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毛泽东的老 师 们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自序

有人曾经这样说过：无论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还是大学问家，大艺术家……都是依靠教育，把他从混沌引向光明。

一代伟人毛泽东，也毫不例外。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毛泽东无疑是政治成就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人——他是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也是人民军队的创建人之一。历史给他留下了一个别人无法取代的显赫地位，当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画面深深地打上了他的印记。他不只是一位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又是集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和军事家于一身的“通世之才”，还是一个杰出的诗人、书法家和文章大家。作为一位人民爱戴的领袖，他更具有超然的人格魅力，其鲜明的个性，浪漫的气质，幽默的谈吐，敏捷的思维，横溢的才情，传奇的经历，多彩的人生，曾令几代中国人深深服膺、景仰。

毛泽东为什么能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子弟脱颖而出，最终成为领导中国人民走向独立与富强的伟大领袖？成为我们这个历史悠久而一度落伍的民族中高高耸立的脊梁？成为一位举世瞩目的历史巨人？他那有限的人生为什么能成就那么大的功业？裹着神秘的谜团，笔者曾花费两年时间，在那些关于伟人出身、家世、成长的书海中寻觅；先后两度赴湘，在伟人的故里探访——在韶山上屋场、唐家托、东山学堂，在长沙，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这些毛泽东早年生活、学习过的地方，踏着伟人的人生轨迹，我恍然有了这样的感悟：毛泽东能走向伟人的“星座”，除了与生俱来便具备成大器者所必备的个人特质和后天的革命实践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那就是长达十余年求学生活的磨炼，为数众多的名师对他的教导培养及对他伟人品格形成的精心塑造。

是的，不是吗？

书本，给他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毛泽东的生身之地——韶山冲，是一个位于湖南湘潭、湘乡、宁乡三县交界处的穷乡僻壤。这里的山川虽也钟灵毓秀，但他养育的子民却大多敦厚本分，足不出户，苦守田园，终老山林。毛泽东之万幸，就在于他有一个比一般山民要高明得多的父亲和一个出身于殷实人家的仁慈母亲，他们用汗水换来的铜板，供儿子进了学堂，拜了先生，学习“识文断字”。自此，幼小的毛泽东便同书本文上了朋友，并在一生中结下了不解之缘。

书本，带他步入悠悠历史长河，去同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对话，使他熟知了中国的三皇五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熟知了世界名人拿破仑、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并立志也要成为这样震古烁今的人。

书本，在他稚嫩的心灵里打上了“阶级”的烙印。童年的毛泽东，读了“四书”“五经”这些“孔夫子的书”；也读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西游记》……这些凡是能在韶山找得到的“杂书”、“闲书”。透过这些书本，这位聪慧少年以其特有的眼光，发现了这么一种怪现象：所有的书没有一本是“写种田人的”或是“种田人写的”。由此再联想到韶山农民食不裹腹、衣不遮体，长沙饥民暴动的惨痛事实，他开始明白他身处社会的腐败，世道的不公，一种朦胧的忧患意识和反叛思想在内心涌动，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的宏愿在萌生。

正是在这种超出常人的志向和使命感的驱动下，少年毛泽东立下“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的誓言，辞别了双亲，走出了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的“洋学堂”去从师求学。在那里，《盛世危言》和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使他对国家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肤之痛，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感的感召下，他又来到省城长沙，参加了辛亥革命军，投身于救国救民的大业之中。结束了半年的军旅生活之后，他又在省立第一师范这块培育“拄天大木”的沃土里，逸游子古今中外的书海之中，如饥似渴地对“中学”和“西学”兼收并蓄，不断地汲取丰厚的知识营养；在自己的苦苦求索和良师的指点下，他确立了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之大本大源”的远大学习目标，立志读通社会这本“无字之书”。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更是义无反顾，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华民族的强盛而不懈奋斗。理想的翅膀，使一个山野村夫的儿子，从韶山到湘乡，从湘乡到长沙，从长沙又“飞”向全中国，尽历千难万险，“虽九死而无悔”，最终找到拯救中华民族、同时也拯救他自己的出路。

老师，教他做一个“大写的人”。

韩愈曾这样论及教师：“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诚然，在教育培养学生过程中，教师的浸透力是巨大的，凡属以教育为天职、以育才为己任的教师，其本身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会给学生以深刻影响。纵观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在他的思想观点中，还是在他的人格修养中，都可以看到良师的痕迹。对此，毛泽东本人在日后也曾多次表示过：在他的青年时代，老师对他“有很深的影响”，“我的知识，我的学问，都是在学校打下的基础。”

幼年的毛泽东，和所有的稚童一样，也有过顽皮的时候，也和老师“造过蛋”，也不大爱读“经书”，甚至还玩点小把戏“蒙”老师——在《论语》下面藏一本“杂书”偷偷地看。为此，他没少被罚站、罚背书，没少挨竹板子。然而，正是严师的督导，他在几年的私塾学习中熟读了老师要求他攻读的“经史子集”，打下了厚实的古代文化知识和文字基础，为日后积累了一笔终生获益的财富。稍长，学习目的已十分明确的毛泽东，由于与旧的教育方针格格不入，不愿“死读书”和“读书死”，因而屡屡破坏校规，几次差点被校方开除，是老师为他仗义执言，以“异材”、“伟器”誉之，他才免除了失学之苦。当他因旧式学校课程繁杂、学风沉闷，几度在校门口徘徊时，是老师给他指明了一条最合适的为学之路——以研究“宇宙、人生、社会之真理”为学习目的；教他“学思结合”、“不动笔墨不看书”、“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的治学之道；要求他遵循德智体“三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以求“身心并完”；引导他投身于各种社会活动，锻炼组织领导才能；告诫他戒骄戒躁，“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团结同仁，众志成城；传授他尚动、尚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尚事实、不尚空谈，从一点一滴做起的求实精神……从而使他成为一名在博与专、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上能够融汇贯通的“饱学之士”，成为一名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人品、才具、胆识出类拔萃的学生。

在毛泽东从师求学的履历中，最重要的一笔还是老师对他进行思想上的启蒙，这才是他将自己“书写”成一个大写的人的起点。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一个外国友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我是从农村

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有段符间受到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觉得改良派也不错，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究竟是怎样“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的呢？诚如他自己所言：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不可能超越他所处的环境和历史。他，这位农民的儿子，童年和少年时代接受的是传统的风俗习惯和孔孟典籍，文化心理上曾受过封建主义的影响，最早的人格也是传统的。从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到王船山、颜习斋、顾炎武；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孙中山；从赫胥黎的进化论、康德的二元论，到十八九世纪欧洲的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以至托尔斯泰主义……他的思想历程是曲折的。在北大“旁听”学习期间，他有幸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思想导师之后，才得以接受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自一九一八年八月至一九二〇年四月的两次北京之行，他在老师的引导及自我反思、自我剖析和自我扬弃之中，终于理清了自身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主义和旧式自由主义这团乱麻，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作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抉择，走上了一个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也登上了人生与事业的巅峰……

教育，赋予了他独特而迷人的性格魅力。

有一位世界名人曾这样说过：“教育像一艘船，领导人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

毋庸置疑，毛泽东确实具备高深的学识，超人的智慧，迷人的魅力。但是，和常人一样，他的知识和智慧也是从刻苦学习中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的；他的性格魅力，也是在长期接受科学知识的教育过程中，凭藉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才逐渐形成的。是教育这艘乘风破浪的航船，载着他，从小小的韶山冲驶向中国革命的大舞台。

了解毛泽东早年生活经历的人们大都清楚，毛泽东是很晚（九岁多）才开始上学的。没进学堂门之前，他与别的农家孩子并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经过数年的私塾学习生活以后，他的性格渐渐显露出与众不同的独特面。

他天资聪颖，求知欲旺盛，虽调皮捣蛋，但会读书；他超乎寻常地早熟，虽家境尚好，但颇知甘苦，因而劳作时勤快、踏实；他有极强的组织能力，是韶山冲里娃娃们公认的“孩子王”；他从小就不怕权威，敢于离经叛道，抗强扶弱；他志向远大，自主性强，对新事物也极敏感，当他得知湘乡县城有一座新式学堂时，便不顾父亲反对，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这里读书。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不断丰富，他那不凡的个人特质更加突出出来。到长沙后，运逢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亲友劝阻，投笔从戎；花大力气考入省一中学，且很快成了学校的“尖子”学生，但他对有限的课程并不满足，对繁琐的校规也极反感，当认识到“自由读书”对自己更有益处后，便毫不犹豫地离开了学校，成了“定王台”下图书馆里的一名自学者。

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他更是有意识地锤炼自己，不懈地磨砺自己的品格和体魄，精进自己的学业。他立志为追求远大的理想真心求学，实意做事，成了一名奋发踔厉，“从早到晚，读书不体”的苦读生；他充分利用良好的学习环境，广泛涉猎各科知识，专心打好学问的基础；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为读懂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利用假期徒步考察五县农村，

了解社会现状，分析社会问题，成为师生人所共知的“游学先生”；他在隆冬时节坚持冷水浴，还有风浴、雨浴，为日后担当大任磨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体魄；他积极从事社会实践，开展广泛的社会活动，为失学工友农友办“夜学”，为同学主持“校友会”，组织“新民学会”，为革命事业团结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富有胆识，智勇双全，领导学生“反帝倒袁”，率领“学生志愿军”缴了北洋军阀一支溃军的枪，保卫了学校。在日常生活中，他谨言慎行，沉静稳重，与同学“约法三章”：不谈金钱，不谈男女私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探求救国救民之真理，探求宇宙与人生……他以其超群的才智，高尚的品德，敏锐的思辩，强健的体格，不凡的胆识和超常的组织能力，使自己成为学校“人物互进”中的“热点人物”，被老师和同学视为“敦品力学”的佼佼者，而倍受器重与钦佩……

有人在论述“权威”类型时曾经说过：有一种“个人魅力型”的权威。毛泽东，作为一个历史巨人，并非仅仅在于他的个人魅力。然而，他那从学生时期便开始“修炼”、并已露端倪的自身性格魅力，无疑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他的同道，也深深地吸引和感染了无数中国的老百姓，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拥戴。这种巨大的人格力量，无疑是推动毛泽东走向伟人“星座”的一股内力。这股内力的凝聚，则是教育的特殊功能之所在。其中，毛泽东的那些独具匠心、苦心琢玉的老师，自然是功不可没的。

翻阅眼前这一沓子厚厚的书稿，毛泽东当年那些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治学严谨的老师，以其鲜活的面容，仿佛一朝我们走来——从私塾的毛宇居、李漱清、毛麓钟，到中小学的谭咏春、贺岚光、符定一；从师范的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再到北大“旁听”时的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无一不是从思想文化和人格品行上给毛泽东以影响的良师。他们，或许并非都是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但却毫无例外地怀着对教育的一颗赤诚之心，把所有的知识精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自己的学生。而他们自身，则大多安于清贫，甘于淡泊。就如同一支燃烧着的蜡烛，照亮了学子的前程，自己却悄然逝去……

写罢《毛泽东的老师》这个小册子，笔者再次感受到这样一句至理名言：教师，是太阳底下最神圣、最辉煌的事业。国家的强盛在人才，人才的成长在教育，教育的兴旺在教师。教师，最清贫，但最富足；最平凡，又最伟大。她培育了数不尽的经天纬地之才，而我们的江山又是靠这些国之栋梁撑起的。

老师，是第一个教会学子认识“人”字的人，若干年后，人们是否还记得他们最初的模样——那像父母一样曾经依赖过的人？！

世上有着许许多多感情，唯有师生之情最单纯、最真挚，最令人难以忘怀。

从一个农家弟子到成为一个泱泱大国的伟大领袖，教育自始至终在毛泽东身上显示了无与伦比的神奇力量。他从自身成长的历程中，深深领悟到一条既浅显又深奥的道理：教育是中国未来，教师是国家的真正财富。一个只重视物质财富而不重视精神财富的社会，不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一个只注重抓经济建设而忽视抓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人，不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因此，教育始终在他头脑中占据重要地位，老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深恩永远铭刻在他心头。伟人常常极富感情地对师友表露心曲：“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

是的，古老的传统文化精华，赋予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观念，毛泽东又是尊师重教的表率。解放后，身为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仍然十分珍视他和他的老师们那份师生之情。日理万机的他，多方设法同每一位健在的任课老师沟通了联系，时常与老先生们书来信往，畅叙旧谊；把老师接到中南海做客，亲执弟子之礼；老师生活有困难，他接济钱粮，问寒问暖；老师去世，他亲书碑文，颂扬师思；即便是对当初“整”过他的个别老师，也不念旧恶，仍以礼相待，尊敬有加……伟人用自己的行动，谱写了一曲尊师重教的千古绝唱。

毛泽东的老师们，爱生如子，诲人不倦，堪称一代师表；毛泽东为学勤勉，尊师敬贤，更是莘莘学子的典范。

毛泽东的老师们
尹高朝

第一章 巨人出世

深山大泽，蛟龙生焉。

——《左传》

没有深山难出虎豹，没有大海难养蛟龙。

——作者手记

1 腾“龙”之地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几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什么县？

出了个什么人世界把名扬？

浏阳河，弯过了九道湾，

五十里水路到湘江，

江边有个湘潭县，

出了个毛主席世界把名扬……

一曲自然、质朴的湖南民歌，中国的老百姓唱了近半个多世纪，唱了几代人，唱红了八百里洞庭，更是唱红了楚南名山——韶山。

九嶷山下，斑竹之乡的湖南，是中国最秀丽、富足的省份之一。民歌中所唱的“湘江”，是贯穿湖南的一条最大河流，在它与涟水的汇合处，便是湖南的湘潭县。湘潭在清末隶属于长沙府，面积一万五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是当时湖南重要的商业城市之一，也一度成为“洋货”倾销中国内地的中转市场。那时，中国的蚕丝、茶叶运往国外，要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往广东出口，湘潭与广州之间的商务活动极为繁忙，陆路肩货的商贩不下十万人。与此同时，凡是外国运来的货物，在广东上岸后，就先运到湘潭，再由湘潭运到国内各地。英国太古公司、日本怡和公司等外资企业，专门制造了一批浅水轮，忙碌奔驰于湘潭、长沙等地

湘潭县城昔日确有几分繁荣，但它的属地却多是贫穷、苦寒、凋蔽之所。在湘潭与湘乡、宁乡交界的地方，就有这么样一个偏僻落后的山村——韶山冲。它的地理坐标在东经 112 度 24 分至 112 度 38 分与北纬 27 度 51 分至 27 度 59 分之间，东北距省城长沙 180 里，东南离湘潭 90 里。冲里的人若去省城长沙，要走一天半的“旱路”，或走一段旱路再搭船走水路；若去湘潭县城，就要从天亮走到天黑。韶山冲山青水秀，冲里稀稀落落地散居着六百多户山民，有毛、李、钟、周、邹、彭、庞等几姓人家，其中十之七八姓毛。他们忠厚、朴实、勤劳、善良，但生活穷困。那时，在这一带的平头苍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些描绘自己生活的顺口溜：

“韶山冲，长又长，砍柴做工度时光。

鸡鸣未晓车声叫，隔夜难存半合粮。”

“韶山冲，冲连冲，十户人家九户穷。

有女莫嫁韶山冲，红薯柴棍度一生。”

还有一首民谣唱道：

“韶山冲来冲又冲，丈夫砍柴做零工，

一天弄得升把米，儿啼女哭难维生，

粗糠野草口里吞。……”

韶山虽然贫穷落后，但却有其神奇动人的传说。

相传，在远古时代，虞舜帝在尧把盟主的尊位禅让给他以后，为造福人类，开拓疆土，辞别爱侣娥皇、女英二妃，甘冒辛苦，涉黄河，渡长江，深入荆楚蛮荒之地，探测山川利弊，规划拓垦宏图。南巡途中，他在经过湘中山野时，看到处处是苍松翠竹，郁郁葱葱。山明水秀的自然景色，令舜帝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于是就与臣僚在湘江流域的湘潭韶山宿营，并在韶山冲边一座不高的山上建起南巡前沿大本营。自此，每当巡游队伍歇息休整之时，

侍从们便在行宫为舜帝奏起“萧韶九成”，臣僚、侍从们随着这欢快优美的乐曲载歌载舞。瞬间，山崖翕然，山鸣相应，声振林木，引得凤凰前来朝仪，翩翩展翅起舞，嚶嚶和鸣。山野胜境，人间盛会，亘古传颂。

著名英国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后来根据上述传说，在她的《早晨的洪流》一书中也曾写道：“舜来到韶山，他喜欢那富饶多产的绿色平原和那闪闪发光的曲折流水。他登上山，坐在悦人的山顶唱起歌来。他设计了一种伴唱的乐器，因此韶乐这个名称是这个地区特有的。而韶山也就是音乐之山。空中的飞鸟给舜的乐曲迷住了，都聚集到这里，其中也有凤凰；凤凰留了下来，成双成对地造起了窠巢。因此，韶山统称为凤凰的诞生地。伟大的人干出伟大的事业的地方。”

韶山有不少风景名胜，最著名的有“仙顶灵峰”、“仙女茅庵”、“胭脂古井”、“石屋清风”、“顿石成门”、“塔岭晴霞”、“石壁流泉”、“凤仪亭址”这“八景奇观”，据传这些都是舜帝南巡时游览过的地方。此外，还有“六朝松”、“飞来船”、“四方竹”、“白石泉”等“韶山四绝”。

在美妙无比的韶山，尤以韶峰险峻、壮观。韶峰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在群山中“拔起一峰，高出云霄，为诸山之祖”。登上韶峰，群山皆在脚下，向远处眺望，洞庭湖景色尽收眼底。有诗赞曰：

“从来仙境称韶峰，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此是湘南第一龙！”

故韶山又有“龙山”之称。韶山冲那南北长五公里、东西宽三公里的狭长山谷地，遍山生长着松、柏、杉、枫，夹杂着丛生的楠竹，景色秀美。从山谷中流出的溪水汇成一条小河，河水清澈明净，潺潺流淌，默默滋润着乡间田野。远远看去，犹如一条昂首翘尾，跃跃欲飞的苍龙……

然而，韶山的美名美景，许久以来并未被人们所认识。“两脚忙忙走，为的一张口”的庄户人，无闲心去领略自己故乡奇瑰俊秀的风姿，只有少许不为柴米油盐酱醋茶操心的士大夫们，偶尔乘着雅兴，迈着方步，走马观花地来游览一番。

谁曾料想，历史竟有许多惊人的巧合——五千年前舜帝南巡偶然驻足的地方，五千年后会出现一个震古烁今的伟人毛泽东！人称“龙山”的韶山，竟真的腾飞起一条“巨龙”！

毛泽东，为韶山添上了耀人的光彩。从这个时代开始，韶山——这块舜帝巡视过的神奇土地，这块诞生和养育了一代伟人的光荣土地，这块为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先后献出过一百四十多位优秀儿女的英雄土地，这块灵秀聚钟，俊山丽水的锦绣土地，才真正被世人向往和瞩目！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土生土长的韶山人，才真正感觉到作为生活在“腾龙之地”的子民的价值和份量！

毛泽东，是韶山人的骄傲与荣耀——韶山因一代伟人毛泽东生于斯、长于斯而名贯中西，并将名垂青史。

韶山，是毛泽东成长的摇篮——“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法自然是无稽之谈，但地灵人杰的说法却不无道理；“地域环境论”者的观点虽不可取，但却不能否定“山川资俊杰，时势造英雄”的正确性。如果说毛泽东走出韶山后，投入革命大潮，驾驭历史航船，使自己成为划时代的历史巨人是得力于时势的话；那么，他的素质，他的品格，他的胸襟，无不是韶山的山水陶冶了他、启迪了他。他的性格来源于韶山韶水韶峰，给他以崇高与坚强；韶

水，给他以豪爽与奔放；大山与旷野，给他以博大和深邃！他的伟大，与他
广义上的母亲——韶山，给他的昭示分不开！

美哉，韶山！壮哉，韶山！

2 关于出生和家世的种种传闻

韶山好像一座锦屏，绵延起伏约二十里长，它的落脉处是一座小山，树木茂密，人称韶山嘴。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环水抱的南岸。这里有一栋湖南农村常见的“凹”字形农舍，当地人把这种式样叫“一担柴”，这就是上屋场。堂屋坐南朝北，背山面水。屋前荷花塘和南岸塘相毗邻，绿水莹莹，风过处，荡起缕缕涟漪。放眼青山，背倚翠竹，山川相继，苍松和翠竹把这座普通农舍装点得生气盎然。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十一月十九日辰时，也就是公元1893年12月26日的上午，在上屋场这幢房子东头居住的毛姓农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三。他就是后来闻名中外的人物——毛泽东！

后来，有人按延续了几千年的古老思维方式，把毛泽东等同于真龙天子、君王皇帝。对于他的出生，编造了许多牵强附会的传闻。

有人说，毛母十月怀胎时，曾梦见过蛟龙飞舞；也有人说，他临产前，时令虽在冬至过后，却陡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风倾盆；还有人说，他降生时，青天白日，天上忽然掉下一坨金光耀眼的东西，直落到上屋场。

摸八字卜卦的老先生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清乾隆帝下江南时，早就断言湘潭要出真龙天子，论姓氏，就是“反手梳头”，隐喻了一个“毛”字；

看相的老头明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一统天下，全凭他下巴上那颗又圆又粗的肉红色“乾坤痣”；

看风水的白胡子老信说：毛泽东家的祖坟墓葬在了龙脉上，坟山贯气，后辈儿孙中出了真龙天子，这全是祖宗显灵，阴功之力……

如此种种传闻，说得有鼻子有眼，神乎其神，玄而又玄。

但是，谣传毕竟是谣传。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他和普通人一样，生就的是一副肉体凡胎；他的降生，也实实在在地和千千万万个湘中农家孩子没有什么两样——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而呱呱落地，两只半睁半闭的眼睛，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世界。

不过，若论及毛泽东的家族姓氏，则真有一番考究。毛姓，是华夏的一个古老的姓氏。像其他许多的古老姓氏一样，它起源于姬姓。相传，具有雄才大略的周武王推翻商朝最后一个暴君纣王以后，封他的弟弟叔郑为毛伯。所以，叔郑又被称为毛叔郑。古毛国的领地在今陕

西省岐山、扶风一带。毛伯后来在周成王时，曾任司空，又称毛公。现今出土的著名国宝青铜器毛公鼎就是毛国遗物。毛伯的子孙在整个周朝时代，世袭其土，遂被称为毛氏。乾隆二年《毛氏族谱》载：“吾姓系出周姬文王毛伯郑之后，世为周卿，因国为氏。自毛亨、毛萇注诗训诂，西河遗源，固深且远矣。汉、晋、唐、宋迄明，莫不代有伟人，光炳青史。考其根源，历历可据，承其年代，派衍如珠之串，如蝉之联，不惟震惊一时，实足赫耀千古矣！”

韶山毛氏，与如此古远的陕西毛氏是否有其渊源，有待查考；但韶山毛姓从其鼻祖毛太华始，这却是有据可考的。二修《毛氏族谱》对此有详尽记载：

“始祖太华，元至正年间（公元1341——1368年），避乱由江西吉州龙城（今江西吉水县），迁云南之澜沧卫（今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娶王氏，生子八。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庚申，以军功拨入楚省。惟长

子清一、四子清四与之偕行，解组侨居湘乡北门外绯紫桥。十余年没，葬五里牌道士山（距湘乡市城关五里之城郊）。后清一清四公，卜居湘潭三十九都，今之七都七甲焉，开种铁陂、乌塘、东塔等处（均为韶山境内小地名——引者注），共田四百余亩，编为一甲民籍。”

原来，毛太华乃是江西吉州府龙城县一农人，在元末红巾军起义如火如荼、天下大乱之际，不甘寂静山林、老死蓬蒿，毅然放下手中的锄头，举起长矛，投奔到朱元璋农民起义的队伍里。大明江山建立以后，毛太华又以下级军官百夫长的身份，随同大将傅龙德、蓝玉西征云南，力拒蒙古族铁木真子孙的铁骑。云南归入大明版图后，明太祖朱元璋令自己的养子沐英世代治滇，毛太华又是被留下镇滇的军人中的一个。从此，毛太华以边地为家，像许多军屯的战友一样，娶一拉祜族姑娘为妻室，决意埋骨边疆，永保社稷平安。晚年的毛太华，身在边陲，心中却念念不忘内地的故土，盼望着落叶归根。遇圣上贤明，体惜他一生征战，屡建功勋，且戍边多年，忠义可嘉，便由朝廷奖励准许他携妻儿回到内地。于是，毛太华偕妻子和长子毛清一、四子毛清四内迁，在湖南湘乡县城北门外的绯紫桥安家落户，并分得了一些田产，过上了不愁生计的平民生活。不久，毛太华的两个儿子又迁移到湘潭七都七甲，也就是今天天下闻名的韶山。自此，毛氏家族便在这山青水秀的韶山繁衍生息，世代相传。正如四修《毛氏族谱》所称：“我毛氏世居韶山，子姓繁衍，近达数千，大开韶山一族。”

因此，自明至清数百年间，韶山毛家子孙都把毛太华当作韶山毛氏开山始祖，并尊定其为第一派。到清乾隆初始修毛氏族谱，从第七代开始制定了固定谱系，合起来恰成一首五绝：“立显荣朝仕/文方运际祥/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毛氏族谱》二修时，因感原订二十个谱系行将排满，便又续订了二十个：“孝友传家本/忠良振国光/起元敦圣学/风雅列明章”。毛泽东的祖上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他们遵循家训和家戒的要求行事，孝父母，悌兄弟，勤劳本业，品行端正，与乡邻和睦相处，在韶山世代繁衍，从太华公算起，到毛泽东这一代，已是五百一十余年历史，第二十代子孙了。

显然，祖先没有留给毛泽东显赫的门第，没有留给他丰厚的家资，也没有遗传给他高贵的血统。

可是，祖宗却给了他山的坚强，水的柔情，土的朴实，火的激情，还有那永远也抹不去的农民底色。始祖毛太华公与异族姑娘结合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传基因，又赐予他少数民族的粗犷强悍和我行我素、永不服输的个性。

3 毛泽东名字溯源

毛家喜得贵子，在过完“九朝”后第一件事便是要给他取名字。

姓名，不过是一个人的代号而已。但中国数千年来形成的传统习俗，却赋予了姓名丰富的、无穷的含义，且形成了极为复杂、颇为严格的取名法则。仿佛有了个吉祥的名字，此人即可鸿运齐天了。

像旧时其他各族各乡的人给儿孙辈取名一样，毛家给子孙取名，严格按照《族谱》既定谱系，即按其辈份长晚在谱系中取相应的一个字。这样取的名字叫“派名”或“祖名”。毛泽东前后的几个辈份分别是“祖恩贻泽远”，毛泽东自己是“泽”字辈，因之取“泽”。至于“东”，古人以东西南北对伯仲叔季，取其老大之意。毛泽东虽在家族同辈中排行第三，却为弟兄中居长，理当为“东”了。这便是“毛泽东”姓名的来历。现在，韶山毛氏“泽”字辈的，尚有七八百人呢！

毛泽东有了一个好名子。后来有人望文生义，认为“泽东”二字意为“润泽华夏大地，恩惠东方”，因此认定给毛泽东取名的人一定才高八斗，甚至还生出许多神秘的猜测来。其实，给毛泽东取名的是他的父亲，他只不过念过两年私塾。但不可否认，正是这位乡野村夫，不仅给了毛泽东一副顶天立地的身躯，还赋予他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名字。

其实，毛泽东一生中不只有父亲给他取的这个大名，他还用过许多名、号，并且大都有特定含义，只不过是“毛泽东”这个名字太响亮，因而使他另外的名号鲜为人知——

毛泽东的乳名叫“石三伢子”，说来有一段缘由。旧时，韶山有这么一种风俗，父母分明望子成龙，却要给他们的孩子取最平常、甚至卑贱的小名，如“狗娃”、“石头娃”、“叫化娃”之类。在毛泽东的前面有两个哥哥，但先后均在襁褓中夭折。毛泽东出生后，毛母生怕三儿子又不能长大成人，就抱着他到滴水洞后山的观音岩拜一块巨石做“干娘”，寄名石山，寓意坚如磐石，希冀他百年长寿。又因其排行第三，故取字“石三伢子”作为乳名。老天没有辜负毛母的心愿，毛泽东身材高大、伟岸，体魄强壮。一生历尽风险，大难不死，实属健康长寿之例。有这样的身体条件作保障，他得以在几十年政治的大风暴中，始终如一地稳如泰山。

“润芝”（或咏芝、润之、润滋），是毛泽东的字。中国古代有这样的习俗，男子二十而冠，成年后即可依据本名之含义而另立别名，称之为字。

《礼檀弓上》说：“幼名，冠字”。疏：“人年二十，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等，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古代人取字，是极为重视和讲究的。名与字之间相互关联，要相得益彰，且从声韵而言必须平反对仗。“泽”与“润”字，字义相近，均可理解为雨露滋润的意思；“咏芝”则是“润之”的谐音，它寓意“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以言志。这个号借喻植物，烘托出了毛泽东向往、讴歌美好事物的心灵。

1910年秋，毛泽东求学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他因仰慕梁启超（号任公）的犀利文笔，又兼具立志以天下为已任，给自己起名“子任”。

1915年暑假后，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为了寻觅志同道合的朋友，在长沙各校贴出《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启事署名“二十八画生”，寓意“毛泽东”三字。

1929年7月至10月间，毛泽东受排挤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他心情抑郁，食不甘味，引发肠胃疾病，便化名“杨引之”，到福建西部农村“治病

疗养”。有人说，“杨引之”即是“杨隐之”，是毛泽东意欲隐退，以此表示对那些高高在上、自诩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的抗议。至于杨姓，则是失意的毛泽东对其远在湖南家乡的爱妻杨开慧那深切思恋之情的流露。

1936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给分别十载、仍留滞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老同学易礼容写信问候，信中的署名为“杨子任”，以“子任”为双方共勉，意为拯救民族的灾难、促进国共合作、统一抗日而共同努力。

1947年3月，国民党反动派以重兵向陕北发起猖狂进攻。为了诱敌深入，在运动中寻找歼敌良机，党中央决定撤离延安，毛泽东化名“李得胜”，取“离得胜”谐音，意为此时主动放弃延安，将换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同学们曾善意地给毛泽东送了一个外号，叫“毛奇”，以此称赞他胸怀大志，不同凡响。1946年，毛泽东还曾用过一个化名：事任……

此外，毛泽东曾经用过的名字还有：允滋、自任、国彬、赵东、马任等等。在其文稿信函中，有时还把润芝写成“咏滋”、“永滋”，或干脆简写成一个“润”字……透过这许许多多的姓名中，人们似乎窥见了毛泽东的性格、志向和情操，以及他一生的经历和思想发展概况。

尽管毛泽东用过如此众多的名字，但“毛泽东”这个名字无疑是最响亮、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战争年代，它是号角，又是胜利的象征，惊天地，泣鬼神；和平时期，它又是方向，是旗帜。“毛泽东”这三个字是与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论家和诗人紧紧联系着的。它在长达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深深影响着中国的命运，并引起全世界的震动与瞩目。提起毛泽东，人们便油然而生一种敬爱、信赖乃至狂热的崇拜之情。于是乎，他被咏成诗，谱成歌，响彻赤县神州！

早在1938年秋，有人便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的旧居门口，张贴了一副对仗工整、含义深远的大红对联：

泽沛苍生

东来紫气

1945年10月，大文豪郭沫若对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毅然亲赴陪都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无尚敬佩，也用了巧嵌“泽东”二字的形式作对：

泽色绘成新世界

东风吹遍旧河山

1942年，陕北赶驴老汉李有源，挑着担子和边区群众一起投身于大生产运动。面对着从宝塔山上冉冉升腾的一轮红日，老汉思绪万千，激动无比：从前是牛马，有苦难言；如今做主人，幸福无边。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放开喉咙唱出了他家祖祖辈辈的喜悦和欢欣——

东方红，

太阳升，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4 父母双亲——第一老师

关于毛泽东的父母双亲，四修《毛氏族谱》作了如下记载：

恩普，子一，貽昌，字顺生，号良弼，行一。清同治九年庚午九月二十一日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十二月初八辰时没，葬韶山南岸楠竹坵卯山西向。配文氏，清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初二辰时生，民国八年己未八月十二辰时没。葬合夫冢同向。子五，长次殇。三泽东、四泽民、五泽覃、女二殇。

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生于1870年10月15日，少时读过几年私塾，十岁时由父母做主与湘乡县文芝仪之女文七妹订了婚，十五岁完婚。稍后，为替父亲偿还购置田产的欠债，不得已外出从军。两年后，他结束了兵旅生活回乡，用在军队发饷银积攒起来的钱，还清了债务，赎回了被典当出去的田产。然后，便开始独当一面，治理家业。毛貽昌精明能干，克勤克俭，肯劳动，善经营，加上贤慧纯良的妻子文七妹的内外操持，仅五六年功夫家业便日渐兴旺起来。儿子毛泽东降生的时候，他家已有水田十五亩，年收产稻谷六十多担。

毛泽东的出世，给毛貽昌一家带来了喜气。封建伦常一直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毛家先后两次得子，可都夭折了。这下可好了：毛家不仅有了“后”，而且家业上也后继有人。毛貽昌是个终身务农经商、生财有道的中国农民，他甚至在孩子怀胎母腹中就早已给他设计好了道路：做一个好角色的农民，或者一个会营生、能挣钱的生意人。为了给子孙后代留一份家产，他开始把脚从田垄里拔出来，把眼睛投向韶山外面的世界，经营起生意来。他家请了帮工，忙时帮助种田，闲时将自家口粮之外的剩余粮食舂成米，挑到银田寺集市上去贩卖，并用米糠喂养架子猪出售，间或也贩卖耕牛。后来，由于取得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生意的规模不断由小到大，由短途贩运粮食发展为长途贩运，并由肩挑改为土车运送，直到用船只运往湘潭销售。家里的雇工也由起初的短工，变成后来的长年雇工。不过，家里人还照常干活，没有一个吃闲饭的，就是儿子毛泽东也要干些割草之类的轻活，大些了就下地干农活。正是这样勤扒苦做，毛家的钱渐渐攒多了，便买进了七亩水田，使田产增加到二十二亩，每年收稻谷约八十多担，加上做生意的盈利，毛家的资产已达到三千元，在韶山已是一个殷实人家了。

家业的发达，家庭生活的富裕，使毛貽昌产生了要让儿子毛泽东读书识字的想法。楚人多奉行“穷莫丢猪，富莫丢书”的古训。毛貽昌看到自己岳父家出了不少读书人，确实比捏锄头扒土巴、勒牛尾巴的农民风光得多；特别是他目睹族人中有的因缺少文化，虽然家资颇丰，仍免不了要受那些“刀笔”的捉弄，他就越发想让儿子知书达理，有满腹经纶，好替家族争气，为门楣增辉。于是，毛貽昌便把年纪虽只有六七岁，却长得大手大脚、个头跟十几岁的孩子一般高的毛泽东，送进了私塾读书。大概毛貽昌做梦也没想到，他这略比一般山民高明的举动，会使自己的儿子日后成长为一代伟人；他也根本想不到，自己儿子的名字日后会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相连，深刻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着中国的那么多代人！

毛貽昌继续积累钱财，一心只想发家致富。他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还与湘潭、湘乡等地的一些店铺有生意往来。他自家还印制了一种叫“毛义顺堂”的纸票，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日杂等好几个店铺的大商号，它的老板是毛

贻昌妻兄文玉瑞的岳家赵蕊香。为了与“吉春堂”永结联盟，毛贻昌同赵蕊香老板于酒酣耳热之际，缔结了秦晋之交——指腹为婚，一手包办了妻子腹中婴儿泽覃与赵家尚在母腹中的婴儿先桂的婚姻。大约在此后的两年，毛贻昌又因家里田间劳动人手不足，给年仅十四岁的儿子毛泽东，娶了一位大他四岁的罗姓女子为妻。性格和他父亲一样倔犟的毛泽东自然不会屈从，结果酿成了一场令父亲终身耿耿于怀、并认为是儿子最大的忤逆不孝的“抗婚事件”。

由于毛贻昌的不懈努力，他家终于跻身于韶山的富厚人家了。1918年，他终将父亲在1878年盖的泥墙草顶房子，改建成青砖瓦房，从而实现了他的夙愿。两年后的元月23日，毛贻昌因患急性伤寒病逝世，终年五十岁。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年出生在湘乡县四都唐家托（今湘潭市韶山市大坪乡棠佳阁）的一个小康人家。她从小没读过书，连正式名字也没有，因在娘家排行第七，家中及邻里昵称她为“七妹”。1936年斯诺根据毛泽东的回忆将文七妹音译为“文其美”，那是因为他不了解，在中国封建社会农家女子有姓无名者相当普遍。文七妹娘家唐家托与韶山隔一座云盘大山，相距十余华里。其父文芝仪是个勤劳忠厚的农民，文家以务农为主，也兼做些小生意，家境还算不错。文家的祖坟在韶山，因为每年要到这里瞻扫坟墓，想在韶山攀门亲戚，找个歇脚处，托人打听到毛贻昌人品还不错，便将文七妹许配给他做了媳妇。

文七妹中等身材，圆脸庞，宽前额，有一双聪慧的眼睛，长得清秀、端庄。她心地善良，性情温和，勤劳俭朴，聪明贤淑，在娘家深受父母、兄长和姐姐的疼爱，出嫁到韶山后也是受乡邻称道的好媳妇。七妹比毛贻昌大三岁，十三岁到毛家做“黄花媳妇”，十八岁正式圆房完婚。婚后头两胎所生的两个男孩，都在襁褓中夭折，第三胎是毛泽东。她一生中共生育七个孩子（五男二女），但成人的只有泽东、泽民、泽覃三兄弟。

毛泽东出生时，文七妹已二十六岁，因之非常疼爱自己的孩子。她生怕毛泽东“八字大”、“根基不稳”，便多方求神拜佛保佑爱子平安，为表示对你的虔诚，还吃起“观音斋”来。同时，她将毛泽东寄养到自己娘家这个家丁兴旺、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还拜唐家托后山龙潭托口的一块巨石作干娘，取名“石山”，因毛泽东排行第三，故乳名为“石三伢子”。毛泽东孩提时，每到傍晚时分，上屋场便传出“石三伢子——石三伢子”的深情呼唤，那便是母亲为她的第三个孩子招魂，祈求他平安长大。稍长，性情倔强的毛泽东，时而和专制的父亲发生冲撞，关键时刻总是母亲出面为他解围，劝说父亲熄灭雷霆之怒，使他一次次免受皮肉之苦……在少年毛泽东的眼里，母亲最美丽、最善良，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母亲。

毛泽东，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富实的家庭，就生长在这样一个具有“严父慈母”结构的家庭。

有人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老师。对于毛泽东来说，他的父母的确是其他任何人也取代不了的老师。他们是平平凡凡、普普通通的家长，但同时又是富有特色的不平凡的人，同其他湘中农民相比，他们确有杰出的一面。毋庸讳言，毛家“严父慈母”的特点，在毛泽东早年的性格沉淀中起了重要作用，父母的品格特征在他身上潜移默化，有的方面在他一生中都产生着正的或负的效应。如果不这么看，那就无法理解和追寻毛泽东成长为巨人的历史

轨迹。

一些有关毛泽东的传记作品，常将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描绘成一个暴戾、自私和骄横的人，而忽视了他吃苦耐劳、勤俭治家，为振兴家族而孜孜不倦地苦斗的精神，忽视了他的顽强、刚毅与执着。事实上，毛贻昌性格中的许多方面给了毛泽东以良好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毛贻昌并非是一个“坏爸爸”，更不是“坏人”，他是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代人。他辛勤劳作，使家庭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他所需要的不过是依照传统方式养家糊口、日子兴旺、勤劳节俭，子女恭顺听话而已。那时，毛家已是韶山一带数得着的富裕人家，而毛贻昌仍让孩子们过勤劳俭朴的普通农家生活，给儿子们领略人生的艰辛和生活之不易的机会，并逐渐养成为幸福生活不懈努力奋斗的良好习惯。对此，毛泽东自己也承认：“我刚学了几个字，父亲就让我开始给家里记帐。他要我学习珠算。由于他的坚持，我开始在晚上记帐算帐。他是个很认真的监工，特别不愿看我闲着，如果没什么帐可记，就让我去干农活。他脾气火爆，经常打我们兄弟几个。他从不给我们钱，给我们吃的也很差。每月十五，他对雇工开恩一次，给他们吃鸡蛋和米饭，但对我他既不给蛋也不给肉吃。”“回想起来，我认为是我父亲的严厉招致了他的失败。……我们全家结成真正的统一战线来反对他。同时，这种严厉大概也使我受益，它使我更勤奋工作，更仔细地记帐，免得让他抓住什么把柄来训斥我。”由此看来，毛泽东倔强的性格和百折不挠、刻苦奋斗的精神何尝不是他父亲赐予的？！

毛贻昌对毛泽东的成长起着决定作用的另一举动，是应允儿子求学读书。在当时，毛氏父子确实有过矛盾与冲突，但在那个时代的农村，父权盛行、父亲对儿子的偶尔打骂也属常见现象，它不过是中国的古老遗风。其实，毛贻昌对毛泽东是格外疼爱的，只不过是把这种深沉的父爱埋在心头而已。毛泽东能到东山、长沙读书，正是依靠父亲支撑起来的这个略为富有的家庭的支持与供养，才得以实现。这长时间的供养不是出于自私，而是出于父亲对儿子的一片爱心。这一举动的意义的确是难以估量的，正是毛贻昌让儿子读书，让他在他的许多师长们的引导之下，透过白纸黑字走上了文明社会；正是由于儿子通过学习，掌握文化知识——这通向智慧之门的钥匙，才能够毫不犹豫地走出了这既是“腾龙之地”，同时又是闭塞、落后的山村，了解和认识了一个比韶山冲广阔得多的世界，从而去探求一条国家和人民的、也包括他自己的人生之路，朝伟人的星座走去！

与毛贻昌的强悍、苛刻和冷峻形成强烈反差，毛母文七妹教儿子仁慈、施舍与博爱，她以一个女人和母亲对人世的洞悉与理解，从另一个侧面塑造着毛泽东。在母亲的影响下，毛泽东自幼信佛，佛家的普度众生、积德行善和平等观念，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关于毛泽东受其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从小同情弱者、帮助穷人的故事，至今仍在韶山一带盛传不衰。

一次，毛泽东的父亲叫他去收一笔欠款，在路上碰到一个贫病交加、告借无门的穷乡亲，毛泽东给了那人两块光洋。有一天，父亲要他到谭沙河家取一百元借款，正碰上有个雇农也去借钱买米下锅，谭沙河怕那人借了还不

起，硬是不惜，毛泽东便掏出六块光洋送给这位雇农。回家后，父亲清点钱数发现少了六元钱，便责问是怎么回事？毛泽东谎称钱掉进塘里了，父亲气得脸发白，可也无可奈何。民国七年过年，穷人是个难关。此时适逢毛泽东从长沙放假在家，他和母亲商量，凡是提篮子上门的，毛家就给一升米、半斤肉，给穷人过年。毛泽东有位堂叔毛菊生，家境十分贫苦，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为了发家致富，在堂弟最困难时，买下他家七亩水田。毛泽东看到堂叔因失去土地而难得温饱时，他幼小的心田里常常起伏不平，他感到世道不公，更为叔叔的窘迫而同情。因此，在好心的母亲的支持下，常偷偷地送些粮食去接济堂叔。每逢年关，娘儿俩还瞒着毛贻昌给毛菊生家送米、送腊肉。

在东茅塘读书时，离家有好几里路，毛泽东寄宿在私塾。一天，文七妹给儿子装好两斗白米，让他顺便带到私塾当口粮。十六岁的毛泽东，挑着一担箩筐走出家门，时间不长；就空着箩筐回来了。文七妹见状，就问儿子怎么回来得这么快，毛泽东就把路上遇到本家毛承七夫妇吵架的事向母亲说了一遍。因为毛承七一家已断粮，毛氏宗祠里百把担谷子被族长毛鸿宾卡住，不肯平糶。七嫂无奈，带着女儿到外村的大财主家里去讨米。毛承七嫌她给自己丢了脸面，十分生气，夫妻就大吵了一场。毛泽东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把自己那担箩筐挑进毛承七的家里，把那两斗白米，倒进了他家的米缸。母亲听完毛泽东的叙述后，很赞同儿子乐于济贫的做法，随即又亲手量了两斗米，让儿子再挑到学堂里去。

毛泽东对于母亲的善良和慈爱，心里十分感激。他后来回忆起他的母亲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毛泽东养成了诚实、勤快、踏实、质朴等优秀品德；同时，属于他所独有的性格，也已露出了端倪。——他诚实坦白。一个炎热的夏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邻居毛开四阿公的菜园偷摘黄瓜吃，主人发现后追赶过来，其他的孩子都跑了，唯独他一人留了下来。他甜甜地叫了声“四伯伯”后说：“我口渴了摘了条黄瓜吃，下次再不了。”开四阿公见他小小年纪如此诚实，大为惊讶，不仅未责备他，还摘下几条黄瓜让他带回家去吃。

——他勤劳肯干。毛泽东尽管年龄不算大，但做起事来却不比成年人差，他除了帮家里干农活外，还在自家屋后开辟出一块菜园子，种了许多蔬菜，并在房前屋后和地头上栽上了树。在南岸旧居，由他亲手栽种的树苗而今已长成参天大树了。他喂牛时，常用铁篦子给牛梳篦，使牛毛里不藏虱子，上屋场故居还保存有他当年用过的篦子。

——他很踏实。一天父亲让他和弟弟泽民一起去收扯泥豆，弟弟调皮，耍滑头，先拣豆子长得稀的地方扯，很快便扯了一大片。当哥哥的却在豆子密集的地方扯，尽管花的力气多得多，豆子也扯得多，可面积却不如弟弟的宽。父亲来了，随便一看，就称赞弟弟而责备哥哥。哥哥呢，虽然心里感到委屈，可一看弟弟那因受到父亲的夸奖而涨红了的小脸，委屈顿时冰释，不禁露出宽厚的微笑。

——他很俭朴。虽然家境较好，但毛泽东从小穿的是粗布衣，吃的也很差。他很珍惜粮食，从不肯随意浪费一点。这种良好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的

参见《韶山地区老人座谈会记录》，1968年11月17日~21日。

晚年。新中国成立后，他身居要职，但平时吃的穿的和一般老百姓并无多大区别。这些美好的品德，赢得了全国人民对他的衷心爱戴和拥护，赢得了崇高的威望。

——他藐视权威，酷爱斗争。他比一般孩子更不好束缚，更具倔强的性格和反抗精神。父亲的苛刻、吝啬、粗暴、唯我独尊、盛气凌人的家长作风，成为少年毛泽东反抗的最直接、最原始的对象，父亲是他反叛性格形成的最初老师。十三岁时，毛泽东终于找到了一个反抗父亲的行之有效的方法，那就是借着父亲的话，引经据典进行反驳。父亲喜欢责备他不孝，他就用经书上“父慈子孝”的话来回敬，说是父慈在先，子孝在后，父不慈子怎么会孝呢？父亲说他懒惰，他反唇相讥，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干活，你年纪比我大两倍多，理应多干活。他还向父亲宣称：等到他长到父亲这样年纪的时候，自然会比父亲勤快得多。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父子二人的冲突终于导致激化。有一次，毛贻昌设宴招待生意行中的客人，让儿子出来与客人见面，毛泽东非常厌恶这套繁文缛节，故拒绝奉迎。父亲当众责骂他不懂事、没礼貌，盛怒之下他便和父亲顶撞起来。父亲要打他，他愤而出走，毛贻昌追赶出来，责令他回去。毛泽东见父亲其势汹汹，便跑到门前的水塘边，威胁说：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要跳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父亲也只得软下来，双方都同意讲和。父亲坚持要求他跪下磕头认错；毛泽东则表示，如果父亲不打他，他可以跪一条腿磕头。结果达成了“协议”，一场父子之争在双方的相互坚持和退让中平息了。这次反抗的“胜利”，使他得出结论：“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父亲就软下来；可是如果我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通过这件事，毛泽东尝到了反抗强权的甜头，斗争的滋味。这一点后来被概括成：“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有古训曰：“三岁一看，到老一半”。这童年的馈赠，对毛泽东不会没有关系。他后来在激烈的政治斗争生活中所表现的酷爱斗争中的乐趣、胜利中的喜悦，绝不能说与他少年时期在家庭中的经历风马牛不相及！而应该说，毛泽东从小与父亲的矛盾和斗争，培养锻炼了他，对他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不懈的造反精神和叛逆行为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笔者这样说并非是渲染毛泽东的父子关系不正常。恰恰相反，它是那个时代的共有特征。凡童年时期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革命者，他们的生活中几乎都有这种不满和冲突。这个特征不是个人的，而是时代的，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毛泽东同代的很多人均是把“家庭革命”看作是社会革命和反对孔教传统的第一步，它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探索新准则、形成新秩序的一种尝试和“练兵”。

——他好争“第一”，喜欢标新立异。毛泽东从小养成极强的个性，加上的确具有一般农家孩子所不及的聪明才智，为他在冲里赢得了“孩子王”的地位。比如，放牛娃们过去总是各自看管各家的牛，互不相干。可是，毛泽东偏要出头把大家召集起来，一改过去那种各顾各的状态，将小朋友分成三组，一组放牛，一组割草，一组采摘野菜。使得牛吃饱了以后，每人又分得一份牛草，留着带回家里，然后把牛拴好，围坐在青石板上吃果子，讲故事。这种做法虽有点束缚那些散漫惯了的小放牛娃，但确比一个人“单干”好，于是渐渐被大家接受了，并一致公推他做了“牛司令”。毛泽东从小好

参见《西行漫记》。

争第一，只当“司令”，不愿当配角和助手的脾性，一直影响到他的一生。……

毛泽东永远也忘不了父母给他的这些馈赠，忘不了双亲含辛茹苦地对自己的哺养、教育之恩，他对自己的父母一直怀着赤子的深情。

韶山的老辈人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十五岁那年，曾因母亲身患重病向南岳圣帝许下誓愿，若保佑母亲平安，一定前往朝拜。母亲病愈后，他跟两个弟弟泽民、泽覃，用竹杆加上躺椅做成一副轿子，抬着母亲，专程到南岳衡山去朝山进香还愿。行程达两百多华里，才到达南岳大庙。从山脚登上海拔一千二百八十多米的祝融峰，要走二十多里的山路。两个弟弟搀扶着母亲，作为长子的毛泽东，走在前面三步一拜，五步一叩，求上苍保佑母亲福体安康。那时，在乡亲们眼里，少年毛泽东既是南岳圣帝的忠实信徒，也是一个难得的孝子。

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告别了韶山冲，先到母亲娘家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又到省城长沙求学。从此，他不再由父亲庇护、母亲照料，开始了独立的生活。但是，父母十六年的教养恩情，却深深地埋藏在了儿子的心间。

在外求学的日子里，毛泽东经常与家里通信联系，向父母问安。学校放寒暑假，他就将父亲给他的生活费用省下一些来，从城里买回父母喜爱的物品孝敬二老。回到家里后，他主动做一些农活或写算之类的事情，尽量帮父母分忧。毛贻昌和文七妹看到儿子不仅读书很有长进，而且十分孝敬大人，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心中得到莫大的慰藉。

1918年，文七妹积劳成疾，在娘家养病。毛泽东十分挂念病中的母亲，赴北京前夕，亲自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同时寄去一封信，拜托两舅父：如母亲的病经过服用此药不愈，请派人交其护送到省城医治。次年三月，毛泽东的舅父按外甥的托咐，让泽民陪同文七妹前往长沙治病。毛泽东从北京返回长沙后，于四月底给舅父去信，告知母亲的病情治疗情况，安慰外祖家的亲人。

也就是文七妹在长沙治病期间，毛泽东和送母亲来省城治病的大弟弟泽民、在长沙修业小学读书的小弟泽覃，一同与他们的母亲合影留念。毛泽东优及母病写给他舅父的两封信以及他和母亲的合影，一直保存至今。它不仅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珍贵文物资料，还是他讲究孝道、恪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见证。

文七妹虽在省城多方精心医治，但由于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便遵医嘱回到韶山。1919年农历8月12日，终于不幸逝世。毛泽东闻讯后，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为母亲守灵。面对暗淡的油灯，回想起慈母的桩桩往事，他悲伤不能自禁，席地而就，写下了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的《祭母文》和“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两副灵联，表示了自己对母亲的无限热爱和怀念。不久，他还含着热泪给同窗好友邹蕴真写信说：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以利人的人。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毛泽东的母亲去世后，他便在是年冬天将父亲接到长沙居住，随同到长沙的还有他的堂叔父。这段时间，毛泽东和弟弟泽覃陪父亲和堂叔游览了长沙的一些名胜古迹，并特地和他们一起照了相。数月之后，毛贻昌因病与世长辞，毛泽东此时正组织湖南驱张代表团到达北京，为成立平民通信社，揭

露军阀张敬尧的罪行而奔波，未能回家奔丧。他只得把对父亲的哀悼和丧父的悲痛深深埋在心间。

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6月25日，毛泽东作为国家领导人和人民领袖，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韶山。在旧居里，他久久地凝望着父母的照片，伤感地对在场的人讲：父母得的都不是不治之症，却都过早地去世了，要是现在，他们都不会死的。次日清晨，他踩着露水来到南岸对面松青柏翠的山梁上，久久仁立在父母的合葬墓前，静默致哀。而后，他自言自语地念叨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说完恭恭敬敬鞠了三个躬。回到住地后，他又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他们二位。”他的话讲得很轻，饱含着深沉的怀念。

是的！“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谁都会承认——又有谁不承认呢？！

这如东海样的深恩，谁都会怀念——又有谁能够忘怀呢？！

第二章 邹春培

——启蒙老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说》

5 初进学堂门

1902年春，毛泽东在家乡韶山南岸私塾发蒙。这年春节刚过，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趁走亲戚的机会来到岳丈家，要接儿子回韶山，说是要送他去蒙馆读书。

毛泽东两岁时，被送到湘乡县唐家坵外婆家寄养。在一大群表兄弟中，“根基不稳”的毛泽东，得到了外公和外婆的格外宠爱，每天让孙儿孙女们带着这个小外孙在宁静秀丽的大自然中无忧无虑地嬉戏、玩耍。农家田园生活的浪漫和集体生活的热闹，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他总是躲着，生怕家里来人将自己带回。入私塾之前，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唐家坵度过的。这次眼看就要离开生活了六年的外婆家，毛泽东不由难过得哭了起来。外婆也舍不得这个聪明可爱的外孙走，但她明白读书是件好事，也就流着眼泪哄着外孙上路了。就这样，毛泽东回到了韶山，从此开始了幼学童蒙生活。

韶山南岸，上屋场的西侧，“邹氏公祠”就坐落在这里。它始建于清代，青砖青瓦，白色粉墙，建筑面积近四百平方米，原为邹姓祠堂公产，后在此兴办邹氏族校。就是在这座极平常的祠堂里，毛泽东那艰难跋涉了十五六载的极不平常的求学之路，迈开了第一步！

毛泽东的启蒙老师名叫邹春培，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开学的第一天，毛贻昌牵着儿子的手，把毛泽东送到离家不到二百米的南岸私塾。在祠堂那间阁楼上，毛贻昌让儿子拜见了老师。邹先生见过新学生之后，把毛泽东引到东墙下神龛的地方说：“这是孔圣人的牌位，从今往后，你每天早上进学堂，都要对神龛叩拜。日后，保管你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毛泽东看了看邹先生那严肃的神情，听着那似懂非懂的话语，像大人一样郑重地点了点头。其实，他对神龛并不陌生，寄居在外祖家的时候，他常到二舅父文玉钦开设的私塾蒙馆“旁听”，那里的神龛也和这一模一样，大红纸上都写着“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之位”。表哥他们上学照例每天要向牌位磕头礼拜。于是，毛泽东就按邹先生所说向神龛恭恭敬敬地作了揖行了礼。邹老先生见此状，脸上露出了赞许的微笑，他高兴地对毛贻昌说：“顺生公，令郎资质聪颖，有朝一日定会名登高科，光宗耀祖的！”

毛贻昌见先生夸奖儿子，心里自然很高兴，但他嘴里却说：“邹先生，种田人家的子弟，不求功名利禄，只要算得几笔数，记得几笔帐，写得几句来往信札，也就要得了……”

就这样，毛泽东初次踏进了学堂门。

6 刻板的先生和顽皮的学生

南岸私塾学童不多，主要是韶山一带邹姓人家的孩子。毛泽东得以到这里上学，主要是由于邹氏宗祠建在离毛家不远处的田地边上，塾师邹春培与毛泽东的父亲关系较密切，所以才被破例招收。这所私塾和当时大多数旧式学校一样，奉行的是封建“正统”教育，“四书五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容有丝毫异端邪说。因此，毛泽东在这里是从读《三字经》开始，继而点读《论语》、《孟子》、《诗经》等儒家经典。先生的教授方法是让学生鹦鹉学舌般地朗读、背诵那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老师不作讲解。这样的教育方法自然遭到后人抨击，也令童年毛泽东生厌。五十多年后，他在北戴河作的《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追忆起当年这种“读死书”的情况时曾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塾师邹春培是一位非常严厉古板的先生，常对学生施行粗暴的管教方法。他信奉当时流行的“不打不骂不成材”、“棍子底下出好人”的教育理论，学生只要稍微懒惰或越轨，动辄便施以打板子、打手心、跪、站等体罚。背书时，他正襟危坐，让学生背对着他站立，弄得气氛相当紧张，学童望而生畏，已熟记的课文往往吓得又忘记了。

毛泽东对老师这种动不动打骂学生的行为很反感。那时候，他还没有像有些书上描述的那样懂事，不明白老师这是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严格要求学生的一种表现，而是觉得这个先生很凶、很坏。因而，他常和同学们一起，用各种方法对先生进行反抗。

有一次，轮到毛泽东背书，可他硬是不按邹春培的“规矩”肃立，仍旧纹丝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邹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不站立起来？毛泽东竟和他论理说：“你是坐着的，我也要坐着背。”邹春培训斥他说：“你怎能跟我比？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也就是说：我是你的先生，就如同你的父亲一样。哪有尊长和晚辈一起陪站的？真是岂有此理！”毛泽东见先生动怒，也不慌张，仍不急不躁地说：“我不习惯站着背，一站着腿就打抖，也就背不出书来，所以，在家里父亲是从不让我站着背书的。你既然说你就像我父亲，那就也不该让我站着嘛！”他巧妙的对答，使邹先生无言以对，只得依他。平日里，在私塾敢冒犯先生的学生几乎没有过，而毛泽东刚入学便顶撞起先生来，这令邹春培很是窝火。他感到毛泽东是个不肯循规蹈矩、不大好管教的学生，但他同时也看到了毛泽东那独特的个性，以及在顽皮之中显露出的灵性和机智。他断言：这孩子，若好便是条龙；不好便是条虫！

是的，邹先生没有看错他的学生。幼年毛泽东的确具有一般农家孩子所不及的聪明劲，但同时也具有一般儿童那种冥顽和淘气的习性，特别是那种伴随在异常顽皮中的机智和勇敢的天性，有时竟让他这位老先生也无可奈何，但又不得不叫人咋舌称奇。

例证之一，是毛泽东带着小同学偷邹先生家的果子。原来，邹春培先生的家就在南岸私塾后面，他家的房屋周围栽了不少果树，什么桃子树呀，柚子树呀，枇杷树呀等等。每当到了果子成熟时，毛泽东和一群丫子的眼睛就被树上的果子勾住了，心里那股馋劲就别提了！只是由于邹先生的母亲邹四阿婆看得严实，手里还拿着根长竹竿子，随时准备教训这些小淘气鬼。哪个丫子偶尔偷摘了她几个果子，她又是叫嚷，又是追打，还向家长告状。最要命的是，她有时还把偷果子的学生“捉”到学堂，让当先生的儿子给打一顿

竹板子。伢子们背后骂她“小气鬼”、“背时婆”，存心和她作对。有一次，他们乘先生有事外出，瞅着邹四阿婆不在树下面，以为她放松了看护，便发出信号，一群伢子向树上爬去。可是，冷不防邹四阿婆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了。她一边嚷嚷着，一边挥动竹竿就向孩子们打来，毛泽东急忙指挥伙伴们一哄而散。邹四阿婆看到毛泽东比一般伢子长得高大，又有点气度不凡的样子，便把竹竿转向他，喝斥道：“好呀，石三伢子！你带牵别个歹，我就打你！”毛泽东一看情况不妙，纵身跳进附近的沟里，接着翻身跃出沟外，奔向离上屋场约两百米的冲口处那两棵大松树。伢子们如法炮制，三把两把就爬上了树。等到邹四阿婆迈有三寸金莲，跌跌撞撞追来时，他们已高居树杈，笑笑，喘的喘气，有的做鬼脸，庆祝自己的胜利……对于这件“绝作”，毛泽东在数十年后仍记忆犹新。1954年仲夏，韶山的毛继生到北京去看望毛泽东，见面谈过一阵子话之后，毛泽东突然话锋一转，问：“南岸那两棵大枞树还在不在？”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大枞树”就是上屋场旧居下面二百米处的这两棵松树，但他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问这个。“主席，这么些年了，为么子还记得这两棵大枞树？”“我们伢子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接着，毛泽东乐呵呵地讲起了上面这个故事。毛继生听了，先是觉得好笑，后是吃惊：在自己的记忆里，听到的毛泽东儿时的故事只有那种乐于助人、老实肯干、办法强、主意多一类，难道毛主席在童年时也调皮捣蛋？

例证之二，是摸邹四阿婆的盐姜等于果吃。邹四阿婆会做干果，什么梅子、黄瓜、茄子、姜片之类普普通通的东西，经她那双手一盘，就变成了酸中有甜、甜中含酸辣的“山珍”。冲里的人都夸她手艺强，毛泽东和小伙伴们更是羡慕得不得了。邹四阿婆做干果干菜时，为了防止小伢子们偷吃，总是搭起梯子、晾晒到屋顶上，这可把毛泽东他们馋得慌。搭梯子吧，偌长的家伙搬动起来会被人发现；用竹竿挑吧，又要弄出声响；要是能长上一双翅膀飞到屋顶，那可就好了……正想着，忽然一只大绿蚱蜢从眼前飞过，他不觉心眼一亮：有了！他马上让小伙伴捉来几只蚱蜢，用细长绳子系住它锯齿形的长腿，然后顺风抛上房去，让它们爬到干果上，再牵动绳子，等蚱蜢正要起飞，他们突然往下一拉，蚱蜢锯子般的腿就把一些干果挂了下来，小伙伴们忍住笑，像鸡啄米似的，抢着拣地上的干果吃。当夕阳西下时，邹四阿婆搭梯子收拾东西，发现少了许多。可是天未刮风，鸡又飞不上去，地上也不见痕迹，真叫她弄不明白。老人自言自语道：“难道给背时的乌鸦偷吃了？你们也晓得我四阿婆做的干果好吃不成？”这时，躲在一边“看风景”的毛泽东和伢子们，乐得捂住嘴巴直笑，他们笑邹四阿婆又“恶”又“笨”，同时夸蚱蜢又聪明又勇敢。

参见《毛泽东的故乡》第13~14页。

参见《毛泽东与故乡》第15~16页。

7 “游泳风波”惊南岸

人们大部知道，毛泽东一生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在江河湖海里畅游，喜爱在大风大浪中征服对手，宣泄情感。“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等诗句，就是他与水打交道留下的千古名句。

毛泽东不但酷爱游泳，而且游技高超，游姿多样，“中流击水”似“闲庭信步”，应该说是很益于他童年、少年的馈赠——上屋场前边的南岸塘，就是他少小时习武练艺的最好场所，更何况他启蒙的南岸私塾就在塘边上呢！

毛泽东对于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嗜好。五六岁时，一般的幼童即使掉进一个水塘，也会吓得直哭，而他却敢在南岸塘里滚。他还用拿手好戏跳水，躲过了父亲数次蛮不讲理的追打。现在，南岸塘边还插着一块铁牌，上书：“毛泽东同志少年时代游泳过的池塘。”1963年11月，郭沫若参观韶山时，曾指着这口塘叹服地说：“毛主席是小时候游池塘，老年游长江啊！”

提起毛泽东“小时候游他塘”，人们自然会忆起他十岁那年在南岸私塾惹起的那场“游泳风波”。

那是一个赤日炎炎的夏天。南岸蒙馆的小阁楼上，闷热得就像蒸笼，灼人的太阳透过伸手可及的瓦缝射进教室内，散发出难耐的热气。

邹春培先生摇着芭蕉扇来到教室，向大家吩咐道：他下午有事外出，不在蒙馆，学生务必尽心温课，不得走动喧哗。等他回来以后，将点读新课——《论语·先进》篇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

毛泽东虽然调皮，可是读书却从不含糊。邹先生走后，他先将昨天学过的课文温习了一遍，然后，便开始预习老师下午将要点读的新课。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何如？”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吾与点也！”，“吾与点也……”读到这里，毛泽东又把这个句子重念了两遍，尔后戛然而止不读了。这时，他陡然记起上次学过的一篇课文中的一句话：“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春。”他心中暗想：哦，原来孔圣人是赞成门徒们游泳的呀！

午后，烈日当空，小阁楼上暑气逼人，就连桌椅板凳都被骄阳烤得发烫

了，仿佛只要划一根火柴，空气便要燃烧起来。汗水像一条条讨厌的小虫子，顺着毛泽东的脊背往下爬，把他身上那件白棉布短褂都浸湿了。

毛泽东用衣袖揩了一把汗水，拿起课本继续读起书来：

“……夫人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刹时，毛泽东眼睛一亮：看来，古时就有“童子”和“冠者”下河游泳的先例，而孔夫子也很赞同。眼下，天气这样热，我们何不也到池塘里冲个凉？“可是，邹先生回来后要责问怎么办？”他脑子一转悠，一个对付先生的“点子”冒出来了。

绝非笔者胡编乱造。这就是那个时期的毛泽东，那个后来几乎被所有教导过他的老师视为“特殊学生”的蒙童！他不到十岁，却天性聪敏机灵，常常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有限知识，又去钻老师的空子，“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一会儿，十几个蒙童像从笼中放出的小鸟，欢呼雀跃地跑出蒙馆。大家站在杨柳依依的南岸塘边，望着清凉澄澈的塘水，心里痒痒的，等着“孩子王”毛泽东发号施令。毛泽东首当其冲，一个猛子扎进碧水清波中。其他学生娃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一个个脱得赤条条的，“扑通”、“扑通”地跳进塘里。他们就像一群鸭子一样，尽情地在水中嬉戏，早把老师的吩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邹先生回馆，小阁楼空无一人，心里好生纳闷：都到哪里去了呢？他朝外一望，却见学生们赤身裸体正戏水弄波，玩得开心。他来到塘边，铁青着老脸，狠狠地吼道：“孺子不可教也！”

回到蒙馆，学生们低头垂眼，等候先生发落。惟独毛泽东神态自然，若无其事。邹先生责备的目光盯着毛泽东，通过上次“背书事件”，他便对毛泽东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想：大概只有毛泽东才敢带这个头，今天非惩罚惩罚他不可！

“谁让你们下水的？——润之，是不是你带的头？”邹先生严厉地责问道。

毛泽东敢作敢当：“是我带头的，先生！不过，若要问到是谁让下水的，那就是孔圣人！”说着，他往东墙上的孔子牌位一指。

“什么？你！你……”邹先生一听此言，气得脸色发白，他用戒尺指着毛泽东，就要动手。

“且慢！”毛泽东一下子打开《论语》，翻到邹先生要点读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递到先生面前，说：“先生，你看，孔夫子不是也说过可以游泳吗？”

蓦然间，邹春培扫视到孔子的那句“吾与点也”，脸上顿时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他气急败坏地折断了那根戒尺，把门“啪”地一摔，忿忿然出了学堂门。

但是，邹春培并未就此罢休。他来到上屋场，一见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便气冲冲地说：“顺生兄，你家石三不得了，他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他这样的学生啦！”毛貽昌问明原委后，忙向邹先生赔笑脸、讲好话。他历来家教颇严，听说儿子竟敢坏了学堂的规矩，还有违师道尊严，与先生顶嘴，就格外恼火。他顺手拿了一根竹子，向南岸师塾跑去。

毛泽东是何等精明的孩子，他知道今天弄得先生下不了台，先生定不会饶他。后来，他见邹春培出去了，就猜想到他准是到父亲面前告状去了。毛

泽东深知父亲的性子，脾气一上来准有一顿好打，他的棍子可比邹老夫子的戒尺厉害多了。于是，他不敢回家，背起书包离开课堂，一溜烟地逃跑了。他听说县城离韶山好远好远，心想跑到县城父亲一定抓不着、打不到，于是便信脚向山外走去。可不足十岁的他，在山里转了三天，只离开家八里远，还未能走出韶山冲。

毛泽东的出走，在韶山冲引起轩然大波。在这三天里，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没有下田种阳春，每天抱着头蹲在门前的石阶上生气、叹息；在这三天里，毛母文七妹一直没下厨房、也不吃不喝，她提着香蜡纸草和供品，来到“观音岩”长跪不起，祈祷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保佑儿子平安归来；在这三天里，南岸私塾一直没上课，同学们觉得毛泽东是代大家受过，现在他生死不明，都感到非常难过，一致以罢课的形式向苛刻的先生“抗议示威”，同时集体到上屋场“顺生公”面前替石三伢子讲情。最后，毛贻昌迫于内外压力，又为儿子的安危担忧，只好和长工阿贵等人一道，四处寻找出走的毛泽东。后来，幸亏一位砍柴的老人，在密林深处遇上了迷路的小泽东，才将他护送回家。

这件事情过后，父亲没有再打骂毛泽东，先生也没有再为难他。他那超常的胆量，不屈和倔犟的性格，得到了初步显露，不得不令先生刮目相看了。对这次的经历，毛泽东自我感觉也很好。几十年以后，他还向朋友说起它，称之为“一次胜利的罢课”。

一场“游泳风波”就这样平息了。在当时那个一潭死水似的韶山冲，曾经激起过一朵浪花，但很快便平伏了。可是，有谁想到过它的意义呢？！这场风波，不只是毛泽东参与“反抗”和“斗争”的尝试，同时还是他降服江湖湖海的演习，它在毛泽东一生中的地位绝不可低估！

如果说，童年毛泽东游南岸塘，是出自于童真与天性的话；那么，后来他进行的许许多多诸如“畅游”、“横渡”之类的游泳活动，则都有着质的升华——在这种貌似平凡的体育活动中，反映着他的好恶、爱憎、寄寓了他对理想与信念的执著追求。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携来百侣”遨游湘江，不是单纯的游玩消遣，也绝非青年人冲动一时的即兴之作，而是有目的、有组织的举动——为了强健体魄，磨炼意志，寄希望在游泳中去经险风恶浪，去体会人生的道路，悟出社会的哲理，增强面对困难、战胜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及至中晚年渗透在游泳活动中的政治色彩，就越发浓厚了。

8 聪颖的私塾生

在私塾里，毛泽东虽被先生排在顽皮的学生之列，但他会读书也是出了名的。

在学习中，毛泽东表现出聪明的天资，尤其表现出非凡的记忆力。他读书时从不出声，读过后很快就能背诵和默写。邹春培有时故意让他多背点书，但总难不住他。毛泽东还学会了使用《康熙字典》，先生没有点读过的书，他也能认得，由于他天资聪慧，在学习上不需要先生多劳神费力，所以大家给他起个浑名，叫“省先生”。

老师总是喜欢成绩好的学生，邹春培先生当然也不例外——他十分器重毛泽东这个调皮而又聪颖的私塾生。据毛泽东的弟媳王淑兰（毛泽民原配）回忆：邹春培曾向她的母亲夸耀说：“三伢子有些特别，他读书从不读出声来，我给他点书，他就说：‘春培阿公，你老人家不要点，省得费累。’我问他，你特地来读书，不点书何理要得？他就讲，你不要点，我都背得。原来我没有点的书，他也能认得、懂得，因为他会翻《康熙字典》。还有填红蒙字，他就不填，要自己放手写，他写的比一般学生照着填的还要好些……”

邹春培古文功底比较深厚，尤其擅长吟诗作对，他常常让学生“属对”，用这种办法来测试他们的成绩，并以对不上“对子”为由，处罚那些不用心读书的学生。一次，邹先生点毛泽东背诵一篇晦涩古奥的文章，没想到毛泽东照背如流。邹先生寻思：背书看来是难不倒毛泽东的，凡是讲过的课文，他没有不会背的。那么属对呢？想到这里，他挥笔在黑板上写下“濯足”二字，然后将所有学生扫视了一遍，最后把目光落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明白：这是让他做的题目。他没有丝毫犹豫，走上讲台略作沉吟，便在“濯足”二字下面对以“修身”。

邹春培惊喜而欣慰地捋着灰白胡子笑了。

十岁时，毛泽东因塾师无故打了学生而逃学罢课，理由是：“要找一个不打人的学校上学”。这使邹春培先生耿耿于怀，他明里不好追究，却采取了一种更特殊的处罚办法：让毛泽东属对，对不上再另行惩处。上一次他和毛泽东已经“交锋”过，知道这个小娃娃不好对付；这次，邹先生在属对的题目和内容及形式上动了一番脑筋，下决心要难倒毛泽东。

一天放学后，邹先生随意领毛泽东到一畦菜地里，扯下一把牛皮菜，让毛泽东带回家去，同时交待明天一早必须还他一茎与牛皮菜能对得上号的菜。说完，用微笑之中略含轻蔑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绝顶聪明的毛泽东，从先生的表情中，“破译”出潜台词——“我倒要试试你小娃娃究竟有多大本事，对不上看我扫尽你的脸面！”

毛泽东明白了：先生只不过以此来讽刺和挖苦自己狂妄自大，寓意他说大话，吹牛皮，华而不实。于是，他对邹先生说：不用等明日，只需稍待片刻即可答对，“既然所对之物是蔬菜类，答案必可在田间寻找！”他稍一思考，随即灵机一动，在菜地旁拔起一莧马齿苋菜，交给了先生，然后迳直离去……

邹春培接过那株马齿苋菜，看了又看。一向苛刻古板的他，顿时由衷赞叹道：“‘牛皮菜’对‘马齿苋’，对得好，对得好！真是奇才，奇才呀！”看着毛泽东那很有大人风度的身影渐渐消逝，邹春培感到双眼模糊了，两行老泪不禁夺眶而出。他突然觉得自己老了、糊涂了，悔不该和一个十岁孩童一般见识，竟用如此刁钻的手法来难为他！

此后，邹春培每每逢人，便既欣喜又不安地说：“润之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已非吾辈所能及矣！”不久，他在教完毛泽东两年书之后，即辞教离韶，远去湘乡，另谋他业。

9 感念师恩

对邹春培这位严厉刻板的启蒙老师，以后成为共和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始终未能忘他授业、传道、解惑的好处。

建国之初，在毛泽东邀请故乡亲朋故旧到北京会见的名单中，便有邹春培的长子邹普勋。1952年9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的丰泽园，亲切会见了邹普勋及昔日的老师李漱清、张干等人，并设家宴盛情款待来自家乡的师友。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蒙师邹春培的一些情况，当他听邹普勋讲老师早在十多年前就已辞世的消息时，以怀念的语调说：“邹先生是个好人！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调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蛋哩！……”以后，毛泽东先后几次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笔钱来，寄给邹普勋，资助他的家庭生活，以此表达自己对老师当年苦心栽培教育的一片感激之情。

第三章 郭伯勋

——深信毛泽东能成大器的人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择其不善者而改之。

——孔子

10 乡野异士

自邹春培先生离开南岸师塾以后，毛泽东一度没有地方上学，他只好在家里自由自在地玩了半年。1904年秋天，父亲把他送到关公桥私塾，塾师是毛润生；几个月后，他又转学到桥头湾，从师于韶山布衣周少希。就这样，从1904年至1906年之间，毛泽东没有找到一个固定而合意的蒙馆，几乎打了两年时间的“乱仗”。

1906年秋，十二岁的毛泽东，又遵照父亲的意愿来到离韶山约五里地的井湾里私塾。这里的塾师郭伯勋，祖上和毛泽东家是世交，他的家兄又同毛泽东的父亲有八拜之交，因而很乐意毛泽东前来就读；加之，蒙馆里的另一位塾师毛字居，是毛泽东本家的堂兄，也一直希望叔父毛贻昌把堂弟送到他这里，以便就近加强教育与管束。这样，尽管井湾里离上屋场远了些，毛贻昌还是把儿子送到这所私塾来了。

井湾里是个屋场名，本是郭伯勋家的私宅。由于房屋十分宽敞，郭伯勋就在家开设了蒙馆，以方便族人。在这里读书的除了毛泽东、李耿侯等为数不多的外姓伢子外，其余的都是郭姓人家的孩子。郭伯勋的两个侄子，后来成为毛泽东儿时最好的朋友的郭梓阁、郭梓材兄弟，也都在这里发蒙。

井湾里私塾的塾师郭伯勋先生，是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他颇长身材，白净面皮，眼睛闪着壮年人特有的睿智之光。他的额头很大，光洁无皱，颇有些智者风度。

据说，这位郭先生读过十多年“长学”，不仅饱读儒家经典，而且对文字古奥、义理隐微的易学，也很有造诣。他运用《周易》相数学，对天文、地理、历法、术数、养生等，进行了二十年的苦苦钻研，开始形成自己的独到见解。

在郭伯勋看来，古人关于《周易》二字的训诂，即认为“周”者是周代、“易”者是占巫之名的说法，纯属胡诌。中国虽有“看了诗经会说话，看了易经会算卦”的俗语，但周易绝非仅仅算卦占卜的书。他说古有三《易》、《连山》以艮为首，艮代表山；《归藏》以坤为首，坤代表地；《周易》以乾为首，乾代表天。天能周匝于四时，即乾元、亨、利、贞，亦即春、夏、秋、冬，周而复始，无穷期也；生死之谓“易”，易乃变化之无穷。“宇宙间周而复始变化无穷”，乃是《周易》的真正含义。他认为：《易》道之大，无所不包；其用至神，无所不存。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易》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至大至博无可比拟。散之在理，则有万殊；统之在道，则无二致。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交感变化无穷，否泰往来，兴衰交替，剥复循环，方有宏深之哲理，此原始反终，并非简单循环，乃终始更迭，推故更新，旧星死灭，新星迭出。天体如此，人事也如此，时而在泰，时而在否，遇泰时不必过喜，时过则否，遇否时不必过忧，时过则泰。虽龙飞在天之时，当防亢龙有悔之日；虽在潜龙无用之时，亦无须忧虑，时过则显在天矣！

他对世人多视《周易》为“筮书”深感不公，认为易理集人类智慧之大成，堪称真正的“天书”。但他同时赞同明末清初大学问家魏禧在《左传经世叙》中所言：“读书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适用也”，若不适用“与未尝读书同”。读《周易》、钻易理也一样，为的是“通世务，达世变”。他不赞成将易学划分为相数、易理两大学派的传统观点，坚信自古真正精通易学的人，必定能够遥观天象，知宇宙生灭；俯瞰地理，察人事兴亡。正所谓：

自古深于《易》者，无不洞天达人！九九归一，《易》中卦爻辞皆由相生，有其相即有其数，有此相数才有此易理；阴阳八卦，时空合一，其变化无可穷尽。万物之象，万物变通之理，皆在《易》中……

郭伯勋谈《易》的这些深奥玄妙的宏论自然不会轻易向人去说，就是了也许没有多少人懂。不过，为了学以致用，有时也按书中阐述的道理，给亲友乡邻卜个卦、算个命或看看相什么的，竟往往也有几分灵验。这样，一传十，十传百，郭伯勋在韶山一带远近闻名，他被人看作是乡野异士，有人甚至称他为“郭半仙”。

毛泽东也听父母谈起过郭伯勋——这位既是才高八斗的教书先生、又是能掐会算的“八卦先生”的高人。他对自己能从师于郭先生的门下，感到颇为得意。人们可以想见，毛泽东的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也曾依在母亲身旁，跪在家设的佛堂前，向着烟气氛氲中的神像，献出过童年的全部虔诚。因而，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是自然而然的，我们不必苛求前人、苛求历史。

11 “状貌若妇人好女”

对于毛泽东，郭伯勋先生并不陌生。要知道，毛泽东早以绝顶聪明和淘气顽皮，而使韶山人妇孺皆知：郭先生本人也听同行邹春培亲口讲过毛泽东与他属对的事。这些曾勾起过他的好奇心：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少年呢？他倒想亲眼见一见。

开学的第一天，当郭伯勋站在讲台上给新学生讲课、并以他特有的眼光与毛泽东相对时，却实实在在诧异不已！他暗自称奇：这个学生好特别！

名字特别！论姓氏，“毛”字即为反手梳头。泽东——润之，泽沛苍生，东来紫气，是为人主之福命，或可曰一条蛟龙，润泽东海之水，而后一飞冲天。

相貌特别，面若妇人，下巴上一颗又黑又粗的乾坤痣。上完课后，郭先生急忙把毛泽东叫到他房里特地让他背一段《百家姓》，认真听他的发音。——声音也特别！毛泽东读书的声音娓娓动听，像一副女人腔调，悠扬之中含激越，温厚之中藏刚劲。

郭伯勋不禁重新打量起毛泽东的相貌和体态，这下他看得更真切

了：毛泽东生就一双不算太大却长而美丽的眼睛，宽阔光洁的前额下面有两只淡淡的眉毛，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腻，一条又黑又粗的长辫子在背后飘逸。……在这一刻，郭伯勋记起了太史公对于

留侯张良的赞语：“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状貌如妇人好女，如妇人好女……”郭伯勋嗫嚅着，“对，毛泽东正是生就了留侯这样的一副相貌！”半晌，郭先生用颤抖的手把毛泽东拉到跟前，他凝视着毛泽东说：“润之，好生用功读书吧。观你的相貌，听你的声音，你会有大造化的！”

12 苦心孤诣育良才

从此以后，郭伯勋对毛泽东另眼相待，悉心指导，疼爱有加，倾注了比普通学生多出许多的心血。

毛泽东家住上屋场，离井湾里较远，每天往返要走十多里山路。为了他的安全和学习着想，郭伯勋分文不取让毛泽东寄宿在自己家里，并安排亲侄儿郭梓材形影不离地陪伴着毛泽东，他们白天一起上学，空余时间在一块玩耍，晚上在一个床上困觉，亲如兄弟，情同手足。同时，郭先生还让侄女帮助料理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据郭梓材回忆：“泽东同志有远大的抱负，……我们全家人都喜爱他，尤其是我二姐，照

料泽东最为细致。泽东的那条长辫子是二姐帮他梳，还帮他洗衣服，补这补那，一点好菜也要留给泽东一份，比对自己的亲弟弟还要亲十分。解放后，泽东主席还向乡亲打听二姐的消息……”。值得在这里附带一提的是，在井湾里私塾读书期间，毛泽东结识了他少年时代最要好的两个朋友——郭伯勋的侄儿郭梓材、郭梓阁兄弟俩，而他们在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生涯中，曾给予过他无私的援助，有两次还在危急之中救了他的命。此事，史书上少有记载，所以它鲜为人知。正因为这样，笔者才以为不该忽略它。

对于郭氏二兄弟与毛泽东的交往情况，郭梓材后来撰文这样追述：

1906 年秋至 1917 年冬，郭梓材和哥哥梓阁同毛泽东一起在井湾里私塾从师叔父郭伯勋和秀才毛宇居，他们之间亲密无间，如同亲兄弟一般。1910 年，郭梓材和毛泽东两人同路步行到湘潭县城内投考“昭潭高等小学”，郭考取了，毛却因年龄超过两岁而落榜。1912 年，毛泽东和郭梓材一道去投湖南新军，半年后又一同退伍。1919 年，郭梓

材就业于湘潭电灯公司。后来，毛泽东把这里作为革命活动的据点，在电灯公司建立了党支部，党内许多重要会议都在公司的地下室召开。郭受毛泽东之托，帮助守门放哨、保管文件及会议记录等。1927 年，毛泽东亲自介绍郭加入了共产党，还给他取了个化名叫“郭栩”。1925 年 8 月，毛泽东在韶山险遇赵恒惕围捕，是郭梓材的爱人刘天民从朋友处

事先获悉情报后，派人从湘潭连夜赶到韶山送信，才使他虎口逃生。

1926 年某月，毛泽东被湖南军阀追到郭家亭南食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急，郭梓阁把毛泽东藏在店铺的夹壁里，亲自送饭送水，躲了两天后，等到追兵撤离，毛泽东方才脱离险境……

郭伯勋先生除了在学习上尽心照顾毛泽东外，更注意他的学习。他找来历代科考中必读的诗书词赋，要求毛泽东刻苦攻读。毛泽东果真聪明，记忆力特别强，读书过目不忘，作“破题文章”总是交头卷，还时常帮助别的同学做。但是，毛泽东的志向终不在科举，因此他常有作者师的苦心孤诣。

那时，《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左传》之类的经书，已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开始偷偷地读中国古典小说。当时私塾里将小说视为杂书、邪书，不准学生读，可是毛泽东却不理这些清规戒律，他被小说中那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生动形象的人物性格刻画和精湛的文学表现

见郭梓材《我对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一文，载湖南省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原文如此，笔者以为这是作者记忆之误。时间应为 1925 年 8 月，即毛泽东受到赵恒惕的追捕后，从韶山来到郭家亭郭梓阁处，在郭的掩护下，躲过追兵，然后“间道入粤”。

见郭梓材《我对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一文，载湖南省湘潭市政协《文史资料》第一辑。

手法，深深地吸引住了，必欲一读为快。为了防止让老师发现挨“克”，他便把经书竖起来作掩护，用这种办法来挡住老师的视线，一头扎进小说之中，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

他的这种雕虫小技，常常被郭伯勋先生识破。有时搞点突然袭击，将看小说入迷的他点起来，要他背诵一段《论语》，他竟也一字不漏地背了下来：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知之为之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后来，毛泽东在回忆起这段读书生活时，曾经饶有兴味地这样说过：“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我很小的时候，尽管老师严加防范，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这位老先生讨厌这些禁书，说它们是坏书。我常常在学堂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正经书遮住。许多故事，我们几乎背得出，而且反复讨论了许多次。……我认为这些书大概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是在容易接受的年龄里读的。”

虽然，毛泽东有违师命，不读经书而偷看“杂书”、“邪书”，多少让郭伯勋先生感到不太满意，但他在罚背课文时表现出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古文的纯熟，却令先生暗自称奇，高兴不已。

郭伯勋思忖：毛泽东不仅生就一副极好的面相，而且绝顶聪明，很有读书的资质，这是成大器者的天赋。不过，他读书的自觉性尚嫌不足，须晓之以理，方可造成良才。

据郭梓材回忆，那时候，他们兄弟俩和毛泽东一起，常常在晚饭后来到二叔的书房，就二叔那一盏桐油灯温课。郭伯勋往往利用这个时间，向他们讲述读书成才的道理，教育他们戒骄戒躁，树立远大抱负，刻苦自觉地读书，立志成才。

郭伯勋熟读古书，又精通世故，他善于联系实际，引用古代名言，来鼓励学生毛泽东用心读书。他常常对毛泽东和侄儿们讲：古人说得好，“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读书求功名，图的是入阁拜相封侯，流芳百世。可是，要到这一步谈何容易！勇达仕途的路是学文习武。古往今来，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自古圣贤，盛德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的。正如唐朝贤相魏征所言：“容体不足观，通力不足恃，族性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这就是说，一个人的容貌、体态没有什么值得观赏的，勇力没有什么可恃仗的，家族、门第没有什么值得津津乐道的，先辈的光荣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但能使人名扬四海，流声后世的，唯一的只有学业上的成就。勤奋好学，无论为官为民都是至关重要的。《贞观政要》曰：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这是对士大夫而言的。晋人王嘉说，人好学，虽死犹存；不学者，虽存，谓之行尸走肉耳。这则是一般读书人都须谨记的。

郭伯勋有针对性地对毛泽东说：读书光凭天分、凭一个聪明的脑袋，行不行呢？前清翰林大学士彭端淑在《为学一首示子侄》中曾讲过：“人之为

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摒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由此可知，读书是件不容易的事，仅靠资质聪慧是不够的。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是志气。志者，学之师也；才者，学之徒也。学者不患才之不赡，而患志之不立。是以为之者亿兆，而成之者无几。故君子必立其志。正所谓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志之士，纵不能日新，犹当月进，不能月进，犹当岁益。所以，郭先生勉励学生铭记古训，从小立定远大志向，认真读书。

为了给毛泽东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郭伯勋还特地讲了那个“状貌若妇人好女”的留侯张良青年时代虚心求学的故事：

张良出身韩国豪门旺族，其祖父、父亲都当过相国。他虽然生就一副妇人样的相貌，却有着不凡的志向和超人的胆识。秦始皇灭了六国后，张良变卖家产，背井离乡，到外面去结识英雄好汉，决心替韩国报仇。后来，他交上了一位大力士朋友，准备趁秦始皇到各地巡视时谋刺他。公元前218年春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当秦始皇带着大队人马来到博浪沙这个地方时，潜伏在这里的张良，指挥大力士把一个重约六十斤的大铁椎砸向秦始皇的座车，但砸得不准，只把一辆副车砸碎了。行刺失败后，张良隐姓埋名，逃到下邳。失败的教训使他清醒，他感到光凭匹夫之勇是报不了仇的，必须学一套过硬本领才行。于是，他潜心钻研起兵法来。

可是，学习兵法没有名师传授是不成的。这时，发生了一桩事，使他求得了名师。一次，张良外出散步，走到一座桥上，遇着一位身穿土黄色大褂的老者坐在桥头上。他见张良过来后，有意无意把脚往后一缩，将一直鞋子掉到桥下去了。张良正要继续往前走，没想到老者却责怪他把鞋弄丢的，很不客气地要他去把鞋子捡上来。张良很生气，但转念一想人家毕竟是个老人，便耐着性子下河把鞋捡了上来。谁知那老者连接也不接，只把脚一伸，要张良给他穿上。张良想，既然已把鞋子捡上来了，索性好人做到底，就跪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帮老人把鞋穿上。这时，老人才站了起来，边微笑边对张良说：“小伙子，还不错呀！是个可塑之材。你如果想学点什么，过五天再到桥上见我。”张良听他的口气，知道是个有学问的人，赶紧跪拜应承。第五天，张良天一亮就前去赴约，他来到桥头一看，那老者已先到了。老人生气地对张良说：“你跟老人家约会，就该早来一些，怎能让我等你呢？”张良只好认错。那老人说，“今天你回去吧，再过五天再来。”又过了五天，张良鸡鸣即起，没想到老人还是先到了，他瞪了张良一眼说：“过五天再来吧。”第三天，张良吸取前两回的教训，到了第四天半夜，就赶到桥上，静静地等到天亮。一会儿，老者来了，他对张良露出慈祥的笑容说：“这样才对了！”说罢，从衣袖里掏出一部书来交给张良，说：“年轻人，拿回去好好地读吧，将来说不定可以为国家出点力呢。”然后，他头也不回就走了。张良借着晨光，将书翻开一看，原来是一部周朝初年太公望编的《兵法》。

就这样，张良用自己虚心和谦逊的求学态度，得到了名师的真传。从此，他刻苦钻研兵法，后来终于成为一名杰出的军事家……

听了郭伯勋这些深入浅出、具体生动的道理以后，毛泽东深受教育和启发。打这以后，他的学习态度比以往端正了许多，读书的自觉性也大大增强了，文章学问更有了长足的进步。

13 芝兰君子性

如果说，郭伯勋仅凭看相来断言毛泽东日后必成大器，因而对他费尽心血进行教育培养，这未免难以让人置信，也失之公允。

事实上，大量资料已经表明，十三四岁时的毛泽东，由于受父母、尤其是受母亲的熏陶，许多属于成大器者所必须具备的良好品质已见端倪，而老师郭伯勋则又是毛泽东身上所显露出来的这种个人特质的初识者。正是通过学生身上这些超乎常人的可贵之处，他似乎领悟到这就是毛泽东人生目标的昭示，他仿佛看到了一个伟岸非凡、顶天立地的巨人毛泽东！试想，还有什么比老师看到了学生成才的希望之光更诱人的呢？有此巨大的原动力，郭伯勋有何理由能不像园丁栽培花朵那样，去精心培育毛泽东这个未来的栋梁之材呢？！

的确，井湾里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在日常生活中的一言一行里，所表现出来的人之天性中那种至真至善和至美，已远远超越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山村农家少年的胸襟和气量，不得不叫他的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毛泽东重义轻利。就在井湾里读书的这年年关，父亲毛贻昌让他去收一笔卖猪的帐，他去了，帐也收了。不过，在回家的路上，碰见几个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钱分送给了他们，惹来父亲一顿好骂。有一回，邻村的一位老阿婆，把自己的猪卖给他父亲，已说好价钱，交了定金。没过几天，毛贻昌叫儿子去把猪赶回来时，猪价又涨了，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他，没有把猪赶回家，只让这位老阿婆退还了父亲付给她的一元钱定金了事。

毛泽东能舍己为人。这年秋收时节，韶山冲里家家户户都在割禾。天气突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冲里的男女老少赶快跑到自己的晒谷坪上，抢收稻谷。毛贻昌也赶紧召集全家人紧张地抢收稻子，可就是找不见儿子毛泽东。雨下得很大、很急，有些稻谷顺着雨水淌走了。他们花了好大的力气，才用晒簟把稻谷盖好。这时，毛泽东才浑身水淋淋地跑回家来。原来，他在帮邻居抢收谷子。毛贻昌对此很生气，说：“自家的谷都叫水淌走了，你倒帮人家去忙乎！你是在家里吃口粮，还是在外头吃口粮？”说罢，扬手就要打儿子。毛泽东笔直站着也不躲闪，理直气壮地说：“人家是佃的田，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的多些，冲走了一些也不太要紧。你既然怪我舍了自家而顾了别人，那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父亲见儿子说的颇在道理，也就没有再责怪他了。

毛泽东有仁爱之心。八月的一天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他行至湘乡五里牌，看见一位老汉挑着担盐在艰难地行走。毛泽东赶上去问：“老伯，您担这么多盐到哪里去？”“我到凤音四都！”毛泽东听了后，便说：“我也到凤音四都，我们正好同路，我来帮你背一些吧！”说着，脱下一条棉布裤子，满满地装上两裤脚盐巴，扛在肩上，绕道十多里，把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嘴。回到唐家托外婆家里，已是掌灯时分。这年的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毛泽东在去井湾里上学的路上，遇见一个衣服单薄破烂的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他走上去和那少年攀谈起来，了解到少年父死母病，只得顶风冒雪外出讨米。毛泽东非常同情这个少年，便把自带的中饭给了他，并脱下一件衣服披在少年身上。后来，母亲洗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问起儿子，毛泽东才把事情原委告诉了她。

在井湾里私塾，毛泽东是年龄最大的，但他从来不欺侮贫穷弱小的同学，

还常常热心帮助他排忧解难。同学毛十二伢子家大口阔，生活贫困，买不起纸、笔、墨砚，毛泽东十分同情他，就把自己的送给他用，他为搭帮家境苦寒的毛富伢子坚持读书带双份饭的事，更是在私塾被同学们传为美谈。井湾里私塾，离韶山嘴上屋场有好几里路，为了节省时间读书，先生要求毛泽东自带午饭。一天中午时分，同学们都在教室吃饭，而有个同学却独自一人在旁边叹息。毛泽东一问，原来这个叫“毛富伢子”的同学家里并不“富”，眼下家里已经断炊了，所以他中午只得饿肚子。知道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就把自己带的饭菜，分给毛富伢子吃。为了不使毛富伢子因为没有饭吃而辍学，从这以后他每天和这位同学一块分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午饭。天长日久，两人共一份饭自然是够吃的，他便尽量少吃一些，让毛富伢子吃饱。每天下午上课时，他都饿得慌，放学回到家里，放下书包就到伙房弄饭吃。母亲文七妹以为儿子的午饭带少了，第二天换了个大钵给他带饭，可是儿子放学后仍然叫饿。母亲感到奇怪，就问毛泽东：你上学读书怎么比在家里做事吃的饭还多？毛泽东这时才把事情的原由告诉母亲。母亲听后慈爱地对儿子说：“石三，你这样做是对的，只是不该瞒着我，应该早些对我讲清楚，我好给你多带一些饭菜，也省得你们两人都吃不饱呀！”从这一天起，母亲每天中午给儿子带双份饭。

毛泽东敢于扬善惩恶。他常对同学说：逢善莫欺，逢恶莫怕。毛泽东虽然关心爱护弱小同学，却喜欢打抱不平，与逞强凌弱的富家子弟作对。有一回轮到他值日，在帮同学蒸饭时，却把一坨锅底灰放在一个富家子弟的饭钵中。这个同学吃饭时，发现饭黑乎乎的，就大哭大闹，引起郭伯勋来追问。毛泽东坦白地承认，锅灰是他放的。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他平日不爱惜粮食，吃不完的饭菜宁愿倒掉，也不肯分给没带饭的同学吃。像这种人，也要让他饿一顿，看看是什么滋味，使他得点教训。”郭伯勋虽然觉得他的行为有些过激，但又感到他的话不无道理，并没有批评他……

上面这些事情，有的是郭伯勋在与毛泽东一年多的师生交往中，亲眼目击的，有的是他在平常的家访中，听毛泽东的父母说起的，有的是侄儿梓阁、梓材告诉他的；还有的是毛泽东自己把它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话资料，讲给同学们听，然后由同学传开的。透过这大量琐碎小事的底蕴，郭伯勋得到一个惊奇的发现：毛泽东具备一种近乎于圣人君子的古风，而它又几乎同毛泽东与生俱来。

这时，郭伯勋蓦然想起毛泽东的名字来。泽东，润芝，名和字搭配精当，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寓意深远！泽东，泽沛苍生，东来紫气；润芝，《论语》中有“楚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变节”之句，《淮南子》亦曰：“兰生幽谷，不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义，不为莫知而止休”。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这“芝兰”，不就隐喻着君子的高风亮节吗？联想至此，郭伯勋感到：毛泽东这个人，还有他的名字，甚至包括他的自身特质、天资秉性等，难道都是上苍赐给芸芸众生的？！

打从真正了解了毛泽东起，郭伯勋对自己的断言更加深信不疑。同时，他对毛泽东的教育也更尽心尽意，特别是在对毛泽东自身的原始美德进行深层开掘的过程中，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为了使毛泽东把不自觉的乐善好施，上升为自觉的明德修养，以造就一代经天纬地之才，郭伯勋根据《四书》的内容，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给毛泽东灌输古时圣哲关于伦理、政治、

哲学等方面的思想精髓。

作为深受孔孟之道影响的“孔门弟子”，郭伯勋尤其尊崇孔子，他要毛泽东效法“大成至圣文宣王”，做个完人。郭伯勋告诉毛泽东：孔夫子是一位人生的导师。他在理论上，并通过自己的实践，勇敢地探索着、不断地揭示着人生的深刻哲理。他公开宣称，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在于求“仁”。他一生都在努力追求，使自己成为仁人，并力求造成一个产生仁人、充分发挥仁人作用的社会环境；他少年贫贱，始志于学，为实现自己追求的目标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本领；中年发迹，他没有颠狂，积极寻找机会，试图能找到一个实现自己追求的理想舞台；盛年当政，有荣华富贵，有万人之尊，他却利用有利的时机，推行实践仁道，把荣华富贵看成过眼烟云；年近花甲，终于弃官出走，去卫逃宋，陈蔡绝粮，匡人围困，艰难苦楚未移行仁之志，友人劝阻，朝野讥讽，逆言充耳，不动求仁之心；行将就木，仍大声疾呼：“朝闻道，夕死可矣！”可谓终身不渝。郭伯勋要求毛泽东，常用圣人的德行与自己的言行相比较，做到“三省吾身”，早夜以恩，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当初并没有领会郭伯勋先生的深意。他不爱《四书》、《五经》这些古书，对孔子也没什么好感，及至后来年纪稍长，知识面的拓宽，和独特的思维定势的形成，他甚至公开地站出来同孔子宣战。因之，他不太满意郭先生的说教。在井湾里私塾学习了一年零八个月之后，他由于老师所教知识太浅、难满足求知欲望和家中需要种田人手等主客观原因，终于告别了郭伯勋，从井湾里回到了上屋场。

尽管如此，郭伯勋先生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人，一直相信毛泽东能成大气。据传，1949年10月1日，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当年逾古稀的郭老先生在广播里听到这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时，他惊喜地对家人说：“听，毛泽东的声音！像不像女人的声音？我早就说过，男人生一副女人相，一种女人声音，就会主大贵，做皇帝，没错吧？！”

当年，毛泽东对郭伯勋先生的一片苦心没有领受，可对这位老先生诲人不倦的治学精神和知遇之恩，却是念念不忘的。他深知，正是老师出自于一片爱才之心，对他从难从严的要求，使他掌握了不少有用的知识，并应用到后来的革命斗争生涯之中。因此，直至建国以后，他仍怀着感激的心情，通过各种途径，关心询问恩师和家人的情况，早在1952年11月的中旬，毛泽东少时的老师李漱清和同窗好友邹普勋，到北京看望毛泽东。会见时，毛泽东打听起郭伯勋一家的事情来。他关切地问他们：“井湾里郭梓阁在不在？我在井湾里读书时，他姐对我很好，给我梳过辫子。”言语之中，流露出对往日学生生活的难忘和对同窗好友及其家人的挂念。郭梓材回忆说，毛泽东在百忙之中，先后给他家及他本人寄来书信十三封，还汇款近两千元，以资助他和家人治病及改善生活。

14 后人妄议

用今天的眼光看，郭伯勋用看相来预示毛泽东日后的巨大成功，这无疑带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色彩，是不足取的。

毛泽东毕竟不是帝王将相，而是党的领袖；不是至高无上的天神，而是被时势造就的英雄；不是真龙天子下凡，而是普通农民的儿子和孜孜以求的学子。他之所以成为伟人，绝不是靠天命，也非纯粹的机遇，而是他的经历，他自身的种种特质，作用于中国历史洪流的需要和必然结果。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风云变幻、动荡不安、方死方生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正是因为早年的毛泽东仅仅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其经历既平凡又不平凡，因而其思想的种子能深深扎根于中国民众的肥沃土壤之中，更为直接地吸取水分和营养，更能无隔膜地反映出普通中国民众的情绪、意志、愿望和要求，从而把握住时代脉搏、中国社会脉搏，最终凭借自己杰出的组织才能和超群的思想智慧，把自己的名字，熔铸于中国历史丰碑。

但是，有一点值得提醒的是，历史是不容粉饰的！毛泽东曾实实在在地从师于郭伯勋，在这位“半人半仙”、满脑子孔孟之道和《易》学原理相混杂的老先生门下，读过一年多时间的古书和杂书。这期间，他曾对《易》学产生过深深的好奇心和一定的兴趣，也曾借阅过佛学方面的书籍，这些都是有据可查、毋庸置疑的。至于说到毛泽东受没受他老师的影响，恢宏的易理和佛学的教义，在后来的大哲学家和无神论者的头脑里，留没留下残渣，这恐怕是世人、甚至毛泽东本人，也难以澄清的。对于当今有的国外文人学者，用毛泽东睡觉必然头朝东，来证明这位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仍然是迷信的，这一点，笔者只能提议他们到毛泽东所有故居中去获取考证；说到他们关于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摘，我要提醒诸君：世上绝对纯粹的东西是没有的，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也是杂取众长，这其中自然也包括易理。这些，权作“题外话”罢了。

不过，笔者在本文中不想讲这些老师对于学生所起的“二律背反”作用，只想特别论证一下，郭伯勋先生对于毛泽东一生立身、做人、建功立业所产生的积极而重要的影响。那就是，他对毛泽东“虎气”的形成、藐视一切的大无畏精神的培养，就如同对毛泽东进行知识灌输一样，起着开发童蒙的作用。“天命”，中国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内核，代表着少年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末代封建王朝中国人的文化心态，无论是王公贵族、文人雅士，还是山野草民、下里巴人，无不匍匐于“天命”。正所谓“自古兴亡不由人”。试想，一个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在乡间有着很高资望的老先生，以近乎于迷信的神秘色彩，引经据典地去宣称一个年方十几岁的稚童有“帝王之相”，并深信他“日后定会大有作为”，这无异给对方编织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使之产生多么大的自豪感和多么强的自信心！同时，它又在世代听天由命的山民中，产生多么巨大的震撼力！而且，郭老先生的断言，又在毛泽东以后的学生生活中不断得到和鸣——在东山小学堂，颇具文才的谭咏春老师看了他的相貌、读了他的文章。不也是断言他有“建国之大用”吗？在北京，名士章士钊第一次在杨昌济的家里看到了毛泽东，不是也在他堂堂相貌面前驻足，而后深赞他是“伟器”、“异材”吗？可以想象得到，当毛泽东吟诵着孟子的话：“如欲治国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一股陡起的稀世豪勇、人杰气概，将是怎样使他豪气顿生！催他跃马奋进！

有人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毛泽东是不是从少年时代起，就立意要成为伟人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基于“舍我其谁”而产生的自信心，是他成功的基石。这种自信心使他本能地认为，他的意志能压倒一切，凡是他希望获得的东西，必定会归他所有。于是乎，在幼年时期，他成为韶山的“孩子王”；在一师求学期间，又被推举为“学生王”；直至大革命失败后，又带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当了红色的“山大王”。而这些，则是凡夫俗子们可望而不可及的。

命运似乎也被他那铮铮的“王者之气”慑服。他一生征战，却从未受过一点伤；他十磨九难，却于九死而入一生。秋收起义之初，他落入敌手，竟然轻易逃脱，虎口余生；进攻长沙退到三湾，子弹打穿了他的帽子，裤脚还钻了两个洞，连根毫毛也没有伤着他；胡宗南的大军逼进延安，他率部在敌人的眼皮底下“蘑菇”，子弹从他耳边穿过，打死了警卫战士，他却安然无恙；1948年5月，敌机轰炸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他的住地中了几颗炸弹，连开水瓶和鸡蛋都被弹片崩了个稀烂，他却幸免遇难……如果在这些险境中，死神不是向他退让的话，那么历史将要重新书写，可是——死神总是退让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宿命论”色彩竟是如此浓烈。

第四 章毛宇居

——纯儒塾师堂兄

圣明之王，不可无师。

师道至尊。

——《贞观政要》

15 “韶山一枝笔”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之中，他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是颇值得一提的。历史的台历，要翻回到 1959 年的那个沉闷燥热的夏天。

6 月 25 日的午后，毛泽东回到了他阔别三十二年的生身之地——韶山冲。下车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向身边的工作人员吩咐：“要把我大哥接来！”

不一会儿，一位精神矍铄，银须飘逸的老者，拄着一根拐杖，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簇拥下，来到了韶山宾馆。

毛泽东闻讯，从他下榻的“松山一号”迎了出来，拉住这位老人手，连声问候：“大哥，你好哇！身体还健旺嘛？……”一边说着，一边毕恭毕敬地搀扶着老人踏上宾馆内的水泥台阶，走向室内……

这位被毛泽东称为“大哥”的老人，便是他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先生。

也许人们不会相信，就是这个貌不惊人的老者，当年却是一位颇具才华而又富正义感的教书先生，是一位曾为伟人之师的了不起的乡村文化人。但这些都千真万确的。

是他，给了幼年的毛泽东以丰富的知识营养，使之打下了深厚的文史基础，从而为日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壮举准备了无与伦比的精神武器；正是这位有一定理想与信念的农村旧知识分子，曾一度放弃安逸平静的生活，追随学生毛泽东，投身于他致力革命事业之中；正是这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面对反动当局的刀枪，历尽艰险，妥善保存了毛泽东的《祭母文》这一极其珍贵的文物，并将其归还给国家；正是他在湖南省主席何键派兵来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时，巧布疑阵，赢得了一场护坟斗争的胜利……

毛宇居，派名泽启，字先甲，又名蕊居、禹居，别号“守一子”，自诩“韶麓散人”。1881 年，出生于湘潭县韶山冲蔡家塘（今韶山市韶山镇韶源村）。国子监生。清光绪年间开始设馆授徒，是当时韶山冲屈指可数的秀才之一，人称“纯儒”。1906 年，毛宇居同郭伯勋一起在井湾里私塾为族弟毛泽东授课十个月。1912 年，他在湘潭师范学堂毕业，继续从事私塾教育。1921 年前后，到云南滇军“建国军第六军”军长何海清（韶山人氏）手下任秘书，同少校衔。不久，他辞去军职，往川东南一带经营茶叶生意。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马日事变”后脱党。抗战期间，同情、支持共产党，悉心照顾烈士后代毛楚雄等。至 1949 年，从事私塾教育累计达三十余载。1950 年，两度被邀请为湘潭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特别会议代表，次年九月受聘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1953 年 1 月受聘为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4 年 9 月 29 日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毛宇居系晚清的国子监生，饱读古书，尤工诗对，人称“韶山一支笔”。他安于淡泊，不慕仕禄，以教书授徒、造福桑梓为乐，甘愿在乡间过着贫寒清苦的生活。他曾写有一联“带耕且读原家教，温故知新作土风”，表白自己的心迹，还作“自画像”诗以言志。诗曰：

牛马生活我生忙，漫走川滇觅稻粱。

鹤守残梅撑做骨，雁飞中泽鬓中囊。

关怀群挤多摩擦，话到和平费思量。

世事沧桑从变化，只愁书味不留香。

毛宇居不仅颇具才学，且为人正直、达练。他曾在赠侄儿毛远翔一笔筒上题词道：“外像圆，内像空，圆而且空，是之谓玄，同竹君子能如此，宜其明体达而无所不通，吾今以此为师兮冀，朝夕瞻仰以磨砢，又岂得小之曰笔筒。”这可看作是他性格涵养的写照，也是他为人处事的信条。正因如此，他在韶山这一带人望颇高，深受乡亲们尊敬。

16 大哥哥与小老弟

毛宇居与毛泽东是未出五服的兄弟。他的曾祖父毛南方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系嫡堂兄弟，其父毛福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共高祖，他比毛泽东年长十三岁，是他的排房兄长。早先，他们的祖上曾经都住在滴水洞黄田坳，后来树大分枝。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1823～1893年）家人丁增多，滴水洞冲墾田土有限，祖人便于清光绪初年（1875年）前后，买下了韶山嘴下面的土地冲（即上屋场前面）一带田土。但这些田土离家有七八里远，寒来暑去，春种秋收，终觉隔山隔水，难于看管。三年后，他买下了上屋场东头五间半土砖茅屋，准备让成房立户的儿子搬到这里来种田和居住。可是，他的两个儿子恩农、恩普兄弟都嫌太偏远吊挂，不想去种，不愿去住，都想厮守在祖居世袭领地上。最后，兄弟俩通过抓阄定夺。清光绪三年（1878年）冬，毛泽东的祖父恩普携妻罗氏和儿子毛貽昌以及另外两个女儿，迁居上层场。在这前后，毛宇居家也迁居蔡家塘。虽然他们两家迁居两地，但仍然往来密切，亲如一家。

1906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读书，毛宇居同与井湾里主人郭伯勋在这里当塾师，给学生们讲授《左传》等经书。由于他与毛泽东的这种特殊的亲情关系，毛宇居对毛泽东这个堂弟自然特殊看待，对他的管束、教育也比其他学生严厉得多。

可是，在少年毛泽东的眼里，大哥哥永远是大哥哥，并不因当了他的先生而改变。相反，有大哥在这里做先生，他感到腰杆子比往常又硬了许多。因此，他开口闭口都叫毛宇居“大哥”，从不叫他先生。在乡间的私塾里，先生与学生都是乡邻，非亲即故，倘若都像他这样按辈份称号，岂不乱了套，还有何师道尊严？这事，毛宇居纠正了他好几回，可他老是改不了。

更有甚者，毛泽东还经常违反课堂规矩，给先生“造蛋”。比如：他不愿读《四书》、《五经》，就和小同学串通起来，反对背书；让他好好在教室温课，可等先生一离开，他便组织小朋友排队打仗，由他当“司令”，让大家冲锋，把个教室弄得乱糟糟的。这些都让毛宇居这位老师加堂兄十分挠头、恼火。

有一回，毛宇居要外出，临行前规定学生在课堂预习课文，不得随意走动闲谈。毛泽东却提出：如果大哥今天不讲授新课，他将到山上树林找一个僻静而空气新鲜处，那里读书记性更好。先生没有答应。可是，毛宇居刚走，毛泽东背着书包爬到屋后山上。两个时辰过去了，毛泽东躺在青石板上背熟了课文，又爬上树摘了一书包毛栗子。回到私塾课室，他先给每个同学分几颗，然后给“大哥”也“孝敬”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他责问道：“石三，谁叫你到处乱跑？”“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记硬背也是空的。”毛泽东辩解。“放肆！”毛宇居很是生气，脸涨得通红。

下午，毛宇居仍然不依不饶，他要毛泽东站在门外，不让他进屋。约过了个把时辰，毛宇居指着课室外的天井说：“你有本事不服管教，就以天井做首诗来。做不出我先打你的屁股，再告你爹！”

毛泽东不愿挨打，只得认罚。他绕着天井转了两圈，思忖着这诗怎么个做法。他看见：天井中有一座深井，调皮的学生从溪里捉了些鱼虾养在里面。不时有三五只小鱼儿把头伸出水面上，小嘴一张一合，似乎感到井中的沉闷，

参见郭梓材《我对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的回忆》一文。

要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这一情景，给了毛泽东的灵感——他想大哥管得也太过分了，自己就像天井中的小鱼虾，没有半点自由！想着想着，他随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轻易过关”，虽说毛宇居当时不觉解气，却不得不承认堂弟是个奇才。这敏捷的才思和深刻的讽喻，给毛宇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数十年后，他还常向前来韶山参观的人们谈起此事，称赞他的才华和反抗精神。

毛宇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从毛泽东的“反抗”行动中体会到：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已不能满足这个聪明而顽皮的少年的求知欲，更不能“降服”他；只能因人施教、严宽相济，方可奏效。此后，他改变了对毛泽东死板的教学方法，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多让他自学，尽量扩大毛泽东的视野。在他的指点下，毛泽东读了大量他喜欢的书籍，才学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在古代文化知识和古代汉语方面，更是打下了较厚实的基础。及至后来，他写著作或作演说，往往博古通今而用典贴切，妙语联珠，这些都不能不说是得益于毛宇居这位“大哥”。

17 手足情深

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不仅有着师生情感，更有亲如手足的兄弟之谊。有三件事足可以说明这一点。

第一件事，是毛宇居两次劝说叔父毛贻昌送子读书。

毛泽东在井湾里学习了近一年时间后，由于他父亲毛贻昌需要帮手，他不得不辍学在家。那时，他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农忙时要下田顶一个雇工的活，农闲时在家磨谷、舂米、喂猪，就像一个雇请的长工。因为他是家里识字最多的人，在白天忙了一天，夜里还要帮父亲记帐算帐。严厉的父亲常常在夏秋的月光下，教他学会打算盘，并且要学会两只手同时打。父亲想让他学会经商本领，准备继承和光大家业。

毛泽东读书的权力被剥夺了，可他渴求知识的欲望却难以遏制，他只好利用点滴的时间读书，有时深更半夜点起小油灯苦读寒窗。这些，毛宇居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知道，堂弟毛泽东爱读书、会读书，可不进学堂正正规规受教育，仅凭自学还是不够的；再说，久而久之，身体吃不消，必将难以为继，一个可塑之材岂不白白荒废掉！

毛宇居觉得他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一天晚上，他来到上屋场，和堂叔毛贻昌打起了“嘴巴官司”。

“叔，石三从经馆回家，有些日子了吧？为什么没让他念书呢？”毛宇居和颜悦色地问堂叔。

“泥脚杆子，读么子书啰，只要能记记帐，打打算盘就行了，念书要花好多钱呀！”一向严肃武断的毛贻昌面对满腹经纶、年纪只比自己小几岁的堂侄，和缓地解释道。

“石三脑子灵光，是块读书的好材料，放到屋里盘泥巴，可惜啊

……”

“家里偌大一冲田地，人手不足哇！我家石伢子在家，只需请一个长工就行了，还是让他跟我顶顶事吧！”

“少请一个长工算得么子啰！石三如读出书来，怕要顶成百上千的长工哩！”接着，毛宇居就拣毛贻昌看得见摸得着的韶山冲里读书成器的人一一列举出来，大讲读书识理的好处，直把毛贻昌的心说得活动起来。

以后，毛宇居又一连几次到上屋场，找堂叔劝说。不久，毛贻昌给毛泽东娶了亲，迎进一个年方十八岁的儿媳。家里添了一双人手。这样，他终于按照毛宇居的意见让儿子继续上学读书了。

两年后的1910年早秋，毛贻昌又一次强迫儿子退学，准备安排他去湘潭裕盛米店当学徒，毛泽东又一次失学了。

毛宇居知道这一情况后，与毛泽东的堂伯父、毛贻昌五服内的堂兄毛麓钟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等人，同毛家的亲戚一道，再次来到上屋场，力劝毛贻昌收回送子进城经商的成命。大家众口一词，称赞毛泽东的读书天分，说他若进了洋学堂，日后定会有大的出息，要求毛贻昌让毛泽东出去读书。经过再三劝说，终于使毛贻昌认识到读书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应允了儿子继续读书的请求，使之踏上了“洋学堂”的门坎。

由于毛宇居独具慧眼，鼎力相助，毛泽东才得以走出大山，日后果真如他的老师所愿有了“大的出息”——成为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伟人！对此，毛泽东一直是心领的。

第二件事，是毛宇居冒险珍藏毛泽东的《祭母文》。

曾有一位外宾来韶山参观后说：“毛泽东作为一位伟大领袖，所表现出来的无私和奉献的美德，在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中，是绝无仅有的。毛主席心里只有人民。”应该说，毛泽东这种美德与他母亲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是旧中国女性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美德在她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家她仁慈厚道，勤苦节俭，是一位贤妻良母；在外她心地善良，善体人之情，解人之难，是乡亲们公认的“好人”。有位哲人说过，人的第一位老师是母亲。同样，毛泽东儿时受母亲的影响最深。母亲颇有同情心，毛泽东就乐于助人；母亲迷信神佛，信教吃斋，毛泽东也就很虔诚地烧香拜佛。所不同的是，毛泽东将佛教中的“普度众生”和周济贫苦人的举动升华到一个最高层次——即“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穷苦农民的道路”。这条道路的选择，可谓母亲是他的引路人。

因此，毛泽东很爱自己的母亲。他以后到了长沙，时刻都不忘母亲。他二十六岁时，母亲得了淋巴炎，正在长沙的毛泽东还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氏夫人第一次照相，也是最后一次照相。毛泽东万万没有料到，这竟是他们母子之间的最后一次欢聚。

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驱张”运动的时候，得到母亲病危的特急信，像是晴天霹雳，马上奔回韶山。可是，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经入棺两天了。二弟毛泽民告诉他，母亲临终时还在呼唤他们的名字。毛泽东听后心如刀绞。那几天，他对着暗淡的油灯，一直守在灵前。并对着孤灯，和泪写了一篇情意深切的《祭母文》。这篇长达495言的骈体祭文，即使今天读来，仍哀婉动人，令人泪湿青衫，堪称祭文典范。特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祭母文》

民国八年八月十五日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萃萃，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则，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使报贲。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心秉慙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心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亡。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筋。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

毛泽东还含着辛酸泪，作了两副灵联。

这篇《祭母文》，译成现代白话的大意是：

“唉唉！亲爱的母亲，就这样匆匆离开了人世！只生活五十三个年头，生下了七个孩子，七子存三，这便是泽东泽民与泽覃。其余没有存活的是二女两男。母亲为了养育我们，尝尽了人间各种苦楚与辛酸。摧残与折磨，使母亲积劳成疾；那历尽的千千万万啊，将会让我们心中永远悲痛！现在既无

法把这些一口气写得淋漓尽致，便只好他日慢慢去倾吐和追寻。我们今天能说些什么？算来只有两件荦荦大者。一就是母亲那伟大的德泽；一是母亲的怨恨不平！母亲啊，您的高风首先应该是那满怀的博爱——戚友不论亲疏，家族不分远近，您的恩泽所及，无不感到温暖如春，就像承受着天的覆盖和地的承载那样。您那恺悌之情与慈爱的光芒，叫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心。您感情所到之处，总会使人感觉到那真挚与诚恳。您既不肯待人以一丝虚伪，您更不愿暗地欺骗自己的心。严肃与正直已成了天性，人们从没有见过您半点儿不纯。凡是双手亲过的遗泽，全都显得那么有条不紊。您的思维是那样精密，感情和理智界限是那么分明。没有什么能超出您精明的筹算，没有什么能逃过您智慧的眼睛。您爱好清洁成习惯，传遍亲戚家族与乡邻；您一尘不染，从表至里，由身到心。您“仁智礼义信”五德俱全，鲜明突出地与您的人格相联，您有伟大的人品，您像是神明的化身。至于母亲怨恨不平的，是身为三纲之末的妇女，痛感到平生希冀未就，志怀未伸。悲伤哀痛，莫此为甚；这难道也是天意？这难道竟是人情？像地角塌陷，再也没法填平！再说儿辈，虽以次第长大，但像果实未熟，半黄半青。您在病中还拉着我们的双手，最令人心酸肠断的，是您直呼着儿辈的小名。一心希冀的，是儿辈都能好自长成。还有，您牵挂着那些亲朋至爱，您不忘他们一向的关注，您记住他们曾为您劳辛。年龄不分大小，关系不论亲疏，您一心只望能一一给以应有的报酬。所有这些回忆啊！无不体现出您慈爱的光辉和崇高的德性。我们深知母亲的心理，誓愿以此作为典范，永不背离。至于母亲生平希望却做不到的，我们定将弥补不遗余力。母亲的慈容就像仍在眼前，母亲的神灵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的心将怎样也不再离弃。您养育我们的大恩就像黎明的曙光，像温暖的春曦，这片图报的赤子之心啊，何时能再有尽期！但只恐像小鸟精卫的衔石，怎能把大海填成平地！唉唉！亲爱的母亲！您的身子虽然离开了人世，但永远活在我们的内心。您的形体虽不再存在，您的仙灵却万古如生。我们活着一日，便会报答您的一日；生的时光，即是报答的时光。我们的话似乎说了许多，实际要说的话儿正长！提要说了个大概，多少琐细事情叫人难以忘怀！现在正举行家奠，母亲啊，请尽此一杯，以后我们还有多少话语向您倾吐，正像时间的流水一样，永远无法收藏！慈爱的母亲，请您享用酒食……”

在毛宇居等亲房叔伯的操持下，毛母的柩柩在家停留四天，按韶山地方的风俗以道场来超度亡魂。十月八日晚，毛泽东长跪母亲柩前，含悲诵读，顿时感动庶汇，满堂泣不成声。

《祭母文》后由毛宇居收藏。后来，为了防止国民党反动派搜查，他将这些手稿一页页塞进墙缝中，才使之完整地保存下来。解放后，他将它交给国家。

第三件事，是毛宇居冒死保护毛泽东家的祖坟。

那是1932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星火燎原”，震惊湖南。当时盘踞湖南的新军阀。湖南省主席兼国民党军队第四军总指挥何键几次派兵“围剿”湘赣一带的红军，都被毛泽东指挥的红军将他打得大败而逃。更使他恼羞成怒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红军趁他率主力部队远离长沙，去湘南迫击桂系部队之际，竟从平江、济阳一带突然杀出，消灭了他的几个团不讲，竟一举攻占长沙，焚烧了他的省政府和四路军总指挥部。若不是一个侦缉人员冒死飞马来湘南前线，及时将这一战况报告给他，如按照原定计划，即将搬师北返长

沙的何键，恰好落入红军之手。他在那个侦缉员的带领下，被马弁们前拖后推地拥着走，经北门外的环城马路逃到湘江码头上，坐着小渔船过了河，逃到河西的裕湘纱厂，才保住了一条性命。

后来，他在蒋介石的军队的帮助下，重占了长沙。回城后第一件事就是想如何剿灭红军。可剿灭红军又谈何容易，硬的也用了，软的也用了，可谓机关算尽，心计已竭，可还是没有个上乘之策。

这日，何键的拜把兄弟吴凯南献计说：“毛泽东率领的红军之所以猖獗，实非人力之功，乃天荫之效。我听说韶山是舜帝南巡演韶乐的地方，灵秀非凡，想必是毛家得地灵之光。我们不妨派人到韶山挖掉他的祖坟，断他家的龙脉，那毛泽东的红军就会不攻自垮了！”

何键本是个迷信大王、“虔诚”的佛教徒，他的部下，排长以上都要跟他一样剃光头入法门，当几个月“业余和尚”，否则不得升官。他最崇拜的是岳飞和关公。听了吴凯南的话，他觉得很合他的心思。为了让毛泽东“倒霉”，决定挖他的祖坟，破毛泽东的“风水”、断他的“龙脉”！

主意已定，何键便派副官处长熊士鼎和特务队长龚仲荪率特务队到韶山，去执行挖毛泽东祖坟的“军务”，为了行动上的保密，对外代号为“酒瓶计划”。于是，一场挖坟与护坟的斗争便在韶山展开了。

何键兴师动众挖毛泽东的祖坟，实属一幕闹剧。不过，关于毛泽东祖父毛翼臣墓地，在韶山确有一段神秘的传说——

从滴水洞往西，有一条通往牛形山的小路，牛形山又叫大石鼓，漫山遍布着宛若大鼓的青石头。这里地势极为险峻，石级山道陡如登天，全长八百多米，中间一段简直无路可走，只能攀缘铁索，凭手抓脚撑，方可一步一步登上山头。因此，即使是青壮年后生，也不能等闲视之。当今有位无名诗人因其陡峭而顿生灵感，咏诗道：“脚踏着沉重的思路，鼻子触着山的脊梁……”。山岗半腰，有一兀突的小坪。据传冬天常有些虎来此朝阳取暖，夏天来此避暑纳凉。因此，大石鼓又叫“虎歇坪”。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坟墓就在这个“坪”里。

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字四端）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德臣（字恩农），比二弟翼臣（字恩普）大六岁，早年都住在黄田坳下的东茅塘，虎歇坪属两兄弟所有。据风水先生断定，这虎歇坪是块宝地，兄弟两商定，谁先过世谁就葬于此山。结果，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在1904年先卒，遂葬于此。为证明这是不是宝地，采用乡间流行的“停棺待葬”：先停放，用砖泥围砌，上面搭一个棚子挡风雨，几年后再翻开棺木验证，直至民国元年经开棺验证，见遗体完好无损，才正式安葬，砌坟立碑。坟前几丈远是巨石突兀的大石鼓，下边是悬岩陡壁，前边山峰自然分开，山脉延伸到狮子山；坟后是黄蜂山脉的主峰，形似宝塔。对这块险要之地，有人曾如此称赞：“龙头山，虎歇坪，聚龙之灵，集虎之威，通三山之风，贯八面之气，藏龙卧虎，风云际会……”

再说，熊士鼎派特务萧鼎元等人事先秘密地来到韶山，通过韶山劣绅、乡长李性恂，终于探听到：毛泽东家的祖坟，就在“八仙吹箫”的虎歇坪一带。为了找到具体地点，他们化妆成“风水先生”，终日手拿着罗盘，鬼鬼祟祟地在虎歇坪一带转悠、搜寻。但由于他们人生地疏，加上山上树竹茂密、荆棘丛生，终究没有找到坟地。

参见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档案 756 号《104、匪特、死刑、龚仲荪卷》。

熊士鼎决定出动大队人马，边找边挖。1932年6月29日晚上，没有星星，月亮也被乌云遮住了，整个韶山冲一带一片黑暗。熊士鼎带着特务队二十多人，在湘潭县保安队的配合下，悄悄地进了韶山冲，朝滴水洞扑去。他们按照李性询指定的路线，来到东茅塘一带。山上黑乎乎的，树林密不透风，老鼠虫蚁在草丛中穿梭，特务们见此情景，心里一阵阵发毛，便胡乱地挖起来。他们先在韶山水库原址，挖了毛泽东的九派祖毛湘泉的坟墓，挖出了好多白蚁；后来到枫树坳挖了地方绅士毛貽池的祖坟；他们不甘心，最后又到牛形山挖了毛草堂的祖先毛厚裕坟一家。连挖三坟，均不是毛泽东的祖坟。这时，山上突然响起了“呵嗬、呵嗬”的喊声，“轰隆、轰隆”、“噼噼啪啪”的枪炮声，声音在夜的寂静中显得特别响，随着刮下山麓的阵风，如同千军万马冲来。匪兵们是经历过沙场的，是从炮子堆里爬出来的，领略过红军游击队的厉害手段，顿时以为中了埋伏，人生地不熟，吓得手脚都酥软了，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撞撞碰碰地向冲外逃窜，一窜竟窜到了离韶山冲十八里远的永义亭，这才惊魂初定。

第二天，李性恂来告诉熊士鼎，昨晚的“枪炮”声、喊声是当地农民守红薯赶野猪时发出的，“炮”声就是鞭炮，“机枪”就是鞭炮挂在铁桶里燃放，另外的响声是响竹、木脚鱼敲出的。匪兵们听说，才知道上了韶山人的当。

其实，何键派兵来要挖毛泽东祖坟的消息，韶山人早已获悉。当李性恂带着“风水先生”到虎歇坪察看时，立刻引起了周围农民的关注，大家纷纷猜测着他们的来意。后来，他们找当地人打听“毛泽东的祖坟在何处”，乡亲们顿时明白了这帮人的用心——他们是“黄鼠狼逛鸡窝，没有什么好事”。这事传到毛泽东的堂兄和少时的老师毛宇居的耳朵里，他听后又气又急——孙辈造反，祖辈地下尸骨何辜？再说，毛泽东是为老百姓的活路才带头造反的，怎能让他受这个打击呢？这位老夫子是很相信“地脉”和“风水”的，他熟读古籍，知道中国古时臣子犯有“谋反”等大罪后，除满门抄斩外，还有挖祖坟、毁宗庙，甚至焚尸之举。民国十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不就曾以孙中山“停灵枢的地方风水太好，是以前南军屡次告捷”为由，要焚烧他的遗体吗？！在民间则更不用说，无人不迷信坟地风水。某人投考中举，不是祖上阴功，便是坟山贯气：要是做了高官，那绝对是他家的祖坟占了风水宝地之故……这次何键的匪兵要是真的挖了堂弟毛泽东的祖坟，岂不毁掉了我们整个一族人的世代昌荣了吗？！毛宇居不觉越想越急，决心哪怕舍弃老命，也要和乡亲们一起保住毛泽东的祖坟，保住这条龙脉！他拈须思考着对策，很快便计上心来。

就在“风水先生”离去的当晚，几十个男女老少齐集在虎歇坪的山上，有的平土，有的担草皮，一会儿，硬是将毛泽东祖父毛翼臣的坟平掉了，并在坟上整成一片旱土，在周围植上草皮，谁见了都以为这是一块旱粮地。至于那块墓碑，人们将它埋到了一米多深的地下……

匪兵们第一次上虎歇坪，不仅一无所获，还受了一场虚惊。熊士鼎恼羞成怒，第二次公然在青天白日派兵进山挖坟。可是，当他们气喘吁吁爬上虎歇坪时，出现在他们眼中的只是遍地的红薯蔓和挖掉了红薯后平整了的旱地，旱地旁边倒是有一片坟堆，可哪座是毛泽东的祖坟呢？他们傻眼了。

正当特务们不知是进是退、左右犯难的时候，李性恂同特务队长龚仲荪耳语了一阵，龚仲荪立即派出十几个枪兵朝一个村庄狂奔而去。不一会儿，

枪兵们抓来了一个约摸五十岁的老头，他就是毛宇居。枪兵们用“吹火筒”顶着老人的胸膛，威胁他说出毛泽东的祖坟来。毛宇居自知这些家伙不会轻易罢休，只好两害权衡取其轻，指着一石坟说：“那就是”，匪兵们哪肯轻易相信，威逼毛宇居“说真话”。突然，山顶上飘下一块白布，匪兵们拾来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八仙吹箫半山腰，一座石坟光又牢；

百年风景全聚此，古木参天凤凰巢。

熊士鼎看了，顿时高兴得手舞足蹈：“哈哈，你看，天助我也！神灵不是指示我说那座大石坟就是毛泽东的祖坟吗？”便命士兵们：“给我挖！”

一会儿，枪兵们撬开石板，起出棺材，把骨骸抛落满地，熊士鼎狂笑了。但是他马上觉得冷气攻心，他看到那绯绯的棺木，耳边却响起了他父亲那颤抖的声音：“伢子呀，挖人家的祖坟，可是造孽的事！将来会报应的！再说，两家相争，虽是各为其主，可死人何辜？一旦结下这血海深仇，子子孙孙都被拖累啊！伢子，你要躲掉这差事呀！”可他没能躲脱，端了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管，再说何键还许他事成之后有赏金。此时，他再也没心思领赏的事了，那凉嗖嗖的山风、那呼呼作响的松涛似是丛中埋伏着成千上万的阴兵，朝他袭来，他有气无力地下令：“回去——吧……”匪兵们早就无心久留此地，见长官下令回营，便胡乱捡几根骨骼装进酒坛子里，拿回去邀功请赏。

熊士鼎回到长沙，夜里常被恶梦惊醒，他梦见那白惨惨的骨骸，红绯绯的棺水；那头颅、骨颅眼洞里透出绿莹莹的惨光；那咬紧的牙关似在阴沉沉地朝他喊：“还我房子来！”白天，他好像时刻都听见跟踪的脚步声……。这个何键的帮凶，既想当屠夫又怕刀沾血。不久，他疯了。最后，他脱下了那身“老虎皮”，回到沅陵老家，在疯疯癫癫中死去了……

韶山人组织的这场严密的护坟斗争，终以胜利而告终，而这场斗争的策划者则是毛宇居。在他的组织下，人们光是将毛翼臣的坟平掉了，接着以驱赶“野猪”的名义，制造了“枪炮”声，给熊道乾一帮人造成了恐怖气氛，使他们不敢在韶山冲久留，免得夜长梦多，节外生枝。使真相暴露。至于那块白布上的“天书”，自然是“韶山一枝笔”毛宇居的急中生智之作，他事先将诗写在白布上，让人藏在密林里，等到匪兵们一到虎歇坪便将它抛下，诱使他们上当……

毛宇居不顾身家性命保护毛泽东祖坟的事，一时在韶山冲广为传颂，人们更加敬重这位老先生。山里人有山里人的待人处世哲学——为人讲究的是“忠义”二字。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不是后来人人尊崇的“主席”，而是一个为“政府”悬赏缉拿的“土匪头子”，毛宇居只是看在他和毛泽东之间那份师生情、兄弟情的份上，才挺身而出的。而这一点，则是最难得、最宝贵的！

毛泽东是否知道他的老师毛宇居上述仗义之举，人们至今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对毛宇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曾给予了特殊的礼遇，这些可是确实实的。这一点，从他们那亲密的交往中可以找到佐证。

18 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

毛宇居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关系，也曾和着中国革命的曲折历程，经历了充满着凄风苦雨的艰难岁月……

1921年春节，身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回韶山过年。

大年初一。他来到堂兄毛宇居家拜年，适逢从军在云南“建国军”第六军任少校衙秘书的毛宇居，也探亲回家。叙谈之间，毛泽东把他这次回乡的目的告诉了堂兄：变卖家产，让弟妹们到长沙求学读书。他的这一打算，得到了毛宇居的支持。

一个寒风呼啸的夜晚，毛泽东和弟弟泽民、泽覃，妹妹泽建和弟媳王淑兰，围坐在上屋场灶屋的火炉边，开了一次不平常的家庭会。借着炉塘里明亮的火光，毛泽东望着全家人，语重心长他说：“国乱民不安。在这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关头，我们要想到大多数人的苦楚，只得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众人才好！”并建议大弟：“泽民，你把家里的事处理好，跟我到长沙读书去”。弟弟泽民也深感像这样的世道如果不改变，个人再苦撑苦干也是空的，也同意哥哥的主张。这样，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他们卖掉了猪牛，还清了生意往来中的赊欠，把田地分给了无田的穷乡亲耕种，并托付堂兄毛宇居照看上屋场，然后毛泽东带着泽民、泽覃、泽建告别了故土韶山，来到省城长沙，投入了革命洪流。从此，这一家人为了谋求大多数人的解放事业，先后献出六位骨肉亲人，真正成为满门忠烈，可歌可泣的革命家庭！

这以后，毛泽东于1925年和1927年的两个春节回过韶山，在故乡点燃农民造反的烈火。再往后，他长期背井离乡，数十年一直在外为革命事业奔忙。

毛泽东虽然走了，但他在韶山点的几把“火”，借助中国大地上刮起的工农革命的飓风，燃烧得更旺了，韶山人在这场革命中第一次充分展现了他们本来的特质——韶山人的性格中具有石灰岩那种坚硬，细砂般的韧性，黄土泥式的粘性。毛泽东带回的“造反”、“革命”就像一架巨大的绞拌机，把这几种性能聚合起来，使他们顿时变成强硬、紧密、坚初的“三合土”，就是用高压和强力，它也不会倒塌，不会分裂，只会顽强地溅出火星，发出反抗的信号；就是狂风暴雨来侵蚀它，也不会分化和解体，只会在表体上增加一层青苔的保护圈。

毛泽东走了，留给韶山的是“空前的大革命”——1925年，就在毛泽东走后的八月份，韶山人开始筹备清溪区农民协会，这是一个在村农民协会基础上的农会联合体，一个月后该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十月份，银田寺建立了党支部，毛泽东旧居里建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那一幕又延演到三十里之外；1926年春，下七都农协会成立，清溪农协改为湘潭特别区农民协会；八月，湘潭县农民协会成立，韶山人派出了几十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毛福轩、庞叔侃、钟志申被选为执行委员；稍后，农民自卫队建起来了，儿童团组织起来了……

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般挺立在韶山的山山冲冲；韶山的山山冲冲里，到处飘扬着农会的旗帜，韶山真正成了农民的天下。“我是农协会员”，成为农民们一种身份的表示，一种权威的象征，一种胆量的延伸。世道在韶山真正从头到脚翻过来了，昔日趾高气扬的土豪富商，在农协面前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农民协会给他们定出“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不准加租加押；要减租减押减息，废除苛捐杂税”的规矩，农民们拍着宽厚

的手掌，举起黧黑的拳，高声叫好！“一切权力归农会”、“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撼着韶山大地。在农会会员红缨枪的解押下，土豪劣绅被戴着高纸帽、敲着破铜锣在游乡；农会会员用粗黑的手指，逼着土豪劣绅交出所经手的地方公款帐，交待吃了多少“冤枉钱”；四十一乡的财主毛堂甫、钟鼎彝包庇窝藏湘乡的一个杀人犯，被农会会员捆绑起来送到区农会关押，面对着农协法庭，他们不得不低头认罪，各罚马灯四十盏和一百元大洋，给农会使用……

韶山人不仅懂得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更懂得保卫新世界，抓住那些时刻梦想反扑的敌人开刀。湘潭“保产党”头子张茂乡秘密来到韶山，串通失去天堂的上豪劣绅们准备向农民反扑。钟声申等人在百子坪地主张润泉家发现了张茂乡，就立即派农民武装骨干的彭绍辉等把他捉拿起来，押送到区农协，将他关进区特别法庭监狱。庞叔侃主持了审讯。不久，韶山人在板凳岭起台子，召开万人公审大会，“泥腿子”第一次在自己的法庭上判处了张茂乡死刑，这个往日作威作福的“三老爷”在自卫队班长蒋福祥的马刀下掉了脑袋。1927年4月，农民自卫队员在宁乡塘脚下村捕获韶山地区大土豪大恶霸、银田镇团防局局长汤峻岩。这家伙鱼肉乡里，作恶多端，民国二年以来的十四年间，共杀人五十多，活埋四人，人们对他恨之入骨。在捉到他的第二天，农民协会根据群众要求，在银田寺召开了空前规模的斗争大会，韶山人闭户锁门，扶老携幼，倾巢涌向会场，他们要诉苦、要报仇雪恨，他们更要搬去这块拦在自己幸福、自由路上的绊脚石！在大会对汤峻岩判处死刑后游乡的途中，愤怒至极的韶山人再也忍无可忍了，他们等不得法庭执行死刑，就举起了手中的棍子，捡起路旁的石块，朝汤峻岩的脑袋砸去。就这样，这个韶山一带最凶恶的劣绅翻着白眼，在白庙的白果树下一命呜呼了。

韶山的革命闹得正火红。韶山人将自己的命运的“魔方”拨弄出一个方方整整，每方都带着玫瑰红的斑斓色彩。反动派早就气了，恼了，恨了！他们把韶山这块诞生了“共匪”头子毛泽东的土地，视为“凶地”、“匪区”，必欲产平而后快！

时机终于到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许克祥紧接着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随后即派他的喽兵向韶山扑来！一股带着血腥味的阴风，一片令人窒息的黑雾，袭上韶山这片火红的大地，刚刚显出生机的韶山和刚刚将自己命运的魔方变得明朗的韶山人，正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

5月23日深夜，到处一片漆黑，狂风不断地刮着，几个穿长袍拿文明棍的土豪劣绅，领着匪营长，团团围住了毛氏宗祠，见人就抓，随抓随绑，顿时祠堂的大柱子上捆着数十个人。韶山党支部委员毛新枚，不幸在家中被捕，也被匪兵捆着杀害了。韶山的农民自卫军被打散了，农会犁头旗被砍倒了，农会的牌子被砸掉了，农会会员被抓被杀，韶山大地到处流淌着烈士的鲜血。八个月内，韶山人民就牺牲了近百名优秀儿女。

敌人似乎还不解恨，“正规军”长驻韶山撑腰，让土豪劣绅的还乡团所组成的“挨户团”、“常备队”、“铲共义勇军”，在韶山大地恣意横行。反动派把一口恶气出在“匪首”毛泽东头上——敌兵的铁蹄踏进了上屋场，对着毛泽东的旧居发出狰狞恐怖的狂笑。尽管毛泽东离家已久，反动派还是恨人及屋，他们冲进屋里，翻箱倒柜，挖地拆墙，妄图从中搜出点什么来，结果只搜出一网袋毛泽东少时用过的旧书本。对此他们也不放过，统统丢进火塘焚之一炬。毛字居闻讯赶来，冒着生命危险，从火堆里抢出了几本课本

和笔记，一直珍藏到解放以后再交还给堂弟毛泽东，为后世保存了一份毛泽东早期的“墨迹”。

从那时开始，作为毛泽东的近亲，毛宇居等族人饱受反动派的歧视和凌辱。他们向看管上屋场的毛宇居宣布：“‘共匪’头子毛泽东家的房子及所有财产，从现在起统统没收，今后不论是谁来种田、住房，统统都要给团防局交租交钱。违者，格杀勿论！”除了在财产上不让毛泽东的族人“沾光”外，反动地方势力还不许毛宇居等亲房叔伯与毛泽东往来、通信，更不许提供物资上的帮助。否则，祸及全家、全族。

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之下，毛宇居只好将仇恨埋藏在心底，一面用他与地方政府某些头面人物的交往关系与敌周旋，一面暗中为堂弟毛泽东家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在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除了继续代为照看毛泽东的旧居外，还尽心保护毛泽覃的幼子毛楚雄和楚雄的外婆周陈轩老人。其侠肝义胆，莫不让人感佩万端！

毛楚雄是毛泽覃和周文楠再婚时所生的孩子。1928年，周文楠因参加革命工作被捕入狱，才半岁的小楚雄也随母一起在长沙监狱坐牢。在狱中，周文楠饱受折磨身染重疾，楚雄也被传染，外婆周陈轩获准把外孙抱回家中治疗。1930年初，周文楠被营救出狱，三天后又参加红军，匆匆奔向苏区。楚雄与母亲离别后，大伯母杨开慧又饮弹长沙；1935年4月，担任中央苏区的红军独立师师长的父亲毛泽覃，也壮烈牺牲于江西瑞金。丧父失母，孤苦零丁的小楚雄，和外婆相依为命，在凄风苦雨中艰难度日。

在此期间，毛宇居曾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侄子毛特夫在长沙四处打听楚雄的下落，后来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在长沙漂泊流浪的小楚雄及周外婆。在长沙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等人的关怀下，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舅舅周颂年一起，于1938年被接回生身之地韶山。

随后，毛宇居即给延安的堂弟毛泽东写信，告诉家里的情况。毛泽东得知楚雄的消息后，十分高兴，为关怀侄儿的生活和成长，他给楚雄寄来了生活费，并回信给堂兄毛宇居，请他不断勉励楚雄“刻苦节省”，并将“周先生”（即周颂年）“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接到毛泽东的复信后，毛宇居更加悉心照料毛楚雄及年迈的周外婆，确是按照堂弟的嘱咐，把他们看成一家人。

为了维持毛楚雄和外婆、舅舅的生计，毛宇居和族人商量，将毛家荒芜的田地收回一部分，请人代耕，每年收成若干粮食，以养家糊口。由于得到毛宇居和乡亲们热心帮助，毛楚雄回韶山后过上了较为安定的生活。

接着，毛宇居又开始抓楚雄的文化教育。起先，楚雄跟在舅舅周颂年身边，读古文，学历史。后来，毛宇居又安排他到他任教的学校——毛氏宗族兴华初级小学、韶山私立第三高等小学读书。在教学之余，毛宇居经常给楚雄讲大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读书的事情，鼓励他像大伯那样努力学习，将来为国效力。

由于毛宇居的精心培养和楚雄自身的刻苦努力，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尤其是他写的作文，思维敏捷，文字精练、语言生动，老师十分赞赏，常常在上面批写“文笔畅达，文思大进”或“传观”等评语。在堂伯和老师毛宇居的影响下，毛楚雄从小关心国家大事，具有远大的理想，决心“继父之志，报父之仇”。这一点，在他平时的作文中就已有体现。据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所藏的有关资料记载：抗战时期，毛楚雄曾写了一篇《小朋友

的救国方法》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现在国家已被暴日侵略，危急到了万分，例如刀架在头上，火烧在眉尖一样。我们小朋友也应该团结起来，一致对外，驱逐鬼子兵。虽然我们不能背起枪到前方和鬼子血战，可是，也可以在后方做救国工作哩。”字里行间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在另一篇题为《抗战建国》的作文中，他还写道：“我国现在抗战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暴日之侵略，忍无可忍而战。二是为全人类的公义而战。三是为了要夺回全世界人类的公理而战。”我们“虽然失去了一些地方，将士们：我们不要抱着悲观，应该为国家努力，应该为祖国争光荣，把鬼子赶出中国去，收复失地，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在文章中，他认为抗日和建国必须紧密结合起来，“要抗战才能建国，要建国必须抗战”，“在前方的应该努力作战，在后方的应该努力读书和宣传，建筑新的中华民族”。他最后很有见解地指出：“前程的路，不是平坦的，崎岖艰难，多鬼多魔，所以要在这青年时代，努力向前猛进，千万不要养尊处优，虎头蛇尾，青年想要达到成功的目标，非要吃苦不行！”他的这些作文，经老师和同学们一宣传，楚雄的名气很大了。但有的人不相信，认为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有一次，县里的一位督学来韶山视察，看了楚雄的作文后惊疑不已，他以为是任课老师为了“树牌子”请人代写的，便让校长把楚雄找到进行当面测试。督学先是拿着教科书有意点了几个难题，让他回答，楚雄不慌不忙，对答如流。接着，督学又让他作文，楚雄胸有成竹，下笔行文，一挥而就。督学读罢，顿时变惊疑为惊喜，连声赞叹道：“非凡之才，非凡之才！”这时，站在一旁的语文教师毛宇居以自豪的语气向客人介绍：“这就是当代伟人毛泽东的侄儿，他是家学渊远啊！”……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毛宇居除了关心照顾毛泽东的侄儿楚雄及其外家亲人外，还有一件事颇值得一书，那就是他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之下，甘冒政治风险，宣传颂扬毛泽东。

1938年秋，毛宇居在韶山冲上屋场毛泽东的家门口，张贴了一副对仗工整，寓意深厚的大红对联：“泽沛苍生，东来紫气”。用这种形式来歌颂毛泽东领导人民抗击日寇，拯救民族危亡的丰功伟绩。

1941年，毛宇居与毛国翹等编成《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对毛泽东三兄弟颇多褒扬。在毛泽东的条目下，他写了“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八个字，在毛泽民的条目下写了“琳玠齐名”四个字，“闳中肆外”，意为文章内容丰富，文笔淋漓尽致，此非溢美之词：“国尔忘家”，通俗言之，意即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为人民。说到“琳玠齐名”，琳玠者，碧玉之美称，这是毛宇居对堂弟泽民（亦称泽淋）美好品德的高度评价。“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和“琳玠齐名”，虽寥寥十二个字，但在今天仍然闪耀着熠熠光彩！

19 书来信往

1949年8月15日，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凶地”、歧视了二十多年的韶山——毛泽东的故乡解放了！

作为毛泽东的塾师加堂兄，毛宇居也告别了那艰难困苦的岁月，扬眉吐气了！

金秋十月，北京传来特大喜讯，新中国诞生了，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主席”，这不就是旧时的皇帝吗？毛宇居和所有的韶山人一样，感到万分激动，无尚荣光！

他夜不能寐，欣然命笔，写下了《颂导师》七律两首，诗曰：

一九四九年秋，阅报见房弟毛泽东荣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以诗志贺。

—

一
一领青衫运远谋，手无寸铁敌王侯。
拔山立海翻天浪，斩草除根解逆流。
饥溺为心能得众，黔黎请命矢同仇。
最难主义坚金石，百折不回气愈遒。

二

思想行为自得师，开诚领导广推为。
成军百万皆精炼，立法三章更剑奇。
人道信心遵马列，谁知济众媲牟尼。
一腔铁血关天下，国尔忘家志不移。

随即，毛宇居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向堂弟表示问候和祝愿。同信还寄去了诗作。

毛泽东接信后，在建国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情况下，很快就给毛宇居回了信，表达了他对家乡父老乡亲的关心和问候。信的内容是：

禹居家兄：

惠示并诗敬悉，极为感谢。此间情形，泽连当可面达，顺问阖族各前辈、同辈、后辈人们的安好，贵宅各兄弟子侄的健康。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从此，他们兄弟之间开始了频繁的书信来往。毛宇居通过给堂弟写信，给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带去了韶山乡亲们的祝福和问候，传递着乡间的信息；毛泽东则通过和毛宇居这位有文化、有能力，人品正派，可靠可信的堂兄书信联系，把家乡的许多事都托给他来办理，并顺便了解韶山的乡情社情。

其实，毛宇居和毛泽东之间的书信往来，并非起始于1949年冬。早在抗战时期，他们就相互写过信。

1938年5月10日，毛宇居给离乡十余年的毛泽东写信，告诉他老家的一些情况：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及其外婆周陈轩、舅父周颂年，已通过地下党组织安排回到韶山定居，但生活困苦；毛家亲戚谭季余想到延安；还询问他儿子毛远耀在延安的情况，等等。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正在延安运筹国共分作、共同抗日大计的毛泽东，自1927年最后一次离开韶山后，许久没有听到家乡的消息，接到毛宇居辗转寄来的信后，格外高兴。在百忙之中，他立即铺纸握笔，给堂兄写了一封言简意赅的回信。信中说：

宇居兄左右：

五月十日信收到。谭季余以不来为上。楚雄等已寄微款，尔后可略接济一点，请督其刻苦节省。周先生留居韶山甚好，应看成一家人，不分彼此。此复。即颂

时绥！

弟毛泽东

五月二十六日

远耀等在此甚好。

接到堂弟毛泽东的复信后，毛宇居喜出望外，他按照堂弟的嘱托，把毛楚雄和周家外婆等“看成一家人”，更加悉心地照顾他们，不仅担负起教育小楚雄的责任，还经常帮他家推谷、碾米、打柴、种菜，教给他生活和劳动的技能。

后来，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身系民族安危的毛泽东渐渐和老家通信少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他忙着运筹帷幄，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决战，就干脆中断了给他的“宇居大哥”写信。这样一来，他们之间一晃便又是十多年不通音讯了。所以，在建国以后的和平时期，他们似乎要弥补过去因战祸而造成的缺憾，自1949年11月通信之后，他们之间书来信往，从未间断。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在韶山的亲朋故旧，纷纷投书北京，既有反应乡间各种情况的，也有请求解决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对此，毛泽东有的自己直接处理，有的则通过写信委托毛宇居来协助解决。每逢遇到毛泽东交办的事情，毛宇居总是尽心尽意，实实在在地为堂弟分忧，替他帮助、照顾那些在革命斗争岁月里为党的事业作过贡献，而眼下还暂时处在贫困线上的父老乡亲。

1950年，毛泽东听毛宇居来信反映，他少年的私塾同窗和邻居邹普勋家境困难，便很快给毛宇居回了一信：

宇居兄：

迭接数函，极为感谢。乡间情形，尚望随时示知。邹普勋（亨二）如十分困难，病情又重时，如兄手中宽裕时，请酌为接济若干，容后由弟归还。另纸请交邹普勋为祷。即颂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

毛宇居收到信后，立即拿出自己的钱垫上，先解决了邹普勋的燃眉之急。

1952年，毛泽东有两封信给毛宇居，请他帮助处理了很多事。一封信这样写道：

宇居兄：

归去后来信均收到，甚慰。有复邹普勋一信，请代转支。接毛泽连的信，六婶病故，他自己又跌断了脚，不知实际情形如何，脚尚有诊好的希望否？他未提到要钱的话，不知他的生活尚过得去否？暇请查明见告。接张有成兄的信，乡里粮缺猪贱，不知好些否？风便望将乡情赐否？为了了解乡间情况，拟待秋收以后邀请李漱清、邹普勋二位来京一游，请你征求他们二人意见告我为盼！

顺致敬意！

毛泽东

七月十一日

另一封信是寄钱给堂弟毛泽连、毛泽荣，请毛宇居转交。钱是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一万元相当新币的一元。毛泽东写道：宇居兄：

李邹二位来京，收到你的信，并承佳脱，甚为感谢。

毛泽连来信叫苦，母尚未葬，脚又未好，兹寄人民币三百万元（当时流通的人民币——引者注），以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请告他不要来京，可到长沙湘雅医院诊治，如湘雅诊不好，北京也就诊不好了。

另寄二百万元给泽荣（逊五）助其家用。他有信来，我尚未复，请转告他，不另写信了。

以上均请费神转致为荷！顺问

康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日

这些钱均是我自己的稿费，请告他们节用。

毛宇居一腔热情，从韶山到北京，千里迢迢，频传信笺，为毛泽东处理了许多家乡亲戚故旧的琐碎事务，使毛泽东少分散精力，更多地为国事操劳，对这样一位师长，毛泽东是感激不尽的。

20 三次进京

通信以寄托对故乡的山水和故乡的人，特别是对昔日老师的那种眷恋之情，这毕竟是间接的，是无法满足一位年已五十余岁、离乡二十多载的老人的感情需要的。1950年5月，他的长子毛岸英要回湖南办事，他特地叮嘱儿子去看望乡亲，去看望毛宇居这位岸英的堂伯和师伯。后来，干脆采取另一种办法——把韶山的亲友、老农民自卫军和儿时的老师们接到北京去欢叙，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连、表弟李柯、表侄贺凤生等几个韶山乡亲的北京之行，也有了毛宇居的“三次进京”。

第一次，是1950年9月。是由毛泽东派人直接送信到毛宇居家，让他进京的。兄弟二人阔别几十年后，相见十分亲切，毛泽东握着毛宇居的手，带着乡音欢迎说：“来客哒，来客哒，快请坐！”毛泽东还设家宴招待堂兄，宴席破例办得很丰盛，既有“京都大菜”，还有几道家乡风味的便菜，如豆腐，鸡蛋，辣椒豆鼓，肉片汤等。席间，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家乡的情况，言语之中流露出游子对故乡和故人的深切向往与怀念。毛泽东还将儿子岸英、女儿李敏、李纳几兄妹叫到跟前，向毛宇居一一作了介绍，并对他们说：“这是从韶山来的，是你们的伯父。”这次，毛泽东还安排毛宇居参加了国庆一周年的观礼和宴会，陪他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又派员陪同他乘飞机鸟瞰了古长城。因毛宇居是第一次从南方到北方，毛泽东怕他不适应北京的气候，特地为他买了皮大衣、皮鞋等，看他牙齿不好，又为他全部换了假牙。毛泽东将自己对老师加堂兄的那一片感激之情，全部凝聚在对毛宇居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之中……

1952年冬，毛宇居第二次到北京。当时，韶山小学要扩建，他受家乡委托，专程进京找毛泽东，要这位深受国人爱戴的堂弟给学校“御书”校名。这一次，毛宇居给堂弟带了几样湘潭土特产，有湖南的红辣椒、酱油和三湘人爱吃的槟榔。毛泽东一见槟榔，格外高兴，他拿起一枚槟榔就吃，保健医生马上制止。毛泽东笑着说：“过去呷了几十年，从没检验过，没得关系，没得关系！”他的湖南“土话”，逗得众人哈哈大笑。

接着，毛宇居向毛泽东报告了家乡兴办学校、发展民办教育的事。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他说：“这好，现在需要人才，教育就要发展。你是教书出身的，要多出力，还要教育人家多出力。”当提到写校名时，毛泽东问：“写什么名字好？”毛宇居如实回答，“我们只是办小学，就写韶山小学吧。”毛泽东想了想说：“为什么硬要叫小学呢？将来学校可以发展，可以办中学、大学嘛！还是叫韶山学校好，这样，一次不就写全了？”毛宇居听了这话，深感毛泽东站得高、看得远，连连称赞：“好，好！”随即，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了几张“韶山学校”校名，供堂兄选择。

这次到京，毛宇居还多次到毛泽东家吃饭、叙谈。有一次吃完饭，毛泽东兴致勃勃他说：“今晚我们回韶山，看看你自己吧！”毛宇居一时不明白他的意思，愣住了。毛泽东也不细说，他和堂兄手牵手来到放映室，一起看了一场电影，片名是《解放了的中国》。这部电影是在苏联帮助下，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彩色纪录片，该片的部分镜头是在韶山拍的外景，多处有毛宇居的镜头。看完电影，毛宇居才明白堂弟毛泽东刚才那风趣的话语的弦外之意。

第三次是1958年8月。当时湘潭大学正在筹办当中，毛宇居受湘潭县委之托，又一次赴京请毛泽东题写校名。抵京后，他开始住在前门的惠中宾馆。毛泽东知道后，即派人接他到档次较高的和平宾馆宿食。此间，毛宇居详细

向毛泽东汇报了湘潭大学的筹备情况和来意，毛泽东询问了办学过程中的许多具体事项后，说：“近年来许多人请我写字，我都未写，我的字写得并不好。我小时候读书的东山学校，几次来信要我写校牌，我也未写，假如给你们写了，他们不会有意见吗？”毛宇居说：“这个问题好办，你写两张。东山学校那一张我替你送去，两县人民不就都没有意见了吗？”毛泽东笑了笑，就答应了。过了几天，毛泽东的秘书将他亲笔题写的两纸校名及一封便函送到和平宾馆，交毛宇居带回。信函云：

宇居兄：

遵嘱写了湘潭大学校名两纸，请转交选用为盼，另致东山学校一纸，补烦转致。

毛泽东

九月十日

就这样，毛宇居利用上北京晋见毛泽东的机会，给他带去“下情”，供最高领导机构决策参考。与此同时，毛宇居还尽他这位“教育界老人”的本分，为家乡兴学办校、发展教育事业尽职尽责。

21 师生相聚在故园

1959年6月25日下午，三辆深蓝色的小轿车自长沙经湘潭直驶韶山冲。汽车上载着韶山人民的儿子毛泽东和陪同前来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及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一行。

汽车进韶山冲，过韶河上迎宾桥，徐徐驶进松竹掩映，环境幽雅的松山招待所一号寓所。

“毛主席回韶山了！”“毛泽东回来了！”“毛润之回来了！”喜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韶山冲，年轻人奔走相告，老人们笑逐颜开，一向沉寂的韶山冲沸腾了！激动、欢呼、热泪……离别三十二年的亲人，今日回到母亲的怀抱，成了韶山人从未有过的盛大节日。

毛泽东走进“松山一号”后，对韶山派出所所长胡兆祥、韶山招待所所长赵伯秋说：“你们去把这里的山神土地找来。”接着又补充道：“把我大哥也接来！”

毛泽东说的“山神、土地”，指的是韶山公社、大队的负责人，他称之为“大哥”的，就是他的堂兄和少年时代的塾师毛宇居。

一会儿，公社书记毛继生匆匆赶到“松山一号”，只见毛泽东正坐在房子里的藤椅上休息。毛继生走上去，喊了声：“主席”。毛泽东站起同他握手，并打量他。毛继生问道：“你还认得我吗？我1954年到过你家里，在北戴河住了三天。”毛泽东定睛一看，笑道：“嗨，山神爷来了！你看，我连叔老子都认不得了！”论起辈派来，毛继生属貽宇辈，比毛泽东还大一辈。1954年6月，他曾代表湘潭县供销社到北京参加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次代表大会，特地去北戴河看望了毛泽东，并邀请他回老家看看。此时，毛泽东谦恭的话语，消除了毛继生心头的拘谨，他对毛泽东说：“那年，你说想回韶山看看，如今，你真的回来了！”说着，他把随后赶来的韶山大队党总支书记毛华松等人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与大家握过手之后说：“你们都是‘当权派呀’！……我离开韶山几十年了，要请你们父老乡亲吃餐便饭。”他一边扳着指头，一边说：“一是我的戚族——老表、堂兄弟；二是韶山冲的烈属、军属；三是老地下党员；四是农民协会老自卫队员。”毛泽东首先提到的是他的堂兄和老师毛宇居。

就在这时，毛宇居被人接到“松山一号”来了。毛泽东听说后，连忙从房内走出来，迎接他的这位年逾七十的“大哥”，接着便出现本章开头那兄弟相见、热情问候的一幕。也就是从这一刻起，毛宇居被毛泽东留住韶山招待所，同他这位当主席的堂弟和昔日的学生一起，度过了他终身难得的三天幸福时光，尽情叙说旧时的兄弟与师生情谊。

毛泽东回韶山的第二天，一清早便来到土地冲楠竹，拜谒了父母的合葬墓，献上了一束青翠的松枝，以表达他那一片深厚的赤子之情。然后，他走访了几户乡亲，又看了谢家屋场的韶山“大食堂”，并接见了因“大食堂”伙食吃不饱而前来告“御状”的青年农民邹长卫，倾听了这位过去的蒙师邹春培的孙子和其他群众对办大食堂的意见和呼声。接着，他来到上屋场旧居，久久伫立在父母的遗像前，深情他说：“母亲，你的儿子回来了！”最后，毛泽东来到韶山学校，少年队员给他戴上鲜艳的红领巾，他高兴他说：“你们看，我现在年轻多了。”

中午，开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在松山一号就餐，他特地让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毛宇居请到一块吃。席间，他一边吃饭，一边吩咐有关同志去把未到

的亲属、老师、革命老人接来，其中三次提到毛宇居的胞弟毛碧珠。一会，见他未到便问：“碧珠怎么没有来？”韶山大队书记毛华松说：“碧珠划了富农。”毛泽东脸上变得严肃起来：“富农又怎样？他是我的堂弟，他还能害我？一定要把他找来？”

俗话说，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毛泽东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生身之地，就仿佛安泰贴近了大地母亲的怀抱，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过滤故乡泥土的清香；他的每一根神经，都被温馨的花木气息浸润着，全心身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

午饭后，毛泽东只在硬板床上小憩了一会，便对“山神”毛继生说：“今天想到外面洗个澡，顺便看看乡亲们。”二时十分，他离开寓所，和毛宇居、毛继生及随行人员乘车来到毛氏宗祠。从邮电局一直到毛震公祠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坪里、山上、路边，被欢迎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盛夏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人满头大汗，可人们似乎浑然不觉，千万双眼睛直盯着徐徐开动着的车队。当身着白色衬衣的毛泽东，从“吉姆”轿车里轻捷地走出来时，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精神抖擞，满面红光，向久违了的韶山父老乡亲们频频招手致意，高声说：“乡亲们好！同志们好！”并和近前的群众一一握手。

毛氏宗祠，是毛泽东创办的农民夜校旧址之一，他和夫人杨开慧曾在这里对农民群众进行过文化知识和革命思想教育。毛泽东来到门口，对身边的毛宇居和毛继生说：“到里面去看看。”毛继生说：“没得看头，面里精光的，主位牌子都烧了。”毛泽东一边往祠堂里走一边说：“管他三七二十一，鞠他三个躬再说。”进到屋里，对着过去放祖宗牌位的地方鞠了几躬。毛宇居和毛继生见状，也陪着他向毛氏祖先恭恭敬敬地鞠躬行礼。

离开毛氏宗祠，来到毛震公祠。这里是毛泽东同志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之一。当年，毛泽东在这里的群众集会上讲话，特别赞扬韶山妇女进祠堂吃饭坐首席的革命行动。走进毛震公祠，毛继生向毛泽东发问：“主席，您讲过‘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是不是在这里讲的？”毛泽东说：“那还是1927年的事，大概是在这里讲的吧。”他看了看身旁的毛宇居。忽然回忆起往事，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欢迎我。”毛宇居诧异地问道：“主席，你还记得？”毛泽东笑着说：“怎么不记得呢？你当时还在欢迎会上致辞呢！”“是的。”毛宇居抚着银须琅琅背诵起来：“毛君泽东，少年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至此，大家欢迎……”毛泽东听着，爽朗地笑了起来，他

转身对陪同他的罗瑞卿介绍说：“我1927年3月回韶山，他们曾在这里欢迎我作报告。”稍顷，他喃喃他说道：“啊，三十二年了……”眼前仿佛浮现出当年那个如火如荼的岁月——

1926年底，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主任的毛泽东，为了回击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和诬蔑，把农民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特向中央提出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请求。12月17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适逢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工人代表大会正在长沙筹备召开。20日出版的《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就发出欢迎通告：

“毛先生泽东，奔走革命，卓著功勋。对于农民运动，尤为注重。去岁回湘养病，曾于湘潭韶山一带从事农民运动。湘省之有农运，除岳北农工会外，实以此为最早……此次革命军势力北展，先生为发展全国农运奠定革命

基础起见，遂于前月离粤赴长江一带考察农运情形。农民代表大会开幕时，曾电请先生回湘指导一切。现已抵湘，农大会定于本日午后二时在幻灯场开会欢迎。”

毛泽东参加了湖南农民代表大会，并于1927年元月4日至2月5日，实地考察了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运。毛泽东考察农运的第一站是湘潭县，湘潭的重点又是他的家乡韶山。

元月4日晨，毛泽东身穿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持雨伞，背着包裹，在湖南省特派员毛福轩的陪同下，自省城西去。途经湘潭县第一区农协所在地银田镇白庙和韶山特别区农协所在地清溪寺时，毛泽东对农协负责人作了重要讲话。7日早晨，他又风尘仆仆直奔韶山冲。

得知“毛委员”要来，韶山冲像一锅开水，沸腾起来。一下子汇集了几百人的队伍，敲锣打鼓走出五六里之外去迎接。第一、二乡农协在韶山特别区第一乡农协所在地毛震公祠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会。乡亲们还在毛震公祠摆下了三十多桌酒席，为毛委员设宴洗尘。尽管酒杯菜碗里盛的不是什么美味佳肴，但一碗碗土产蔬菜，却咸辣合口，情纯意重，一坛坛陈年老酒，清香醇厚，醉人心田。

席间，毛泽东发现今天进祠堂的妇女很多，其中就有弟媳王淑兰，便提议说：“今天喝酒，要让妇女坐首席。”王淑兰代表妇女辞让道：“我们妇女是搭帮大哥才翻了身，今天要请大哥坐首席。”毛泽东热情地解释说：“过去妇女受的压迫最深，除了跟男人们一样受政权、族权、神权的压迫外，还多一层夫权压迫的苦楚。过去就不让妇女进祠堂吃酒，今日妇女解放了，应该请你们坐首席才是。”此后，毛泽东尊重和关心妇女，让妇女坐首席的故事传遍三湘四水。

毛泽东在毛震公祠吃过午饭，韶山特别区第三、四乡又在毛震公祠举行了欢迎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忱谢了乡亲们的一片盛情，并用风趣而通俗的语言作了长篇讲话。

毛泽东说：“过去遇上天灾人祸，有人就要到仙顶灵山上拜菩萨。我前年回韶山，有人诉说自己命苦，八字坏。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坟山贯气。刚过不长的光景，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就一齐倒了台，难道现在大家都走好运，都坟山贯气了吗？而地主阶级突然交了坏运，坟山突然泄气了吗？土豪劣绅讽刺说：‘巧得很哪，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上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的八字突然都好了！坟山也都忽然贯气了？！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协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很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协会？”

毛泽东这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没有人回答他最后提出的问题，因为答案是明摆着的。

毛泽东接着说：“世界是变化的，过去只有土车子，人靠步行；现在有了汽车，轮船，清早从湘乡到湘潭买肉，还能够赶回湘乡吃早饭。”他由浅入深道：“几个月前，土豪劣绅还在作威作福；几个月后，农民运动搞得热火朝天，把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全部扫地了。现在，‘农民协会万岁’、‘农民万岁’的口号喊得非常响亮。乡里几个月

来的形势对比不是起了很大的变化吗？可有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你们怎么看？”

“那是放屁！农民运动好得很！”听讲演的贫苦乡亲们中，马上有人站起来说道。

“对，是好得很！我同意你们的结论。”接着，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韶山一带的农民运动，称他们所做的是“明明白白的好事”，搞革命就需要有这样的劲头。随即他又指出：“农民协会硬要放手发动群众。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反革命反对也不要怕，土豪劣绅终究非打倒不可。全世界十五亿人口，有十二亿受压迫，力量大，我们只会赢不会输。但是革命是长期的，好比挖土，挖出几条蚯蚓算不了什么。现在革命刚开始，我们才打倒了几个土豪劣绅，这好比指甲缝里的泥土，还只挑出一点点，要彻底消灭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还得攒劲干！一根筷子容易折断，一把筷子就难折断，我们要团结起来。团结才有力量！”

毛泽东的这番话，说到了乡亲们的心坎里，他们感到心里亮堂多了。

毛泽东此次在韶山调查、访问、作报告，前后历时五天。元月十日，他经外祖家唐家前往湘乡。临行前，乡亲们把他送了一程又一程。堂兄毛宇居拉着他的手问：“兄弟，此次一别，也不知何时相见？”毛泽东慷慨激昂他说：“三十年后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主席……”一声呼唤，把毛泽东从深沉的回忆里拉回到现实之中。按日程安排，下午要到韶山水库游泳，晚上还要请乡亲们吃饭，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毛泽东便快步跨出毛震公祠，朝韶山水库方向走去。从毛震公祠到韶山水库有一华里多路，路很窄，不能行车，只好步行。一路上，毛泽东搀扶着七十多岁的毛宇居，漫步在韶山冲的山间小道上。摄影师侯波抢拍下了这动人场面，一直珍藏至今。

毛泽东一行经过邹家冲。放眼望去，冲里层层梯田直插山中，那一垄垄土壤肥沃的稻田里，水稻快黄熟了，社员们正在挖田沟。毛泽东问身边的毛宇居：“能打多少谷一亩？”毛宇居答：“可打四百来斤一亩。”毛泽东皱了一下眉：“那么要打七百斤毛谷啊！”又问：“过去能打多少？”“六百斤毛谷，如今还增产了一点。”“累了一年，增了一点，为什么不可以多放一点肥呀？”人们都沉默了。来到竹山坝田垌里，毛泽东察看了稻田密植情况后，认为秧栽得过密。他提着一蔸秧说：“你们看，这个禾，简单是要直上青云哟。”又对公社书记毛继生等人说：“干部是主张越密越好的，青年是听梆子响的，老年是反对密植的，我是主张合理密植的。要增产，就要搞合理密植。你们干部与老农、青年来个三结合，共同研究，做到合理密植，提高产量。”说完，他面带希冀地望着大家。陪同毛泽东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表示：“主席，我们一定按您讲的去做。”

跟在毛泽东身边的毛宇居，不认识这位省委书记，便问：“这位首长是谁？”毛泽东笑道：“他是一条船，叫小舟，周小舟，是你们的省委书记，你还不认识？”周小舟连忙向毛宇居点头，又走过去同他握手。毛泽东对周小舟说：“你们省委书记到韶山来得太少了。这位是我的宇居大哥，他是县人民代表，省文史馆馆员，你们还不认识呀？”周小舟歉意地点了点头。

韶山水库，位于滴水洞附近，这里三面环山，山高坡陡，林木茂密，风景宜人。1958年韶山人民在这里修建了水库，蓄水量十五万立方米，荫田四百余亩。如今，高山上出平湖，方圆数里波光鳞鳞，水库里水清如镜，山

影倒垂。

这次回乡，毛泽东早作好了游泳的准备。两天前，即6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长沙畅游了湘江，并游览了水陆洲头。今天，他要来游韶山水库，罗瑞卿早就派人作了准备：水质已经化验，水里的石头和荆棘早被清除。此时，有一批会游泳的战士已先下水，作水情试探，并摸索开道。一会，毛泽东走上大堤，他环视青山绿水和坝下起伏的稻浪，满意地笑了。水库周围围满了前来观看的人群，他们见六十六岁的毛泽东步伐稳健地登上大坝，高兴地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向人们招手致意，一边来到临时搭起的更衣棚内，换上白色游泳短裤，赤着上身，坐到椅子上喝了一杯茶，便下到水里，罗瑞卿和十来个水手也下了水。

毛泽东在水里进退自如，时而仰卧水面，时而端坐水中，时而击水激进，时而潜水徐行，表演了“立正”、“稍息”、“坐凳子”、“睡觉”等动作。他精湛的游技，博得了岸上群众的一片叫好声，掌声此起彼伏。这时，毛泽东见留着长白胡须的毛宇居也在岸上为自己喝彩助兴，忙喊道：“宇居大哥，你也来游泳吧！”宇居老人答：“主席，我快八十了，不能游了。”毛泽东说：“你多游几次，起码还能多活二十年！”他幽默的话语，又引来一片笑的浪花。

毛泽东游了一个多钟头，直到太阳偏西才上岸。离开韶山水库，毛泽东和来时一样，和毛宇居相互搀扶着，边走边谈。他神采奕奕，毫无倦意，谈兴甚浓。回到毛震公祠汽车停放处，太阳已经落到山背后去了，远处升起缕缕炊烟，正是一派“遍地英雄下夕烟”景象。

当晚八时许，毛泽东在松山招待所设宴招待各位父老乡亲。被邀请的宾客陆续赶来了。他们中有毛泽东的亲属、师友、烈属、老赤卫队员、老地下党员等等。毛泽东的堂兄毛宇居来了，毛泽东与他握手，招呼他挨自己坐下。毛新梅烈士的妻子沈妻华在孙子的搀扶下来了；毛福轩烈士的妻子贺菊英带着孙子来了；毛泽东外婆家的堂表弟文东仙来了；还有毛泽连、谭熙春、毛顺清……等许多乡亲也都来了。人们聚集松山，犹如家人团圆，热闹非常。餐厅里摆着十多张圆桌，桌上热气腾腾，摆着许多颇具家乡风味的佳肴，有扣肉、清蒸鱼、炒鸡、炒蛋、木耳汤等和各色的酒。

人到齐了。毛泽东从席位上站起来，端起酒杯对乡亲们说：“离开韶山几十年了，今天我泽东三伢子特请各位长辈、亲朋、革命老人就餐便饭，敬大家一杯酒。”说着又起身来到各席，逐桌敬酒：“我离开韶山三十多年了，敬大家一杯酒，大家一定要喝！”。席间，毛泽东与毛宇居、毛泽连等人在一桌，作陪的有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毛泽东一面招呼大家吃菜，一面举杯把盏，他端起酒杯走向堂兄兼儿时塾师毛宇居身边，白发飘逸的老人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连声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边扶老人坐下，边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还贴到宇居老人的耳边说起了悄悄话：“我过去是个调皮学生，还造过你的反哩。你还记得吗？”毛宇居笑着说，“记得记得，你也是个高材生，那时你很爱看杂书，我还故意给你点《左传》，你都能应付裕如哩！”他们之间有趣的对话，使得乡亲们发出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饭后有人提议要与毛泽东合影。毛泽东说：“我举双手赞成。离开家乡这么多年了，今日回来能和乡亲们合个影，也是一件美事。”工作人员立即在青松翠竹荫掩的灰砖平房前，摆开了一些木凳，毛泽东走上去，被乡亲们

拥在前排长凳的中央，毛宇居、贺菊英紧挨他左右两边坐着，其余的人挨近他们，或坐着，或站着。“喀嚓”一声，闪光灯亮了，摄影记者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个珍贵的镜头。

便宴后，毛泽东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走进了他的卧房，这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白天那沸腾的韶山冲变得格外宁静，欢乐的人们都进入了梦乡。可是，毛泽东丝毫没有睡意，他吸烟、喝茶，在卧房里来回踱步。他站到窗前，拉开红绒落地窗帘，打开窗户，让清凉的南风梳理两天来积攒起来的醉人的乡情和缕缕诗意。屋外，灯光闪烁；天空，繁星晶亮。韶河潺潺，蛙声点点，偶尔掺杂几声熟悉而又陌生的犬吠。赤子和诗人此刻仿佛听到了熟睡乡亲的梦呓，母子呢喃；听到了三十二年前农民赤卫队的震天怒吼，三十四年前农民夜校的朗朗书声；甚至还听到了半个多世纪前井湾里师塾那个聪明而颇皮的稚童和先生“造蛋”时发出的吃吃笑声……为了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他毛泽东整整三十二年没回韶山了。历史的长河，在他泛舟的这一程出现了澎湃的巨浪——如今，他的壮志已成大业，一个崭新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回来了，远方的游子终于回来了，回到了母亲的怀抱！这一切，怎不教他心潮激荡，思绪万千……毛泽东才思泉涌，情致酣畅，他铺开宣纸，饱蘸浓墨，笔走龙蛇，吟成了一首《七律·到韶山》：

1959年6月25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获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6月27日，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吃过中饭，乡亲们知道毛泽东下午就要走了，便络绎不绝赶到松山招待所，为自己的领袖和亲人送行。送行的队伍从松山招待所延伸到韶山公社机关，长达两华里。下午一点半钟，毛泽东从招待所出来，先和左边队伍里的人握手，从左队队首握到队尾，又从右队尾握到队首，握手时间长达两三小时，先后和三千多群众握过手。毛泽东一生创造了许许多多的“世界之最”，这次故园之行，他又创造了握手的世界之最！

毛泽东即将登车了，毛宇居伸出他那双颤抖着的手与堂弟握别时，已是老泪纵横、唏嘘不已：“主席——润之老弟，望多保重！”毛泽东双手紧握住自己的堂兄兼老师的手说：“宇居大哥，你也善自珍重！得便时我接你再到北京！”“主席，你有时间也回呀！你可要回呀——”

毛泽东终于上车了。车队徐徐穿过人群，渐渐远去了，远去了……

师生在故园相聚，又在故园离别了！从此以后，毛宇居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学生和堂弟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更无法亲赴毛泽东“再到北京”的约请了。五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9月29日，84岁高寿的毛宇居，终于带着无限的满足和还有那么一丝遗憾永远地去了。同时也将他与毛泽东的交往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

第五章 李漱清

——“过激派老师”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
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

——《颜氏家训》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南朝·范晔

22 从师却在辍学时

1936年，毛泽东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自己早年的学生生活时，曾以恳切的语气说过这样一席话：“……对我有影响的事，是本地小学来了一位‘激进’的教师。所谓‘激进’是因为他反对拜佛，想摆脱神佛，他呼吁人们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颇受注目，被人议论的人物，我敬慕他，同意他的观点。”

这个被毛泽东称为“过激派老师”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李漱清。

李漱清，又名李劫，1874年生，长毛泽东十九岁，家住韶山冲陈家桥（今属韶山市韶山乡韶北村），和毛泽东的家上屋场相距五六里路。清末投考湘潭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先后在湘潭县西二区上七都都校、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他是一个思想开明，充满爱国热情的进步知识分子。在乡间，他常给人们讲述外地见闻，劝说乡亲们不要求神拜佛，并大胆地提出了“弃庙兴学”的主张。也就是说，要把寺庙和宗祠的田、房产拿出来兴办学堂，让农家子弟都能进学校读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开发民智。而且，他要办的不是过去那种私塾，而是新型的“洋学堂”，在这种学堂里，学生不拜“孔圣人”，不读四书五经，学的是时兴的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新学。

李漱清提出了这些主张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责难，那些掌权的房户族长、封建豪绅们一致起来激烈反对他，都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连祖宗都不要了，多半是发了疯癫病。因而，李漱清的新观点、新主张，被他们斥之为异端邪说；他本人也成了乡人茶余饭后议论的话题。

其时，正值1907年，毛泽东已在学校度过了五年的学习时光。五年中，他所读的书多为儒家经典，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抗、叛逆性格，但这些经典也使他获益颇丰。随着所读的书不断增多，涉猎的知识面不断拓宽，这个昔日顽皮的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也变得日益浓烈了。正当他凭藉自己的天资，在书本中对宏观世界的宇宙奇迹和微观世界的人生奥妙，开始了初步探寻的时候，家庭情况正在发生着变化，这种变化几乎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轨迹。

如前所述，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为人精明强干，善于算计，加上全家人勤奋劳动，省吃俭用，手中聚积的财富日渐增多。到1903年前后，也就是毛泽东发蒙前后，他家在韶山冲里已经是个富裕户了。此后，毛贻昌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原锡堂”等店铺经常有商务往来。为了商品流通方便，曾自家印了取号“义顺堂”的纸票周转，也使用湘乡县大平街最大的商号“吉寿堂”的纸票。家业的兴旺发达，生意买卖的日益昌隆，使毛贻昌迫切感到需要一个好帮手，而这个帮手就在身边，他就是渐渐已长成大人的儿子毛泽东。毛贻昌认为儿子的书已经念得不少了，能识文断字，写个信、记个账呀什么的，再也不用求人，自己对他所希望的那个目标已经达到了。与其说再把白花花银洋往书的“无底洞”里丢，倒不如停学跟自己学种庄稼，跑买卖，挣现钱。于是，毛泽东按照父亲的意愿，离开了老师，离开了课堂。

当然，毛泽东的辍学，除了家庭的原因之外，也有着自身的原因。那个时候，韶山方圆数十里，只有几个“蒙馆”和“经馆”，所学的不过是“人之初，性本善”和“四书”、“五经”之类的东西，根本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望；而且这些学校规矩极严，除了孔孟的书外，其他“杂书”一概禁止阅

读，他感到在这样死气沉沉的学校里实在再难以呆下去。恰好父亲希望他回家帮忙种田，以便腾出手来去做生意，所以他就顺风扯旗，退学了。

人虽离开了学校，可毛泽东渴求知识的愿望丝毫未减，反倒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加强烈。特别是那超出未成年人负荷的体力劳动，有时压得他简直喘不过气来，更使他向往往日那悠闲、舒适的课堂。毛泽东渴望读书，但义不愿再回到那陈旧的私塾学堂。这期间，他曾暗中在韶山冲一带打听名师，却没有访到。正在彷徨观望之时，李漱清学成归来了。他从大人们对于李漱清的纷纷议论中，听出李先生是一位很特别、很有个性的文化人。虽然李先生提出的办学堂、破除迷信、传播文化科学知识等主张，毛泽东说不上对不对，但关键是这些见解很独特、很新鲜，是他生平头一次听说过的，这对于对新事物有着天然敏感的他来说，无疑是颇具吸引力的。因而，毛泽东格外敬佩李漱清的学识人品，赞成李先生的言行，心中窃喜李漱清正是他所要求的老师。

于是，有一天，毛泽东在干完父亲分派的农活以后，专程来到李家屋场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来了。

李漱清多年在外读书，此次初回家乡，对毛泽东还不熟悉，但他却被这位少年走五六里山路登门求教的诚心所感动。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并询问了他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当他听到毛泽东因不满旧私塾的教学方法及因父亲不让继续读书而被迫辍学时，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动。李漱清想：透过这个十四五岁的少年那聪慧的资质和不凡的谈吐，他读书的天分是很高的。他已经读了五年私塾，对于经书，有了比较强的理解能力了，如果有一所好学校，让他继续深造，完全可以造就成一个杰出人才。真可惜呀，老师是这样的粗暴专横，父亲是这样的固执，韶山冲又是这样的闭塞，即使是盖世英才，也要无声无息地在这山沟里被埋没掉的。想到这里，李漱清深深为眼前这个农家孩子而惋惜，同时也为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而怨艾，不禁喟然长叹。毛泽东被李漱清那激动的情绪所感染，他着急地问：“李先生，你办的洋学堂怎么样了？我到你那个学堂里去读书行吗？”“只怕没有用！”李漱清摇摇头，苦笑着说，“地方上的大人先生们不让我开馆，我要是不讲孔夫子的书，只教维新派的文章，他们就会给我加上一个‘毁谤僧道，背叛孔孟，的罪名，不但我自己要吃官司，还会连累你们呢！”

听李漱清这样一讲，毛泽东深感进洋学堂读书的希望已经破灭，不由更加着急。李先生看到他这副求知若渴的样子，劝慰他说：“润芝，你不用急。从今往后，你有时间就到我这里来读书习文，我这里新书不少，你想看什么，就尽管挑！”听了李漱清的话，毛泽东欣喜万分，连忙谢过李先生，并恭恭敬敬地向李漱清鞠了一躬，行了拜师之礼。从此，李漱清便收下了毛泽东这个半耕半读的特殊学生，陈家桥李家屋场成了毛泽东的课堂，他隔三差五地来这里借书、读书，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李漱清讲述读书做人的道理和那些维新救国的有志之士的事迹。在那段长达两年多的时光里，李漱清为教育毛泽东这位学生，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新书，灌输新鲜知识，辅导他阅读诗书，帮助他修改作文……那时，每当傍晚时分，在李家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师生二人兴致勃勃地交谈读书心得、切磋学术的身影。天长日久，他们之间逐渐形成了比一般师生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对特殊师生之间为历史留下的那诲人不倦、学而不厌的典型场面，韶山韶水大概也会铭记不忘的！

23 半耕半读

自从结识了李漱清老师之后，毛泽东就不再急于找学校读书了，而是采取半耕半读的形式，忙里偷闲地挤时间去刻苦学习。那时，毛泽东家里田地多、人手少，他的父亲毛贻昌一向精打细算，为了少雇一个工，硬是让年纪尚小的泽东和泽民跟着他干农活、种阳春。白天，毛泽东要挑粪、犁田、播种或插秧，还要砍柴、舂米、喂猪和放牛……似乎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则要替父亲记帐，跟着父亲学打算盘，难得有片刻的空闲。从李漱清那里借来的一摞书，也没有时间去看。

李漱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虽然很为毛泽东的学习而担忧，但鉴于学生的家庭现状，一时也拿不去什么好办法来帮他解决读书时间紧缺的问题，只能鼓励他克服眼前困难，见缝插针地挤时间抓学习。为了帮助毛泽东树立刻苦学习的精神，李漱清特地给他讲解了颜之推《颜氏家训》中的《勉学》篇，用古人读书治学的典型事例教育毛泽东勤奋学习。

李漱清借古人的话告诫学生：“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萤，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为勤笃。……”他进一步讲解道：自古圣明的君主，尚且要勤奋学习，更何况一般的人呢？……古时勤学习的人，有握锥投斧的，有照雪聚萤的，有边种地边看书的，有边放牧边编蒲草写字的，都非常勤奋刻苦。梁朝时，彭城人刘绮，他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孤家贫，买不起灯烛，便经常买来获草折成一尺长短，点燃后晚上读书。孝元帝初出会稽时，精心挑选官吏，刘绮凭着才能做了国常侍兼记室，受到朝廷封赠。义阳人朱詹，其家世代居住在江陵，后出扬都。他好学而家贫没有条件，连续几日不烧火做饭，经常吞食纸来填肚子，天冷无毡被，只好抱着狗睡以取暖。狗饥饿腹空，起来寻找食物，呼之不至，哀伤的声音惊动了邻里。朱詹面临这样的困境，仍不放弃学习。后来，他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得到孝元帝的礼遇。他这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也算是一个勤学的人。东莞人臧逢世，二十多岁，想读班固的《汉书》，苦于借来的书不能长时间用，于是，找姐夫刘缓，乞求其门客刺书于翰纸末，手抄了一本。军府佩服他的志尚，他终以精通《汉书》而闻名于世……李漱清希望毛泽东以古时有志之士为榜样，勤学博习，修身利行，学成一艺，得以自资。

受到李漱清的教育和启发后，毛泽东果然坚定了学习的决心，采取了多种方法用功读书。

白天没有时间看书学习，他就等父母睡觉后点着桐油、样油灯夜读。对于他这种耗油费神的夜读——读的又不是他父亲所希望的经书，自然遭到父亲的反对；母亲怕深夜读书有伤身体，出于疼爱儿子也加以反对。毛泽东就用蓝布被单遮住窗户，使父母亲看不见灯光。有时他干脆躲到存放杂物的小阁楼上去。夏夜，蚊虫叮咬，他就在床头放一条凳子，将头从蚊帐里伸出来，趴在床头，读得不亦乐乎。可是，他的“秘密”还是被半夜起床给猪牛添食料的父亲发现了。父亲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他虽然看不见灯光，却听出了翻书页的声响，便悄悄地走近窗户，揭开那块遮挡灯光的蓝布印花被单，于是，房里的一切便“曝光”了。爆仗脾气的毛贻昌隔窗对儿子斥责道：“石三，你一夜熬掉我一盏桐油，一个月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搞下去，一份家产怕是要败在你的手里！”好心的母亲听到吼声，披衣起床给儿子打圆场，这才解了他的围。

夜里不能看书，毛泽东就天天把书带到田间地头，得空便躲到一座古坟后的毛栗树下面，读得心醉神迷。毛贻昌开始发现儿子经常溜号，不由得“盯梢”起来。一天他终于当场“捉”住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津津有味地看书，两只空粪箕齐齐摆摆地放在他身边。父亲不由得火冒三丈，两人便争吵起来。这时，恰好毛泽东的母亲来喊他们父子俩回家吃午饭，才算平息了这场风波。下午，毛贻昌仍然分派毛泽东去挑粪，还规定他必须完成十五担。太阳落山前，毛泽东又不见了。这一次，毛贻昌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他，可是毛泽东看书正看得着了迷，根本没注意到父亲的到来。这下，惹发了毛贻昌的火爆脾气，他几步冲上前来，一把枪过了儿子手上的那本线装书。厉声吼道：“你真的鬼迷心窍，中了这破书的魔了？我要你一门心思扑在田里，你倒好，躲在这里看这些闲书。”说着，他又把那本线装书的封面看了一下，原来是一本《西游记》。这个他懂得，这是一本讲孙猴子保唐三藏去西天取经的书，这孙猴子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精怪。儿子小小年纪看这样的书，不学坏了才怪哩。想到这里，他越发生气了。他顺手抓起毛泽东挑粪的扁担，就要对儿子动武。毛泽东一看父亲要打他，赶紧一双大手拉住扁担的一头，一边向父亲解释道：“父亲，我会规规矩矩干活的，但我也要读书。我保证先做事后看书。你要我挑的十五担肥我已经完成了，要是不信，你先到田里去数数，如果不够数，要打要罚都由你。”听了儿子的话，毛贻昌觉得颇在道理，他放眼往平整的水田一望，心里默默数了数，足足十五担。毛贻昌虽然平日对儿子态度比较粗暴，但毕竟也是通情达理的人，也有一颗爱子之心，他想到儿子为了省出时间读书，大半个下午挑了十五担粪，的确够辛苦的。所以，他没有再责备儿子，只是说了声：“天不早了，还不快回家去。”说完，率先走了……

这件事情过后，父亲再没有干涉他读书的事情了。毛泽东就按照自己的计划办事：白天，发狠做田里功夫；傍晚，帮助父亲结算一天的来往帐目。农活做得漂亮，帐目算得清楚，不给父亲留下一点责难和挑剔的把柄。遇到雨天或农闲空余时间，毛泽东就到李漱清的家里，向李先生请教学问，听他给自己讲课，接受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上完课后，毛泽东又把李先生借给他的书籍带到家里。多少个夜晚，他在上屋场那间土屋里，点亮那盏古老的竹络小油灯，发奋攻读。

这段时间，毛泽东完全不读“四书”“五经”了，中国的古典小说，成了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凡是李老师这里有的小说，他都借来了；李老师这里没有的，由他开出书单，毛泽东就到相隔十多里远的湘乡县唐家坨外婆家去借。他看过的有：《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说岳全传》、《隋唐演义》、《封神演义》……这些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他都爱不释手，有的书看过还不只一遍。后来，毛泽东又在李漱清的指导下，开始看一些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救国图存方面的书，如《盛世危言》、《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等，并深深为书中的内容所吸引。

24 令先生惊讶的读书心得

寒来暑往。不知不觉中，毛泽东辍学务农快有两年了，通过李漱清老师的悉心指导和他见缝插针的读书，他的学业不仅没有荒废，相反还有了很大的进步。渐渐地，他的思想出现某种升华……

有一天傍晚，毛泽东按父亲的吩咐薅完秧后，就跑到李家场屋去找李漱清。他最近读完了好几本书，很有些“心得”，要向老师说说。

毛泽东来到李家场屋，李漱清正躺在晒谷场上的一张竹睡椅上，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在聚精会神地看书。看到毛泽东来了，就急忙放下书本，站起来笑咪咪地同他打招呼。

毛泽东坐下以后，开门见山地对李漱清说：“李先生，你最近让我看的书我都读完了，有几个问题我弄不明白，想请教先生您。”

“润之，你有什么问题呀，请尽管讲吧！”李漱清知道毛泽东有好学多问的习惯，就含笑鼓励他讲下去。

毛泽东向李漱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李先生，我看了这些小说和故事书，所有的人物为什么都是文官、武将、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夫做主人公呢？”

说老实话，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连老师也未考虑过，所以李漱清一时答不上来。毛泽东似乎是早有主见，他继续说道：“对这个问题我以往搞不清楚，现在开始明白了。我发现，书中颂扬的这些文官、武将和书生们，他们是百姓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自然有佃户交租子养活他们。而那些写书的人，也多半是出身富贵人家，他们没有种过田，没有受过人生艰苦，他们怎么会去写种田人的书呢？”

李漱清没想到这个“小”学生竟然提出这样大的问题，而且有了这样深的见解，他不禁暗暗感到几分惊讶。少许，他点头赞同道：“是的，你这个看法很有道理！”

受到老师的鼓励，毛泽东谈锋更健：“我希望，在将来的有一天，能够出现专门写农夫和工匠的书。我甚至想，假如我长大以后能够写书的话，我一定要写农民的书，写受苦人的书，一定要把种田的、打铁的、挖煤的，都写成英雄豪杰。”他在说这一番话的时候，眉宇间充满着一股难以抑制的自信与豪迈之气。

若干年后，毛泽东曾对人说起过他当时的心境：阅读“闲书”和“杂书”时的知识发现，在他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为广大劳动群众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最初的朴素思想基础。正是因为有这个思想基础，日后的毛泽东终于履行了当年向他的老师李漱清先生许下的诺言——“写一本农民的书”，这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是一部亘古未有的宏篇巨著。这本书，便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大书，在这部书里，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觉悟了、站起来了，他们拿起了锄和镐，挖掘了埋掉旧世界的坟墓，建造了一座崭新的社会主义大厦！自然，这些都是后话。

毛泽东继续向李漱清先生谈起他的读书感想：历代遗留下来的这些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他有的地方的确非常喜欢，然而有的地方又让人看了很是扫兴，还有的甚至叫人很生气。他很喜欢李逵、武松、鲁智深这些不畏强暴的英雄好汉，十分痛恨高俅、童贯、蔡京这些欺压百姓的奸臣。他认为牛皋比岳飞有气魄，岳飞比不上他。岳飞明明知道秦桧要加害于他，却偏要跑到风波亭去送死；牛皋的胆子大得多，他敢于拉起人马，上

太行山落草，造皇帝老子的反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不过，总的看来小说还是比经书好。就拿这些年来我读书的情形来说吧，我过去读了几年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不仅没有读懂，反倒越读越糊涂了。你看《学而》上是怎么写的？子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孔夫子是一位大圣人，居然也说出这等的蠢话来！贫困的穷苦人怎么能够快活？地主老财又怎么会对穷人讲理施礼呢？读这样的书人怎么会聪明啊？相反，那些小说则好看好懂得多，书中所写的人和事让人过目不忘，它的影响比那些经书可大多了哩！可是，我始终弄不明白，学堂里为什么不准人看小说呢？为什么要把它叫做‘杂书’呢？”说完，他不解地望着老师，似乎在等待着答案。

李漱清呷了一口茶，说：“你问得好！这也是我们大清帝国的怪现象。在长沙，我听维新派的先生们说过，西洋人是十分推崇小说的，俄国的托尔斯泰，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伏尔泰、巴尔扎克和雨果，他们都是很有名气，很受人尊敬的大学问家。只有我们古老的大清王朝，只晓得崇拜二千多年来老而又老的孔夫子，只晓得抱残守缺，容不下一点新的东西。那些大人先生把小说看成杂书，写小说的人被斥之为下九流，至于那些描写造反和离经叛道的新书，则更是被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禁之而后快……”

“反叛那些恶人和坏人，有什么不好的呢？这样的书多一些，又有什么关系呢？大清王朝还有公道吗？”毛泽东年轻气盛，直言快语地把心中的话吐了出来。

李漱清听了毛泽东这番话，觉得也有同感，心里极为赞成。不过，他没有直露地表示自己的态度。他知道上述这些问题多少有些敏感，有些“犯忌”，而从毛泽东的谈话中已流露出愈来愈浓的反叛意识，所以 he 不想以激烈的言行去刺激他，因为他还很年轻，摆在他脚下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作为人师再不能去增加他的偏颇与冲动，这样于他今后是不利的。

想到这里，李漱清感到有必要提醒毛泽东注意——在性格中应该溶入韧性，防止锋芒外露，真正做到怒不变容，喜不失节。于是，他起身来到屋内用毛笔书写了一副条幅，送给了自己的学生。毛泽东接过一看，条幅上写道：

硬就硬，莫激烈；

软就软，莫投降。

毛泽东手捧条幅，品味着、沉吟着，他仿佛要透过这通俗的字句悟出深邃的人生哲理。渐渐地，他感到手中这件馈赠物的份量重了，它不是一张纸，分明是一份沉甸甸的丰厚礼品！

是的，这是一份厚礼，它让毛泽东终生受用。“硬就硬，莫激烈；软就软，莫投降”，毛泽东后来提倡的“既要有松柏的原则性，又要有杨柳的灵活性”，不是与之一脉相承的吗？

毛泽东在谈了自己读小说的感想后，接着又同李漱清讲起他最近借阅两本新书的经过和读书体会来。

毛泽东告诉李漱清先生，他前几天去了一趟唐家坨婆家，找八舅父借了两本新书，一本叫做《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本是《盛世危言》，他阅读之后很受教益。

《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呜呼！中国覆亡有日矣！”真叫人怵目惊心！这本小册子的作者，列举了大量的实

例，分析了世界列强的侵略野心和内政外交政策，叙述了印度、安南、朝鲜、缅甸亡国的经过和亡国以后的痛苦与屈辱。也写了大清帝国朝纲紊乱，官吏昏愤，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民生凋蔽等现状，提出了“亡国之祸，迫在眉睫”的警告。

毛泽东对着暗淡的桐油竹络灯，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激动得一整夜没有合眼。一种强烈的危机感袭上了他的心头，他为祖国的安危、民族的存亡，而感到深深的忧虑。从这一刻起，他第一次产生了政治意识，开始感觉到：救国，是每一个国人的天职！

《盛世危言》是一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作，是1893年出版的。说来也巧，它正好和毛泽东同岁，在读者中间它已流传十五六年了，可在十分闭塞的韶山冲，还是一本难得的新书呢！

毛泽东在李漱清这里得知有这么一本书，就翻山越岭至唐家坵外婆家，好不容易把它借来了。这本书的作者叫郑观应，广东省香山县人，是一个办理中外贸易的官商。他对于国内外的政治经济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对西方的科学技术，也作过一些考察。由于痛感满清王朝积弱不振和几十年丧权辱国，触景伤情，满怀忧虑，才积三十年精力写成这部书，提出了一整套改良主义的办法。他认为：中华古国的富强之道在于开矿山，筑铁路，繁商业，办报馆，兴教育，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这些观点，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分子维新变法的要求，在当时确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而现在，戊戌变法的失败早已宣告了改良主义思想的不可行性，在这辛亥革命的前夜，君主立宪的主张显然是落后很远了。不过，在闭塞的韶山冲，能看到这样一本触及时事、洋溢着爱国主义激情和改造中国社会设想的书，还真令人耳目一新，也叫少年毛泽东感动不已，他非常喜欢这本书，看了一遍又一遍。

“治乱之源，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力；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使物尽其流。……育才于学校，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炮、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毛泽东一边朗朗背诵着《盛世危言》的自序，一边由衷赞叹道：“这本书写得真好啊！中国要富强，只提倡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要从政治上进行改良。应设议会、制宪法、实行‘君民共主’；办报纸，开学堂，提高民众文化；开矿山，修铁路，发展工商企业。李先生，你看是这样吗？”

李漱清默默地听着，他从毛泽东那颇有见地的谈吐中感到：书本像只船，已载着毛泽东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生活海洋，他所关心的不再是小小的韶山冲，不再是一人一家的生存出路，而是整个国家的强盛和振兴。一个乡村少年能有此悟性实在难得！想到这里，李先生那黛黑而清瘦的脸庞，渐渐泛起了欣慰的光泽。当听到学生毛泽东似在小结自己的论述、又似在征询老师的意见时，李漱清进一步诱导道：“是啊！你说得很对。像我们这样的七尺男儿，一介书生，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努力探索富国强兵之道。但是，只有在学到更多的知识之后，才能真正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啊！润之，十五六岁的年纪，正是立志向上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外出求学深造，那就是最好的了。”

李漱清先生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毛泽东那颗奋进向上的心；像一团

火，燎起了毛泽东复学求知的欲望……

25 携手同行

告别李漱清先生后，毛泽东一回到家里，就找父亲谈继续读书的事。

可是，毛贻昌并不理解儿子渴望读书的心情，没有应允毛泽东的正当要求。李漱清听到这个消息后，亲自来到上屋场，做毛贻昌的说服工作。他问毛泽东的父亲：“顺生大哥，怎么不让润之继续读书呢？”毛顺生说：“李先生，我家人手少，石三伢子在家种田，只需请一个雇工就行了。”“顺生大哥，润之天分好，会读书，你自己苦一些，还是要让他进学堂呢！”后来，在李漱清、毛宇居及毛泽东的一些亲戚的劝说下，毛顺生终于让毛泽东在乌龟井、东茅塘又读了一年私塾，并于1910年进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以后又到省城长沙读书。

毛泽东和李漱清一起，度过了近两年半耕半读的时光。这一阶段，正是他面临失学、苦闷彷徨的时候，如果没有李先生的关心和教育，他的学业就很可能荒废，也许会像他的父辈和祖辈一样，做一个“好把式”的庄稼汉，或是一个生意人，最后终老山林，自行湮灭。因之，毛泽东始终感激李先生的知遇之恩，始终铭记着这位“过激派”老师对自己整个人生的重大影响。在日后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师生之间友谊笃深，堪称相敬相携的范例，并留下许多尊师爱生的佳话。

1911年至1921年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期间，每次回家乡韶山冲，总要专程去李家屋场，看望李漱清先生。

1925年2月，作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的毛泽东，从上海回韶山养病，领导农民运动。李漱清热情支持大儿子、季氏族校教员李耿侯，协助毛泽东等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民协会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反帝反封建宣传和平策、阻禁等斗争。李耿侯由杨开慧介绍，被毛泽东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韶山支部最早的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骨干之一。这年八月下旬，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密令胞弟、湘潭县反动头子赵恒哲派兵追捕毛泽东，李耿侯的姨妹刘天民，从她在湘潭县任议员的朋友处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选派共产党员郭士葵，带干粮抄小路赶往韶山报讯，并会同韶山支部的庞叔侃、李耿侯等同志掩护毛泽东摆脱敌人的追捕，安全离开韶山，后途经长沙、衡阳、宜章等地“间道入粤”，到了广州。

1925年10月，毛泽东从韶山脱险后，从湖南到达广州，住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内。不久，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直至第二年五月。

在此期间，已年过半百的李漱清应毛泽东的邀请，偕毛泽东的另一位塾师毛岱钟一道，到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后又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先后编辑出版了《政治周报》十四期。针对反革命派在宣传中的反“共产”、反“赤色帝国主义”两面黑旗，毛泽东以《政治周报》为阵地，写了《如果讨赤志同，仇亦良友》、《向左还是向右》等大量杂文和政论文章，阐明了革命者在大革命中必须明确的一些基本观点——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中间派必然要分化；“西山会议派”就是国民党右派，就是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代表；国民党右派分离出去“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国民党右派的分裂不足以阻碍革命的进程；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两面性。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李漱清、毛岱钟等编辑的《政治周报》

刘天民，女，湘潭韶山人，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湖南省委青年部部长，省学联干事长、团书记等职。

从理论上、事实上揭批了国民党右派分裂国共合作的行径，教育了国民党左派，争取了中间派。毛泽东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道，《政治周报》“在抨击和揭露以戴季陶为首的国民党右派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毛泽东对老师这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满意。据说，他曾以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名义，下令嘉许李漱清，鼓励李先生为国共合作多作贡献。后来，为了充分发挥李漱清的才干，毛泽东利用他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关系，亲自写信推荐老师回湘，参加国民党湖南政府的工作。

1927年，李漱清到长沙，在湖南省清查逆产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主管没收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财产，为抚恤老弱、残废、伤兵及赈济之用。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在湖南组织秋收暴动，然后带领起义队伍上了井冈山。李漱清与他失去了联系，就仍然回到家乡韶山，继续当小学教师。当时，李耿侯等领导韶山农民自卫军，同许克祥派来的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韶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寻求新的斗争途径，李漱清让儿子李耿侯去投奔毛泽东的队伍。于是，李耿侯就同弟弟李贡侯、大儿子李德深一道，几经周折，来到常宁水口山，参加了工农革命武装。自此，就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1949年，全国解放后，李漱清得悉毛泽东已是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激动不已。他叫儿子李介侯呈信毛泽东，热烈祝贺革命胜利，并询问李耿侯的下落。不久，毛泽东主席回了信：介侯先生：

惠书敬悉，深感厚意。

耿侯兄自一九二八年在湘赣边界之宁冈县见过一面，随即率队返湘南以后，未再见过。传闻殉难，似属可信，时地则无从查问了。

尊翁健存，可为庆贺。尚祈转致问候之意。率复，顺祝
健进！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这以后，李漱清几次给毛泽东去信，讲到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加入红军、作战牺牲的情况。毛泽东回信，“极表同情”，并说：“李耿侯、李贡侯、李德深三人为革命牺牲，均应发给光荣纪念证件，”在毛泽东和湘潭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下，李漱清领到了三位亲人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和抚恤粮。

李漱清十分感激毛泽东对他的关心。岁月流逝，他和毛泽东已有二十多年未见面了，他多么想在有生之年看一看昔日的学生毛泽东，叙一叙故旧之情、师生之情啊！

26 中南海会见

李漱清热切企盼看到毛泽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1951年7月11日、8月21日，毛泽东两次致信给他的堂兄和老师毛宇居，“为了了解乡间情况”，邀请李漱清和毛泽东的蒙师邹春培之子邹普勋进京，“住一至两个月”，同时寄来了介绍信，托毛宇居转交。喜讯传来，李漱清和邹普勋于9月14日从韶山起程，21日到达首都北京。

9月26日中午，一辆银灰色轿车，载着李漱清、邹普勋和张干、罗元鲲四位老人，驶入中南海，一直开到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口。卫士长带着他们穿过几道曲径长廊，直抵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笑盈盈地迎上前来，同他们一一握手，并动情地说：“稀客来了，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毛泽东说完，把客人请进客厅，让大家一一落座。当他看到年近八旬的李漱清仍然精神矍铄时，高兴地说：“您老先生好健旺啊！”李漱清是建国以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既激动又紧张，听了毛泽东的问候，他高兴得满脸通红，只是恭恭敬敬地抿着嘴笑。毛泽东好像看出李先生的拘谨，笑着说：“老熟人，老朋友，随便一点么，怕么子啰？”毛泽东这亲切而又略带家乡口音的话语，使李漱清坦然了许多，他半真半笑地说：“见了皇帝老子，我就慌张！”“如今还有什么皇帝老子？皇帝老子也是人，您老还是皇帝老子的老师哩！”这句幽默风趣的话，引得四老都笑了。

在亲密无间的叙谈之间，毛泽东叫来江青和孩子们，向他们介绍了客人。他诙谐地对李敏和李讷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都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毛泽东轻松自如的话语，赶跑李漱清等人的拘束情绪，他们就好似回到家里一样。毛泽东在一师的老校长张干，想起当年那场学潮，苍老的眼里噙满了泪花，终于向毛泽东说出了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话：“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对不起呀！”

毛泽东缓缓地摆手：“当年我虎气太盛，要是像现在这样学点猴气，就不会发动‘驱张运动’了。”他还诚恳地说：“‘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这颗‘寸草心’，是怎么也难报答老师的‘三春晖’啊！”接着，毛泽东设家宴招待李漱清一行，并尊请李先生上座，还亲自为几位师友敬酒、敬菜。师生们聚会在一起，谈笑风生，心里有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

饭后休息时，毛泽东仔细询问了韶山的生产和父老乡亲的生活情况，李漱清等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询问了家乡老人的情况：“红胡子五阿公在不在？民国十六年，红胡子是个顽固派，土霸王，反对过农民运动。不过只要他认识错误，跟上时代前进就是好的。”“还有，关公桥开四阿公在不在？他很恶，那时我们读书都怕他。”“井湾里郭梓阁在不在？我在井湾里读书时，他姐待我好，给我梳过辫子。”李漱清他们都作了简要回答。毛泽东又问：“上屋场南岸是原样子不？”

树砍了没有？”李漱清回答：“是原样子，树没砍。”这时邹普勋插话：“小时候，你和我在一起看牛，‘打仗’，记得不？”“记得！是老样子就

邹普勋，毛泽东儿时的同学，邹春培先生之子；张干，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的校长；罗元鲲，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的历史教员。

红胡子五阿公，即毛鸿初，地方绅士，曾反对过农民运动，成为韶山冲“四大扇”的首领。

开四阿公，即毛恩梯，毛泽东的远方亲戚，当时在家务农。

郭梓阁，又名子阁，毛泽东少年时的塾师郭伯勋之侄，私塾的同学和好友。

好，山里要绿化，树木要保护下来。”李漱清问：“你的房子是不是要修整一下？”“不要修整了，最好是照原样子。”谈话当中，李漱清把韶山乡党支部一份汇报材料呈送毛泽东。毛泽东看后说道：“要组织起来搞合作化，单干不行，单干发展不起来。”他面对李漱清：“当年你是主张拆祠堂，毁庙宇，办学堂的，是个激进派！现在搞合作化，你要带个头。土改虽分了田地，可俗话说：一人一口，七石二斗。农业还得抓紧才行哩。”话语里蕴含着对老师的深情，对故园的心驰神往。谈了一个多小时后，生活秘书进来请毛泽东休息，他谈兴正浓，把烟蒂用力一揷，说：“老朋友难得相会，见了面还要谈一下。”又谈了一阵后才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过几天再请你们来吃顿晚饭。”说完，毛泽东亲自陪老师参观了中南海、中央大礼堂，并引入电影室观剧。因李漱清耳朵有些聋，毛泽东还让秘书田家英坐在他身旁，为他解说。几天后，毛泽东又派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来为李漱清、张干等人检查身体，并用自己的稿费购置了呢大衣、被服等礼物相赠。此后，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带李漱清等游览了京津的名胜古迹。十月一日，还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同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军民欢庆新中国成立三周年。李漱清深有感触他说：“此次不是毛主席盛意，实难得此机会！”

十月中旬，时近黄昏，毛泽东再次在中南海会见了李漱清他们一行。毛泽东说：“你们来京快有二十多天了吧？过得痛快不？有点想家

了吧？现在我也不留你们了，我已告诉秘书做好三件事：每人做一套制服，一件呢子大衣，再送人民币一百万元（旧币）。你们送来了家乡特产，我没得特产送的，就是这‘三个一’。如今我并不富，不像过去的皇帝那样，要什么就有什么。你们来京的一切费用，都是用我的稿费开支的。你们还要做什么事？有什么要求，但讲无妨。”这时，邹普勋拿出一本《社会发展简史》请毛泽东题几个字。毛泽东说：“你们又不是不晓得写字，要我写什么？”李漱清插话说：“要借你的御笔书写！”“写什么呢？”“我们要送一本书给唐煦存，他就是给你写汇报材料的那个伢子。”“拿笔来。”毛泽东说完就接过秘书递来的钢笔题了字：“邹普勋赠给唐煦存，嘱毛泽东书。”又说：“你们要走了，我还要送一本书给你们。”于是，又拿起笔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本的封面上写了“毛泽东”三个中楷字，分送给李漱清等四人，又问：“你们还要做什么事？如果还有什么事要做，再写信告诉我，现在回去好好休息，再玩几天，就叫秘书派人送你们各位回去。”

一个周末的下午，主席办公室来电话：主席请李漱清先生共进晚餐。随即派警卫处负责同志将他们接到中南海——毛泽东家里。四点多钟，生活秘书告诉毛泽东，请来的客人到了。毛泽东热情地请李漱清等围圆桌就餐。餐桌上，摆着七八道菜，有红烧肉、家乡腊肉、火焙鱼、豆豉炒辣椒、两碗汤菜，还有两道北方菜。毛泽东举杯敬酒，笑着对李漱清等四人说：“湖南人爱吃湖南菜，我在这里陪家乡人吃家乡菜，别有风味。这里有两道北方菜，你们尝一下，这叫做南北合作。”圆桌大，李漱清夹不到北方菜，就风趣地说：“我夹不到菜，鞭长莫及。”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忙给他们夹菜敬酒，并说：“你们来京，心里不慌吧？生活过得惯吧？你们来了，就要出去看一看。先看看名胜古迹，再看看城市建筑。这是京城，进了京，就要看看京城风貌。”宾主笑语喧哗，气氛融洽热烈。

宴会结束时，毛泽东请李漱清等人合影留念，他们十分高兴，旋即起身，略整一整衣衫，走到合和堂外面走廊上拍了合影照。照完相后，毛泽东将他们送到丰泽园门口，说：“不远送了，你们回去后，问候老朋友好，问候家乡人好，以后如果有机会，再来京吧！”送别之时，毛泽东乡情浓烈，李漱清等人依依不舍，向毛泽东告辞，这时已是华灯初上了。

李漱清他们回到住所后，思潮起伏，浮想联翩。想到承毛泽东厚意，此番进京该玩的玩了，该看的看了，只是感觉到这一生还未坐过飞机，似嫌美中不足。大家商量起来，想坐一回飞机。于是，由李漱清执笔，向毛泽东写了请求报告：“余年八十，欲试航空，不知可否？请主席批准。”毛主席接信后立即批准，让他们登上民航飞机，围绕北京城、八达岭上空，俯瞰首都、长城风光，浏览京城名胜，实现了几位老人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回到韶山后，李漱清把在京多次晋见毛泽东及所见所闻，告诉老伴、儿孙及乡亲们，让大家分享幸福。并几次致信毛泽东，表示衷心感谢。毛泽东回信请他“保重身体”，并请告知乡间情形。当李漱清去信，将乡间情况报告毛泽东时，毛泽东回信：“承告乡情，甚感。”

党和政府非常关心李漱清先生，1952年11月，经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介绍，湖南省人民政府聘请他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后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留乡间休养，安度晚年，直至1957年12月逝世。

第六章 毛岱钟

——“一个失业的法科生”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

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

之所存也。

——《师说》

27 重进学堂

这是 1909 年的夏天。毛泽东失学已经两个多年头了。

虽说，毛泽东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里，没有离开过书本，没有间断过自学，但他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却极不满意。他感到，韶山冲太闭塞了，闭塞得连一本好看的新书都找不到；父亲太专横了，专横得连儿子的合理要求都听不进，剥夺了他上学堂读书的权利！他是多么向往像李漱清先生那样到城里的洋学堂去读书啊，那里书多，先生高明，能够学到许多在私塾里学不到的知识能够看到许多在韶山看不到的新鲜东西。自从上次和李漱清先生长谈后，他的心再也没有安宁过，他想到韶山以外的世界去，他厌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家生活，甚至厌烦自己祖祖辈辈在这里繁衍生息的韶山冲和很是富足的上屋场这个家。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可是如真能像李漱清先生所言外出求学深造，以便将来为国尽忠、为民造福的话，他甘愿离别故土和家人！他决定和父亲“摊牌”——要求到外面去读书。

凉风习习，月光皎洁，山冲里的夏夜格外幽静。父亲毛贻昌从来就没有闲暇的时候，为了这个家他总在日夜操劳。此刻，他正在屋场旁边的打谷场上，对着明月教十二岁的弟弟泽民用双手同时打算盘，只听得鼻盘珠子“噼哩叭啦”响，就像弹琴一样流畅。母亲带着泽覃和泽建，坐在竹床上一边乘凉，一边数天上的星星，讲牛郎织女的故事

毛泽东慢慢地走到了父亲的身边，低声他说：“爹！我想到外头读书去。”

毛贻昌一听，有些吃惊了，这件事使他感到很突然。他想：润之在家种了两年多田，已经学会了抛粮下种，扶犁掌耙，田间管理、种菜养鱼等整套农活，算得上一个种田里手了。眼下，家里正是靠他出大力、帮大忙的时候，怎么能出去读书呢？自己的身体已大不如前，而且还要忙生意场中的事，泽民、泽覃都还小；去年冬天虽说娶了一房儿媳罗氏，但毕竟是个妇道人家，种田不大在行。如果在这个时候润之要是走了，家里这几十亩地由谁来种呢？就是请长工，也得有个人承头主事呀！于是，他板起面孔说：

“你在家种田，搞得好好的，出去干什么？又是哪个给你出了这个馊主意？还读那些‘之乎也者’，有什么用场呀？”

毛泽东见父亲一开始便反对他读书，急了，连忙把自己的想法，都对父亲讲了。父亲根本听不进去，毛泽东更急，就和父亲争吵起来，他说：“我不管！你答应也罢，不答应也罢，我就是要走！”毛贻昌气得跳起来，大声吼道：“你敢！看我不打死你！”就这样，他们父子谈崩

母亲见他们父子争吵起来，急忙走过来解劝。丈夫和儿子的对话，她都听见了，她不觉得儿子要求读书有什么不对的。她这个做母亲的，本不愿儿子过早从事体力劳动，怕伤了他的身子骨。谁不知道这个“石三伢子”是她含辛茹苦地养大的啊！所以，她在心里有点偏向儿子，就对丈夫责备起来：“你又吼什么啦？晚饭吃多了？有话慢点讲嘛！他如今已是成房立户的人了，也爱面子呀！”

像往常一样，只要妻子文七妹出面讲话，毛贻昌再大的火气也慢慢消了。眼下，他只是瞪了儿子一眼，便再也不吱声了。毛泽东也比以前懂事多了，遇上这种情况知道给“梯子”让父亲下台，便不再和父亲硬顶了。他离开打谷场，走进自己的土砖房子里，上床睡觉去了。

可是，他并未睡着，脑子里老是想着读书的事。他琢磨：用什么法子能够去读书呢？硬顶硬碰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么来个“先斩后奏”呢？跟母亲通个气，先跑出去读书再说，等父亲气消了，再托人打圆场，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到那时定会应允的。对！就采用这种办法。主意已定，他心里舒坦了许多，很快便呼呼入睡了……

毛泽东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也逐渐讨厌田间劳动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争吵，最后，我从家里跑了。我到一個失业的法科生家里，在那里读了半年书。”

或许是因年久日深毛泽东记忆有误，或许是代笔者为了渲染少年毛泽东的反抗精神，总之，毛泽东能拜师“法科生”，还是经他父亲同意和支持的，而绝非“私自跑出去”。试想：毛泽东的本意是要走出韶山去读书，如果真的“从家里跑了”，就不只是跑到离家几里之遥的乌龟井的，这是其一；其二，毛贻昌在韶山素以治家严谨著称，如果儿子真的不经允许便私自跑出家门，他是不会给他提供学习和生活费用的，在那个父权盛行的时代，父亲的命令是难以违抗的。这里作此赘述，权当一段历史事实的考据吧。

事实上是，还未等毛泽东“从家里跑出去”，他父亲毛贻昌就同意了儿子的读书请求。一个多月后，到了“七月半”。又是一个皓月当空的夜晚，父亲突然对毛泽东说：“三伢子，听我讲！你不要到外头去读书，就到乌龟井去吧！那里有个先生，是从省城长沙的学堂里回来的，他懂得皇上的王法，跟他去好好学些本事吧！”这是一个十分意外的决定。父亲为什么突然开恩呢？毛泽东觉得这是一个谜，不过他不想去解开它，只要能继续读书，管它什么原因呢！

不久，毛泽东还是从他母亲那里弄清楚了，父亲答应他重进学堂，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前些日子，在他们家里，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公案，为了一小块柴山，父亲和别人闹起争讼，官司打到了湘潭县衙。对手本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但他有一个女婿在省里抚台衙门当差，官虽不大，却精通大清法律，在具知事的大堂上，引经据典，口若悬河，舌如利剑，父亲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结果，原告变成被告，有理变成无理，花了几十元银洋，还把柴山判给了别人。官司打输了，人丢了，父亲心里十分窝火，暗自恨自己少读了“四书”、“五经”，只好隐忍了。这事的发生，成了毛泽东重新上学的契机，父亲下决心让儿子恢复学业，要他跟着刚从城里回来不久的一个“法科生”去学习朝廷的“王法”。

毛泽东觉得很幸运，他没想到自己争来争去的读书机会，此刻竟轻易地来到了。他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立即打点起行李书籍，来到了乌龟井私塾。

两年多的田间劳动，就这样结束了。

今人大都惋惜，毛泽东的读书生涯中，不该有这辍学两年多的小插曲。依笔者愚见，这正是他的父亲毛贻昌给他的特殊馈赠：两年多时间辛勤劳作之余的挑灯夜读，使毛泽东感到学习的艰难和进学堂读书的不易，后来一旦重新获得读书的机会，便如饥似渴，刻苦自励，原先那种与聪颖相伴的懒惰便一扫而光；为期不短的田间劳动，使毛泽东原本羸弱的体格发育得粗大结实，以致他一年多后上东山学校时，由于身材高大，面颜黧黑，被人误认为是纨绔子弟的挑夫。更重要的是，在这两年多时间里，毛泽东接近了饱受压

迫的中国农民，了解了种田人的苦楚深知农事艰难，吃饭不易。他后来成家立业了，常常教儿子岸英岸青兄弟吟诵唐朝诗人李绅的《悯农》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1942年，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他还抽时间精心栽培分给他的菜地，被边区人民评为“特等劳模”而获得了奖章和纪念品。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党和国家的主席，他更是把广大农民，把全国人民的衣食冷暖放在心头。他把农业作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把粮食作为“纲”，亲自制订了水、肥、土、种、密、保、管、工的农业“八字宪法”。即使到晚年，他还设想要下到农村去，“搞一年农业”。他曾语重心长地对全国人民说：“须知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他的话至今仍震聋发聩

就这样，毛泽东在辍学两年多之后，又重新跨入了学校之门。

28 “法科生”教“王法”

毛泽东在他的回忆中提到的“一个失业的法科生”，就是家住韶山乌龟井的塾师毛岱钟，他毕业于长沙法政学堂，以讼笔著称韶山一带。

毛岱钟当时正值盛年，且接受的是新式学堂的教育，思想比较激进，对封建末代王朝那种法度紊乱，官场腐败，社会丑恶的现象颇是不满。因之很不得志，甚至连“饭碗”也拿不到，不得不回到家乡韶山。

毛岱钟的父亲毛简臣，字羽仪，号恩谔，是韶山一带较有名望的乡绅，《韶山四修毛氏族谱》评价他是“率性勇为质直好义”的好人。他家庭富裕，又略通文墨，便在家中私设了一所学馆，教授四乡适龄儿童。自从儿子从长沙回乡之后，毛简臣见他整天无所事事，愁眉不展，便要毛岱钟顶替自己，担当塾师。毛岱钟毕竟是具有新型观念的知识分子，他思想活跃，一改旧时私塾死读古书的传统格局，利用自己的所学之长，在私塾讲解大清帝国的法律条例，传授衙门诉讼的诀窍。他的这一举动，在闭塞落后，不知“王法”为何物的韶山冲，自然是一件新奇的事，乡民们虽说对此褒贬不一，但还是有不少人将自己的子弟送到这里来学习。指望将来能凭精通律例踏上仕途，兴盛家邦；万一不成，至少可以学成“刀笔”，靠为人打官司来安身立命，养家糊口。毛泽东便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怀着好奇的心情，生平第一次听毛岱钟老师讲授那神圣的“王法”，开始接受法的启蒙教育。

“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法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毛岱钟开宗明义，依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即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给“法”释义。

他告诉学生：“法，是传说中的神兽，它形状似牛，独角，亦称‘独角兽’。它是正直的化身，被用以判定是非曲直。‘法’从水，从去，意味着公平、正直。因之，古时审判案件，以被法触者为败诉。《论衡·是应篇》：‘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法的概念，虽随时代而有不同含义，但自奴隶制时代之后，‘法’实际与‘刑’是同义字，所以，

‘法’、‘刑’、‘辟’等字，可以相通，成为统治者罚罪的手段了。据考证，法字还是‘代’的假借字。法、伐音近，法借为伐。伐者攻也，击也。《管子·心术》：‘杀戮禁诛之谓法’，就是借法为伐的一例。同时，法字又借为废。因之废字的含义渐成法字的含义。《国语·郑语》注：

‘废，禁也’。《盐铁论·诏圣》：‘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废是禁止，所以法也意味着禁止。《后汉书·虞诩传》：‘法禁者，俗之堤防。’法禁连成一词，就是法以禁止为含义的一种表现。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又因法、逼双声，逼变力法。《释名·释典艺》：‘法，逼也。人莫不欲从其志，逼正使有所限也。’《左传·襄公二年》注：‘逼，夺其权势。’《尔雅·释言》：‘逼，迫也。’夺其权势而又加以逼迫，自然就是强制服从，亦即命其采一定行动。一方面是禁止，另一方面是命令，法字含义，从此包括命令和禁止两方面。于是凡以禁止或命令为内容的一切规章都是法。《管子·七法》：‘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就是这种意思的表现。此外，诸子百家，历代贤哲对法也有种种不同诠释。韩非子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慎到说：‘法者，所以齐天

下之动，至公大定（正）之制也。’……概而言之，法是社会生活准则的总称，亦即统治者的意志一般的和概括的表现形式。”

毛岱钟顿了顿又接着讲：“至于说到‘律’，清人段玉裁撰《说文解字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一，故曰均布也。’律字含提供模式，纠偏止邪，使之齐一、统一之意。它始创于战国，先是赵制国律，后来商鞅又制秦律。故此，《唐律疏义》说得明白：律之与法，文虽有殊，其义一也。’又说战国时期魏李悝集辑各国之法编成《法经》，后商鞅改法为律。《管子·七臣七主》解释更详：‘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让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轨绳墨也。’由上所述，法和律有公平、正直以及普遍、划一的意思，是国家用来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

毛岱钟博闻强记，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侃侃而谈，把本来枯燥生涩的法律基本概念问题同文字训诂糅合在一起，讲得高深而不失流畅，准确而又极富概括，使毛泽东这些从来也没有见过“王法”的私塾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既进行了古文功力的训练，又懂得了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从这一天起，毛泽东这位山里娃子便跟着“法科生”，接受了为期半年的法制学启蒙教育。

从目前掌握的历史资料来看，这是毛泽东在学习生涯中第一次正规地接受法制教育，也是他一生中头一次在课堂里听老师讲授法律课。拿今天的尺度来衡量，毛岱钟所授的知识，无疑是浅显而有历史局限性的。或许在当初，谁也不会料想到，这段学习经历在日后毛泽东的一生中会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只要稍微追寻一下毛泽东的学习履迹和成长历程，人们便能清楚地发现：正是由于毛岱钟先生——这位被毛泽东称之为“失业的法科生”的青年知识分子，勇敢冲破历史雾障，敢为私塾教育之“天下先”，打破私立学校教材教法的“一贯制”，对毛泽东进行了为期半年的法启蒙教育，才使之粗知了一些法学常识，在他稚嫩的心田里萌发了依法治国的幼芽，开始懂得了依靠法律武器建设国家、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而在于自此以后“法制”二字在他的头脑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在后来几十年革命斗争的理论与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毛泽东法律思想”，并以其为指导思想，亲手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的《井冈山土地法》，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条例》，解放战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和建国初期起国家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等一系列好的法律，从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只是在那时，老师和学生都未曾预料到这一层罢了。

29 “不学这不公正的法律”

正当毛泽东专心致志地在乌龟井私塾学习“王法”的时候，在他的身边发生了两件触目惊心的事件，打破了他心头的平静，也使那至高无上的“大清律”，在他的眼里黯然失色，成了一摞一文不值的废纸，从而使他钻研法律的兴趣荡然无存。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如是说：“这时，湖南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我整个一生。就在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堂外面，我们学生看到了许多从长沙回来的豆商。我们问他们为啥全离开那里，他们说城里发生了大暴动。……”

毛泽东所说的“大暴动”，就震惊全国的宣统初年长沙“抢米风潮”。

1909年，湖南水旱灾严重，粮食奇缺，灾民遍野。而投机商人、豪绅地主和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大奸商、大豪绅王先谦、叶德辉等，囤积的谷米竟多达上千石、上万石，导致米价暴涨，每升由原来的二十六文上升到七十六文。长沙市南门外有个靠卖水为生的穷人黄贵荪，好不容易积攒了七十六文钱，让妻子到粮店买米，可此时米价已涨到七十八文一升，他妻子不得已又回来向邻居借了两文钱，等她再返回粮店时，米价又涨到八十文一升。这个可怜的妇女，在绝望中饱含悲愤跳进了湘江。黄贵荪闻讯后，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拉着几个快要饿死的孩子，也一起投江而死。

黄贵荪一家投江自尽的消息，在长沙引起极大的震动，饥民们选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巡抚衙门请求救济。但抚台却置百姓之生死于不顾，竟然傲慢地说：“城里有的是粮食，我总是吃得饱饱的，为什么你们种田人倒没有饭吃？”当他的一派胡言遭到代表们的驳斥时，他竟恼羞成怒地下令把请愿的饥民代表抓进大牢。饥民们忍无可忍，便在一夜之间“将城厢碓房堆栈之米，抢劫罄空；警兵站岗之木栅，打毁尽净”，还砍断了作为官府象征的朱红旗杆，捣毁了巡抚衙门和一些外国领事馆、教堂、洋行。“之后，一个姓庄的布政使骑马出来，晓谕众人说，官府将采取措施帮助他们。庄的应允显然是有诚意的，但皇帝却不喜欢他，传谕说他密通‘暴民’，将其革职。新巡抚一到任，即下令缉拿

‘暴乱’的领头者，许多人被砍了头，挂在柱子上，以警告后来的‘造反者’。”

这件事强烈地震撼着少年毛泽东的心灵，他后来说：“这件事在我的学校里议论了好些天，给我留下了根深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

‘造反者’，但他们只是从旁观者的观点出发，而不明白这也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有关，他们感兴趣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件很有刺激性的事件。我永远忘不了这件事，我感到那些造反的人都是像我自己家人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我对他们所受的非正义的对待深抱不平。”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就在长沙发生饥民暴动以后，“韶山也发生了秘密会社哥老会成员和本地一个地主之间的冲突。地主上法庭告他们，由于他是个有权势的地主，轻而易举地买通官府，做出了于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成员败诉了。但他们并不屈服，而是起来反抗这个地主和官府，他们撤到本地的浏山，在那筑起了堡垒。官府派官军攻打，地主又散布谣言，说他们揭

《红星照耀中国》第96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96~97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97页。

竿造反时，杀了一个孩子来祭旗。起义军的头领叫彭石匠。他们最后被镇压了，彭石匠被迫逃走，可最终还是被捉住砍了头。然而，在学生们眼里，他是个英雄，因为大家都同情造反者。”

这一连串的事变，深刻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学习和生活道路。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在少年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种朦朦胧胧的阶级对立的政治意识开始产生了，他的心灵已经在反叛了——觉得不反抗便没有劳苦大众的生路！他日后回忆说：“这些接连发生的事情，在我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头脑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觉悟，觉悟，使毛泽东那倔强的性格和反抗意识得到了质的升华；觉悟，也使毛泽东把反叛的焦点由父亲、老师和韶山的土豪投向整个社会！

不过，在当时毛泽东的心目中，最清晰的反响是他对毛岱钟所讲的象征着“公平”和“正直”的法律，产生了根深的怀疑。他想不通，饥肠辘辘、走投无路的长沙受灾难民，他们并非是存心和官府作对的刁民，而是些作田种地的老实农夫。往年风调雨顺，他们对于交租纳粮，何曾讲过半个“不”字！总是含着眼泪，忍着辛酸，把一担担金黄的稻谷，倒进地主老财家的粮仓，然后又被这些人用木船运到湘潭、长沙，高价卖给那无田可种、缺粮糊口的穷苦人，为这些不愁耕种自然收的吸血虫赚回白花花的银洋……如今，种田人自己遭了大灾大难，却连一口粥水也喝不到，被逼得没有活路可走，想夺回原本属于他们的粮食，反而要挨官家的洋枪子弹，他们那瘦骨嶙嶙的躯体，竟倒在巡抚大人的辕门之外，最后的一滴滴鲜血也慢慢地流干了……公正严明的大清王法为什么不依法惩处那些鱼肉百姓、草菅人命的官家，不保护那些善良可怜的穷人，还要对他们治以重罪，处以极刑，这哪里有何“公平”“正直”可言？再说彭石匠，他只不过是和一个土豪有些“过结”，土豪使用银子买通官府，使得他这个有理的人竟然官司败诉，最后官逼民反，彭石匠因此丧命……透过这一桩桩、一件件的惨痛事实，毛泽东终于看清：王法是专门向着地主、豪绅、官家和皇帝老子的，他们可以拿它作刀子，任意宰割屠杀那些像长沙饥民一样的无辜者和像彭石匠那样的英雄好汉！他昂首向苍天呐喊：这种不公正的“王法”，要它何用？他抚心对自己发问：这样有害无用的“王法”，又学之何益？

他，心中萌发了退学的念头。

毛泽东想退学，可退学的事并不那么简单。那时读书，半年缴纳一次学费，钱交付给先生之后，学生因自身原因如不能入学，先生则概不退还。毛家虽说富裕，可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个精打细算、勤俭持家的人，他绝不答应儿子花冤枉钱而不读书。对于这一点，毛泽东是深知的。他这次重新读书，本来就颇费周折，来上乌龟井私塾，父亲是对他寄予了厚望的，指望他跟毛岱钟老师好好学习“王法”，将来好涉足仕途，以使门楣增辉。如果自己还没学习几天便要回去，父亲定会生气的，弄不好自己将永远失去学习的机会。想到这些，他只好捺住性子在这里读下去。

值得庆幸的是，毛泽东虽不想继续学习法律，但却和私塾先生毛岱钟合得来。按毛姓辈派论，毛岱钟比毛泽东长一辈，毛泽东不仅要尊他为师还要敬他是叔。可是毛岱钟年纪并不大，他出生于1890年12月，比毛泽东整整

大三岁，他们实际上属同龄人。毛岱钟五岁发蒙，十二岁考入“昭谭高等小学堂”，十五岁进“长沙法政学堂”，十九岁毕业回乡任教，这才阴差阳错地成了年满十六岁的毛泽东的先生。毛岱钟在长沙读书期间，接受了某些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所以在执教期间很少有封建教育的那一套繁文褥节和清规戒律。在他的私塾里，虽然立了孔夫子的牌位，但这是父亲毛简臣的意思，他也只好摆个样子罢了，并不像那些酸学究，硬要学生们磕头下跪，烧香作揖。他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不愿管得太死，尤其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年龄较大，自我约束力较强的学生，更是听其自然。他给学生讲课的时候，也是文质彬彬，轻言细语，从来不打人骂人。他的这些做法，深受绝大多数同学的欢迎，特别是符合生性不愿受束缚的毛泽东的性格特征，他发自内心喜欢毛岱钟老师，觉得他是读书以来遇到的最和气的先生。

在这样的环境里，毛泽东可以根据自己的所好去读书。他自己拟定了一个读书计划，除完成毛岱钟老师所讲授的课程外，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在这方面下了很多功夫。两年多的辍学务农，使他格外珍惜这失而复得的读书时光，学习也更加自觉和勤勉，每日里起五更、睡半夜，总是手不释卷。毛岱钟——看在眼里，虽然学生学的不是他所要教的书，但仍感到十分满意。

不过毛岱钟是个细心的人，他看到毛泽东对学习法律的兴趣大不如前，心里有些不解。为了弄清原委，他决定和毛泽东谈一谈。这样，便引出了一场严肃深刻而又精妙绝他的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犯罪的罪与罚的讨论——

30 经馆纵横论刑名

一天傍晚，毛泽东正乘着落日的余辉，在私塾门前的水塘边看书。毛岱钟手里拿着一本线装书，来到他的学生身边。

“润之，你在读什么书呀？”毛岱钟关切地问。

毛泽东抬头，见是毛岱钟先生在问他，便将手中的书递给老师。

“噢！是《史记》？你在读历史？”毛岱钟看了书名后，又将书还给毛泽东，问：“润之，你近来对法律课学得怎么样了？”

听了老师的问话，毛泽东半晌没有做声，怎么说呢？毛泽东深知：无论是哪位老师，大凡是他所教的那门功课，便都希望学生能专心致志，学有所成。可是，自己确实已对学习“王法”失去兴趣，没有兴趣就不可能刻苦自励，也就不可能学好。平时的大量时间和精力均用来钻研历史书籍，幸亏毛岱钟先生的通融，给了他不少关照，他才能在私塾里安心地读自己喜欢的书，而不必担心先生的处罚，但是，当现在先生过问自己的学习时，毛泽东的确感到有些不好向老师交待。这个中情由怎么好当面对老师讲呢？可是不说清楚他总感到对不起这位和气可亲的先生。思量来，思量去，毛泽东觉得还是要把自己的心事对老师说说为好。于是，他坦诚地望着毛岱钟，说：

“先生，我不想学王法了！”

“为什么呢，润之？”毛岱钟闻言，不解地问。

“先生，你听说了长沙饥民暴动和彭石匠造反的事吧？”毛泽东答非所问地反问老师。

毛岱钟点了点头。毛泽东所说的两件事他是知道的。前些时，毛岱钟从长沙逃回的生意人那里听说过，长沙十几万饥民被逼造反，冲了抚台衙门，砍了旗杆，赶跑了抚台大人，还放火烧了辕门。清朝政府对此惊恐万状，立即从湖北调集来了两个步兵团，并请英、美、日、德、法五国政府帮忙，从厦门、上海、汉口调来了十几艘军舰，浩浩荡荡地开到长沙，水陆并进，华洋勾结，对手无寸铁的饥民，来了个大搜捕，大屠杀。霎时间，浏阳门外的识字岭上，到处是无辜者的鲜血。许多人的脑袋被割下来，挂在旗杆上示众……至于彭石匠造反的事，就发生在韶山冲里，他更知道得一清二楚。说实话，他十分同情走投无路的饥民，也很敬佩彭石匠的武勇，但作为一个法科生，他又觉得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大清律条，按律将定为“反逆罪”，罪不容赦，当斩不饶。不过，毛岱钟不明白今天毛泽东提这些事的意思，也弄不清这些事与他学王法有什么关系。想到这里，毛岱钟不无疑问地对学生说：

“润之，你说的这些事，可谓惊心动魄的大事变，在湘中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只是它们与你的学习有关系吗？”

“有的，先生！我以为朝庭的王法是专门为官府、富人制定的，这是极不公正的！试想，它如果‘公平’，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不管百姓死活、贪赃在法的官老爷和富商豪绅，而治罪于那些遭灾落难的饥民和正直善良的种田人？它如果‘正直’，那些饥民和彭石匠何以死得如此悲惨？！照我看来，这样不公正的王法，学了有什么用啊！”毛泽东面对他喜欢的老师直言不讳，慷慨陈辞。

听了毛泽东的话，毛岱钟陷入了沉思。作为族人，他深为毛泽东这位远房侄子担忧，毛泽东刚才这番令他的同龄人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言论，若在公众场合张扬出去，将是为大清王法所不容的，不坐大牢也会“杖责四十”；可是，作为老师，他又不禁对这位学生刮目相看，一个十多岁的私塾学生看

问题如此深刻，简直把封建法律的本质看透了，可见他是极有思想的。说心里话，毛泽东的这种想法自己在长沙读书时也曾有过。经过几年对法律的深研，特别是受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与法制思想的老师的影响，毛岱钟日益看清代表极少数满清大地主贵族利益的大清王法的本来面目，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和徇私枉法更是深恶痛绝。他不愿同流合污，深感报国无门，只好回到故乡靠教书度日。尽管这样，毛岱钟还是认为法律作为一个专门学科仍有其深厚的渊源和较高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像毛泽东这样的山乡农家子弟，学一点法律知识，懂一些诉讼之道，是有益而无害的。为了启发毛泽东的学习自觉性，毛岱钟想引导他了解一些中国古代法制史，特别是想让他了解历代王法对类似于“长沙抢米风潮”这样的政治性犯罪，是如何定罪量刑的，以便消除他的陈见。于是，毛岱钟扬了扬他手里拿的那本线装书，对毛泽东说：

“润之，你的这些想法我个人以为是好的。但是，不能把大清律条与法学、法制史等同起来看，法律作为一种学问还是值得一学的。你近来读史不知注意到了没有，历代史书上对法律可是有不少记述啊！我这几天也正在温习列朝史籍，想给你们讲讲历代王法的变迁呢！”

“哦！史书里对法律也有论及？”毛泽东初涉史籍，自然对此不甚了了，便极感兴趣地问。

“是的，有史即有法嘛。法是和国家一起产生的，国家政权就是靠军队、警察和法庭来得到巩固的。一部史书要记国家一朝一代的兴衰，自然也要论及那个时代的法律。因之有人说，一部中华古国的历史，便是一部法律变迁史。”毛岱钟不愧是法政学堂的高材生，三言两语便既回答了毛泽东的提问，又把法制史与历史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近年来，毛泽东阅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绝大多数是历史题材的小说，他以此作入门向导，把兴趣又转向钻研中国古代历史方面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下功夫往深处钻，就越觉得悠久的历史和中国历史和浩繁的历史书籍，就像那浩瀚的大海，望不着边、游不到岸，其幽深和奥秘无以穷尽。听了刚才老师阐述历史与法制史的关系后，他由此及彼地联想到法律这门学问的深奥，不由勾起了他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心急切的心情向毛岱钟询问：

“先生，你具体想讲哪个课题，能向我先讲讲吗？”

“好的，走，润之，我今晚就给你讲！”毛岱钟欣然答应。然后，同毛泽东一道来到他的书房，在梓油灯下，开始了他自己命题为《中国历代政治犯罪的罪与罚》的专题讨论。

“政治犯罪，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古老的罪名之一，它几乎和国家、法律一起与生俱来，历代统治者将其视为‘常赦所不原’的大罪，并施行最严酷的刑罚。”毛岱钟以准确、精炼的语言，开始了他那冗长的讲解。

他接着指出：“关于政治犯罪，最重大的是夺取统治权为目的而危害统治者的犯罪，以当今大清律和新颁《大清新刑律》定罪，就叫“叛逆罪”。当然，根据各个朝代的具体历史情况，对此罪的罪名也各有所不同。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最早出现‘叛逆罪’在五帝时代。《尚书·吕刑》载：‘蚩尤惟始作乱’；《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那时，反逆和乱词异义同。贾子《道术》：‘返顺为逆’；《国语·晋语》注：‘逆，反也’；《广雅·释詁》：‘逆，乱也’。《左传·文公七年》：‘兵作于内为乱’。‘作乱’是与统治者实行军事对抗，因而也就是造反：‘不用命’，就是不顺从命令。由此看来，作乱和不用帝命是典型的政治犯

罪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也是五帝时代政治犯罪的主要内容。

“到夏、商、周三代，奴隶主贵族统治奴隶的合理性，已被提到与自然规律等量齐观的高度。因而认为背叛、反抗统治者是‘逆天地’，欺君、造次和要君，都是‘逆天地’的表现形式。欺君，是颠倒是非和虚实，使君主误解；造次亦即造虐，就是弑君；要君即是邀君，也就是拦阻君王行为。除此之外，夏、商时期崇尚孝道，因而带有政治色彩的罪名还有‘不孝罪’，《孝经·五刑章》说，‘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

“继春秋之后，我国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一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曾经提出了‘法治’的主张，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封建法律。其中集春秋末叶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者，乃战国魏文侯相李悝编纂的《法经》。在《法经》中，政治犯罪的范围大为扩充。‘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这是贯穿在《法经》中的根本思想。《荀子·修身篇》曰：‘窃货曰盗’，‘害良曰贼’。可见，其中的《贼》法是防止叛逆、杀伤，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和保护地主阶级人身安全的法律。此外，凡属危害封建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府、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等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都在《法经》中定为重罪。

“秦、汉、魏、晋的政治犯罪主要有谋反、大逆、大逆不道、不道、不敬、大不敬等罪名。‘反’是举兵作乱之意，如《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长安君成矫反和《汉书·景帝纪》所记吴楚七国反；谋反和大逆是同一罪名：吴楚七国反，诏书称为逆，汉朝的新垣平反，称谋为逆，都是著名例证。‘大逆不道’包括单纯弑君，例如《史记·高祖纪》里所说的项羽杀义帝和《汉书》所载的欲求禅位以及不称德行而无臣子礼。《魏律》改‘大逆不道’为：单纯用言语侵犯当朝皇帝或先君；‘不道’指逆节绝礼，汉代包括误朝、左道乱政、言事恣意、拒闭使者、附上罔上、罔上、非议诏书毁先帝、诽谤政治、僭上、狡猾、奉使无状、知后母与帝谋凶已而不举发，使吏谋杀方士等罪，内容十分广泛，而无正式条目。‘不敬’指亏礼废节，包括大臣奏事泄漏，令吏民传写流闻四方；置天子之功于地；奉使不敬；持虎符出界归家；教子上书，称引不当，失臣体；骂座；骑至司马门等等。其尤其重者为‘大不敬’，例如：称诈、虚设、非所宜言，醉歌宗庙堂下。所有这些政治性犯罪，《汉书》中都有详尽记载。与此同时，各朝都把法律的锋芒指向农民暴动。如秦津中的‘群盗’，已不是‘窃货曰盗’的盗窃，而是指贫苦农民聚众反抗官府统治，就像如今世上发生的长沙饥民暴动和彭石匠等哥老会造反这类情况。汉朝为了孤立和打击农民起义军，割断他们与群众的密切联系，从法律上制定了‘首匿罪’及‘通行饮食罪’。凡首谋藏匿犯罪者，就叫‘首匿’；给农民起义军通情报，当向导，供给饮食，即‘通行饮食’。此外，汉朝对侵犯皇帝权威与尊严者，予以严厉镇压。在这方面有矫诏、矫制罪、废格诏令罪和僭越罪等。

“唐、宋、明、清都有谋反、谋大逆、谋叛和大不敬四个罪名。不道已不再是政治犯罪。谋反不分已行未行。大逆，唐宋都分谋和行，明清不分已行未成。叛字由半、反二字组成，反是分裂而且对抗，如进攻城池；叛是背离，如背国从伪或投靠外国，但未公开对抗，如果对抗，便是反而非叛了。大不敬，包括盗大把神御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不如本

方及封题误，或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车误不牢固等罪。《大清新刑律》在预期君主立宪的情况下，虽废除以君主专制家天下为前提的谋反、大逆罪名，但又制定了相当于旧律之大逆、大不敬的‘侵犯皇帝罪’，规定意图颠覆政府，潜窃国土或紊乱国宪而实行者为‘内乱罪’，这实际上是封建法律‘十恶’中谋反罪的扩大，和旧律是一脉相承的……”

毛岱钟一口气从三皇五帝讲到宣统年间，把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犯罪的内容和演变过程及其法定罪名，阐述得深刻透彻。其中许多观点，显然是教科书上所没有的，而是他多年来通读史书，精研法理，站在历史的高度悟出来的结论。对这样的讲解，毛泽东从未听到过，所以觉得特别新颖、爽心悦目。他始终全神贯注地听老师讲，深怕漏掉了一句话，待到老师讲完一段停下来，他仍以企盼的眼光望着毛岱钟说：“先生，你这是讲的有关历代政治犯罪的定罪，那么还有量刑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毛岱钟呷了一口茶，笑着对他的学生说：“莫急，润之！下面我就要谈到自古到今对政治犯罪的刑罚问题哩。”

“综观我国古代刑法的发展史，政治犯和常事犯的刑罚，经历了一个由合到分的过程。——在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政治犯罪和其他犯罪的处罚基本是相同的；时至封建社会，对于触犯礼义、伦常的刑罚，汉唐和明清大体类似，而对于危及国家统治的反叛大逆等罪的处罚，汉、明、清更重于唐。”

毛岱钟说：五帝时代的统治者，处在从邦人的代表转变为邦人的统治者的过程中。直至唐尧时代，还存在着原始共产主义的流风余韵。对政治犯和常事犯的处罚并无不同，而只有敌我之分，内外之别。共工、兜都是同族，所以只是流放；蚩尤、隶农都是异族，因此都处列刑，甚至以供肉食，《史记·五帝本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路史·后记》四：“执蚩尤于中冀而诛之，爰谓之解。”《续博物志》：“帝杀之（蚩尤），身体异处。”解是分析，亦即肢解，割下人头，自然身首异处。由此看来，黄帝惩治蚩尤的刑罚是列。

“三代时期，天下为家，统治者至高无上，因而降低了统治集团内部政治犯的地位，实际上与奴隶同样待遇。‘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未尝不从尊贵之臣也’。‘刑不上大夫’这一贵族大夫的特权原则，对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犯罪，特别是‘犯法为逆以成大奸者’，不但处死的事例史不绝书，到后来肉刑也适用于奴隶主贵族了。不论同族异族，一概处列，足见政治犯和列刑已结下了不解之缘。如果弑君，处罚就更重。《礼记·檀弓》‘凡弑君者，杀其人，坏其室，污其宫而瀦焉。’就是说，对杀君的罪人除本身列死处，还要扫穴犁庭，掘地为池。又《大戴礼·本命》：‘逆天地者，罪及五世。’所谓‘逆天地’，就是谋反谋大逆；父死子继为世，五世即五代，也就是一宗，在以五代为亲属范围时，一网打尽了犯人所有的血亲。这成了夏、商、周三代罪责制度最突出的例子，实际是原始社会血族复仇的变种。其苛酷野蛮，莫不如此。从此，政治犯罪的处罚出现了亲属集体责任的先河。”

“与‘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制度相适应，三代对‘不孝罪’、‘不孝不友罪’的处罚是十分严厉的。《吕氏春秋》引《商书》云：‘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传说伊尹放大甲，原因之一就是太甲不明居丧之礼。《周礼》记载：‘凡杀其亲者，焚之’，凡是杀死尊亲者，处以焚刑。统治者把不孝不友罪列为最大最凶恶的罪，主要是害怕‘上下’‘尊卑’的人伦纲常被破坏，进而危及其奴隶主贵族的统治秩序。”

“战国时期的法律，充分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人们哪怕是最轻的政治反抗或违犯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法经》规定：‘盗符者诛，籍其家；盗玺者诛……籍其家及其妻氏’；‘议国法令者诛，籍及家及其妻氏’，‘窥宫者腴’。楚国有一条法律：‘加兵于王尸者’，不仅本人处死，而且罪及三族。商鞅制定的重刑原则中有‘不赦不宥’。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世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对于‘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不管是谁，都要依法治罪，决不赦免或宽宥。当然，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这是不可能真正实行的。”

“秦代对于危害皇帝及其专制统治的行为，处罚是极其严酷的。秦始皇三十六年，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有人在上面刻有‘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即派遣御史追查，由于未能查出作案人，竟下令‘尽取石旁居人诛之’。这件事《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已有明载。对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性犯罪行为，秦律是决不宽容的，以‘三族之罪’而治之。公元前二三八年，长信侯嫪毐发动武装叛乱。叛乱被平定后，始皇依法将嫪毐及卫尉竭等二十名主犯梟首，并车裂以徇，灭其宗，其他从犯分别处以三年徒刑，或夺爵迁蜀。次年，革去叛乱的

另一与谋者吕不韦的相国职位，吕畏罪自杀，其党羽或被驱逐或被夺爵。秦始皇还颁市一道法令：‘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才。籍其门’，借以用高压政策来警戒臣下。秦代无‘罪及五世’的制度，

只有‘夷三族’。《史记·秦本纪》：‘文公廿年，法初有三族之罪’，‘武公三年诛三父而夷三族’。夷三族就是杀三代，秦末李斯、赵高皆因谋反、谋大逆而夷三族。腰斩和列刑，本与夷三族不相联系，纯属二事，但亦不妨同时叛处。李斯夷三族，又处列刑加腰斩，实属刑法

史上所罕有。……”

毛岱钟停歇了一会，梳理了一下思路后接着说：“汉承秦制。汉律也继承了《法经》中‘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的立法原则，凡是以武装斗争或其它方式反对汉朝统治的行为，都被宣布为‘大逆不道’，

‘谋危社稷’，除犯罪者本人腰斩处死以外，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一律弃市（即杀之于市），甚至祖父母也不得幸免。凡有上述罪行，不但处罚严厉，一般还不得赦免。如东汉明帝、冲帝和桓帝的‘赦罪诏’中都规定：‘今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惟谋反大逆，不用此令。’法律对侵犯皇帝权威与尊严者，更是予以严厉镇压。如犯矫制、矫诏罪的，‘矫诏大害’腰斩或弃市，‘矫诏不害’处罚则可从轻。汉武帝时，‘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雷被等，废格明诏，当弃市。’汉律甚至规定议论死去的皇帝也属大不敬。‘高后时，患臣下妄非议先帝宗庙寝园宫，故定著令，敢有擅议者弃市’。汉朝一开始就有夷三族的刑罚，《史记·高祖本纪》：‘汉九年，赵相贯高等谋杀高祖事发觉，夷三族。大约由于家天下意识和杀人淫虐情绪作祟，夷三族尚不足以泄其对犯人的愤恨，竟依秦时处罚李斯时融三族五刑于一炉的先例，制定了新的夷三族令。《汉书·刑法志》：‘汉兴之初，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夷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梟其首，殖其骨

肉于市。其诽谤诬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这种惨虐为怀的

夷三族，曾以彭越、韩信为对象而实行过。高后元年虽曾宣告废除，后来在文帝十七年，新垣平谋逆事发，又再度施行。

“魏国初建，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将‘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犯者‘腰斩，家属从坐’，然而‘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汙渚，或果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既明确了大逆无道的含义，也限定了从坐家属的范围，较汉律精当。尽管如此，对其中的‘谋反大逆’罪处罚甚至还有加重。除夷三族外，还有‘汙渚’、‘梟菹’，汙渚是掘庭成塘，梟菹是悬首示众及骨肉剁成酱。这是原始社会食人复仇时期血族斗争的遗风，亦即君主专制野蛮本质的标志。北魏初期，还有门诛之制，‘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太武帝时，诏诰定律令：‘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梁律规定：‘其谋反，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货财没官’。其刑上及祖父母、父母，下及于子孙，实际上是恢复了罪及五世的古制。北周《大律》仿效周礼与大诰，刻意仿古，‘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北齐以辑为常用死刑，即车裂。对政治犯的处罚，当然是车裂。此外，又以反逆、大逆、叛、不道、不敬等为‘重罪十条’，不在八议之列，显然加重了政治犯的罪责。”

毛岱钟讲道：“隋又置十恶之条，多采后齐之制，但大逆、谋反、谋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实际只杀三代，且是斩首，显较北齐为轻。但到隋炀帝时，‘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辑裂裒首之刑。或磔而射之’。这是法外重刑，恣意酷虐，史无前例。唐律以谋反重于谋大逆，实行大逆与谋反同罚。据《唐律·贼盗律》规定：‘诸谋反及谋大逆者，无分首从皆斩，其父及子十六以上皆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祖、孙、兄、弟、姊、妹，若部曲、资财、田宅，一律没官。伯父及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异同。’对于‘词理不能动众，威力不足以率人’，实际上不能为害的，也不分首从，依律处斩，父、子、母、女、妻、妾并流三千里。甚至‘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而无状可寻者’，亦要流放三千里。总的来看，唐律于政治犯实际是杀三代而波及五世，死只是斩、绞，与常事犯无异。在白纸黑字范围内，尚是历史上对政治犯处罚温和的典型。但应当说明，实际上对谋反、叛逆的镇压，远远超出了法律的规定。如唐末镇压庞勋领导的桂林戍卒起义时，不仅起义军上万人被杀害，而且‘悉捕戍桂林者亲族斩之，死者数千人’。”

“宋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时期。一部宋史，便是农民揭竿而起和朝廷大军剿杀的记录。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法律制度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太宗年间，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眉州王小波、李顺起义，淳化四年来太宗下诏镇压：‘其贼党等，或敢恣凶顽，或辄行抗拒，即尽加杀戮，不得存留’。公元九九六年，即起义失败后的两年，太宗依然心有余悸，惟恐蜀人多变，于是下诏‘川峡诸州民家先藏兵器者，限百日悉送官，匿不以闻者斩’。真宗咸平四年，在乎定刘旻、王均等领导的兵变以后，又诏‘讹言动众者，有司斩以闻’，以对百姓实行严格的政治思想箝制。在对政治犯的刑罚上，宋朝肉刑的复活，附加刑的施行，标志着刑罚威胁主义的加强。《明律》认为：谋反和谋大逆轻重相同。规定凡谋反及大逆者，不仅本人要凌迟处死，其被株连的亲属，包括‘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

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皆斩。’‘十五以下及祖母、母、妻、妾、姊、妹，子之妻妾，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财产没官’。以这样亲属斩及五世，同居包括异姓，均属史无前例的。尤其所谓凌迟处死，就是碎割周身，亦即《尚书·吕刑》所谓‘五虐之刑’。”

毛岱钟继续讲道：“大清律全部援用作为古法典核心的‘十恶’条款，列为政治性犯罪，虽有小注增修，但基本内容不变。所较明律为严的，是清律扩大了反逆罪的范围。如：凡上书奏事犯讳或奏疏不当者，经常加以‘殊属丧心病狂’，‘妄议朝政’等罪名，按大逆律例治罪；将所谓‘倡立邪教传徒、惑众、滋事’列为谋反罪的内容。《附例》中具体规定：凡异姓歃血订盟结拜兄弟者，照谋叛未行律，为首绞监候，为从减一等。若聚众二十人，为首绞决，为从发往烟瘴地带充军。如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者各杖一百。至于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斩决梟示，同谋斩立决，从犯绞监候，被胁同者，各杖一百。此外，为了惩治‘异端’思想，从大清康熙、雍正、乾隆在朝以来，迭兴文字狱百余起，以“大逆”的条例比附定罪。对臣民横加屠戮，株连之广，惩罚之严，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刑律》在预定君主立宪的前提下，规定‘加或将加危害于乘舆车驾，处绞死。’但因旧思想作祟，终于在暂行章程中改绞为斩，以示特殊。还对旧律‘十恶’中的谋反罪进行扩大，规定‘内乱罪’。犯者，首魁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执重要事务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一等有期徒刑；附和随行者，处二至四等有期徒刑。即使‘预备或阴谋’犯此罪，或‘知预备内乱之情而供给兵器、弹药、船舰、钱粮及其它军需品者’，也要处无期徒刑或二等有期徒刑。”

“总之，列朝列代对政治犯罪施行的是严刑峻法。特别是对‘谋反大逆’，‘罪大恶极’的危害朝庭的行为，一律采用‘重罪加重’的刑罚原则，处罚则更重了。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统治所必需。不这样做，帝王的江山社稷就不能永固，王朝便会有覆亡的危险……”

说到这里，毛岱钟的话音戛然而止，像是要给学生留一个回味、思索的余地。他在停顿许久之后，才对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润之，我今天跟你讲这些，除了向你介绍一些法学方面的知识之外，还想告诉你这样的一个事实：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由朝庭制定，为帝王服务，因而绝对公平正直的法律是没有的！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长沙饥民和彭石匠的事太难过，而影响了你的学业和前程。只有学好王法，将来踏上仕途，做一个公正廉明的清官，再秉公执法，为黎民百姓撑腰做主，造福于民，这才是我们读书人要追求的出路啊！……”

毛泽东陷入了沉思之中，连毛岱钟什么时候离开书房回卧室休息的，他也不曾察觉。他的内心像开了锅的水，沸腾翻滚不已。原以为，是因为法不“公”或官不“清”，才造成无数长沙饥民和彭石匠被滥杀的惨剧。听了毛岱钟先生这一席谈，毛泽东似乎清晰地醒悟到，问题并不仅仅如此，皇帝老子才是总根子！自古以来，法自君出，狱自君断，皇帝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无怪乎世人皆称刑法为“王法”！而“王法”的统治锋芒，又主要是“治民”；为了维持统治机构职能的正常运转，严防臣下“犯上”，同时也“治吏”；但却从来没有治君之法。为了维护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它对于像长沙饥民和彭石匠这样的“政治犯”，不管是“民”是“吏”，

动辄处以“夷三族”等极刑，这就造成了苛法酷刑的泛滥，正所谓“苛政猛于虎”啊！既然皇上不以天下为公，而以天下为私，这个为“家天下”所有的法律，有什么学头呢？就是学好了，还不是拿去用来震慑平头苍生？！想到这里，毛泽东对学习法律感到彻底失望了。他终于下定了退学的决心。

31 “故人何处，感慨系之”

1910年春，毛泽东离开了乌龟井私塾，转学到东茅塘毛麓钟先生门下，从而结束了他那重进学堂门之后的读书生活，离别了教他学习王法的“法科生”先生毛岱钟。但是，这段学习经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以致他在数十年后，仍然忆起他的“法科生”老师。

1925年2月，毛泽东回韶山养病，并在家乡组织领导农民运动。毛岱钟以极大的热情协助他昔日的学生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协和反帝爱国组织——雪耻会，开展平粜阻禁等斗争。这年8月下旬，因军阀、湖南省省长赵恒惕派兵追捕，毛泽东在韶山乡亲们的掩护下离开故乡，于10月到达广州，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这时，年富力强的毛岱钟应毛泽东的邀请，和毛泽东的另一位老师李漱清先生一道也来到广州，在宣传部图书室工作，同有关人员一道协助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政治周报》，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宣传，维护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迎来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此后，毛岱钟曾在国民政府任监察委员会专员，直至1937年病逝。

有感于毛岱钟的一生清白，敬佩他的学识和人品，更因他曾为一代伟人毛泽东之师，烈士毛泽覃的妻弟周颂年先生曾撰文刊载于《韶山毛氏四修族谱》，追悼他曰：

裕申韩学，为名律师。

盈庭辩论，剥茧抽丝。

争回公益，传诵于兹。

古滇游幕，铁笔一枝。

青萍结绿，到处见知。

旋官岭表，监察职司。

发抒政见，适所措施。

春花秋月，想望丰姿。

故人何处，感慨系之！

第七章 毛麓钟

——教读“治乱兴衰之书”的府学秀才

师生关系至重也。有孔子，而后有七十二贤；有二程，而后有三十高弟，有朱吕讲学于丽泽，而后金华诸贤哲，后先相继，迭出而不已。

——一位古代教育家的话

32 转学东茅塘

1909年，韶山毛氏家族中唯一的长沙学府秀才毛麓钟，在老家韶山东茅塘开办了一所中西合璧式的私塾，招收韶山冲毛姓族人中文化程度较高的青少年入学。私塾设在东茅塘的面山楼，一共只有十多个学生，但大都是韶山农家子弟中的佼佼者。

毛麓钟的声望和道德文章，在韶山一带是有口皆碑的。毛麓钟派名毛贻训，学名绍芳，字麓钟，号云阁，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祖居韶山冲茅塘屋场。祖父毛兰芳与毛泽东的曾祖父毛祖人（四端）系嫡堂兄弟，是以诗书而振家声的著名士绅，在满清曾任过几县的县丞，既有文才，又善于词令诉讼，乡间遇有重大纠纷无不请其到场得以调解。父亲毛鼎臣有五个儿子，毛福生居长，毛麓钟排行老二，还有寿生、喜生、全生。毛麓钟就是生长在这个三世同堂的大家庭里。他从小在祖父的严格教育和影响下，生活节俭朴素，学习勤奋刻苦，终于在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应考经柯学使甄拔补入郡库。”科举时代称府学为“郡库”，也就是说毛麓钟是长沙府学秀才，据毛字居撰《毛麓钟公传》载：“毛麓钟对于各经史无不揣摩纯熟，诗赋尤极典丽，每试辄冠其首。”据传，他的诗赋，有人抄去背熟，然后去赶考，往往深受考官赞赏，考生多被录取。青年时代的毛麓钟，为了干一番大事业，视国为家，四处飘流，“初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继走武陵，为参军何梅岭之书记。”甲午战争后，因不满清朝政府丧权辱国、腐败无能，愤然辞职回乡，不问政事，闭门隐居，并自诩“韶山小隐人”。

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出于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痛定思痛，毛麓钟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对满清政府的愤慨转而反抗，由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政治态度转而赞成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还主张废科举，兴学堂，开办新学，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坚船利炮，富国强兵，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思想。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政治主张，他一方面联络地方绅士在韶山兴办学校，开启民智；另一方面，他又与族人倡办团练开发民力，武装民众，维护地方治安秩序，以反对军阀混战对乡民的侵扰。

毛麓钟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是五服内堂兄弟，并且家庭关系十分密切。毛泽东的父母，对毛麓钟这位有府学秀才功名的族兄，素来十分敬重。毛泽东初发蒙时，偶有调皮捣蛋，学习不肯用功，他们就常拿这位堂伯作榜样，来教训儿子，指望他能像堂伯那样专心攻读，将来学有所成。由于受父母的影响，毛泽东自幼便格外敬畏毛麓钟。每逢年关，在官衙做幕僚、谋士的毛麓钟回乡，父亲带着他去拜见这位堂伯时，小泽东总是躲在爹爹的身后，用好奇的眼光打量这个穿将校军服、颇有威严的长辈。在他那幼小的心田里，最初的奋斗目标便是——学堂伯的样子，长大做一个文武兼备而受人敬重的人。

毛麓钟辞却军职，回到桑梓之地兴办学堂的消息不胫而走，有钱人家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到他这里就读。就是一些穷人，也因仰慕他的才名，都想方设法让孩子到毛麓钟门下读书。毛麓钟办学本不为衣食之虞，而是图培养人才，报效国家，因之所取学生多是品学优良之

毛麓钟的东茅塘私塾兴办的时候，也就是1909年的秋天，毛泽东在乌龟井的毛岱钟手下读书。听说堂伯回家乡办了学，他十分高兴。看到冲里不少人到东茅塘上学，他心里痒痒的，很想到堂伯门下去进修

几年。可是，这一期的银子已经交给毛麓钟老师了，如果半途而废父亲是不会答应的，他只好暂时放下转学念头，安下心来在乌龟井私塾读了半年书。

转眼间，1910年的旧历年到了，过完“月半”，毛泽东就对父亲说：“爹，我在法科生先生那里读了半年，操练了一点本事；要是再跟‘秀才二伯’去补一补课，将来出去搞事，就越发靠得住了。”

毛貽昌知道毛麓钟见多识广，很有学问，他本人虽说没有做大官、发大财，但人品和学识在韶山冲却是数一数二的。儿子如果能拜师他的门下，的确是个难得的求学机会。再说儿子大了，一般的老师管束不住他。平日里，他最服他“秀才”二伯，放在这位严师手下，家里也放心。经过麓钟大哥的精心栽培，三伢子将来兴许有些出息。想到这些，毛貽昌打算依了儿子的心愿，让他从乌龟井私塾退学，转到东茅塘。于是，他发话，“好吧，先去读半年，看看吧！”

毛泽东一见父亲满口答应，十分欢喜。出了正月，他请父亲到乌龟井辞了学，然后就收拾行李铺盖和文房四宝，转读东茅塘，住到毛麓钟二伯家去了。

33 开学第一课

毛麓钟的家，坐落在韶峰脚下。这里树木葱茏，楠竹青翠，在一片绿荫的掩映下，有一栋不小的瓦房，环境很是清幽。

毛麓钟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他恪守塾师教授生徒的原则，认为“少则工夫有余，精神足用，自然训诲周详，课程无缺；多则师之精力既疲，而工夫亦有所不及，一切皆苟且简率矣。故生徒以少为贵也。”所以，他只收了十来个学生。

正月一过，学生们陆续来到经馆，毛麓钟给他们上了别开生面的第一课——“人，为何而活着？”

毛麓钟直接切题，像是自问又像向学生发问：“我常常思忖：人，为什么活着呢？”“这……？”先生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大问题，同学们一时都未明白过来。

毛麓钟又解释说：“我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到底要做什么呢？”“人，为什么活着？”这真是一个大题目！同学们不知道应怎样回答才好，只好面面相觑。毛麓钟没有等学生回答，接着讲：“我总在想，一个人到世界上来走一趟，是为了什么呢？难道就是为了吃穿二字？就是为了成家立业？为了妻儿老小？”他顿了顿，继续说：“是呀，‘人在世上走，为了身和口’，许多人都这么说，而且也是这样过的。可是，吾辈莘莘学子也能像如此生活着吗？我已年近五旬，多年戎马征战，四处漂泊，一不求高官厚禄，二不为荣华富贵，生平最大的嗜好是置书、读书。这些年来，我每天襄办军务，总要读书至更深夜静。这些书本，引起了我许多的感慨！你们看，史书上、小说里，那些忠臣义士、英雄豪杰，都是十分了不起的风流人物！他们或公正廉明，解民倒悬；或血洒疆场，为国立功；或立一家之言，成百世圣哲。因此，他们名垂青史，辉同日月，为后世的人们所钦佩，所纪念，并且一代又一代地传流着他们的英雄事迹。你们，都是家乡孔门弟子中的佼佼者，是韶山的骄子，当你们在书本中和历代英雄豪杰、圣人先哲会晤、对话的时候，你们将拿什么作见面礼呢？！”

毛麓钟激动了，他向在座的学生们扫了一眼，讲堂里鸦雀无声，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地听着。只见他面色绯红，胸脯起伏，拿起粉笔“刷刷”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的几行字：

“旷观宇宙，竖画天地，前因后果，无一可恃；而可恃者惟在我横画山川。古往今来，一无可恋；而可恋者，惟在目前。目前之事维何？即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激，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树立于世界之林。”

毛麓钟接着讲道：“如今，国家多难，外贼逞凶，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时，黎民百姓沦陷水深火热之中，像尔等七尺男儿，一介书生，正在有为之年，理当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岂能株守家园，无所作为？古人云：‘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依为师所见，雄飞的翅膀就是知识。知识，犹如农民的土地，渔夫的网罟，骑手的骏马，勇士的刀剑……望你们趁大有作为的年纪，认认真真读书，扎扎实实求知，练出一身真本事来！”

谈到读书和求知，毛麓钟告诫学生们，功崇惟志、业广为勤，学习一要有志向，二要勤奋刻苦。他侃侃谈道：

“志向，乃人之灵魂。人不知道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学，就没有目标，

没有动力，好比盲人骑瞎马。志向与理想即主义。人无高尚之主义，即无生活之意义；事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存在之价值；团体无高尚之主义，即无发展之能力。至于勤奋刻苦，则是读书求知的根本。今朝大学问家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采撷宋词三首中的各一句，用来形容读书做学问的三种境界，窃以为极是生动贴切，恰当好处。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调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王国维选择三首词的三句话集来一起，选得很巧，集得很妙，给三句古词注入了新的生命，道出了读书的真谛。古往今来，‘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为了读书求知，谁开始没经历‘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的艰苦探索，最后才能到达‘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佳境呢？这种求得真知灼见的愉悦，豁然开朗的欢乐，不亲身经历由淡到苦、由苦到甜的全过程，是无法真正体会到的。”

毛麓钟认为，学习还要不耻相师、不耻下问。“韩愈的《师说》大家读过吗？韩吏部说得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拿平常的话说就是：生在我前面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比我早，我就向他学习；生在我后面的人，他懂得道理要是比我早，我也要向他学习。我要学习的是道理，哪管他是生在我前或是生在我后呢？所以不论尊卑贵贱，不论年长年幼，谁懂得道理，谁就是我学习的老师。韩愈的见解是相当精辟的，大凡是有学问的人都不以拜师求学为耻。你们都在蒙馆读了《论语》，可否记得书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孔子刚刚做了鲁国小吏的时候，到太庙去助祭。进了太庙，他每件事都向别人请教。祭祀的礼节，他在书本上不是没学过，但是因为没有实际演习过，他还是样样都要问个明白。旁边有人看到他这样，就讥笑说：人了太庙每事问，谁说他是知礼的呢？孔子听了，说：每事问，才正是知礼呢！这个故事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求知要诚心诚意，不耻下问，如果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的度量，是学不到真正的知识的。试想，昂首向天，除了几片浮云之外还能看到什么呢？……”

这堂课，毛麓钟从早饭后一直讲到正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开学第一课给他们的教益太深了，不少道理是他们过去从未听到过的。这一课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是“务虚”的，但它足以使学生们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大家深为能选择到这样一位思想、学识、品格都在上乘的先生感到庆幸，一股对明师的崇敬之情在他们稚嫩的心田里涌动。

无疑，这一课对毛泽东的启迪，远比其他同学要深刻得多。当时他已到了懂事的年龄，老师提出的“人，为什么要活着”的问题，他也曾久久地思考过，可一直未能找到满意而确切的答案。今天，老师和堂伯父把答案给自己找到了——人，并非仅仅为自己而活着，也不是只为一家一姓的“小我”而活着，而是为他人活着，为国家民族和黎民百姓这个“大我”活着。毛泽东思量，既然此身并非一己之私，那么就应该将它奉献给公众，去奋斗、去创造，像历代英雄豪杰那样去追求人生的最高价值。他在心里暗自发誓：为了在此生于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了像毛麓钟先生所言的那样——使祖

国不再因国力羸弱而受列强欺侮，中华民族能够真正“自立于世界之林”，从今往后一定要树立远大志向，勤奋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以图日后效力于国家，服务于民众。

毛麓钟所讲的这开学第一课，给毛泽东留下很深的印象，四十多年后的1959年，阔别故乡三十二载的毛泽东回到韶山，在宴请父老乡亲 and 亲朋故旧的筵席上，他和他的另一位老师毛宇居叙旧时，曾谈起过这段往事。毛泽东说：“那时我能读书，可能是不好好读，后来在家种了两年田，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是的，综观毛泽东早期的读书生活，他真正有目的地自觉刻苦学习，确实是从拜师毛麓钟先生开始。

34 独具匠心苦琢玉

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先生的十余名学生当中，聚集了韶山冲一带最优秀的青少年，这些人中有毛泽东、李耿侯、毛新枚、刘伯庚等，其中毛泽东年龄最大，大得与他的私塾生“身份”有点不相称。但是，却又要数他禀性最聪明，记忆力最强，诗文做得最好。

这些，自然博得了十分爱才的毛麓钟先生的赞赏。多年来，毛麓钟在外面谋生，对家里的情况不甚了了。他只听说，自己的堂弟、上屋场的毛顺生家，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儿子，叫石三伢子；他还听说，这石三伢子是个“调皮王”，在蒙馆专跟先生“造蛋”，把老师都气跑过。可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发现自己的这个侄儿秉性是这么好，读书的天分是这样高！毛麓钟以他特有的眼光认定：自己的这个学生加侄儿极有发展前途，将来在自己所教的学生当中，最有出息的当非他莫属；就是毛氏家族中兴的希望，也将寄托在他的身上。

上述发现，令毛麓钟喜出望外。像他那个时候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受做县丞的父亲的影响，秉承儒家的思想积极入世，将科举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的目标，力图在政治上寻找自己的价值。可是，许多年过去了，仍然功不成名不就。每每思虑至此，他都感到前途黯淡，心灰意冷，曾产生过息影田间、隐居山野的想法。是戊戌维新志士的呐喊，猛然惊醒了他，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使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他回到生身之地韶山，在家乡兴办新学，培养人材。但他没有想到，刚开始授徒，便遇上了毛泽东这样大有造比的学生。这怎不叫他欣喜异常呢？

大概就是打这时候起，毛麓钟先生抱定这么一个心愿：精心教育培养毛泽东，用全部的心血和汗水，去浇灌这棵幼苗，使他长成参天大树；用全部的知识与智慧，去雕琢这块璞石，使之成为价值连城的美玉。

在东茅塘私塾读书时期的毛泽东，经过两年多辍学劳动的磨练，有感于乡间生活的贫乏和读书求知的不易，因而在就学机会夫而复得之后，学习开始由不自觉转向自觉，由天资聪慧转向天分加勤奋。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他每天起五更，睡半夜，手不释卷，格外刻苦用功。

对此，毛麓钟——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但是，他没有嘉勉自己的学生和侄儿，他怕毛泽东这种对于学习的自觉和勤奋，是来自于两年多繁重体力劳动的挤压，它将随着时光的流逝萤火般地一闪而过。为了使这种自觉和勤奋能够持久下去，毛麓钟除经常向毛泽东讲述古人立志成才，以图报效国家民族的大道理外，还以他特有的思维定势，把“大道理”与“小道理”结合起来，不时向毛泽东讲述毛氏家族的兴衰史。希望毛泽东始终保持旺盛的学习热情，为振兴家族而发愤读书。

像许多旧知识分子一样，毛麓钟也是个宗族观念很强的人，他认为使一个家族兴旺发达应该成为全体家族成员的凝聚力，正是靠这种力量使然，家族的成员们才能一代一代地不懈努力奋斗下去。他觉得毛泽东是个悟性极高的毛氏后生，应该让他明白这个事理。所以，他打破惯例，虽然毛泽东尚未成年，仍让他阅览《毛氏族谱》，使之了解毛姓家族的缘起和发展状况，藉以激发他为振兴家门而好好学习。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阅读着由毛麓钟保存的那部本房的《毛氏家谱》，从这部编修于乾隆二年的族谱中，他了解了毛氏的渊源：

知道了毛氏家族的历史后，毛泽东这才明白，老师为什么让自己看那昏

黄的族谱。他恍然悟出：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只有全家人的团结和睦，家庭才能兴旺；只有全体族人的齐心协力，家族才能昌隆，像毛姓这样华夏最古老的氏族才能经千百年而不绝；只有全民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才能够繁荣富强！

懂得这些道理以后，毛泽东就像老师所希望的那样，学习的热情更加旺盛了，读书也更加用功了。

当然，毛麓钟花费心血最多的，还是毛泽东的学习和进步。他除了在课堂教好每一节课外，还十分重视抓好毛泽东的课外学习，悉心指导毛泽东阅读了大量古籍。

我国古代常把图书分成经、史、子、集四个大类：经部，包括历代儒家的经典著作，如《诗经》、《论语》、《孟子》等，以及研究文字音韵的书；史部，包括各种历史、地理、传记等书；子部，包括古代诸子百家学说和科技著作，像农学、医学、天文、历法、算法、艺术等；集部，包括文学的总集和专集等。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毛麓钟按照传统的图书分类方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给他点读历代名家传世之作。

《史记》，是毛麓钟先生给毛泽东点读的第一本史学著作。毛麓钟告诉学生：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可与太史公司马迁相提并论的只有二人，一是与他时代较近的班固，史称“马班”，一是跟他时代较远的司马光，史称“两司马”。历来人们都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班固的《汉书》，是史学界呈鼎立之势的三部大书，故而有读史必读《史记》之说。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花了很大功夫攻读《史记》。这本书使他对中国历朝之事有所了解，并从中懂得了不少兴衰与得失的道理。与此同时，他还按老师要求，阅读了《纲鉴类纂》和《日知录》等书。《纲鉴类纂》是明人王世贞依据朱熹的《通鉴纲目》而编写的一种通俗历史课本，《日知录》则是顾炎武精著之书。毛麓钟先生点读的上述这些书籍，大大地开拓了毛泽东的视野，丰富了他的知识头脑，使之收益颇丰，进而在他世界观的形成阶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毛麓钟酷爱历代著名诗词辞赋，尤其喜爱宋词元曲，往往一时兴起，以手击节，低头吟咏，不能自己。他的这一爱好，自然而然地感染着他的学生。毛麓钟见毛泽东对诗词辞赋产生了极大兴趣，便悉心地教他朗读、背诵，同时教他习诗作赋。

毛麓钟让毛泽东背诵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觉得其诗句虽短，内容却情深意长，读来余音缭绕，回味无穷。

毛麓钟很爱唐代大诗人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认为它反映了古人珍视友情的思想主题，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事，毫无雕琢之态，读起来朗朗上口，很适合青少年学习和模仿。所以，他要毛泽东学习这首诗：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驱儿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觴；
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毛麓钟很喜欢白居易的《长恨歌》：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瓏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尽期！”他赞赏诗中那哀怨动人的故事，悠扬宛转的诗句，还有那给世人留下的谆谆告诫。他将这首长诗亲手抄录给毛泽东，让学生吟咏、揣摩……

由于毛麓钟的严格训练，毛泽东对诗词辞赋的学习进步很快，他不仅熟读了几百首古诗，即使是很生僻的诗句，竟然也能稔熟于心，倒背如流。从南宋“将军诗人”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到陈亮的“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能会”；再到庾信的“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他都能即兴吟唱，信口背诵，毫无差池。据传，他的这种熟读古诗的兴趣和超常的记忆力到老不衰，一直伴他度过一生中轰轰烈烈的最后岁月。

有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话不无道理。正是在东茅塘私塾毛麓钟手下奠定了扎实的古诗词功底，毛泽东才能在日后写下那么多脍炙人口的好诗，并享有“马背上的诗人”和“领袖诗人”的美誉，为他的政治生活赢得了非同凡响的个人魅力。对此，历史是早有定论的。

毛麓钟不但精心给毛泽东点读诗书，而且还教给他怎样去读书求学。老先生是位见过大世面、有一定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不大搞读死书和满堂灌那一套教育方法，而主张让学生们独立思考，清静无为。平时，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走出课堂，来到私塾后面的龙头山上游览踏青，让学生领略大自然的美妙奇观，省悟人生的真谛。在那块被儿时毛泽东叩拜为“干娘”的观音岩下，毛麓钟把自己在外谋职的曲折经历和所见所闻告诉给毛泽东，并向他和同学们介绍祖国的大好山河，教他们热爱名山大川，在美丽的大自然中陶冶性情，养成高尚的情操，广博的胸襟。

为了启发学生把课堂学习与社会联结起来，也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培养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书呆子。毛麓钟结合课堂教学，常向学生讲述古人读千卷书、行万里路，探寻世上万事万物奥秘的事例，灌输学以致用，“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适用”，若不适用“与未尝读书同”的道理。例如，他在给毛泽东点读《史记》和《日知录》时，就曾讲述过司马迁和顾炎武的治学精神，认为他们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提倡实地考察研究，遇事穷源探本，其治学态度堪称一代文人之楷模。毛麓钟对太史公司马迁尤其推崇，要毛泽东多读《史记》，说是“司马迁将其游览四方所得山川浩瀚之气，一以发为文章，故气势奔放，雄视百世。”受老师的影响，毛泽东“迷”上了《史记》和其他史籍，司马迁的文章及其行谊，都使他深为折服、感佩。他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当时读书体会的写照罢。

由于毛麓钟的苦心教诲，毛泽东虽然仅在东茅塘私塾学习了半年时间，可所学的知识比别的同学多得多。毛先生的思想、学识和人品影响着毛泽东，他感到拜师毛麓钟门下身心受益匪浅。这些，毛泽东终生难忘。

35 教读“治乱兴衰之书”

在东茅塘私塾，由于毛泽东学习刻苦认真，又聪明过人，且有超常的理解能力，课堂授课已不能满足他的知识需求量，毛麓钟先生只好经常给他“开小灶”——单独授课。

单独授课讲些什么内容呢？一般的诗书，课堂上已讲过许多篇章，毛泽东在课余时间也自学了不少，毛麓钟不愿再在这方面花费很多功夫。像天下的为人师者都要把“绝活”传给自己最喜爱的门徒一样，他也想把人世间最深奥的道理讲述给毛泽东，把书海中的英华采撷下来传授给这位高足。

这期间，毛麓钟根据自己对毛泽东的期望值，辅导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资治通鉴》、《孙子兵法》和《贞观政要》等书，并进行了细心的讲解。

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治乱兴衰之书”，是仕人必读之节。毛先生教毛泽东这些书，其良苦用心是显而易见的。因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所受的教育，不啻是“中国治乱兴衰之学”的启蒙教育！

毛麓钟多年从军，没有积攒多少家资，却置下为数可观的书籍，其中有不少还是书中的珍品。不过，嗜书如命的他从不轻易拿这些书示人。

可是，有一天，毛麓钟先生却破例地把毛泽东带到了他的书房。

跨进老师那宽敞的书房，看着四周依墙而立的书橱，毛泽东惊异地赞叹道：“哎呀！二伯，你这里书可真多呀！”

“嗯。”毛麓钟点了点头说道：“石三，坐吧！上次，你读了《纲鉴类纂》，有些什么心得呀？”

“二伯，读了这本书，我以为对中国历朝之事有了些了解，也懂得了些兴衰与得失的道理。只是觉得简要了些……”

“嗯，是的！这是一本根据《通鉴纲目》编写的通俗历史读本，自然写得浅简了些。今天，我准备让你再看一本书——”说着，他从一个书橱里抽出一本线装书，递给他的学生。

“《资治通鉴》？”毛泽东看了看书名，欣喜地问。

“是的。这是一部很有名的史书。凡二九四卷，另有《目录》、《考异》各三十卷，所记千余年史事，以政治军事、民族关系等为主，兼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和重要历史人物，而以历代统治的盛衰得失之故为中心。你拿去好好读一读，或许有所裨益。看完后，我还想同你探讨一番呢。”

“好的。二伯！”毛泽东高兴地从小先生手中接过书本，恭恭敬敬地向毛麓钟鞠了一躬，告辞了。

一个多月以后，毛泽东把《资治通鉴》通读完毕，当他把书送还给毛麓钟时，他感到自己多有受益。他心中暗想：如果再同老师谈起历史，自己不至于一无所知了。

当毛麓钟从毛泽东手中接过送还的书籍时，他微笑着对学生说：“书看完了，可不能白看噢。润之，发表些见解吧。”

毛泽东知道老师这是在考自己，就拿了把椅子，直直地坐在毛麓钟面前，虚心地说道：“二伯，对《资治通鉴》，我只能说有一点点了解，还有许多地方不明白呢。让我说，也只能是提问题。”

毛麓钟笑着说：“了解一点点也好嘛。看来是略知一二了。光提问题也行嘛，能提问就是一种提高！”

于是，在毛麓钟那间宽敞的书房里，一场师生间的讨论开始了。

作为学生的毛泽东首先发问：“二伯，《通鉴》是部通史书，为什么叫

‘资治通鉴’呢？”

听到这个提问，毛麓钟的眼睛一亮，显出异常高兴的神情，笑着对毛泽东说：“润之，这个问题提得了，看来你是动了一番脑筋的。《资治通鉴》的书名是宋神宗钦定的，‘资治’就是帮助皇帝治理天下的意思。宋神宗为该书作序曰：‘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之以邪正，要之于治忽，辞令渊源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故赐其书名曰《资治通鉴》，以著朕之志焉耳。’由此看来，这部书叫《资治通鉴》，就是让皇上和臣子们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常常对照自己，从中借鉴成功与失败的例证。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

毛泽东：“二伯，您讲的这个意思我知道了，历史确是一面镜子。可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从有史以来就写，而是从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写起呢？从头写起不是更完整吗？”

毛麓钟：“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是司马光认为发生了一件大事。”

毛泽东：“这一年有什么大事？我学过的历史书上怎么没有讲到呢？”

毛麓钟：“你过去读过的历史教本太简单，怎么能讲得那么细。这一年，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了合法的，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所以，他在书中感慨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据说，大清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而国家还无法治他们，甚至大开方便之门，那天下非乱不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司马光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真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既没有原则，也没有是非，当然非乱不可。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国家也是一样，你上面的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嘛！”

“那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就不再接着写呢？”毛泽东的认真劲上来了，又向老师提出了新的问题。

毛麓钟看到学生大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赞许地笑着对毛泽东说：“嗯，问得好！为什么只写到五代呢？有人说，这是由于宋代自有国史，不依据国史，另编一本有困难。我看这不是主要的。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史上的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千秋功罪，自有后世评说嘛！”

毛麓钟稍稍停了一下，想了想，又接着说：“司马光是一个敢于发表自己看法的人，但在这本书中也许还有言不由衷之苦。你看《通鉴》最后一段写了赵匡胤，说太祖皇帝如何勇敢，如何英明，如何了不得，简直白璧无瑕，十全十美，能全信吗？他这是写北宋的太祖皇帝，能冒犯赵氏天子的龙颜？恐怕也只有说好话，说假话，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个折扣。由此可见，历史书里也有不少不可信的东西，只有待读书的人去思考，去分辨。”

毛泽东：“《资治通鉴》里也写了不少糊涂皇帝，写了不少小皇帝，这些人能怎做万民至尊的皇上呢？真让人不可思议。”

毛麓钟：“中国的皇帝，有的很有作为，有的却很无能，这是没有办法

的事。皇帝是世袭的，只要老子是皇帝，儿子再糊涂也得当皇帝。这也怪不得他，生下来就是皇帝嘛。还有两三岁就当皇帝，当然要闹笑话。他那个皇帝好当，什么事都有人替他办。”

毛泽东：“三岁娃儿当皇帝，怎能办理朝政，岂不荒唐！”

毛麓钟：“中国历史上有三岁的皇帝，但没有过三岁的车夫，十三岁怕也不行。你说当皇帝与拉车哪个更难啊？皇帝不中用，当然大臣们就胡来，就拼命地搜刮老百姓。老百姓不服就要镇压，那方法残酷得很，《通鉴》上就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种刑罚，把人的肚子剖开，拖着犯人的肠子走。暴政到了这种程度，老百姓忍无可忍了，就造反，镇压不下去，一个王朝就灭亡了，一顶王冠就落地了。”

毛泽东：“皇帝糊涂，那些做臣子的呢？难道他们也都是些糊涂虫吗？”

毛麓钟：“那倒不是这样！历朝贤臣良相还是有的，可遇不上明君，也是空有一腔热血，一片忠心。弄不好自己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不算，有的甚至丢了身家性命！所以，他们往往不能‘入世’，则转向‘出世’，或探研老庄哲学，超脱世俗寻求精神上的人格独立；或著书立说，以图青史留名。竖看历史，周文王囚禁姜里作《周易》；孔子困陈蔡写《春秋》，屈原遭放逐赋《离骚》，左丘双目失明授《国语》；孙臆膝盖骨被剜留《兵法》；司马迁处宫刑著《史记》；司马光罢官编《通鉴》……古往今来，有多少传世之作，都是有才气的人在政治上不得志的境遇中写成的。”

“二伯，听您这么说，难道司马光也遇到过挫折？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听老师谈起《通鉴》一书的作者，毛泽东颇感兴趣地问道。

毛麓钟：“是这样的。司马光一生经历两朝人主，他是宋仁宗时的进士，历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中老年阶段近二十年未理政事，临死前又被启用当了宰相，可谓大起大落，坎坎坷坷……

“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最有名的大臣，陕西夏县人。他的名声，从幼小的时候就已传开了。他七岁那年，就开始专心读书。不论是酷暑炎天，还是数九严寒，他总捧着书本不放，有时候连吃饭喝水都忘了。他不但读书用功，而且很机灵。有一次，他和小伙伴们在后院玩耍，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有个小孩爬到缸沿上，一不小心掉进缸里。缸大水深，眼看那孩子快要淹死了。别的孩子一见出了事，吓得一面哭喊，一面跑去找大人求救。司马光没有走开，他急中生智，顺手从地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使尽力气朝水缸砸去。“砰”的一声，水缸砸破了，缸里的水哗哗流了出来，淹在水里的孩子得救了。这件偶然的事件，使幼小的司马光出了名。东京和洛阳有人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泛宣传。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司马光官拜翰林学士。后来，他的好朋友王安石担任宰相，提出变法主张，遭到他的坚决反对。他还以老朋友的资格，写了一封信，责备王安石侵犯其他官员的职权，惹是生非，搜刮财富，还拒不接受别人的意见。王安石写了一封回信。对司马光的四条责难针锋相对地作了反驳。司马光接到回信气得要命。但是，知道王安石有皇帝撑腰，也无可奈何。最后，他辞去朝廷官职，离开京都，到了洛阳……”

“二伯，司马光与王安石既是朋友，又是对头，这是怎么回事呢？”毛泽东打断了毛麓钟的讲述，不解地问。

“这两个人在政治上是对手，王安石激进，司马光保守，王安石要变法，司马光反对；但在学问上，他俩还是好朋友，是互相尊重的。他们尊重的是对方的人品和学问，所存的仅是政治上的分歧，却没有私怨。润之，这就是

古时贤哲的大家风范啦！”毛麓钟顿了顿后，接着说道：“要说司马光，可真是有真学问哩。他辞官不做之后，表示不愿过问政事，关起门来写书了。他对历史很有研究，认为治理国家的人，一定要通晓从古以来的历史，从历史中吸取兴盛、衰亡的经验教训。他又觉得，从上古到五代，历史书实在太多，皇帝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看。于是，他很早就动手编写一本从战国到五代的史书。宋英宗在位的时候，他把一部分稿子献给朝廷，英宗皇帝觉得这本书对巩固王朝统治有好处，十分赞赏这项工作，让他继续编下去。后来，宋神宗即位，司马光又把编好的手稿献给神宗，宋神宗不同意司马光的政治主张，但是对编历史书却很支持。他把自己收藏的二千四百卷书都送给司马光，并专门配备了一个编写机构，要他们协助司马光好好完成这部著作。”

“二伯，听您这么说，《资治通鉴》不是司马光一个人写的呀？”毛泽东大概感到台伙写书很新鲜，所以又好奇地发问。

“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长有三头六臂，也完成不了这么一项大的工程呀！《通鉴》上写上名字的有五人，没署名的还有很多呢。这个写作班子，互相配合，各施所长，一共花了十九年时间，才把这部著作完成。当然，主要是靠司马光，为了写这一部巨大篇幅的著作，他献出了自己从四十八岁到六十余岁的黄金时代。在司马光的主持下，这个编写班子收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除了采用了历代正史之外，还参阅各种历史著作三百多种。这部书按历史年代编写，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到五代时期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据说，成书的时候，原稿足足堆放了两间屋子。”

毛泽东听了老师的介绍，情不自禁地赞叹说：“这真是一部大书！”

“是的，这是一部真正的历史长卷！由于它的材料丰富，剪裁恰当和考证严格，加上文字精练生动，所以成为我国史学上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对于后世研究古代历史，提供了比较完备的资料，也为历朝历代为官者，提供了许多治国安邦的借鉴。”

毛泽东：“二伯，由此看来，人受点打击，遇点挫折，未尝不是好事噢。”

毛麓钟：“是呀，润之！当然，这是对那些有才气又有志向的人而言的。没有这两条，打击一来，不是消沉，便是胡来，甚至去自杀，那就应另当别论。就说司马光吧，他官场失意，如果没有精通历史的才艺，或者说有点才气却没有志向，哪能写出《通鉴》这样的巨著呢？在整整十九年时间里，司马光把全部精力放在这部书上，每天工作到深夜。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十分衰弱，老眼昏花，牙齿大多脱落了，可靠着‘志气’二字支撑，他终于把《通鉴》完成了。由于他在史学方面作出了贡献，他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所以，我以为司马光乃天下读书人的楷模。润之，望你能以古人为榜样，立定一个远大的志向，认准的事一定要办，就是千回百折也要办到底！做学问是要有这种精神的啊……”

师生之间的讨论结束了。毛泽东回到宿舍，已是半夜时分。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里产生了许多遐想：毛麓钟先生难怪懂得那么多深奥的道理，却原来他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从中汲取了知识的营养。书，确是个好东西，它能使人聪明和豁达。特别是读《通鉴》这样的书，能把历朝历代的事串联起来，把历史呈现在眼前，让人从中借鉴到兴衰与得失的定律。毛泽东下决心，一定要像老师那样，熟读史书，穷究国学，将来也做个空前绝后的人！

有人说，历史是现在与过去无休止的对话，历史与现实并不矛盾，历史

是现实的母体。后来的毛泽东，是以反传统而闻名于世的。但是，“反传统”并非就是“反历史”。

自从青少年时期在毛麓钟先生那里读过《资治通鉴》以后，对于中国历史“自幼到老，嗜之不厌”。据说，仅《通鉴》这部书，他就看过十七遍，到老仍爱不释手。1954年冬，他还以赞赏的口吻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是的，毛泽东嗜古成癖，但并不像那些冬烘先生，读死书，或卖弄自己的博学。他是带着批判眼光看待中外古籍的，他看书的目的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以后不久，毛麓钟又教毛泽东阅读了堪称“成功宝典”的著述——《贞观政要》。

距毛泽东那个时代的一千一百多年前，在中国最伟大的皇帝之一——盛唐开创者李世民——逝去几十年之后，一个叫吴兢的唐朝史官，以生动真实、简洁明了的文风，运用对话夹轶事的形式，追记了这位一代天骄的非凡的政绩与生平经验，以及他与他的聪明多谋的大臣们所讨论的种种问题，所进行的多番争议与论辩，从而提出了一整套关于如何治理家国、控制权力、调度人事、平衡利害、驾驭臣僚、考察人心、防备腐败、消除隐患等等的“统治谋略大全”，并将其命名为《贞观政要》。由是，遂使该书成为“中国兴衰治乱之学”的第一经典——自其问世以来，未有哪一个后肚中国皇帝敢不用心拜读之！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功经验之集成，该书亦系“朝野上下必备”、“入世为人必读”之教本。历代，从官僚阶层到草野人士，该书的哲理、教义，格言、名句，俱被反复研讨，广泛援用。

毛泽东怀着教徒读《圣经》一样虔诚的心情，阅读着《贞观政要》。很快地，他就完全被这本书所吸引。

他发觉，《贞观政要》十分独特，它极为朴素平白，却又丰富非常。作为一部忠实的历史文献，它不加修饰地辑录了唐太宗的所说、所为、所想、所感，以及所犯的错误；同样，也不带忌讳地记述了一代名臣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人对唐太宗的规劝、批评甚至指责，以及唐太宗与众大臣之间坦率的讨论与争执。而作为一部政论性的历史读物，它又一反历史传记中通用的编年式的繁琐写法，而对唐太宗的治国经验与思想进行分门别类，共立四十个篇目，多以故事、轶闻等实例为引子，生动有趣、概括集中、清晰明了地进行记叙与评介。这四十个篇目，涉及了权力、体制、政策、人事、品德、欲望、名分、淫乐、竞争、奖惩，灾祥等等内容，十分广泛。其间涉及到的众多唐代名流，俱是十分富有个性。处处形象鲜明，时时妙语横生，每每机智过人。其取譬之机警，举例之巧妙，诘问之尖锐，立论之精辟，尤其令人叹为观止。

毛泽东用了近一个月时间，反复研读了这部传世千载的实用名著。这部书引起了他的许多遐想：唐太宗李世民不愧为是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圣明之君；太宗时的教化，粲然可观，是自古以来未有过的圣明之治。吴兢一区区史官，披览史籍，将太宗垂范后世的典章制度以及诏诰、谏言、奏疏等文献，详加甄录，按照成规，制定体例，写成《贞观政要》，希望执掌国家政权者，

能够遵循前代的历史经验，择善而从。这样，就可以使传之万代的帝业，更加光辉昭著，使已取得的丰功伟绩，更加发展壮大。当年，唐太宗的子孙凭它而获得统治术的精华，继“贞观之治”之后创造了“开元之治”，把唐朝的繁荣和昌盛推向顶峰。由此看来，《贞观政要》真可谓古今治理国家的第一教科书。这时，毛泽东联想起《史记·陈涉世家》中陈胜吴广起义时说过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来，如果“学而优则仕”这条人生之路走得通的话，自己将来要称雄，要治国，要创业，要守成，依然离不开《贞观政要》这本古今通用的治乱兴衰之学大全……

这部书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后他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一师范图书馆，又反复地研读了它。甚至在他后来居住的地方——中南海菊香书房的藏书中，这部书也是他居家自备、供随时取阅的读物之一。书中关于君道政体和治国安邦的立论，诸如：“明君与昏君之别”、“草创与守成熟难”、“居安思危”、“反对‘一言堂’”、“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治国犹如栽树”、“人主严明，臣下畏法”、“知心者智，自知者明”、“防微杜渐”等等，他都能熟记于心，有的还在他数十年的政治舞台上得到了挥洒自如的应用和发挥，从而使这一古老的历史文化遗产成古今相传、恒久适用的政治学、社会管理学精义。

像任何事物都有二重性一样，毛泽东的那些古书，是他的知识宝库，是他后来指导革命、待人处世的教科书，然而，书中许多的古训，以及大唐皇帝和文臣武将“治国平天下”的韬晦、谋略、策略，也成了他处理党内斗争、对待“反对派”的“法宝”。

“一呼百应，山摇地动”，从小喜欢当“大王”的毛泽东虽然在青年时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夺取了政权，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而站起来的毛泽东，不是神仙，不是圣明，几十年来中国封建文化的沉淀，潜移默化在他的灵魂深处，加上他除了接待外宾外，很少与国外的新思想新事物接触，使他过去受的孔孟等封建教育，时有暴露，这不能不说是毛泽东的悲剧！

毛麓钟给毛泽东单独讲授的第三本书，是我国最古老并有极高科学价值的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诞生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中外军事学术史上久负盛名的一本兵书。它总结了我国古代战争的经验，揭示了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战争规律，包含着丰富的唯物论思想和辩证观点，是伟大祖国文化宝库中一份珍贵的遗产。早在毛泽东出生前的一百多年，日、法、英、俄、越等国就有译本问世，在世界兵坛上被誉为“兵经”，“第一部战略著作”。

中国素称文武合一之国，自古以来就把孙子、吴子、六韬、三略等兵法，视为“以武治国，以文修德之枢要”，并将“兵法”与武艺加以区别——前者泛指理念性的，即军事谋略，后者则指个别技术性武功，可见“兵法”涵义极广。《战国策·秦策》有“兵法之数”一语，《汉书·平帝纪》也有“明兵法”之句。这就是说，历代兵法，不论是太平或战时，都是属于仕人所必习的。《论语》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道德经》也说：“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孙子也说：“令之以文，齐之以武”。这些都是主张文武兼备的，可惜人总难免要偏向一边。偏于文则弱，偏于武则爆。唯有文武合一方能如车之双轮，又如手足之左右，临机应变而发挥表里为用的效果。

鉴于这样，毛麓钟认为：文武两全的人，必然是钻研学问，具备教养，

掌握原理，并经修炼而穷极奥义，臻于无我之境界的。总之，必定是向着人格之形成与人之完成这一目标努力不歇的。因此，他要求毛泽东在熟读经史的同时，必须精通兵书，努力做一个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人。

毛麓钟饱读诗书，又出身行武，《孙子兵法》是他喜好最甚、研习最精的书籍之一。由于多年攻读、揣摩，他已深谙书中要义，在许多方面还形成了独到的见解。这样，这部兵书自然是他向他最喜爱的学生传授的必读教材；同时他讲解这本书也是轻车熟路，得心应手，十分精到。于是，在布置毛泽东通读完兵法十二篇之后，他专门花了十多个晚上，分“概说”、“孙子其人其事”、“十三篇详解”、“战法与计谋”等几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详尽的讲解。在讲解中，毛麓钟结合自己十多年行军作战的亲身经历和战斗实例，向毛泽东阐明了《孙子兵法》中的许多著名观点。譬如：“兵者，诡道也”和“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的计策观；“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的战争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侦察观；“三军之亲，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宝”的用间观等等。还有“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的作战原则；“避实击虚”、“守其所必攻”、“攻其所不守”、“攻其所必救”、“形人而无形”的指挥艺术；“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战争谋略；“以治待乱，以静待哗”、“以近待远，以逸待劳，以饱待饥”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其中不少军事论述，毛泽东遵照老师的要求，将它们当作格言和口诀背诵，并熟记于心。

古老的兵书，赋予了毛泽东一种尚武精神。从此时研习《孙子兵法》，聆听老师传授治军为将之道开始，到1917年《体育之研究》一文提出“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到1929年的“战地黄花分外香”，再到1961年《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他的尚武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他的至理名言。

毛泽东采撷、品尝了《孙子兵法》这一中国乃至世界的兵学奇葩结出的累累硕果，汲取了它丰富的军事知识营养，为他在日后打碎旧世界、建设新天地的战斗中，准备了无与伦比的身手！

回顾毛泽东后来数十年征战的历程，他运用古老兵书的成功范例，真可谓不胜枚举。三十年代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围剿”，蒋介石出动兵力十万，第二次二十万，第三次三十万。毛泽东率领红军，以远比敌人微弱得多的军事力量，取得了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虽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红军中留有深刻的影响，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仍然战胜了蒋介石五十万大军的进犯。

人们不禁要问：毛泽东是靠什么取胜的呢？回答是：除了靠“第一因素”——人的因素——一支愿意为穷人打天下的英勇红军队伍外，再就是制定了一整套适合于红色武装割据中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又是毛泽东将中国共产党人自1927年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的经验与古老的中国兵法“嫁接”的产物。请看，毛泽东自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后的这一时期亲自制

定的一系列军事方针大计——口号：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十六个字的方针，亦称“十六字诀”，它与蒋介石的“分进合击、长驱直入、外线作战、猛进猛打”的“十六字方针”针锋相对。）；政策：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战略战术：“诱敌深入，围而攻之，各个击破，乘退追歼”、“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打走”、“声东击西”、“阻击战”、“运动战”、“突袭”、“围魏救赵”、“预伏”……孙子的种种战法无所不用其极。

毛泽东把古老的兵法，这种独创性的东方军事艺术理论，一旦与人民战争的光辉实践相结合，必然会产生游击战和运动战这样的英明创见，并必将发挥出巨大无比的威力，令一切敌人，望风披靡。这正应验了两千多年前孙子的话：“凡正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读“治乱兴衰之书”，毛泽东日后果未辜负老师的一片苦心，终于创立了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古代封建帝王要大得多的文治武功。此时早已长眠九泉之下的毛麓钟如有知——他的希望之花已结出成功之果，将会有何等高兴啊？！

36 力举润之出乡关

韶光易去，岁月如流。过了桃红柳绿的早春二月，过了杜鹃漫山竞妍的清明时节，又到了荷花出水的六月炎天……半年的时光瞬息即逝。经过短暂半年时间的相处，毛麓钟先生深感：韶山冲这小小的山村，已藏不住将展翅的雄鹰；东茅塘这区区的斗室，已容不下毛泽东那伟岸的身躯。他想推荐毛泽东到外面的“洋学堂”去读书。恰好在这时发生的一件事，更加促使他这样做。——不然，一株可望茁壮成长为栋梁之材的小树苗，将会因缺少阳光雨露的滋润而枯死！

1910年夏，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硬是要毛泽东辍学在家种田、记帐，后来又叫他到银田寺镇自己开设的店铺里当学徒，学习做生意。对此，毛泽东坚决反对，要求继续读书，遭到专横的父亲的责骂和追打，只好跑出家门到东茅塘找伯父和老师毛麓钟告状、诉苦。毛麓钟见这聪慧的后生满脸委屈的样子，连忙向他询问个中情由。待毛泽东把情况告诉他后，这位一向温文尔雅的秀才激动了、愤慨了！他为自己的学生和侄儿而激动——人小志大，不效燕雀安居屋檐而学鸿鹄志在广阔蓝天，不图富足而安贫贱，不甘愚昧而向往文明；他气自己的堂弟——为了让儿子弃学经商，去追逐钱财这些身外之物，竟不惜以断送儿子的锦绣前程为筹码！于是，毛麓钟把毛泽东留宿在家里，二人进行了彻夜的交谈，商量了对策。

毛泽东第二天回家后，依堂伯父和老师的计策行事。在母亲文七妹的支持下，他“编导”了一场“为求学计‘赚’父亲”的好戏：自己到唐家屯去请两位舅父和二位表兄，堂伯父则出面邀请堂兄加塾师毛宇居、李家屋场的新派读书人李漱清先生等人，在家里设了“鸿门宴”，联手做父亲毛贻昌的说服工作——

这一天，毛母文七妹让人清早到铺子里买了肉，让长工在南岸塘里打了鱼，还专门请了厨子来家办菜。毛泽东只对父亲说：“爹，今天家里有客来，你老不要出去啦。”毛贻昌心想：你人细鬼大，搞这大的场面，问都不问我一声，看你搞出什么鬼来。也就忍着没做声。等上午九十点钟，客人陆续来了——舅舅、姑父、姨父和亲房叔伯，以及韶山冲里几位体面的读书人。两桌客，堆盆大碗，猜拳喝酒，好不热闹。

酒过三巡，毛泽东站起身来，给客人们斟了酒，也给父亲倒了满满的一杯，然后高高地举起酒杯，向大家敬了一杯酒。喝毕，他躬身拱手说：“今天动了舅舅、姑父、姨父、伯伯、叔叔，以及各位长辈的大驾，我爹也在这里。我有句话要当着各位长辈的面讲，我今年说大不算大，可说小也不小，十五六的人了。如今人在世上要想做点事，非多念点书不行。乡间呢？先生说我要读的书都读过了。要读深读透，还是到湘潭、湘乡的洋学堂里去。我看我家日子还过得去，送我去城里读书的钱还有。故此，今天我就当着各位长辈的面，正式向爹提出，要到湘乡出名的东山学堂去读书。”毛泽东的话一出口，他父亲心里在打算盘：我伢子鬼主意还不坏，有点用。只是到湘乡去读书，每年要花不少银子。

毛宇居见堂叔沉吟，连忙赔笑打了个“头炮”，说：“堂叔，昨天他到我那里接客，我听他谈起诗书学问，果然是大有进益了，又有满腹的爱国心，关心着国计民生，颇有见地。依侄的愚见，还是莫荒废他的学业，让他继续深造为好。叔，你的意见呢？”

毛贻昌没有吱声，却见李漱清放下酒杯，他那黧黑而清瘦的脸上泛起了

红晕，激动地说：“顺生哥！不是我讲奉承话，润之确实是绝顶聪明。我读了一世的书，他只用了几年的功夫就全看完了，而且很有自己的见解。顺生哥，我劝你答应他出去，莫埋没了济世英才。”

毛贻昌装作没有听清楚，提起筷子，请客人吃菜，想搪塞过去。心里却在思量：呵！原来你们是串通一气早就谋划好了的！哼！我才不上当哩。如今国运衰微，比不得太平年月，自从五洋闹中华，到处开起了商埠口岸，做生意算是最有出息的了。读书有什么好？两位舅子读了几年“子曰”，还不是捏起锄头翻黄土？你宇居，漱清二先生满肚子经纶，还不是穷途潦倒，两袖清风？想到这里，他开腔了：“你们列位快莫夸奖他了，他还是个细伢子，不懂天高地厚。我都给他安排好，明天就动身。到湘潭裕盛米店去做事。”

听了他那封口的口气，大家都有点急了。毛麓钟更急，他求援地望了毛泽东的两个舅舅一眼。八舅文玉钦会意，连忙站起来说：“姑爷！你这着棋走得不好哩！润之不喜欢学生意，你硬要霸蛮，也是学不进去的。依我之见，不如送他再读几年书，目前虽说皇上废除了科举，前程总还是有的。如果能在衙门里找个差使，得个一官半职，那个还敢欺侮你？还记得去年夏天的事么？”

旧事重提，又深深刺痛了毛贻昌的心。他明白这就是指那桩“柴山败诉案”。对这件事，毛贻昌真不愿意让人提起，他感到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窝囊的一件事。为此，他憋了几个月的闷气，至今提起还有点隐隐作痛呢？有时，他真指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官吏，自己当老太爷，何愁人欺负。可是，润之喜欢着“杂书”，如今又想读“洋书”，那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想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说：“列位都是好心。有道是：父愿子成龙。他能有点出息，我还不乐意？只是恨铁不成钢，只怕他读不进去了，搞成个文不文，武不武的，那可就耽误了他一世的事哩！”

“那不会的！”一直很少讲后的毛麓钟，这时终于站起来讲话了，他大声说道：“这个嘛，我可以担保。润之天资聪慧，英才早发，‘四书’、‘五经’很有根底，再到外面去闯一闯，增长一点新鲜知识，学习些仕途经济，那就会大有出息。那时候，不止在我们这个小小的韶山冲，就是在湘潭县，在湖南省里，也是难得的人材哩！”

这时，请来的客人个个都站起来帮毛泽东说话，有的称赞毛泽东有胆量、有见识、好主意；有人搬出古今中外读书好处的话，如“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等等，来劝毛贻昌。

听了众人的话，毛贻昌的心开始活动了。特别是堂兄毛麓钟这位“秀才爷”的意见，他更是很看重的。他俩从小在一起长大，互相信赖，无所不谈，毛贻昌深知自己这位堂兄的秉性，他是轻易不向人求情的，如今他也出面为儿子讲话，自是一番美意，只怕石三真有点出息呢！他想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却这许多亲友的面子为好。最后，他笑着对客人们说：“列位都是好心好意，我领列位的情！既然你们做了一半的主，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这事就按列位的意思来定吧！”

毛麓钟见毛贻昌终于答应让堂侄毛泽东读书，高兴地笑了。

1910年秋，毛泽东踏上了去湘乡东山学校的崎岖山道。在告别故乡、告别亲人的时候，他怀着依依惜别的激动心情，改写了毛麓钟教给他的那首由一个叫西乡隆盛的日本将领所写的七言诗送给父亲，以表达自己此去他乡谋

求大业的宏愿。诗曰：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泽东在他的老师的指点和帮助下，终于冲破了家庭的束缚，离开了风气闭塞的韶山冲，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雄伟抱负，走进了一个广阔的新天地。

37 造福桑梓

在送学生和侄儿毛泽东走出韶山冲，奔向外面的世界以后，毛麓钟老师，自己也顺应历史发展的滚滚洪流，毅然踏上了一条向旧世界公开宣战的道路。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不久，革命果实被袁世凯篡夺，接着军阀混战，全国人民奋起讨袁。毛麓钟对时局十分关心，对袁世凯的窃国行径异常愤慨，遂与毛宇居、毛国翘等人一道参加了蔡锷将军领导的云南讨袁起义军，在蔡锷所属将领何海清部下担任文书，为护法护国转战云南、四川、广东、广西诸省，备受征战之劳。不久，引疾而归。

毛麓钟回乡后，仍然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他不顾年老体弱，拖着伤病之身四乡奔走，为兴建一所新式的学校向韶山一带的士绅，地主集资筹款。经过他和毛简臣两位先生一年多时间的筹划，韶山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正规学校——毛氏族校，终于在1921年秋诞生了。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韶山学校”的前身，从创办的时候起就一直是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1925年初春至仲秋，毛泽东偕夫人杨开慧回韶山开展农民运动时，曾利用毛氏族校课堂开办农民夜校，这是湖南乃至全国办得最早的农民夜校。抗战时期，毛氏族校是韶山一带宣传抗日救亡的中心，是地下党组织革命活动的掩蔽部。中共地下党员刘伯庚、邹祖培、孙卓、毛远耀、毛亮生等，先后以毛氏族校教师的身份为掩护，成立“小学教师联谊会”，从事革命活动。彭德怀的弟弟彭金华曾在这里传达过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毛泽东曾写信给这里教书的堂侄毛特夫，希望他很好地利用学校讲台，宣传抗日救亡，组织群众斗争。这期间，中共韶山支部在学校办起了“农村小型图书室”，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理论，学生中涌现了许多革命积极分子，如毛华初、毛振南、毛一青、毛楚雄等，毛华初和毛楚雄后来被送往延安学习。1949年，人民政府接管了毛氏族校，改名为韶山乡第三村校。1952年，国家拨款旧币十二亿元，兴建新校舍。毛泽东对故乡这所由他老师亲手创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表现出了特殊的喜爱和重视，1953年5月，学校新建校舍竣工时，他亲笔题写了“韶山学校”的校名，它至今仍镶嵌在学校的门楼上。1959年6月间，毛泽东在回故乡的短暂三天时光中，曾特地来到韶山学校看望师生，详细地询问学校规模、师生学习和生活情况，接受了少先队员敬献的红领巾，永远留下了那张被诗人臧克家称之为“仿佛听得见笑声的照片”——领袖和师生的合影照。从那时起，学校把这一天作为校庆日……

毛麓钟在他的暮年，给韶山人留下了一所学校——这传播知识的摇篮后，终于在1921年底去世了。据他的儿子，原湖南省委顾问毛泽普回忆：毛麓钟崇尚教育、尊重知识，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志愿至死未渝。他在临终前，还拉住老伴的手嘱托道：“一定要送儿子读书，丢了书本子我死不瞑目！”

38 “铁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今天，在毛泽东“百年祭”的日子里，当人们讴歌毛泽东的文治武功的时候，当那些跨世纪的莘莘学子们叹服毛泽东那作为领袖人物所具备的巨大个人魅力的时候，笔者忘不了要提醒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位伟人的那些老师们，是他们——老师，给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划破旧社会黑暗天幕的利剑、建功立业的臂力和雄飞冲天的翅膀——知识。

更应该给毛麓钟这位老先生树碑立传。

他，不仅给少年毛泽东的血肉之躯内注入了尚武精神和教给了他治国之道，同时还给了毛泽东穷究“国学”（中国古典经籍）、深研诗词辞赋的浓烈兴趣。这两者在毛泽东那轰轰烈烈的一生中孰轻孰重？对他那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的形成，哪个更有裨益？人们很难判定。文韬武略，好比他的左右手，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顺天应时，交互使用，书就了一幅惊天动地的历史画卷。人们在崇拜作为伟大政治家、卓越战略家和杰出军事家的毛泽东时，往往更津津乐道他那思想家的睿智、哲学家的精辟思辨和文人学者的横溢才气。尤其是对于他集卓有成效的政论家、文学家、诗人和书法家于一身的奇迹，人们更是颇感神秘和不可思议，一种对天才的深深崇拜感便油然而生。

“铁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它是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给丁玲的《临江仙》一词中，对这位女作家的赞语。一枝笔可以当得三千枝毛瑟枪，笔杆子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可是，当今中国能用笔作刀枪的又真正有几人呢？恐怕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代表”了吧。作为中国的国民，人们忘不了——毛泽东曾用如椽巨笔写下了“雄文四卷”，同时也在一张白纸上“绘”出了一个崭新的中国；而作为历史的一个小小的片断，人们更加记忆犹新的是，他曾以一阕《沁园春》词轰动国民党“陪都”，誉满山城重庆，在“国统区”引发了一股《沁园春》“热”，从此他诗名与人名一同远播海内外……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昔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就是毛泽东作于1936年2月东征途中，1945年赴重庆谈判时书赠给著名民主人士柳亚子的《沁园春·雪》。

……经过漫长的八年抗战，中国人民终于把入侵我国的日本侵略者赶走了。祖国、人民被日寇蹂躏了八年，满身留下战争的创伤。抗战胜利以后，中国人民渴望祖国和平，统一、民主，渴望能安定地生活。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人心，愿意与国民党进行和谈，筹组联合政府。就在这样的“大气候”下，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的陪同下，乘飞机从延安飞抵重庆。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和平谈判亲赴重庆，成为“陪都”的一大政治新闻。各界人士对这次和谈都寄予厚望。以忧国忧民著称而颇为好事的文化人更是奔走相告。毛泽东的故旧及一些社会名流纷纷前往他的住地拜访。就在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先生来看望他。柳先生先呈诗一首：“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称颂毛泽东亲临龙潭虎穴的“弥天大勇”，如“霖雨苍生”，为的是拯民于水火，登民于衽席。同时，他还提出索要毛泽

东的诗稿。9月6日，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去沙坪坝柳先生寓所回拜。在10月7日，毛泽东致柳亚子一信，送上自己手书《沁园春》咏雪旧作一阕，不料却在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文化中心重庆引起一场《沁园春》热。

柳亚子先生得到毛泽东的祠稿之后，自己也诗兴勃发，步原韵和一阕：
念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醉，余意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痛无双国土，绝代妖烧。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可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意浓情细细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热心的柳亚子先生把毛泽东书赠的《沁园春》与自己的和作传扬出去了。几经传抄，重庆《新民报晚刊》在1945年11月14日把这两首词一起发表了。一时使得政治气氛十分紧张的山城平添上几分风雅。隔了数日，重庆《大公报》又把这两首词转载在新闻版上，便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尽管有的是出自于对毛泽东那过人胆识和盖世才情的惊叹，有的则是受当时的“和谈大潮”所裹胁、推涌。《大公报》在刊出毛泽东和柳亚子两词后的不几天，就发表了王芸生的抨击性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但这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另一种景况是，各报纷纷刊登毛泽东词的应和之作，文化界立即形成一股唱和风潮，使得尖锐的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表现出风雅化。

当时，重庆《扫荡报》首先刊出了署名易君左的一阕步毛泽东《雪》原韵的《沁园春》和作。易的和作如下：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益高？神明胄，忍支离破碎，葬送妖娆。黄金难储阿娇，住冶态妖容学折腰。看大漠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的和作，忧国忧民之情如泣如诉，盼望和平统一之心若隐若现，警世醒人之意溢于言表，词人的忧患意识表现得淋漓尽致。易君左还呼吁天下词人，闻风兴起。

或许是由于响应易君左的呼吁，或许是一种巧合；诗人们或者是出于自身兴趣，也或者是出于对毛泽东《沁园春·雪》的倾倒，继柳亚子、易君左的和作刊出之后，步毛泽东《雪》原韵填写《沁园春》一时成为时髦。重庆各报上，排日刊载，热闹非常。仅重庆一地就有十余种报刊连续发表了步韵、唱和之作与评论文章，真可谓舆论沸腾，人心所向。

此后，国民党政府从重庆迁往南京后，南京、上海的文人诗家不分左中右派，还继续发表和作或著文品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当时的著名诗人文豪郭沫若等人，都曾填过《沁园春》。他在柳亚子发表“和词”匝月之时，先在《新民报晚刊》副刊上发表了第一首“和词”，随后又发表了第二首“和词”。郭沫若这两首诗是这样的：

国步艰难，寒暑相推，风雨所飘。叹九夷入寇，神州鼎沸；八年抗战，血浪天滔。遍野哀鸣，排空鸣鹏，海洋仇深日样高。和平到，望肃清敌伪，除鲜苛娆。西方彼美多娇，振千仞金衣裹细腰。把残钢废铁，前输外寇；飞机大炮，后引中骚。一手遮天，神圣付托，欲把生民力尽雕。堪笑甚，学狙

公茅赋，四暮三朝。

说甚帝王，道甚英雄，皮相轻飘。看古今成败，片言狱折；恭宽信敏，无器民滔。岂等沛风？还殊易水，气度雍容格调高。开生面，是堂堂大雅，谢绝妖娆。传声鹦鹉翻娇，又款摆扬州闲话腰。道红船荡载，王师大捷；黄巾再起，蛾贼群骚。嗟尔能言，不离飞鸟，朽木之村未可雕。何足道！纵漫天迷雾，无损晴朝。

《沁园春》风靡文化圈，引起了社会服务行业的注意。当时，成都的一家颇有文化眼光的酒店老板，竟挂出了“沁园春”的招牌，并在酒店内的墙壁上书写《沁园春》百阙，一时传为佳话。1946年2月，重庆发生校场口事件，中共从延安派黄齐生先生为代表前往重庆慰问受伤人士。据说，在沈钧儒住所举行的一次宴会上，黄齐生曾出示一首自己步毛泽东《雪》原韵填的《沁园春》词，传供众览。黄词云：

是有天缘，握别红岩，意气飘飘。忆郭舍联欢，君嗟负负；衡门痛饮，我慨滔滔。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兮愁船不高？分明甚，彼褒姒笑，只解妖娆。何曾宋子真娇？偏作势装腔惯扭腰！看羊胃羊头，满坑满谷；密探密捕，横扰横骄。天道好还，物极必反，朽木凭他怎样雕？安排定，看居嬖父，走马来朝。

如果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属于怀述之作，抒发情怀，讴歌大自然的壮美，那么黄齐生的这阙《沁园春》倒真的属于政治诗词了。“民主如船，民权如水，水涨兮愁船不高？”把民主与民权比喻为船与水之间因涨使高的关系，的确很富有哲理。……

有人曾把《沁园春》在知识界卷起的“热”与国共两党、蒋介石与毛泽东两人的胜败联系起来，认为这个多少有点偶然的事情，竟使蒋介石在毛泽东面前败下阵来。此言虽不无偏颇，但若仅就个人魅力的政治作用而言，并非无稽之谈。抗战胜利之后，重庆和谈及后来“双十协定”被撕毁后，中国前途的抉择，不仅只取决于国共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也不仅仅取决于国共两党政治力量的对比，而最终取决于人心所向；人民群众要通过两支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去了解、选择他们各自的事业，因而，也体现在两党最高领袖的个人魅力之间的较量。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过去对毛泽东所知甚少，大多以为他不过是草莽英雄。甚至还有人相信红军过贵池时在茅台酒池里洗脚的谣传。《沁园春·雪》中所体现出来的博大的胸襟、宏伟的气魄、敏捷的才思和俊逸的文采，不得不令文化人震惊与敬佩。多么符合圣与王融为一体的人格理想！治国平天下不寄托、倚重于这样的“风流人物”还去何求？！相比之下，那个身着戎装、神情冷峻的“蒋委员长”，倒酷似“只识弯弓射大雕”的一介武夫。当知识分子为毛泽东的词所倾倒，纷纷提笔唱和时，这种中国文人式的对话，已经流露出文化人的价值取向或选择意向。这种心理上的倾斜，实际上已经不自觉地为他们日后他们在政治上接受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奠定了文化和心理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的这枝笔不是胜过三千毛瑟枪吗？

从这个意义上广而推之，毛泽东的老师给他的难道说不是通向成功之路的膂力、利剑和翅膀吗？

第八章 李元甫：

——爱才惜才的洋学堂堂长

是老师，把一个个文盲扶上文明的台阶，

只因有了老师，我们才有了这文明的世界。

所以我要说，世上最值得颂扬的，除母亲之外，还有老师。

——作者随想

39 东山学堂的来客

湘乡县城的东门叫做望春门。城门外，有一溜长长的麻石阶梯。沿着阶梯下去，就是涟水河渡口。从这里摆渡过河，再走两三里路，就是有名的东山书院。

东山书院座落在东台山下。东台山是一座海拔约二三百米的圆锥形小山，山上树木葱茏，风景幽雅，山尖上有两座并排耸立的七层宝塔，那尖尖的塔顶，插进湛蓝的晴空，别有一番诗情画意；离山脚不远，有一片房屋，重檐敞阁，雕梁画栋，就像是一座很大的寺庙，显得古朴庄重；周围有一道很长的圆形青砖高墙，墙头花树掩映，竹林扶疏；院墙外面紧紧环绕着一个七八丈宽的园池，园池两岸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一座装有矮栏杆的小木桥横跨在园池上面，成为进出书院的必由之路；黄昏时，圆锥形的东台山和山上尖尖的宝塔，倒映在环绕书院的园池里，显得格外幽静而美丽；富丽堂皇的书院建筑包围在清澈的园池之中，就好似出水芙蓉，在银色的水面上摇曳。难怪有人称这里为“莲花屋场”，真是名不虚传。

1910年秋日里的一天，年仅十七岁的毛泽东，告别父母和弟妹，离开了韶山冲，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湘乡县东山“洋学堂”。

此时此刻，毛泽东站在高高的围墙下面，迎面望去——一扇黑漆大门，门顶上悬着一块红漆金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东山书院”；大门旁边，挂着一块新制的竖牌子，黑底红字，写的是：“湘乡县公立东山高等小学堂”。真是大地方，大书院，大气派！毛泽东心中不由暗自赞叹。

毛泽东正要跨进学校大门，门房里走出一位青衣小帽、白净脸皮的中年人，他是东山学堂的看门人。看门人打量了一下毛泽东，询问说：“是来干什么的？你是不是帮哪位相公挑行李来的？你家相公来了没有？”听了看门人的问话，毛泽东心中涌起几分不快，但他还是礼貌地上前打了一个躬，微笑着说：“我是从湘潭来的考生，劳烦您通报一声，让我进去考试。”这次看门人认真打量了毛泽东一番，看到他那身装束和那副行李，脸上露出明显的鄙夷之色。他冷冷地对毛泽东说：“快点回去吧，这里早就考过了。再说，我们湘乡的高等学堂，怎么会收你们湘潭人做学生呢！”正在这时，从学堂里走出几个十五六岁的青年，他们一个个穿著整洁潇洒，举止儒雅风流。前面那个穿白色湘芸纱长衫的青年学生，听了看门人的话，斜着眼睛向毛泽东投来了一瞥：“哼，土包子！土包子也想进洋学堂，真是乱弹琴！”其他几个随声附和：“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乡巴佬也要读高等学堂！”“唉，放牛伢子也进了‘莲花屋场’，我真要为东山书院一哭！”

受到看门人的冷遇和过几个青年学生的嘲弄，毛泽东气愤异常！在韶山，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庇护，何曾体验过这种被人瞧不起的心境？！他真想一走了之。可是，这次来东山学堂求学读书，花费了好多的周折，父母、老师和亲友寄予了多少的厚望啊……

毛泽东不由想起众亲友做父亲思想工作的情景来。那天，被他请到家里的娘舅、表兄和老师们都替他讲情。大家众口一辞，劝他父来说，润之聪明，会读书，如果让他上洋学堂，将来会有大造化。执拗的父亲，终于同意了让他到东山学堂去上学读书。

与家人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半，太阳刚出山的时候，毛泽东挑起行李，走出家门。父亲、母亲和泽民、泽覃、泽建，都送到了塘岸上。母亲一双眼睛红红的，反复叮咛着说：“石三伢子，一个人出门

在外，要晓得招呼自己，天气凉了，要多加点衣服，莫受了风寒……”泽民弟特别懂事，他昨天连夜精心地赶打了一双苎麻凉鞋，悄悄地挂在哥哥的行李担上。泽覃和泽建还小，都默默地站着，深情地望着大哥。父亲嘱咐着儿子：“石三，要好生念书，莫贪玩。”他那平素极严峻的脸上，今天也流露出了依依惜别的神情……看到这些，毛泽东心头一热，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长到十七岁，除了到外婆和姨妈家以外，还很少离开过韶山上屋场。如今，他要到五十里外的湘乡县城去，过着独立的求学生活。想到这里，心里头也很不好受，禁不住涌起了一股说不出的离别愁绪。可是，一想到国家的多难，民生的疾苦，他又觉得应义无反顾地离开这闭塞的山村，去见大世面，学新知识，长真才干，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他挥手告别了亲人，告别了韶山，大步朝山外走去。猛抬头，只见巍峨的韶峰，屹立在面前。阳光格外耀眼，松林更加苍翠，湛蓝的晴空，明净得像是用泉水洗过的一样，一只矫健的雄鹰，展开翅膀，自由地飞向远方……

“好不容易来到了东山学堂，决不能就这么空着回去！”毛泽东打断了无边的思绪，自己对自己说。眼看太阳落山了，飞鸟归巢了，他只好耐着性子向看门人求情，想见一见管事的先生。可是，看门人还是不搭理。

毛泽东本来就生就一身“虎气”，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怕人、服输。看门人的无礼行为，激怒了他，他不再理睬他了，挑起行李，径直闯进那道黑漆大门。看门人急了，连忙将他拦住。于是，一个要进去，一个不让进，相持不下，不可开交。

40 破格录取“建国材”

东山学堂以一种颇不礼貌的方式，迎接着他的新学子的到来。

这时，从学堂里走出一位约摸四十来岁的先生，只见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浓黑的八字胡，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很精干、严谨。他往门口一站，看门人就连声喊他“堂长”。毛泽东这才明白：这位先生就是李元甫，是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堂长。学生们还按照从前书院里的习惯，尊称他为“监督”。

毛泽东早就听在这里念过书的表哥王季范说过，李元甫是个维新派，思想比较开明，热心教育事业，在湘乡学界很有名气，倒是一位好人。于是，就放下担子，给李元甫行了一个礼，然后讲明了来意。李元甫仔细看了看他的仪容和打扮，看了看他身边的那担行李，稍为踌躇了一下，就说：“好吧，考期是过了，不过，你要是有真才实学，也可以考虑录取。”说着，走进门房，在条桌前坐下来，取出纸笔，写下了“言志”这个题目，交给毛泽东，对他说：“你先做篇文章看看，再填一张履历表，明天早晨交给我。”说完，又对看门人交待：“你帮这位相公安排个安静地方，准备文房四宝，再给他一盏美孚洋油台灯。”

李元甫走后，看门人按照他的吩咐，给毛泽东拿来了油灯和纸笔墨砚。毛泽东坐在门房的条桌面前，面对李元甫所命的《言志》试题，聚精会神地思索着。忽然，脑际中便闪现出离开家乡时给父亲题诗立誓的情景，是的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以身报国。自己离开父母兄弟，离别故乡，走出大山，投考这“洋学堂”，不就是为了学一身硬本领，将来好报效国家民族吗？！想到这些，毛泽东不禁豪气顿生。于是，他直抒胸臆，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个人志向与国家命运联在一起，他一边想着国弱民穷的现实，一边挥毫，一篇文章一气呵成。

李元甫接到看门人送来的考卷后，先是被那工整清秀的蝇头小楷所吸引，当他看完文章的内容时，那高远深邃的立论，华美典丽的词藻，纵横捭阖的笔法，令他兴奋不已。他捋着八字胡子，连声称赞：“好啊！好啊！”接着，立即叫杂役去下通知，把管事的先生们请到监督室来。他高兴地对大家说：“各位先生，我告诉你们一件大喜事，我们东山学堂，今天发现一位建国的栋梁材！”说着，李元甫就拿起了毛泽东那篇《言志》的文章，大声朗读起来，真是气势磅礴，余音绕梁。先生们听了，也赞不绝口。一些先生主张马上录取这位考生。可是，一看考生填写的《学生履历表》，又犯难了。那表格是这样填的：“毛泽东，号咏芝，字润之，湘潭韶山人。”

问题就出在这里！原来这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前身，是有名的东山书院，进了这个书院，就是秀才底子了，官家每月补贴二两银子，让他们读书。改成学堂以后，也还是地主豪绅培养自己子弟的地方，学费和膳宿费有相当可观的津贴。因此，它不能让外县人沾光。现在，考生毛泽东是湘潭人氏，又没有特殊的背景，沿例是不该录取的。有个姓张的经学教员，反对得最为激烈，因为他是东山书院的一名董事，在湘乡县里还有点权势，有些教员看到他持否定态度，就只好明确表态；有的干脆和他站在一起，反对录取外县学生。于是，围绕录取还是不录取，展开了一场争论，争论双方各持己见，一时难得统一看法。李元甫只好请国文教师谭咏春出去一趟，让他在学校读书的儿子谭世瑛，先把毛泽东安排在西后斋休息。

紧接着，十几位管事先生又继续开会，争吵到深夜，一盏洋油都熬干了，

但由于张教员坚决反对，仍不能作出录取毛泽东的决定。最后，堂长李元甫气得捶桌子，愤愤地说：“中国学生可以到外国去留学，湘潭人反倒不准到湘乡来读书，这真是海内奇谈！”说着，他向校董事会摊牌：如果不录取毛泽东这样的旷世英才，他就辞去堂长的职务。谭咏春和贺岚光两位先生也坚决表示，如果张先生故意从中作梗，他们也将自请辞退。其他先生见李元甫和谭、贺二先生的态度强硬，也都同意打破惯例，录取毛泽东。张先生见众怒难犯，也只好无可奈何地松口了。

次日下午，学监正式通知，破格录取毛泽东为东山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编在戊班，也就是第五班学习。

于是，毛泽东缴纳了一百四十个铜元，作为五个月的膳宿费和学杂费，正式成为这所新式学堂里的一员。从这一天起，他这个韶山冲里的农家子弟，终于跨进了湘乡县的“洋学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41 爱才惜才护才

李元甫是一位十分爱才的学堂堂长。他常常说：“学校是培养人材的场所，教师的天职是发现人材，培养人材。因此，对那些学生中人品、学识拔尖者，学校一定要精心培养，加倍爱惜！”

从毛泽东到达东山的那一天起，李元甫就特别关注起这个“尖子”学生了，那篇入学考卷《言志》，他到现在还没有忘记。入学后写的一些文章，他也在百忙之中从任课先生那里调来看了，他从心里喜欢毛泽东的文采，尤其是那忧国忧民的宏伟抱负。他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看错，破格录取了毛泽东这么一位建国之材。从此，他处处爱护毛泽东这个人材。

在老家韶山，毛泽东家境小康，加上他人极聪明，会读书，点子多，有组织能力，因而在私塾里是同学们公认的“头”。可是，在这东山学堂他是外乡人，又初来乍到，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富家子弟，把他看作“乡巴佬”，常常奚落他。面对这较大的反差，他感到怅然若失，心情很是压抑苦闷。

“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多孩子聚在一起。他们大多是地主的孩子，穿的是值钱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供得起他们的孩子上这样的学校。我穿得比其他人寒酸，我只有一套还算过得去的衣裤。学生不穿长袍，只有教员才穿，‘假洋鬼子’则穿西服。很多富家的同学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穿着破旧的衣服。”

“我不受欢迎也因为我不是湘乡人。是不是湘乡人很重要，而来自湘乡的哪个地方也很要紧。湘乡分成上、中、下三部分，上湘乡与下湘乡械斗不断，纯粹是地域观念作怪。双方互不相让。我在这场争端中采取中立，因为我是外乡人，结果三个地区的学生都歧视我，我心情很郁闷。”后来，毛泽东曾这样回忆当时的境遇。

李元甫对东山学堂的学生状况是很了解的：不少学生依仗家庭权势，在学校不学无术，却要逞强好胜，欺侮那些家境贫寒和生性老实本分的学生。他早想扭转这种坏风气，怎奈是一介寒儒，势单力薄，难以如愿。这次，他从国文教师谭咏春这里了解到毛泽东因受某些纨绔子弟歧视而心情抑郁的情况时，再也按捺不住了！一天，他在学生早上点名的时候训示道：

“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唯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学堂教育之要项，乃是任人为贤，唯才是举，力戒任人为亲。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育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切勿夜郎自大……”

李元甫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东山学堂师生当中引起强烈反响。绝大多数同学从堂长的高度评价中了解了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深深为之钦佩；原来一些歧视毛泽东的人，听了李堂长的训示，有的改变了态度，有的也不得不有所收敛。

就这样，在李元甫堂长的鼎力帮助下，毛泽东有了一个比较舒心的学习环境，广泛涉猎国文、算术、经学、修身、历史、地理、音乐、自然、图画等各科知识。在这些学科当中，他尤其喜欢国文、历史和地理。通过时祖国历史和地理的学习，毛泽东大大地打开了眼界，他感到自己的胸怀顿为开阔起来。他深为祖国有辽阔的疆土和悠久的历史而自豪，又深为有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等曾经使祖国威震寰宇的人物而振奋；但同时，也深为鸦片战争后，祖国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发奋学

习。

由于在学习上的自觉和勤勉，毛泽东的各科学业，在全校学生中相当突出，特别是国文成绩更是拔尖的。他的作文，如《言志》、《宋襄公论》和《救国图存论》等，被老师赞扬为“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的好文章，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因而，他的文章全校闻名，真正成了“文章魁首”。

堂长李元甫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常在学生早晚点名的时候，向大家讲一些中国日益贫弱，迭遭列强侵略和侮辱的情况，启发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听了李元甫的讲话，毛泽东心情更加沉重，他感觉到要救国救民，光读“死书”还不行，还要钻研“天下国家之要事”。从此，他除学习文化课外，十分关心时事政治。

东山学堂有一个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毛泽东很快地就成了这里的常客。这时他最爱读的是《新民丛报》，最喜欢康、梁文章。

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维新变法时期的进步思潮。但是，它这时早已失去原有的进步意义，孙中山倡导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已成为当时的主要潮流。然而，刚刚从偏僻山村出来的毛泽东，对康梁知之甚少，对孙中山就更不了解。所以当他一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感到十分新鲜，从而康、梁也就成为他心目中崇拜的人物。康、梁宣扬的变法图强的主张，对毛泽东来说，仍然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梁启超“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极大的兴趣，特别是他的文章中凝结的一腔救国救民的激情，更令毛泽东十分感动。因此，对康、梁的文章，毛泽东是爱不释手，捧读了一遍又一遍，许多章节都能背诵下来，并时常写出心得和批语。例如，毛泽东在阅读过的《新民丛报》上，曾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正式而立者，立宪之国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不以正式而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由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通过这段批语，人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深切赞同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也充分说明了康梁对他早期思想的深刻影响。

毛泽东不仅喜欢康梁文章的思想内容，对康梁文体也很推崇。在李元甫和国文老师谭咏春的支持下，他效仿“康梁体”做起文章来。可是，这件事给他带来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麻烦，又是李元甫堂长出于爱护人才的至诚，公开出面保护他，给了他公道，才使他得以继续安心

学习。

原来，经学教员张某，是一个抱残守缺、思想陈旧的人，在毛泽

东投考东山学堂时，就曾以他不是湘乡人为理由反对录取他。后来是

堂长李元甫、教员谭咏春、贺岚光等人的据理力争，才将毛泽东破格

录取。毛泽东入学以后，张教员对他或多或少地抱有一些成见。毛泽东性格沉静、不苟言笑，洒脱不羁，他视之为恃才傲物，不尊师长；毛泽东装束俭朴、不修边幅，他认为是仪表不整，不拘小节；毛泽东年龄较大，有些科目如算术、图画、生物等底子较薄，而对国文、历史和地理等课很感兴趣，

成绩也很突出，这些则被他斥之为“偏废”、“一条腿”，评判为“名列后榜”。毛泽东看“过激”书刊，效康梁文体，更加触怒了他。他认为毛泽东的文章“一窍不通”，不但没有加圈加评，连断句的标点也不打，篇篇作文都打二十分——不及格！

李元甫知道这一情况以后，感觉到这不仅仅是先生对学生的态度问题，而且是事关学校的教学风气和办学方向的大问题，张先生作为师表，却压制学生探求新知、接收进步思想的积极性，学校哪有民主自由的学习空气，岂不成了封建专制的牢笼！于是，他对一些师生公开表示了自己对此事的态度：“毛生润之的文章我都看过了，是写得很好的，他思想前进，文笔泼辣，给八九十分都不为过分。另外嘛，康梁体的文章也是可以学的……”

从此，东山高等小学堂的教学风气，来了一个大转变。谭咏春老师得到李元甫堂长的应允，在课堂里开讲康梁文体；贺岚光老师开讲了毛泽东喜爱的《饮冰室文集》；学堂里到处都在讲维新，甚至还有宣传民主和自由的，也有讲博爱和平等的；曾留学日本的肖先生，甚至在课堂上讲起了“洋文”《泰西五十轶事》和《天方夜谭》。霎时间，东山学堂活跃起来了。毛泽东和同学们，都很高兴，觉得现在才真像一个洋学堂了……

毛泽东从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中，从《新民丛报》及其他维新书刊中，吸收了资产阶级的文化，这对他幼年学过的孔孟之道是一个否定；康梁的“君主立宪”主张，对于他原有的“皇权至尊”的思想烙印，也是一个否定；康梁变法图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他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启蒙，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因此，毛泽东由崇拜孔夫子到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这是他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巨大进步。这个进步的内在原因，就是他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而外在原因，则无疑是李元甫这位开明的学堂堂长，创办了一个可让学生自由自在地读书的“洋学堂”，营造了一个能使学生探讨学问、交流思想的宽松环境，从而使毛泽东得以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

42 “为国育材，应有一木支三厦”

东山学堂，是湖南最早兴办起来的新式学堂之一。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起》中曾提出：“湘乡改东山书院之举，又继之以起，趋向亦渐变矣。”这说明，它早在戊戌变法时，就已经很有名气了。

为了办好这所新式学堂，李元甫倾注了自己的许多心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排除各种干扰，打破陈规陋习，摸索了一套培养人才、教育人才的办学方略。

他认为：“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小学。小学者，教育之奠基，固陶铸文明之国民，造就富强之中国之渊泉也。”因此，东山学堂的教育宗旨与教育方针，学制年限与课程设置，师资的配备和招生制度等，都是“以造就于社会合格之人材”为目的。

李元甫从多年的教学实验中悟出这么一个道理：学校的职能是教育和培养学生，而学校办得如何，同校长、教员的素质如何关系很大。因之，在他任东山学堂堂氏期间，他聘用了一批热心教育事业、愿意为之奋斗，并在湘乡教育界享有很高声誉的教职员。其中，有曾游学四方，学识丰富的贺岚光先生；有刚直不阿，正直善良的谭咏春先生；有留学日本，思想先进的肖先生；还有诚实方正，宁折不弯的王季范先生……

清朝末年，正处于新旧交替的社会历史时期。教育界，一方面保留着封建社会的古老教育形式——私塾和书院；一方面又掀起了废科举兴学堂的维新潮流。李元甫主事东山学堂后，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将旧时文人读经的古老书院，改建成一所新式的学校，它开设的课程也一扫过去仅有经学课的单调枯燥之风，除国文、算术、历史外，增设修身、地理、物理以及体操、音乐、图画等新科目。这些新科目，对于一些像毛泽东这样热烈追求新知识的青年学生来说，自然感到非常新鲜，引起他们学习的极大兴趣，大大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

在教学设施上，东山学堂有宽敞明亮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购置了大量的教学仪器，仅从日本买回的物理、化学仪器，就花费了二千两雪花银子；学校建有“藏书楼”，收藏着许多中外书刊，供学生阅览。

此外，李元甫在当时那个历史条件下，以他特有的胆识，为师生创造了一个自由宽松的教学环境，如学校订购了《新民丛报》等反映维新变法进步思潮的书刊，允许学生阅读被列为禁书的梁启超所著《饮冰室文集》和《西游记》、《水浒传》等杂书，支持教师在课堂上开讲康梁的文章，鼓励毛泽东等学生仿效康梁文体作文……这一切，对毛泽东来说，起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自此，他产生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深深忧虑和报效国家民族的决心；也就是在一时期，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叫“子任”的别名，即“以天下为己任”的意思。就是说，他决心要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在李元甫的关怀下，毛泽东虽只在东山学堂学习了半年，却大大地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爱国主义思想也更加强烈了。看到毛泽东成绩优良，而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另外年纪也不小了，为了他能够更快地成长，李元甫打算推荐毛泽东到省城去深造。一天，李元甫和谭咏春两人把毛泽东叫到办公室，就毛泽东继续学习的事，专门和他谈了一次话。李元甫对他说：“润之，你现在的国文、历史和地理，已经到了中学程度，其他课目，也比同学们优良，不宜再读小学堂了，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毛泽东说出了他的忧虑：“想是想去，只是在省城长沙我人地生疏，举目无亲，怕不肯收；

再说长沙米珠薪桂，怕家里没有钱，供养不起！”李元甫安慰他：“不要紧，长沙有个湘乡驻省中学，是我们湘乡会馆办的，收费很低。成绩特别优良的，还可以吃公费，我和谭先生都有朋友在那里，推荐你去读书，不会有困难的！”毛泽东高兴地说：“谢谢先生关照！等放寒假的时候，我回家和父母商量一下，一定到长沙去念书。”

第二年春，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了东台山下的莲花屋场。临行前，李元甫先生给他写了一封推荐信，然后和谭咏春先生一道，把毛泽东送到了高高的围墙外。

就这样，毛泽东通过李元甫的引荐，同应聘到长沙任教的贺岚光先生一道来到省城，顺利地考取了长沙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李元甫先生也辞却了东山学堂堂长职务，到湘乡驻省中学担任学监。在这里，他时常向师生们介绍毛泽东在东山学堂读书的情况，夸奖毛泽东“是珍奇瑰异之才，为三代以下仅见之选。”言语之中，流露出他对毛泽东这个人才的器重和珍惜……

……四十多年后，毛泽东成了中国这个有几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他身居首都北京城，日理万机，异常辛劳。可是，他没有忘记仅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堂堂，没有忘记当年的良师益友。

在建国初期，国事异常繁忙的情况下，他仍亲自给“东山学校”写了校名，还写信问候过去的师友，接他们到北京游览、参观。他的同班同学谭咏春先生的儿子谭世瑛，是1955年去北京的。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把谭接进中南海。老同学见面，格外亲切，四十年前的求学生活，又一一呈现在眼前。讲起到东山学堂读书和效仿“康梁体”文章，讲起李元甫等老师，毛泽东顿时生出许多感慨来，他客观地回顾说：“是的！那一年，我是‘土包子’进了洋学堂，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那时候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有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一样，都有一个学习走路的阶段……李元甫堂长，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啊！”

谭世瑛告诉毛泽东：他父亲和李元甫先生已经逝世了。李堂长在去世的前夕，曾经作过一幅对联，作为对他一生从事教育生涯的总结：

为国育才，应有一木支三厦

齐家教子，不及三葛在南阳

毛泽东听了，感触很深，在铺着青砖的房间里，来回地走动，把这幅自勉联，轻声念了好几遍。接着，他深情地说：“是呀！李元甫先生，贺岚光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材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们能够这样关心一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呢！现在应该好办得多了。我希望所有办教育的人，都注意爱惜人材……”

第九章 谭咏春

——爱生如子的级主任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
利于行耳。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
秋登其实。讲论文章，
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

——见《颜氏家训·勉学》

43 东台山的述说……

东台山，这座巍巍耸立在东山学校背后的历史见证

人，将永远无声述说着毛泽东和他的班主任老师谭咏春之间的那份非同寻常的师生情谊……

如前所述，毛泽东颇费周折，好不容易说服父亲应允，来到了东山学堂。经过考试，他的成绩不错，可因为是外县人，差点被拒之门外。多亏了李元甫堂长和谭咏春，贺岚光二先生出面为他说话，才被学堂董事会勉强录取。谭咏春先生批阅过毛泽东的作文试卷，很着重毛泽东的才情，便请求李堂长把毛泽东编在他担任级主任的戊班——按今天的话说就是五班就读。就这样，毛泽东正式成了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第五班的一名学生

东山学堂，不愧是一所新式学校，这里背靠巍峨苍翠的东台山，面临清澈明净的涟水河，左右是一展平阳的稻田，环境秀美、幽静，是读书习文的理想去处。学校采取多学科式的课程设置，除经学外，还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音乐、图画、体操以及进行道德品行教育的修身课；各个班级实行“级主任制”，由国文教师担任级主任，全权负责学生的学习、生活、操行和其他班务活动。

初来东山小学，毛泽东人地两生。在韶山冲，毛泽东称得上是富家子弟，他在家玩耍是“孩子王”，在私塾读书是“学生头”；可在东山学堂读书的，多是一些比他家更有钱有势的人家的孩子，他们当中有些人沾上浓厚的纨绔子弟气味，根本瞧不起毛泽东这个身穿灰土布长褂，口音难听，年龄那么大才读小学的外乡人。毛泽东此时的心境是凄寂悲凉的。倒是谭咏春，这位爱生如子的先生、可敬的级主任，给了他许多关怀和照顾，给了他父辈般的温暖，使他这位远离亲人的少年那颗孤独的心，得以慰藉。这些真诚而无私的帮助，让毛泽东感动一辈子。

毛泽东首先遇到的难题是睡觉的事。他在离家时，只带有一床打着补丁的旧棉被，必须找一个同学“搭伙”睡。可是，由于他穿着朴素，又是山里人，在那些出身官宦和豪绅之家的同学眼里，他是个十足的“土包子”，没有人愿意和他一起睡。谭咏春很喜欢毛泽东这位作风朴实无华，才华出类拔萃的学生，为了不让他受委屈，谭先生让自己的儿子谭世瑛从家里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睡一个铺。谭世瑛在毛泽东进东山学堂的第一天就和他打过交道，对这位举止端庄持重，性情沉稳的同学颇有好感，所以很乐意跟毛泽东在一起。从此，他俩朝夕相处，建立了兄弟般的情谊。白天，他们在一个教室学文习字，切磋学术；夜里，他们盖一床被子睡觉，亲如手足；课余时间，他俩漫游徜徉在学堂周围的青山碧水之间，涟水河畔、东台山上，留下了他们的无数身影。看到他们两人那亲密无间的样子，有的教员半开玩笑半是羡慕地对谭咏春说：“谭先生，你收下了一个好学生，谭师娘可添了一个好小子啊！……”

先生们的话，并非都是戏言。事实上，谭咏春夫妇俩对待毛泽东这个来自外乡的学生，的确倾注了父母般的感情，付出了一片爱心。

毛泽东的身体从小很瘦弱，十二岁那年他害了一场大病后，就显得更单薄了。虽然在辍学的两年多时间内，经过体力劳动的磨练，他身体强壮了许多；但到东山学堂后，他在生活上突然失去了母亲的精心照料，营养又跟不上，所以经常闹病。对此，谭咏春看在眼里，急在心头。除了请医送药和耐心照护外，还经常嘱咐老伴做一些可口的饭菜，让儿子谭世瑛带给毛泽东，

帮助毛泽东改善生活，恢复体力，以保证他不辍学，不旷课，不耽搁正常的学习。

据谭世瑛回忆，1910年的冬天，毛泽东曾身患感冒，并因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病情十分危急。当时，“校董”张教员让谭咏春去通知毛泽东的家人把他领回去诊治，谭先生担心这样会延误治疗时间，便请人绑了一架竹床，把毛泽东连夜抬到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用西医西药给他进行了治疗，使他很快便脱离了危险。此后，谭咏春父子又把毛泽东接回到家中，端汤送药，精心照料，一直到他病愈恢复健康，又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之中。

44 传授交友之道

在东山，毛泽东的思想情绪曾发生过较大波动。昔日在家乡，作为殷实人家的公子，得到的多是赞赏、羡慕和爱护；可在东山学堂这些富家子弟面前，他第一次体验到受人歧视的心境，感到很是寂寞和抑郁，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常常困扰着他。

在那段日子里，为了使毛泽东从孤独愁苦的心境中很快解脱出来，投入正常的学习生活之中，谭咏春叮嘱儿子谭世瑛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带着毛泽东外出游玩，以便让他开心；还在节假日请毛泽东到家里做客，让谭师母做些好吃的给他改善伙食，同时趁机做他的开导工作，规劝毛泽东克服孤僻的毛病，鼓励他主动到同学们当中去找朋友、找友

谊。

为了让毛泽东这个涉世未深的农家少年，真正懂得友谊与人生和事业的关系，知道怎样去交结志同道合的朋友，谭咏春经常向他介绍历代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不断灌输交友之道，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

谭咏春教导学生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连鸟儿的啼鸣，也是寻求伙伴而发出的声音，更何况万物灵长的人呢？可见交朋结友对于人类是何等的重要啊！”

“但是，怎样识别朋友、选择朋友和与朋友交往呢？这却有大学问。历代贤哲对此有过诸多论述。”谭咏春引经据典，谈了他对古人关于择友标准的领悟。《论语》：“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朱子：“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过者，益友也；其谄媚轻薄，傲慢褻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谭咏春解释说，这都是教世人去交怎样的朋友。那些忠厚老实、正直诚信的人，博学多闻的人，还有那些能够指出你的过错的人，方可当作好朋友交往；而那些爱奉承、表面很亲善、很柔顺的人，能说会道、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人，以及傲慢无礼，教唆人去作恶的人，则是坏朋友，应该疏远绝交。

可是，好坏朋友并不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这就要看你拿什么作择友标准。《战国策》：“以财交者，财尽而交绝；以色交者，华落而爱渝。”隋人王通说，“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太史公也说：“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因之，古之君子，重神交而贵道合，正所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故而《孟子》又有“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之语。

谭咏春指出：古人强调谨慎交友，《礼记》：“君子慎其所与人者”，晋人葛洪说：“详交者不失人，泛交者多后悔”。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

古人看到了朋友之间的相互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之道，犹素之白也。染以朱，则赤；染以蓝，则青。《礼记》说：“与君子游，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小人游，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荀子》说得更形象，“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故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和君子交朋友，就像进到栽培有灵芝、兰草的房子里一样，时间长了闻不出它的香味，因为他自己已成香的了；和小人在一起，就像走进鱼市一样，时间一长就闻不出它的臭味，因为他自己也成臭的了。蓬草生长在麻中间，不用扶它自然就长成直的；白沙放在黑泥中，就会和涅一样黑。兰槐虽然说是香草，如果浸泡在臭水里，君子不接近它，普通人也不佩戴它。并非它的本质不好，而是由于它在臭水里浸泡的缘故。所以君子居住一定要选择好的村落，交游一定要接近有学问、有道德的人，这是因为要防止歪门邪道而接近正道的缘故。鉴于这些情况，要判明自己交往的是益友还是损友，就先要对对方进行接触了解。君子先择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择。不知其人，则不与为友。

“交朋友是双向的，不光你挑拣别人，别人也要看你怎么样。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自己品质不好，是交不到好朋友的，所以自己一定要过得硬。”谭咏春告诫毛泽东，待朋友，首要的是真诚，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别人，知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做到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要乐于助人，不损人利己。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要讲信用，重友情，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不以荣辱定交情，就像贺兰进明所言：“人之结交在始终，莫为升沉中路分”。此外，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周以重，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

谭咏春反复强调学生注意，凡与人相交，切不可求一时亲热。一个人容易表现出高兴，也一定会容易发怒，只有那些遵循礼仪、表现恭敬的人，不表现自己、也不讨好别人的人，才会长相交。因而古人崇尚“淡而可久”。君子之交谈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先淡后浓，先疏后密，先远后近，是为交友之道。

末了，谭咏春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的长处比照你的短处，发现别人的毛病用以警戒你自己的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取得长进啊！”

为了使毛泽东交上有益的朋友，谭咏春特地把他的另外两名高足萧子升（萧瑜）、萧子璋（萧三）兄弟也接到家中来，介绍他们与毛泽东见面认识。以后，他们经常在一起交谈学习心得，互相传观作文，交换阅读书籍，逐渐有了较深的友谊。

其中，最令毛泽东难以忘怀的，是他找萧三借阅《世界英雄豪杰传》的事。

有一天，毛泽东看见萧三手里拿着一本书，便迎上去问道：“你拿的是什么书？”“《世界英雄豪杰传》。”萧三答道。“借给我读一读吧！”毛泽东接过萧三手中的这本新书。

该书是关于欧美近代史上一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扼要地叙述了拿破仑、

彼得大帝、惠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华盛顿、叶卡捷琳娜等世界名人的事迹。对这本书，毛泽东读得非常认真仔细，许多地方都用毛笔打上了圈圈点点，还写下了不少感想。在还书时，他对萧三抱歉地说：“对不起，我把你的书弄脏了。”萧三把书打开一看，真有些哭笑不得——几乎整册书都布满了朱青二色的圈圈点点。在记述拿破仑、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女皇、惠灵顿、卢梭、孟德斯鸠、林肯、华盛顿等人生平事迹的篇章里，除了红道道、黑框框外，在书中的空白处，还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批语。

毛泽东把书还给萧三以后，也不看好友的表情，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阅读这本书的感想来：

“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求富国强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朝鲜、印度的覆辙。你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顾炎武说得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积弱不振，要使它富强、独立起来，要花很长的时间，但是时间长不要紧。你看，华盛顿经过八年战争之后，才取得胜利，建立了美国，我们也要准备长期奋斗！”

值得一提的是，在谭咏春老师的影响下，萧氏二兄弟打破了地域的界限，终于同毛泽东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哥哥萧子升后来因政见的不同，和毛泽东分道扬镳，做了蒋介石政府的农业部次长。弟弟萧三走上了一条与哥哥截然不同的道路，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斗争，用手中的笔讴歌正义的革命事业，撰写老同学毛泽东的生平传记，成为著名的红色作家、诗人和中共内部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这位同毛泽东小学时候同过学，师范学校同过学，一起参加“新民学会”，一道在北京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后来又在延安共事的文人，作为毛泽东的老朋友，同他保持了一生一世的友谊。

更值得一提的是，东山学堂求学时期的毛泽东，在谭咏春等老师的引导下，开始明白了友谊对于人生、理想与事业的辅助作用，懂得了对友情的珍视。友谊，是人生社会本性的绝妙写照。如果没有友谊，一个喧闹的社会便如同一片旷野，一座城市就好比一片沙漠，一个人则只是这旷野和沙漠中的一只小羊。老师的谆谆教导，终使毛泽东省悟到这一切。从此，他在同朋友的交往中找回了青春年华的欢快，怡然的生活气息扫除了他心头的阴霾，他变得活泼、开朗、豁达起来。就像一位哲人所说的那样：友谊不但能使人走出暴风骤雨的感情世界而进入和风细雨的春天，而且使人摆脱黑暗混乱的胡思乱想而走入光明与理性的思考。是的，孤傲的毛泽东变了，他变成了一位极其重视友谊的赤诚男子，并从友谊中获益匪浅。

在东山，在长沙，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聚集在良师周围的优秀同学。他们当中有东山学堂的同学萧三兄弟和谭世瑛；有湖南省一中的罗章龙；还有第一师范学校众多的学生精英，其中有中共最著名的理论家蔡和森、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向警予、早期工运领袖李立三、郭亮、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北伐时牺牲在许昌城下的北伐军将领蒋先云、科学家李振翩、史学家李平心、文学家周谷城，还有李维汉、蔡畅、夏曦、贺昌、罗学瓚、张昆弟、易礼容、张国基、周世钊……这些人中有的和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有的同毛泽东并肩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后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协助他治

国安民。

当然，在毛泽东的众多朋友当中，也有的因志趣不同，最终未能和他走在一条路上。然而，当友谊与真理发生背反的时候，他也只好忍痛割爱了，尽管割得有些过分，甚至不近情理。但随即，他又会去寻求新的友谊。

这便是毛泽东，那个有着独特感情世界的毛泽东！

如果说谭咏春先生开始对毛泽东的关心与帮助，是出自于一个老师对学生本能的爱护的话，那么，随着他们之间相处日深，他对毛泽东的人品和学识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后，他为这位英才早发的学生甘愿奉献出自己的心血和辛劳，则是内心驱动力使然而化作的自觉行动。

在私塾学习期间，毛泽东曾得到毛字居、毛麓钟等严师的指教，广泛阅读历代名家的诗词辞赋，加之他读书颇具天分，博闻强记，故功底打得十分牢固扎实，往往出口成章。到东山学堂后，学习条件优越，图书藏量丰富，这对于渴望追求新知识的毛泽东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把天才与勤奋“嫁接”在一起，刻苦攻读了大量新书，尤其是阅读了过去在韶山冲和外婆家难以借到的外国历史和地理书，使文化知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对此，作为级主任的谭咏春，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他更加器重这个秀外慧中的学生。

毛泽东写得一手好文章。他才华横溢，文思敏捷，作文常常交头卷，这一点更是深得谭咏春的喜欢。毛泽东的作文在全校数百名学生当中总是出类拔萃的，谭先生常拿它作范文在班上宣读，并让同学们向他学习。

有一次国文课，毛泽东又作了一首言志诗——《咏蛙》，诗曰：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谭咏春先生看了这首诗以后惊诧不已：在众多的咏蛙诗中，不是写蛙鸣如开音乐会，便是写青蛙是益虫可以吞食害虫，大都落入前人窠臼，难脱俗套。唯独毛泽东这首小诗，却独出心裁，另有立意，将小小青蛙赋予了生生虎气，实在是别树一帜，殊为难得。他不由对学生毛泽东那异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宏大的气魄，发出由衷的叹服：它哪像出于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的手笔！言志诗，“诗言志”，看那雄奇的气势，超凡的胆识，广博的胸襟，此子分明有建国之用！

谭咏春激动万分，他挥动手中的朱笔，在毛泽东的作文上写下如此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像这样对一个学生的作文赞美之词溢于言表，就拘谨的谭先生而言，实是首次。

课后，谭咏春先生又将这首诗拿去给堂长李元甫看，李堂长反复击节吟诵后欣慰地说：“此诗立意高远，寄寓深厚，且赋兴精当，看来毛润之已得诗文之奥妙。你我能教像他这样的学生，此生也不枉为人师啊！”言毕，他挥豪批下“传观”二字，让人将这首诗用大字重新抄写后，张贴在学校的“揭示栏”内，让全校师生传观。从此，毛泽东的文章全校闻名。

除《咏蛙诗》外，毛泽东还有其它的一些作文，像《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等，由于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又能紧扣时代脉搏，做到有感而发，大都写得立意高远，气势非凡。

譬如，在《宋襄公论》一文中，他就曾以准确论证和生动的文笔，倾吐了一个小学生对政治的独到见解，因而轰动东山高等小学堂。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

春秋时期，诸侯争雄。公元前647年，各诸侯国的霸主——齐国的君主齐桓公病亡，他的几个儿子为抢夺君位，发生了内讧，公子昭逃往宋国。经过这一变乱，齐国元气大伤，它称霸诸侯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宋国的国君宋襄公，一心想取代齐桓公的盟主地位。他先是拉拢三个小国用武力扶持齐国

的逃亡公子昭，回齐国做了国君，这就是齐孝公。接着又派员去联络国力较强的中原大国——楚国，欲借助楚国的力量使“强楚”势力范围内的那些弱小国家归服宋国。宋襄公有一个庶兄，叫目夷，时为相国，是一个很有才能和学问的人，他不赞成宋襄公的主张，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当霸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不肯接受他的直谏，硬是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来宋国聚集，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在会上，宋、楚、齐三国君主决定，于是年七月各国诸侯在宋国的孟会盟。公元前639年7月，宋襄公如期驾车前往孟。行前，公子目夷第二次劝宋襄公说：“楚国一向自恃强大，亡宋之心不死。倘若在这次结盟大会上不安好心，怎么办？主公还是多带些兵马去，万一情况有变也可应急。”没想到，宋襄公又一次拒绝采纳目夷的意见。目夷见说服不了他，只好赤手空拳跟他去了。结果，在会上楚成王为争夺盟主地位，果真将宋襄公抓了起来，迫使他答应俯首称臣，才把他放了回去。宋襄公为了报这个仇，决定用武力征服那些和楚国交好的小国。宋军先征伐相邻的郑国，郑向楚求救。楚成王派大将率大军直捣宋国，妄图乘宋国国内兵力空虚，一举将它攻占。宋襄公闻讯，忙命停止向郑国进攻，往国内撤军。宋、楚两军在泓水隔岸对阵，楚军依仗兵强马壮，不把宋军放在眼里，竟白天涉水渡河，向泓水南岸的宋营进攻。目夷觉得这时正是向楚军出击的大好时机，于是建议趁楚军尚未完全渡过涨水之机，迎头痛击，一举取胜。这一次，宋襄公提出一个荒唐的理论：“不行，我们是仁义的国家，敌人渡河还没有结束，我军就出击，还算什么仁义呢？”就这样，一次进攻的大好时机错过了。楚军全部渡河上岸后，正乱哄哄地排列阵势。目夷又对宋襄公说：“主公，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我军赶快打过去，尚能抵挡一阵，如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宋襄公责备目夷说：“你太不讲仁义了！人家队伍都没有排好，怎么可以打呢？”一会儿，楚军摆好阵，一阵战鼓擂响，千军万马像大水冲决堤坝一样，直向宋军阵地横扫过来。宋军难以阻挡，顷刻溃不成军。激战中，宋襄公大腿上也中了一箭。幸亏卫士奋力拼杀，冲出一条血路，才保护他逃出重围，回到了京都。宋襄公身负重伤，过了不久，就悔恨交加地死去了……在《宋襄公论》这篇作文中，毛泽东抓住宋襄公这个载入史册的著名人物和楚宋争霸的典型事件，大做文章，直抒己见，阐述了非同寻常的政治见解。

在文章中，毛泽东一反史籍中认为宋襄公“愚蠢与无能”的传统说法，别出心裁地论证他是一个伪善狡猾而又野心勃勃的枭雄。毛泽东首先引用有关史实，作为文章的反驳论据，以表示宋襄公的虚伪。他指出：“礼”是宋襄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范，几乎整个社会都在它的支配之下。《礼记》说：“夫礼始于冠，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这是讲礼在生活中的仪节作用。《礼记·经解》中又说：“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乡饮酒之礼废，则长幼之序失，而争斗之狱繁矣；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而背死忘生者众矣；聘观之礼废，则君臣之位失，诸侯之行恶，而倍畔（背叛）侵陵之败起矣。”这就是说，礼起着“绝恶于未萌”，“塞乱之所从生”的作用。除了上面这两个作用以外，制礼的目的最初是为了维护宗法制度。宗法制度有两条重要原则：一条是“嫡长子继承”，另一条是“兄弟相宗”。“嫡长子继承”的意义，不仅是为了防止发生内讧，也是为了保持统治者的基业不致分散、权力不致削弱；“兄弟相宗”则是指大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的统属关系，表

现为一种政治职能。在宗法制度下，根据“尊尊”、“亲亲”的原则，经过序尊卑、定亲疏、别贵贱而划分不同的等级名分，任何人也不得僭越。按照这种极其严格的礼制，君王自称天子，天子的庶子分封为诸侯，诸侯的庶子分封为卿、大夫。天子有天子的礼，诸侯有诸侯的礼，卿大夫有卿大夫的礼，士有士的礼，上下有别，等级森严，以保证贱不妨贵，下不犯上。所以，在当时礼被看作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的重要工具，认为“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毛泽东在充分运用经史知识阐述“礼”的作用之后，将笔锋一转切入正题：宋襄公是熟知以“礼”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的，可在继承诸侯国王位时，却演了一场有“违”这一制度的话剧。据《史记·宋微子世家》载：“三十年，桓公病，太子兹甫让其庶兄目夷为嗣。桓公义太子意，竟不听。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兹甫立，是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为相。”已是太子——王位合法继承人的兹甫（也就是后来的宋襄公），为什么要“让其庶兄目夷为嗣”呢？他这是有意做给桓公看的。因为，无论以目夷的人品还是才智都在他之上，但他系嫡出，目夷系庶出，按“嫡长子继承”的原则，目夷是不能继承王位的。所以，他装出一副让贤的样子，建议桓公立目夷为嗣，目的是要在齐桓公面前表现出他的“仁义”。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仁”和“礼”是连在一起的，它是做天子和诸侯必须具备的条件。兹甫给自己贴上“仁”的金字招牌，无非是好让身患重病的桓公，尽快把宋国诸侯的位子交给他，顺利完成权力交接，以免久拖生变。事情正好按兹甫的设计，一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登上了王位的宝座，“是为襄公”。

据此，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件事足已说明，宋襄公是一个政治野心很大的人，也是一个虚伪狡诈之徒。他是不会真的放弃权力的，如果真有诚意的话，在继承了王位以后便可自己做主把王位禅让给德才兼备的庶兄目夷，而不是“以其庶兄目夷为相”。由此可以看出，他原来“让其庶兄目夷为嗣”，只不过是骗人的把戏。

接着，毛泽东进一步深入剖析道：“宋襄公不只是伪善，还很贪婪，这在他得到诸侯王位以后的一系列举动中便可以找到佐证。宋襄公得到宋国国君的地位后并不满足，还一心想取代昔日齐桓公的盟主地位。为了实现这一政治野心，他对周围的国家采取了又打又拉、明打暗拉的策略，又是搞和谈结盟，又是侵略颠覆，各种手法无所不用其极。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他的野心被中原大国楚国的国君楚成王识破，将计就计，在会盟之地将他生擒，迫使他答应拱手称臣之后，才把他放回去。在这种情况下，宋襄公完全撕下了“仁君”的面纱，大举兴兵征伐相邻的小国，实行对外扩张。正当他亲率大军进攻郑国的时候，楚成王出兵宋国，抄了他的老窝。眼看军事失利，称霸诸侯的美梦已成泡影，所以在宋楚两国军队在泓水对垒的时候，宋襄公为掩人耳目，又弹起了“仁义”的老调，敷衍主张对敌反击的目夷，至使全军覆没，自己也落得个身负重伤、落荒逃命，最后悔恨而死的可悲下场……毛泽东辛辣地讥讽道，宋襄公这种结局，应了中国的那句老话：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毛泽东抽象概括说：历史给后人留下了宋襄公这个“伪君子”的典型。看来，伪善、权欲和贪婪是一路走的，伪善是实现权力的阶梯，贪婪是权利欲的诱因，而功名利禄又有时使人变得格外虚伪和贪得无厌。它们互相作用，互为表里。毛泽东转而指出：不过，像宋襄公这样的人，即使获得了很高的

权位，也不会受到世人的崇拜和得到历史的承认。

最后，毛泽东大发议论：品德高尚、表里如一和出以公心，是君王臣子追求的至道。《论语》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班固则认为“亡德而富贵，谓之不幸”。这就是说，富贵是人们都向往的事情，但是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得它，君子是不会接受的；如果因求富贵而丢失了品德，那便是极不幸的事情。《淮南子》：“圣人之于善也，无小而不举；其于过也，无微而不改”。可见圣人对于好的品质和行为，再小也要提倡；对于错误和缺陷，再小也要纠正。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树恩，尚力树敌。君子尚义，小人尚利。尚利则乱，尚义则治。所以，宋襄公的行为是不足为训的，切不可被君王所效法。如果做君王的权力欲过重，以致受私心所驱使，轻则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重则祸国殃民，必将为百姓所不齿。因此，毛泽东认定人君一定要品德高尚，胸怀坦荡，坚毅果敢——治理国家，需要崇高的德行；为民请命，需要当仁不让；对敌斗争，需要大智大勇。惟其如此，方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从而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

毛泽东的这篇作文，自然又得到了谭咏春先生的嘉奖，照例又批给同学们传观。打这以后，毛泽东在东山学堂名声大振，他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46 鼓励学生学“康梁”

毛泽东在东山学校学习时，很喜欢读康有为、梁启超的书和文章，他厌恶“八股”文章，常仿效“康梁体”作文。

当时，东山学堂的一些保守的教员认为，康梁的书是“为洋鬼子说话的”，不让学生看，对仿“康梁体”写作的文章更是贬斥。有一次，毛泽东用“康梁体”写了一篇《救国图存论》的作文，一位保守教员认为只能给20分——不及格。

谭咏春阅后，却拍案叫绝：“毛润之的思想前进，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呀！仿效康梁的文章有什么不好？好，好得很！”他破例给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打了105分。

为了倡导“康梁体”，谭咏春还向校长提出在课堂上开讲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章，让学生学习“康梁体”的写法。此后，东山学校的文风更加活泼起来，毛泽东的文章每次都被批上“传观”二字，贴在“揭示栏”内，供同学们观摩、学习。

在结合语文教学的同时，谭咏春还向学生介绍康、梁等人的政治主张，培养他们热心天下大事的兴趣，教导大家不仅要注重文化课的学习，还要关心时事政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在老师的启发教育下，毛泽东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阅览各种报刊杂志，同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他很快地尝到了老师教给的这种读书方法的甜头：明显地感到自己知识面不断拓宽，信息量不断扩大，眼界大为开阔。他得知两年前（1908年11月），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经死了，年仅十岁的宣统（溥仪）做了儿皇帝；他看到了康南海（有为）梁任公（启超）的雄文奇著；他听说了孙逸仙（中山）、黄兴的传奇经历；他还从萧三处看到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华盛顿、杰弗逊、林肯……这些名扬四海的英雄豪杰，激励着毛泽东这个农民的儿子奋进。他觉得自己也应该象他们那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家族和自己留下点什么。他接受了梁启超变法维新的影响，尤其是“欲维新我国，当维新我民”的《新民说》的影响，从而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股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内心涌动着。此后不久，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子任”的别名，表达了他倾心仰慕梁任公的犀利文笔、学习梁任公的维新思想和“以天下为己任”，即决心要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作为自己崇高职责的心愿。

转眼间，一个学期便匆匆将尽。谭咏春看到毛泽东成绩优异，且胸怀大志，严于律己，加之年龄也不小了，为了让他更好地成长，便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贺岚光商量了一个办法；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

在一个冬日里，谭咏春把毛泽东叫到自己的房里，语气恳切地对他说：“润之，你现在的国文和历史、地理，已经学到了中学的程度了，其他科目的成绩也不错，不宜再读小学堂，不然会贻误你，何不到长沙去读中学呢？”听了老师的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说出了长沙无熟人怕进不了中学、家里无钱供养等苦恼。谭咏春立即向他说明：“不要紧，我和几位先生推荐你去湘乡驻省中学就读，吃公费。”毛泽东听罢，欣喜异常，连声向老师道谢。

次年春天，毛泽东挑起行李书籍，离开东山高小，踏上了赴长沙城的旅程。临行时，谭咏春父子及部分师生依依相送，直到湘乡涟水河渡口才止步。毛泽东登舟挥臂，依依不舍地告别东山学校的师友们。

47 四十年后忆恩师

……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毛泽东在经历千难万险、南征北战，领导人民建立起新中国之后，还深深挂念着他小学时代的老师。建国后，毛泽东托人多方打听谭咏春先生的音讯，可万分遗憾的是，他得到的是老师早已作古的回音！原来，他尊敬的老师谭咏春，数十年来像园丁一样辛勤浇灌培育了满天的桃李，自己却劳累成疾而过早谢世。他们师生再见一面已成梦幻！

然而，毛泽东仍忘不了仅读过半年书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忘不了当年的良师益友。他虽日理万机，国事繁忙，也要挤出宝贵的时间，几次亲笔写信问候过去的师友，接他们到北京参观、游览和相聚。在毛泽东的盛情邀请下，1955年的春夏之交，谭咏春的儿子、他的老同学谭世瑛来到了首都北京。记得是进京后不几天的一个下午，毛泽东派人把谭世瑛接进中南海。老同学久别重逢，毛泽东万分高兴，不禁吟起“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故人相见，分外亲切，忆起四十年前的同学生活，就像叙谈昨天才发生的事情。恩师谭咏春对自己的关怀爱护之情，毛泽东铭记在心；此刻往事重提，那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景，又一一呈现在他的面前。毛泽东关切地询问谭世瑛：“你爹是哪年去世的？”知道老师在解放前便已病逝的情况后，他接着回忆说：“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年我投考东山小学堂，是他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我这个超龄的学生……”说到这里，他自然联想起当年进小学读书的曲折经历。

接着，他们又谈起东山学堂同学中因地域观念引起的纷争，毛泽东讲了他初到东山时心理上的变化和精神上的压抑，他坦率地剖白了自己以后，说：“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同，只有你父亲他老先生同情我，说个性独特能成事。”

讲起“康梁体”的文章，毛泽东爽朗地大笑起来：“那时候，我这个‘土包子’对康有为、梁启超，可以说是崇拜得很哟！山沟沟里的娃子懂什么？连孙中山都没有听说过呢！人的思想嘛，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就跟小孩子学走路一样，都有一个摸索的过程……真要感谢李元甫先生，还有你父亲谭老先生，是他们教我学起步的啊！”

两个多小时的会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情犹未尽了，言犹未尽，他在客人即将告别离去时，再一次向老同学称道恩师谭咏春的好处：“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真心诚意地关心学生、爱护人才的。没有他，我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呀！……”

毛泽东的话，的确是发自肺腑。

没有谭咏春先生当年的仗义执言和慧眼识金，毛泽东进不了东山学堂，走不出闭塞的韶山冲，他这个稀世之才将会在乡村的农田里，活活埋没掉；不是谭咏春的鼎力相助，毛泽东恐怕也一时到不了省城长沙，难以开始系统的学习生涯，难以接触到那个广阔的社会天地，难以和那么多的良师益友结识，更难以投身于现代中国历史的洪流之中，在日后走向伟人的“星座”！

48 念旧情，却不徇私情

解放初期，新中国从旧社会“继承”到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破烂摊子，国家经济极度衰竭，人民生活困难重重。

就是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时候，毛泽东的心，仍然挂记着远隔千里之遥的谭咏春先生一家。当他从来自家乡的亲朋好友那里得知谭家生活拮据的情况后，从北京寄去三百元人民币以周济，同时寄去一片功成名就的伟人对他昔日师长的拳拳赤子之心。

早在四十多年前，毛泽东离开东山前往长沙求学时，他曾对为他送行的学堂看门人说过：“我这个人有个脾气，对于别人的好处，我是一世都记得的！”漫长的四十年已经过去了，毛泽东这不忘别人好处的“脾气”，仍然丝毫未改。所不同的是，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在“不忘旧情”的朴素感情之中，融进了“党性原则”这四个字！拿他自己的话说，就叫做“私事论情，公事论理、论法”。他这一处事原则，在与谭咏春家人的交往中也得到印证。

还是1955年进京晋见毛泽东之前，谭世瑛的两个儿子，在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中被人民政府枪毙，他自己也被剥夺公民权并管制一年，撤管之后又不让他加入农会。对这些，谭世瑛不能理解，带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就在这时，他接到老同学毛泽东邀他去北京相聚叙旧的信函，顿觉十分高兴。他想：此番进京向毛泽东细说情由，凭他们之间过去同窗好友的特殊关系，只要毛泽东帮忙说一句话，他个人和家庭境况定有转机。

谭世瑛就是怀着喜忧参半的复杂心境进京的。在与毛泽东相见时，他几次欲言又止，似有难言之隐。毛泽东似乎洞悉了老同学的内心世界，鼓励他“竹筒倒豆子”，把问题和难处都摆出来。当了解到上述情况后，毛泽东没有马上表态，他那高度表达和填密的大脑寻思开了，他想自己虽然和谭世瑛是好朋友，可那毕竟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时过境迁，老同学的情况到底是怎样的，自己还不太清楚，尤其是谭世瑛反映的都是些涉及到国家政策、法律方面的事情，在未真正搞清楚之前，决不能贸然表态。于是，他既没有看在老同学的情面上去大包大揽，利用自己的威望和地位去干预地方事务，也没有摆大人物的架子去作空洞说教，而只是说了一句：“我调查一下再发言吧！”

过了几天，毛泽东专门腾出时间，挥毫给中共湘乡县委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湘乡县委，并转第二区区委、石洞乡支部各同志：

石洞乡的谭世瑛，四十多年前，曾在湘乡东山学校和我有过同学关系。解放后来过几次信，我亦回过几封信，因他叫困难，最后又寄了一点钱给他。最近因患眼病，到汉口找谭政（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引者注）同志求治，谭不在，到北京找我。现在进医院治眼，两三星期即回乡。我嘱他好好听区乡党政干部管教。据他说，他有两个儿子在三年前镇反斗争中被枪决，一个是营长，一个是排长，听说有血债被枪决的。他本人也被剥夺公民权，管制一年，现已解除管制但仍不能入农会。他的妻和他的其他两个儿子则有公民权并入了农会。他说，他的成份是贫农。他又说，他教了几十年书，只在二十七年前在国民党的邵阳县政府当过五个月的科员，并未作坏事云云。

此人历史我完全不清楚，请你们查明告我为盼。

祝你们工作顺利。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七日 中共湘乡县委和石洞乡支部收到毛泽东主席的信以后，立即组织县、区、乡三级联合调查组，专门对谭世瑛所反映的有关情况和毛泽东在亲笔信中要求“查明告我”的一些事项，进行了认真的调查，随后，即将调查的结果写信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这时，仍在北京治疗眼疾的谭世瑛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一是感谢同学毛泽东对他的关照，二是提出在近期返回家乡，从事生产劳动。毛泽东接到这封信之后，很快写了一封回信：

世瑛兄：

六月四日的信及大作一首收到，甚谢！我赞成你于日内返乡。

中共湘乡县委有信（乡支部也有一信）给我，对于你家情况有所说明。据称：你的两个儿子确实有罪，这是因为他们在几次宽释之后还要犯罪，而且犯了严重罪行的原故。因此，政府和人民对他们依法处理，是应该的。你则只有一些旧社会带来的缺点和在对待你两个儿子的态度上有些不当，故给以一年管制，现已解除。县委来信认为你无其他罪行。我认为县委对你的评语，是公道的。

你应当在新旧社会的根本变化上去看问题，逐步地把你的思想和情绪转变过来。这样就可以想开些，把一些缺点改掉，督促全家努力生产。最要紧的是服从政府法令，听干部们的话。这样，几年之后，人们对你的态度就会更好些了。

如你认为必要的话，此信可给县区乡负责同志一阅。

祝你平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五年六月八日 谭世瑛在老同学毛泽东的耐心开导和规劝下，愉快地回到了家乡湘乡县石洞乡。从此，他带领全家捐弃前嫌，努力生产，为建设家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十章 肖佚名

——“洋学堂”里的“洋先生”

有学问的人是一块真金，在任何地方
都会受人尊敬。

——〔波斯〕萨迪

知识是有学问的人的第二个太阳。

——〔古希腊〕赫拉克利特

49 “假洋鬼子”

毛泽东曾经如是述说过他在东山学堂的一位年轻教师：“在这所新学校里，我能够学到自然科学和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教师中有一个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戴着一条假辫子，他的假辫子很容易分辨出来，大家都嘲笑他，称他为‘假洋鬼子’。”

这位被人称作“假洋鬼子”的先生，姓甚名谁？毛泽东没有说过。笔者在两度前往湖南采访的过程中，为了再充实一些有关他的平生事迹，曾经冒着绵绵春雨，顶着盛夏骄阳特地来到湘乡参观游览。在东台山下那旧时的东山书院——东山高等小学堂、今日的东山学校里，我走访了一些教师，查阅了包括东山学校校志在内的许多文史资料，可遗憾的是，除了了解到这位令伟人毛泽东终生难忘却又名不见经传的“洋先生”姓肖和获得了一些虽零碎、却极珍贵的历史材料外，终究还是不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没有名字怎么写他的传略？我踌躇了。但要真实反映毛泽东与师长们的关系，要写毛泽东在东山学院这段学习经历，而不写“假洋鬼子”——这位第一个给毛泽东打开窗户看世界的先生，那将留下几多缺憾！思虑至此，我还是抱定主意写下去。好在姓名终不过是人的符号，并不重要，重要的这个人和他所做之事。肖先生有姓佚名，我们权且称他为“肖佚名”吧。

毛泽东认识肖佚名，是在入学不久的事。

一天，学堂里爆出了一条新闻：校长李元甫聘请了一位洋先生来学校任教。要知道，这里可是旧时秀才举子讲学读经的领地，可没有新派人物的地盘。请洋先生来讲学，真是花姑娘坐轿——头一回呢！怎能不叫人当成稀奇事呢？”

那天中午，毛泽东吃完午饭后正在东斋的藏书阁看书，突然，有位同学在楼下喊：“快来看呀！看洋鬼子呀！看洋鬼子呀！”

这一声喊，很多同学都听到了。虽然大家听说有位洋先生近日要到学校来报到，但仍非常好奇，不知道洋鬼子是什么模样。于是，在宿舍的，在自修室的，在藏书阁的，都纷纷往外跑，争着看洋鬼子。毛泽东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看到大家都走光了，也跟着下了楼。

走到了便河旁边，只见前面的石拱桥上，果然有一个装束和姿态都很特别的青年人，跨着大步，向礼堂这边走来。他穿的不是长袍，也不是学生装，而是穿的敞开领的洋服，脖子上还打了一个黑色蝴蝶结；他的头上没有常见的那根又粗又长的独辫子，头发剃得很短，朝两边分着，在太阳的映照下油光可鉴；他走路的姿势也有些与众不同，不是弯腰驼背，也没有迈八字步，而是胸脯挺得高高的，腰杆竖得直直的，膝盖骨也不打弯，就像当兵的出操一样。可是，他也是黄皮肤、黑头发，脸相和中国人长的一模一样，只是那双黑眼睛，透出几分读书人所特有的灵气，傲气、矜持气。

同学们都拥到便河边上来了，对着这个“洋鬼子”指手划脚，大声议论，弄得他十分狼狈。他没有理会众人的不礼貌行为，旁若无人地径直朝礼堂走去了。

“哪里来的洋鬼子呀？他一个人这样大胆，敢到东山学堂来！”

“只怕是传教士。”

“对的！河对岸天主堂里面，也来过两个洋人，都穿他这样的洋服，也

不留辫子……”

“洋人也真怪，怎不穿长衫，不蓄长辫子？”

正在这时，谭世瑛来了。听到同学们这番议论，他对大家说：“你们不要瞎讲，他不是什么洋鬼子，是学堂请来的先生，明天就要给我们讲课呢！”

同学们听谭世瑛一讲，都感到诧异：“不是洋鬼子？那他是何方人氏呢？给我们讲课，他会不会湘乡话呢？”

“他是我们湖南人，搞不清是哪个县的。”谭世瑛说，“听说他姓肖，在东洋留学刚回来，李堂长和他很熟，聘请他来教英文和音乐的。”

谭世瑛是本校国文教员谭咏春先生的儿子，他的消息想必是可靠的。可是，不少同学心里还是犯疑。他们总觉得这位老师太奇怪了，怪就怪在他头上竟然没有辫子。没有辫子怎像一个中国人呢？“发肤父母之所授”，哪一个大清臣民能够不要辫子呀？自从1644年清兵入关，传到如今的宣统二年，二百六十多年了，大清帝国的皇上早有诏谕：每个人都要结辫子，男子长到十多岁，就要把前面的一半头发剃掉，把后面的一半蓄起来，结成一条拖到屁股后面的长辫子。谁不这样做，谁就违犯了王法，就有砍头的危险。

如今，这位教英文和唱歌的肖先生，居然没有辫子而且一身洋服，这当然是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开始是学生们围着观看；慢慢地，学堂附近的种田人，也等在围墙外面观看——看他的短发分头，看他的奇装异服。只要这位肖先生一出学堂门，他走到哪里，哪里就跟着一路的围观者。

一次，他到店铺去买东西，在他的背后，很快就围成了一堵半圆形的人墙，把铺着碎石子的湘乡正街，挤得水泄不通。他费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突围”出人群，过了涟水河，才回到了莲花屋场。

看热闹的人这样多，弄得肖先生十分苦恼。后来，他听了李元甫先生的话，把西装脱掉，换上长袍马褂，戴上瓜皮小帽，并且在估衣店里买了一条辫子，接在自己的后脑勺上。谁料到这样一来，人们笑得更厉害了。因为，那条辫子和他的头发是两种颜色，一看便知是假的。于是，学生们很少有人叫他“肖先生”，大家都在背地里喊他“假洋鬼子”。

50 第一次音乐课

开始，毛泽东和许多同学一样，也觉得肖佚名这条假辫子很可笑，他甚至还有些瞧不起这位喝过洋墨水的先生，没有辫子也就罢了，干嘛要接一条假的呢，像狗尾巴似的。这个肖先生，胆子也太小了。

可是，慢慢地，他的印象改变了——“假洋鬼子”原来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先生！

“大部分学生都因为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而不喜欢他，但我却爱听他讲日本的事情。他教音乐和英语。他教的歌有一首日本歌，歌名叫《黄海之战》，我至今仍记得其中一些动人的歌词：

麻雀歌唱，
夜莺起舞，
春天绿野多可爱。
榴花儿红，
柳叶儿绿，
好一幅新图画。”

毛泽东回忆的是肖佚名教音乐课的情景。这是他第一次上音乐课——过去的私塾是不唱歌的，再说那些“非礼莫为”的孔门弟子也不会唱歌。只有像现在这样的洋学堂，才开设音乐课；只有像肖佚名这样的洋先生，才会教音乐。

肖先生教唱的这首歌，唱的是日俄战争结束，《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的那个春节的盛大欢庆场景，这首歌的歌词十分优美，旋律热烈欢快，悠扬悦耳。同学们在肖佚名那有节奏的拍节下唱着、唱着，顿时感到平日苦读诗书的劳累和愁闷一扫而光，身心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和愉快。

“当时，从这首歌唱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胜利的歌中，我了解和感觉到日本的美丽，感觉到它的骄傲和强大。”毛泽东后来回忆他生平第一次上音乐课时的感受，这样说。

同学们从这首优美动听的《黄海之歌》，联想到日本，日本的土地和海洋也一定是很美的吧？“东洋”的世界上一一定有很多新鲜事？中国人为什么都要跑到日本留学？大家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请肖先生解答。

肖佚名笑了笑，一边摘下深度近视眼镜用手绢擦拭，一边慢慢他讲了起来。

他说，日本是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的一个群岛国家。它不是很远——隔海与中国相望；它也不大——土地和人口还不到两个湖南省那么多。但这里的确很美，到处是茂密的树林和清清的河流，每年樱花开放时节，它又变成花的海洋……接着，他又从太平洋西岸富士山的活火山，讲到本州东南部横滨的大海港；从北海道的渔场，又讲到函馆、下关的渔港，再讲到他留学的地方——日本首都东京。他说，东京的人口十分稠密，这里建起了很多高楼大厦，住宅向空中发展；有钱人已不像中国的富人那样出门坐轿，而是坐轿车，东京有很多大学，教育事业很发达，政府制定了各种优待政策扶持教育的发展，这是日本富强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青年飘洋过海去留学的内在动因……

《红皇照耀中国》第 99 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 100 页。

数十年以后，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以毛泽东的口吻说过这样一句带总结性的话：“这就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了解到的一切肖佚名讲了许多，同学们听得入神，谁也没注意到一堂课已经过去了！”

肖佚名最后说道：“我们在东京的留学生，大都是热血青年，都为我轩辕黄帝子孙后代的命运担忧，都想找一条振国兴邦的出路。在日本，我们自己编了一支歌……”

“一支什么歌？”毛泽东连忙问道，“肖先生，可以让我们听听吗？”
“可以的/肖快名和蔼地笑了，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深

“可以的。”肖佚名和蔼地笑了，接着，他清了清嗓子，用他那深沉厚重的男中音，唱起了这支饱含激情的歌：

进兮，进兮，进进进！

谁谓我华人大梦犹未醒？！

歌声萦绕，又随风飘散；同学们脑海里对肖佚名先生的不良印象，也一同飘散了。他们吃惊地发现：肖先生是一位富有民族自强精神的爱国知识分子，并不是那种出卖祖宗、吃里扒外的假洋鬼子。

51 夜话“东洋”

自从第一次音乐课之后，毛泽东和不少同学都与肖佚名先生亲近起来。课余时间，他们都喜欢来到肖先生的住处，向他问这问那，而问得最多的还是中国以外的世界，还是日本。

有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和肖佚名一起，走出学堂的围墙，坐在池塘边的草地上看小白鱼戏水。稍后，谭世瑛、贺汝威等几位同学也都来了。他们和毛泽东一样，也很喜欢和肖先生接近，爱听他讲国家的大事和在日本的所见所闻。

这一次，肖佚名没等毛泽东他们发问便讲开了，而所谈的内容又比上次在讲堂里的深刻得多。他讲起了日朝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经过，越讲越激动，瘦削的双颊胀得通红：

“日本地狭人稠，并不很富饶。在明治维新以前，还是一个很落后的国家。现在，仅用了三四十年时间，就变得强盛起来，不仅打败了沙皇俄国这个泱泱大国，还把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也打得一败涂地，北洋水师弄得全军覆没，逼得我们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同学们，你们知道中日甲午海战吗？”

毛泽东摇了摇头：“没听说过，老师。”这场战争发生在毛泽东出生的第二年，在那个政治极为封闭的年代，他自然是不知道的。

“好吧，我来给你们讲讲！”肖佚名习惯地正了正眼镜，以深沉的口吻说开了。

“十九世纪末期，也大概就在你们出世的前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向垄断过渡，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日益尖锐。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日本原先跟中国一样，是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国家，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同时也迅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早在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将朝鲜和中国的大陆及台湾作为侵略的主要目标。两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清王朝元气大伤，国力极度衰弱，日本感到趁火打劫的时机已到。1894年2月，朝鲜发生东学党领导的农民大暴动，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极为怂恿我国出兵干涉，并同时派兵朝鲜。当东学党暴动被镇压之后，日本违反前约拒绝撤兵，继续集结兵力，企图以朝鲜作跳板，对我国发动战争。7月25日，日本军舰对护送援军的中国船只发动突袭。8月1日，大清皇帝被迫下诏对日宣战。因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称为甲午中日战争。战争经历了四个主要战役……”

“肖先生，能具体讲一讲这些战役的情况吗？”对历史事件具有特殊兴趣的毛泽东，见老师停了下来，急忙以征询意见的口气央求道。

“好的！”肖佚名看了一眼学生那副求知若渴的样子，欣然地同意了。接着，他讲述道：“首先是朝鲜之战。7月25日，日军袭击我驻牙山的军队，清军败退平壤。9月，日军分四路大军联合进攻平壤，清军将领左宝贵率部奋勇反击。激战中，左宝贵阵亡，主帅叶志超贪生怕死，率部逃跑，‘一马狂奔三百里’逃过鸭绿江，平壤落入敌手。

“接着是黄海之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大清王朝鉴于海疆危机，决定编练新式海军。朝廷前后从外国购进大小舰艇三十九艘，还仿制了一些舰船，淘汰了一批薄板旧钉的木船。创办的海军有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福建水师。北洋水师就布防在黄海到东海一带辽阔的海疆上。中日战争在朝鲜陆地打响以后，中日海军舰队在黄海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致远号’管带邓世昌，

在战舰中弹燃烧的情况下，向敌军旗舰猛冲过去，与之同归于尽，他和全体将士壮烈殉国。‘经远号’管带林水升也在激战中阵亡。经此一战，李鸿章采取‘保船制敌’方针，把制海权拱手让于日本人。

“黄海海战后，日军分两路侵入中国东北。一路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丹东等地；一路从辽东半岛登陆，侵占大连、旅顺，侵略军在这里屠城四天，旅顺仅幸存三十六人，实属惨绝人寰！这一仗，史称辽东之战。”

“最后的战役是威海卫之战。1895年1月，日军发动了对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的进攻。李鸿章奉行‘避战求和’方针，令北洋舰队困守，不许迎战。2月，日军攻占威海卫，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此后，日军连陷牛庄、营口等地。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

“战争失败后的两个月，是中国人最耻辱的日子。当时，中国作为战败国不得不派代表前往日本的马关，与日本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按照这个条约要求：大清朝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二亿两白银，分八次还清，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个通商口岸，日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人在各通商口岸任意从事各项工艺制造。《马关条约》传到中国，举国为之震惊！”

“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列强掀起了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战争结束后，沙俄伙同法、德干涉还辽，又以还辽有‘功’将东北划为其势力范围。其后，列强纷纷要求‘利益均沾’，法国以云南和两广、英国以长江流域、德国以山东、日本以福建为其势力范围；1899年，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使整个中国市场向美国开放。此外，列强各国还纷纷效法日本，在中国开矿设厂，设立银行，修筑铁路，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战后，列强各国在华工厂共有九千多家，还有近四万里的铁路修筑权和投资权。他们在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后，又进一步通过政治贷款，控制着中国的政权，使大清朝在财政上以至于政治上都俯首听命于帝国主义。至此，我华夏之邦已国将不国了

……”

“肖先生，一个小小的日本，为什么这样强大，居然能打败俄国、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而我们堂堂的大清帝国竟然甘心受它的欺侮呢？”毛泽东听完肖佚名的讲述，深思片刻后提出了心存的疑问。

听了毛泽东的发问，肖佚名没有立即正面回答，他启发式地反问道：“同学们，你们自己想想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毛泽东认真地思索着。在学习上，他始终牢记古文中“学而不思则罔”，“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的教条，逐渐养成多问多思的习惯。对于某一个问题的未想明白之前，他不愿轻率地发表看法。

谭世瑛见毛泽东没有答话，拘谨地插问了一句：“先生，日本的富强是不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呢？”

“是这样的。”肖佚名回答说，“日本明治天皇以来，非常认真地学习西洋的科学技术，大力发展文化教育和从事经济建设，努力振兴实业，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他们造枪炮，修海船，提高了这个孤岛上小国家的军事实力。正是依仗着坚船利炮，它才打败了中俄两个大国。眼下，不要说中俄奈何它不得，就是一些西洋国家也被它赶上和超过了。可是，我们中国人至今还在做梦，一边在挨打，割地赔款，另一边还要以‘文明古国’、‘礼乐之邦’自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甚至把西方先

进的科学技术看成是‘奇技淫巧’，予以一概排斥。那个去年驾崩的“老佛爷”，也就是当今圣上的祖母，把火车都看成是妖怪，要推到大海里去，岂不可笑之极！古话说得好：‘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看看咱们国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状况，不遭外侮那才真怪哩！如今国难当头，可大清朝的皇亲国戚，贪生怕死；王公大臣，腐败成性，文臣既爱钱，武将又怕死；八旗军、绿营军长期懒于操练，军队素质极差，纪律松懈，斗志消沉，兵卒使用的是大刀、长矛、弓箭之类的陈旧武器；加上连年的耗银赔款，国库搜刮一空，民力损耗殆尽，哪有力量和外敌抗衡呢？唉！如此下去，不出好多年，我堂堂华夏之邦，必定是砧板上的肉块，只能任人宰割了

讲到这里，肖佚名已声泪俱下，唏嘘有声，再也说不下去了。毛泽东等人心情也很沉重，大家谁也没有说话，只有池塘里的小鱼儿，轻盈地蹦出水面，弄出一丝丝声响，溅起一朵朵水花……

过了一阵，肖佚名抬起头来，扫了一眼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学生：“同学们，古人说得好！‘忧国忘家，捐躯济难，忠臣之志也’，‘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君子之为学也，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的年纪已经都不小了，离为国效力的年岁已为期不远，切不能只为一身一家的荣辱而读书，而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去读书啊！”

夜幕开始降临，东台山已有些模糊了。肖佚名见到了该上自修课的时间，便打住了话头，领着大家回学堂去了。

毛泽东走在通往东斋藏书阁的白石甬道上，思想却一时还没有从刚才同肖先生交谈的话题中跳出来。一路上，肖佚名的话不时回响在他耳畔：“君子之为学，将以身而备天下国家之用”，“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而读书”。想到这些，他感到胸中豪情激荡，一股为救国救民而发愤学习的内心驱动力骤然产生。

晚钟“ ”敲响了，他迈开坚实的步履朝前走去。

52 打开窗户看世界

如果说毛泽东开始听肖佚名先生“讲日本的故事”是出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及至他了解了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强盛及其妄图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后，这种好奇心则湮灭了，随之而来的是为祖国的贫弱落后而深深忧虑，为国家层出不穷的内忧外患而痛心疾首。

“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强大起来，而不致于受列强欺侮呢？”他开始思考着这样的一些大问题。

正在这时，他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表兄王季范又从省城寄来了康有为的著作《大同书》，读了这些书籍，毛泽东很是激动，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十分崇拜，十分赞成君主立宪制度。在当时，他还不是反对君主制度的人，还没有达到那样高的思想觉悟，只是觉得宣统皇帝年纪太小了，五岁的小孩子，知道什么事呢，还能治理国家？非得有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能人帮他才行呢。他想：这大概就是“变法维新”、“改良政治”吧，再联想到肖先生讲过的日本“明治维新”的事，他觉得比以前知道的更实在了。于是，他将这些想法写进题为《救国图存论》的一篇作文里，而大受国文老师谭咏春的褒奖，被破例给了105分，并批给全班同学“传观”。

十七八岁，是接受新事物、新知识敏感的人生阶段；又是获得一知半解急于与人交流，幼稚和尚不成熟的人生阶段。毛泽东当年也毫不例外。通过听谭咏春先生在课堂上讲康梁文体和自己在课余时间读康梁文章，他仿佛透过沉沉黑夜，看到了新思想的光亮，虽然这光亮是那样阑珊。他为此感到激动、欣喜，内心有一种要与人交谈的冲动。于是，他想起了肖佚名——他要把自己这些时来的学习心得告诉肖先生，肖先生知道自己的长进也一定会高兴的。当然，还有许多自己一时还弄不明白的问题也要同肖先生说一说，并请他指点。

一个星期天，他来到肖佚名的住处，在向老师讲了《救国图存论》中的那些想法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肖先生，您说康梁的维新变法像不像日本的明治维新呢？”

肖佚名听了这个带着学生思辩痕迹的问题，认真思考片刻后说：“润之，你这个问题提得好！中国康梁的变法维新，确实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有颇多相似之处，都是为了革新政治和富国强兵。可是，你可知道，它们之间又有根本的不同之处？”

“不同之处？”听了肖先生的反问，毛泽东有些不解。说真的，中国的戊戌维新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到底有些什么不同呢？他还来不及去想，恐怕想也想不明白。听老师这么一问，他还真想知道呢！于是，毛泽东央求肖佚名把这些事讲给他听一听。

“这些说起来活可就长啦，先说说‘戊戌维新’吧。”肖佚名也不推辞，他略微理了理思路后，侃侃而谈：“要讲‘戊戌维新’，还是要讲讲中日甲午战争后的国内局势。在那场给中国人脸上抹上耻辱印记的战争失败后，或许正当你蹒跚学步之时，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正萎缩着坐在盛气凌人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面前，低声下气地说道：‘既知我国为难情绪，则所求者必量我力之所可为。’4月17日，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一条约的每一款都由日方提出，每一款都令人触目惊心！消息传回国内后，国人再也按捺不住了。五天之后，即1895年4月22日，广东、湖南两省举子联合上书都察院，继而各省举人亦纷纷上书。5月2日，正在京城应试的康有为率

十八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上书光绪皇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呼吁变法自强，史称‘公车上书’。国难当头，一批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华民族前途的焦虑情绪日益剧增，纷纷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在此后的二三年内，强学会、知耻学会、粤学会等二十多个维新团体成立，《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等宣传变法维新的报纸相继创刊。1896年，康有为推出《孔子改制考》，欲托古改制；严复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武器，宣告：惟有变法自强才能保种，否则中华民族将被淘汰出世界民族之林；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枭雄，也都奋起为变法维新到处呐喊奔波。古老的封建帝国在内忧外患中摇摇欲坠……”

肖佚名呷了一口茶，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1898年6月11日，也许是寄居于外婆家的你，正同表兄弟们在门前的池塘里‘打水仗’的时候，年轻的光绪皇帝迫于内外压力，采纳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先后颁布几十道新的诏令。可不曾料想，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了北京政变，将光绪帝软禁瀛

台，康有为和梁启超被迫逃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朝廷杀了头，维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零三天便宣告失败了！所以，有人又称这次维新变法运动为‘百日维新’……”

“哦？原来是这样的……”毛泽东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些事，他先前把维新的希望寄托在康、梁身上，想不到他们已是自身难保，亡命海外。

“中国的维新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失败了呢？从上述情况中就不难看出，它不过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利用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开始便遭到了被称为‘老佛爷’的慈禧太后和那些王公贵族的反对，他们勾结一些握有兵权的‘新军’将领，发动了宫廷政变，连皇上都自身难保，变法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它的结果，没有给国家带来一分的强大，没有给百姓带来一毫的富裕。两年后的1900年，义和团风靡全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华大地饱受战乱之苦。

“再看看日本的明治维新又是怎样的呢？它是明治天皇亲自发动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改革。改革的结果不仅带来了经济上的腾飞，而且使日本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质的改变——天皇只保持荣誉上的尊位，朝政则由以首相为首的内阁负责。也就是说，日本国再也不是‘家天下’了。润之，你想想看，一样的维新变法，却是两样的结果，这不能不说是我中华民族的不幸啊！”讲到这里，情绪容易激动的肖佚名停住了。

听了肖佚名的话，毛泽东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他急切地问：“肖先生，您说说看，我们中国还有出路吗？”

“出路还是有的。”接着，肖佚名把革命党人1905前在日本组织“中国同盟会”的事告诉了毛泽东。他说：“同盟会，是一个反清的秘密组织。它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孙中山、黄兴，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也是我们留学生的杰出代表。”

“肖先生，孙中山和黄兴也在外国留过学吗？”毛泽东好奇地问。“是的。”肖佚名告诉毛泽东：“在国外留学的不光有孙中山、黄兴，光是在日本的就有陈天华、邹容、章大炎、蔡元培等一大批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他们是反满灭清的领路人！”

“这朝廷是能够反得的吗，先生？”毛泽东过去在古书上所看到的，都

是说皇帝是真龙天子，乃上天下派凡间统治臣民的，天子龙威是不可冒犯的。这些，他虽然不全相信，可真要与朝廷作对，他还是有些发怵。所以，他不无担心地问肖佚名。

“有什么反不得的！满清不灭，国运不振。你看，我头上这象征汉人向满人臣服的长辫子，不是剪掉了么？如今，在留学生中是没有多少人蓄辫子的。”说着，肖佚名抖了抖自己头上那根归国后接上去的假辫子，解嘲地笑了笑。

“可是，我还是觉得：孙中山这些读书人是很难斗得过朝廷的。”以毛泽东有限的年龄和生活阅历，他怎么也不相信，孙中山这些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怎能与有二三百年基业的大清王朝相抗衡呢？“俗话说得好，五人团结一只虎，十人团结一条龙，百人团结一座山。目前，反清排满已成大势，只要天下人起来抱成团，满清王朝崩溃覆亡的命运便为期不远了！”肖佚名以恳切的语气和十足的信心，对学生如是说。

见时候不早，毛泽东起身告辞。肖佚名在送他回学校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意味深长地说：“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些事，在留学生中间早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是由于朝廷的封锁，加上乡村的闭塞，才不被多数国人知晓罢了。有的事，我眼下也不便跟你详细地讲。不过，我可以断言，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知道这一切，并能看到它的结果了！”说到这里，肖佚名充满期望地鼓励学生。

“润之，以我的观察，你是个勤学而好思的学生，应该有个大的志向才好。将来有机会，走出这湘乡县城，走出湖南省，走出国门，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闯一闯吧！……”

告别肖佚名回到寝室以后，毛泽东禁不住思潮翻滚，良久难以平静。自上一次上音乐课听了肖先生介绍日本的见闻后，就有许多问题在他心头萦绕：这个被中国人称之为“倭奴”的日本国难道有什么魔法，把一个荒凉的岛屿建设得这样富强？而我们大清帝国的属地多系陆上富饶之所，为何却是这样贫穷落后？中日两国多年征战、纷争不休，却又有那么多像肖先生一样的优秀中国青年漂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这些问题像一个个猜不透的谜，令毛泽东百思不得其解。

通过今天和肖佚名先生的长谈以后，毛泽东终于明白：历史潮流滚滚向前，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勇敢地站在时代浪潮的峰顶，就必将抛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日本国正是顺应了时势，借助“维新”这把巨桨，才使国家这艘船驶过了急流险滩，一往无前；而我们这个号称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帝国，封建保守，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

陷于落后挨打的境地。所以，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几代读书人中的有识之士，就像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唐高僧玄奘到天竺取经那样，纷纷到日本求学，企盼能够像林则徐在《四洲志》和魏源在《海国图志》中阐述的那样，“师敌之长技以制敌”、“师夷之长以制夷”。这样，在日本逐渐聚集了一批知识界精英——老一辈中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变法最为积极最有影响的人物；新一代里有孙中山、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反清革命党的领袖和中坚……

毛泽东想：如果不接触肖佚名这位“洋先生”，上述这些事理自己是不可能知道的。他庆幸自己总是遇上这么好的老师。他推测：肖先生对革命党

的情况知道得这样多，一定也是个革命党人，最低也是个维新派。说实话，毛泽东最佩服的就是这些新派人物。他认识的第一个维新派，是韶山冲的李漱清先生，第二个便是肖佚名。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有很好的主张。特别是这位被人称为“假洋鬼子”的肖佚名先生，他是这样年轻，却又如此才华横溢，跟他接触，可以知道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情，能够懂得从未弄懂的深奥道理。这些人哪来这么大的本事呢？毛泽东终于想明白了：他们读了许多的书，掌握了许多知识，经历过许多的大世面。由此他感受到，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生活的圈子是多么的狭小，韶山乃至湘乡县城又是多么的落后和封闭！这引起了他的遐思：省城长沙是个什么样子？京城北京是个什么样子？还有那个日本国，又会是怎样的呢？他多么想走出这湘中大山，亲身到这些地方去看一看。他憧憬：如果将来有一天，能够象肖先生那样也到日本去留学，在那里去取得富民强国之经，然后再拿来为苦难深重的祖国所用，那该有多好啊！

这个出身于乡村农家的青年，从肖佚名打开的那扇“窗户”里，看到了山外面那个广阔的世界，他向往着那个世界……

这时，恰好正是快要放寒假的时候，李元甫堂长打算在下学期推荐毛泽东到省城长沙去读中学。毛泽东把这件事告诉给了肖佚名。肖佚名先生听后，高兴地说：“好啊，润芝！巴尔扎克说过：离开了人才荟萃的中心，呼吸不到思想活跃的空气，不接触日新月异的潮流，我们的知识会陈腐，趣味会像死水一般变质。到外面去看看吧，这对于你来说，是尤为重要的。”

1911年春日的一天，毛泽东终于在那种难以抑制的向往的驱使下，告别了幽静迷人的“洋学堂”，告别了肖佚名这位“洋先生”，挤进了一艘湘江小货轮的三等舱里，踏上了通往长沙的旅程。

湘江的水滚滚向北奔流，乘着波涛，毛泽东步入了现代中国汹涌的历史大潮中……

第十一章 贺岚光：

——政治 ABC 的入门向导

学莫便乎近其人，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

——《劝学》

多读好书，多接近贤能。

——《贞观政要》

53 长沙之旅

1911年的早春。乍暖还寒。

一艘小货轮，沿湘江北上长沙。在它的三等舱里，有一位绅士模样的中年人情一英俊少年，正扶栏站立在船弦上，眺望着江面上那水天一色、鸟舞舸飞的苍茫景象。飕飕江风吹拂着他们身着的长衫下摆，一股袭人的寒气直透肌肤，可他们浑然不觉。

这个少年便是毛泽东，中年男子是他东山高等小学堂的老师贺岚光先生。

原来，就在年前李元甫堂长和谭咏春先生商定要推荐毛泽东到省城读书的时候，湘乡驻省中学校董事会向东山学堂发来聘书，邀请该校教员贺岚光先生到长沙任教。李元甫一见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省得毛泽东独自到长沙多费周折，于是在新年过后，贺先生赴省应聘之际，通知毛泽东和他结伴同行。就这样，毛泽东踏上了他首次赴长沙的旅途。

这次从水路去长沙城，是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远行，也是他第一次乘坐轮船，年轻的他既感到兴奋又忐忑不安。一路上，他一直“缠”着贺岚光先生问这问那。贺岚光尽他所知，向毛泽东介绍湘江沿岸的风土人情和省城民沙的概况。

贺岚光告诉毛泽东，沿湘潭往东北约九十里水路，在滔滔湘江东岸，便是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城。长沙，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相传，远古时代大禹王治水曾在这里拖过船，楚国屈原就在这里出生；唐朝大诗人杜甫曾浪迹天涯云游至此；南宋文学家辛弃疾将军，也曾在这里设“飞虎营”，囤兵练武……这里，还有岳麓书院、船山学社、爱晚亭、桔子洲头等名胜，长沙因此而闻名遐迩，声播中外。

在近代，长沙由于它地处全国南北交通要冲的重要地理位置，是中国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很尖锐的地方，也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汇聚的一个中心。太平天国时，这里是农民军和地主武装湘军搏斗、厮杀的重要战场；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志士，曾在这里创办“时务学堂”，编辑《湘新学报》、《湘报》，宣传维新变法主张；随后，革命党人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于1904年在这里建立华兴会，后来成为同盟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曾多次策划反清的武装起义，特别是1906年春，萍乡、浏阳、醴陵地区的武装暴动，曾在全国产生巨大震动。因此，长沙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从事反清斗争的一个极活跃的地方。

贺岚光的话，把毛泽东的心一下子带到了那个他想象中古老而神秘的长沙，带到了那个早已让他心驰神往，而今正风云激荡的长沙……

小货轮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在黄昏前到了长沙城。正如他想象的那样，省城不愧是全湖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不愧是三湘人无限向往的大都市。这里楼房鳞次栉比，街道宽阔笔直，市面热闹繁华，是自己原先到过的湘潭和湘乡县城所无法比拟的。看到这一切，第一次从乡间来到省城的毛泽东，眼界顿时开阔，心情异常兴奋。他在心中极富感情地念叨：“你好，你好！我来了！”

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筹资兴办的一所学校，主要是为了满足湘乡旅省人员的子弟在长沙读书方便而设，其教职员工大都是从湘乡籍人氏中聘请，校董事会就设在长沙湘乡会馆内。到长沙后，贺岚光先生要到会馆联系应聘事宜，于是就和毛泽东一起来到位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贺岚光办完应

办的手续之后，又把毛泽东推荐给会馆的负责人。这位负责人认真听取了贺先生关于毛泽东品学情况的介绍，又看了毛泽东转呈的李元甫堂长的引荐信，当场拍板同意录取他进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当晚，他们师生二人被安排在湘乡会馆客室住宿。这一夜，毛泽东失眠了！贺先生关于省城——这精英荟萃之地的介绍，令他心醉神迷；初到长沙——这繁华大世界的观感，更叫他激动不已。从明天开始，他就要成为长沙这座大城市的一员了，新的生活就要在这里起步了！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民的儿子，能走到这一步，是何等的不易啊！其中的艰辛和曲折、酸涩与甘甜、苦恼与快乐、失望与憧憬，只有他毛泽东体味得出来。

贺岚光先生看着翻来覆去，夜不成寐的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自己的学生说：“润之，快睡吧，明天早些去报名入学，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

是的，明天就要跨进湘乡驻省中学这所颇有名气的学校了，就要成为一名中学生了。正如贺先生所言：今后摆在自己面前的人生之路是漫长的，到底怎样走下去？这的确是他来到长沙后要交的第一张考卷！忽然，他脑海里冒出屈原那句著名的诗：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求索”，“求索……”毛泽东终于在喃喃呓语中安然入睡。

54 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经贺岚光老师热心推荐，毛泽东顺利地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学生”。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的前夜。当毛泽东初到繁华大都市的热情尚未消退时，各种规模的反清秘密起义正此起彼伏，一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一个风云激荡的长沙，向毛泽东张开了它的那双巨臂，欢迎这位勇敢的“弄潮儿”，投身于率领民众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时代洪流之中！

长沙，正处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时刻！民族，正处在新与旧两个时代的交接点！历史，正处在一个方生方死的重大转折关头！

国家已进入一个改朝换代的“非常时代”，毛泽东个人也同样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因为，从这时开始，毛泽东这个读了近十年“孔夫子的书”的大龄私塾生，已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中学生，他将从此开始接受系统的现代化科学文化知识教育，把文化素质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这是他日后政治生命的养料；不仅如此，他所处的那个非常的历史年代，还把他这个不懂政治的年轻人卷进了政治旋涡之中，从此他的学习兴趣将由对“纯文化知识”的追求，上升为有目标的政治追求。

学校，历来是传播新思想的领地。湘乡驻省中学自然也不例外。随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呼声日渐高亢，孙中山、黄兴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影响日益扩大，学校的反清宣传也由隐晦转向明朗化，由秘密转向公开化。为了进一步适应急剧发展的政治形势，湘乡驻省中学专门增设了时事政治课，安排虽到学校受聘时间不长、但在湘乡教育界久负盛名的贺岚光先生，担任这门课的任课教师，及时向学生介绍和传递全国反清斗争的情况与信息，大张旗鼓地灌输革命党人的思想和主张。

湘乡驻省中学安排贺岚光担任时事政治课教员，绝不是偶然的举措。在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贺岚光任过国文、修身和历史等课教员，以一专多能、知识面广泛而受到同事称道和学生尊敬，不仅如此，他平时对国家大事特别关心，在阅读书报的时候，常常将国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摘抄成册，然后熟记于心，在教学或平时与人交谈之中，往往信口道来，竟持之有据，准确无误。这样一来，在湘乡学界，他又有“时事通”之誉。贺岚光的这些过人之处，大概就是湘乡驻省中学聘任他的原故。

贺岚光担任学校时事政治课教员的重任之后，果不负众望，用“教绩斐然”来描述毫不过分。他翻阅了大量的报刊和书籍，进行了认真而充分的备课，然后详尽地向学生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大量史实，和人民群众反抗清廷斗争的情况，特别是重点宣讲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从而使青年学生们看清了原本在他们心目中至高无上的朝廷的所作所为，初步弄懂了许多过去在头脑中一直是模糊不清的道理。尤其是毛泽东，这期间，在贺岚光的精心指导下，他一边尽可能多地学一些文化知识，一边留心观察社会政治动态，从老师讲授的时事政治课和大量的反清救国宣传品中，去领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的思想，汲取大量的政治营养，来丰富自己的政治头脑，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觉悟，为他日后政治上的“腾飞”奠定初步基础。

通过贺岚光先生，毛泽东知道了许多过去密而不宣的“军国大事”。

贺岚光告诉他：就在“戊戌变法”后的两年，即1900年，义和团运动蓬勃发展，八国联军乘机入侵北京。大敌当前，腐败无能的慈禧太后和满朝文武官员，却只会向西仓皇逃窜。几个月后，大清朝与十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在这之前，清廷已被迫签订了十多个充满屈辱的条约。外国使馆早已成了清政府的“太上府”，国中之国的租界已是到处林立，香港、澳门被英、葡所占，北方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归沙皇俄国，通商口岸增设了一批又一批，军事赔款也赔了一次又一次。《辛丑条约》只不过是其中最贪婪的一个。按这个条约规定：中国要赔偿列强的军费白银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本息合计九亿八千多万两，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在北京划定东交民巷为使馆区；拆毁大沽炮台，外国军队驻扎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重要地区。各列强国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控制了大清朝。迫于亡国灭种的危机，也为了安抚民众的情绪，清廷于1905年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次年九月下诏预备立宪，但同时在皇帝的上谕里却堂皇地写道：“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与主权在民的立宪精神南辕北辙。1907年，清廷给各省咨议局规定的职责为“遵谕旨采各自之舆论”。1908年9月，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文规定了君主的至高无上的权力。1909年，又断然拒绝了各省咨议局代表提出召开国会的请愿。1911年4月，就在毛泽东来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不久，清廷又颁布新内阁制，任命皇族权贵奕为首席内阁总理大臣，全国舆论大哗……

在贺岚光先生这里，毛泽东还头一回看到了由著名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力报》。他“发现《民力报》满篇都是激动人心的消息”，立即被它所吸引，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1911年4月27日，黄兴率领一百多名爱国志士在广州黄花岗起义。他们英勇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觉民、方声洞等七十二名革命党人和反清义士英勇殉难。当毛泽东在《民力报》上看到这次反清武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为革命英勇献身时，心情异常激动，烈士们为国为民捐躯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他们。

更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民力报》和经常请教贺岚光先生，毛泽东对于同盟会及其纲领，还有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的生平事迹和革命活动，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知道了许多东山学堂肖佚名先生想说而不能说的事情。

从《民力报》的“人物专栏”中毛泽东知道了许多关于孙中山和革命党的斗争事迹——

《民力报》载，革命党主要领袖人物叫孙中山，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孙中山的名字由此而来。他1898年到檀香山，随哥哥孙眉生活，先后入英美教会学校读书，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由于他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和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早就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愿望。中法战争的失败，给孙中山以很大的刺激，“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1894年，他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遭到拒绝。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使他认识到，要救国，只有走革命的道路。为了“振兴中国，维持国体”，1894年冬，他联合华侨二十多人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并于1895年春在香港成立了兴中

会总部，这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在兴中会宣言中，孙中山指出：中国已面临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的危急局面，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肤小厦之将倾”，并明确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奋斗目标。从此，孙中山就把武装夺取政权作为他从事革命的首要任务，着手进行武装暴动。1895年10月，兴中会联络广东各地的会党、绿林和防营，准备在广东发动武装起义，因事前消息走漏，参加起义的七十多人被捕，起义遭到失败，孙中山亡命海外。1900年10月，孙中山利用“义和团”运动严重削弱清廷统治之机，联络广东等地的会党又发动惠州起义。这次起义由于清廷的重兵弹压依然没有成功，但它具有较广的群众基础和较大的规模，因而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拥护孙中山革命主张的人越来越多，他被公认为反清的革命领袖。

除了孙中山组织的兴中会外，1904年2月，从日本归国的湖南留学生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在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为宗旨，公推黄兴为会长，先后入会的有五百余人。他们联络新军、会党准备在当年十一月举行起义，后因机密泄漏，清朝大肆搜捕革命党人，黄兴等人流亡日本。在这期间，全国各地还成立了一些其他“反清排满”的团体。如：1906年，湖北革命志士刘静庵、吕大生、张难先等，组织了秘密团体“日知会”；同年底，章炳麟、蔡元培、陶成章等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蔡元培任会长，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重新建国，图共和之新政”为宗旨；此外，上海和福建的“学生会”，江西的“自强会”等，都是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为目标。

各革命团体成立后，由于各自为战、力量分散，所发动的起义都先后失败。当时不少人主张“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这时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也一直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团体努力工作。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坚决主张联合全国各革命团体的力量，他在会见黄兴、宋教仁等革命派时，强调说：“现今之主义，总以联络为要”，他的意见获得大多数人赞同。7月30日，在东京召开各革命团体筹备组党会议，各革命团体均有代表参加，经过一番争论，定名为“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召开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各革命团体的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程》和《军政府宣言》，决定组成同盟会领导机构，总部设在东京，国内各省设分部。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主持总部工作，并决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纲领，《民报》作为机关报。11月，《民报》在东京正式创刊，孙中山在为《民报》写的发刊词中，把同盟会十六字纲领明确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后，在上海、重庆、香港、汉口等地秘密建立支部，不到一年时间，同盟会员发展到一万多人。

紧接着，孙中山和黄兴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是1906年12月的萍浏醴起义。它就发生在湖湘大地，由湖南人氏、同盟会党魁黄兴指挥策动。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起义，它虽然后来被镇压下去了，但对扩大同盟会在群众中的影响，振奋革命党人的斗志具有积极作用。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07年3月被迫离开日本，但他毫不气馁，又在越南河内成立革命机关，并连续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

六次武装暴动。这些暴动是 1907 年 5 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六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的防城起义；12 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 年的钦廉防城起义和四月的河口起义。此外，在 1911 年 2 月，还发动了广州的新军起义。这些起义的锋芒直指清廷，满清王朝垮台的日子快要到来了！……

革命的舆论，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的政治参与意识。还在东山学堂读书时，由于受到康梁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就十分关心国家大事，并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来到湘乡驻省中学以后，他虽觉得这里的学习抓得有些松懈，整个学校乃至全长沙都被一种兴奋激昂与躁动不安相混杂的紧张气氛包裹着。但置身于这如火如荼的生活中，他在精神上感到了从来有过的亢奋，心身获得了极大的愉悦，深感只有参与激烈的斗争才更符合自己的性格特色，才更贴近自己要追求的人生目标。因此，不谙政治的毛泽东，很快就被“革命党人”的反清救国宣传所吸引，卷进辛亥革命的激流，为这场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大变革，付出了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

经过一个时期对政治问题的深入钻研，毛泽东敏锐地感觉到社会正处于变革的前夜，为此而异常兴奋和激动，便奋笔直书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标题为《打倒清王朝》，公开张贴在学校门口的墙壁上，大胆地发表了自己对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亮出了个人的政治观点

——推翻腐朽清王朝，组建民国新政府，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出任大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篇文章的发表，在学校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是一个中学生的“政见”！

后来，毛泽东曾就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道：“这是我第一次表达我

的政治观点，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去掉对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崇拜。对他们与革命党的区别也不甚了了”。诚然，从毛泽东这篇文章的主张看，他当时确实还不知道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同康、梁为首的改良派的根本分歧，只是模糊地认为，凡是讲维新、干革命的人都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黑暗腐朽的清王朝，这说明他当时的政治思想还是混沌不清的。但是，他把孙中山列为理想中新政府的头号人物，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孙中山的地位已超过了康梁的地位。这个事实表明，十七岁的毛泽东，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由深受康、梁思想影响，拥护“君主立宪”，到主张推翻清王朝，废除封建帝制和建立共和制。而促使他思想转变的动力，固然有他立志报效祖国，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宏大抱负，但亦不能排除有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和他的老师贺岚光先生的正确引导。

毛泽东在数十年后论及教育时曾讲过类似这样的话：教育问题，终

究是教员问题。他认为老师对于学生关系尤为重大，老师的世界观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学生，老师的素质优劣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学生

操行的好坏。这种论断不无道理，他当年在湘乡驻省中学的经历正说明了这一点。毛泽东刚进入中学阶段便对政治发生极大的兴趣，并迅速投入辛亥革命的历史潮流，除了他得天独厚的自身因素外，不能不承认幸遇贺岚光这位政治时事课老师，并得益于贺先生的教导。

参见毛泽东早年同学、湖南文史馆专员谭泮泉先生《关于毛主席青少年时代的片断回忆》一文，《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10 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 101 页。

由此看来，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的这段学习经历，是他亲身参与政治生活的起始，在他整个一生当中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而他的老师贺岚光先生的引导作用也是不能埋没的。所以，要研究毛泽东求学时代的履迹，就不可忽略他在湘乡驻省中学的这段读书生活；而要记一部毛泽东与他的老师们的“交往关系录”，也就不应忘记贺岚光先生。想当年，毛泽东初来乍到湘乡驻省中学，在长沙城里举目无亲，贺先生对他在生活上的颇多关照、学习上的尽心指点，这是自不待说的。笔者以为 贺岚光作为一名时事政治课的老师，在当时那么个特定时期里，对毛泽东最重要的影响，却在于他充当了毛泽东“政治 ABC”的启蒙老师。通过他这位政治入门向导，毛泽东把知识的触角从文化领域转入到政治领域，甚至转入对政治斗争的直接参与，才有了这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的可能，才有了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可能。这可看作是他整个人生的质的飞跃！

55 剪辫子——第一次政治反叛

1911年春夏之交，全国反清情绪不断高涨，革命形势急剧向前发展。

四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其实质是将川汉、粤汉铁路的建筑权从民族资本家手中收回，出让给外国人。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川、湘、鄂、粤等省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还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武装斗争。五月，湖南省各界召开了万人抗议大会，接着全省各地相继发生了罢市、罢工、罢课的抗议行动。湖南学界尤为激愤，他们“倡言罢课，到处开会演说”。遭到政府干涉后，“学生公然开会不成，则秘密开会，城里开会不成，则聚于岳麓山头。”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

这些情况，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当时还不尽知道。那时的新闻传播工具远不如今天发达，不用说电视机、收音机，就是一张报纸也很难看到，新闻的媒介作用小得可怜。因而，即使国内外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除非是自己亲自耳闻目睹，否则也是一概不知的。为了加强对学生的宣传发动，学校让贺岚光先生利用课堂教学的机会，及时向同学们通报了这些反清斗争的情况。还专门举行了几次演讲会，请贺先生向全校师生员工介绍国内政治形势。通过这些宣传活动，反清排满的情绪在该校愈演愈烈，师生们也一天比一天激动，他们似乎要在一夜之间从清廷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以奋不顾身的姿态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当中。毛泽东几年后在他主编的《湘江评论》第四号中，对当时的情况追记道：“我们学校每天关着大门演说，好些同学慷慨激昂地主张革命。还记得演说的时候，一位同学将他身上的长袍卸下一丢，说：‘快习兵操，准备打仗’。”

为了表示与反动卖国的清朝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提议大家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并建议大家马上把辫子剪掉，有十几个同学纷纷表示响应。

原来，清朝入关的时候，曾要求所有的臣民都按满人的习惯——男人蓄长辫子，以示对满清的归顺和臣服。因此，现在剪掉辫子，就成了反对清朝、拥护革命的标志。毛泽东和另外一位同学带头剪掉了辫子，但是，曾表示赞成剪辫子的多数同学，却又动摇起来，迟迟不肯动手。毛泽东对这种不守信用的行为很不满意，他认为要革命就得有勇气，有决心，不能迟疑不决，摇摆不定，更不能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于是，他和另一个剪掉辫子的同学一起，以信守诺言为由，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强行剪掉了那十几个同学的辫子。

围绕剪辫子的事，毛泽东还和他的一位朋友展开了激烈争论，对于这一问题他们都讲出一套相悖的理论。他那位在法政学堂读书的朋友，从《孝经》上搬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经典，来说明辫子不能剪掉。毛泽东的观点则完全建立在排满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认为大汉民族的男子汉自古就没有留辫子的习俗，它完全是满清统治者强加在我们头上的奇耻大辱，要打倒清廷，就必须剪掉辫子，以示拥护革命、与“鞑虏”誓不两立的决心。

毛泽东的“剪辫行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也是他第一次政治上的反叛，在湘乡驻省中学无异于投下一颗重磅炸弹，引来了相当大的震动，公开站出来支持和反对的人都很少，更多的人是见毛泽东剪掉辫子，留着小平头的模样，在旁边窃窃讥讽，纷纷议论。贺岚光先生是为数很少的支持者之一，他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旗帜鲜明地赞扬毛泽东等十多名同学剪辫子的行动是“剪断了满清鞑子套在汉人项上之绳索，

是悠悠二百余年莘莘学子惊世骇俗之壮举”！只可叹，这位先生顾及身家的安全，自己没能勇敢地站到学生毛泽东剪辫子的行列中来，直到“共和”建立后有了“留发不留头”的禁令，才剪掉自己头上那根蓄了四十余年、又黑又粗又长的辫子。

在进入湘乡驻省中学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成为坚决反对清王朝的人。这表明，在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面前，在具有新思想的老师的影响下，他很快地抛弃了原来的观点，在思想上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正如他自己后来所感叹的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从嘲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进步到要求完全剪除辫子，政治观点是多么能改变人的思想观念啊。”

56 支持“秀才”从军

革命浪潮在不断地涌动着，冲击着每个爱国青年的心魄。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其他省份的新军和会党也纷纷响应，湖南便是第一个起来响应的省份。长期蕴藏在人们心中的反满、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情绪骤然迸发。湖南巡抚杨文鼎极度紧张，马上宣布长沙全城戒严，但革命党人仍然在城内城外秘密而频繁地活动。

有一天，一个革命党人得到湘乡驻省中学校长的许可，由贺岚光先生邀请到学校讲形势教育课。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演讲，革命党人面对数百名师生慷慨陈辞，历数二百多年满清统治和二千多年的封建皇权统治之罪恶，号召大家起来拥护革命。对这次演讲，毛泽东在二十多年后仍记忆犹新：“有七八个学生当场站起来支持他，激烈地抨击满清，号召行动起来建立共和国。这位革命演说家是黎元洪的一个官员，在他向这些情绪激昂的学生演讲时，场上静悄悄的，人人都全神贯注地倾听。”

听了这次演讲后，毛泽东异常兴奋。他认为，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的愿望很快就能实现。对于这场革命，自己决不能袖手旁观。当时，清王朝还在作垂死的挣扎，派遣军队，围攻革命中心武汉，战斗在激烈地进行着。革命需要更多的人加入战斗。毛泽东决定投笔从戎，到武汉去参加革命军。

但是，决策这样大的事情，应该找人商量后才能定夺。父母远在韶山，去信请示将耽搁很多时日；再说即使是去了信，父亲知道他不好好念书而要去当兵，也是不会应允的。要知道，在旧社会的中国农村，人们是恪守“好男不当兵”的信条的。思考再三，毛泽东觉得还是去找贺岚光老师，听听他的意见。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贺岚光先生的住处，把自己的打算告诉给了这位平素最信赖的老师。贺岚光了解了毛泽东的想法以后，当即表示支持学生当兵打仗投身辛亥革命的行动。他还向毛泽东讲了东汉时代班超投笔从戎的故事——

东汉时期，有一个大学问家班彪，他有两个儿子——班固和班超，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习文学和历史。班彪死后，汉明帝授班固兰台令史，令其继续完成他父亲班彪所编写的历史书籍——《汉书》，班超跟着他哥哥做抄写工作。正当他们兄弟俩专心致志研究百家学说，撰写《汉书》的时候，匈奴不断地侵扰边疆，掠夺居民和牲口。班超听说这些情况后，扔了手中的笔，激愤地说：“大丈夫应当像张骞那样到塞外去立功，怎么能老死在书房里呢？！”于是，他在哥哥的同意下，抛弃了案头工作去从了军，走上了战场。公元73年，大将军窦固出兵攻打匈奴，班超在他手下担任代理司马，立下战功。窦固为了抵御匈奴，想采用汉武帝的办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共同对付匈奴。他很赏识班超的才干，派班超担任使者到西域去。班超轻车简行，仅带着三十六个随从人员，先后出使鄯善（在今新疆境内——作者注）、于阗等国，以非凡的胆识和卓绝的才智，劝说这些国家的国王与匈奴断绝了交往，愿意向汉朝俯首称臣。鄯善、于阗是西域的主要国家，他们结交了汉朝，别的西域国家像龟兹（在今新疆库车县一带——作者注）、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一带）等也同汉朝修好了。西域各国从王莽执政时期起，与汉朝不相往来已有六十五年之久。自班超出使之后，才恢复了张骞通西域时期的那个局面，

双方又经常有使者和商人交往了。为了表彰班超的功绩，汉明帝提拔班超正式做了军司马……

贺岚光给毛泽东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看着自己的学生情绪激昂地说：“润之，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学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他们勇敢地拿起了刀枪，驰骋沙场，就是血溅荒丘、马革裹尸也在所不惜。正是靠这种大无畏精神，他们为国家建立了千秋功业，也使自己青史垂名，成为万代传颂的英雄豪杰。润之，你还很年轻，学古人，效前贤，到军营里去，跃马横枪，创一番大业吧！”

听了贺岚光先生这番鼓舞人心的话，毛泽东胸脯起伏，激动异常。他向贺岚光深鞠一躬，道：“谢谢您，先生！感谢您对学生的理解与支持

在贺岚光的支持和鼓励下，毛泽东终于下定了投身沙场，反清御侮的决心。随即，他开始了参军的准备工作——向学校正式提交了退学从军的申请报告：找富有的同学借了一些去武汉所需的费用；邀约了同窗好友郭梓材、毛煦生等人结伴同行；听说武汉地区很潮湿，还特地到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新军营地，找一个在这里当兵的朋友借了一双雨鞋。

就在他即将成行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武昌起义军正沿着粤汉铁路逼近长沙，湖南新军在焦达峰、陈作新的领导下，于10月22日举行了起义，两股革命武装力量同时向守城的清军发动进攻，起义军迅速攻占了长沙城，抚台衙门，在高高的城楼上升起了上书“汉”字的白色汉旗。爬到高处“观战”的毛泽东，亲眼目睹了起义军的勇猛，更加向往投身于这支队伍之中。

焦达峰、陈作新等领导的长沙起义，赶走了清政府的巡抚，将巡抚署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湖南宣告独立了！湖南起义胜利后，立即招募新兵，扩大新军，准备派兵北上支援武昌，以与从北京南下的袁世凯的军队对阵。当时，长沙城中的庙宇、公所、客栈，到处悬挂着招兵旗帜，而应募的人也十分踊跃，特别是城市贫民和农村的贫苦农民，其中也有许多青年学生。“这时许多学生都从了军，成立了一支学生军，其中一人叫唐生智。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它的基础太混乱。我决定加入正规军，帮助完成革命。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还要进行一段斗争。”这样，毛泽东最后没有去武汉，于1911年10月底，在长沙报名参加了革命军，从学校走进了兵营，为他的七彩人生涂上了一笔重彩。

参军后，毛泽东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在新军里，有和毛泽东一样投笔从戎的青年学生，也有来自城乡的忠厚朴素的贫民和小手工业者，还有来自煤矿的坚毅勇敢的工人。毛泽东和周围的士兵及官长都相处得很好。他经常和大家一起拉家常，谈生活，给他们写家信，讲故事。大家都很尊重他，称他为“我们的秀才兵”。

当时，毛泽东年仅十七八岁，但身材已相当高大。入伍后，整日和成年人一起操练、出勤，对此他毫无怨言，十分认真地完成操课任务。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便掌握了军事训练的全部课目，了解了许多武器弹药的基本性能，懂得了军队中诸如行军、打仗、宿营以及防守、进退等方面的初步道理。

在紧张、艰苦的军事训练之余，毛泽东谨记他的老师贺岚光临行前的叮嘱，毫不放松学习，特别是时事政治的学习。

那时，每个士兵可得薪饷银元七块，毛泽东除了每月伙食费所用二三元外，其余的钱，他都省下来购买学习资料。他嫌书太沉太重，不利于在行军打仗中携带和保存，便想起在湘乡驻省中学贺岚光先生那里看到的报纸，它不光轻便，而且知识和信息量又大，很有阅读价值。“当时，那些报刊中涉及革命最多的是《湘汉新闻》，该报讨论社会主义……”，于是，他就订了一份《湘汉新闻》报。

毛泽东后来在陕北，对《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我的薪饷是每月七元——不管怎样，比我现在在红军里的收入多——其中每月伙食费花去两元，还要花钱买水。……余下来的钱就买报纸，我贪婪地读报。”

在那些日子里，毛泽东在每天的操练和值勤之后，他总是抓紧时间认真地阅读报纸，每张报纸的四面，他都要一字不漏地看完，报上的新闻、政论和反映社会问题的各种文字，他都极感兴趣，所以有人称他为“报癖”。

见战友们对自己的行为不理解，毛泽东对大家解释说：“报纸是一部活历史，是一本百科全书，从这上面可以得到许多有用的东西！”

的确如此，通过阅读报纸，毛泽东不仅学到了许多课堂里学不到的知识，还培养了他注意研究政治形势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浓厚兴趣。有一天，毛泽东从《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了“社会主义”这个名词。此后，他读了一些讨论“社会主义”的报刊和文章，并读了江亢虎的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些小册子。那时，报章上对社会主义宣传和介绍是很混乱的，它们所称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社会改良主义。尽管如此，“社会主义”这一名词，还是引起了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和士兵们热烈地谈论这个问题，并热情洋溢地给几位同班同学写信，要求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他的热情并没有唤起别人的热情，只有一个同学回信表示同意讨论。不过，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在他的老师的影响下，对国家大事是何等关心，对新鲜事物是何等敏感，对真理的追求又是何等热切！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毛泽东真正尝到了阅读报纸的甜头。他后来回忆：“我已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1911年到1927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没有停止过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等地的报纸。”事实正是这样的。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消息极为闭塞，毛泽东给白区工作的李立三写信：“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常寄书报给我。”每当战士们下山打仗，他都明确指示：凡是能找到的书报，统统带上山。他要从中研究敌情，指导战争。聂荣臻元帅回忆长征说：“在哈达铺获得了敌人的一张报纸，才知道陕北还有块根据地。我赶快派人把报纸送给毛主席。这才决定向陕北进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一张报纸决定了长征的落脚点。毛泽东的这种习惯，以后一直延续到他的暮年……

1912年春，正当湖南新军准备采取行动与清朝的走卒袁世凯决战时，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宣统皇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孙中山到海外“考察”，让袁世凯当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湖南，军阀政客谭延用阴谋手段刺杀了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篡夺了军政大权。南

《红星照耀中国》第103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103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111页。

京临时政府解散了，南北实行了“统一”，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就这样过去了！

毛泽东本来怀着满腔热情投笔从戎，甘愿当一名革命的“马前卒”，但是没想到一场革命就这样迅速、这样轻易地结束了。这令他十分失望，他感到辫子剪了，清王朝也推翻了，“共和”实现了，但革命并没有使身边的一切发生多大的变化，再留在军队里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这样，他带着迷惘的心情，退出了生活和战斗了半年的兵营。

这次军旅生活虽然短暂，但在毛泽东青年时代乃至一生中都具有一定意义。它不仅为毛泽东提供了一次参加“改朝换代”的大革命的机会，给他传奇的生活履历中添上了重要的一笔；同时，它是毛泽东接触军事的开始，自此他粗知了一些军事常识，是他日后数十年戎马生涯的最初尝试；此外，他在军队接触了大量下层官兵，了解了他们的喜怒哀乐，掌握了他们的思想脉络，同他们建立了较深的战斗友情，并赢得了他们的喜爱和敬重，为他日后改造旧军队、建立新型的革命队伍，以及统率和指挥千军万马，积累了初步的却极宝贵的经验。

应该说，在毛泽东这次重大的人生道路的抉择当中，他的老师——贺岚光先生功不可没。是他，打破当时文人中普遍存在的重文轻武的偏见，坚决支持学生弃学从军的大胆举动，从而使毛泽东走出学校的小课堂，跻身社会的大舞台，去寻求国家和民族以及实现他个人人生价值的艰难求索之路。这无疑是贺岚光先生的过人之处。

第十二章 符定一 ——一代名师

人之为学，第一在得明师。

——一位古代教育家的话

57 “秀才兵”进省一中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湖南湘潭有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与毛泽东的思想感情很接近，受到这位当代巨人的一贯敬重。他，就是毛泽东在“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读书时的老师和校长——符定一先生。符定一号悔庵，字宇澄，是今湘潭市晓南乡新铺村下新屋人，1877年生，比毛泽东年长十六岁。符定一幼年时，父亲曾三次送他学木工，皆因他身体瘦弱多病半途而废。无奈，父亲只好又送他到叔父开办的私塾里去读书。符定一的叔父，是一位颇具旧学的秀才，遂授以《十三经》、《文选》，没料想符定一天资聪明，均能过目成诵。这样，叔父就劝他父亲打消了让他再事农耕和学做手艺的念头，出资送他读书。数年后，他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毕业后考入北京师大。1908年回湖南执教，并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湖南师范校长、衡阳中学校长等职。汤芑铭督湘时，他以其“顾学通儒”的身份选任湖南教育会副会长，后任筹安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不久又当选为国会议员，赴北京定居。1926年后在北京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符定一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他既是一位杰出的文字学家，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

毛泽东同符定一的交往，是从他考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开始的。

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新军退伍后，下决心继续求学。但不知道到底进什么学校于国家和民族更有益，于自己最合适。因此，在选择学校问题上他犹豫不决，举棋不定。

那时，长沙兴办了许多学校，实业的、商业的、法政的……专业种类很多，它们都以各式各样的广告招徕新生。这些广告对富有理想的毛泽东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他只得根据报上登载的广告择校。

一则警察学校的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去报了名。但在应试之前，一所制皂学校的广告又吸引了他，那所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声言可发给一些津贴。广告上还说制皂可以造福社会，利国利民。于是毛泽东改变了主意，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打算投考制皂学校，将来去当一个肥皂制造专家。

这时，天天读报的他，又看到了一则娓娓动听的法政学堂的招生广告，声称在三年内教完全部法律课程，并保证毕业后可以当法官。毛泽东立即给家里写信，把将来当法官的灿烂图景向父母描绘了一番，请求他们给他寄学费来。然后便花了一元钱的报名费报考法科学校，并等候父母的来信。

“命运之手再次以一则商业学校广告的形式插了进来。另一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国家正在打经济战，最需要的就是能够振兴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论点占了上风，我又花了一元钱报考这所商科中学。我真的去注册并被录取了。但与此同时，我继续留意广告，一天，我看到一则描绘一所公立高等商科学校的魅力的广告。它是政府开办的，开设的课程很广泛，我听说该校的教员都是有能力的人。我断定要成为一名经商专家，到那里去更好一些，就又花了一元钱报了名，接着就写信把我的打算告诉了父亲。他很高兴，因为他知道精通商务的益处。我进了这所学校——仅呆了一个月。

“我在新学校遇到了麻烦，入学后我发现大多数课程都是用英语讲授的，同其他学生一样，我不懂英文，实际上，除了字母之外，我几乎一窍不通。另一个障碍就是这学校没有专门教英语的教师。这种情况令我生厌，我

在月底就退了学，继续在报上搜寻广告。”

毛泽东的“下一个求学探险是省立第一中学”，也就是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第一中学是一所很大很有名的学校，在校门前徘徊许久之后，毛泽东最后慕名前往省一中应考。值得庆幸的是，在入学考试中，他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省一中中学校长符定一和老师们都非常欢迎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入校读书，但当毛泽东报名入学后，他们看了他粗壮的身材和土里土气的装束，却不相信毛泽东这个生长在边远山村，只读过半年小学堂、进中学几个月又退学入伍的青年，能考得出那样好的成绩。于是，便由符定一校长做主，加演了一场面试新生的插曲。

次日，符定一让国文教师柳潜把毛泽东叫到一个单独房间，他们二人当面商定文章题目，要求毛泽东限时作文，符定一校长亲自监考、面试。毛泽东不知底里，看到先生这样重视自己，决心全力考好。写文章本是毛泽东的“拿手戏”，但见他略一思忖，便顷刻文思泉涌，一篇文章洋洋洒洒，一挥而就。复试的结果证明，毛泽东这次所写的文章，比入学考试的作文还要好。

符定一执教十余年来，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中学生写出这样文采斐然、妙笔惊人的漂亮文章，阅卷时他禁不住拍案叫绝！高兴之余，他挥起朱笔在卷子上批道：“历观该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人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矣！”最后，毛泽东当然地被学校正式录取了。

就这样，毛泽东这位“秀才兵”在结束了半年多的军旅生活之后，终于进入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求学了。从此，他开始接受符定一先生在语言文字方面给予的指导，开始进行比较严格的政论写作基础知识训练，同时也开始了他与符定一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

58 《商鞅徙木立信论》

在省一中学，毛泽东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学生。这不仅是由于他在一千余名应考学生中名列金榜，而得到学校的格外看重；更主要的还在于，入学后他一直保持着“文章魁首”的美名，而倍受符定一校长和老师们的青睐。

毛泽东的国文教师柳潜，字钧湄，是一个颇有学问的前清秀才。他对毛泽东的文章十分赏识，常常在校长符定一面前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符定一校长也认为毛泽东是位可塑之材，他希望柳先生着力培养毛泽东。

恰好，当时学校正准备举行一次全校学生作文竞赛，符定一让柳潜先生通知毛泽东，要他务必参加这一活动。为了使毛泽东能赛出好成绩，符定一要求柳潜督导毛泽东进行强化训练。由于作文比赛的文章体裁校方已明确规定为论说文，毛泽东就在柳先生的指导下，努力进行论说文的写作练习。在参赛前的近两个月时间内，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柳先生则认真批改，及时提出意见，从而使他的写作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很大长进。难怪有人说，在省一中读书期间，是毛泽东从事论文写作的开始，他后来能写出篇篇震古烁今的政论文，成为一代政论文写作大家，绝不能够说与这段时期严格而刻苦的训练毫无关系。

作文竞赛如期举行，毛泽东果不负符定一和柳潜先生所望，他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以刚健充实的内容、纵横捭阖的气势、严谨善辩的推论和新颖别致的立意，赢得了评委们的极高评价。

商鞅“徙木立信”见于《史记·商君列传》。据《史记》载：

在战国七雄中，秦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中原各诸侯国落后，邻近的强国魏国竟以武力从秦国夺去了河西的大片土地。这种严峻局面逼得秦国不得不进行改革了。

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君秦孝公即位。他下决心发奋图强，首先搜罗人才。他下了一道诏令：不论是秦国人或外来的客人，谁要是想办法能让秦国富强起来，就封他做官。秦孝公这样一号召，果然吸引了不少有才干的人。有一个卫国的贵族公孙鞅，在卫国得不到重用，跑到秦国，托人引见，得到秦孝公的接见。秦孝公问商鞅有哪些治国方略，商鞅说：“一个国家要富强，必须注意农业，奖励将士；要打算把国家治理好，必须有赏有罚，赏罚分明，朝廷有了威信，一切改革也就容易进行了。”秦孝公十分赞赏商鞅的立张，可秦国的一些贵族和大臣却竭力反对。秦孝公刚刚即位，怕闹出乱子，就把改革的事暂时搁置下来。

过了两年，秦孝公的权力稳固了，就拜商鞅为左庶长，命他全权负责改革大计。

商鞅起草了一个改革的法令，但是怕老百姓不信任他，不按照新法令去做。于是，他就让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贴出告示说：谁能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赐给他十两金子。这一举动，引来了许多人的围观，人们觉得这件事很稀奇：一根谁都拿得动的木头，还用得着赏金十两？莫不是左庶长拿百姓开玩笑吧！因此，众人只是议论，就是没有一个愿意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还不相信他下的命令，就把赏金提到五十两。没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依旧没有去扛。正在这时，人群中站出一个人来，说：“我来试试。”他扛起了这根木头，并按“告示”上所要求的把它搬到了北门。商鞅听到报告后，立刻传下话来，赏给这位扛木头的

人五十两黄金。

这件商鞅“徙木立信”的事，立即传遍京城，轰动了全国。老百姓说：“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真是言而有信！”商鞅知道，他的策略已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农业生产发展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攻占了。公元前350年，商鞅又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第二次改革。这样过了十年，秦国越来越富强，周天子只好屈尊打发使者到秦国，封秦孝公为“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中原的诸侯国也纷纷向秦国道贺。魏国不得不割让河西土地，把国都迁到大梁。秦孝公论功行赏，赐给商鞅十五邑的土地，封号为商君……

毛泽东在他参赛的作文当中，就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

毛泽东在文章开头，直言了读该文的体会：“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在这段文字后面，以符定一校长为首的评卷老师写上如下批语：“切实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如报笔，而义法亦骀骀入古！”

接着，毛泽东论述了民与法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法令只有利国利民，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否则，便会遭到老百姓的反对。他写道：“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尽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法令而不善，则不唯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尽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法令应该是为百姓谋福利的。一个好的法令，能使普天下的人受惠，百姓唯恐其不颁布此类法令，即使颁布了还担心其不能生效，必然会竭力去保障维护它，务必使它臻于完善。政府与国民之间是互相“倚系”的，哪有不信的道理？但如果法令不完善，则不仅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反而危害人民，老百姓无疑要阻止这类“不善”的法令。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称颂商鞅是我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他在中原鼎沸、战祸绵延、百姓苦不堪言的时候，推出变法措施，是推动历史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之举。商鞅之法是“良法”，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毛泽东还认为：法令应当像商鞅之法那样，“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写到这里，毛泽东笔锋一转：商鞅变法，老百姓竟对此“悍而不信”，以至他不得不“徙木立信”。从这里可以看出国民的愚陋，也可以看出当政者的煞费苦心，不得不靠耍政治手腕来维护其统治。

文章最后指出，造成百姓愚昧、民智黑暗、国家蹈于沦亡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是此民”、“法是彼法”，国家的法令从来不是为黎民的幸福而设立，老百姓害怕了，统治者早已失信于民，这才有了商鞅徙木立信之举措。

这篇文章，以借古喻今的写作手法，充分抒发了青年毛泽东忧国忧民的政治激情，表达了他对像商鞅这样一心为国为民谋福利的贤能之士的无限崇敬和爱戴之情，同时也对那些不顾国家人民利益的统治者进行了有力鞭挞。符定一、柳潜等先生对这篇文章极为欣赏，在空白处写下了多条批语，如：“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笔力挺拔”；“力能扛鼎”；“积

理宏富”等等。在文末还写有如下总评语：“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评委们称赞毛泽东“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纷纷把桂冠判给他。

毛泽东作文比赛夺魁，符定一校长满心欢喜，他更加喜爱这位才华横溢而又性格沉静的“小老乡”，决心认真栽培。

当时，由于课堂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他便常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书刊。符定一听说毛泽东喜欢课外书籍，便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阅读。其中有一部书叫从《御批通鉴辑览》，它系清朝乾隆皇帝敕撰，全书共一百一十六卷，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编年体裁，纲目相从，是一本十分珍贵难得的好书。毛泽东用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饶有兴味地读完了这部巨著，感到受益颇多。通过钻研这本书，还引发了另一个直接后果，这就是毛泽东对平平淡淡、按部就班地呆在学校里读书发生了怀疑，他觉得自由自在地精读一本书，比在学校上课更有益处些。由此，他产生了变学习各科基础知识为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以及变课堂读书为自由读书、研究大学问的念头。

59 “尖子”退学

像上次在湘乡驻省中学退学一样，毛泽东虽然有退出省一中的打算，但并未贸然行事，而是准备先把自己想法告诉符定一等几位亲近的先生，听听他们的意见再行决定。这时的毛泽东，似乎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处事风格：重大事情自己拿主意，但不急躁冒进，放在一边冷一冷，待认真倾听他人意见，博采众议之后，再由自己作出决断。

1912年夏日的一天，也就是在学校快要放暑假的前些时，毛泽东找到符定一，向他谈了自己退学的想法。符定一听说自己平素最喜欢的学生提出退学请求。颇感惊讶。他不解地询问毛泽东：“润之，在这里学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了呢？是不是先生们对你照顾不周呀？”听符定一这么一说，毛泽东倒感到有些难为情，他只好把自己觉得学校课程太浅，内容略嫌陈旧，常感课堂学习“吃不饱”，以及难于习惯呆板的课堂生活，不愿受烦琐的校规束缚等情况，坦率地向符定一校长谈了。

符定一自然是不愿放这位高材生走。毛泽东才华出众，心性很高，小小一所中学留不住他，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是，符定一不想过早地让他离开省一中，他想亲手栽培他，让他受到最好的文化基础知识教育，然后送他上第一流的大学深造。这样，为国家培养了一个栋梁之材，也算是尽了一份作为人师的职责。想到这里，符定一对毛泽东说：“润之，你的情形是有些特殊，我们可以特别看待，你大可不必退学。从今往后，只要对你的学习有益，可不受条条框框的限制。至于教育内容则可以革新，教学方式也是会不断改进的嘛！你中学尚未毕业，便要中途退学，锦绣前程岂不要白白断送掉！润之，你可要三思呀……”

符定一言辞恳切，真心诚意地极力挽留，使毛泽东深受感动。他诚挚地说：“校长，感谢您的美意！我不会放弃学习，离开省一中后书还是要读的，只不过学习的方式不同罢了。”接着，他向符定一介绍了在家乡韶山自己半耕半读的情况，以及在东山学堂、湘乡驻省中学和半年兵旅生涯期间的自学情况，认为自修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最后，他和盘托出了自己准备到省立图书馆自修半年的学习计划。

听完毛泽东的话，符定一明白学生选择的是一条适合他成长的独特道路，并且去意已决，就不想再勉强挽留了。他双手抚着毛泽东的肩膀，依依不舍地说道：“润之，既然你去意已定，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相信你这样做总是有道理的。不过，一中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以后你可以常来常往……”“好的，先生！”毛泽东深深地向符定一鞠了一躬。

他，终于谢绝了符定一校长和老师的好意，走上了独立自学的道路——一条攀登知识之巅的崎岖道路。

60 定王台下自学者

毛泽东从湖南全省第一中学退学后，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到浏阳门外的定王台省立图书馆看书学习。从1912年冬到1913年春，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极有价值”的半年自修生活。

定王台在长沙城的东南角上。相传在西汉时，有一位定王远离京都，来到皇上赐封的领地长沙。他非常怀念死去的母亲和别离的亲人，为了寄托自己的思亲之情，就在城东南的高岗上筑了一个台子，每当落日西沉之时，便引颈向长安方向远眺。后人称这座定王西望长安的台子为“定王台”。到辛亥革命时，这个土台子早已荡然无存，旧址上已建了一栋二层洋楼。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接受文化人的建议，利用这栋闲置的洋楼创建了湖南第一个省立图书馆。馆内购置了不少当时出版的新书。这里地处偏僻，环境幽静，周围树木葱茏，是一个难得的读书处所。

初进图书馆时，毛泽东见到各种中外书籍和报刊杂志，惊喜异常，不知如何下手。一次，他到符定一那里拜访先生，交谈中说起这种情况，并向他请教如何选择好书和怎样读书的方法问题。

谈到什么是好书时，符定一的看法与常人不同，认为只要是为求知而读书，必定是开卷有益，他说：旧时对于所谓“好书”过于苛求，如朱子《读书歌》就说，好书最难逢，好书真难置。《父师善诱法》中也讲：“天下书，虽至多，而好者极少。……即如四书讲章，何止数百家？其好者，能有几耶？故人欲读一书，宜问有学者；何为善本？得其指点书名，方可购求。不然，误觅庸陋之书，鲁莽诵读，我之学问，反为其所卑隘矣。”他批评这种观点似是而非，太陈腐保守了，束缚了读书人的手脚和思想。所以他指出：书，作为一种知识的载体，只要能给你某种启示，能引起你的感情共鸣，能开发你的心智，这便是好的。有人骂闲书、杂书海淫诲盗，殊不知《西游记》、《水浒传》、《石头记》，还有大禁书《金瓶梅》，乃同“四书”、“五经”、《史记》和唐诗、宋词等在书林共领风骚。

不过，符定一很赞赏古人关于读书方法的经验之谈，他向毛泽东口授了《父师善诱法》中的读书总要：“有当读之书，有当熟读之书；有当看之书，有当再三细看之书；有必当备以资查考之书。书既有正有闲，而正经之中，有精粗高下，有急需不急需之异，故有五等分别也。学者苟不分别当读者何书，当熟读者何书，当看者何书，当熟者何书，则工夫缓急、先后俱误矣。至于当备考究之书，不备则无以查考，学问知识何从而长哉？”符先生希望毛泽东认真借鉴前人读书治学的经验，掌握好自修中的诀窍。他让学生去了解馆藏情况，再根据自己的爱好和知识结构的层次，选择学以致用之书，选择好书和新书，急用的先读，通俗易懂的先读，然后由近致远，由浅入深，扎扎实实，博览群书，真正学到课堂里面学不到的东西。

听了符定一先生关于读书的一席话，毛泽东感到深受教益和启发，他回到湘乡会馆后，拟定了一个以攻读社科书籍为主的自修计划，制定了别具一格的学习蓝图。

毛泽东寄宿的新安巷湘乡会馆，距省立图书馆约三四里地。为了充分利用开馆时间，每天，他总是第一个进馆，图书馆关门时，他最后一个出来。只是在中午的时候，他才休息片刻，到街上买两个烧饼或两块米糕充饥。从头年秋天到次年孟春，毛泽东日复一日，早去晚归，风雨无阻，从未间断。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师傅，深深为这位衣着

朴素，学习异常刻苦的青年人所感动，不久他们便成了好朋友。这位管理员，后来跟随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回忆毛泽东当年在定王台自学的情景时说：那时候，图书馆每天早上一开门，迎接的第一个读者就是毛泽东，他每天天麻亮就动身，到图书馆已等候多时了；每天下午关门，要“欢送”毛泽东，因为他走得最晚，不提醒他，他还不走……的确，强烈的求知欲，驱使毛泽东贪婪地读书，每读一本，他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后来，他回忆这段自修生活时，也曾风趣地说：那时进了图书馆，“我贪婪地读，拼命地读，就像牛闯进了人家的菜园，尝到了菜的味道，就拼命地吃一样。”

这期间，毛泽东广泛阅读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著。他读书的面很宽，什么书都想借来读，像中国的经、史、子、集，美、英、法、俄等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文学、哲学，并穿插阅读了一些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罗马的神话、童话故事书籍。不过，在这里他主要还是集中精力认真读了大量反映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著作以及以进化论为核心的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其中有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亚当·斯密的《原富》、约翰·穆勒的《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等。

这些西方资本主义时期的代表著作，大多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严复翻译的，多在七八年或十几年前就出版了。然而对青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书绝大多数他还是第一次读到。因此，他都感到非常新鲜，越读越有兴味，从中获得了许多新知识，也得到了许多新的启示。其中有些书，如《天演论》，对毛泽东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

《天演论》阐发的“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论观点，和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今不如古”、“颂古非今”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因而当时被称为“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书。其实，《天演论》并不是赫胥黎的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忠实翻译，而是严复为适应中国救亡图存现实政治的需要，有所选择取舍，并夹杂着评论，以发挥自己的政治见解。所以鲁迅说，严复作了《天演论》。译者在按语中常引用中国古代各家思想学说，加以对比、印证、评论，尤其是着重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宋、明理学。这种打破封建思想束缚，蔑视传统思想权威，宣扬自强、自立、自主，提倡发奋图强、救国图存的学说，大大开扩了毛泽东的眼界，对他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开始在他的头脑里生根，民族责任感不断在胸中升腾。

在定王台自学的半年中，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

在省立图书馆的墙壁上，挂着一幅《世界坤輿大地图》，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兴趣。毛泽东每天走到这里，总是站在大地图前仔细看了又看，并认真地考虑，严肃地思索。他联想到当时的社会现实，人民的疾苦，深深感到青年人改造社会的责任艰巨。直到四十年后，即1951年秋天，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几个在北京学习的湖南老同学去看望他时，他还能十分清晰地忆起当年研究世界大地图的情形。他说：

参见周世钊同志在《韶山老人座谈会上的谈话纪要》，1974年5月。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看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是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自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的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的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了，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就更没有影子了。世界原来有这么大！”

“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样过生活，难道不值得我们注意吗？从韶山冲的情形来看，那里的人大部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有无钱治病看着病死的；有交不起租谷钱粮被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的；还有家庭里、乡邻间，为着大大小小的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颈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就更多了。在韶山冲里，我就没有看见几个生活过得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形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的情形，恐怕也差不多！”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注定要过痛苦的生活吗？决不！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是制度不好，政治不好，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制度，所以使世界大多数的人都陷入痛苦的深渊。这种不合理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活的人，幸福的人！”

“世界的变化，不会自己发生，必须通过革命，通过人的努力。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是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要走的道路真长。从这时候起，我就决心要为全中国痛苦的人、全世界痛苦的人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世界大地图向毛泽东昭示了世界的巨大，也引出了他的无限遐想。十九岁的他，从看世界地图联想到社会制度，联想到世界上千千万万受剥削、受压迫的人的痛苦，并决心为全中国、全世界受痛苦的人求解放而奋斗终生。这是多么崇高的理想，多么宽广的胸怀，多么坚定的决心！如何实现这么崇高的理想和伟大的抱负呢？青年毛泽东继续在书海中进行着更艰苦的探寻。

正当毛泽东在湖南省立图书馆兴致勃勃地过着自修生活的时候，新的问题发生了——是年腊月，毛泽东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回到家乡韶山欢度春节。父亲毛贻昌从儿子口中得知了他从省一中退学的事，十分生气。望子成龙的毛贻昌，见儿子既不进学校读书，又不谋职，认为是不走正道。他不能容忍儿子的这种自由行为，强令毛泽东一定要再去报考正规学校，说是如不听话，要么就断绝他的生活来源，要么让他回家务农。

毛泽东拗不过父亲，新年刚过后，他又来到长沙城。元宵节的前夕，毛泽东前往符定一家给老师拜年，同时征询老师对报考哪类学校的看法。符定一认为毛泽东再不宜进中学就读，应该选择一所专门学校。这位毕业于北京师大的教育家，建议自己的学生也能像他一样，去报考师范学校，将来当一名教师，走教育救国、教育兴邦的道路。毛泽东采纳了老师的建议。不久，他终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进入了系统的求学生涯。

就这样，毛泽东结束了定台的自学生活。但是，对这为时半年的自由读书经历，他始终念念不忘。解放后，他还以留恋的口吻对老同学周世钊谈起过这件事。他说：“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增长了知识，提高

了觉悟。”

毛泽东绝非夸大其词，这确是他“学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说它“最有价值”，不只是因为无拘无束的自学，给毛泽东以博览群书的极好机会，而书本又给了这个中学生所需的丰富知识营养，使之茁壮成长成为“柱天大木”；更“有价值”的是，这次自学生活使毛泽东对书——这启开人类智慧之门的金钥匙，真正产生了极为浓烈的兴趣，而书本上的知识又给了一位政治家超越自我的睿智，超越时空的翅膀，超越国界的政治魅力。

的确，从那时开始，书本同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一生与书结伴，永不满足地、不知疲倦地在知识的王国里探索着、追求着。

他酷爱读书。从定王台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后，那个藏书量很是可观的学校图书馆，成了他求知的第二课堂，每天午饭后和晚上熄灯前，只要图书馆开放，最后一排靠窗的那个坐位上，必定有他刻苦攻读的身影；在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期间，他利用在北大图书馆兼职图书管理员的便利条件，更是如饥似渴，手不释卷；在革命战争年代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在延安，他都千方百计设法找书读。书，是他一日不可缺少、较之其他物质享受更为重要的精神食粮。正如他自己曾说过的：“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

他所读之书范围极广，就像他的老师符定一先生教他的那样：不受“好书”和“坏书”的框框限制，好书不迷信，“坏书”不排斥，既不管它是古今中外的，也无论它是政治、哲学或文化、历史的，还是经济和自然的，一概奉行“拿来主义”。他对学习“English”抱有浓厚兴趣，直至晚年还在“啃”英语、日语；从后来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中不难看到，他对《美国全史》很喜欢读；他还嘱秘书找来《怎样认识世界》七八本，“送给同我接近的青年同志阅读”；他要列宁的《做什么？》、《四月提纲》和《六朝之絮》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要看班固的《贾谊传》、《治安策》；他要胡乔木“就延安能找到的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不论是翻译的、写作的，搜集若干种给我。”他将看到的好书，及时推荐给同事和他所亲近的人。要刘少奇看《从猿到人》，“我正在找其他唯物史观的书看，看后再送给我。”；那本家喻户晓的不朽之作《红楼梦》，他也嘱咐少林寺和尚出身的大将许世友“至少看五遍”；他要长子毛岸英看“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历史小说 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对于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他要求从中央到省市地县四级党委委员“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毛泽东不仅爱读书，他还极爱藏书。凡是参观过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的人们，大概都不会忘记那一个巨人生活过的“书的天地”。“菊香书屋”——这座十八世纪中国宫廷建筑的四合院，飞檐走厦，青砖灰瓦，建筑风格很是古朴。它面临碧波涟漪、岸柳依依的南海，毗邻假山叠翠、溪流潺潺的静谷。庭院内老槐苍柏，鸟语啾啾，环境十分幽静。在这里，毛泽东和他的战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运筹决策过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接见过来自五大洲的许多国家的元首、著名社会活动家和学者；邀请过国内不少民主人士、教授、专家等，或商谈科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大计，或讨论诗书，交流常识。总之，这里是世界瞩目的地方，它跳动着时代的脉搏，联系着世界的风云。然而，这里触目所及的几乎全部都是书，又

分明告诉人们：这座原名就叫“菊香书屋”的房子，名副其实地是一所书屋——一所第一流学者的书房。

一走进故居的第一排房间名叫松寿斋，里面并排分列着三十六个高大的木书橱，是毛泽东的藏书处。东厢房原是毛泽东办公的地方，但据说他并不常去，现在这里陈列着他生前阅读批注过的各种书籍和他亲笔修改过的文件的复制品。西厢房的中间安放着一张乒乓球台，毛泽东有时和工作人员一起打打球，作为一种休息和锻炼。左右两间和北房的左间，也都摆放着满橱满架的书。北房的中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右间是卧室。起居室里除了一张吃饭的方桌和几张沙发外，三面靠墙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沙发之间的茶几上叠放着徐悲鸿等人的画册，宋高宗赵构等人的草书字贴等。卧室里除了一张宽大的办公桌，一只藤椅和一张大的木板床外，环绕四壁的仍是书橱和书架，里面放置的是他经常阅读的马列著作。各种学术专著和线装古籍。桌子上放着夹着书签，折着书角的书籍、工具书、报刊、文件。就连睡觉的床上，一半也被码起半尺高的各种书籍占据着，这一奇特现象，是毛泽东为适应睡前醒后，一翻身就能随手拿到所需要的书读，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与书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卧室里的起居用物。作为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作为对中国人民建有特殊功勋的毛泽东，他的生活是极为简朴的。居室里既无一件考究的家具，也无一件名贵的摆设，身上穿过的衬衣、睡衣打着补丁，脚上的皮鞋、拖鞋磨烂了后跟，有着破洞的枕席，洗出窟窿的毛巾，卷了毛的牙刷……这一切，真实地为后人揭开了这位伟人生前的精神世界和业余活动的神秘帷幕。

面对毛泽东故居的“书山书海”，笔者似乎悟出：这位大国的领袖虽贫俭却最富有——他拥有的最大财富是书！我突然产生这样的猜想：他是不是从定王台第一次看到那数不尽的藏书起，就萌发了要聚集这笔巨大财富的念头呢？他是不是从那时起，就抱定了读绝天下诗书、穷尽世上学问的宏愿呢？

是这样的吗？——是的！早在一师读书时，作为穷书生的他，从牙缝里省下几个钱，跑到折旧书店里买下许多“对折处理”的书籍，阅读，收藏了“好几大网篮”，可惜，在1928年被何健的匪兵全部焚毁。后来，他做了“红色的山帅”，从土豪劣绅手上“抢”来不少书，又在长征的万里征程中遗失殆尽。到了陕北以后，他通过“国统区”工作的同志购置了一批各类书籍，可在1947年延安战略撤退时，不得不掩埋黄土之下，后来找不到去向；只有少数舍不得丢下的，由战士们分散携带转移，最后带到北京。这些书，几经战火，染满征尘，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全国解放后，他对自己最大的关注是买书。故居的藏书，大多数是解放后根据他提出的要求，购置充实起来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包括经、史、子、集线装古籍和中外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科技等各门类的主要图书，基本完备，达数万册之多。这些藏书，大体可以反映毛泽东读书的博览广收和兴趣所在。书，浩如烟海的书籍，如同忠实的朋友，伴随着毛泽东度过了他那波澜壮阔的一生，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兼学问家，几乎是在他的心脏快要停止跳动的时候，才结束了他一生从未间断过的读书生活。书，古今中外的书籍，同他的伟大实践一样，给了他无穷的力量，给了他不尽的智慧，也为他的政治生命涂上了绚丽的色彩。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也无论是党内同志还是党外人士，凡是和毛泽东有过接触，读过他的著作，听过他的谈话，都无不为了他的博学强记产生难忘的印象。尤其是那许多来访的国际著名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杰

出的外交家、军事家，世界驰名的科学家，几乎都一致公认：毛泽东是一位知识渊博的政治家，并为此而赞叹不绝，钦佩不已。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称赞：“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位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力的诗人。”英国前首相希思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对国际事务的深刻理解，以及他对历史的知识，使他得以从世界战略出发来考虑问题。”法国前驻中国大使马纳克说：“他（指毛泽东——引者注）在许多方面都是知识渊博的，包括历史、社会学、农业、工业……毛泽东对法国十八世纪以来的历史，对于法国革命，对于十九世纪相继进行的革命，对于巴黎公社，都有深刻的理解，他认为法国革命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性运动的起点。此外，他对波拿巴特别了解，甚至了解那些细节问题。”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杨振宁在和毛泽东会见后说：“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西方研究毛泽东生平和思想颇有影响的学者、《毛泽东》一书的作者施拉姆教授认为，毛泽东“阐述共产主义的著作，善于运用中国历史上的典故，富于文采，从而使共产主义非常通俗易懂而易于为他的同胞们所接受。”

听了上述评价，读者诸君或许能够原有笔者说了这么一通“题外话”吧？或许能将那个中南海内嗜书如命的政治家毛泽东与当年定王台下那个青年自学者毛泽东联系起来吧？！

61 同情革命

1915年后，符定一到北京执教、任职，举家北移。毛泽东暂时和他分手了。

1918年秋，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为继续求学和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与罗学瓚、张昆弟等人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符定一和毛泽东这两位感情诚笃的忘年之交叉相聚了。

这期间，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教授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下，来到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手下当助理员，并进北京大学文学院旁听学习。他除了同杨昌济、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保持密切联系外，还常去符定一家作客。他们研究学问，讨论时局。毛泽东尤其表现出要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强烈愿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了热情的鼓励和支持。在北京，毛泽东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1922年，湖南军阀、省长赵恒惕枪杀了湖南劳工会首领黄爱、庞人铨，激起了长沙各界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反抗怒火。作为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和黄、庞二人的密友，毛泽东对这两位湖南劳工界杰出的领袖人物的惨死，感到尤为震惊。

毛泽东与庞人铨和黄爱有过一段曲折而又诚挚的交往——

那是1921年春，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负责人毛泽东，准备组织湖南学联并联合工人团体“劳工会”，在“五一”劳动节那天组织一次游行示威。可是劳工会负责人黄爱和庞人铨，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不愿合作。为了争取广大工人参与游行示威活动，毛泽东决定利用湖南一师附小主事的公开身份，以到江对面第一纱厂推销书报为由，相机对黄爱和庞人铨开展工作。

他了解到黄爱由于受好友周恩来的影响，十分敬重李大钊。于是，他从自己第一次进京谈起，接着又谈到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情况，继而介绍李大钊写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并告诉黄爱说，李大钊先生是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然后巧妙地把话题转到马克思主义胜过无政府主义、经济斗争必须同政治斗争结合上面来，借机提出“五一”劳动节举行大游行的要求。

黄爱和庞人铨认为：劳工会是搞经济斗争的，参加游行就带了政治色彩。如今为了第一纱厂的复工问题，正在和赵恒惕政府谈判，如果搞了政治斗争，就可能使复工的希望完全破灭。因此，对参加游行的事犹豫不决。毛泽东为打消他们的顾虑，策略地对黄爱和庞人铨说：“正品先生龙庵先生，依我的想法，劳工会应该支持学联。不打劳工会的牌子也行，就让你们用泥工行、染织行、印刷行、箩夫行的名义，参加一些人进去，给学联呐喊助威，这也是劳动阶级的义气嘛！何况，前年驱张也这样搞过。”黄庞二人不好再拒绝，只好说等考虑两天再作决定。

没想到，两天以后，毛泽东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由于最近半年来第一纱厂连续罢工，赵恒惕政府十分恼怒，下令通缉黄爱。黄爱的倔脾气又来了，居然跑到省长公署去申辩，当即被赵恒惕逮捕了。

为了营救黄爱，毛泽东四处奔走，联络各界知名人士，请他们到省长公署去疏通。同时，组织工、农、商、学各团体，开展请愿活动。另外，还秘密进行着游行示威的准备工作。赵恒惕是一个十分顽固的军阀，对于说情和请愿，他根本就不予理睬。这样一来，把许多知名人士气恼了。工人和学生

们更加忍无可忍，到了5月1日，出动了一万人的游行示威队伍，整个长沙城都沸腾起来了。工人和学生的抗议、示威，京沪各报的舆论压力，迫使赵恒惕政府在5月8日释放了黄爱。

此后，黄爱、庞人铨与毛泽东的往来日渐密切，并建立了真诚的友谊。在毛泽东的影响和帮助下，他二人完全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开始信仰马列主义。1921年秋，他们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毛泽东、郭亮、柳直荀一起，积极从事劳工运动……

如烟的往事，勾起了毛泽东对牺牲了的战友的深切怀念，也更加激起了他对反动军阀赵恒惕的愤恨。他一方面利用舆论声讨赵恒惕的暴行，另一方面深入到工人群众之中进行宣传发动工作，号召工友们起来反对反动军阀当权的政府，替死难的工人兄弟报仇。同年十月，斗争的时机和条件已成熟。于是，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举行了全城大罢工，同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随后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任总干事。他率领湖南十一个工团的代表与赵恒惕辩论三天，取得了工人集会、结社等民主权利。

但是，毛泽东却因此触怒了赵恒惕，他咬牙切齿地叫嚣：“有毛泽东就无赵恒惕，有我赵恒惕就决没有毛泽东！”多次通缉毛泽东。符定一这期间虽远在北京，却一直在记挂着自己的学生。他常利用回乡的机会打听毛泽东的情况。1925年，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养病，不料遭到军警的追捕。此时，符定一正好回到长沙省亲，闻知此事，便凭借自己宿儒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从中疏通，力陈他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竭力保护毛泽东脱险，直到毛泽东化险为夷，离开湖南去广州，他才放心。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从北平假道重庆回到湖南，隐居家乡新铺。次年，他被国民党逮捕，解往新化，后经乡亲们设法营救获释。1945年，王震、王首道将军率领的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湘潭株洲时，符定一派儿子前去迎接，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1946年初，符定一根据地下党组织的安排，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参加地下活动。同年六月，毛泽东邀请符先生赴延安共商大策。符定一遂偕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他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欢迎先生的莅临。符定一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政府和国民党的腐败，对解放区给予热情洋溢的赞颂，并号召人民群众跟共产党、毛主席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九月，符定一向毛泽东辞行，先行回到北平。毛泽东托其后返北平的女儿符德芳，捎去一些礼物送给先生，并附亲笔书信一封。信中说：

字澄先生夫子道席：

即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尽。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晒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

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字里行间，表现出毛泽东对老师的一片关怀和崇敬之情。

1947年，符定一在北平再次被国民党逮捕。叶剑英闻讯，即设法营救；

北平各大学教授计八十余人联合向国民党表示抗议。迫于舆论的压力，国民党只得将其无罪开释。

1948 年秋天，符定一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由北平城内化装到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他开始看到这位曾经要使“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学生的宏伟理想和事业即将变为现实，心里是多么高兴啊！符定一在此向党中央提出下一系列建设性的建议，受到毛泽东的欢迎。

62 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全国解放后，符定一同毛泽东保持着颇为密切的交往。

毛泽东常常利用闲遣时间，专程请符定一到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做客、吃饭，有时还和先生切磋语言文字学方面的学术问题。一次，毛泽东对符定一说：“您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我的好多知识就是跟您学的。老先生不愧是一代名师哩。”

1953年7月7日，毛泽东曾写信给先生符定一。信曰：

字澄先生：

今日收到惠书，说尊著《联绵字典》再版嘱为题词事。我对尊著未曾研究，因此不可能发表意见。所谓“秦皇汉武之业”，大概是先生听错了。先生是著作家，似不宜与古代封建帝王的事业类比。方命之处，尚祈鉴谅为荷。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七月七日

毛泽东在信中所提到的“尊著《联绵字典》”，就是指的文字学家符定一三十余年苦心孤诣的劳动结晶。据《辞海》载：“《联绵字典》，辞书。三十六卷，近人符定一撰。此书多收双声、迭韵和失音的字，包括虚词。按部首编排，用反切注音，意义有不同，皆分条注释，——列书证明。但收词并非都是联绵词，论字体完全墨守《说文》，是其缺点。”符定一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言文字研究工作。他对文字这门冷僻枯燥的学问爱之成癖。从1910年起，他即开始搜集我国自隋唐以来经籍中的联绵字，广征博采，废寝忘食，三十年如一日，备尝艰辛，终于1940年编著而成《联绵字典》，其稿本多达八十七册，计四百余万字，叠起来有数尺高，真可谓“著作等身”。

鉴于符定一的德行、才学和名望，在解放初期中央文史馆建立时，毛泽东邀请这位学贯古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表示谦让，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随即补上一句说：“还要才、德、望。”盛情难却，符定一终于就任了新中国的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从此，符定一兢兢业业，尽职尽责，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高的荣誉，他先后被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代表，还担任了国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等职。1958年逝世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第十三章 张干

——被学潮撵走的校长

命运如同海风——

吹着青春的舟

飘摇的，曲折的，

渡过了时光的海。

风雨后——

花儿的芬芳过去了，

花儿的颜色过去了，

果儿沉默地在枝上悬着。

花的价值，

要因着果儿而定了。

——冰心

63 投考师范学校

民国初年，湖南省政府在省会长沙先后创办了几所师范学校。其中，较著名的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第四师范学校。

1913年春，正过着自由自在的自修读书生活的毛泽东，被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一则招生广告所吸引：

“学校不收学费，膳食费低廉”，“教育乃立国之本，学生毕业之后为教育服务”。这引起了毛泽东的兴趣，他认真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前途，认为自己最适合于教书，报考师范学校正符合自己的志愿。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省一中的校长符定一，在符先生的支持和鼓励下，他最后作出了投考师范学校的决断。

于是，毛泽东写信把自己的打算告诉家里，父亲立即回信表示赞成。他随即前去投考，结果以第一名的最佳成绩，被第四师范录取了。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毛泽东的两个要好的朋友，也很想报考师范，但因文章不很出色，担心落榜，就在考前请毛泽东为他们各写了几篇文章，然后背熟、记牢。进入考场后，依样画瓢地写上试卷，不料想也顺利地 and 毛泽东一起被学校录取了。

后来，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情时诙谐地说：“我替这两个朋友写了作文，也给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被录取了——所以，我实际上是考了三次。当时我并不觉得自己顶替朋友作文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只看着是事关友谊而已。”

就这样，毛泽东于1913年仲春时节，跨入了第四师范学校。

湖南的师范教育始于清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当时清廷在长沙的黄泥坝设立了湖南“师范馆”。随后，又扩大了师范教育的规模，改设为三路师范：西路师范在常德；南路师范在衡阳；中路师范在长沙。辛亥革命后，又将长沙、常德、衡阳师范改称为湖南第一、第二、第三师范。同时，还在长沙增设了第四师范。

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坐落在长沙城的西南侧，它的前身是建立于宋代的长沙“城南书院”，这里原是南宋理学家张栻讲学的地方，与另一位大学问家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隔江相望。在历史上，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还留有一段千古佳话。

据传，当年朱熹和张栻是南宋的著名理学家，又同时在长沙授徒讲学，两人关系极密切，经常相互往来。他们都抱着昌明孔孟儒学的宗旨，创立了自己的学派。这样一来，声名传遍全国，前来听讲的儒生，经常有好几千人。他们听完河西的演讲，又来听河东的辩论，使湘江渡口都应接不暇。因此，长沙的百姓们，就把这个渡口称作“朱张渡”，大概兼有纪念朱熹张栻这两位大学者的意思吧！

历史的日历翻到了公元1914年，按当时的说法，就是“民国三年”。距朱张讲学的时代，已经有七百多年了。可是，“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还不失为湖南省的两个学术文化中心。“岳麓书院”还保持着昔日的模样，如今成了湖南优级师范的校址；“城南书院”原有的房屋，早已淹没于荒烟蔓草之中，但近年来又兴建了一片气势宏大的建筑物，这便是“民国政府”设立的第一师范学校。

第一师范的校舍，是当时长沙城里唯一的一栋现代化建筑，人们称它为“洋楼”。那几栋新盖的两层楼房，灰砖青瓦，方柱回廊，门窗顶上都有西洋式圆拱，还带着五彩瓷砖镶嵌的阳台。校园四周砌起了灰色围墙，有好几条小岔道直通大门外的一条大马路，向远方延伸开去，就好像这个灰色巨人的血管。学校的左侧，是一溜五百来级的石阶，直达粤汉铁路线，再稍往前就到了烟波浩森的湘江边。湘江是湖南最长的河流，滚滚江水向北奔流。远远望运，各类船只来往穿梭于江上，各种水鸟在江面上盘旋飞舞。江中心有一座狭长的岛屿，上面种满了橘树，这个岛便叫“橘子洲”，橘子成熟的时节，这片江中沙洲就像一团金红的云彩浮在水面……学校后面那座二三十米高的小山，叫“妙高峰”。从学校内体育场上去，只需几分钟就可爬上山顶。站在山顶上，鸟瞰学校错落有致的建筑群，横看岳麓山的山峰，入夜还可远眺长沙城的万家灯火，自是别有一番情趣。与妙高峰遥遥相对、隔江相望的那座山峰，就是有名的岳麓山。据说，岳麓山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山脉最北的一座山峰。从这里再往北，就是一望无际的八百里洞庭湖。岳麓山上有很多名胜古迹，到处林木幽深，殿阁巍峨，站在山顶，俯瞰湘江两岸，远眺洞庭平原，更觉山川秀丽，气象万千……

第一师范的历史和现状，使它在当时曾以湖南“亚高学府”而驰名三湘，享誉全国。因此，根据这种状况和当时师范教育的需要，湖南省公署教育科指令，将兴建不久的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合并后的学校就叫做“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于是，毛泽东和四师的三百多名同学，还有一批优秀的任课先生，都一起迁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里，四师范春季招收的学生和一师范秋季招收的学生均编入一年级，分别编分为六、七、八、九、十五个班。毛泽东被编入仅有三十八名同学的一年级八班。按学制算，毛泽东等原四师范的学生比原一师范的学生，要多读半年书。

从此，毛泽东同第一师范结下了不解之缘。自1914年春到1918年夏，他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半之久的求学岁月；自1920年秋到1921年冬的又一年半时间，他在一师附属小学担任主事，并兼任师范部的国文教员，作为他掩护革命活动的社会职业。在这个时期中，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年代，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争，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异常激烈，南北军阀混战不休。这内忧外患的时局，使毛泽东不为优异的学业所陶醉，没有走向名流学者奋斗这条路，而是毅然决然地卷入了变革中国社会的历史洪流，成为历史潮流的弄潮儿！

——这期间，毛泽东有幸聆听一批学识卓绝的老师们的教诲，如张干、徐特立、杨昌济、王季范、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罗元鲲等等，他们当中有的和毛泽东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友谊，有的追随自己的学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日后成为我党的高层领导人，有的不能理解当年毛泽东的反叛行为，对毛泽东多有责难，但毛泽东不以为忤，留下了不少尊师重教的佳话。

——这期间，毛泽东结识了一大批聚集在良师周围的优秀学生，他们既是“一师”的精英，也是湘中的人杰。其中有中共最著名的理论家蔡和森、中共第一个妇女部长向警予、早期工运领袖李立三、郭亮，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北伐时牺牲在许昌城下的北伐军团长蒋先云、科学家李振翩、史学家李平心、文学家周谷城，以及李维汉、罗章龙、夏曦、蔡畅、贺昌、罗学赞、张昆弟、易礼容、张国基、周世例……他们结成志同道合的朋友，为

探索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真理而共同不懈努力。

——这期间，毛泽东不但注重储才蓄能，更潜心探索科学的救世方法，试图干预社会，并为实现这一大目标，进行着多方面的准备——他追求真理，崇尚科学；他顽强锻炼，“野蛮体魄”，磨炼意志；他加强修养，砥砺品行；他关注中外局势的变化，积极投身社会活动之中，从结成讨论哲学问题的学习小组到组织学友会，从新民学会到俄罗斯研究会、自修大学、湖南共产主义小组；从二十八画生“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的征友启事，到徒步考察湘省农村；从岳麓山爱晚亭的集会到制定船山学社、自修大学宗旨的讨论；从主办工友夜校到谋求“联省自治”、湖南自治……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走三湘、下武汉、二上北京、三赴上海；驱张、斗赵；创刊、办报、结社……着实干了一番事业。

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毫不愧作地说：在第一师范求学的数年时间，是毛泽东整个学习生涯中的最重要时期，也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折阶段。这里，不只是为他开辟了广阔的知识与智慧天地，更是他成长为一名职业革命家的摇篮。

64 校长年轻本有为

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正值张干在这里担任校长职务。

张干字次^七，湖南新化县人。他家三代贫困，九岁丧父，幼年生活在穷苦饥馑之中。依母靠兄做豆腐卖，勉强糊口。他半工半读，奋发向上，指望跳出苦海，居然成为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毕业后，受聘于第一师范学校，担任数学教员，因其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所以不到三十岁，就当上了号称湖南“亚高学府”的一师范校长。

本来，作为一校之长的张干，按常情而论不会同莘莘学子中的毛泽东有多少交往，但这位不平庸的校长面对的是一位不寻常的“特殊学生”，正所谓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响叮当，故而生出了后来那许多的瓜葛和纷争。

“文革”时期读中学的人大概都不会忘记，由于毛泽东这位伟人曾造过张干的反，张干被戴上了“反动校长”的帽子，被人写进了中学的语文课本。

可是，历史却另有记载：张干在一师任上的一年多时间，保持和扩展了前任校长孔昭绥的改革成果，使学校的民主教育章程化、制度化，是一位颇有建树、政绩卓著的校长。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教育事业曾有所发展，特别是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颁布了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教育章程，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张干担任一师校长后，按照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宗旨令》，在“校章”中规定了较为进步的教育方针，其中说：“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民主主义）规定教育方针。所谓民本主义教育包括三个方面：一、道德实践；二、身体活动；三、社会生活（包括智能及课程教育）以及职业训练（包括智能实习和各种学生会活动）”。张干还提出了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并将“注重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作为教育要旨”。张干主政一师时所秉承的《教养学生之要旨》是：

- 一、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
- 二、陶冶性情，锻炼意志，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
- 三、爱国家，尊宪法，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明建国之本原，践国民之职分；
- 四、独立博爱，为充任教员者之要务，故宜使学生尊品格而重自治，爱人道而尚大公；
- 五、国民教育趋重实际，宜使学生明现今之大势，察社会之情状，实事求是，为生利之人而勿为分利之人；
- 六、世界观与人生观为精神教育之本，故宜使学生究心哲理而具高尚之志趣；
- 七、教授时常宜注意于教授法，务使学生于受业之际悟施教之方；
- 八、教授上一切资料务切于学生将来之实用，以符合《小学校令》及其“施行细则”之旨趣；
- 九、为学之道，不宜专恃教授，务使学生锐意研究，养

成自动之能力。

上述《教养学生之要旨》，虽打上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但对当时一师开创民主教育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其中强调“德行”、“体育”，提倡“自动”、“自治”，主张面向小学等，后来发展成为一师的办学传统。即使在今天，也有可惜鉴之处。

在张干的主持下，一师完善了一套严格的招考新生与毕业分配制度。学校当局在《招生广告》中提出：“师范之责任既重，则师范之价值宜尊。当入学之初，即宜尊重人格，遴选真才，先杜歧趋，以祛陋

习。品题恐失佳士，夹袋詎有奇才。苟有以私相干，定即归而不受（有请托者，除扣考外，并将其事实宣布）。非门墙之过峻，乃器识之

宜先。患在为师，学原为己。进必以正，首杜侥幸之门；求为可知，自膺德育之选。”基于这一认识，规定招生对象必须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在学历上，预科要求在高等小学毕业或年在十四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历

者；本科第一部要求在本校预科毕业或年在十五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历者，本科第二部要求在中等专业学校（农、工、商）毕业或年在十七岁以上与有同等学历者。此外，报考新生还必须是本人自愿。学生毕业后必须对社会尽义务。自受毕业证书之日起，一部毕业生在本省小学校服务不得少于七年，二部毕业生不得少于二年。“因特别情事，经省行政长官认可者，亦得就职于他省或华侨所居地，但以教育事业为限。”

张干认为，学校培养人主要是通过教学来实现的。为切实抓好教学，他和学监主任方维夏等人主持制定了细密的各科“教授要旨”与

“教授要项”，它有三个明显的特色：一是反映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提倡民主和科学；二是反映了三育并重，强调德智体平衡地发展；三是反映了中等师范学校的办学特色，注重专业训练和面向小学。从而，使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完整地在“要旨”和“要项”中体现出来。为培养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教育人材，张干不仅规定有系统完整的教学内容，而且有严格而完善的考核制度，学校明确地从德智体三个方面考核学生，分别叫做“操行考查”、“学业考查”和“体格考查”，仅操行考查的要点就有“礼节、容止、言语、性情、才干、嗜好、交际、修学、服务、职业、运动、整洁”等十二项，“人物互选”是对学生从德、智、体三方面进行全面考查的办法之一，具有民意测验的性质。

张干十分重视教职员在办学中的作用。他积极宣传贯彻部颁《训管理員及教員令》的精神，认为教职员“在校内既为学生所矜式，在校外则树社会之楷模，果具高尚贞固之精神，以终身尽职为乐，则我中华民国学术之发达，风俗之转化，与世界列强同臻进化之盛轨，盖非远莫能至者矣。”要求教职员“于其职务，务宜竭诚将事，以尽先知先觉之责。对学生亲之如良友，爱之如子弟，本身作责，以陶冶其品性，养成其独立自营之能力”为使教职人员各尽其职，学校制定了教职员的“工作总则”和“工作细则”，全面实行工作责任制。“总则”有十四条，主要内容是“教职员受校长约聘或委托，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12—1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以下同）。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39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39页。

须从校长商议督促进行；负责任，敦品行，为学生模范；热心研究教育及所担任之职务。”同时对作息、告假、辞退、相互关系、对外联系等项，都有明确的规定。“工作细则”除对校长、学监和其他职员的责任都有详细规定外，规定教员的职责有十三条。内容是：

- 一、担任教授上及执行教室规则之完全责任；
- 二、依训育宗旨负训育管理之责；
- 三、注意学生操行、学业，随时考查登记；
- 四、编定所任学科教授学年案及预算、决算各表；
- 五、准备所任学科之教授用具或书籍与印刷物；
- 六、关于教科增加设置或改易教本，须先与校长或学监商榷；
- 七、严守教授时间，不得缺课或迟到、早退；
- 八、注重小学教授上之联络及实习本科之监视；
- 九、提倡学生自动，实行启发教授；
- 十、监视考试并执行规则，依限阅卷计分交事务室；
- 十一、教务会议必须出席并执行决议案；
- 十二、组织各科研究会并分掌校务之进行；
- 十三、其他临时委托事项。

张干既注意用规章制度来管理学校，又重视选择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教职员。他上任伊始，就聘用了留学“东、西洋”、学贯中西的伦理教员杨昌济先生；曾任长沙师范校长、有长沙“小学教育之王”之誉的徐特立先生；语言学家黎锦熙先生和有前清举人“功名”的袁仲谦先生等。这些“彪炳冠一时”的学者前来就任教职，的确使一师声震遐迩。许多有志青年为访名师，纷纷投考第一师范学校。

不仅如此，张干还极重视对学生的管理。他要求学生“在校当以致力学业，锻炼身体为务”，“自由以法律为范围者也，学校规则必应遵守之；平等非无秩序之谓也，学校秩序必应尊重之。若忘当然之职分，辄思骛外，失难得之时机，不求进取，是则自暴自弃，后虽悔悟，亦无及矣”。“望诸生保有健全之人格，预储独立自营之实力。我中华民国之前途，惟有为青年是赖”。为了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按礼仪、风纪、服务、时间、场所、赏罚六个方面作了具体规定，这些繁琐的“规定”，有许多是夹杂着封建色彩的条条框框。如仅在学生应遵守的“秩序”一项中就规定了“二十八个不得”，诸如“学生不得经营一切非关学术之事业”，“不得入一切非学术之党社及教育会”，“不得干预外事，扰乱社会之秩序”，“非经校长认可，不得私自开会演说”，“不得讴吟俚曲，调弄俗乐，及购置一切有损无益之书籍”等等。这许多的“不得”，限制了学生的自由，并和一师提倡的自治与自动的“教育宗旨”，也是相矛盾的。这引起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反感。毛泽东在进入一师范后，不愿受这些条条框框的束缚，曾几次想退学。后来考虑到读书总得要进一所学校的，再说一师在当时的长沙还算是办得比较好的学校，这才留了下来。但是，如果客观地评价张干在一师制定的这些管理条例，它还是与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教育状况相吻合的，对维护学校正常的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44 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45 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59 页。

教学活动，也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张干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使第一师范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因工作有才干、有魄力，成绩斐然，深得上峰的赏识，被誉为“年青有为”的校长。

可是，有谁能料到，就是这样一位颇有作为的校长，对青年学生毛泽东的反叛行为难以理解和容忍，以致在一师引起一场“驱张”的轩然大波。日后，他被当作保守顽固、推行封建专制教育的典型，在共和国的教科书中“公开示众”。于是，也就有了这位校长和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共和国首脑的毛泽东之间的种种感情交往，并给世人留下许多尊师重教的佳话……

65 十元钱引发一场学潮

1913年，第一师范学校传达了湖南省议会新近颁发的一项规定：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须交纳十元学杂费。这首先遭到了那些家境贫寒或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大多数学生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原来从四师并入一师后多读半年书的学生，要多拿出半年学杂费！

这个规定，据说是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张干向省政府提出的动议。学生们得知“内幕”情况后，对张干的行为极为不满，认为他为了“媚上”不惜牺牲广大学生的利益，于是纷纷举行罢课，一场声势浩大的校内“驱张运动”便以此为发端。

同学们在校园内外大量散发传单，无情揭露校长张干的所谓“劣迹”，诸如“不忠、不孝、不仁、不悌”等等，以图通过舆论把张干搞垮。

毛泽东看了这些传单以后，很不以为然。他感到同学们这样做，并未切中张干的要害。一天，毛泽东拿着一张《驱张宣言》，找到同班同学周世钊说：这个宣言讲的都是张干私德如何如何不好，不切要旨。我们是反对他做一师校长，而不是反对他当家长、族长。既要赶走他这个校长，我们就要列举他不称职的言行，批评他办学校办得怎样不好。于是，毛泽东提议由他俩合作重写一个宣言。周世钊向来有些胆小怕事，就回答毛泽东：由你一个人写就可以了。这样，毛泽东也未强勉，他找来笔墨纸张在“君子亭”笔走龙蛇，很快便拟就一份新的《驱张宣言》，尖锐地抨击了张干如何对上逢迎，对下专横，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弊政。宣言写成之后，毛泽东组织同学连夜赶印了上千份，次日清晨带回学校，广为散发，还贴到学校最显眼的地方，轰动了全校。

一师的“学潮”，很快传遍了整个长沙城，惊动了省政府衙门。湖南省教育厅当即委派了一位督学来一师，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不得继续“胡闹”。这更使学生们火上加油，他们纷纷给这位督学递纸条，上面写着：“张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上课！”搞得督学狼狈不堪，难得下台。只好答复说：“你们还是上课罢，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同学们见省府要员答应撤换张干的校长职务，一个个奔走相告，高兴异常。他们第一次尝到了小人物斗倒大人物的胜利滋味！张干校长当众被上司贬斥，感到师道尊严受到侮辱，他气火了！

66 给伟人“记过”

正当张干恼羞成怒的时候，有人火上浇油了——一个学监向他告密说，在这次学潮派了“大用场”的那份《驱张宣言》，是二年级学生毛泽东起草的。张干更恼了！

对于毛泽东，张干并不陌生。平时，教员们都住在公寓里，上课就来，下课就走，没有课就不来，对于自己的学生，一般了解得很少。张干作为一个有一千多名学生的“一校之长”，诸事缠身，与学生的交道就更少。然而，对于毛泽东，先生们却有着深刻的印象。伦理学教员杨昌济先生就曾对张干介绍过：毛泽东是“一个特殊的学生”。是的，这个学生长得高高大大的，大概有五六尺的个头，不像个学生倒有些像年轻的教职员，在一般的同学当中真有点“鹤立鸡群”。他的文章做得很好，早在四师并入一师时，张干就听原来的校长夸过：“毛泽东的文章做得极好，不要说在学子当中，即使是我辈同事中也没有几人能做得出来！”他性格倔强，沉默寡言，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信。他常常有奇异惊人之举，有两件事，可以说是全校闻名。

一件事是在路灯底下读书。按照学校当局的规定，学生必须遵守作息制度，晚上九点钟就寝，九点半熄灯。可是，每天熄灯以后，毛泽东就捧着书本，坐在走廊的路灯底下，或者茶炉房的门边，一直读到深更半夜，因为那些地方的电灯是彻夜长明的。他的这一举动，弄得值日的学监很为难：管吧，他的学习精神实在可嘉；不管吧，他又是违反校规的。

还有一件事是在南门口读书。一般来讲，读书人是喜欢安静的，可是，毛泽东却恰恰相反。只要一有空余时间，他就在腋窝里夹着一本书，走到南门口去，坐在街道旁边，不声不响地读起来。这南门口，是长沙城里热闹的地方，走路的人，来来往往不断线；黄包车子像过江的鲫鱼一样，响起一串嘈杂的铃声；卖油炸糍粑的，敲起了竹梆子；卖荷兰水的，扯起喉咙叫喊着……在这样的闹市里，身体差一点的，头脑都要弄得昏昏沉沉的，毛泽东却偏要来个“闹中求静”，说是用这种办法，来锻炼自己的意志……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毛泽东因此招来不少议论，有人说他怪人做怪事，有人称他奇人有奇才。

张干还听人讲，毛泽东认为一师的课程非常繁杂，规则非常烦琐，近二十门学科好比一个“杂货铺”，教学方法又很死板，故不愿在这里浪费时光，提出过退学的请求。因此，他对学校开设的大部分课程不感兴趣，有的课根本就不去听讲，有的课勉强去了也是夹带其他书籍去看。图画课老师就向校方反映过：上“静物写生”时，教师在教桌上摆了一个花瓶，一把茶壶，几只茶杯，叫学生们依样画葫芦。毛泽东拿起教师发给的那张白纸，提起毛笔，信笔一挥，画了一条横线，上面再加上一个半圈，然后在旁边写了唐朝大诗人李白的一句诗：“半壁见海日”，表示太阳正从大海上升起。不到两分钟的时间，就画完交卷了。然后，拿起他喜爱读的书离开第八班教室到自修室去了。图画教师没办法，只好给他四十分——不及格！

……张干把对毛泽东的一鳞半爪的了解，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再联想到毛泽东在这次学潮中带头闹事，起草“宣言”、污辱师长的事，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毛泽东自恃有些才华，目无师长，不守校规，是一个“害群之马”。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擒贼先擒王，毛泽东带头闹事，就拿他“开刀”。于是，张干立即行使校长职权，决定要“挂牌开除”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十七名发动“学潮”的学生，以儆效尤。

消息传出以后，曾为毛泽东讲授过修身、教育和伦理学、哲学等课程
的杨昌济先生及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等教师，对此忿忿不平。杨昌济先生
在课堂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地写下了这么两
句诗：“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杨先生不能容忍学校当
局把他一向寄予莫大期望，并视为“柱天大木”，“当代英才”的学生毛
泽东开除！他先后联络了徐特立、方维厦、袁仲谦、王立庵等先生，仗
义执言，据理力争，并为此专门召开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们鸣不平，
共同向张干施加压力，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与此相呼应，学生们不屈服校
方的压力，不肯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发动罢课，重申自己的誓言：“张
干一日不出一师校门，我们一日不复课！”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张干为了平息事态，恢复教学秩序，终于作出了
让步：同意不开除毛泽东等“闹事”学生。但是，为了保全他和学校当局
的面子，还是给了毛泽东一个处分：记大过一次！

第一师范的学潮总算平息了。可是校长张干却快快不乐，一口气憋不
下。想到自己在一师任教多年，为了十元钱学杂费的事竟要被学生撵走！
历来，在学校只有校长开除学生，哪有学生“开除”校长？这真是闻所
未闻！张干越思越想，越不是滋味，感到在第一师范再也呆不下去了。
于是，便主动向省府教育厅递交了辞呈，卷起简单的行囊，离开了辛勤
工作六年之久的第一师范，到别的学校谋事去了。

67 毛泽东重评老校长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解放初，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旧址——妙高峰上的一所中学里，有一位六十余岁的老者，他面色抑郁，惶惶不安。

他，就是张干——就是毛泽东 1915 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在君子亭起草“宣言”要赶走的那个“反动校长”张干；就是坚持要开除毛泽东等十七名学生未果，而给毛泽东记“过”的那个张干；就是后来被那场学潮驱逐出校的那个张干。

此刻，忧心忡忡的张干，有好几块心病：一是恼恨自己当了“地主”，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家本是贫民，以后任教四十余年，靠积蓄购置了一份田产，却未想成了“剥削阶级”；二是当年自己的学生毛泽东如今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悔不该当初提出开除他，还给了个“处分”，虽然毛泽东是大人物，未必记人之过，但终究是一笔未了的旧帐；三是在国共双方重庆谈判前夕，曾被人所用，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敦促他“应召赴渝，赞襄国政”，还要他“幸勿固执，致人失望”，这岂不是替国民党蒋介石说话吗？张干越想越觉得有愧于学生毛泽东，更害怕毛泽东责怪于他。就这样，张干在惶惑与苦闷中生活，又兼生活窘困，有时竟无以为炊。他想给毛泽东写信，坦露自己的心情和艰难处境，却拿不起笔来。

1950 年 10 月 5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王季范、徐特立、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吃饭。席间，大家谈起了几十年前的往事，仿佛就在昨天，不由人感慨万千。周世钊对毛泽东说：“张干这个人主席可能还记得，他现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家庭生活颇困难。他托我向主席提出请求，适当给予照顾。”毛泽东听说张干一直在教书育人，很受感动。他放下手中的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来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刚才听你说他还在继续教书，解放前他吃粉笔灰，现在还吃粉笔灰，这是难能可贵的！”

“是的，张干抓教育很有一套，那个时候他确实是年轻有为。”徐特立、熊瑾玎都赞同主席的看法。

王季范等一言我一语，提起毛泽东在君子亭起草“驱张宣言”以及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事来。

“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毛泽东不无几分自责他说：“每个学生多交十元钱的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毛泽东的好朋友、老同学周世钊，趁机把张干六口之家的生活窘状和愁苦心境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感慨系之，不假思索他说：“张干是有向上爬的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经过几十年还没有爬上去，可见他没有向上爬的决心，这就算有一定的操守。对张干应当照顾，应当照顾！”

事后，国事异常繁忙的毛泽东，仍然挂记着老校长张干。他先让在北京参观游览的周世钊给张干写信，告诉政府将对张给予照顾的情况，给贫病交加的老人带去了安慰。六天后，也就是十月十一日，毛泽东亲自致函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张次（张干别号）、罗元鲲两先生，湖南教育界老人，现年均七十多岁，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张为校

长，罗为历史教员。现闻两先生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湖南省政府每月每人酌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又据罗元鲲先生来函说，曾任我的国文教员之袁仲谦先生已死，其妻七十岁饿饭等语，亦请省府酌予接济。以上张、罗、戴（袁仲谦之妻——引者注）三人事，请予酌办见复，并请派人向张、罗二先生予以慰问。”

王首道同志接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即派人来到长沙书院路附近张干的家中，专门传达了毛泽东来函的内容，向他表示慰问，并先后两次将一千二百斤救济大米和五十万元人民币（旧币）送到了他的手中，也把领袖对人民、学生对老师的诚挚感情送到了张干先生的心坎里。

幸福从天而降，欢愉弥漫全家。它太厚重、太浓烈，也太突然，张干简直承受不住了。毛润之，旷世雄才呀！他不是如此英明、伟大，如何从无到有，“星火燎原”呢？他不是如此英明、伟大，如何聚天下英豪，使拥有八百万军队的国民党，一败涂地呢？他不是如此英明、伟大，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轮旭日，如何能喷薄而出呢？！……

张干欢畅异常，夜不能寐。

68 “极为系念”！

张干在收到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派人送去的救济粮和资助金之唐，又相继收到同事、同学寄来的三封问候信。一天夜晚，他坐在灯下看着这些信函，抚今忆昔，心潮翻滚，感慨万分，即展纸握笔，饱蘸老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润之吾弟主席惠鉴：

敬启者，近接懋斋、元（周世钊）诸弟得吾弟致汉溟（罗元鲲）先生函，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干服务教育界四十二年，小有储蓄，已为去家秋征（实收为一百八十二石，征去了七十七石）及今年减退消耗殆尽，不得已来省教书，又复旧病浚发，卧床月余，几无以为炊。幸省主席奉吾弟之命，厚赈兼金（人民币五十万元）。经国万机，不遗在远，其感激曷可言喻？今乡里既不可居，省垣又难工作，六口之家，贫与病迫，无实至为可虑。

本年二月十六日，闻吾弟签订中苏条约，当时曾作贺函，闻未收到，兹另纸补写，敬希钧鉴。未此布谢，并颂政祺。

张干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十日

张干将信寄出后，日夜盼望复函。然而，眼看四十多天过去了，仍杳无音讯。毛泽东公务繁忙，他是能想象得到的，但忙到抽不出片刻时间给他回信，他就不以为然了。该不是考虑到身为一国之最高决策人，与他张干这样一个卑微的教师通信，影响不好吧？张干有些失望。可是，就在第二天，张干接到了一封邮自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信的内容是——

次先生：

十月三十日惠书及中苏条约所致贺函，均已收到。甚为感谢！生活困难情形，极为系念，已告省府有所协助。此复，敬颂教祺！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毛泽东的信，行书如行云流水，短信似滞湘源长。尤其是“极为系念”一语，牵心动肠，情重千钧。如果说在此之前，张干以他的学生中能有毛泽东这样一位伟人而高兴的话，那么今天则是他最值得骄傲的时刻——他收到了共和国主席的亲笔信！这是殊荣，也是良药，他的病也似乎好了一大半。一家人笑逐颜开，把毛泽东的信看来看去，张干深怕把信污损了，看过之后连忙深情地将它收藏起来。

喜讯不胫而走，张干的家，顿时门庭若市。羡慕的，分享快乐的，看稀奇的，什么人都有。当然，青少年更多。张干热情地招待他们，向客人们讲起他任一师校长时，毛泽东如何好学不倦，博览群书；如何独立思考，追求真理；如何磨砺意志，锻炼身体；以及如何带头闹事，掀起学潮。他曾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原来是讳莫如深的，此刻竟忘乎所以，向众人絮絮叨叨谈起来，宛如一个天真的孩童……

69 卅五年后又重逢

1951年秋，张干应毛泽东的邀请，来到了首都北京。这对过去闹过“别扭”的师生，在分手三十五年后，又终于重逢了！

此次赴京，张干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怀的两个月……

9月26日上午，张干和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师友罗元鲲、李漱清、邹普勋游览故宫时，传来一个暖人心窝的消息：十一时在寓所等候，毛泽东派车来接去吃饭。

轿车驶进新华门，来到丰泽园门前停稳。张干他们刚一下车，身材魁伟、容光焕发的毛泽东，就笑盈盈地迎候在厅堂前，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动情地说：“老朋友来了，欢迎！欢迎！”随即把客人们请进客厅，让大家就座。毛泽东躬谨谦和，定要张干、李漱清先生坐上方，他自己坐下方。李漱清是毛泽东在韶山读私塾时的老师，已届八十高龄，坐上方理所当然。但李先生定要把首席让给小他十几岁的前校长张干，张干不敢当，直到毛泽东发了话。

叙谈当中，毛泽东叫来子女，向他们介绍自己的老校长和师友，风趣地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师友们顿时消除了拘谨情绪，心里说不出的温馨和慰藉，再看毛泽东子女的神色，则是又惊异、又快活，显然都为爸爸尊师敬老之情所动。

毛泽东又说：“次先生和元鲲先生，都没有加入蒋匪帮，是好的。没有听人讲你们的坏话。”

张干内疚不安，想到当年那场学潮和要开除毛泽东的事，如鲠在喉，欲吐为快。又觉得师生久别重逢，气氛融洽，此刻道出来不好。可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自责了起来：“一师闹学潮那阵，我主张开除你，真是对不住呀……”

毛泽东缓缓摆手，不让老校长再说下去：“我那时年轻，虎气太盛，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随即转换话题，询问起张干现在工作及生活的情形。

张干说：“我在妙高峰中学教几点钟的书。”

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教了。学校应该优待，照送薪水。”

十二时一刻，毛泽东家宴汗席，菜的样数很多，既有山珍海味，又有湖南的家乡风味小菜。头一盆是海参，毛泽东亲自为四位师友夹菜，又一个一个地敬酒。张干也敬了毛泽东一杯，并祝他“万寿无疆”。

饭后，毛泽东陪同四位师友参观中南海，看电影。晚上，毛泽东又派人送来应用物品，每人一套。各为盖被、褥子、布毡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方，面巾一条，袜子一双，香皂一块，牙刷各一枚。他们事后得知，这些东西都是毛泽东拿自己的稿费购买赠送的。

张干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

9月27日下午三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受毛泽东之托，来到寓所，亲自为张干等师友检查身体。在这样规格的待遇面前，四个老人无不坐卧不安。张干更是如痴如梦，连傅连璋说他“身体很好，没有毛病”，都没有听清。

在京两个月，张干不但国庆时登上天安门观礼台，游览了京津名胜古迹，还第一次乘坐飞机鸟瞰长城和首都风光。昔日的同事徐特立请他到家做客，学生萧三宴请赠诗书。你来我往应接不暇。一师校友、统战部部长李维汉，

特地接张干去相商恢复一师原貌之事。张干侃侃而谈，与李部长的看法不谋而合。李部长还邀请张干到中央文史研究馆工作。张干不胜感激，因考虑到北京生活费用较湖南为高，一人薪金难养六口之家，便放弃了这一为人羡慕的荣誉性职务。

张干心情舒畅，信步上街，买了一根手杖，10月27日，农历重阳节这天，他又到商场刻了两颗铜质图章：一书“张干印”，一书“张次章”，都是隶书，作为永久的纪念。

11月8日下午三时，毛泽东邀约张干、李漱清、罗元鲲、邹普勋四位师友，来到中南海瀛台，合影留念。晚上，再次请他们吃饭、看电影。

11月12日，张干行将启程南归时，毛泽东派人送来零用钱一百万元（旧币）、一套衣服和一件呢大衣。并特地给他捎来鹿茸精一瓶，嘱咐每日服二次，每次于饭前二十分钟服二十滴。毛泽东还请来人转告他的关照：望张干多多保重身体。

在南行的列车上，张干依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一次次回味着六十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一次次回味着在京期间写给毛泽东的信。

润之主席惠鉴：

敬启者，干此次来京，荷蒙殷勤接待。食用兼金，被褥衣裳，全部赠给。不但给干以彻底自新之鼓励，而且足以挽回轻视教育工作者与老者之作风。愧受之余，感佩无报。兹干于参观此间办理较优之名校后，即行南返，继续学习，估蒙不弃，委业重任，自当尽力完成，以副厚意，决不以年老家贫有所顾虑而误事也。

一此道谢，敬颂政祺，并希照拂不一。

张干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日

张干从北京归来后，先受聘为省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议，后受聘为省人民政府参事室顾问，每月领取优金，加上学校薪水，一家生活有了保障。他常参议国家大事，应邀作报告，深为人敬重。他认真学习，解剖自己“因受孔孟中庸学说及康梁改良主义的影响，对于国事，无论国体如何，总希望有圣贤出世，把国家弄好，使人民能安居乐业。所以在清末同意保皇党康梁之维新，而惜其不成；在民初，同意军阀袁世凯做总统，而惜其称帝；即对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也未尝不望其与中共会谈”，结果无不成梦幻。

六十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虽有所好转，人民生活依然比较困难。此时，张干身体不适，生活拮据，1963年，张干曾在病中两次写信给毛泽东，请他设法帮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接信后，毛泽东一面积极为老校长张干分忧解难，一面给湖南省副省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亲笔信：“老校长张干先生，寄我两信，尚未奉复。他叫我设法助其女儿返湘工作，以便侍养。此事我正在办，未知能办得到否？如办不到，可否另想办法。请你暇时找张先生一叙，看其生活上是否有困难，是否需要协助。叙谈结果，见告为荷”。

不久，毛泽东便接到了周世钊的复信。1963年5月26日，他又亲笔给张干写了一封回信：

次先生左右：

两次惠书，均已收读，甚为感谢。尊恙情况，周元（周世钊——引者注）兄业已见告，极为怀念。寄上薄物若干，以为医药之助，尚望收纳为幸。

敬颂早日康复。

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信中提到的“薄物若干”指什么？谁知竟是毛泽东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捎来的二千元人民币！

张干万万没想到，毛泽东给他这么一大笔钱。这哪里是“薄物”，这是“厚馈”；这岂止是“药物之助”，而是恩情并重啊！张干唯怨年届八十，耄耋老矣，不能奋起精神，大展宏图，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便谆谆教育儿女，要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的博大的胸襟，处世待人要正直，要有一技之长，以此报效国家。

1966年9月，“文化大革命”中有人造谣说，张干家藏有金银，是过去剥削来的。加上他当过“反动校长”的那一段历史，便被抄了家。抄走了张干心爱的书籍、资料、外带五百元存款。此时，张干瘫痪在床，起坐困难，气得全身颤抖。老人凄楚异常，病体更难支。他日夜思念毛泽东。

百思不解的张干之子张六如，在母亲和姐妹的支持下，悄然奔向火车站，火速赴京。折腾了十多天，总算见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负责人，带回一封加盖了中央办公厅大印的函件和五百元生活补贴费。于是，抄去的一部分东西和五百元存款给退回来了。从此，再没有人上门高叫“造反有理”了。

1967年1月21日，张干——这位被毛泽东誉为“湖南教育界老人”的教育家，在长沙的家中溘然辞世，享年八十三岁。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1页。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93页。着重号是作者引用时加的。

第十四章 袁仲谦：

——非同寻常的国文老师

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

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

几有所学，皆成性格。

知识就是力量。

——弗朗西斯·培根

71 “袁大胡子”

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在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记述：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时，“学校里有一位国文老师，学生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袁大胡子’”。

斯诺以毛泽东的口吻回忆说：“……他揶揄我的文章，称之为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奉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半通不通。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我研读了韩愈的作品，掌握了古文的写作技巧。所以，这该感谢袁大胡子，至今，我还能写出过得去的古文。”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其任课老师多达数十人，时过二十多年后，他独独不忘这位“大胡子”先生，向一位外国朋友娓娓道出这位老师对他学习上的深刻影响，由此人们不难想见，这位被学生背后称之为“袁大胡子”的先生，在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同寻常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袁大胡子”这位严师，作为一个普通师范生的毛泽东，读不了那么多的书，成不了一代政论大家；而日后作为一个卓越政治家的毛泽东，也许就没有那无穷的智慧和才具，其个人魅力或许要逊色许多！正因如此，他在这本专门记述伟人之师的小册子中，当然地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这个叫“袁大胡子”的老师姓甚名谁呢？原来，他的真名实姓叫袁仲谦，表字吉六，湖南新化县人。186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书香门第的家庭里。他自幼在家风的熏陶下，苦读诗书，二十余岁时投身科考，终于金榜题名，中了举人。此后，他谨遵父命，拒绝入仕，一直在私塾、书院教书授徒。1913年春，到新建的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毛泽东是他任课的预科第一班的学生。

1914年春，根据省公署教育科的指令，第四师范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袁仲谦也随三百多名学生一道转入一师任教。在这里，他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员，一直到1918年夏季毛泽东毕业，前后达五年半之久，是毛泽东在一师学习期间教课时间最长的老师之一。

袁仲谦到四师任教的时候，正是四十五岁左右的年龄，却生就一副长长的“挂脸胡子”，轮廓分明的方脸上，有一双冷峻的眼睛，再加上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乍一见面便不由人生出几分敬畏。他为人刚正，秉性耿直，平时的言行举止保留着前清绅士的遗风，在讲堂里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折不扣，特别是对那些不认真学习、有违课堂纪律的学生，甚至还来点诸如“罚站”、“面壁”一类的体罚。所以，不少学生既怕他，又恼他，有的人就在背地里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袁大胡子”。

就这样，“袁大胡子”的称呼，便在同学们中间渐渐传开了。

《红星照耀中国》，第107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107页。

72 学生“不敬”先生

1913年，早春二月的一天，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教室，教第一堂国文课。

讲课伊始，袁先生想认识一下学生，就拿起学生“花名册”点起名来，他念一个学生的名字，那个学生就站起来答一声“有”，这样师生算是见面了。

“毛泽东”当袁仲谦点到第四十位，也就是最后一位学生的名字时，随着一声略显柔弱的回音，从后排座位上站起一个年轻人。只见他大约二十左右的年纪，长得高大，粗手大脚，身穿粗布衣裤，里面大概连棉袄也没有穿，在早春时节里显得十分单薄。“这是一个农家子弟”，袁仲谦在心里得出这样的结论。

毛泽东看见袁仲谦在打量他，有些不好意思，他向先生行了注目礼，然后腼腆一笑。袁先生被毛泽东敦厚的神情和彬彬有礼的举止所动，不由得又朝他多看了两眼。他发现这个学生有一张俊秀的脸孔，五官轮廓端正、分明，前额宽阔平滑，特别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更是闪烁着聪慧的光泽。“这是个天资聪颖的学生！”袁仲谦又暗自作出这样的断定。他面带满意之色，向毛泽东微微点了点头，用手示意自己的学生坐回到他的位子上。就这样，袁仲谦这位不平常的老师和毛泽东这位“特殊的学生”相识了。

这节课，袁仲谦讲授的是古典名著《严先生祠堂记》。

《严先生祠堂记》是一篇碑文，系宋朝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所作。光武帝是汉朝的一代明君，在位执政三十三年。在继位之前，叫刘秀，曾与学士严光交情甚厚。刘秀登基后，邀请严光一同执政，但严光不爱仕途，他推辞了。当朝宰相范仲淹——也是一大文士，应邀作了一篇碑文。全文二百一十九个字，充分表达了他对光武帝和严光的敬慕之情，赞美了他们所显示出的高风亮节——光武帝贤君爱才，严光不爱权力和俗名。这篇碑文素负盛名，后来收录在各种文学课本里作为“精选文章”，国文教员也往往以讲解此文为乐事，以便使学生从文章的思想内容和文采中获益。

袁仲谦在上完这课以后，要求学生写出他们读过这个故事后的感想，作文题目叫“评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谁也没料到，因做这第一篇作文，毛泽东差点和老师闹翻，本来已对毛泽东怀有好感的袁仲谦先生，也因此对自己的学生有了看法。

事情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毛泽东在作文中，对范仲淹的说法不以为然，提出了与袁先生相左的解释。他认为光武帝仅仅请朋友帮忙处理繁难的政务，未必就是求贤若渴；还认为严光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纯洁高尚。如果他早知道自己不会接受光武的委任，那么他为什么还来拜访皇帝并与之同床共寝呢，这不也表明了他图权贵慕虚荣吗？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光武初主朝纲，正是用人之际，无论作为刘秀的朋友还是国家的臣民，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严光都应当危难受命，出任宰相，辅佐刘秀，就像比他早二百多年的前贤张良辅佐汉高祖那样……

袁仲谦在批改作文时，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毛泽东那初具特色的小楷字，它笔划粗重，似乎是受不了小方格的束缚，要“挣”出框框之外，两个字竟占了三个格子！“这个毛泽东，看来是颇有个性！”袁先生暗自思忖道。及至阅读正文时，他立时被毛泽东在文章中表现出的那娴熟的章法、

通达的文理所吸引，他挥笔写下眉批：“大有孔融笔意”；当看到毛泽东打破传统看法，跳出先生提示的思路，独树一帜另立新意时，袁先生心中虽有一丝不快，但他对于这个学生敢于超越前人，大胆创新的学习精神，却是极为赞赏的。他又批道：“似有创见”！

一篇一千多字的文章，袁仲谦一口气读完了。正当他挥动狼毫笔要给毛泽东的文章写总评语时，却皱起了眉头。原来，毛泽东在作文的后面写了句“民国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一次作文”。袁先生看后心里想：我没让你这样写，你为什么偏偏要这样写呢？看来这是一个不守规矩的学生，想到这里，本来思想就较守旧的袁仲谦心里感到大为不快。他决意挫挫毛泽东的锐气，于是就挥毫写下如下批语：“作文、做事须守一定之规，切忌标新立异！”

批改完毛泽东的作文，袁仲谦来到预科第一班的教室，把作文本退还给毛泽东，要他把文章重抄一遍。毛泽东弄清事情的原委之后，觉得先生太专横，便没有理会。后来上国文课，袁又两次催问，毛泽东都回答“没有抄”。那时的学校，仍奉行师道尊严，先生是绝对的权威，学生必须唯先生之命是从，毛泽东公然违抗师命，袁仲谦认为这是“不敬”，因而很是恼怒，便气冲冲地将毛泽东的作文本撕了。可是，毛泽东自有自己的处事标准，绝不盲从，先生的过人行动触发了他的反抗意识，他起立质问袁为什么要这样做？并要同袁一道到校长那里去评理，弄得他十分尴尬下不了台。最后，在再抄一遍时，毛泽东仍加上了关于写作日期的这句话。袁仲谦对这个倔犟的学生无可奈何，也就不了了之。

“作文风波”过后，袁仲谦让学生给顶了牛，心里老大不高兴，不再管毛泽东了。可是，毛泽东就好像偏偏要存心和他作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短处”，出了他的洋相。

一天，一位工友不小心，打破了庭院里的一只大花盆。这事被兼任学监的袁仲谦知道了，就把那个工友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工友承认了错误，他还是不依不饶，用手指着工友的脸大骂一通。恰好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打这里路过，深为这位工人师傅鸣不平。他顾不上师生礼仪，大声说道：“哪里这样恶，要这样骂人？有事可以好好说嘛！”袁仲谦虽然感到毛泽东多管闲事，但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只好住口了。

这两件事情发生后，袁仲谦认为毛泽东目无尊长，不敬师门，再也不大理睬这个“犯上”的学生了。

73 不“打”不相识

光阴荏苒。一转眼，一个学期过去了，两个学期又过去了。

1914年春，遵照省公署的指令精神，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后，袁仲谦和毛泽东也都转入一师继续教书和读书。真是“山不转路转，河不弯水弯”，袁先生竟又是毛泽东所在的一年级第八班的国文教员。

隔膜能导致疏远，可疏远却更能冷眼窥视人的全貌。这期间，袁仲谦在授课过程中审视着自己的学生，毛泽东也在学习中观察着老师。终于有一天他们感到彼此之间的成见消逝了。

在这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毛泽东看到袁仲谦先生虽然思想比较守旧，教育方法也有很大成份是封建式的，可是，他酷爱祖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博览古代经、史、子、集，对“国学”有根深的造诣。他治学严谨，常以古籍中古人的品行和治学精神自励，具备了为人师表的许多优良德行。他对教学尽职尽责，诲人不倦；对学生尽心尽意，从难从严要求。他在教授国文课过程中，善于用中国历史上一些史学家、文学家、诗人、书画家的成就和治学精神激发学生，要求大家“真心求学，实意做事”，要有“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志气……慢慢地。袁先生的形象在毛泽东眼前矗立起来——这是一个好老师！他不禁自责起来：老师不让在作业本子上乱写，这本来就没有大错；训斥做错了事的工友，充其量是个方法问题，用不着自己当着众人的面去抹老师的面子，让老师下不了台。想到这里，毛泽东深感自己有些对不住袁先生。他打算抽时间找老师道个歉。

袁仲谦又是怎么看毛泽东？经过一年来的交往，他感觉到毛泽东显然比以往成熟多了，个性也没有过去那样“冲”了。尽管先前有过两次顶撞先生的事发生，可他学习国文课的情绪却丝毫不受影响，相反。在学校开设的二十多门课中，毛泽东最喜欢的是国文和与之相关的历史、地理，在这些课上面花的力气、下的功夫也最多，更令袁先生欣慰的是，毛泽东具备一种勤奋好学、刻苦钻研文化知识的浓厚兴趣。他对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十分用心，从先秦诸子百家，到宋明理学；从楚辞汉赋，到唐宋古文；从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有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探讨。他也十分喜欢诗词，能背诵几百首。对于中国书法，他很感兴趣，天天坚持练碑帖，获得了可喜的成绩，他的“兰亭体”是全校著名的。他对于外语也很重视，认为外国语是“中国人看世界之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为此，曾刻苦攻读过一个时期的英语。他重视探讨历史，特别是对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顾祖禹的《读史方輿记要》，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新出版的史地书和杂志上的史地资料，也多方搜集。对于哲学，他不仅上课认真听讲，认真作笔记，深入思考，而且还利用课余或自修时间深入钻研，或找老师

请教，或与同学研讨，对于某种观点、某种思想，他都要通过深究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或赞同，或反对，或进一步深入阐发。他求知欲极强，读书面甚广，由于囊中羞涩，买不起书，就常常到古旧书店去买折价书。他还常向老师和同学借书，见其喜爱的内容，便认认真真一笔不苟地抄录下来。他有一个冠名《讲堂录》读书笔记本，里面就手抄有古代大诗人屈原的《离骚》和《九歌》，由此可见其爱好之深。

像所有的老师一样，袁仲谦历来喜欢和看重有才华、成绩好的学生。平时对学生从严从难要求，也是为了在自己门下多出几个“高足”。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的师范生，对古今中外的文史哲学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并已

有这样深的造诣，这的确令他颇感意外和惊讶！人说“不打不相识”，通过这一年多对毛泽东的深入了解，他感到自己已完全改变了对这个学生的看法，深为能有这样一位门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74 “兰亭体”记《讲堂录》

毛泽东有一本课堂笔记，冠名《讲堂录》。袁仲谦对它极感兴趣，特地找学生借来阅读。透过这本笔记，袁仲谦对于毛泽东那种勤学苦思，积久成学的学习风格，甚是欣赏。

《讲堂录》这本读书笔记共四十七页，一万余言，它全部是毛泽东用“兰亭体”小楷字书写而成。在前面的十一页中，《离骚》和《九歌》全文抄录，一笔不苟；后面三十六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记。它所记范围很广，凡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汉书、唐宋古文、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等，都有所涉及。有许多处是评论中国历代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也有论及拿破仑，凯撒与福泽谕吉等外国著名人物的。所读各篇，凡典故、同义、要旨和警句，都分条写出，间或夹以议论。这些议论多是做人和治学的随感，却包含了较深刻的哲理。内容和观点并非完全是毛泽东自己的，但至少是经过他理解，消化和加工整理而成的。袁仲谦感觉，只有一个在讲堂里认真听讲的学生，才能抓住要点，获得精萃，并有这样的《讲堂录》。

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写道：

“理想者，事实之母也。”

“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 ”

“某氏曰：吾观古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

“语曰：毒蛇螫手，壮志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仕人者，以天下万事为身，而以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天下生者，仁人人为之除其痛苦，图其安全也）。 ”

——这是说做人要有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为了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和改造社会，要舍得牺牲自己的一切。

“修身。人性多耽安逸而惮劳苦。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人而懒惰，农则废其田畴，工则废其规矩，商贾则废其所鬻，士则废其所学。业既废矣，无以为生，而杀身亡家乃随之。国而懒惰，始则不进，继则退行，继则衰弱，终则必亡。可畏哉！故曰懒惰为万恶之渊藪也。”

“奋斗。夫以五千之卒，敌十万之军；策罢（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如此而欲图存，非奋斗不可。”

“朝气。少年须有朝气，否则暮气之中。暮气之来，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坟墓。”

——这是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要发扬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神。

“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不谈过高之理，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之愈。”

“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

“天下之道未有见之不真，蓄之不厚，而可以苟为之者。”

“盖未有力不足以举天下之烦，气不足以练天下之苦，性情不足以扶持天下之一偏，而可以大有为者也。”

“既明而断矣，事未有不成者。”

——要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必须进行艰苦的积蓄功夫，脚踏实地，不事喧哗，从而使自己具有真才实学，方能有所作为。

“夫善积而成者也。是故万里之程，一步所积；千尺之帛，一丝所积。差一步不能谓之万里；差一丝不能谓之千尺。朱子学问，铢积寸累而得之。苟为不蓄，则终身不得矣。”

——刻苦攻读，持之以恒，一个人人格的完善和学问的长进都有赖于“积累”，这是他治学的经验之谈。

“为学之道，则不得不重现在。何则？某氏有言曰：以往之事，追悔何益？未来之事，预测何益？求其可据，惟在目前，有目前乃有终身。诚哉言矣！使为学而不重现在，则人寿几何？日月迈矣，果谁之愆乎？盖大禹惜阴之说也。”

——为学之道，要“重现在”。就是说，如果过去已经浪费了光阴，“追悔何益”？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从现在开始，持久坚持，以“久”制胜。

“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宇尚已。”

“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湖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积，则不知衣服之所自。”

——毛泽东认为，学习不但要善于读死的书本，而且要善于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而且要读无字之书。只有书本知识而脱离实践的人，是担当不起改造中国和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的。他十分赞赏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治学经验，尤其向往司马迁周览天下名山大川、开阔胸襟的壮举。

……

阅读了毛泽东的《讲堂录》以后，袁仲谦先生清楚地看到了学生那深厚的古文功底、宏大的抱负和超凡的志向，这在他执教数十年来是未曾见到过的。他认定：这是一块玉石，凡经雕琢定会成为无价之宝。毛泽东天生丽质已定，一切全待那高明工匠的功夫了……

75 “李氏芋园”论读书

清明时节，阳光明媚。长沙的春天是短促的，象这样美好的天气，实在是难得。

第一师范的校园里，一串串的紫荆花，一团团的白绣球，迎着暮春三月的和风，嫣然开放了。入夜，微风吹拂着花枝，飘散着浓郁的香气。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家住长沙的同学，早已回去了；外地的学生们，也在自寻乐趣，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猜诗谜。毛泽东没有参与这些娱乐活动，草草吃罢夜饭以后，稍事收拾便在腋下夹一本书和一个笔记本，匆匆往“李氏芋园”赶路——他是应袁仲谦先生之约，前往他的家里谈话的。

进了南门口，通过大古道巷，到了天心阁脚下，再往北走，就到了浏阳门正街。来到一个黑漆的院门前，门顶上有“李氏芋园”四个字，门正开着，毛泽东跨了进去。

这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几栋楼台馆舍，颇为精巧，园内亭阁花树，池塘假山，显得十分玲珑雅致。前些年，这里建起了一个“衡粹女校”。如今，学校迁出去了，这里的房屋，就做了第一师范和别的几个学校的教师公寓。

毛泽东知道，住在这里有这么几位先生：修身教员杨昌济、历史教员黎锦熙、国文教员袁仲谦、算学教员王立庵，以及校长张干、学监主任方维夏和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等，这许多知名教师聚居于此，平日来往的先生和学生都很多，经常性的拜访和讲学，也十分频繁，使沉寂幽静的李氏芋园变得热闹起来。

毛泽东来到一处僻静的独立小院跟前，轻轻地叩响了那扇红漆大门。一会儿，袁仲谦的夫人戴师母打开门，把毛泽东迎进屋里。

袁仲谦先生正在书房备课，听说毛泽东来了，立刻放下手中的笔，起身和他打招呼，并让他到书房里面坐。戴师母送上茶水之后，师生二人面对面地坐在藤椅上，开始了他们之间的第一次深谈。

袁仲谦先生以关切的口吻，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世、家庭和个人经历，毛泽东就把自己韶山冲启蒙、东台山求学、参加新军、定王台自学及投考师范等情况，向袁先生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末了，毛泽东抱歉他说，“先生，我先前冥顽，不知事理，悔不该冲撞了您……”

袁仲谦用手势制止毛泽东，不让他再说下去，“不，润之，过去的事就不要提它了！今天我找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一谈学习方面的事情。从目前的情形看，你读了不少的书，古文基础比较扎实，文章也做得不错。可是，我总觉得，你如果在学习方法上再改进一番，那就更好了。”

接着，袁仲谦具体指出了毛泽东在学习上存在的不足之处，谈了他从数十载教学实践中体验出来的真知灼见。

谈到学习态度，袁仲谦认为毛泽东苦读和巧读还结合不够。他提醒说：从早到晚读书不休，不过是苦读而已：青年正是长身体的阶段，长此以往，必将难以为继。脑瓜灵活，会读书，不过是凭天分而已；不刻苦钻研，长期积累，必将贪安逸而畏劳苦，终使学业荒废。所以，古人有“椎鲁朴钝，非学者之患；聪明绝异，学者之深患”一说。只有把聪明与勤奋连在一起，就如同禾苗既得农人辛勤耕耘，又赖阳光雨露滋润一样，方可茁壮成长，蒸蒸日上。

论及读书内容，袁先生指出，毛泽东读书虽多，但内容庞杂，良莠并蓄，不利于消化、汲取。他列举“国学”（经、史、子、集）中的“集”为例，说明中国古代诗文浩繁，难以尽阅。他说：“集”渊远流长，从《文选》算起也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中，历代都编纂了不少的“集”。仅就史《志》所著录的来说，其数量就十分可观——《隋书·经籍志》一百四十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八百九十二部、一万二千零二十八卷，《新唐书·艺文志》九十九部、四千二百二十三卷，《宋史·艺文志》四百三十五部、一万零六百五十七卷，《元史新编·艺文志》八十一部、九百五十四卷，《明史·艺文志》一百六十二部、九千八百一十卷，《清史稿·艺文志》五百零三部、一万五千四百二十卷。况且，因目录学家对图书的分类不甚严格，常有应归入“集”的而未收，各家补《志》增补了为数不少的“集”还统未列入。总集之中流别繁多，有务求全备的“集”，有采摘精华的“集”。前者就是李元度所说的“征文”、魏源所说的“广存”，特点是不问作品的好坏长短，一律收罗，甚至连片语断句也囊括无遗，目的是力求做到一个“全”字；后者就是李元度所说的“选文”、魏源所说的“审取”，通常称为“选本”。在这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读书人往往无从入手，不得要领。因此，这就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一个“读书法”的问题。

书犹如药，善读可以医愚。但怎样才算“善读”呢？袁仲谦的理解是：从宏观上讲（亦即总体的书），一要博，二要精。博，就是泛读各类书籍，好比鲸鱼张开大口，把小鱼小虾、甚至是海藻泥巴都吃下去，只求吃饱肚子；精，就是重点研读书中精品，好比牛吃草料，吃了以后再吐出来，慢慢地反刍，消化，为的是吸收养分。从微观上讲（亦即具体的某本书），要求悉心“详玩”。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譬如饮食，从容咀嚼，其味必长；大嚼大咽，终不知味。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功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度。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往来接应不暇，如看场中美景，一眼即过，于学无益。所以，读书要力求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书上，则眼就不看仔细，心和眼既然不能做到专一，口中却只知漫不经心地诵读，那么就定然不能记住其内容，记住的也不能长久。“三到”之中，心到最重要，心既到，眼和口自然会到。综而言之，既要博览群书，又择选精华，使“博”与“专”结合起来。对于重要的、有价值的书，要钻深懂透，反复研读，切忌贪多求快，囫圇吞枣，不讲效果的读书方法。唯其这样，方能日新、月进、岁益。

为了指导毛泽东系统地读书，袁仲谦还给学生开列了一份“必读之书”的清单。其中，第一部书就是《文选》。袁先生介绍：《文选》系南朝梁萧统编。萧统字德施，南兰陵人，武帝长子，崇信佛教，提倡文学，早逝，有文集二十卷。传见《梁书》卷八，《南史》卷五十三。萧统死后，谥为昭明，世称昭明太子。他所编选的《文选》，因此也称《昭明文选》。《文选》选录东周至梁八百年间的各体文章，分三十八类。有些类，下面再分小类；类分之中，又各以时代先后为序。三十八类，可以大致概括为诗歌、辞赋和杂文三大类，计诗歌四百三十四篇，辞赋九十九篇，杂文二百一十九篇，共七百五十二篇。《文选》选录文章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用白话说意思就是：文章的立意谋篇，要出于精心思索；文章的思想内容，要用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说，文章应当要求文质并重，也就是要求内容、形式都好。“沉思”、“翰藻”，是《文选》选文的主要标准。此外还有一个标准，就是详近略远，也就是时代较近的，入选的就增多。《文选》编成时，据说有千卷之多，后来删定为三十卷，可见选文的标准之严，入选作品品位之高。它以总集的形式体现了当时比较进步的文学概念，并精选了大量的代表作品，为后人提供了诵习和研究的方便。它的分类，也能够反映汉、魏以来创作日益发展、文体日益增多的历史现象。《文选》成书后，一些早于它的文学总集就渐归淘汰。它取代了它们，成为一部重要的文学读本，流传极广，影响也极为深远。从隋代起，研究《文选》就成为专门学问，号称“文选学”；唐代以诗赋取士，士子必须研读《文选》，连大诗人杜甫也要自己的儿子“熟精《文选》理”；宋代重辞科，当时也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元、明两代研习《文选》的也不少，清代探索更勤，成书更多。《文选》所选的文章，后人不但把它们当做范文读，而且当做字书、类书看；《文选》所选的诗歌，后来也成为揣摩的典范，称为“选体”。这些情况，都足以说明《文选》为历代所重视……

袁仲谦一再嘱咐毛泽东，像《文选》这样的好书，一定要反复诵读、吟咏，仔细琢磨书中的内容，力求融会贯通。

讲到文章体裁，袁仲谦又说：毛泽东学习梁启超写文章的笔法，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接着评价起梁启超，说梁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

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袁先生还讲到，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近年来又拥戴袁世凯当总统，为其执政摇旗呐喊，鼓劲助威。袁仲谦还批评梁启超，说他写政论恰如其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连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袁先生告诫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文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袁先生对梁启超有褒有贬，可见对梁的生平比较熟悉，对其著作也有研究。但他还是表明：他看不起梁启超，说梁启超是个半通不通的文人。他限令毛泽东改变文风，摒弃“康梁体”，下决心钻研韩愈的文章，学写桐城派的古文。

最后，袁仲谦带总结性地讲述了学习的“秘诀”：治学，要坚持“四多”，即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读书，要做到“好书不厌百遍读”；作文，记住“文章妙来无过熟”。自此，毛泽东牢牢记住老师这寥寥数十字的“真言”，抱定“才不胜今人，不足以为才；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的远大志向，坚持勤学苦练，最终成为一代“文章大家”。

这一天，师生作了一次彻夜长谈，一直到旭日东升……

自从和袁仲谦先生深谈后，毛泽东遵照老师传授的读书方法，去悉心领悟，身体力行。古今知识，给了他丰富的精神营养，陶冶了他的性情，增长了他的才干。这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使之终身获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袁仲谦先生教毛泽东“四多”和“文章妙来无过熟”的学习诀窍，他躬行实践，硕果累累。

毛泽东在进第一师范求学之前，文章就写得很棒，曾以一篇《言志》被东山小学堂破格录取；又因文章做得好，先后荣登湘乡驻省中学，省一中和湖南第四师范招生考试之榜首。进入一师后，他在袁仲谦先生的严格督导下，不敢稍有懈怠，而是坚持勤写苦练，精益求精。他十分重视每周一次的作文课，每次都按袁仲谦先生的规定，在两小时之内写好交卷，从不拖到课外。他利用课余时间，仔细研读《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诗经》、《楚辞》、《全唐诗》等，也深钻过孔融、陈同甫、叶水心等人的文集，从中国历代诗文巨匠那里探寻文章的奥秘，因而无论是短文、长文、古文、白话文，都写得很好，议论性文章尤其写得出色。他的文章，议论纵横，气势磅礴，被赞誉为“立试万言，倚马可待”，往往被老师批上“传阅”，贴在一师事务室对面的走廊上。每贴出一篇，同学们都争相阅读。他也很喜欢古体诗词，能背诵数百首古代诗词，填词赋诗的功力也非一般，但不轻易写作，偶一命笔，即成佳句。如在一师写作的《列嶂青且》、《送纵宇一郎东行》等“五古”、“七古”诗，就调高意厚，颇现功力；象“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咏游泳联》；“与其苟且偷生，生无足道；非为奋斗而死，死有余哀。”、“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煎，独令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待因君去非时”的“挽同学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的对联等，也都是这一时期所写的。这些作品脍炙人口，堪称上乘之作，曾被一师的师生传抄吟咏，一直流传至今。

多写苦练，使毛泽东成为一代杰出诗人和理论家。毛泽东一生中到底写过多少诗文，人们无法统计出它的数目。人们只知道：日后已成为国家首脑的他，坚决反对“秘书干政”，提倡领导干部自己动手写文件。他带头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大到治党、治国、治军的方针大计，小到关于政治、经济、军事工作的指示电文，他都要亲自起草。他善于运用浅显明了的语言文字和完美的文学形式表达深刻严谨的思想内容，并能根据不同的需要，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风格——或通俗，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庄重严肃，写出大量说理透辟、气势磅礴，融古代语言于白话文之中，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和民族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来。毛泽东一生著述甚丰。他还填写了几十首诗词，其诗作不仅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而且艺术形式丰富多彩，先后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度、希腊等数十个国家和

民族的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在诗坛文坛上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毛泽东可以当之无愧他说是古今独步。

当时，学校教育多半是死灌书本知识，教学方法也多半是填鸭式的，很少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受这种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也常常是迷信古人，迷信洋人，迷信名流学者，迷信死的书本，甚至认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不容置疑的真理。第一师范也不例外，有不少这样的学生。毛泽东则不然，他谨记袁仲谦先生“多想、多问”的教导，在学习中学会运用独立思考、

分析批判的方法，不盲从，不迷信。

他常对同学们讲，读书、看报、上课、或听讲演，都要开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我们都必须反复思考，批判分析，真是对的才能接受，如果是错的就应该抛弃。我们不应该一味盲目迷信古人，崇拜洋人，当然也不应该把他们全盘否定。所以，他无论读古书，读洋书，听讲课，听讲演，总是认真思考，精心领会，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绝不人云亦云。

有一次，学校邀请上海来湖南的一位名流向学生讲演。毛泽东早就听说这位名流是当时知名的学者，但这次听完讲演之后，却觉得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他得知这位名流第二天将在船山学社讲演，就又专程去听，希望能听到一些新问题、新见解，谁知竟大失所望。听完回校以后，他向周围的同学说，他今天讲的就是昨天讲过的，甚至连字句都原封未动。这件事对他印象很深，使他对有些“名流”失望和怀疑起来了。

当时，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一样，都热烈地追求西方的新思想，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重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这一点可从《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得到充分证实。他在文章中，主要引用了中国古代重视实践的事例，来说明他自己的观点。其中，从《论语》、《礼记》、《中庸》、《孟子》、《庄子》、《史记》以及韩愈的文章中，引用成语、典故、诗文近二十条，涉及到中国古代历史人物十六人、近代人物三人。在如何对待西方文化方面，当时在某些，

283

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盲目崇拜、全盘接受的错误思潮，认为西方的一切都好，中国的一切都坏，只有西方思想才能救中国。毛泽东完全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对西方的文化应该像对待中国古代文化一样，批判地继承，以期洋为中用。他认为“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对西方文化明确地持批判态度，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少见的。

毛泽东这种独立思考分析批判的态度，在他阅读《韩昌黎全集》时，更反映得十分清楚。袁仲谦要毛泽东多读韩文，一天，他从旧书坊里买回一部《韩昌黎全集》共二十多本。他从中选出一部分比较好的文章，每天抽出一两个钟头认真钻研，并在书上空白处写满了批语。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相反，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他就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陋儒之说也”等眉批。

他

并不因为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家，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有同学问他，为什么对于同一个人的文章，有的地方那么赞赏，有些地方却那么鄙视呢？他说，一个人讲的话不一定

全对，也不一定全不对，何况古今不同时，事理多变化，我们不应该一味迷信古人，也不应该把古人全盘否定。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本《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看到毛泽东博学多思的一些情况。《伦理学原理》一书，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泡

尔生的主要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1909年由蔡元培译成中文。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一师把它作为本科毕业班的修身课教材。毛泽东很爱读这本书，并且以先秦诸子百家、宋明理学以及王船山、谭

嗣同、梁启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学说，与之比较，综合研究，分析批判，常有独到见解。他在这本仅有十多万字的书上，用毛笔小楷写下了一万二千余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笔、黑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批语的绝大部分内容是抒发自己对道德、人生、历史、宇宙的看法。凡原著中与他的观点较相吻合之处或颇触发人深思处，他就密加圈点，批上：“切论”、“此语甚精”、“振聋发聩之言”、“诚哉，诚哉”、“洞悉人性之语”、“吾极主此说”、“此节议论透彻之至”、“真理在此”等话。对于著作中有怀疑或否定的地方，便批上“诚不然”、“此不然”、“此节不甚当”、“此处又使予怀疑”、“吾意不应以此立说”、“此说终觉不完美”等字样。许多处还联系我国历史和“五·四”前夕的政局及思想动态，加以分析对比。如原著中论及专制政体与暴君时，他便在旁边注上“如袁政府”；当论及康德的形而上学的道德哲学时，便注上“吾国杀儒之说与康德同”等语。这些批语，充分表现了青年毛泽东惊人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见解，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严肃思想家的宝贵品格。

毛泽东这种品格，尤其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思想，不断进行自我批判的革命精神上。他信仰过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崇拜过康、梁和谭嗣同，接受过胡适、托尔斯泰的影响，他还信奉过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然而，当他把这些人物、思想、主义放在改造中国和世界的这个伟大理想的天平上加以衡量之后，发现其有违自己的初衷，便无情批判，毅然摒弃，彻底清除这些思想对自己的影响，继续探求革命的真理。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过程中，使毛泽东在经过了一条崎岖曲折的探索道路之后，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常常提出疑难问题，虚心向别人请教，汲取他人之长，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这里学习到的又一重要读书方法。

毛泽东常说，“学问”二字组成一个词是很有道理的，要成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便既要虚心好学，独立思索；又要好问，拜人为师。因此毛泽东有特别好问的习惯，即虚心向他人求教的习惯。无论是读书听课，还是看报刊杂志，凡是不大明白的地方，从术语、名词、典故，到理论逻辑和思想内容，都要记下来，以便随时随地向他人请教求解。但他在学习中并不注重烦琐的考证，更不探究无关紧要的奇闻轶事，一般问题借助工具书自己的去解决，而提出来和师友们讨论的多半是关系到国家社会、人生及治学方面的大问题。这一点，已成为他探求真知的初步特色。

他常向师长求学问道。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等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到杨昌济先生寓所登门请教。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哲学小组邀请杨先生担任指导。每逢星期天，常常聚集在杨先生家里研究学术问题，讨论治学方法，或讲学论道，纵谈天下大事。除杨先生外，毛泽东还经常到袁仲谦、徐特立、黎锦熙、方维夏等先生家中释疑求教。

拜访名流学者。凡是长沙城里比较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讲学的知名学者，毛泽东探知他们的住处后，常常抽空余时间前去拜访，请他们解答学习中碰到的疑难问题。虽然有些人并不认识他，也不一定高兴接待他，但他从不计较这些，只要对学习上有益，他总是千方百计地去请教。有一次，他从老师杨昌济那里得知，距长沙板仓四十余里的地方住着一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柳午亭先生（即后来为革命牺牲了的柳直荀同志的父亲），是一位体育

运动的热心倡导者和实践者。那时，体育是毛泽东悉心研究的课题之一。第二天，他即由一位农民带路，去拜访了柳午亭先生。柳先生非常高兴地接待了毛泽东，他们进行了广泛的交谈。毛泽东归校后同杨昌济先生谈到此行的印象，称赞柳先生在体育的研究和实践上有根深的造诣，许多地方值得效法。

向日本朋友“聆取宏教”。1916年10月底，黄兴在上海不幸病逝，其灵柩归葬湖南。次年春天，曾支持帮助过辛亥革命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先生不远波涛万里，由日本亲临长沙，参加黄兴的葬礼。毛泽东和同学萧三知道这一消息后，特地给这位知名的日本友人写了一封求见信，恳切要求晤面求教。信的全文如下：

白浪滔天先生阁下：

久钦高谊。觐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蕃、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肖植藩 肖植藩上

毛泽东

通信求教。毛泽东还采用通信的方式求教。经杨昌济先生介绍，他和北京、上海、武汉的一些名流学者，建立了比较密切的通信联系。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到哲学思潮、人生观、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等等，无不涉及。

此外，他还更多地同学友一道交流读书心得，以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当萧子升以“讷言敏行”作为准则默示毛泽东时，毛泽东回信道：“天地道藏之邃，今古义蕴之奥，或蕃变而错综，或散乱而隐约，其为事无域，而人生有程，人获一珠，家藏半壁，欲不互质参观，安有博征而广识哉？”他认为，人是万类之灵，“发声以为言，言而后传其类以为群”，语言有如此大的作用，怎能不用？再说，不与人交谈，怎么能知道自己的过失呢，只有通过交流，知道了自己的过失，才能改过而从善，不断长进。“是故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国，排搅神废日之说，所以益神而修业，言之为贵，不愈可见乎！”通过交流讨论，才能出真知，寻得宇宙的大本大源，才能使“豪杰之士知殊趋而同至。”还认为，听取别人的意见并不意味着放弃自己的正确观点，而屈从于他人。他恳切地对萧子升说：“仆自克之力甚薄，欲借外界以为策励，故求友之心甚热。如足下，诚能策励我者也。”他非常谦逊地说自己“无他长处，惟守‘善与人同’‘取人为善’二语，故已有所得，未尝敢不告于人；人有善，虽千里吾求之”，以求“共学适道”。

正是为了求得更多的学问，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他先是成立哲学研究小组，继而“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尔后又成立新民学会，终于在身边聚集了包括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昌、张昆弟、陈绍林、罗学瓚、周世钊等许多奋发有为的青年学子，他们来往密切，

参见1977年9月7日《文汇报》。

1915年8月，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

互相切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袁仲谦先生教他“多读”，他嗜书如命，读书不休，直至终年，乐此不疲。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初期，甚至在更早一些的学习生活中，读书的范围很广，古今中外的许多书籍，他都想方设法找来阅读。后来，他按照袁先生提出的“博和专并举”，“博览群书与重点攻读相济”的主张，“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中的精品，使知识出现了升华。

袁先生要求毛泽东：读书要有一个严格的计划，在一个时期内，应紧紧围绕一个中心去读书，围绕一个中心去深入研究一个专门问题。他专门给学生开列了长长的一串“必读书目”：《二十四史》、《韩昌黎全集》、《昭明文选》、《读史方輿纪要》……让毛泽东反复研读，钻深懂透。

毛泽东谨遵师命，花了两个学期的晚自习时间，读完了二十四史这部浩繁巨著；另外，每天挤出两小时的空余时间，阅读了《文选》、《韩昌黎全集》和《读史方輿纪要》、《史记》、《资治通鉴》等古代名著。在读书过程中，他记住“好书不厌百遍读”的箴言，潜心钻研书中的内容，认真掌握它的精神底蕴，反复诵读吟咏。例如，一部二十多册的《韩昌黎全集》，他用了将近一年的课余时间硬是一篇一篇地通读了一遍，然后再回头从词汇、句子、章节到意义，去精心阅读，细心领会，直到融会贯通为止。最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默读和朗诵。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文”的大部分诗文，他都读得烂熟，甚至背得很流利。这种读书方法，看起来又笨又慢，花费精力太多，但实际上效果很好。毛泽东从中尝到了收获知识硕果的甜头，自此直到晚年，他都一直奉行这条读书经验。

现存的毛泽东的藏书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他反复读过的。关于这一点从他批阅过的书籍中看得特别清楚。像《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古典著名小说，他从上私塾时在韶山就读过，到了六十年代他又重新读。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他看过的《红楼梦》的各种版本有十种以上，他究竟看了多少遍，谁也说不清。还有许多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他都反复地读，而且一次又一次地批注、圈点，像《昭明文选》，他青年时代就反复读过，后来五十年代读，六十年代又读，到了七十年代还读过好几次。他批注过的版本，现存的就有三种，每一种都圈点勾画，朱墨纷呈。唐、宋、元、明、清诗别裁集，《词综》、《曲选》等古典文学书籍，他都看了好多遍。一部《唐宋名家词选》，他读过的本子就有四种。1974年8月25日，他已重病在身，还亲手写了《康宋名家词选》的书名，并告诉工作人员说，他还要继续看这种书。《唐诗三百首详析》、《李贺诗集》、《稼轩词》等等，他也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有许多古今名人的传记，他在上学时就爱读，在以后数十年的革命生涯里，他还多次阅读过这些书籍。一部《古文辞类纂》，从北京图书馆借来后还了回去，过不了几天，他又要看。就这样借了还，还了借，他不知看了多少回。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和哲学方面的书，他反复阅读的次数就更多了。

毛泽东反复读书的事，在延安的时候，他自己就曾对人说过：“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奉劝各位也多读几遍。”在一次小会上，毛泽东又曾这样说过：“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十遍。”“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现在已读了三遍半，也准备

读它十遍。”六十年代初，有相当一段时间，有的书他读一次就在书上画一个圈。现在收存的不少书上，都还有这个引人注目的记号，有的书封面上划了四五个圈。

重要的书、有价值的书，认真地读，反复地读，这是毛泽东从袁仲谦先生那里学习到的一条重要读书方法，它从此亦成为他全部读书生涯中的“习惯定型”。正因如此，他以一个通晓古今、博学多才的人民领袖形象矗立在他的人民面前，从而给他的整个政治生命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

爱读古籍，使作为政治家、谋略家的毛泽东如虎添翼。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与纯熟，在党的其他领导人中居于首位，即使在近代的革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但他决不是信而好古，钻进故纸堆出不来的学究。领导者要保持高瞻远瞩的能力，就必须善于立足现在回溯过去，并透过过去看清未来。伟大的人物能改变历史进程，却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深深地明白这一点。他认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有许多珍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给以总结，批判地继承。要“挹其瑰宝，而绝其淄磷”。

毛泽东读古籍，尤其喜欢看人物传记。中国古代有为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业绩，曾使青年毛泽东向往，增强了他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孕育了振兴中华的壮志；而农民起义领袖陈涉、吴广直到李自成等人的传略，使他得出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的结论。对于那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对旧势力、旧制度具有反叛性格的改革家和革命家的传记、著作，毛泽东更是反复阅读。这对他个性气质的形成无疑起过潜移默化的作用。

读古书，毛泽东不仅从传统文化遗产中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而且批判继承了其中大量积累的民族智慧和治国经验。在他的藏书中，有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册。这部史书他生前不知反复看过多少遍，许多册的封面和边角都磨破了，从头到尾满布批注、圈点和勾划。他在读《新唐书》中的《姚崇传》时，看到姚崇向皇帝阐述关于怎样治国的一段话，非常赞赏。认为它简单明了，是古今少见的十条政治纲领。其中一些内容，对我们今天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书中不少地方，毛泽东还写下关于战略战术问题的许多批语。他不但自己读，还将认为值得一读的文章推荐给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如《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等就因他的推荐而广为传播。文中关于“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警句，曾为党内同志引为箴规之言。

毛泽东在“古为今用”思想指导下，数十年来从古籍中发掘出诸如“实事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任人唯贤”，“百家争鸣”、“多谋善断”等许多言简意赅的警句，并赋予崭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有的成为表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概括语言，有些成为党内生活的原则，有的则是党的某一方面工作方针或具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对我国历代小说杂记颇为喜爱和精通，古典文学的养分，使他成为一代杰出的语言大师。在他的谈话中和著作里，常常信手拈来一些故事、典故，阐明政治、军事、哲学等方面的道理，通俗生动，警策凝炼，别人入胜，他曾用《红楼梦》中王熙凤“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话来鼓

励立志改革的人；用《三国演义》中周瑜二十九岁当都督取得抗曹胜利的故事，说明选拔德才兼备的青年干部的必要性；甚至用《西游记》中的人物，来讲解“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他说：唐僧这个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但他也有缺点：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了个花样就识别不了。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艰苦。臭柿胡同就是他拱开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但他最大的缺点是方向不坚定，三心二意。毛泽东还特别提到那匹白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值得我们效法。

综观毛泽东的一生，他首先是个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通晓古今的伟大学者。他高超的领导艺术，优异的才能和智慧，是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晶，也是他一生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结出的硕果。当我们颂扬已成为一代伟人的毛泽东时，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当年第一师范的那个作为普通师范生的毛泽东，自然也就不会忘记那位人称“ 袁大胡子 ” 的先生——是他谆谆教导毛泽东要多读书、读好书、并会读书。毕竟，毛泽东是人，而不是神，就像幼儿最初迈步走路总是要人搀扶一样，青年学子要获得真知灼见，终离不开良师的指引、点化。这或许是古今人才学中的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

77 为恩师题写碑文

雏鹰羽翼渐丰，总要挪动巢穴，展翅蓝天；幼儿长大成人，必将离开父母庇护，奔向生活；莘莘学子学业告成，终归告别母校、老师，投身社会。

1918年暑期，毛泽东结束了五年半的师范学习生活，毕业离开了一师，也告别了袁仲谦先生。

两年后，他又回到母校，任附小主事。这时，袁仲谦已于1919年辞却了一师的教职，到别的学校教书谋生去了，而毛泽东则走上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去为早已立下的救国救民的誓愿而奋斗。从此，师生之间天各一方，再也没见过面。

三十年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终于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缔造了一个崭新的共和国，他成了这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毛泽东获得了巨大成功，但他十分向往故园，更怀念教育培养他成长的老师们。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特地邀请原第一师范的老师和学友徐特立、王季范、熊瑾玎、周世钊和谢觉哉等人，来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叙谈当中，周世钊告诉他：罗元鲲已年迈七十，现回新化县老家，但因家口甚多，眼下生计艰难。袁仲谦先生因积劳成疾，早已在1932年病逝。其遗孀戴氏年迈体弱，无依无靠，生活极苦。说完，周世钊将罗元鲲写给毛泽东反映他和袁仲谦先生家属生活窘迫情状的信呈上。这时，袁先生一师的同事、毛泽东的表兄王季范先生，送上一纸陈请给袁以救济的信。信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袁胡教学有何奇，
横扫千军笔一枝。
一字千金何处报，
其妻老病绝粮时。

听了周世钊的汇报和看了王季范的请求信，毛泽东深深震动了！张干、袁仲谦、罗元鲲……这可都是第一师范第一流的师表啊！他们品德高尚，学识渊博，有本钱、有机会求得高官厚禄。可是，他们热爱教育事业，宁可一生清贫，也要为国家培养人才殚精竭虑。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想不到，像这样一些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晚年竟然会生活无着。这都是旧社会留下的罪恶渊藪，新社会决不能眼看着这样的事发生！人民政府应该尊重知识，爱护人才，敬老尊贤，这是个政策问题，甚至是关系到新中国的江山能否稳固的大问题！眼下，虽说国家初建，困难重重，百废待兴，但再难也要救济这些教育界的老人……想到这里，毛泽东决定亲自过问上述几位老先生的事情。10月11日，也就是会见原一师校友后的第六天，毛泽东亲自写信

给当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具体交办此事。

王首道同志接到毛泽东的来函，即派员前往袁仲谦家中，详细了解其家属生活困难情况，并向袁师母表示问候。尔后，长沙市民政局根据省政府的指示，每月发给袁师母三十元的生活补助费。后来，袁师母生病，毛泽东从周世钊那里得知情况后，嘱周带去三百元的现金送给她治病，调养；不久，老人医治无效逝世，毛泽东又让周世钊转交了三百元的丧葬费。

1952年，袁仲谦家乡的有关部门及袁的亲朋好友，计划给他修葺坟墓，委托罗元鲲给毛泽东写信，请他给袁仲谦题写碑文。于是，罗先生遂于同年十月中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上述请求。很快，

毛泽东就作了回复。这封亲笔信的全文如下：

翰溟先生：

十月十九日赐示敬悉。李先生交来两件，均已拜读，极为感谢！自传兴会飙举，评论深刻，可为后生楷模。另件所述“特色”诸点，得之传闻，诸多不实，请勿公表为荷。两件奉还。袁先生墓文（指毛泽东亲笔题写的“袁吉六先生之墓”碑文——引者注）遵嘱书就，烦为转致。新化古寺有所毁损，极为不当，此类各地多有，正由政务院统筹保护之法，故不单独写字，尚祈谅之。僧尼老者守寺，少壮从事劳动，此论公允，已转政府有关机关酌处。此复。

敬颂

旅安

毛泽东

一九五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罗元鲲先生接到毛泽东随信邮来的碑文，激动万分。毛泽东日理万机，专门为一位已故的普通老师题写墓碑文，可见他忘不了老师授业解惑之情，也有一颗滚烫的赤子之心！

他当即将碑文转呈新化县政府，并告知袁冲谦的亲属。后来，有关部门举行了隆重的墓碑安放仪式，由毛泽东亲书的“袁吉六先生之墓”七个大字，镌刻在白玉般的大理石上，矗立在袁仲谦先生的坟前，放射出熠熠的光彩。

袁仲谦先生在世时，致力于教书育人，却贫病交加一生；未曾想百年之后，竟受到已成为伟人的学生毛泽东的深切悼念，备极哀荣。袁先生如若知当含笑九泉——共和国主席给他的老师亲书碑文，在众多的先生中，也仅有他袁仲谦一人！

指罗元鲲托毛泽东幼时的塾师李漱清交给毛泽东的两篇文稿。一篇是罗元鲲的自传，另一篇是罗写的《第一师时代的毛主席》一文。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 452 页。

第十五章 王立庵：

——知人善教的数学教员

良药苦口，惟疾者能甘之；忠言逆耳，

惟达者能受之。

——晋·陈寿

能使事业趋于正轨者还数忠言。

——〔英〕培根

78 “有争议”的学生与宽容的老师

生长在当今中国的人们大概谁都知道，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是一个刻苦学习，勤奋读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而绝不会相信，他和现时学校里的许多青年学子一样，也有不守学校教学规定的时候，也有“偏科”的毛病，也有挑剔老师的习惯……总之，就如同人吃五谷杂粮要生病一样，凡是人所共有的天性，他一样也都具有，有时甚至还表现得特别突出。所不同的是，绝大多数人是人性弱点的自然流露，而毛泽东则是深思熟虑后的自觉行动。

我们不必为尊者讳过，为贤者讳耻、为亲者讳疾。初进第一师范时的毛泽东，在当时的学校当局眼里，是一个好与“坏”都很突出、优与差同样明显的“复杂型”学生——他是个志向远大、品行端正的学生，但有时又是个不服管理、不守纪律、难以约束的“刺头”；他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是个发奋踔厉的“苦读者”，但有些课又懒得去听讲，因而成绩总是排在班上的后面……一言以蔽之，他是一名颇有争议的学生。

凡是上过学的人大都目睹过这样一种怪现象——有时，某些科目中的学习“尖子”，在其他科目中的成绩，或许是最糟的；被这位老师赞不绝口的学生，又常常令另外的任课老师摇头叹息。遇上这种情况，老师们往往会各执己见，莫衷一是。可最后评估呢？又往往是一般功课服从重要功课、选修课让位于必修课——只要主课成绩好，便算得上好学生。不过，也不是绝对的，这要看任副课的老师肯不肯通融。遇上有的老师，你越不行越“踩”你；你别的科目行，为什么就是他所教的课成绩不行？可见你不用功，非判你个“不及格”，让你脸上不好看不说，学业考查也要受到影响。

碰上这种情况，最不好做人的那些偏科的“左撇子”学生，最难办的却是任课老师。这不，这样棘手的事，偏偏让湖南第一师范第八班的数学教员王立庵和学生毛泽东双双撞着了！

在一师，毛泽东的国文成绩突出是出了名的，特别是他那一手兰亭体小楷和作文，更是博得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王立庵的同事和邻居、八班的国文教员袁仲谦先生，就经常在他面前念叨：毛润之是他任教数十年来仅见的好学生。袁先生特别欣赏毛泽东那种勤学苦练的读书精神，称赞他：“大有颜子箪瓢与范公画粥之风，犹如车胤、孙康转世。”袁仲谦是和毛泽东一同从四师转到一师来的，又一直是毛泽东的国文老师。他的话自然很有权威性。王立庵怀着极大的兴趣听他讲自己的得意门生，渐渐地对毛泽东产生了良好的印象，也为自己任教的班级里能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高兴。

可是，时间一长，王立庵便对袁先生的话“不敢恭维”了。这个毛泽东真叫他感到有些失望，几次数学测试他的成绩都很不理想，有一次还不足60分，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王先生原以为，毛泽东是逻辑思维不发达，对有些严密的数学问题弄不懂也是奇怪的。他想，做学生的谁不想考得好成绩呢？既然确实成绩上不来，只好慢慢给他“吃小灶”，逐步提高罢了。

但是，后来王立庵终于发现，事情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回事：影响毛泽东数学成绩的，不是智商，而是学习态度——他学数学很不用心，常常把他喜爱的书籍，如《昭明文选》、《韩昌黎全集》等带到课堂去看，你讲你的，他看他的；还有几回，他干脆不来课堂听讲，让同学周世钊代为请假，说是“病了”。

起初，王立庵信以为真，特地来到学生寝室去看毛泽东，见他不在；恰好碰上一位值星的教员，一打听得知他到自修室去了。当时，正是1915年的

初春，外面卷起了冷飕飕的麻风细雨。王先生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第八班自修室。自修室冷清清、空荡荡的，毛泽东就坐在临窗的那张桌子面前，正在津津有味的看一本什么书，只见他读到精要处，还打开笔记本，认真地摘录起来……

王立庵在第一师范教员中，是有名的宽厚人，有时，甚至宽厚得有些婆婆妈妈的。但他又是公认的有见地的“明白人”，教学生也极负责任，从不马虎和敷衍塞责。此刻，他未免对毛泽东蒙哄老师的行为有些生气，呼吸也粗重起来。

过了一阵，毛泽东感到背后有喘息声，他转头一看，原来是数学教员王立庵先生，只见他面色微红表情严肃，默默地站在旁边。他急忙站起来打招呼：“王先生！”“嗯！”王立庵情绪平静了些，他微笑地说：“润之，听说你生病，我来看看。”见毛泽东一窘，他紧接着关切地轻声询问：“好些了吗？”“先生……”王立庵好像明白学生要说什么，忙用手示意他不要再说下去。“坐下吧！”他对毛泽东说。毛泽东没有坐，仍旧恭恭敬敬地站着，似乎是等待着先生的训斥。王立庵只好移过一张凳子，自己先坐下来，然后默默地打量着毛泽东。只见他身穿青色斜纹布学生装，里面没有棉衣，显得十分单薄，一双手冻得红红的，手背上裂开了一道道细小的口子。看到这里，一股难以抑制的怜爱之情，突然涌上王立庵的心头。“天气这般寒冷，毛泽东仍能独自一人专心在自修室读书，看来他绝非那种懒惰的学生！”王立庵暗自琢磨，“可是，今天称病不上数学课又作何解释呢？”他又自问道。

王立庵那温和善良的目光，又移到自修桌上。毛泽东面前摆着一本厚厚的书，一副笔砚，还有一个笔记本，上面的字还墨迹未干。他问道：“你在看什么书？可以让我看看吗？”毛泽东点点头，连忙把那本书和自己的笔记本一起拿过来，交给了王先生。

王立庵接过来一看，那本书是《读史方輿纪要》，他只看了一下封面便放在一边，倒是十分注意地看那本读书笔记。那是一个九行的直线本，前面全文抄录的是屈原的《离骚》和《九章》，中间有一页的正中间，用端庄俊逸的“兰亭体”竖写了《讲堂录》三个大字，后面一部分是听国文和修身课的笔记，一部分是毛泽东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者叫“随感录”。笔记的范围相当广泛，大都属于文学、历史、哲学的范畴。从这个笔记本看，毛泽东把注意力摆在社会科学方面，而对于自然科学，却是很不重视的。

看到这里王立庵轻轻地合上了笔记本，又重新望着毛泽东，望了好久，以致毛泽东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说实话，王立庵的思想是矛盾和复杂的。他不得不承认袁仲谦老夫子识人的眼力。毛泽东确实是一个勤勉好学的学生；但他又对今天发生的事感到恼火，毛泽东这样不重视数学课的学习，不要说与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教学章程不相符合，就是用实用的观点来看，这对他将来走上社会，从事教育职业也是有碍的。对这样的事情，王立庵觉得不能任其下去，他决意要“敲打”对方一下。不过按他的一贯作风来讲，他不愿时学生疾言厉色，而总是循循诱导。他想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子说得明白的，必须好好跟学生谈谈。他从大襟里面掏出怀表看了看说：“润之，时间不早了，我还要讲一堂课。有些事情我想和你讨论一下，下星期天我在家里等你，你看行吗？”

毛泽东知道王立庵住在“李氏芋园”，就在袁仲谦先生的隔壁，而他是常去袁先生家请教学问的。于是，便点头答应说：“好的，届时我一定来。”

王立庵拿起讲义夹，走出了自修室。外面，依然刮着冷飕飕的风，卷起了纷纷杨扬的毛毛雨。毛泽东站在自修室门口，望着王先生的背影，直到他消失在迷蒙的雨雾中。

自从那天毛泽东称病不上数学课的事发生后，王立庵的心情一直不很平静。他想做毛泽东的工作，但到底该怎么做呢，他心里底数不足。他想全面摸一摸毛泽东的学习情况，听听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后再说。

正好，第二天下午，学校举行教务工作会议。散会后，王立庵个别征询了一下英语和美术课两位任课老师对毛泽东的看法。英语老师反映毛泽东对英语的学习还是重视的，只是他地方口音太重，发音不太准确，口语的成绩受到影响，但据说他经常利用早上的时间在练习。美术课老师则说：毛泽东根本就对美术课没兴趣，更谈不上重视这门功课。让他画画，他总是一挥而就，画个椭圆形，说是学达·芬奇画蛋：画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个半圆，说是表现“半壁见海日”；往先生那里一交了事……

听了两位任课老师的情况介绍以后，王立庵感到心情沉重起来，看来毛泽东偏科的毛病十分突出，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程度，不然，将来很可能影响到他顺利地毕业和谋职。作为他的老师有责任帮他指出缺点，在关键时候给他引路。想到这里，他加快步伐往第八班教室走去——他要再找几位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同学谈一谈，深入了解一下毛泽东平时的学习情况，摸清他的思想脉搏，以便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来到八班教室，他让人叫出周世钊。周世钊胆子较小，见王立庵先生找他，以为是昨天帮毛泽东请“病”假的事被先生怪罪，早已急得脸色通红。他对王立庵解释说：“王先生，昨天的事是润之让我那样跟您讲的……”“元，昨天的事就再不要提了。我今天找你，主要是想问一问润之平时的学习情况，比如，他平时都干些什么啦，爱看些什么书啦，等等。你来跟我说说好吗？”说着，他把周世钊带到他的办公室。

见先生毫无责备他的意思，周世钊感到轻松了些。他平时同毛泽东关系最要好，听老师找自己了解毛泽东的情况，便不失时机地为好朋友说话：“王先生，毛泽东绝非那种贪闲偷懒之人，昨日的事确实是出自偶然。若论他平时的学习劲头，那可是吾辈望尘莫及的呀！”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毛泽东刻苦用功的事。

他说毛泽东平时与同学约定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事，不谈家务琐事，只在一起探索宇宙与人生。为了求得更多的知识，他奋发踔厉，发愤读书，将一天的时间作了极紧凑的安排：每天早晨，学校还没有吹起床号，他就提前起床，进行冷水浴和六段操，然后进自修室或去后山君子亭，迎着熹微的晨光，朗读他所喜欢的诗文，间或还有意识地到喧闹嘈杂的南门口看书，任凭车来人往，时而默读，时而朗诵，专心致志，旁若无人；午后的空闲时间，常到图书馆去借阅书刊或到阅报室看报；晚餐后，照例邀集一些同学外出散步，互相交换一天的学习心得，或谈论时事，这就算是他白天唯一的休息时间了；晚上的自习时间，便集中精力，认真钻研社会科学，熄灯后还要到走廊或茶炉室的灯光下看一阵子书，直到夜深人静，同学们都已进入梦乡……

“毛泽东最喜欢些什么课程呢？他平时抽出这么多时间，多读些什么书呢？”王立庵问周世钊。

“他一贯喜读国文、历史、地理，现在又开始研究哲学。他爱读的书很多，主要是古籍，从先秦诸子、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和二十四史，到省志、县志，他都认真研读过。他读过的书，我这一辈子怕也是看不

完的！”

“元，你可知道：毛润之对学习有些课程——比如说数学的基本态度？”王立庵又委婉地问。

“这个我可不太清楚。”周世钊思考了一下，接着说：“不过，润之说过，我们学校的课程太多，内容繁杂，主次不分，学与用脱节，教学方法也太机械、太呆板，也使学生太受拘束了，常常把人累得疲于奔命，然而对所学的许多课程却是一知半解。因此，他说学校的课程设置象杂货摊。”

“杂货摊？！”王立庵觉得又新鲜又诧异，一个低年级师范生，竟然对学校教育体制这样重大的问题，作出如此尖刻而又形象的比喻，这在以前是闻所未闻的事，大概只有这个毛泽东，才能做到这一点。

王立庵陷入了沉思，反差，巨大的反差——毛泽东对学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取的不同态度；老师和同学们对他褒贬不一的品评：还有自己在昨天看到的那个既装病不上课，而又不畏寒冷躲到自修室认真读书的判若两人的毛泽东……这一切形成的反差是那样强烈，是那样叫人难以置信，可它又是实实在在的。可是，什么是形成这些反差的真正动因呢？王立庵冥思苦想着。从自己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确不失为一个严于律己，敦品力学的学生，以自己数十年教学和做人的经验观之，像他这样的人，每干一件事总是会深思熟虑的。他既然放弃对自然科学的钻研，而专攻文、史、哲；那么，总是有着深层的原因的。这个原因看来不是别的，只能是他树立的志向和选择的奋斗目标与现今的教育体制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旦这种矛盾冲突尖锐化时，有着特殊性格的毛泽东，只能是摒弃一切羁绊，向他认准的目标迈进。

想到这里，王立庵感到自己总算摸着毛泽东的“脉”了。但到底是不是这样，这个谜只有等毛泽东本人来解了。于是，便对周世钊说：“元，时候不早了，你去吧！”“好的。”周世钊起身向先生告辞。

送走了周世钊以后，王立庵伸了伸腰，做了个深呼吸，他感到身心轻松了许多……

80 劝学数理化

雨后初晴，地面上结了一层薄冰。毛泽东一清早便起床了，照例洗了个冷水澡，做了几节体操，在南门口买了两块油炸糍粑过了早，就迎着早晨的阳光，走出了第一师范的大门，来到坐落在浏阳门正街的“李氏芋园”。

早晨的芋园，显得特别幽静。先生们忙了一个星期的教学，难得有这么个歇息的机会。毛泽东怕打扰了王立庵先生，在花园里的水池边看了一会儿书，然后才来到王先生家。

王立庵也起得很早，他正在书房里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着毛泽东。见他来了，忙把他迎进书房里面。

毛泽东趁王立庵正在泡茶的机会，打量起书房的布置来。书房里除北面墙挂了一幅山水画外，东西两堵墙壁，被一排落地大书柜遮住

了，玻璃橱内，摆满了许多数、理、化书籍，也有不少厚厚的线装古书，还有些外文书。毛泽东早就听人讲，王先生是湖南优级师范学堂的高材生，不仅对数理化很精通，就是对文学和历史也有研究，被一些老师谓之“通人”。今日一见，果真名不虚传。

“润之，”王立庵给毛泽东倒上一杯茶，打开了话题：“今天让你来，主要是想和你谈谈学习问题。以我近日观之，你读书的兴趣，是不是太偏重于文科了呢？对于其他学科，你钻研得怎么样呀？”

毛泽东抬头望着王先生，只见他穿一件青“洋布”面料棉长袍，围着一条灰色长围巾，宽阔的前额上爬满了许多皱纹，清瘦的脸庞上挂着和蔼而慈祥的微笑，使人一见面便有一种亲切和崇敬的感觉。此刻，他正用敦厚的目光看着毛泽东，等待着他的回答。

毛泽东顿时消除了拘谨，坦率地承认说：“王先生，我是在注意研究社会科学。我觉得，在目前的中国，一定要从哲学和教育学入手，先改变天下的民心，再才能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用别的办法，是徒劳无功的。”

“你说的道理很对！社会科学是得下苦工钻研，但数学、图画等课也很重要呀！你想过没有，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什么都要懂一点。将来毕业出去了，如果哪个学校只请得起一个教员，那么，数学、图画这些课还开不开呢？若是开这些课，你不会，岂不误人子弟！若是不开，别人又怎么能聘用你呢？”

“是的，先生！师范学校的学生，一出去就要当小学教员，大概是什么都要懂一点。正因为如此，学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繁杂，将近三十门学科，真象一个杂货铺，结果是哪一门学科也不能真正地精通。宝贵的青春年华，就这样白白地流逝，实在令人心痛啊！”

王立庵听了，心里怔了一下，浓黑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深邃的眼睛仔细地打量着学生：“是这样吗？润之！你想过没有，现在已进入二十世纪了，这是科学的时代，是蒸汽机和来复枪的时代。研究社会科学的人，不懂自然科学，也是不行的呀！听说你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赫胥黎的《天演论》，你看，他们研究的是社会改革，可是又非常精通生物的进化……”

王立庵的话，一字一句都打在毛泽东的心上，他感叹着说：“先生，我知道自然科学很要紧，可是，我以前读的是孔夫子，如今年龄大了，学不进数理化了……”

“啊？”王立庵不解地看了他一眼，“你有多大年纪呀？”

“已经二十一岁了。”毛泽东不好意思地说。

王立庵又好气又好笑：“年方二十就以‘年龄大’自居？！古人是怎么说的？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弘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受《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颜之推借用孔子‘五十学《易》可以无大过’之句，不是提倡世人都要待到老之将至再去学习，无非是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因早年迷误，学习上起步较迟，这并不可怕；只要中晚年渐渐明白读书学习的道理，不放松自弃，尔后奋起直追，终会大器晚成、有所作为的。正所谓：‘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学，如炳烛之明’。看看你吧，刚到婚冠之年，便说自己年纪大了，嫌学习为时已晚，对照古代名贤，将作何感想呢？……”

王立庵的话掷地有声，余音萦绕在耳，使毛泽东感到心头一震。他思忖：先生说的是极对的，可自己的心里的话也得向先生讲一讲，相互沟通沟通，或许能找到契合点。

于是，毛泽东恳切地说：“先生，我也晓得二十多岁年富力强，精神专一，正是读书的大好时光。可是，我又总在想，古往今来，有多少忠臣良将，都是少壮有为，为国家建功立业，可我们这一代人，偏偏生逢乱世，国运衰微。人的生命有限啊！已经过去了二十一年，还有几个二十一年呢？不能再白白地浪费青春了。难道说，要待到腰弯背驼时，再来为国出力，为民造福吗？！”说到此处，毛泽东已是热泪盈眶，唏嘘有声了。

王立庵被强烈震动了！他不是个容易激动的人，可是听了毛泽东的这番肺腑之言，心情实在不能平静了。他在书房里来回地踱着步子，半晌没有说话。他想：毛泽东已有凌云壮志，他思虑的不是一己的出路，而是天下万民的出路；他要学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要探索中国、世界、宇宙的大本大源！对这样的特殊学生，不能拿寻常的教学模式限制他，而应该因势利导，因人施教。否则，便扼杀了一个人才。想到这里，他真诚地对毛泽东说：“润之，我虽是你的先生，看来还没有真正了解你。你应该有你的选择，别人不能苛求于你，只要是认准了的路，你就坚决走下去吧！”

“先生……”毛泽东没想到王立庵这样理解和支持他，而且态度又是这般恳切，心里很是感激。

他怎能不感激呢！说心里话，他太需要理解与支持了。在第一师范，既有一批思想开明诲人不倦的先生，也有一些比较保守，苛求于人的先生。他毛泽东平素听到的不是溢美之言，便是尖酸刻薄之辞，有的夸他是“异材”，有的说他是“怪人”，甚至还有因他常有违校规，视之为“害群之马”、“毫无可塑之望”，建议学校开除他！相比之下，像王先生这样既有逆耳忠言，又是真正爱护他的老师，实在不可多得。当今之世，捞薪水、混日子的老师比比皆是，有几多像王先生这样真心诚意地为他的学业着想，为他的前途设计的呢？也是他毛泽东三生有幸，求学以来总是遇上这样些好老师、好人！自己如不努力钻研文比知识，力争将来能有所作为，将有何面目对老师呢？！

王立庵手抚毛泽东的肩头，语重心长地说：“润之，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应该要求一个学生全面发展；但是，在你这样的特定条件下，就应另当别论。老实说，一师的课程，的确太繁杂了；论深浅的程度，也只适合于十四

五岁的少年。你今年二十一岁了，已经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你在文学历史和哲学方面有了比较好的基础，可以专攻一门了。有些课程对你来说，显然是不重要的了；而专门研究社会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却是十分必要的。从现在开始，赶快加紧努力吧，再也不要延误了。有什么难处，我当竭尽所能帮助你！”

毛泽东感到心头一热，他向王立庵深深鞠了一躬：“谢谢您，先生！”

光阴似箭，春去夏来。

1915 年的头一个学朗，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就要开始放暑假。

“布告栏”里贴出一则消息：各个班全部考完试后，学生将有两个半月的假期，学生应于三天之内离开学校。

毛泽东收拾完东西之后，去邀家住湘乡的学友萧子升一道回家。萧子升告诉他，已决定不回家了。当毛泽东了解到萧子升留校是为了补习代数、几何、英语和地理的意图后，决然取消了回家的计划，决定也留在学校，一方面自修一下哲学，同时也请数学教员王立庵给自己补补数学课。

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一书中，曾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留校的经过：

……最后，所有的教育都空空如也了，只有我所在的教室是例外。所有我的书籍、毛笔和墨水都摊在桌上，书箱也满满当当的。毛泽东走了进来，跟我打招呼。当他看见我还没有动手整理东西，就坐下来，说道：“萧先生，你什么时候回家？”

“我已决定不回家了，”我答道。

“你真就呆在学校吗？上个月您这么说时，我以为你在开玩笑。”

“没有，”我接着说，“我已决定先在这儿呆一两个月，然后再回家往上二十天。学校很安静，呆上两个月我能读许多书。”

“你这两个月的计划是什么？你计划学些什么？”毛泽东问道。

“我准备先自学一下下学期的代数、几何、英语和地理，兴许还要读些哲学方面的书籍。”

“我知道了。那校长允许你留在学校吗？”

“允许的。昨晚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想呆在学校，他说那是违反校规的，但他相信我的确是要认真读书的，因此也就同意了。他告诉我，门房和四个校工放假期间也留在学校，所以学校不光我一人。他说他会告诉他们睡的地方离我寝室近些以便照看我。一些厨子也会留下来的，这样他们可以给我做饭，当然，我得交伙食费，学校不会担负任何额外的开支。”

“听起来真不错，我也想和你一起留下来的，你觉得怎么样？”

毛泽东是我的最好的朋友，自然我很高兴，于是说道，“好，赶快去见校长。如果你愿意，我跟你一起去，兴许我能帮点忙。有个朋友陪伴一起当然好，我希望你能留下。”

……我们去见校长，校长对毛泽东的请求毫无意见地准许了。……

就这样，毛泽东和萧子升一起留在学校了。

毛泽东把留校的事和补习数学的想法告诉了王立庵，王先生很是欣喜。他对毛泽东说：“润芝，来补习吧！正好我假期闲着呢。”

这以后，毛泽东每天早晚在学校阅读《伦理学原理》和手抄杨昌济先生翻译、尚未出版的《西洋伦理学史》一书，上午和下午便来到“李氏芋园”王立庵先生的家里，听王先生讲数学课，中午就在王家吃午饭。

后来，王立庵见毛泽东每天从一师到“李氏芋园”往返两趟，要走很远的路程，很是辛苦，加之天气炎热，既吃不好，又睡不安，就让他搬到家里来寄宿。这个暑期，毛泽东在王先生家住了一个多月，直到新学期快要开学了，才在王先生的安排下回韶山去看望父母和弟妹。

在这些日子里，王立庵先生每日不辞劳苦，尽心尽意给毛泽东辅导，补上了平时掉下的数学课；王先生还把一个由他亲手抄满数学公式和定律的本子送给毛泽东，帮助他学好这门功课。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按自学计划读完了自己选定的哲学书籍，手抄了《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并且在王先生这里借阅了大量的藏书。

这次补课，毛泽东感到收获颇丰，除了学到了不少新鲜知识和巩固了已学过的旧知识外，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上的受益。王立庵先生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炽烈热爱，给毛泽东从思想观念上补了一课，使之真正认识到了学习和掌握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这段时间，王先生和毛泽东朝夕相处，关系密切。但他并未因此忽略对学生学习自然科学的教育与熏陶，以及放松对他学习上的严格要求和检查督促。相反，越是深入了解了毛泽东济世救民的宏图大志，王立庵越是要求他一定要设法补上自然科学这一课，以求学以致用。王先生利用补课期间师生过从甚密的机会，反复向毛泽东阐明这样一些观点：无论求学或办事，都必须打好基础，盖房子要挖很深的基脚，做学问要汲取各家之长，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而后流长。如今已进入二十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的相互关联越来越精密细致了，只靠某一门类的知识，是无法掌握全局的。一件大事，要有众人来做，不能孤军奋战，不能单枪匹马。王安石变法，本是一件好事，可只凭一己之意，不设法联合各方势力，结果还是失败了。知识是联系同志，集合群体的纽带，对于某种知识的共同兴趣，可以导致感情的联结、思想的共鸣。隔行如隔山，干大事业的人如果知识单一，往往会因此而失去方方面面的朋友。因此，文化知识上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事业的牢固基础——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

这次补课，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以致终生念念不忘。虽然，这以后由于他的经历、他的环境和他所承担的使命使然，他终没有很系统地学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在这方面也说不上是个有很深素养的人。这是容易理解的。人是历史造就的，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苛求于前人。但观其一生，作为一个求知者，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毛泽东对涉猎自然科学是颇为注意的。对某些问题，他表现了浓烈的兴趣；在有的方面，发表过一些深刻的见解，并产生了巨大影响。

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向斯诺讲述自己青年时代追求新知的经历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专攻社会科学课程，自然科学并不特别令我感兴趣，我不学它们，所以我在大多数课程上分数很差。……好在我的社会科学课程分数都很突出，可以拉平在另外这些科目上的坏分数。”这是1913年到1918年这五年间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后——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的会员开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须采用甚么方法的问题”之后，在讨论会友个人的计划时，毛泽东发言：“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

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止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这一年毛泽东二十八岁，“三十以内”，还有两年，毛

《红星照耀中国》，第107页。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32、33页。

泽东还说：“两年中求学方面，拟从译本及报纸了解世界学术思想的大概。惟做事则不能兼读书，去年下半年，竟完全牺牲了（这是最痛苦的牺牲）。以后想办法每天看一点钟书，一点钟报。”

这段话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当毛泽东明确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这门科学和这条革命道路的时候，同时强调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必要。从他的话来看，他并不以学生时代对自然科学不甚感兴趣为正确或无所谓，相反，他要设法补足由于这种偏颇而造成的知识结构上的缺陷。现在我们不能详知、他的这种重大转变是不是与他的数学老师王立庵当年的教育与熏陶有关系，有多大的关系？或是他在工作和斗争的实践中的省悟？亦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但是我们知道，自此以后直至终其一生毛泽东都注意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的“大概”。延安时期如此，北京时期如此，直到逝世前几年，眼力很差了，他还收集和阅读了一些特地印成大字的自然科学书刊。

从1921年这一段话，联想到1941年的另一段话。那是毛泽东1月31日写给在苏联上学的两个儿子岸英和岸青的信，信中说：“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也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这里讲了政治和科学的关系——谈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又讲了学科学中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习社会科学。撇开这段话可能针对的具体背景不谈，仅就一般意义而言，这个主张是很有道理的。毛泽东如何形成这一主张，信中没有细说理由。一个可以想见的显著理由，就是系统地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如果年轻时没有获得或抓住机会，成年后便很难有时间和条件。在这件问题上毛泽东同许多人一样，是过来人。所以，他谆谆告诫包括他的亲儿子在内的年轻人，要抓住机会潜心“多习自然科学”。是经验的积累？还是教训的总结？当青年朋友读到毛泽东这封给儿子的书信时，希望能从中悟出些道理来。

建国以后，身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仍一直保持着对自然科学的特别兴趣和对这一工作领域的格外关注。

那是1963年12月16日，中央科学小组的聂荣臻、张劲夫、韩光、于光远、范长江等人到颐年堂向毛泽东汇报新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谈话中，毛泽东问大家说：“有一本杂志《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中间停了很久，现在复刊了，复刊了就好。现在第二期已经出了，这个刊物哪里出的？”

毛泽东问到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是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组主办的一个杂志，它于1956年创刊，1960年因故停办，1963年秋天复刊。这个杂志发行量不大，开头不过二千份，后来也不过一万份，读者圈大致限于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和一些对自然辩证法有兴趣的教师和学生。哲学界多数人都都不大注意，然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复刊第一期上的重点文章之一，是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从苏联《哲

《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2号），《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版，第32、31页。

《毛泽东书信选》第166页。

学问题》杂志转译过来的，毛泽东对坂田的文章很感兴趣，对他关于基本‘粒子’可分的见解非常重视。

毛泽东重视坂田文章和他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对待基本粒子的认识上与他的观点相吻合。早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就讲过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原子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有反质子，中子又有反中子……。

1964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同几位哲学工作者谈话，又讲到《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特别讲到坂田昌一的文章，进一步阐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的不可分的粒子的观点。他说：

“列宁讲过，凡事都可分。举原子为例，不但原子可分，电子也可分。可是从前认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这门科学还很年青。近几十年来，科学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这是重的，还有轻的。电线输电，就利用了铜、铝的外层电子的分离。电离层，在地球上空几百公里，那里电子同原子核也分离了。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个真理。不信，就试试看。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

当时我国有一群理论物理学家，正致力于基本粒子的研究。毛泽东强调的“基本粒子可分”的思想，本是从物理学家那里来的，反过来又影响这些物理学家去认真探索“基本粒子”以下层次的粒子。他们把这种粒子称为层子，建立了基本粒子结构的层子模型，发表了一批研究论文。在此前后，西方物理学家发展了关于基本粒子重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夸克”大致相当于“层子”。从六十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终于得到公认。

1977 年，毛泽东逝世已近一年。美国的夏威夷召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追述了物理学家如同剥葱一样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后，说了这样一段

话；

“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这个建议，并不是对粒子命名的一个具体建议，但他充分表示了一个“世界级”科学家，对一个政治家的深刻见解和他对自然科学作出巨大贡献所表示的崇高敬意……

九泉之下的王立庵先生，在他当年为毛泽东补习自然科学的时候，是否可知他的学生将来会获此殊荣？！

82 报恩

当年，王立庵先生曾给予“偏科”的毛泽东以深深的理解。在当时的教育体制下，不少老师对毛泽东的行为不理解，对他颇多微辞；学校当局则认为他不守校规，几次要开除他；只有王立庵这位知人善教的先生，既给了他理解与支持，又给了他教育与规劝。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对此，毛泽东一直感激不尽。毛泽东是个极重感情的人，他忘不了王先生对他的教育之恩。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延安与著名作家、当年的同窗好友萧三叙旧时，还激动地谈到他在一师曾和萧三的二哥萧子升暑假留校自学及到王立庵先生家补习数学的事，并以他特有的习惯语言称王先生“是个明白人”、“好人”。

解放后，毛泽东多方打听王先生的消息。当得知老师已经仙逝以后，为之深深惋惜。1950年5月，王立庵先生的儿媳、无锡师范学校附小教师吴启瑞，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书信，一方面向毛泽东致意，一方面告知家庭生活困难情形。毛泽东收信后，于7月19日给吴启瑞写了亲笔回信，对她家大口阔、生活困难的情况给予关怀，并帮她解决小孩入学的实际问题。信的内容如下：

启瑞先生：

五月来信收到，困难情形，甚为系念。所请准予你的三个小孩加入苏南干部子弟班，减轻你的困难一事，请持此信与当地适当机关的负责同志商量一下，看是否可行。找什么人商量由你酌定，如有必要可去找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一商。我是没有不赞成的，就是不知道该子弟班有容纳较多的小孩之可能否？你是八个孩子的母亲，望加保重，并为我问候你的孩子们。此复，并颂

教祺。

毛泽东

七月十九日

吴启瑞接到毛泽东的亲笔回信后，高兴万分，全家人捧着书信看了又看，像是见到了救星。遵照毛泽东的嘱咐，吴启瑞拿着这封信，立即去找当时的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再次面陈了家庭生活困难问题。陈丕显同志听了吴启瑞的情况反映，又阅读了毛泽东的书信，引起了高度重视。他亲自出面，首先为吴启瑞解决了孩子免费入学问题，接着民政部门还依照有关政策给予她家一定的救济，以资助生活之用。

此后不久，吴启瑞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向他报告了这些情况，并对他表示衷心感谢。看到老师的后代生活有了保障，毛泽东心里得到了很大的慰藉——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来知恩图报的夙愿。

第十六章 黎锦熙

——良师益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佚名

83 誉满长沙的历史教员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读书时所在的

预科一班，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历史教员。

他，中等身材，看上去比较清瘦，平时着一袭蓝士林布长衫，穿一双圆口布鞋，戴一副玳瑁眼镜；讲课语言和缓，虽讲究词藻，亦不失风趣幽默，于温文尔雅中，透出一种飘逸俊秀的学者风范。

他，就是黎锦熙，字邵西，又名鹏厂，1890年2月2日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霞镇石潭坝，也就是今天的湘潭市湘潭县长塘乡。

《湘潭文史》载明：在现代史上，湘潭曾有个出类拔萃的家庭，兄弟姊妹共十一人，均成为中国现代著名人物，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较大贡献，这就是湘潭长塘黎氏——黎锦熙的家。黎父培奎，字松庵，前清举人，终生不仕。在众多的子女当中，黎锦熙居长。

笔者在前往湖南采访的过程中，曾怀着虔诚与崇敬的心情，专程去长塘拜谒这位曾为伟人之师又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的故居。遗憾的是，黎氏故宅已全部拆毁或改建，仅保留着一道槽门。此后，在湘潭市博物馆副馆长谭国才、市图书馆馆长舒俊杰二先生的协助下，通过翻阅有关文史资料，终于查找到了关于黎氏故宅的详细记载：

黎氏故宅坐落在晓霞山白竹拗西麓，自成院落，宅舍坐东朝西，上首为蝴蝶坝，下首为上湾，石潭坝溪流从对面罗网山经过。黎宅占地二十余亩，第一道槽门朝南，第二道槽门和正屋大门朝西，正屋两进共十三间，除厅堂外，均为卧室，木板楼上有书房，两头有横屋，共二十一间。槽门外约五十米处的堆子巷，有屋十间，为佃人的南北杂货店铺。院墙内，还有一口小池塘和一座小花园，屋后有风景林，极显幽静和雅致。黎氏兄妹最初就都是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和成长的。

黎锦熙四岁时，父亲便为他延塾师来家设馆，塾师就是著名画师齐白石老人的妻弟王仲言先生。其时黎锦熙年纪太小，人矮得爬不上凳子，齐白石与黎父松庵先生交好，又常来黎宅看望妻弟，往往是他把黎抱上座位的。黎锦熙自幼聪慧过人，乡人有“神童”之称。十岁就参加了家乡民间组织的“罗山诗社”。十二岁起写日记，此后终身不辍。赋诗、作画，治印、吹箫，全都爱好。1905年应童子试，名列前茅，中秀才，时年十六岁。塾师王仲言曾对人说：“邵西身体虽然瘦弱，但聪颖过人。他是最得意的学生，要不是废了科举，他是会金榜题名的。”

1906年，年方十七岁的黎锦熙只身来到长沙，假曾国藩祠堂为活动地址，以“致良知”为宗旨，以“牺牲个人，努力报国”为原则，组织“德育会”。不料触犯官府禁令，要捉拿他，幸早得讯息，逃匿回乡。旋赴北京考入铁路学校，不久学校焚于火灾。于是又回长沙，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史地部，辗转迁延，其时已十九岁。

这时，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代，开创了共和纪元，但政见纷坛，百废待举。1912年，黎锦熙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优级师范”，被新任湖南督军谭延征聘为秘书，到职后不几天，有感于衙门的复杂，政情的诡秘，坚辞不就。于是改办《长沙日报》，任总编。持论每与当政不洽，报社改组。他也被挤了出来。接着，他又创办《湖南公报》，仍任总编，写

见《回忆黎锦熙先生》，《湘潭文史》第五辑。作者齐佛来，齐白石之孙。

社论、时评，振聋发聩，博得热血青年一致好评。《湖南公报》强调全国和平统一，力主“民治”。当时袁世凯企图复辟帝制，帝制派窃据时政，报纸又被查封，乃改《湖南大公报》。这段时间，他为振兴中华，大声疾呼，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充分表现了他青年时期的满腔爱国热忱。

由于黎锦熙的这段传奇式的经历，他在未到师范任教之前，便已誉满长沙城。尤其是在许多年轻的读书人眼里，他成了反清排满的大英雄。

1913年，黎锦熙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担任历史教员，在毛泽东所在的班级——预科第一班教历史课。在这里，他受到了毛泽东等学生的尊崇。

毛泽东是个“报迷”，早在湘乡驻省中学和省一中就读时，便是《长沙日报》、《湖南公报》的热心读者，因之对这些报纸的创办人黎锦熙早有耳闻，特别是黎锦熙那不凡的经历和渊博的学识，更令他倾倒。及至他与黎先生在课堂见面时，大有一见如故之感。不过，毛泽东万没想到：眼前这位名重一时的先生，竟是这般年轻、随和、可爱，不由更凭添了几分钦佩。

与此同时，年轻沉静，体态和气质与众不同的毛泽东，也很快就引起了黎锦熙先生的关注。据黎先生的夫人贺澹江女士回忆，黎锦熙后来在追述毛泽东在第四师范读书的仪表和举止时说：“在当时的学生中，毛泽东个子很高，显得沉静儒雅，并无过激言行，上课听讲时从不浮躁，只是一双眼睛灼灼有光。他衣着一向俭朴，一望而知来自乡间，课间休息时，从不和人打闹，对一切事物总是静思、观察。”黎还回忆说，那时毛泽东就表现了不凡的胸襟，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以天下为已任的气概。

黎锦熙只比毛泽东大三岁，两人年龄相仿加之又是湘潭小同乡，彼此之间有很多共同语言。所以，他们虽为师生，却很快建立起较深的友谊。

1914年，湖南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后，黎锦熙仍任历史教员。他与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他任主任，编辑中小学各科教材；又附办刊物《公言》，发表正义舆论，抨击教育弊政，极力鼓吹新学，并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报导当时正在进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引人注目。毛泽东也对之很有兴趣，时常帮黎抄写文稿。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史实，黎锦熙后来以欣慰和略带幽默的口吻说过：他办报刊时，有三个青年学生帮他抄写过文稿。一个是不问文稿的内容，什么都照抄；一个是凡见到文稿中有问题，总要提出来，并有代为润色的时候；一个是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这三个青年对待抄写文稿的态度不同，后来各自的成就也不一样。第二位后来成了著名的作家，那就是田汉。第一位默默无闻了，第三位成了伟大的人物。这第一位、第三位他不便说出来，但私下对家人透露，第三位抄写文稿的人，就是毛泽东。后来，“宏文社”在长沙“李氏芋园”组织哲学研究小组，研讨新思潮。学生中，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都加入了这个学习小组，经常前往“李氏芋园”听黎锦熙、杨昌济等先生讲授哲学，参加学术讨论。

正是在这师生教学相长、相得益彰的过程中，毛泽东和黎锦熙的友情，与日俱增，并从此保持了一生一世。

贺澹江：《忆黎锦熙先生》，《文化史料》第五期。

见《仰之弥高——深切怀念黎劭西老师》，《湘潭文史》第五辑，作者曹述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84 一代师风，仰之弥高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当中，黎锦熙的学识和人品，可以说是数一数二的。因之，黎先生在治学和做人方面，曾给早期毛泽东以重大影响。毛泽东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称赞他“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就是兼指这位良师的品行、才学和思想见解而言的。

对于黎锦熙的风范，他的“老学生”、全国政协委员、北师大客座教授梁若容先生，曾作过这样的描述：“黎先生温文尔雅，从无疾言遽色，永远使人感到春风化雨的浸润。他说话慢而有条理有力量，作事稳扎稳打，动必有功，处必能久。他是学人而兼事业家，能知人能组织团体，以群策群力，在平地起楼台，在无可为处找出路。在基本修养上，斡旋气运，“打通后壁说话，竖起脊梁做人”。不矜才不使气，在拈花微笑里，点化群伦；在机锋棒喝里，旋转乾坤；是张子房、李邕侯的化身，有王阳明、程明道的力量。具体说，他没有不能适应的时候，没有不能消化的饮食，没有不能合作的人员，没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没有不能适应的环境。他所到处就有新学问，他所读书就有新见解，他所见人就有新用处。他能从朋友里找同志，从敌人里找朋友，所以他的天地永远是宽大的。用一副挽联说明他：

通天地人之谓学，离矜去躁，任重致远；

汇华洋印以成家，化雨春风，海晏河清。”

纵观黎锦熙的一生，梁容若先生的话并非过誉之辞。作为一代名师，他的风范永存，仰之弥高。

黎锦熙很赞成孔门弟子的“安贫乐道”精神。作为师范学校的先生他收入不薄，虽无恒产，但是几乎从无窘困之忧，可仍以“吃得菜根百事可做”自励，从不“暴殄天物”，奢侈浪费。衣服破了，不喜欢换新的，却要补了再穿，说旧衣服舒适。仙从不喜欢奢华靡费，却也不吝啬小气，除了众多弟妹常得到他的资助外，其他亲友、学生、凡是贫寒求助的，他莫不援之以手。他常说：“钱财是身外物，不可不重，亦不可太重。”他喜欢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常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之思。他曾经对毛泽东讲，刻苦俭朴的生活，能够磨炼人的意志，培养人不怕劳苦、战胜困难和勇往直前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是成大器者不可缺少的。

黎锦熙的这些品质，对学生具有很深影响。尤其是毛泽东，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在身上反映得更明显些。至今仍陈列在湖南一师“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的《讲堂录》里，便写有这样一些富有哲理的话：“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这便是毛泽东当年在一师听黎先生讲课时记下来的偶感。

以老师作榜样，毛泽东从来不乱花一文钱。在长沙读书期间，总共用了160块钱，其中三分之一是花在订报上，其余的钱也多是买了书籍和杂志。在长达五年半的师范生活中，他从来没有坐过人力车，没有进过戏院，也没有下过饭馆，唯一例外的是到长沙火宫殿买过臭豆腐。这件事给他印象很深。解放后到湖南时还专门点名要火宫殿的臭豆腐吃，并风趣他说：“火宫殿的臭豆腐很好吃，它有三个特点：闻着很臭，看着很脏，吃着很香！”学校的星期天，照例放假。学生外出办事回来赶不上开饭时间的，按规定可以补助误餐。一般同学不愿吃剩菜剩饭，常常是几个人邀约一起炒菜热饭，然后再

吃。而毛泽东却例外，他总是打点冷饭冷菜，单坐一桌，悄悄吃罢后就去读书或找老师求教去了。

毛泽东的衣著朴素也是出了名的。初入师范时，学校里发了一套青色呢制服，他一直穿到毕业。衣袖裤管磨破了，颜色褪了，他还是缝缝补补，穿了又穿。他的被褥是湖南一般农民用的蓝大布套被，没有枕头，则以书代枕。他唯一的一件比较体面的衣服是那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一年四季常穿，不同的是冬穿穿时里面加些旧衣裤，夏天穿时则把它减去。因此，一些同学常跟他开玩笑说：“毛润之的‘算术’学得好——冬天用加法，夏天用减法。”

那个时代的先生，大都受封建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多以衣帽取人，对那些衣衫寒酸、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弟，常常冷眼相看。黎锦熙则不然，不仅未因毛泽东的艰苦朴素而瞧不起他，相反更看重他——主动摒弃师生的等级之别，将毛泽东引以为最知己的朋友。

黎锦熙博学多闻，满腹经纶，但他向来不以学者自居，而极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循循善诱，因人施教。他常勉励学生说：“不怕不宽宏，就怕不笼统；不怕不聪明，就怕不宽容；不怕不用功，就怕乱翻动；不怕不奋发，就怕如炮炸；不怕胆不大，就怕少规划。”这种深入浅出饱含哲理的教导，使不少学生受到启发和鼓舞，向着知识的高峰奋力攀登。他不只对学生期望殷切，而是真诚地关怀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就曾在各方面得到过他的热忱帮助，而在学问和做人上才有了长足的进步。

黎锦熙执教不愿囿于旧的章程，总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他毕业于师范学校，立志毕生从事教育工作，对教育事业不仅是热心，而是非常忠心，特别是对教材、教法，反复实践、研究，不愿沿袭旧法，而想尽办法要闯出一条让学生易学易懂易用的事半功倍的新路子。利用图表法进行教学，便是他勇于探索的鲜明一例。

他教历史课，把历史年代、人事、事件、历史地位和贡献等，用图表法加以排列，学生不用老师多费口舌，便可以把某个纷繁的历史问题搞清楚，在头脑中留下具体深刻的印象。他不满于当时国文教学的老套套——老师逐字逐句讲解，朗读或让学生背诵，加上几句评论。认为这样学生得不到全面的、明确的印象，含糊笼统，收效不大。他主张按照语法规则，用图解的方式，把文言文画出图解，在旁边标出各段大意及其相互关系，并顺便指出文艺技巧修辞等特点。学生掌握了语法基本知识之后，对着图解，一望而知句、段、全文的语法构造和意义。他把这些想法告诉好友袁仲谦，并做通比较保守的袁先生的工作，让袁在他任教的第八班试行，结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后来，黎锦熙到大学任教，他更是在教学中广泛运用图表法。如讲音韵学，无论古音、今音都要画元音舌位图和其他表格来说明发音的部位、方法及舌的高下前后，加强学生的印象；讲国语教学法，就画了著名的《汉语方言十二系区域图》；讲语言学概要，就印发《世界语言发达图》；讲读书指导课，他编过一本“增码补注《书目答问》”，他按当时通行的“图书分类法”把《书目答问》中的每一部分都编了书号，按这

见《毛泽东成长的道路》，第79页，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孙毓蘋：《著作等身》，《湘潭文史》第五辑，第26页。

个书号到图书馆很容易就能借阅这部书。他还发表过一本《学术业务类码表》，几乎把图书资料以致书信往来都分类排了号码，他就是利用这种业务分类标码的方法，十分有条理的保存了大量的各种资料，其中许多已成为极为宝贵的文史资料。黎锦熙的图样法、纲目排列法，使毛泽东受益匪浅。早年在一师读书时，他运用这种方法阅读、理解了别的同学一生都难以读完、读通的经史子集，为他日后成就一番大事业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成为新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他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运用这种方法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图样领导艺术。大到中国革命或建设的总体构想（总图样），小到对中国革命或建设某一方面或某一阶段的规划和设计（分图样），毛泽东总是事先用铅笔在纸上勾勒出来，经过周密的调查、分析和论证后，才形成决议和文件。这种具体多样、缜密精妙的“图样法”，成为他成功地、卓有成效地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他也因善于绘制出众多极其成功的精美图样而著称于世。

在治学上，黎锦熙生平最服膺两个字，一是勤，一是恒，而两字当中“恒”字更重要。他常对毛泽东说，世人多是“勤于始而怠于终”，所以无所成。他从青年时代就认定这两个字缺一不可，并且一生身体力行。“认真”是他做学问的主要特点，生平最反对“拆烂污”。他自己的日记，一记就是七十多年，从未间断；搞语言，一搞也是七十多年，全力以赴；办教育更是这样，二十一岁从湖南优级师范毕业后开始做教育工作，一做几乎又是七十年。恒心、毅力，加上科学精神和注重实践，不断前进，就是他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几个重要因素。毛泽东在这方面也受到他的深刻影响，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写过“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有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的著名对联，以此提倡“持之以恒”的学风。

黎锦熙虽然关心政治，同情革命，绝非闭门教书、不更时事的“桃花源中人”。但是，他甘于澹泊，不慕虚荣，不愿把宝贵的时光花在政治活动上。对于做官、当头头，一向不感兴趣，甚至到了头上的“官”也不愿接受，更不用说去勾心斗角、拉关系、钻营取巧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他为西北师院院长，他呆在重庆，始终没有到任。解放后，有几次出任某校某馆领导职务的机会，他都婉言辞谢，推荐别人担任。看到有的人不干自己的正事，而喜欢出入会议厅，来往飞机场，他深有感慨地说：“他们乐此不疲，夫我则不暇！”他常常把一些整天东游西逛、混日子、不干事的人叫做“等死”！而他，则永远沉潜在他认为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中。

那么，他干些什么呢？——当然，主要是做学问、写专著。他的研究成果，就是他数十年如一日，在更深夜静、独树一灯干到天亮的结晶。

他一生孜孜不倦，研究文字学，自得其乐。他说：“新文化运动的文学与史学，是离不开文字学的基础的，这是发源。中国繁难的语言文字学不搞好，文学史学等文化的发展就会受影响。”他还说：“这门科学，现在很少有人搞，我宁愿做一头牛，耕别人不暇后顾的这块荒地。”他一生对文字学执着的追求，上面这段话，就是最恰当的写照。他自称为牛，几十年中也确像牛一样稳健，像牛一样踏实，在坚持搞文字学这漫长的一生中，走到了尽头。从最初的倡导、组织到规定标准音、标准语，制订符号、音标；从注音

字母、注音符号到国语罗马字、拼音文字；从南北协议定音，而京音、京语到普通话；从拼音方法上的“三拼”到“双拼”等等；他是无役不从。或主持，或参与，无不殚思竭虑，实际调查，采择众议，审古酌今，而后独出心裁，不断地加以修订、改进，务期既合于音理，又便于实用，尽善尽美而后已。

黎锦熙学识渊博，著述等身，对多学科领域均有精湛的造诣。他出版了很多关于文字改革的著作，如《国语新文字论》、《新著国语文法》、《文字改革论丛》，其中《新著国语文法》一书，迄今为止已先后印行二十六版之多。我国当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吕叔湘对《新著国语文法》极推崇，他有一首诗曰：“《国语文法》推新著，吾辈数人定《国罗》。更有桃李满宇内，天南海北播弦歌。”王力先生也有一首诗：“酒阑夜永数人名，巨制宏文次第成，眉叔高才石寿，鰲生倾羨有余情。”叶圣陶先生也有颂扬他治学精神的诗：“难忘前岁访先生，列桌摊书真若城。高论滔滔笔在手，著书到老我心倾。”的确，黎锦熙在他漫长的教学实践和研究工作中，除对语言学有独特贡献外，在音韵学、文字学、辞书学、方志学、目录学、文学、史地、教育、哲学、佛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建树和丰富的著述。据粗略统计，他毕生所著已发表和出版的约四百余种。似这样的丰硕成果，怎不教老教育家圣陶老“倾心”呢！

他不只是著名的学者，同时又是诗人，著有《邵西诗存》；他又不只是诗人，还是一位卓越的书法家。他留在人间的翰墨真迹，笔力遒劲秀拔，颜筋柳骨，人们把它视之为无价之宝。

黎锦熙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在他的人生简历上，赫然写着：

早年，历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历史教员，北京高等师范、女子师大、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长，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历任西北临大（联大）主任教授、西北师院教授、教务主任、院长及湖南大学文学院长；新中国成立后，续任北京师大教授、主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全国政协一、二、五届委员，全国人大一、二届代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常务理事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等职。

观其一生，盖棺定论，无论是治学还是立身，他都堪称一代师表。

据笔者考证，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先后同三位老师交往最为密切，他们是杨昌济、徐特立和黎锦熙。而在这一时期，根据毛泽东的学习兴趣所在、学校课程的设置和老师的工作变迁情形，又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与三人中的某位老师关系好。大抵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阶段——1913年春到1915年秋黎离长赴京，毛泽东同黎锦熙过从甚密；第二阶段——1915年至1917年秋徐辞却一师教职，毛泽东与徐特立交往甚深；第三阶段——1917年至1918年春杨赴北大任教，毛泽东和杨昌济感情甚好。

对于毛泽东来讲，黎锦熙不仅是他的良师，还是一位难得的益友。

他不但在才学上敬佩这位跟自己年纪不相上下的老师，而且在思想见解上也服膺于他。毛泽东不仅在课堂里向黎先生求学问道，还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黎的住处释疑解惑，共同切磋学术见解，交换对政治形

势的看法，探求人生与救国的大道理。因此，在一个时期他们两个几乎到了须臾不离的亲密地步，这几乎是全校师生人所共知的事。

对此，黎锦熙在他1915年4月至8月所记的日记中和后来撰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已作了翔实的记载。他在《纪事》中回顾道：

“辛亥革命后，我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历史教员，毛主席于1913年考入预科，又升入本科……那时我组织“宏文图书编译社”，办《公言》杂志，又组织哲学研究组，共有杨昌济徐特立等二十余人。大家都搬到一起住。毛主席每逢星期日常偕同学来参加学习和讨论。见于我1915年日记，如：

（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星期日。上午润之来，阅其日记，告以读书方法。

四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一师学生肖子升、润之及甫（熊光楚）至，讲读书法。

四月十八日，星期日。润之、少青及执钦相继至，共话社事。

四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游国（即“李氏芋国”），润之来，告以在校研究科学之术。

五月九日，星期日。润之至，稍话读书事。（为什么是“稍话”呢？黎锦熙在他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写的《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中追述道：“查我上一天即八日日记：‘日本已于昨日即五月七日下午下哀的美敦书矣！’故九日对‘读书’只是‘稍话’。对于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卖国

‘二十一条’的消息是详谈的。当天下午日记云：‘公报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于是群情大愤。’毛主席写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于他所看的书上。”）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上午甫、润之至，又晤季范，久谈改造社会事。

七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章甫同润之来，问“小学”（即语言文字学的旧称）功夫做法，余谓宜读《说文段注》。

七月十三日，星期二。夜归，与润之、章甫说读史法（时放暑假，两人都离校住宿《公言》杂志社中）。

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读《群学肄言》“教辟”竟。……与润之说研究法。

七月十九日，星期一。上午与润之、章甫说读书自习法。

七月二十日，星期二。收拾《公言》杂志社编辑室。上午坐门间，阅《群

学肄言》《缮性》篇，竟。甚爽适，润之亦移坐此室。

七月二十一日，星期三。与润之、章甫讲学，告以精读《缮性》一篇，以自试其思考力及学识程度。

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晚，在润之处观其日记，甚切实，文理优于章甫，笃行两人略同，皆可大造，宜示之以方也。

八月八日，星期日。晚饭后归，与润之谈学与政，以易导（谓易于引导群众）为佳。

八月十一日，星期三。晚归，与润之久谈读书法，谓须与校课联贯。

八月十四日，星期六。晚，览润之日记于甫处，甫前日来此住，预备升学考试，润之昨日之到校矣。章甫则任一师附小的级任去。

八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上午润之、章甫至，为论读书法于甫处。

八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上午子升、润之至，谈学颇久，平子偕（张平子，《公言》杂志社同事）。时正组办湖南《大公报》，九月一日创刊，同日我动身来北京。……

从以上日记及《毛主席六札纪事》中的部分回忆，可以看到在四月四日到八月二十九日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共去拜访黎锦熙近二十次，可见其请教是多么频繁，请教的内容又是多么广泛！他们名为师生，实是挚友，推心置腹，无所不谈。

在这些求教及相互交谈过程中，毛泽东深有所获。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弟自得阁下，如婴儿之得慈母”，“甚愿日日趋前请教”。“如婴儿之得慈母”一语，力重千钧，毛泽东对黎锦熙的尊敬和推崇，由此可略见一斑！

1915年，年仅二十六岁的黎锦熙，应国民政府教育部之聘，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从此，毛泽东失去了向先生当面聆教的机会，于是他就采用通信的方法求教。

从这年的冬天到1920年间，毛泽东给在北京工作的黎锦熙一共写过六封书信。信中讨论的问题相当广泛，从国家大事，哲学思潮，到人生观，世界观；从求学方法，到锻炼身体，等等，无所不及。在信中，毛泽东对黎锦熙或尊为师或称为兄，谈政论文，说古道今，披肝沥胆，坦诚相见。只要读过那几封信，便可知当时毛泽东同黎锦熙绝非一般的师生、朋友关系而是“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大计”的深厚交情。

毛泽东给黎锦熙六封书信的具体内容，归纳起来主要是

之一：直言劝友。

1915年秋冬之交，袁世凯收买一批政客，以北京为中心，大造复辟舆论。当时，黎锦熙受聘初到北京，社会上有人误传他也被袁世凯罗织。毛泽东担心黎会卷入复辟逆流，出于对老师和挚友的关心，他于11月9日给黎去信进言，恳切地规劝道：

“方今恶声日高，正义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当龙潜不见，以待有为，不可急图进取。”并说，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京城是“腐臭之地”，不可久留，劝他不要为人收买，请他“急归！勿恋！”速回湖南生身之地，以讲学为正务。

之二：疏通误会。

毛泽东在给黎锦熙寄信以后，在另一位老师杨昌济先生处得知：黎任职的机关是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隶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这个机关是主管探讨、研究有关国语运动的学术问题的，不同其他行政部门。黎锦熙在该会充任“委员”，除了为谋生计必需一个社会职业外，更主要的目的是利用教育当局想凭借专家学者的声望为自己装点门面的心理，来推进国语运动的发展。黎当的只不过是“事务之官”，做的是“书生事业”，并未被袁所笼络。所以，毛泽东又于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致信，检讨自己“所言多不是”，以求得好友的原宥，疏通两人之间可能存在的误会。

毛泽东对一师那种旧式的教育制度很不满意，认为它太机械，太呆板，使学生太受拘束，因而大大压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当时，他产生了退学念头。特别是在1915年，因发动“学潮”被校长张干“记过”之后，他更感到不愿在一师再待下去。但是，对这样大的事情作出决定，他觉得还是应事先和信得过的人商量以后再说。于是，他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杨昌济先生，当即受到了杨先生的劝阻。尔后，他于1915年11月9日给黎锦熙写了一封信，公开流露出自己对学校教育制度的强烈不满情绪。信中说：

“……弟在学校，依兄所教言。孳孳不敢叛。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太悲伤。昔日朱子谓‘不能使般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

毛泽东 1915 年 11 月 9 日致黎锦熙的信。

毛泽东 1916 年 12 月 9 日致黎锦熙的信。

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渴望兄归一商筹之。”

黎锦熙接信后，立即回信劝毛泽东留在一师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主要是利用学校的各种有利条件，自己发愤读书，以自修为主，借以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这样，毛泽东听取了黎先生的意见，继续留在一师学习。事实证明，黎锦熙的意见是对的，毛泽东后来通过在一师进行系统的学习，掌握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为他日后从事革命活动奠定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

还是在上述这封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向老师通报了他为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的事。他在信中坦率地说：“两年以来，求友之心甚炽，暑假后，乃作一启事，张之各校，应者亦五六人。近日心事稍快惟此耳。”

之四：切磋学术。

一九一九年九月，毛泽东在他写给黎锦熙的另一封中，称赞黎先生发表在《民铎》六号的《国语学之研究》一文，与《民铎》同期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他还说，他“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便可说不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在信中阐发的这种以普及国语教科书来推动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的主张，与黎锦熙多年来的孜孜以求不谋而合。黎先生提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改文言文为白话文的时间很早，1916年他在教育部工作时作过一篇《教育之根本问题》就提出了这种要求。其中有一段文字是“……其弊之尤甚者，大多数国民以不通文义之故，于国家政治绝无所知：一二人操纵之，虽有亡国败家之祸，弗能喻也。犹幸是非利害，人类尚有直觉之本能，真正民意，终难湮没。然共和回复之后，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之国民聋盲如故，则‘民意’二字，又将为少数人所僭夺，真正之共和政治，亦终不可得而见，此其机括，悉在义务教育之四年间，悉在此四年间所学之本国文字能应用与否而已。”这时正当袁世凯帝制推翻之后，从这段话可看出黎锦熙从事国语运动、文字改革的终极目的乃在启发民智，改革政治。从上述1919年给黎锦熙的信中表明，“五·四”运动前后，毛泽东和黎在学术思想上是互有切磋和交流的，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互为影响、趋于一致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一师学到的文化知识越来越多，他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标也越来越清晰明了。同时，也就是在这期间，他愈来愈领悟到这样一个道理——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是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的人，才能当此重任。也就是说，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能任重致远。他在1916年12月9日给黎锦熙先生的信中，阐述了自己关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重要意义，以期与先生求得共识。他写道：

“古称三达德，智、仁与勇并举。今之教育学者，以为可配德、智、体之三者。诚以德、智所寄，不处于身；智、仁体也，非勇以为无用。且观自古不永寿者，未必其数之本如斯也，或以其身之弱然尔。颜子则早夭矣；贾生王佐之才，死之年才三十三耳；王勃、卢照邻或早死，或坐废。此皆有甚

毛泽东 1915 年 11 月 9 日致黎锦熙的信。

毛泽东 1919 年 9 月 ■ 日致黎锦熙的信。

高之德与智，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矣。”

毛泽东从古时早逝的英才，联想到自身，联想到黎先生。他接着写道：“兄之德智美矣，唯身体健康一层不勉少缺，弟意宜勤加运动之功。弟身亦不强，近以运动之故，受益颇多。闻之至弱之人，可以进于至强。东西大体育家若罗斯福、若孙棠、若嘉纳，皆以至弱之身，而得至强之效。弟始闻体魄、精神不能并完，且官骸肌络及时而定，不复再可改易；今乃知其不然，身心可以并完也，而官骸亦无时不可改易也。愚意如此，不知合兄之心否。”

之五：抒发志向。

毛泽东认为，作为一个青年就要有救国救民的宏大志向。而要实现这一志向，就应当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样的大本大源问题，从根本上改造现实社会。1917年，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写道：

“天下亦大矣，社会之组织极复杂，而又有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有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在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他在信中批评了当时社会上流俗的立志之说：“今人动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见夫宇宙之真理，明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立志，只有把立志和探求宇宙的真谛联系起来，把认识真理和实现真理联系起来，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立志。

毛泽东向黎锦熙先生进一步直抒己见：“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他进而得出这样的推论：立志是件不容易的事，“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他将探索真理作为自己的奋斗理想，勉励自己将“全幅功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只有对哲学深下功夫，日新月异，才能不盲从他人是非，而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或主张”。

他在信中继续谈道：要探求宇宙的真理，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志向，就必须刻苦学习，求得真本领，不断地充实自己。他说：“今之天下纷纷，就一面言，本为变革应有之事情：就他面言，今之纷纷，毋亦诸人本身本领之不足，无术以救天下之难，徒以肤末之见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无他，无内省之明，无外观之识而已矣。……以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欲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毛泽东 1916 年 12 月 9 日致黎锦熙的信

毛泽东 1917 年 8 月 23 日给黎锦熙的信

1917年8月31日，黎锦熙在北京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写道：“下午。……得润之书，大有见地，非庸碌者。”他尤其赞赏毛泽东关于“立志”一说，深感毛泽东“不愧为是大器量之人”。他想：虎豹之子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雏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只有干大事业的人才胸有大志。毛泽东已立下凌云之志，似这等英才、伟器，焉有不成功之理！

之六：商筹人生大计。

在是否出国留学这样关系到人生道路抉择的大事上，毛泽东也曾写信征询过黎锦熙的看法。

早年的毛泽东是主张出洋的。新民学会成立之初，他就提出学会要向外发展。赴法勤工俭学的事传到湖南时，同当时许多湖南青年一样，他也是很欣喜的，认为“留学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的一个新生命”，并设想到日本等国去留学。这些在有关材料中都得到证实。萧三在1918年3月31日的日记中曾记载：“二兄（指萧子升）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革新民学会简章。……又述润之等赴日求学之计划。”罗学瓚在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提到：“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说：“兄与章甫于两年中将小学校办好然后赴俄，则根深蒂固矣。”

那么，后来毛泽东又为什么没有出国领略外国的世界呢？据分析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现实的考察，深思熟虑后决定暂留国内研究中国国情。1918年秋至1919年春的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开阔了视野，也使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他深感自己对中国社会了解不够，对于种种学说、种种主义，还没有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因而需要在国内作进一步的探讨。通过思虑，他认为暂不出洋有三大好处：第一，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在世界文明中，东方文明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促使毛泽东留下来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许多出国留学的新民学会的会友希望他能留在国内“殿后”溪学会在国内的发展打好基础。第三个原因，则是毛泽东特地征询过黎锦熙等先生的意见，得到他们的支持后才最后下决心留在国内的。在第一次北京之行期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家中做客，1919年的春节，就是同黎锦熙及家人一起度过的。他们之间交情甚深，无话不谈，盼是否出洋的事也曾在一块商量讨论过。黎在《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一文中回忆：当时，他问毛泽东有何想法和打算，毛泽东解释说：“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如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研究本国问题”，这一观点与黎锦熙的一贯思想十分吻合，所以毛泽东的意见得到黎先生的赞同。关于这一点，在毛泽东本人的信件中也得到反映。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

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即胡适——引者注）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基于上述这些原因，毛泽东最后决定，“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后来，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毛泽东“觉得俄国是世界第一文明国”，十分向往到俄国去留学。他把这一想法，很快定信告诉了黎锦熙：“同住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后因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一愿望未能实现。但是，通过毛泽东与黎锦熙通信中所透出的信息，人们可以感受到他们之间是何等亲密和信赖。

黎锦熙出于对毛泽东人品的敬重和对他们之间深厚友谊的珍惜，解放前一直在“国统区”工作的他，冒着坐牢杀头的极大风险，一直珍藏着毛泽东写给他的这六封信。解放后，他把这些信件献给了中央档案馆保存。毛泽东见到这些原件时说，谢谢黎老在漫长的黑暗年月中敢于保存至今。并让荣宝斋制作成影印件，还赠先生留作纪念。1950年12月，黎锦熙还特地为此写了一篇《毛主席六札纪事》，以志纪念。

今人朱星在悼念黎锦熙的诗作中，也对黎先生与毛泽东之间的这段鲜为人知的经历有过描述：

试披手迹墨犹新，师生相投情意深。

难得宛委藏秘室，低徊叹息感人心。

毛泽东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致黎锦熙的信。

朱星：《悼念黎劭西师（十绝）》，《湘潭文史》第五辑，第230页。

1949年春，北平和平解放后不久。一天中午，几辆小车驰往和平门，在北京师范大学宿舍楼前徐徐停下。旋即，从一辆车上走出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人。他，就是毛泽东。

这时，在欢迎的人群里，有一位年近六旬、学者模样的长者朝毛泽东走来，毛泽东一见急忙快步迎上前去，激动地叫了一声：“黎老师，黎先生！”然后两人久久地握手、问候……

这，就是毛泽东同分别近三十年的老师黎锦熙重逢时的动人情景。

师生久别重逢，格外高兴。午饭时分，毛泽东让身边工作人员叫了两坐酒席，特地款待老师黎锦熙和北师大黄国璋、汤真、傅种荪等知名教授。宴席上，他们亲切话旧，感慨万端。当黎锦熙向昔日的学生介绍他离别后的情况时，毛泽东评价说：你老是爱国的知识分子，是主持正义、坚持真理的。接着，毛泽东问起了1948年发生在北师大的“四·九”血案，赞扬了老师在这当中的表现，说：“你们《‘四·九’血案教授罢教宣言》，写得好！……”

毛泽东说的“四·九”血案和《教授罢教宣言》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始末如下：

一九四八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御转为进攻，国民党为了维持其垂危的统治，加紧镇压国内民主运动。四月九日零时，特务分子数十人其势汹汹地突然闯进了北师大学生宿舍，将学生自治会理事姚炯、和平社团理事房世泰等八位同学毒打后强行逮捕，同时捣毁了文科大楼“筱庄楼”的学生自治会、历史学会、国文学会、英语学会及许多教室。这就是当时震动北平的师大“四·九”血案。

当时，北师大代理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对国民党特务的这种暴行异常气愤，说“这是中国教育界空前的耻辱”。次日，他和许多教授一起在“筱庄楼”前广场举行全体师生大会，控诉特务暴行，而后联络其他院校师生五千余人到“总统行辕”大请愿。黎锦熙和师大教授站在请愿示威队伍的最前列，新华门前形成了数千人包围行辕的壮阔场面。黎锦熙和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英语系主任焦菊隐、数学系主任傅种荪等先生，一起进入行辕交涉，经过和行辕参谋长徐启明一再谈判，迫使行辕终于答应释放被捕的八位同学。当晚，师大学生代表从北平警察局将八位同学接回，请愿斗争取得初步胜利。

四月十日，师大教授会继续开会，决议要求政府惩凶、赔偿、保障生员安全，并宣布从即日起无期限罢教，同时由黎锦熙、傅种荪、刘盼遂三位先生共同起草了“罢教宣言”。宣言内容如下：

“本院‘四九’惨案发生，全体员生罢教罢课，齐集行辕请愿，提出最低要求，并承北大、清华、燕京、中法、铁院、朝阳等各校师生协助，始于九日晚十时，由东直门内第三警署将学生八人领回，转送北大医院。然多已血迹模糊，神魂丧失，其中二人双胫击断，只手垂残，屠宰余骸，惨不忍睹。未被绑走之重伤二人，一则胸腹内伤，奄奄待毙，一则头部有二寸长铁器伤口三处，深入脑直髓，左耳半去半存，恐有生命之虞。似此草菅人命，无法无天，全体员生，同声愤慨。本会决议提出三项要求：一、惩凶。罹难学生，虽经释放，逞凶主犯犹未究明。东厂肆虐，锦衣诏狱。岂特被害者，含冤莫诉，凡有血气，实皆耻之。国家不实行法治则已，如实行法治，北平军警当局理应交出凶手，依法严惩。二、赔偿。此次暴行，受伤者之医药费及公私所受之物质损失，均应由主凶从犯负责赔偿。三、保障员生安全。生命安全

宪法明载。文武官员，信誓旦旦，莫不以奉公守法服务人民为口头之禅。今纵令未能，岂可作威作福，肆凶肆恶，视学府如寇仇，等青年于鱼肉？……以上三端为本会最低要求，倘遭漠视，誓不复教。”

这份宣言除由学校当局送交有关方面及在校内张贴外，黎锦熙还让学生自治会油印数百份广为散发，后又在《世界日报》教育界栏内刊登，影响很大。师大教授罢教，学生罢课直至四月下旬，北平市长何思源、警备司令陈继承联合备函表示：“职司治安，疏于防范，公私交责，愧憾何似。飭属严究肇事责任，依法惩办。……至于贵院此次所有损失，当负责妥为弥补。”罢教、罢课方才结束。

在罢教罢课期间，师大曾连续三次发表“宣言。以及《致北平行辕徐启明参谋长书》。这些宣言，黎锦熙都参与起草，写得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当时受到北平地下党学委和华北局城工部刘仁、荣高棠等负责同志的高度赞扬……

“四·九”血案是解放前夕“国统区”爆发的一次较大的学生爱国运动，具有全国性影响，它自然为毛泽东所知。特别是事关他昔日的老师，所以印象就更深刻。及至这次师生久别再见以后，便情不自禁地当面向老师重提旧事。不过，从毛泽东的一贯风格看，他称赞的绝不是老师的一时一事，而是肯定老师的全部历史。

考查黎锦熙的人生履迹，事实正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历史教员，黎锦熙对中国历史人物兴衰荣辱的事例可谓谙熟于心，岳飞、辛弃疾、文天祥、戚继光……这些为民请命、宁死不屈的英雄形象早已扎根在他心中。他常常以此教育学生、鞭策自己，无论立身治学，都要随着时代前进，不可逆潮流而动。早在一师任教时，一次他给学生讲课，当讲到《易经》里“时”“渐”的意义时，他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随时之义大矣哉’，‘时’是《易经》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个人无论处世治学，都应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前进：不可作顽固保守派，不可墨守陈规，人云亦云。而要自己能‘立’，有主轴骨”。他还要求学生，要“打通后壁说话，挺起脊梁做人”。用这些话来看他的整个人生轨迹，基本上是颇为适合的。

他幼时读儒家经典，受家庭影响，想从科举考试找到出路。但由于当时的中国，处在各帝国主义多次侵华战争之后，有被瓜分的危险，爱国志士各以所学，纷纷以各种主张和行动试图挽救危亡。康、梁等人立宪改良派，孙中山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办洋务、兴实业等思想，对于全国人民、尤其对知识分子影响很大。黎锦熙自然也不例外。他青少年时期，在上述各种思想影响下，与同伴们一起组织“德育会”，以“致良知”，“牺牲个人，努力救国”为宗旨。主编“长沙”、“湖南”各报时，主张全国统一，绝对民治，批评时政，并翻译美国《民主政治》等书，作为鼓吹。随着西方民主思想高潮的来到，“五四”时期，接受了提倡民主、科学的口号，他以推动国语统一，提倡文言一致，反对复古倒退，作为新文化运动有力的一翼，积极投入运动的行列。

徐康：《严词正对千夫指，抗暴全凭赤子心——忆黎锦熙先生在北师大“四·九”血案中》，《湘潭文史》第五辑，第121～123页。

梁若容：《黎锦熙先生与国语运动》，《湘潭文史》第五辑，第183页。

1925年发生的北京“女师大风潮”，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进步学生反对保守落后的学校当局的斗争。黎锦熙在这场斗争中的表现，充分展示了他坚持原则、主持正义的可贵品格。

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杨荫瑜，把她与学生的关系当成封建婆媳关系，“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怀春；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上公园，以为是密约，”把学生禁锢得个个“未字先寡”。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在北京中央公园举行公祭，杨也阻止学生去参加追悼会，说什么：“孙中山是实行共产共妻，你们学了他没有好处。”就这样，激怒了学生，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驱羊（杨）运动”就展开了。在当时教育部长章士钊的指使下，杨荫瑜有恃无恐，竟于5月19日，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刘和珍、许广平等六名学生。鲁迅一方面写文章为女师大学生说话，同时两次替学生代拟给教育部的呈文，还和马裕藻、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李泰芬、沈兼士等七位教授在《京报》上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在这关键时刻，女师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及代理主任黎锦熙毅然相率引退辞职，以抵制杨荫瑜的独断专行，和鲁迅站在一起支持进步学生。而杨立即放出谣言，蛊惑人心，说她开除学生的事曾通知过文科主任。为了揭露杨的虚伪卑劣行径，黎锦熙于5月31日印发了《致杨荫瑜先生函》，并在6月3日的《京报》上公开发表，说明他对学校开除学生的事“事前的确是绝对的‘并未与闻’。”黎锦熙仗义执言，主持公道，有力地声援了女师大学生的正义斗争，实际上也是对李大钊、鲁迅所领导的这场革命斗争的支持。

国民党时期，黎锦熙因为一直主持国语会的工作，与当时的教育部经常有联系，但对国民党政府，他不愿同流合污，只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七七”事变前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处于极端动荡的状态，几方面的政治势力斗争极为激烈。教育部当局想拉拢他，由一位和他熟悉的人示意，想请他出任某大学校长，条件是解聘该校进步教授。黎当即表示，既不愿当校长，更不愿无故解聘教授。深为陈立夫所不满。不久，北平危急，各校南迁，师大、北大、北洋等校组成西北临时大学（后改称联大）。教育部想借机解聘几位左翼教授，但由于几位知名教授联名作保，才暂未实现，其中签名作保的人就有黎锦熙。这样，就更被当局所忌。他原任师大文学院院长多年，声望也很高，临大文学院院长一职，顺理成章应由他担任，但因上述原因，宁可把文理两院合成一个院，请一位研究自然科学的教授做院长，而只让他任中文系中任。从这些事实来看，他同情并在可能范围内支持左派、支持革命，是很清楚的。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黎锦熙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政策深表不满，这从他的许多诗文和讲演词里便都可以看得出来。如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黎先生作诗云：

“安内”残民众，和戎弃版图。

乃云无抵抗，直是递降书！

北虏吞龙锦，南锋指沪苏；

国联犹束手，烽燧迫中枢。

鲁迅：《寡妇主义》。

陈剑鸣：《黎锦熙与鲁迅站在一起》，《湘潭文史》第五辑，第77～78页。

又云：

“攘外”原虚语，孤军委海隅。

仓皇辞寝庙，迤丽赴行都。

幸拒金牌召，终输铁锁图。

坐令万家市，灯火杂号呼。

1933年6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黎先生有感国破家亡而赋诗，其中有“酒浆难挹徒欺饰，仰视长空斗柄横”之句，自注云：“我国航空已设专署，飞机只备内战，无一抵抗，东北飞机又皆资敌。诗云：‘×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此之谓也。”这首诗的小序有云：“和约五条，签订塘沽之市；平东廿县，顿成瓯脱之区。貂锦三千，已化无定河边之骨，燕云十六，渐入契丹南服之图。”

1936年5月4日，黎锦熙以《‘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为题，在北师大“总理纪念周”集会上作过一次讲演，他在前面论述了“‘五四’运动以外交问题起，而以文化改造运动终”的观点以后，接着说：“历史的过去的话是如此，现在的话又应该怎么说呢？‘五四’运动是对于日本在巴黎和会有优越感的成功，而中国提出‘取消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没有办到所引起的反响。现在呢，十七年过去了，我们连‘五四’时代的国势也大不如了，回想‘五四’时代的国势，反可称是黄金时代了。当时的运动，是在争应得的而没有得到的利益；现在呢，恐怕只有逃难避死的运动了。我们想到这十七年间国事日非，如果‘五四’之后那种精神能够继续进展下来，也许不会落到今日这般地步。对于国家前途与今后的自处，应当努力作一点实际的准备。”黎先生竟然在国民党政府规定的“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公开斥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实行独裁统治，反不如“五四”时代的北洋政府了。他的话柔中含刚，实在是受爱国主义热情的激发而发出的忧愤吼声。

抗战期间，他随大学内迁陕西国民党统治区，一直与共产党保持联系，与延安的吴玉章、徐特立同志等老友多有书信往来，甚至与吴玉章在信中长篇大论地争论注音字母和拉丁化的优劣。黎锦熙以汉语的“又有油又有肉”比喻拉丁化就拼不出准确的音来；而注音字母有四声，就能正确拼出音来，使吴老回信说“这是个别音和个别句子的问题”云云。抗战胜利后，他在重庆同许德珩等进步的知名人士一道，发起组组“民主科学社”，后改为“九三学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新民主运动。1946年，黎随学校返回北平后，他的家——烟筒胡同四号，曾经是地下党负责同志多次开会的所在。停战协定后，中共“军调部”代表叶剑英、彭真、罗瑞卿、徐冰等都曾在他家开过会。他的长子倪夫当时就是地下工作者，也曾负责安排周扬、张大中等来家里开过会。

黎锦熙与毛泽东、李大钊等有着很深的个人友谊，也有许多相似的政治见解。正是与这些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交往，敬佩这些人的高尚人格，他才转而同情和支持他们领导的革命事业。那个年代，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天天在骂共产党和毛泽东是“匪”。但无论怎样的诋毁，黎锦熙一直是对毛泽东打内心敬重，对革命的成功也是满怀希望的。这绝非后人牵强附会。在白色

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

见黎锦熙《廿年纪事诗存》。

北平师大《校务汇报》152期。

恐怖之下，他不顾身家性命，不仅保存了毛泽东给他的书信，还保存了完整的《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包括毛泽东亲自邮寄给他的一至四期《湘江评论》。仅此一点，就是常人所不能做得到的，它需要非凡的胆识。同时，他与毛泽东的友情也可从中略见一斑。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他对以“领袖”、“元首”自居的独夫民贼蒋介石却深感鄙夷。还是在临大的时候，他和友人开会住在西北大厦。进餐时，看见墙上悬挂着四大盟国领导人罗斯福、邱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巨幅画像。黎问朋友：“你看哪个人的像最好？”那人没有了解问话的含义，随便答道：“看样子，邱吉尔还有点政治家的风度。”他听了不以为然，指着斯大林像说：“还是他好，”又补充一句：“他很英武，那个像（指蒋介石）不好。”这时，朋友才明白他说话的用意，不禁报以会心的一笑。

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挑起内战，日益走向腐朽，越来越失去了民心。正是通过这些事实，黎锦熙才逐渐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如果说，早些年他还对国民党政府抱有一丝幻想的话，那么，这时他已对它完全丧失了信任和信心，决心与之彻底决裂。这样，便有了毛泽东后来盛赞“四·九”血案中的正义之举。

1948年底，解放军围攻北平。炮声隆隆之际，国民党考虑到黎锦熙的名望，妄图裹胁他南逃。教育部当局三次送来通知，让他全家乘飞机去台湾都被他拒绝了。第三次通知是1948年12月26日，派北师大教务长亲自登门敦请，让他立即作好准备，乘“霸王号”起飞，而且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当晚六点即派车送往机场。对此局面黎锦熙已成竹在胸，笑着问夫人贺澹江：“你看怎么办？”贺说：“我才不跟蒋介石去当高等难民呢！”当着教务长的面，她撕毁了那张通知单，扔在纸篓中。教务长知道动员无望，只好夹起皮包说：“黎老，那我先走了。”教务长走后，黎锦熙说：“让他们去吧！我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呢！”贺澹江会心地含首，她知道先生要等的是曾为他学生的伟人毛泽东……

88 半个多世纪的交情

自 1913 年到湖南第四师范任教始，到 1976 年止，黎锦熙和毛泽东之间的交往保持了半个多世纪。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虽然人世苍茫，时事变迁，但他们师生加挚友的那份情谊，并未见因此而淡薄。六十多年来，他们之间的交情历尽了生与死、贫与富、贵与贱的种种考验，却愈发显得浓烈。“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这句毛泽东极欣赏的太史公对于友情的精辟之论，用在他俩人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这则人际交往关系史上的鲜有之例，将有待社会学家去探讨。

民国初年，黎锦熙到北京任教育部教科书特约编纂后，他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少了，可他们之间书信不断，或互报平安，或交流思想，相互之间的了解有了更进一步的加深。毛泽东在一师毕业后，第一次来到北京，一边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一边到北大旁听学习和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这期间，据萧三回忆说，毛泽东“常到黎锦熙先生家里去拜访，同黎先生谈论时事及世界问题，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阴历年时，黎锦熙把毛泽东请到烟筒胡同四号的家里，大家一起动手，包饺子过年。师生感情之深，关系之密切，由此可见。

1919 年春夏之交，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这时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毛泽东即以全部的爱国热情投入这场反帝爱国的革命洪流之中，主编了进步刊物《湘江评论》，宣传“五·四”运动。《湘江评论》创刊后，毛泽东每一期都要寄一份给北京的黎锦熙，一来便于黎了解湘省运动进展情况，二来请他提出改进意见。在监印《湘江评论》第四期时，毛泽东又和往常一样，亲自在印刷机旁将刚印出的第一份报纸装入信封，亲自写好地址去邮局寄往北京。没料到，他刚刚离去，湖南军阀就派人查抄了已印好的第四期《湘江评论》，并全部焚毁。所以，直到今天全国只有黎锦熙保存的这独一份由毛泽东亲自寄给他的第四期《湘江评论》。毛泽东在 1919 年 9 月 5 日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谈及当时的情况：“《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加上增刊，第四期便是第五期。故有“第五号被禁停刊”之语——引者注）。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收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

1919 年末，为驱逐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黎锦熙闻讯，即刻赶到毛泽东的住地——北长街九十九号福佑寺看望。在这里，黎锦熙发现毛泽东在异常紧张、艰苦的工作环境下，正在阅读《共产党宣言》，言谈中毛泽东还要黎锦熙也看一看这本书。不久，毛泽东又去上海，从此天各一方，甚至音讯也渺茫了。然而，黎锦熙始终关注着自己的这位“高足”、“畏友”。后来，他听说毛泽东组织了“反对党”——共产党；再后来，又传闻毛泽东上山当了土匪；有一阵子，报上还宣传“朱毛赤匪被剿灭了”。听了这些消息，黎锦熙格外为老友的安全担忧，也更增添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打这以后，他保存的毛泽东“六札”墨宝，便成了他思念友人的感情寄托。每当思友心切时，读一读那字迹道劲、学问渊博的书信，一师时风华正茂的青年毛泽东便清晰地出现在面前。他感觉到与毛泽东近了，心胸便得到了慰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白色恐怖下，他把毛

泽东的信和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及五期《湘江评论》装在一个精制的盒子里珍藏起来。他想等到那一天，一定把这些东西亲手交给他的主人。这一天终于盼到了。解放后的1953年，黎锦熙把“六札”送给了毛泽东，作为他六十岁的寿礼。收到这份异常珍贵的礼物，毛泽东特别高兴，对黎锦熙连声道谢。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国内政治空气有所缓和。黎锦熙的同事、西北大学教授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他在有一次回家探亲时去了延安，见到了毛泽东。当毛泽东知道黎已到汉中城固任教时，便托马先生代向老师问好，还说了许多想念的话。不久，又给黎寄去一本《论持久战》，以表达他对当年凭窗夜话的师友的惦念之情。

北京和平解放后，党中央从西柏坡迁进北京城刚刚住下不久，毛泽东从中共北平市委有关同志那时得悉：黎锦熙和北师大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著名画家齐白石等都在北京，就立即驱车到和平门北师大宿舍看望。黎锦熙事先得通知后，从家中赶到院门口迎候。上午十时许，毛泽东一行到达北师大宿舍区，他一下车直奔黎锦熙而去，一声“黎老师”出口，他的眼眶湿润了，黎锦熙的双眼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自1919年北京一别，整整三十年，两位挚友未曾见过面，这怎不叫人激动万分呢！在场的人们，都被这动人的场面感动感热泪盈眶。宿舍大院的孩子们一见毛主席来了一个个欢呼跳跃，在大人的带领下，不停地喊“毛主席万岁！”这天中午，毛泽东掏钱让工作人员叫来了两桌酒席，款待老师和几位知名教授，席间他紧挨黎先生就坐，亲切话旧，非常兴奋，直到日落才依依而去。此后，毛泽东几次接黎锦熙到中南海叙谈，有时也把另一位湘潭人氏齐白石也一同请去。有一次荷花盛开，毛泽东还饶有兴味地和他一起泛舟共赏。十月，黎锦熙受党中央、毛泽东之邀参加了开国大典，亲历了这举世瞩目空前隆重的盛事。

建国以后，毛泽东日理万机，抽不开身去看望黎锦熙，就派秘书周小舟前往代为看望，常常捎去自己的一些喜爱之物送给老师。周与黎也属湖南老乡，又兼与黎有师生之谊（周在解放前投考北师大，因迟到一步未能赶上考试，后打听到任师大文学院长的黎是湖南人，便去找他帮忙，后经黎同意，周得以顺利入学。），所以乐为代劳，长此以往，形成习惯，此后，周“外放”湖南当省委书记，仍不忘黎先生，每次回京，必去看望他。

1951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会议，作为“九三学社”负责人的黎锦熙，也参加了这次大会。会期半月左右，黎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有一天晚上，看郝寿臣演出武打戏，黎锦熙和叶圣陶、老舍等人被安排在毛泽东后一排就坐，演出间隙，毛泽东不时回过头来向老师和其他几位著名民主人士点头致意。看到毛泽东红光满面，神采奕奕，黎锦熙感到无比高兴。

毛泽东素来敬重黎锦熙的人品和学识。解放初期，他曾想请黎在政府部门担任一些实质性职务，黎以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谢绝了。后来，他了解到黎锦熙潜心于教育和著述，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不久，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和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七人共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49年10月10日，文字改革协会成立大会在协和礼堂举行，黎锦熙被选为理事，后又被选为常务理事。12月4日，协会召开第一次常务理事会，通过了“组织大纲”，推举吴玉章、黎锦熙、胡乔木为协会正副主席，

兼方案研究委员会正副主任，黎

又兼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据传，这些都是经过毛泽东点头同意的。

此后，黎锦熙便尽其所长，为汉字改革殚精竭虑，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如 1958 年公布“汉语拼音方案”时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这一报告里所说：“黎锦熙、钱玄同等人制订‘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

1953 年的一天，毛泽东派人给黎锦熙送来了不少礼物，并附有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信中说：“黎锦熙委员：各兄弟民族先后敬献毛主席、周总理礼物一批，奉命分送给您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并请检收，此致敬礼！”来人还转告了毛泽东的问候，望他多多进补，保重身体。这些关怀，黎锦熙不胜感激。

对黎锦熙的学术研究，毛泽东给予了支持和肯定。早在 1950 年黎出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时，曾向毛泽东写过一封信，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机构归属、人员编制以及辞书编辑事业应合理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很快回信加以肯定。他在信中说：邵西先生：

五月十七日惠书敬悉。所提大辞典处各点均可同意。并和胡乔木同志说了，他也同意。请用电话和胡同志接洽为荷。

顺祝

健康

毛泽东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二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干扰使黎锦熙也受到冲击，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旋即指示保护他，还通过毛泽东的表兄、黎锦熙的友好王季范等疏通红卫兵，不要去抄黎的家，更不许去批斗他。

1972 年，毛泽东、周恩来得知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时，特地过问他的住房问题，使他迁到朝阳门内北小街一个四合独院，他从此有了一个幽静、舒适的治学环境，在这里孜孜不倦地一直工作到逝世。对此，黎锦熙曾于 1973 年元旦，以高兴和调侃的心情作《四合房即事》诗并序。序曰：“西城老屋和后迁的‘单元房’，六七十年来书刊稿档，除先后捐赠公家三大批外，还堆积许多，组织上指定此房，集中整理，备作有关科学和业务的参考资料，迁毕过年，即事偶成。”诗云：

南斋门设且常关，北门锁钥谁堪属？

北房中作办公厅，两头耳房供住宿；

西房一室客厅虚，东南五间书库实；

五车昨已汗牛来，万卷今犹充栋积。

对于毛泽东和党中央给他的关怀，黎锦熙感到无以为报，只能更加倍地工作，更多地奉献教学和科研成果，以实际行动支持学生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事业。与此同时，他在思想感情上更贴近人民，更贴近时代，为革命和建设的每一次成功感到欢欣鼓舞。

1962 年，国内遭受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经济面临巨大困难，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反攻大陆”的叫嚣却甚嚣尘上。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黎锦熙和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填了一首词：

解放台湾，雾净波澄，风举叶飘。笑星沉海底，当窗历历，河源雨过，隔座滔滔。远掠层空，近探圆月，银汉翱翔孰比高！从天降，又百花齐放，万种妖饶。地球映日呈娇，瞰海岸回环尽舞腰。叹向戍弭兵，徒劳辱舌，屈原爱国，空赋离骚。民主阵营，和平堡垒，谁在张弓学射雕，拭目看，被东风压倒，曾不崇朝。

在词中，他浮想联翩，超脱九天之上，气势不凡。他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其思想纵横数千年中国历史，遨游数万万里太空。他满含着诗人的情感，乘着宇宙飞船“远掠层空，近探圆月”，到银河中去翱翔，又绕地球一周鸟瞰大地，“万种娇饶”，“当窗历历”，将科学的眼光和浪漫主义的遐思结合在一起，水乳交融，天衣无缝。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放眼全球，看到“民主阵营，和平堡垒”，东风正在压倒西风；对那些魑魅魍魉，他大声喝斥“谁在张弓学射雕？”，接着又展望了祖国统一的远景，字里行间散发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立即写了一首七言绝句：

只惜吴刚不炼钢，明月千古冷天堂。

昨夜寰宇歌声动，争取红星斗列强。

从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领导下创造的人间奇迹，是多么激动和喜悦；对列强，是多么的藐视！

对毛泽东，黎锦熙更是发自内心的敬重和热爱，他不仅认真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毛泽东思想，还大力宣传毛泽东，对青年人进行传统教育。1952年，他撰写《毛主席六札纪事》，回忆毛泽东在一师刻苦学习、为革命储备力量的情景。1958年，出版《‘实践论’语法图解》。以推动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1967年，他不顾七十八岁高龄，热情接待关于询问毛泽东青年时代革命活动的各地来访者，并著《有关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回忆》一文；1968年，完成《矛盾论语法图解分析》一书，从分析《矛盾论》的章句入手，要求读者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全文的内容，与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实践论语法图解》形成姊妹篇；1974年，校补《毛主席六札纪事》一文；1977年，在《人民日报》发表回忆文《峥嵘岁月中的伟大革命实践——回忆建党前夕毛主席的部分革命活动》。

1976年，对于黎锦熙来说是沉痛的一年。先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他在悲痛中赋了“周总理哀辞”一首：

冬别红梅树，春催白李花；

罡风扇北陆，佳气集中华。

止赖黄图辅，何期赤旆斜！

哀声动寰宇，星殒万人家。

接着，与他有着六十多年交谊的毛泽东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这对他打击更大，他犹如五雷击顶，浑身无力，四肢麻木，数日不思茶饭。不久，他病倒了，身体更加衰弱了。

一年多以后，黎锦熙在书房不小心摔倒，竟致不起。时为1978年3月27日，享年八十九岁。

第十七章 孔昭绶：

——开明的一师校长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两

者都能使人永垂不朽。

——〔美〕爱默生

89 校门口的徘徊

时光飞逝，一转眼便成了民国五年（1916年）的秋天。毛泽东已经在第一师范度过了两年多的学生生活了。这是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晚饭后，同学们三五成群，谈笑风生，沿着铁路两旁散步去了。毛泽东没有随大家去，他迎着落日的余辉和柔软的秋风，登上了学校后面的妙高峰。

妙高峰：好响亮的名字！其实，它并不怎么妙，也不怎么高，只比学校的两层楼洋房略高一点。半山腰上，有一个六角亭子，顶上盖着琉璃瓦，一块牌匾上写着“君子亭”。为什么叫“君子亭”呢？是不是哪位历史名人登妙高峰时在此憩息过，后人为纪念他修建了这座亭子呢？毛泽东遐想着。现在，他就站在这君子亭里，放眼望去，只见第一师范的校园黄舍壮观，花木繁茂，似这样富丽堂皇、中西合璧的学校，在长沙城里还真是不可多得的。再向远眺，铁路线上，车来车往，滔滔湘江，百舸争流；岳麓山上枫叶初红，一团团，一簇簇，如火焰、似彩霞……看到这样美好的自然景色，毛泽东才悟出“妙高峰”这三个字的道理来。这时，他突然觉得一师是那么地可爱！他一个韶峰脚下山民的儿子，能在这“湖南亚高学府”就读，多么地不易！

“可是，来到一师已经几年了，以往为什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毛泽东默默地问着自己。

人的情绪就这么捉摸不定，说变就变。就在半年前，即1915年的11月上旬，毛泽东还给已到北京谋职的黎锦熙老师写信说：“弟在学校，……然性不好束缚，终见此非读书之地，意志不自由，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有用之身，宝贵之时日，逐渐摧落，以衰以逝，心中实大悲伤。昔者朱子谓：‘不能使船者嫌溪曲。’弟诚不能为古人所为，宜为其所讥；然亦有‘幽谷乔木’之训。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在这之后不久，他一天晚上到校长门口去了三次，准备请求退学。……

是的，毛泽东不喜欢第一师范，尽管这里的自然环境和教学条件比四师好得多。可是，在这个学校“意志不自由”而且“程度太低，俦侣太恶。”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这所学校有很多规则，我同意的很少。”总的说来，毛泽东要求退学的深层原因，是他不满意封建教育制度下派生出来的那种读死书、死读书的旧式学校。因之，他感到一师绝非他要寻找的学习“乐土”。

可是，那时毛泽东还不明白，他的愿望大大超前了现实，这是难以实现的。

当时，中国的学校教育几乎全部照搬日本的模式，最大的缺陷是课程多，学生负担过重。一师是一所中等师范学校，课程设置比普通中小学要多得多，加之学校当局重视职业训练，又增设了农工商各科，用毛泽东比喻的“杂货摊”来形容，倒有几分相像。正因为这样，许多课目与毛泽东的学习兴趣发生了冲突。毛泽东读书颇有些“感情用事”，也就是说通常凭兴趣、爱好去读书。他有一套理论：兴趣所致，读书越读越有味道，越读越轻松，像休息一样，人就不会感到苦和累了；没有兴趣，咬着牙看书，如同嚼蜡，就是再有毅力，也还是看不下去。按他制定的自学计划，学习的兴趣重点放在文学、哲学和史他等学科上，对其他的课则不愿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更不屑去争高分、满分。所以，“他的英语很差，算术也不好；图画课上他只

画圆圈。在这些科目上，他总在班上的后面。”

学校靠分数来衡量学生的各科成绩，毛泽东又过不了“考试关”，这就免不了要招来一些任课老师的偏见和物议。

另外，一师的教育方式和他格格不入。其时，正是军阀汤芑铭推行封建复古教育期间，一师的民主教育受到制约和影响，校长张干把袁世凯的“训令”挂在礼堂的正面墙上，只要一有集会，言必讲“训令”，同时制定了苛繁的“校章”，规定了数十个“不准”，使学校的教学空气沉闷而又压抑，有的学生干脆在背地里叫张干为“章校长”。一师的作息时间非常刻板，从早到晚活动安排得极为严格，进课堂、入阅览室、到饭厅以及寝室等，都必须随着号角的鸣叫准时进行，号角就像军营中的军号。当号角声一响，一千多名学生在十多名教职员的指挥下，像一千多只鸭子似的迅速集合起来。毛泽东强烈反对这种做法，认为这种强制纪律是没有必要的，因此常常不按号角行动。

“……当其他同学都到大阅览室和自修室时，他俩常出去，到妙高峰那块草地上去。……记得有一情景十分难忘。像往常一样，吃罢晚饭，我们登上妙高峰，找块舒适的草地坐下来，我们沉浸在交谈中，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听到号角声。‘他们一定是到自修室去了。’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后来，号角声又响了，‘现在他们一定是回寝室去了。’半小时以后，传来了最后的一次号角：‘现在他们马上就要熄灯了！’而我们仍坐在那里继续谈着。顷刻，整个学校被笼罩在夜幕中，我俩清楚，我们是仅有的两个尚未就寝的学生。后来我们知道，我们的擅自离开已被察觉。但当时我们都得意忘形地沉浸在交谈中，根本没有考虑熄灯后仍在校外的后果。……”对于毛泽东“不按号角行动”的违纪行为，他的好朋友萧子升日后曾如是述说过。至于萧子升所讲的他们“根本没有考虑的后果”是什么呢？轻者，往往是招惹训导员的一顿大声训斥；重者则是捅到校长张干那儿，校长很恼火，甚至曾确实考虑过要开除毛泽东的学籍。“但最后校长表示让步，因为我们是好学生（那时候，人们认为作文是最重要的功课，只要文章好，就是好学生。所以毛泽东算好学生），行为纪律也不错，我们的违令也就不了了之”。

尽管校方对毛泽东很宽容，但他对一师种种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教育方式，仍感深恶痛绝。在稍后不久发表的一篇论及教育方针的文章中，他写道：“吾国学制，课程密如牛毛，虽成年之人，顽强之身，犹莫能举，况未成年者乎？况弱者乎？观其意，教育者若特设此繁重之课，以困学生，蹂躏其身，而戕贼其生，有不受者则罚之，智力过人者，则令加读某种某种之书，甘言以话之，厚赏以诱之。嗟乎，此所谓贼夫人之子欤！”

以毛泽东无畏的个性，这种不满情绪，必将要爆发出来。因之，就有了一师 1915 年的那场轰动长沙的学潮，也就有了张干对他的记过处分！尽管此后不久，张干离开了一师，可一年当中连换三个校长，办学方略却一个不如一个，最后这位彭政枢校长，任职时间仅月余，终因学生反对而辞职。对此，心性颇高的毛泽东，怎不发出“如此等学校者，直下下之幽谷也”的感叹，而下决心“必欲弃去，就良图，立远志”呢？！

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但是，中途退学又往何处去呢？求知欲望十分强烈的毛泽东考虑，求学总得要个地方，依然像在定王台图书馆那样去自由读书，家里定然是不同意的，一旦中断提供费用，自己靠什么生活？再说，一师还算得上一所办得认真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同学，大多数来自贫寒之家，家里很富有又有政治背景的学生是不愿进师范的。因此，这里没有纨绔子弟带来的恶习，逐渐形成了一种勤劳俭朴，认真踏实和刻苦读书的好学风。毛泽东感到这样的环境对自己求知还是有益的。此外，杨昌济和黎锦熙二位先生得知他有退学的想法后，也出面进行劝阻或写信做说服工作。基于这些因素，到底是去是留，毛泽东举棋不定，一时难作决断。

就这样，他送走了 1916 年的春季，又挨过了一个不算短的暑假，眼看着新的学期就要开学了，他仍在犹豫徘徊……

90 “老校长”回一师

正在这个时候，比毛泽东高两届的同学萧子升告诉他：学校新来了一个校长——不，一师的老校长回来了。萧子升说，这位校长叫孔昭绶，在四师与一师合并前曾在这里当过校长，由于反对袁世凯窃国，流亡日本。现学成归来，受新任省长谭延委派，重来一师主政。萧子升还介绍，孔昭绶是位难得的好校长，他博学多才，办学有方，很爱护学生，把原来的一师甚得人心。最后萧劝毛泽东留下来，不要走。

萧子升带来的这一消息，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振，他暂时打消了退学的念头，到教务处办理了报名手续。

九月初，孔昭绶正式就任第一师范校长。为此，学校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暨新学期开学典礼。当孔昭绶在学监主任方维夏等人陪同下登上主席台时，台下一千多名师生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这位反帝英雄和老校长的归来！

在会上，孔昭绶饱含热泪，做了激动人心的演讲。他从1914年1月为躲避北洋军阀汤芑铭的追捕，被迫离开一师远走日本，讲到在异地他乡对故土的眷恋和一个没有国籍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又讲到立志兴办教育振国兴邦的夙愿，继而提出自己这次重返一师的“施政纲领”——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在一师推行民主教育，提倡自治、自动，改善教学环境，宽松学术氛围，培养合格人材，以新的姿态树立于长沙学界……

孔昭绶的讲话，鼓舞了全校师生，台下爆发出一阵阵掌声。它像一袭和煦的清风，驱走了往日弥漫在一师的沉闷空气，也扫除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进步师生心头的阴霾。

从这一刻起，毛泽东的眼前呈现一个崭新的学校，他感到心胸豁然开朗，仿佛头顶上的天是新的，太阳是新的，就连学校那几幢已盖了几年的灰砖青瓦“洋楼”，也似乎是新的！

也许是从这一刻，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从新的第一师范找到了自己理想和志愿的契合点，找到了“拄天大木”茁壮成长的沃土。从此，他将把这里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向伟人的星座冲刺。

91 民主教育的先驱

老校长孔昭绶重回一师，在师生中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轰动效应”，说人心所向也罢，说众望所归也行，都绝非溢美之辞。这不仅有他反帝倒袁的声名在，还有他在一师的办学成果在。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载：“孔昭绶，字竞存，湖南浏阳人，湖南高等师范毕业，曾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他历任长沙多所中学、师范学校教员，于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一八年，两度担任第一师范校长。”

第一次在一师主政的孔昭绶，是学校教育和校园建设蓝图的设计者。一师校舍在1910年被愤怒的长沙暴动饥民焚毁后，后又因湖南响应武昌起义而停课。经请银五万两大规模复建后，新校园于1912年夏天落成，同年秋天学校复课，由“衡清试馆”迁回新舍。孔昭绶就是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于1913的春接任一师校长的。

复建后的一师，校舍规模颇为宏伟，但仅是一座空楼，各种教学设施和图书资料，都在大火中荡然无存，许多教员也因停课停薪离去，

一切都须从零开始。

孔昭绶走马上任后，开始了全面的革新的再创活动。他对部定学制年限、课程设置，做了适当变通，设立预科班，招收预科学生一百二十人，并组建了附属小学。请款建筑新寝室一栋，上下二十四间，创设电灯，结束了学习照明用油灯的历史。筑后山校院围墙，防止兵匪滋扰教学，保障师生安全。他提出用严格的规章制度管理学校，全面规定了学校的章程，如对学生操行、学业、体格考查的一套完整制度，就是在他主持下草创，并由后任校长张干补充完善的。他还创设“技能会”，指导学生开展课外学术、体育活动。他的这些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一师开创民主教育的前景，也为他后来进一步发展一师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就在孔昭绶潜心为振兴一师努力的时候，灾难已悄悄向他逼近。其时，袁世凯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用武力在全国实行镇压，为其称帝复辟扫清道路，其走狗汤芑铭秉承主子旨意，率北洋军一部进攻湖南，逼谭延退守广东。汤部入湘后，便开始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镇压反袁势力。一时之间因所谓“党案”牵连遭枪杀者，有案可查的就达五千余人。孔昭绶因忠实贯彻执行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法令，竭力反对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和封建复古教育，被汤芑铭所忌恨，必欲去之而后快。1914年1月的一天，汤芑铭派一营兵力包围了第一师范，逮捕孔昭绶。幸得到汤部中同情者的密报，孔化装成卖河水的人，从侧门混了出去，旋东渡日本避难，后进东京政法大学学习。

1916年夏，袁世凯在全国上下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汤芑铭离湘，谭延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湖南省长兼督军。这时，孔昭绶也在东京政法大学毕业，取得法学学士学位。他得知国内政治动态后，即从日本归国。鉴于他的声望和办学经验，谭延委派他再度出任一师校长……

这次重返一师，孔昭绶果然不负众望。他汲取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坚持崇尚民主的办学方向，采用顺应新文化运动潮流的办学方法，使一师教育有了迅猛的发展。

他坚持“有治人然后有治法，然无治法未必有治人”的观点，上任伊始即调整教职员队伍，制定学校规程。他重新聘用那些不满“汤屠”统治而富有正义感的教职员，如方维复、王季范、王范、王昌麟任学监，黎景湘任庶务，吴观明任会计，杨昌济任修身教员，徐特立任教育学教员等，还聘请了美国人饶伯斯、德国人费尔廉分别担任英文、音乐教员。新聘用的四十五名教员，基本都是高等师范毕业并从事过师范教育的专门人才，其中有六人是“留洋”获得学位后回国的。孔昭绶的这项举措，意义非同一般。学校的职能是教育培养学生，学校办得如何同校长、老师关系尤重。在那寒凝大地、万马齐暗的时代，在狐鼠横行、豺狼当道的社会，老师对于像毛泽东这样有志匡救国家的青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翻开毛泽东的成长史，一师的这些道德高尚、学术渊博、思想开明的老师，对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

在整顿教师队伍以后，孔昭绶即着手全面制定学校教育方针，修改各项章程，调整教学内容及方法。为了突出新文化运动的主题，他确定“采最新民本主义规定教育方针”，“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前任校长张干提出以“诚”字为中心的“公诚勤俭”的校训，他针对日本侵略中国、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现实，改以“知耻”二字为校训中心，贯彻公诚勤俭诸义；张干校长提出“注重人格教育与生活教

育之要旨”，他改为“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实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这三种教育，与蔡元培提出的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道德教育是一致的，只是字面上有所不同而已。接着，他总结前几任校长的办学经验，又吸收东西方一些文明国家的教育方式和管理办法，制定了《校务会议与教务会议制度》，明确各类人员职责；制定了《训练与管理条例》，加强对学生的培养；制定了《教授要旨与教育要项》，提高教学质量，等等。

办学的方针大计确立之后，他并未就此停步。1917年底，他应邀出席了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联席会议。此间，他对学校教育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当教育部设立学制调查会，负责革新事宜时，他即草拟呈交了一份万言《意见书》。此后，他根据自己在《意见书》中创设的改革基调，率先在一师开始了一系列的改革尝试。

改革旧学制。他反对那种把师范本科四年宜延长为五年或六年的意见。认为“惟贵实事求是，使修业一日即有一日之进步，应学与时俱进，不至浪掷时光，否则虽延长一、二年无益也”。为此，他纵横比较了美、英、法、德、日、奥、俄、瑞典、芬兰、挪威、丹麦、比利时等十二个国家的学制，提出“我国学制系取其年限之最长者，更何必更议延长而故为鳃脰之续乎”。

在科目问题上，他认为，“师范学科多至二十余类，或偏于知识，或偏于技能，一人之精力有限，而欲求其兼收并蓄，细大不捐，亦戛戛乎难能之事矣。故不如用分科制，因材施教，使各依类进取，或干预科后即以文、理分科，或以普通与职业分科，或于二、三年级依农、工、商之性质而分科，或减少授课时间，依个人之志愿与特长，专听其自习而分科研究。如是，则分道扬镳，并行不悖，较之各方涉猎反一无所成者，不啻有天渊之隔。”他的这些观点与毛泽东等学生的心愿不谋而合，从而深受大家欢迎。

创新教学体制。他认为，“吾国学校通病多以校长屡更，教职员亦因而屡进屡退，遂多视学校为传舍，不独无一久远的计划，抑且无一系统之学科，前后参差，支离破碎，不可究诘责任，不专义务心亦日以薄弱，苟且敷衍一切进行，日于冥冥之中，此教育之所以无起色也。今欲去其弊，则首宜统一教授，欲统一教授，首宜行主任、科任制。”所谓主任制，是指一个年级设一位级主任，“以国文教员充之。”所谓科任制，是指除国文外的各门课程，“宜以一人兼教数班或十数班，若一科分聘数人，则其教授之不能统一，其弊必更支离破碎而不合学理上之原则矣”。他主张教员定工作量，反对设员过多而钟点过少，每班平均授课三十六小时，每人平均授课二十四小时，“如是教员之责任既专，斯学生之信仰倍切，而关于管理、训练、教授等项可以事半功倍矣”。此外，他还提出师范学校宜另编适应之教科书和注重国民教育的需要等应注意的问题。

吁请迁移校址。1916年底，他考虑一师附近开办了几个工厂，造成了空气污染，加之教室采光面小，光线差，曾向省署写了《呈请变更校地文》。他在这个报告中提出：一师校舍“不适卫生，自宜迁地为良，不可不急谋一相当之地”，“不可不求达最后之目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准。直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一师仍在老地方。不过，其存在价值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个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单位，而不是一个教学单位——作为教学单位的现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已深受空气污染、噪音等现代都市“常见病”的困扰，因而也就更显示出孔昭绶当年的远见卓识。

扩充办学规模。根据当时小学师资严重缺乏的状况，他提出“补救之策

除另添设师校外，不如即就原有校数添广班次”。并结合一师学区范围内的小学教育实际，制定了一个扩大办学规模的“五年计划”，计划在原有的基础上，从1918年的12班、600人到1922年发展成17个班、800人。

注重农工实习。他强调指出，“国家之盛衰视人才，人才之消长视教育，教育之良窳视师范。师范者，教育之教育，固陶铸国民之模范，造就青年中国之渊泉也。”“师范为储备小学教员而设，则日后之所需要者自宜为储蓄，以备异时教授之用，否则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宜有师范生不中用之叹也。今欲力矫此弊，故宜注重实习。”他结合一师的实际，提出农工商实习与教育实习并重的主张。然后，根据这一指导思想，筹资兴建了学工、学农基地“实习园”。

改善计分标准。他认为“学生注意科学，必有学业成绩之表现，而欲促进学业成绩，必其考查方法最为适当”。他对部定百分法的不利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一个计分“折衷法”，即采用百分法与比例法，凡各科计分初用百分法，后再用比例法。如国文考试得62分，其授课时间每周十课时，以10乘62得620分，习字考试得50分，其授课时间每周二课时，以2乘50得100分，二数相加为720分，再以二科授课时数之和除之得60分，即为两科之平均分数。这就突出了主科，扩大了主科成绩在各科总成绩中的比例。这项改革为毛泽东这样的学生开了“绿灯”，带来了许多便利，他们不再为考试而考试，拉下了一些兴趣不大的学科，腾出大量时间和精力专攻自己爱好的社科学问。

孔昭绶的上述政治主张、教育思想与治校方法，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却无疑是积极而进步的，其中的许多东西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至今仍被一师沿用。

由于时局与身体的原因，1918年暑假，孔昭绶辞去了校长职务，后不久在长沙病故。但是，后人忘不了他在一师的建树。一师“校史”中高度评价他说：“孔顺应新文化运动的潮流，运用在国外考察教育的成果，进一步发展了一师的民主教育，并使之章程化、制度化。因此孔昭绶对一师建设有着卓著的贡献，是继谭延以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

评价是在这位资产阶级教育家百年之后，由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作出的，真可谓盖棺定论，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二个校长”一语，更是一言九鼎，力重千钧。

是的，不该忘记这位开明的一师校长的功绩！当我们今天惊叹：一所普通的中等师范学校何以能走出毛泽东、蔡和森、蔡畅、向警予、李维汉……这一大批著名革命活动家时，我们应该同时牢记这样一句话：

一所好学校，便是一座人才库；

一位好老师，便是一部人才学。

孔昭绶到一师后，为开创民主教育所作的种种努力，恰似一阵阵春风，吹走了一师的沉沉暮气，给她带来了一片勃勃生机。

是的，一师变了。

——学校的入口处，书写着“德、智、军、美”四个大红字，包容了学校的办学和教育宗旨，把一所新潮的学校昭然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校园的主楼上，高高竖起了新制的校旗。校旗采用红麾、黄镖、在蓝绿色的旗面中央置一白色五角星，五角星内镌一黑字“师”字，以“代表一师的徽识”，并“唤起学生爱校心。”

——清晨，随着嘹亮的号声，一千多名学生身着制服，在操场列成整齐的方阵，做起游戏体操。制服分暑服，白色：寒服，黑色，领章上缀“第一师范”四个字。制帽是黑色，暑期在顶上加一白罩，帽章是在银色五角星内镌一“师”字。学生统一着装，统一步调，显示了资产阶级上升、进步时期的办学决心。

——学校新谱了校歌，歌词“词取简短”，便于歌咏，旨在“唤起学生主讲学兴味，并涵养高尚之思想”。每逢周一，学校举行一次校旗升旗仪式，校园便响彻悠扬悦耳的校歌，它激发着学生刻苦学习、奋发向上的自信心：

衡山西，岳麓东，
城南讲学峙其中。
人可铸，金可熔，
丽泽绍高风。
多材自昔夸熊封。
男儿努力。
蔚为万夫雄。

这些只是外观上的变化，真正深层的变化是民主教育的兴起——在孔昭绶的领导下，以培养学生自治自动能力为目的的组织和活动层出不穷：改组学友会，开办工人夜学，创设学生志愿军，组织运动会，成立劳动会，加强职业训练，实行修业旅行，等等。

这些组织和活动，充分反映了孔昭绶为资产阶级培养合格人材的办学愿望，顺应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潮流。从此，以毛泽东、蔡和森为突出代表的一大批有为青年，把一师作为匡世救民的演练场，锤炼坚强的意志，砥砺高尚的品行，树立远大的理想，培养卓越的才能，他们从早期参与这些有益的组织和活动起步，发展到后来投身爱国和革命运动，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终于成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领袖人物或领导骨干。

特别是毛泽东，这一阶段对于他意义非凡。在孔昭绶到一师的两年校长任期内，是他生活之路的转折点，更是他整个辉煌人生的开端！在此之前，他虽然也胸怀大志，刻苦学习，但理想和教育制度的现实却格格不入，他深感不满却又无力扭转，这种矛盾时常折磨着他的身心。入师范后的第一次反抗行动——驱逐校长张干受到挫折，使他精神抑郁，落落寡欢，曾想以退学来逃避这种环境。自老校长孔昭绶来到一师之后，带采了民主教育的新风气，创造了宽松活跃的治学环境，使具有很强的独立反叛意识的毛泽东，从禁锢的旧式教育中解脱出来，呼吸到民主教育的自由空气，把握着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脉搏，从心灵到精神面貌上感到焕然一新。他完全改变了对一师的看法，

庆幸自己当初没有贸然行事离开一师这样一所好的学校。这以后，他开始重塑自我，不再为读书而读书，而是为匡救国家而自觉地经受各方面的锻炼。他充分利用第一师范这块不可多得的学习园地，还有那些辛勤的园丁，刻苦钻研，探索为学之道，专心打好学问的底子；他密切联系社会实际，探求人生的价值与救国的根本道路；他刻苦顽强地进行各种形式的体格锻炼，磨炼坚韧不拔的斗争意志。

更为重要的是，他在这里参与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为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的能力进行着充分的预演。

他主持了学友会的工作，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显露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领导才干。

他以学友会教育研究部部长的身份主办了工人夜学，通过“夜学”的教学活动，他这个农家子弟与城市工人第一次有了较为广泛的接触和了解，并同他们中间的骨干分子建立了深厚的个人友谊，从而取得了与工人阶级联络感情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最有意义的收获之一，并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积极参加学生志愿军，组织同学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智取北撤的北洋军一个混成旅的部分溃兵，徒手缴了他们的枪。这次军事行动，是毛泽东军事组织指挥才能的演练，他在指挥中显示出的那种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组织能力，在一师的师生中引起了巨大轰动，为大家推崇，为大家津津乐道，他因此被人喻为普鲁士著名将领——“毛奇”。

毛泽东在一师期间参与并组织的社会活动，当首推成立了一个坚强而又具有革命精神的团体——新民学会，这是他学生时代的一个创举，也是他实现远大抱负的第一步。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在一师这段时间的经历，为他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1836年，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说道：“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生活中，发生的事很多，我的政治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获得了社会活动的最初经验。”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当年的老同学时又讲：“我没有正式进过大学，也没有到国外留过学，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是在一师打下了基础，一师是个好学校。”

毛泽东非常怀念在一师的这段岁月，1925年秋，他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非常生动而概括地描述了这令人难忘的丰富多彩、充满激情的生活。他写道：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解放后，毛泽东还特地为一师题写了“第一师范”的校名，并写了“要

《红星照耀中国》第107页。

周世创：《第一师范时代的毛泽东》，载《新观察》第2卷第2期。

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 的题词。藉以与母校的老师共勉。

93 学生志愿军与连部上士

1916 年秋，孔昭绶就任一师校长后不久，在一师校史上发生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学生志愿军成立了！

这件事不啻在校园扔下了一颗炸弹，整个第一师范沸腾起来了！

历来讲经论道、学文习字的学校，为什么创办军队，练起兵操来了呢？这事还得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孔昭绶校长的办学宗旨说起。

民国初年，南北军阀混战，湖南当军事要冲。北洋军阀企图盘踞湖南为制服两广的基础，南方军阀则以湖南为北进阵地。这样，北来南去，南来北去，各系军阀都出入湖南。自 1912 年起，南北军阀谭延闿、汤芑铭、刘人熙、傅良佐、谭浩明等更替督湘，湖南惨遭兵祸。第一师范地处铁路线边沿，是交通要冲，校舍又宽敞，遂成为驻兵之所。1913 年孔昭绶第一次出任一师校长时，汤芑铭就曾派旅长李佑文率部在此驻扎。因此，学校被弄得乌烟瘴气，师生安全常受到散兵游勇的骚扰，附近居民也感到极不安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急需一支武装力量来维护教学秩序和生员安全。这便是一师创办学生志愿军的最初发端。

但是，真正促使学生志愿军很快成立的深层动因，是校长孔昭绶推行“军国民教育”的结果。

曾留学日本的孔昭绶，对日本学校教育中推行的那种“军国主义”教育十分推崇，痛感于中国国力羸弱，他认为军事可以强大国防，还可鼓舞民心士气，振国兴邦。因而，他十分赞同国民政府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出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把这四个字写在礼堂入口处的横匾上。正是出于在一师实行“军育”的教育方针，创办学生志愿军这一计划开始在孔昭绶的头脑中酝酿产生。

约在 1916 年 10 月间，孔昭绶亲自给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写了一份《呈试办学生课外志愿军文》。“呈文”开首，就其指导思想写道：“窃昭绶忝再任为第一师范学校校长，自应勉竭绵薄，诉之良心，积极改进，整理计划。首应时势需要确定教育方针，全以人格教育、军国民教育、实用教育为现救国强种唯一之教旨。除人格教育、实用教育业于各科教授加意提倡，并另组有训话会、学友会、课外劳动会、课外运动会等实施其教旨外，至军国民教育尤非仅案主义，虚悬理想，即足以策进行而收实效。”

接着，孔昭绶在“呈文”中陈述了试办学生志愿军的四条理由：

“一遵照教育部令，宜实施军国民教育也。查民国元年中央政府颁布《教育宗旨》，曾以军国民教育风示天下，嗣教育部有《注重尚武精神》之训令。”

“诚以国家者，国民之所积也。欲国民全体对外有独立之位置，须国民分子对内有独立之精神。”“大部明定宗旨，表示决心，凡各学校均负有执行之责任，宜有以发扬而光大，以无负国家储才救国之至意。此志愿军依照部令而有倡办之必要也。”

“一应世界潮流，宜采用军国民主义也。近世各国注全力于军国民主义。如何而可养成爱国尚武之精神，如何而可作育实质刚健之国民，其规划设备不遗余力。自欧洲大战争开幕以来，各国教育方针受战争之影响愈带军事之色泽，教育思想为之一大变动”。在列举德、英、美、日注重军事教育后，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75 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75～76 页。

他指出：“夫教育无上之价值，首贵顺世界之潮流，而妙施其方法于国内，使之蔚成学风。我国国民身体孱弱，数千年来，社会习惯厌薄军人，歌咏流传历以从军为苦，致东方病夫腾讥万国，大陆欢眠日趋危险。欲为习惯之改良，即宜为教育之革命，而教育革命必先自军国民主义始。此又志愿军应时势之要求而有倡办之必要也。”

“一感受国家刺激，宜提倡尚武精神也。我国历年外交失败，由无战斗实力以折冲后盾”。“世界惟有铁血可以购公理，惟有武装可以企和平。转瞬欧洲战局告终，列强视线将益集中于我国，来日大难及今闲暇，固宜首筹对付之策。则就学校提倡尚武精神，诚为今日之要义，而不容稍缓者。此又志愿军对于外界刺激而有倡办之必要也”。

“一注重师范教育，铸成青年中国，为异日实行征兵之准备也。世界军事编制有二大端，一征兵制，二募兵制。招募之弊人所共斥，已成为历史上之僵物，无复存在。居今日而欲与列强势均力敌计，非实行征兵无由储蓄量最大之战斗力。惟欲实行征兵，须先就全国之民锻炼其当兵之资格，使为小学教师再散其军国民教育于全国青年，则人尽知兵。异日实行征兵。人人知有当兵之义务，自人人具有当兵之志愿，各愿出头颅颈血以上卫国家。自无征兵不足，不肯纳血以壮国防之虞。”“此又志愿军对于国民教育与军制改良而有倡办之必要也”。“呈文”最后指出：“惟枪械不备，凭虚讲演，终鲜实用。”故请按二连人数拨给枪械。呈文上报省府后，谭延当即照准。他还亲自确定“以激发爱国思想，提倡尚武精神，研究军事学术，实施军国民教育为宗旨”，以“对于各种命令指挥均须绝对服从为天职”，以中华民国国庆日为志愿军成立纪念日。一师学生志愿军遂于十月底正式宣告成立。孔昭绶的这一创举，在一师师生中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有的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有的窃窃私语，颇有微辞；有的置身事外，作壁上观。据萧子升回忆，他和毛泽东之间便对此存在意见分歧。在一次讨论中，萧认为学校推行的“德智军美”的教育宗旨虽然很有道理，但平常得很。只有一点美育，比较创新。他还根据这一主体思想，写了一篇论文，叫做《以美学代宗教》。毛泽东不同意萧子升的看法，觉得“军官”是最值得尊崇的，坚诗认为“军育更为重要，如果国家软弱，谈论美学有什么用途？首要的事情是打败侵略我们的敌人！这和美学又有什么关系呢？”萧辨解说：“德性的完美早已在古代诗歌、古典作品和音乐中都被强调过，那就是同样的意见。”“如果民族软弱，完美的德性又有什么用？”毛泽东反问道：“重要的事情是强盛起来。有力量，才能战胜敌人，战胜敌人才能显示德性。”他们争论了很长时间，但最后谁也未能说服谁。萧子升不愿加入学生志愿军，而毛泽东则成了最先报名参加志愿军的人。随后，许多同学都踊跃报名参加学生志愿军”

最后，学校从众多的报名者中挑选体格健壮、品学优良的学生加入志愿军，编制成一个营，营下辖二连，一连三排，一排三班，每班十四人，计二百六十九人。校长孔昭绶亲任志愿军总指挥，总指挥部下设纠察员，由学监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75页~76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75~76页。

《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76页。

参见萧子升《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担任，商承校长和纠察志愿军一切应行事务。营长、副营长由兵式操教员担任，营以下的连、排、班长由学生充当。毛泽东平时在同学们当中就较有威信，加上他又有过半年的兵旅履历，便被孔昭绶任命为一连连部上士文书，负责连部一应内务。第二年，又因在袭击溃兵的战斗中指挥有功，提升为连长。

从此直至毕业，毛泽东经历了近两年的学生志愿军生活。这段生活，不仅在他的头脑中注入了尚武精神，还使他经受了严明军纪（包括统一着装、军事操练、武器保管和请假、奖惩制度等等）的考验，系统地接受了战术、兵器、地形等军事学训练，培养了钻研军事技术、指挥艺术，特别是战争谋略的兴趣，从而为他提高自身军事素质，为日后图谋亘古大业蓄积了力量。纵看毛泽东的一生，这些在他日后的军事斗争生涯中具有难以估量的作用——当年一师学生志愿军中的“连部上士”，十多年后能成为威震四方的“红色山大王”，三十年后又能成为率领数百万雄师直捣黄龙的统帅，绝不会与这段经历风马牛不相及……

94 “毛奇”率兵击溃军

1917年11月间，第一师范的师生和全长沙城的居民一样，日夜惶恐不安，都担心着一场即将降临的兵灾战祸。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北洋军政府段祺瑞派往湖南镇压护法运动的北洋军阀傅良佐，被桂系军队谭浩明所部打败。傅良佐带着他的残兵败卒逃出长沙，朝湖北方向溃退，而谭浩明部暂时还驻守在衡山、湘乡一线，不能及时赶到长沙。于是，长沙暂时成了一座空城，仅靠数目很少的警察维护秩序。这时，忽然传来这样的消息：驰援傅良佐的北洋军某混成旅之一部，闻知傅良佐已败走湖北，也无心恋战，便由株洲、湘潭方向沿粤汉铁路撤往长沙，已经到了距第一师范不远的猴，子石一带。

这个消息，霎时传遍第一师范。全校近两千名师生员工完全陷入了紧张慌乱的状态之中。在全体师生大会上，学监主任方维夏向大家报告说：南郊有作战危险，全校师生必须立即作好准备，集体到城东五里的阿弥岭暂时躲避，等号令马上出发。

听了方主任的敌情报告以后，毛泽东没有马上离开会场，他坐在礼堂的方桌前，手托腮帮眉头紧锁地沉思起来：近年来，军阀混战，连绵不断，湖湘百姓惨遭兵祸，一师师生也饱经战乱之苦。事实表明，消极躲避总不是个办法。俗话说，逃得了和尚逃不了庙，且不说两千人的师生队伍撤退困难，就是人撤离了，一师校园势必是溃兵袭击的第一个目标。如果这样，学校数年来辛辛苦苦建起来的校舍，还有初具规模的教学设备，图书资料，岂不要毁于一旦？想到这里，毛泽东觉得说什么这次再也不能让学校遭受兵灾，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随即，他在详细分析了一番敌我双方的情况之后，一个依靠学生志愿军开展护校护城的方案，便初步形成了。

于是，毛泽东来到校长办公室，向孔昭绶谈了自己的想法。孔昭绶不放心地问：“润之，以二百多名学生军去抵挡四千余众溃兵，这能行吗？”毛泽东分析道：“如果师生撤离学校，学校空虚，溃兵必定进校打劫；相反，如果积极组织起来保卫学校，倒比离校避难要安全一些。再说这些溃兵为什么仅在城外徘徊而不入城呢？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城里情况而不敢贸然行动。如果趁他们又慌又累，立足未稳而主动出击，是可以将他们赶走的！”听完毛泽东的意见，孔昭绶没有马上表态，只是提醒毛泽东：“润之，此事关系到一师一千多名师生的安危，责任重大啊！”毛泽东从校长那严肃的话语中掂量到自己身上担子的重量，他答道：“知道了，校长！”

尔后，毛泽东亲自到猴子石附近，探听溃兵的真实情况。他经过侦察得知，这些溃兵已完全陷入饥饿、疲劳，又不知道长沙城内的兵力情况，害怕再遭打击，犹如惊弓之鸟，已经丧失战斗力。如果组织力量来击退这些溃兵，是完全可能的。他经过周密考虑，立即返回学校，向孔校长提出应急方案：组织学生志愿军，设伏截击溃兵，收缴他们的枪械。

孔昭绶经过与方维夏和其他老师紧急磋商之后，终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授权毛泽东全权指挥学生志愿军。毛泽东受命后立即决定，从两个连队中抽调一百人左右，作好出发准备；同时，动员全校师生把桌椅板凳都搬出来，堵住学校所有的门，形成多道屏障，准备迎战。接着，他又带着学校的公函到南区警察分局，和他们取得联络。这样，全校师生、抽调的学生志愿军和一些警察，都统一归毛泽东指挥，他成了“三军”统帅。

时将黄昏，毛泽东率领学生志愿军拿着木枪、爆仗和煤油桶，分成三队，

绕道潜伏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上，对溃兵形成居高临下的包围之势；同时，他让警察带着十几支真枪，扼守在学校后面的妙高峰上。这时，溃兵心惊胆颤地向北移动，企图进城。待到距伏击区不远时，毛泽东便令警察在山头上鸣枪，学生志愿军一边鸣放装在煤油桶里的爆仗，一面齐声高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不杀！”霎时间，枪“炮”齐鸣，喊声震天，犹如千军万马横扫过来。北军本是惊弓之鸟，经此突然袭击，队伍顷刻瓦解，士兵东躲西藏，溃不成兵，约有三千余人当场缴械投降。当晚败兵露宿在第一师范前坪，第二天由商会发款遣送回北方去了。

就这样，长沙城免除了一场兵祸。毛泽东果断勇敢、智取溃兵的事，受到全校师生的交口称赞，都夸他“通身都是胆”。孔昭绶还将他誉之为“毛奇”，以嘉许毛泽东超人的胆略和非凡的组织指挥才能，并提升他为一连连长。

对于这次军事行动，毛泽东自己也感到很满意，他觉得不仅受到了实战的锻炼和考验，还初尝了统率士卒、纵横驰骋、挥洒自如的惬意，使他对战争的艺术有了初步的兴趣。很久以后，毛泽东还在闲谈中提到，说他搞军事，那才真是第一次呢！

有了这次经验后，1918年南北军阀再战时，张敬尧部队侵入长沙，毛泽东便从容地领导同学组织了“警备队”，担任队长，护卫学校。在城中秩序混乱，南军溃兵行劫时，曾经准备联合其他学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维持治安秩序。后来因张敬尧已经率部进城，才没有组织起来。这年四月，湘东战事仍然很紧张，长沙城内风声鹤唳，居民连觉都不敢睡。毛泽东则带领警备队日夜巡逻，严密地保卫着学校，从而使学校仍能照常上课。为了纪念这件事，学校特摄影留念，并在这张照片上题词“戊午上期，本校教职员学生弦歌不辍，几不知有兵祸云”。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作为毛泽东当年带领学生志愿军护校的见证，至今仍陈列在“湖南第一师范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

关于毛泽东组织学生志愿军警备队，设立妇孺救济会，布岗巡逻，保卫学校和市民的事迹，《一师校志》上也有记载：

“湘省战争频年，每遇南北军退匪猖獗之时，本校由本军内组织警备队，并设妇孺救济会，保卫一切，间或巡逻城内外，以维公安，盖颇著成效云。”

“1917年11月，湘南战事紧急，风鹤频惊。学生组织警备队分夜梭巡，警卫非常。”

“1918年3月，令学生镇静，毋惊风鹤，致妨学业。令学生恢复警备队，警卫非常。旋城中秩序大乱，拟联合他校，组织学生保安队巡逻街市，适北军至，乃止。膳杂费暂由校长（孔昭绶）借垫。教职员每月仅送车费洋十元。”

“四月，湘东战役，居民一夕数惊，学生捍卫学校异常得力，因摄影以留念。……”

“知识和勇气能成就伟大的事业”，曾经“留洋”的孔昭绶熟悉这句外国名人的著名论断。或许，他从第一师范求学时那个普普通通的学生毛泽东身上，窥视到了寓于普通之中的不普通、平凡之中的非凡；从毛泽东学生生活中所表现出的超常智慧和胆识中，憧憬到了该“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的美好未来，于是，他亲手将毛泽东当年率领学生志愿军智取溃军、组织“警备队”护校等详情一一记入《一师校志》中，连同毛泽东亲笔书写的1917年至1918年间《学友会纪事录》一本、《夜学日志》两本，一起珍藏起来。从而

为后人研究一师校史和毛泽东在一师的学习生活和参与社会活动情况，提供了难得的历史资料，同时也为他当初与毛泽东之间良好的师生关系找到了有力的佐证。1951年，人们在已经故去很久的孔昭绶家中，发现了这些历史珍宝，遂将它献给了国家……

第十八章 方维夏

——风仪师友的学监主任

友不贵多，得一人可胜百人；友

不论久，得一日可喻千古……

——莎士比亚

95 一师的“实权派人物”

在毛泽东众多的老师中，有一位可与徐特立，杨昌济齐名的“宿儒”，他同青年毛泽东之间，可谓是一对“特殊师生”，两人交往甚密，情谊笃深，相互影响，互为导师，教学相长，风仪师友，堪称学界典范！他后来成为我党早期领导骨干，曾为建立革命武装和开创红色根据地作出过重大贡献。他的名字已被载入《中国近现代名人录》，成为名垂青史的著名人物。

他，便是德高望重的曾为湖南第一师范学监主任的方维夏。

方维夏，号竹雅，生于1879年，年长毛泽东十四岁，湖南平江人氏。他于1906年9月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简易科毕业，随后考入湖南优级师范学堂，1909年毕业于优级师范，又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学成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在母校第一师范任博物、农业科教员；1916年，孔昭绶第二次担任一师校长时，被聘为学监、学监主任，直至1920年高校出任湖南省教育司司长。

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史》记载：方维夏在第一师范担任了五年之外的学监主任，其地位和作用仅次于校长孔昭绶，是公认的“实权派人物”。这一点从当时一师制定的《学监工作细则》便可略见一斑。《细则》明确地规定了学监主任的职务权限：一是与校长商定的事项，如“重要规则之制定、改废及设备编制之规划；学生操行、学业、身体、成绩之核定，甲等乙等赏罚之处理；学生重要请愿之处理，学生一周以上请假之准驳；学生用品发给之限量及教本之更易；学年历及教授细目之编制；暂行规则、命令之发布；教育实习事项之支配；教员请代之商榷”。等等。二是学监的本职权限，如“教夕点名，查察上课、实习及整洁各事项；监察考试及朝会、课间操；报告教员缺席或补课等，并撰拟询告教员函件，判定学生操行成绩；各种成绩分数之核算；执行各室及各场所之规则；丙等丁等赏罚之处理；学生请给暂假之准驳；学生次要事项请愿之处理；检查体格；督促学生课外运动、劳动、实习及学友会等之活动；办理招考、毕业、旅行、运动及各种集会议式事项；处理临时发生之事项”等十四项。方维夏切实履行校方赋予的上述这些职责，以民主科学精神教育管理学生，开展各项校务活动，为一师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

方维夏为人公正，品德高尚，在第一师范及至湖南教育界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一师任教期间即被选为省现补议员，后被选为省议员。他痛恨反动军阀的独裁统治，拥护孙中山的主张，1915年袁世凯企图复辟封建帝制，他参加徐特立、黎锦熙等教师的斗争行列，打击湖南教育界“筹安会”帝制派中的叶德辉、廖名缙等一伙人，而赞成“西南派”的谭延。他在议会的激进言行，常常遭到守旧议员的反对和讥讽，但他始终坚持正义，刚直不阿。

方维夏的正直无私，还体现在对学生的爱护上，1915年上学期，第一师范的学生为反对湖南教育当局要增收师范生的学杂费，发生了罢课和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在这次事件中，毛泽东曾起草了一份反对张干的《宣言》。事后，校方决定开除十七名为首的“闹事”学生，毛泽东也在被开除之列。当时，已是学监的方维夏，并不为维护校方的尊严而牺牲学生的利益和前程，而是站在进步学生一边，联络一师资深教师徐待立、杨昌济、袁仲谦、王季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41页。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43页。

范诸先生，据理力争，才使毛泽东等学生免于开除出校。

校长孔昭绶极为钦佩方维夏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监主任，他当时身体羸弱多病，便授命方维夏全权主持学校教务工作。据一师校志载，在他俩共事的几年间，不仅政治主张，办学思想趋于一致，而且个人感情与工作配合也十分融洽和默契。1920年，方维夏离开一师到省教育司任职时，孔昭绶依依不舍，极力挽留。现今的一师校史陈列室，还保存着当年他们挽留和告别的唱和诗。孔昭绶的诗，名为《留别方君》，诗云：

好风吹我到瀛洲，一舸如君又壮游。

寄语神山旧仙侣，故人无恙水天秋。

卷云亭峙妙高峰，独立苍茫听晚钟。

何时一樽共明月，与君重破白云封。方维夏回赠《竹雅见和》。

频思浪迹到瀛洲，系舸南风且卧游。

从此三山寻旧侣，技螯共醉菊花秋。

茂时携杖祝融峰，同叩秋风晚寺钟。

料得芷兰生意满，名山定有五云封。对于方维夏这么一位有名望的先生，极力探求真才实学的青年学于毛泽东，自然是推崇备至的，这便成为他在五年的师范学习生活中虚心求教于方维夏，并建立深厚师生友谊的感情基石。

96 “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维夏最初认识毛泽东，是在1914年的春季。

还是两年前的1912年夏，方维夏从日本学成回国。是年秋天，即被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曾沛霖聘请为该校教员，教授农业、博物学科。后来，毛泽东随第四师范的师生一起并入一师，方维夏刚好是他所在的本科一部八班的任课教师。

开始，方维夏与毛泽东的交往并不太深。他只知道，这个坐在倒数第二排、个头比一般人高大的学生，名叫毛泽东，来自湘潭农村，是本校学监王季范的表弟。毛泽东给他最初的印象是性格比较沉静，上课一般不肯轻易发表自己的见解，但对农业、博物课学得很认真，特别是对农业实习课兴趣很浓，对农作物的种植、中耕、灌溉、施肥等，样样都很在行。后来，他和挚友杨昌济、黎锦熙等在“李氏芋园”组织了长沙宏文编译社，毛泽东偕蔡和森、陈昌等常去该社，或参加哲学学习研究，请教读书方法，或谈论时事政治，互观日记心得，交往日益加深。尤其是担任毛泽东修身、国文课的杨昌济、袁仲谦，常向他提起毛泽东刻苦求知的事情，夸奖自己的得意门生是“异材”、“伟器”，这更引起了他对毛泽东的格外关注。教学和求知这根纽带，终于把这对“特殊师生”的人生历程紧紧地连结在一起。

方维夏在日本留学三年，深受资产阶级民主教育思想的熏陶。在教学中，他反对旧式学堂普遍存在的书本与实际脱节、课堂与社会隔绝的弊端，主张学以致用。当时，在一些教员当中“重文轻理”的观念很浓，大都不愿意担任博物、农业、物理等“副课”的任课教师，而争着教授国文经学等主课。方维夏则不然，他认为古今中外的教育家都强调“致知”在“格物”，“格物”在“致用”，“湘为农业省，宜重农业，而博物、手工为农业工作之导师”，故为必修之课。

为了教好这些课程，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

力。

他亲手拟定了博物科和农业科的《教授要旨》与《教授要项》，以体现“民本主义”的教育方针。他在《博物科要旨与要项》中写道：“博物要旨在习得天然物之知识，领会其中互相关系及对于人生之关系，并解悟高等小学校理科教授法。宜授以重要植、动、矿物及标本之采集制作法，人身生理卫生之大要，并教授法与教授时必须之实验。……总的要求：博物课，室内教授与野外教授并重，注重本国及乡土之产物；重实验，多备标本、模型并研究标本简单制造法，或令学生自行采制；添置学生用之解剖器，注意应用并须与农学相联络；使知动、植、矿三界相互之关系并说明其利害，唤起哲学上的意味，以增加其研究心；……”在《农业科要旨与要项》中，方维夏进一步指出：“农业要旨在习得农业之知识技能，以养成农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其要项：注重应用，须理论与实习并行，养成勤勉耐劳之习惯而引其趣味；地方作物及农产制造物，乡土之气候、土壤、肥料等，应详加讲授；关于博物学、理化学，宜随时证明之，俾知应用而资联络；注意本国最近农业经济之状况；实习时，须会填写日志，养成观察精细、服务守秩序之习惯。”

为使学生对博物一科发生趣味，他采取实地教学的方法，经常带领学生去岳麓山和妙高峰采集各种植物标本，现场讲授。在他的积极建议和筹划下，一师开辟了“学校园”，以此激发学生对农业科的学习积极性。“学校园”由实习农场与学级园两部分组成。他亲自组织数百名学生将校门口的旧操场开辟为毕业班实习农场，场内中央为花坛，四周为果树畦，花坛与果树畦之间的地段为作物畦，种植各种粮食作物

与时令瓜菜。同时辟校园内各坪及后山空地为肄业班学级园。学级园计有花卉区三个，内分海棠区、芙蓉区、木犀区、葡萄区、石榴区、菊区、杂卉区；果树区三个，内分梅区、桃区、李区、梨区、苹果区、樱桃区、枇杷区、柑桔区、柿树区，其中桃、李、杏、梨、樱桃是方维夏托人从日本移植来的品种；蔬菜区三个，种植各种时令瓜菜。谷菽区二个，种植豆、麦、甘薯、马铃薯之类；桑树区一个，实习接桑；标本区一个，种植蓼蓝、甘蔗、苕麻、三桠、茶等；还有一个由学校花工管理的公共苗圃。农场与学级园的各项收益，除酌提若干奖给工作人员外，其余均为“学校园”基金，用作资助教学活动。

实习园地建立起来以后，方维夏根据当时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势需要，全力抓好学生的农工商实习。农、工实习，自三年级起，按学生志愿，每周课外分别实习三小时。农场实习，包括粮食作物和时令蔬菜的种植，按各班各组划定区域，任耕种、栽培、除草、除虫、灌溉、施肥、管理、收获之责；工场实习，设有木工工场、金工工场、普通工场和印刷场，实习或分组或不分组，视工作品类繁简为准。商业实习，则由学校指派部分学生轮流进行，实习期六个月，旨在练习事务，注重职业，实践商业。通过上述实习活动，要求学生达到既学会各种生产技能，又熟悉各行各业管理方法的目的，从根本上除掉旧时代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毛病。

方维夏是一个很有政治抱负的人，他不满当时南北军阀割据的混乱政

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28~29页。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32页。

局，希望自己的学生能掌握到一身过硬的本领，以便将来能担当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他深知：温室里长不出栋梁材，鸡窝里养不出千里马，光靠课堂或“校园”是学不到真东西、培养不出真人才的，必须让学生走出学校的“小课堂”，投身社会的“大课堂”，“汗漫九垓，遍游四字，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方能获得真知识、增长真才干。他尤其对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优秀学生寄予厚望，常常教导他们：读书要面向社会，不但要啃死书本，还要读活的书本；不但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和读书结合游历。他曾反复几次向毛泽东等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时有个学者徐霞客，步行中国南部近十个省份，走了几年，历尽千辛万苦。到四川时，他的同伴因病逝世，他把同伴的棺柩送回家之后，又继续旅行。后来，他根据自己游历的所见所闻，写下了一本叫《徐霞客游记》的书，这本书成为研究中国地理的不朽之作。方维夏要自己的学生向古人学习，拿出徐霞客那样的毅力去求知。

方维夏的上述教育思想和教学方略，对志向远大的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共鸣。他将平时听老师讲课的心得，用蝇头小楷工工整整地记入听课笔记本《讲堂录》：“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则汗漫九垓，遍游四字尚已。”“游之为益大矣哉！登祝融之峰，一览众山小；泛黄渤之海，启瞬江潮失。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穡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1915年9月6日，他在给同学萧子升的信中写道：改革家王安石托古改制，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傲睨汉唐”，可谓是一个精深的学者。但他的变法为什么最终不能逃脱失败的命运？皆因他“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这个时期的毛泽东，通过方维夏的教育和引导，以及对于历史与现实的观察之后，已开始认识到“学校与社会相隔相疑，犹鸿沟之分东西”，决心走向社会这所永久的大学校，了解社会，“读”懂社会这部大书。

97 试行“游学”

在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陈列室，有一幅《毛泽东一九一七年暑假“游学”路线图》，格外引人注目。透过这幅图，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毛泽东当年效法古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求取真知的那种独树一帜的治学风格，仿佛看到青年学生毛泽东千里跋涉五县城乡，实地考察社会现状的飒爽英姿！

但是，掩藏在这历史画卷后面的许多情况，却是鲜为人知的。如果拂去历史的尘埃，人们便会发现：毛泽东注重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这一优良学风的培养与形成，无疑是得益于他的老师们。作为毛泽东农业、博物教员的方维夏，所起的作用更是不容忽视。

的确，在当时那种旧的教育体制下，要想真正推广旅行游学并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必须先突破旧学制的桎梏。为实现自己的教育构想，方维夏在第一师范首创了“修学旅行”的教学模式，以“校章”的形式对学生提出节假日作旅行调查的各种规定，从制度上保证“修学旅行”的推行。据湖南第一师范校志记载，由方维夏亲自制定的《校章纪》第十一节“修学旅行”对学生进行假期旅行调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如第三百九十二条写道：“本

校学生每学期修学旅行一次，或全体或分级分班，临时定之”。为了防止这一活动流于形式，校章中还具体提出了检查、考核及奖惩办法，比如统一印制：“教育及乡土情况调查表”，让学生如实依照旅行所见情形认真填写，然后呈交学校考查，通过评审决出优劣。故此，校章中有“本校遵照部令制定调查乡土各表分给学生，限于假期内实地调查照式填注，以期精确而裨实用。……奖励方法，限入校时将各表册汇交事务室各职员，考查成绩评定等第，并择优揭示，或送杂志或汇编报告书。……”。等条款。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方维夏就竭尽全力组织学生去尝试。大约就在这期间，报纸上报道了这样一件事：两名青年学生徒步旅行全国，一直到达四川康定打箭炉，从而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方维夏及时利用这一契机，在同学们当中进行广泛宣传，鼓励大家向那两个青年学习，从小课堂走向大课堂。他还特地把刊登有这则消息的《民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受鼓舞。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的那样：“这件事给我很大鼓舞。我很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我想我应当先试着在湖南旅行一番。”

毛泽东深受方维夏老师的影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假日进行修学旅行，这在当时的一师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对此，许多文章作了非常生动而又详尽的记述。

新民学会会员，我党早期领导人罗章龙在《回忆新民学会》一文中，对毛泽东热衷于修学旅行的事情有过一段专门的描写。他写道：

……对于旅行游学，他（毛泽东）也有一种特别的爱好，读书之外，很少坐着不动，总是到外面走一走。我没有看见他坐过车子，总是步行。……

一次，他与毛泽东同志一起步行去韶山，走出长沙三、四十里的地方，很累了，就在路边休息。见一位老农在茅屋边打草鞋，毛泽东同志就与他谈家常，并当他的助手，帮助他锤草、搓绳、编织，织好后又帮他把草鞋锤平。我见他对打草鞋的工序很熟悉，便问：你会打草鞋？他说：我会，走路很费鞋子，大家都应会打草鞋。在长沙，我陪他到过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块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他对此很感兴趣。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禹王是个劳动人民，毛泽东同志对他怀有好感。

对于湖南历史上先进人物的遗迹，我们常去访问。楚国屈原住过的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将军辛弃疾在长沙练兵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衡阳等地，我们都同去过。

此外，长沙郊区的妙高峰，相传太平天国肖朝贵攻打长沙时曾到过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古迹胜地，毛泽东同志也去看过。他曾对我说：我们这样走是有意义的。我们要向前代英雄人物学习，使自己的思想丰富意志坚强起来。我体会到，这不是旧知识分子的游山玩水，而是为了锻炼身体，向古代、前辈的英雄学习，吸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进行修学旅行，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在一师读

参见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文史资料。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诺的谈话》，第 27 页。

《峥嵘岁月》：回忆新民学会，第 8~9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书期间，类似的经历还有过多次。

1917年12月，他到浏阳文家市铁路冲同学陈绍林家、浏阳西乡土桥炭坡大屋同学陈章甫家走访，和农民一道挑水种菜，了解情况。1918年夏初，他与蔡和森一道到滨湖地区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他们经浏阳、湘阴、岳阳，绕洞庭湖南半圈而返，将沿途的见闻用生动通俗、幽默风趣的文字，写成一篇篇通讯寄给《湖南通俗教育报》发表。

毛泽东花费时间最长，旅行地域最广的一次“游学”活动，是在方维夏的具体安排和支持下进行的——

1917年夏，学校放了暑假，同学们都纷纷离校。毛泽东没有回家，他打算去做一次长途修学旅行。当他把自己的想告诉给方维夏先生时，当即得到了老师的首肯。行前，方先生还特地向毛泽东交待了旅行须注意的事项，并和他一起确定了旅行的线路，然后亲笔给沿途各县的劝学所、教育会写了介绍信，以备在旅行中遇到困难时应急之用。

七月中旬，毛泽东邀友人萧子升和同学萧蔚然一道，踏上了“游学”旅途。他们分文未带，只带有一把雨伞和一个装有换洗衣服、洗漱用品及笔墨盒的布包，从长沙楚怡小学到小西门渡湘江，换上草鞋，经白药铺，一直步行到达宁乡县县城。他们在一个同班同学家住了两宵，走访了当地的劝学所、玉潭高小及香山寺，还到宋家潭找老农了解生产、生活情况。当他们又累又饿时，便写了一首诗送到当地一位老翰林的府上。诗曰：“翻山渡水访名郡，竹杖草履谒学尊。途见白云如晶海，沾衣晨露浸饿身。”婉转表达了自己的窘境和对老学者的尊敬。老翰林让家员把他们请进府内喝茶、吃饭，还一起讨论了经书，走时又送给他们四十枚铜元。洩山，是佛教史上的名山，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寺庙，寺里香火旺盛。游洩山时，他们给寺庙赠送了一副对联，博得方丈的赞赏。在伪山寺，他们听方丈讲解佛经，并认真了解佛教徒的生活，还和方丈讨论了老子、庄子及佛家经典。

在宁乡，他们还特别访问了何叔衡的家乡。从宁乡县城经横山湾，步行一百多里到达杓子冲何家，受到热情的款待。在何家住了几天，参观了何家的猪圈、牛栏、菜园、稻田和山林，了解了何家的经济收支及家庭历史。经何叔衡介绍，毛泽东到一位贫苦农民家里进行了走访。主人以忧郁的心情告诉他：佃田要交倒“三七”的租，佃农不分白天黑夜、天晴天涩地下力气种地，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听了主人的诉说，毛泽东的心情也像主人一样沉重。

告别何家后，他们经沙田到巷子口，在那里碰到一个姓王的老人，进行了一次极有意义的交谈。

老人说：“你们看上去决非乞丐，天这么热，为什么要以乞讨为生呢？”

“我们的家境不太好”，毛泽东答道，“但我们想旅行，没得路费，只得游学。”

老人说：“游学并不坏，游学的人往往是正直、诚实的人。只有那些当官的人最坏，多数为官之人都不正直、不廉洁。我在衙门做守卫，亲眼所见县太爷满脑子想的都是钱！他每审一个案子，给他钱多的一方照例打赢官司。这叫做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

“县太爷不怕被人告发吗？输官司的一方不能到省城告他一状吗？”

“怕什么？他不会在乎的！”老人说，“在省城里打官司比在县里花销更大，如果连行贿县官的钱都不够，哪有足够的钱去行贿省府里的大官呢？”

在省城官司更没有打赢的希望了。官官相护，谁人不知，哪个不晓？！”

“这是什么世道哟！”毛泽东愤愤不平。

告别老翁后，毛泽东的心情更为沉重。一路上，与萧子升议论着社会不公的事。

他们三人离开宁乡，到达安化县的司徒铺，这时萧蔚然回家去了，毛泽东和萧子升两人继续经清塘铺、太平段、直奔县城梅城。

夜深人静，不名分文，因到县城路途太远，他们就宿在一条大河的沙滩上。毛泽东风趣地说：“河滩是床，蓝天是帐，星星作伴，月亮作灯！”还指着岸边的一棵老树说：“这是我们的衣架。”说着，将雨伞、布包挂在书枝上。

躺下不久，萧子升爬起来要到河底洗脚，毛泽东笑着说：“你还要保持那绅士习惯啦！你是一个要饭的绅士呢。今晚试试不洗脚，能否睡得好。”

第二天早晨，他们在途中一家小吃店吃饭时，听老板娘诉说了她家所遭受的苦难，颇为同情。得知附近有一刘邦庙时，两人便对刘邦的评价问题展开了讨论，边走边谈，不知不觉来到了梅城。在梅城。毛泽东查阅了安化县志，到东华山观看了农民起义烈士墓，并就地调查了清代黄国旭领导的农民起义，走访了一户贫困农民。还到安化县劝业所拜访了安化饱学先生、劝学所所长夏默庵。夏先生早年毕业于晚清两湖学院，学识渊博，专擅经电之学，著有《中华六族同胞考》、《默庵诗存》、《安化诗抄》等，喜吟诗作对，心性高傲，一向拒游学先生于门外。毛泽东两次求见，均遭拒绝，但他并不灰心，第三次再度登门，夏先生只得开门相见。稍事寒暄以后，夏默庵挥毫写了“绿杨枝上鸟声声，春到也，春去也”一句对子置于几上，以试探来人学问的深浅。毛泽东稍作沉吟，便以端庄秀丽的兰亭体在白宣纸上续了联：“清水池中蛙句句，为公乎，为私乎”。夏默庵见后，觉得对边胜过出边，还蕴含火辣辣的批评意味，自感弗如，不由衷心发出赞叹。随后，他留毛泽东和萧子升在家吃饭和住宿，并作了昼夜长谈。临行前，还赠送了八块银洋做盘缠。

在梅城，两人在街上买了纸，并将沿街的重要店铺名字诸如“鼎升泰”，“廉益吉”等抄了下来，然后把它写在纸上，送到各店赚回了一些钱，以济食宿。有了零花钱，他们游览了孔圣庙、培英堂、东华阁、北宝塔等名胜古迹，观赏了祭孔用的“铜壶滴漏”。

几天以后，他们离开梅城，前往益阳县城。一路上，两人就连日来的所见所闻发表着各自的感慨，而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的家庭制度和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毛泽东指摘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太重，人们因此而缺乏民族感情，在现阶段国家民族的利益应摆在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之上。萧子升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一个人面对有利于他的国家而有害于整个社会的行为时，他应该彻底将国家抛在一边。检验行为的最后标准是社会的最终之善。毛泽东则强调，一个好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因此人民有义务保卫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子民。最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和好的政府，人民就可甘心情愿为之服务。

到达益阳城后，他们从张贴在县城的一张介绍新任县长情况的告示中得知，县长张凤夙原是第一师范学校教员，便决定前往政府去拜望这位师尊。他们身着旧短衫，脚穿草鞋来到县政府衙门，年轻的门房一见他们这身装束大喊“滚开！”，怎么也不让他们进去。无奈，他们就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

大有一副不见一面不肯罢休的架势。后来，一位年长的门房进去通报，那年轻的门房对他吆喝：“你到县长那里讨个命令，把这两个叫花子捆起来，送到大牢里去蹲几天，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下次他们就不敢来捣乱了！”两人感到扫兴，只好离去。在去沅江的路上，毛泽东对萧子升说，这个年轻的门房固然可恶，但他的主子张县长可能更坏。门房不过是依令行事罢了，因为他说县长已明确吩咐不要穷人进县衙去。看来当过先生的张县长也是那种势利小人，人生的目标就是权势和金钱，他的脑瓜里不可能有高尚一点的思想。至于门房，我见过的许多人比他好得多，不过因人而异罢了。

当到达沅江县城时，那里正值洪水泛滥，于是两人决定返回长沙。在湘江渡船上，两人就这次游学作了一个总结，毛泽东说：“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只要彻底认识到我们的目标。”

这次游学，历时一个多月，途经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城乡，步行一千多里，是毛泽东早期学习生活中一次极具意义的活动。它使毛泽东深入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现实情况，在他的革命道路上产生过积极而深刻的作用。

当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带着仆仆风尘和泥土的芬芳，回到了学校。方维夏看着学生那被骄阳晒得黝黑的脸庞，翻阅着他带回的那几大本详细记载着五县农村风土人情、人文地理和社会情况的日记，不禁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98 学友会的代理会长和总务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期间，在刻苦学习、努力锻炼身体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在社会活动的实践中增长才干、增长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的能力。几年当中，他参与和组织的社会活动，除组织新民学会外，最主要的是主持学友会和创办工人夜学，而这后两项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活动，又无一不是仰仗一师的实权派人物——学监主任方维夏的全力支持。

先说说方维夏支持毛泽东主持学友会的事吧——

1913年秋，一师创设技能会，以培养学生生活技能为宗旨。后经几度易名，于1916年9月正式定名为“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友会”，确定以“砥砺道德，研究教育，增进学识，养成职业，锻炼身体，联络感情”为宗旨。学友会下设教育研究、文学、竞技等十五个部。成员包括在校学生和已毕业的校友，设会长一人，由校长兼任，总务一人，主持日常会务，由学监主任兼任，每部设部长、文牒、庶务、会计一人。

1917年下学期，学友会进行了新的改组，校长孔昭绶因校务工作繁重和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会长之职，指定方维夏代理会长。这样，原来由方兼任的总务一职即成空缺。

一师校友会会长不过由校主要领导挂名而已，实际担负全部领导责任的则是总务，学友会的工作能否抓出成效，与总务的关系很大。因此，校长孔昭绶在确定总务人选的问题上颇费踌躇。

就在这时，学监主任、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推荐学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总务。

方维夏的建议，在校董事会引起了不同反响。有部分校董认为，学友会是全面培养锻炼学生的一个园地和开展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校方历来十分重视，总务和各部部长均由学监主任及教员充任，尚无学生任职的先例，一旦由学生担此重任，担心工作难以开展。方维夏自1915年就任一师学监主任以来，一直兼任学友会总务，对毛泽东的才能十分了解。他向同事们介绍了毛泽东的情况：自1915下学期以来的四个学期，毛泽东担任学友会文牒，掌管报告、文件、造具表册及开会速记等事项。在此期间，他协助会长和总务做了大量的工作，显露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出色的组织才干。方维夏据此认为，把主持学友会的重任交给毛泽东，是可以放心的。

方维夏在一师范颇孚众望，一向受到校长孔昭绶的倚重。孔校长见他力举毛泽东，也就表示同意了。就这样，从1917年下学期起，毛泽东正式就任学友会总务，同时兼任教育研究部部长。

毛泽东担任总务以后，即着手对学友会的机构进行调整，这届学友会共设十五个部，即教育研究、演讲、文学、书法、图画、手工、音乐、武术、剑术、架梁、足球、庭球、野战、竞技、游泳，他还建议增设营业部，以筹集经费。他认为学生应改变轻视商业的传统，以适应经济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设立营业部可以让大家学习经营。他还拟定了细则。由于方维夏担心学生经商不被校董事会许可，故未采纳此项建议。但是，方维夏却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另一条重大举措——让三四年级学生担任学友会各部部长。他觉得毛泽东的理由相当充分：三四年级的学生快要临近毕业了，理应养成组织实际工作的能力和自觉性，如果在学友会得到教员这些“赞助会员”的指导，学生是能够胜任其职的。在他在全力支持下，学友会开创了总务及各部部长由学生充任，学生实际主持全面工作的先例，注入了新的活力。

自毛泽东担任总务的这一学期开始，由于有方维夏这位兼任代理会长的学监主任大力支持，在人财物上大开绿灯，学友会的工作特别活跃起来，办的事情特别多。

据《一师校志》载，1917年10月13日至14日，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新的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学友会工作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本届学友会工作的六项决议：第一，征集资金；第二，各部活动的日期、次数，学生参加各部的办法，教员的聘定；第三，编制预算；第四，成绩单之保存及设立学生成绩展览处；第五，建立记事录制度；第六，增设图书馆。会后，方维夏随即签发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关于整顿学友会组织、增设“学友会记事录”、修改会章三个报告。

遵照方维夏提出的“务实、致用”的办会指导思想，毛泽东在全体会员中主要倡导两件事：一是学术研究，一是体育活动。这一点与方维夏的思想观念相吻合，他认为要结束国家动荡不安的局面，必须要有一大批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强体魄的人材，方能任重致远。他希望通过学友会的各项活动，能培养同学们朝这个方向前进。他鼓励毛泽东，大胆去闯，在“第二课堂”闯出一条育人的新路来。

为了在学友会大力倡导各种学术研究活动，方维夏督促教育研究部部长毛泽东及其他各部制定切实可行的学术研讨计划，拟定各部聘请的义务指导老师，尽快报他批准。后经他同意，一师一批名师，如杨昌济、傅熊湘、钱伯斯（美国人）、宁协万、费尔廉（德国人）、王翰、王渤涛、王志祥、雷明亮等，分别担任了各部的指导老师。由于有名师辅导，同学们纷纷慕名而来，学友会各项活动空前活跃。据《一师校志》记载：仅1917年10月15日至11月16日这三十天之内，各部活动达六十四次之多，颇盛一时。

方维夏很重视毛泽东关于“增设图书馆”的建议，他从学校有限的办学经费中挤出专款，拨给学友会购置大量图书。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学友会购回一批新杂志，如《新青年》、《东方红》、《太平洋》、《科学》、《旅欧杂志》、《教育周报》、《教育研究》等，吸引了一大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学友会图书馆因此办得井井有条，很有起色。

方维夏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教育家，对文娱体育活动颇具兴趣，因而也是毛泽东在学友会倡导体育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六段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运动体操，方维夏对这项运动项目很欣赏。他认为这项运动集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于一身，很有实用价值，即让毛泽东把六段运动传授给同学们，并以他个人的体会向同学们宣讲体育运动的目的是、意义和规律，以此带动大家持之以恒地加强锻炼，提高身体素质。

针对一师没有室内操场，雨天和晚上不能从事体育锻炼的状况，毛泽东向方维夏积极建议提倡简便易行的乒乓球运动，取得一致看法后，即由方维夏批条落实款项，毛泽东负责请工匠做乒乓桌和木架十二个，竹布网二十片，分给各班。于是，“乒乓之声一时聒耳，或谓之乒乓狂”

当时长沙各学校的球类运动，以足球最为盛行。离一师不远的长郡中学，有八个身强力壮、球术精湛的球员，被人称为“八大球王”。在校际比赛中，他们常独执“牛耳”。一师学生中间也有几个和“八大球王”差不多的足球

健将，但学校没有把他们很好组织起来，并加以认真训练，所以和长郡中学的足球队比起来，还差得远。毛泽东和方维夏商量，决定从两方面提高学校足球的技术水平：一方面，把一些足球健将编成全校的足球代表队，学校在学习上提供一定保障，以利其加强训练；另一方面，发动全校各班组建足球队，各县同学组织县足球队，更进一步普及足球活动，培养新生力量。方维夏觉得毛泽东的意见很可取，即以学校的名义在各个班级进行布置，很快便在全校成立了二十多个足球队。由于学校运动场地狭小，不能一下满足这么多足球队活动的需要，报经方维夏同意，毛泽东便有计划地安排一些足球队到离校四五里以外的协操坪和教育会坪去练习。从此以后，第一师范的代表队，就成了长沙各校中实力雄厚的足球队，成了“八大球王”的劲敌。这一时期，踢足球成为全校师生的主要体育活动，一师在继“乒乓狂”之后又兴起了“足球热”。

当时，长沙各校学生没有游泳的风气，甚至有的学校还明令禁止学生到江河、池塘去游泳。方维夏是一位思想比较开放的师长，他知道游泳是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学生最喜爱也是最擅长的体育活动，故从不加以阻止。自学友会成立游泳部以后，他明确指示要“精心组织，确保安全”，并在牛头洲专门开辟了一个游泳场所，供会员开展游泳活动。他还督导毛泽东等学友会干部，严密组织领导好每一游泳活动，保证万无一失。按照他的要求，毛泽东把报名参加游泳的同学编成若干小组，选派水性好，责任心强的同学任组长、干事和纠察，以领导游泳小组的活动，并指导技术和照顾安全。到了夏天，参加游泳的同学更多了，毛泽东便请示方维夏同意，通知伙房每日晚餐留出数桌饭菜，推迟两个钟头开饭，好让同学们在游泳尽兴归来之后，能吃到热饭、热菜。这样，第一师范就又出现了游泳高潮。

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方维夏不仅全力支持他开展开创性的工作，还不时向他传授工作方法、组织策略。他常常对毛泽东讲：组一个团体，办一件大的事情，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要善于发挥众人之长，集众人之智慧，正所谓“贤相不以自己之长为长，常集天下之长为长”。他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毛泽东：“在同学中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我们应该鼓励、发展、运用每个人的长处，不管那长处是很小的、有限的。我们看人首先就应看他的长处。”方维夏的话，似春风化雨，滋润着毛泽东那求知若渴的心田，他把这些金玉良言工工整整地抄入《讲堂录》，当作座右铭。

谨记老师的教导，毛泽东在主持学友会的工作中，尽力做到发挥各人所长，如对于长于语言文字的学友，分配到文学部工作；对于教育有兴趣的，便让其参加教育研究部，使人尽其才，各得其所。他还善于吸取众人的智慧，每当学友会开会时，他总是用心听取各种意见，从不轻易表态。最后总结时，取长补短，抓住要领，深入分析，妥善安排，从而使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建议和看法，达到了集思广益的良好效果。

1918年上学期，是毛泽东在一师的最后一个学期，毛泽东仍被同学们推举为总务，协助会长方维夏工作。但这牢四五月间北方军阀占领长沙，学校成为囤兵之所，大部分师生被迫离校，学友会的活动遂告一段落。5月10日，毛泽东将学友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代理保存”，并同时向方维夏复命述职。方维夏对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所做的创造性的工作，给予了

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介，他嘱咐学生“切将本届会务活动成功之经验留下

来、传下去”。毛泽东遵照老师的嘱托，根据自己几年来在学友会工作的体会，对今后的学友会工作提出了富于建设性的书面意见：以后一个时期的主要工作有两方面，一是扩充会务经费，用以购置图书杂志，办夜校，救济失学穷民；二是加设交际部，以“寻旧思故，勉学励业”。他满怀豪情地写道：“抑本校之地位则师范也，其须联络之情，较之其他学校犹切。教育为事，重在相互比较参观，交换其知识，而讨论其方法。本校立在省会，为全省国民教育之枢纽，诚使联络得法，研究有方，不难使全省教育焕然改观。”最后，他向未来的校友寄予

殷切希望：“今愚等又将去矣，惟有望后来同学诸兄，竭力以图其诚而已。”意见书后，他还拟出细则七条附上，然后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呈送给了方维夏。这是他对学友会工作的最后交待，如今已成为后人研究他这段求学生活的珍贵史料。

毛泽东终于结束了在学友会的工作，可是，这段生活对他整个人生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在方维夏的引导下，毛泽东通过主持学友会的工作，初步积累了社会活动的经验，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和领导能力，也初步显示出他作为一个杰出社会活动家的优良品质和非凡才具。

参见《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志》，1918年编印。

99 共同主办工人夜学

毛泽东和方维夏共同主办工人夜学，是在1917年的秋天。这是他俩主政学友会期间所办的一件大事。

1915年后，新文化运动的思潮激荡着湖南，反对特殊阶层的教育特权，倡导教育平民化的呼声日益高涨，许多有识之士提出开办平民学校，让“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进入学校，接受近代教育。第一师范作为湖南教育工作者的摇篮，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于1916年12月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专收校内外失学的职工，由教员业余授课。但办得并不成功，不久中辍。

毛泽东非常同情工友没有文化遭受欺凌的境况，在他被选为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后，通过对过去主办工人夜校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总结，即主动向学监主任兼学友会代理会长方维夏请缨，由三、四年级学生来办夜校，并由他直接负责的教育研究部来主管这件事。方维夏觉得毛泽东的设想不失为大胆创新之举，同意由毛泽东先行拟出具体实施方案，然后提交学友会职员会议讨论通过。

1917年10月底，方维夏主持召开了本届学友会第二次全体职员会议，专项讨论举办工人夜学的有关事宜。在会上，毛泽东首先道出了倡议主办夜学的动因：“本学期学友会改选，定有数种计划，夜学即为计划之一，倡议之初咸以师范本以教育为天职。”接着，他条分缕析地列举了主办工人夜学的理由和目的；其一，“我国现状，社会之中坚实为大多数失学之国民，此辈阻碍政令之推行、自治之组织，风俗之改良、教育之普及，其力甚大。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才。而欲达此目的，不可不去为此目的之阻碍。”其二，欧美号称教育普及，求其可教者教之，草木鸟兽，同兹生类，犹宜护惜，更何况是人呢？“小人”本来并不是小人，也不是恶人，偶因天禀之不齐，境遇不同至于失学。给他们以教育的机会，正是“仁人”君子无可推诿的责任。其三，三四年级学生已基本上学完有关教育理论的课程，应将所学理论用于教育实践，夜校正可以成为其实习的场所。其四，最重要的是，改变现时学校与社会之间不正常的关系，消除学校与社会之间存在的鸿沟和相互不信任的状况，使学校与社会结合，使学校与社会团结一致，“社会之人视学生如耳目，依其指导而得繁荣发展之益；学生视社会之人如手足，凭其辅佐而得实施所志之益。久之，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永久之大学校。此则千百年后改良进步之成绩也。”

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方维夏兴奋不已，不由自主地带头鼓掌致意。从毛泽东力举开办工人夜学的举动中，他看到这个学生的不凡——不是一个崇尚空谈、坐而论道的人，而善于把自己远大的理想与眼前每一细小的、实在的步骤连在一起，去付诸卓有成效的努力，这是成大器者所具备的天然素质，他由此感到：作为学校的学监主任和一名资深教师，完全有责任为这样的有志者施展才华、实现抱负创造更好的活动天地。于是，他率先对在坐的教职员和学生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学讲得好哇！我们中国恭弱不堪，数十年来遭受外侮，这与国民素质太差不无关系。老百姓不识字，无知识，多是愚昧之辈，哪有能力保护国家呢？要提高国民素质，加强国力，

见《夜学日志首卷》，1917年11月。

尚须靠我辈学人不懈努力！所以，对毛泽东同学的提议我是完全的同意，并将为之不遗余力！”

方维夏一席恳切的话语，得到与会人员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致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并当即形成决议：在一师附近的国民学校继续主办工人夜学。

办学决定一经形成，毛泽东马上着手组织准备。10月39日，他用白话文起草了一份《工人夜学招生广告》，生动而通俗的语言，说出了工人们的心里话：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几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

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今年上半年学生很多，列位中想有听过来的。这个夜学专为列位工人设的，从礼拜一起至礼拜六止，每夜上课两点钟。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若是要来求学的，就赶快于一礼拜内到师范的号房来报名。列位大家想想，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做？无非是念列位工人的苦楚，想列位个个写得算得。列位何不早来报个名，大家来听听讲？有说时势不好，恐怕犯了戒严的命令，此事我们可以担保，上学以后，每人发听课牌一块，遇有军警查问，说是师范夜学学生就无妨了。若有为难之处，我们替你做保，此层只管放心的。快快来报名，莫再耽阁！”

方维夏是最先看到这份广告的人。毛泽东将《夜学招生广告》草拟好以后，用毛笔誊写了一遍，送给老师修改润色，以便最后定稿公布。读着这平白如话，通俗易懂的招生广告，这位正直的知识分子不禁万分激动。透过这篇短短四百多字的广告，他看到的是毛泽东那一片为因贫困而失学的工人兄弟排忧解难的火热心肠！

是的，方维夏怎能不激动呢？这样的白话广告本身，在当时就是一件新鲜事。即便是今天读来，其蕴含的赤子之情，也莫不叫人怦然心动！只有像这样设身处地地为穷苦劳动者着想、诚心实意地为穷苦劳动者办一件件好事的人，才能成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人民的解放而无私奋斗终生的伟人，成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人们从这里便可领略到毛泽东极富魅力的人格特征，这种特征为广大的中国人民喜闻乐见。如果说在创办夜学所陈的四条理由中，还不免有旧知识分子居高临下，解民于倒悬的某种通病的话，那么，这则广告则是毛泽东实现救国救民伟大抱负的明确昭示！这则广告，由方维夏主持的宏文图书社印刷后，委托警察协助向居民分发。但意想不到的是，老百姓反映冷淡，没有人前来报名。这使方维夏感到很奇怪，就召集毛泽东等有关同学分析原因，认为学校举办工人夜校，在长沙还是个新鲜事，不容易使人相信；由警察代发广告也不妥当，警察代表官府，使人们望而生畏，反而增加

了疑虑。原因找到之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就带着六百多份广告挨家挨户去动员。见此情景，那些失学的工人被深深地感动了。中国工人自从诞生之日起，何曾见过来自读书人如此亲切和诚挚的关心？几天以后，就有一百多人来报名，后来又增加到三百多人，而且还有许多人要求增报。毛泽东在《夜学日志》上记载工人这种迫切要求学习的情形时，把它形容为“如嗷嗷之待哺也。”

经过方维夏的精心组织和毛泽东及有关同学的认真筹备，工人夜学正式开学了！11月9日晚，方维夏亲自主持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入夜时分，第一师范右边的国民学校教室里，灯光明亮，笑语喧哗。方维夏带领毛泽东等一批夜学“小教员”，在门口的通道上排成两行，热情地夹道欢迎一批批衣服褴褛的工友走进自己的课堂。开学典礼上，方维夏代表校方讲了话。他满腔热忱地赞扬了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热烈欢迎失学工友进夜学学习，要求担任夜学教员的一师学生，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努力办好夜学，希望通过主办工人夜学，增强学生与劳工的联系，消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鸿沟，真正实现创设夜学的宏伟设想——“社会之人皆学校毕业之人，学校之局部，为一时之小学校；社会之全体，为全体之大学校。”接着，毛泽东向学员详细解释了由他起草的《上课说明书》。鉴于过去夜学未能坚持的教训，毛泽东制定了一些教学规则，但说明书从总体上却反映了他体谅工人难处、设身处地为工人着想的精神境界。如“每次上课，衣服听便，不必求好”，“本校已函请警察保护，来往只可放心”等规定，极其宽容、周详。在课程设置上也尽量结合工人的特点，只开设适用性强的国文、算术、常识三科，按毛泽东所解释的话说，就是“国文与算术近于技能，常识近于精神”。国文的内容分为认字、写字、短文、便条和书信；算术以珠算为主，稍加笔算；常识课的内容是关于历史、地理、修身、卫生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所有各课，都由夜校教员自编讲义，讲义的特点是少而精，都与学员的生活、工作有密切关系。这些，博得了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为了办好夜学，也为了给方维夏减轻工作负担，毛泽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非常注意倾听工人的意见和要求，认真探讨教学方法，对关乎教学质量的大小事情都想得十分周到和妥贴，而且做到事无巨细，每必亲躬。开学初，他时刻关注着授课情况，适时向方维夏提出建议，不断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案。在11月12日的夜学日志中，他写道：“教授两点余钟，学生听之颇能娓娓不倦。”“此次地理讲义不善，字嫌小，又不刚白。”“教室洋油灯四盏，有二盏不明，灯在四角，中间颇暗，应添一盏。”夜学教员、毛泽东同班同学张昆弟在同日的日志中记道：“课毕由毛泽东报告不可喧扰，宜每次都来上课，三次不来者开缺不补。解手赴外边厕所。下雨时雨具自置椅下看管。今次有未带笔墨者，下次宜都带来。”11月14日，毛泽东在《教学日志》上初步总结道：“实践三日矣，觉国文似太多、太深。太多宜减其分量，太深宜改用通俗语。常识分量亦嫌太多，宜少文字，其讲义宜用白话简几句标明，初不发给，单用精神演讲。将终，取讲义略读一遍足矣。本日历史即改用此法，觉活泼得多。”“本日算术却觉过浅，学生学过乘除者，令其举手，有19人之多。此则应逐渐加深。”11月16日，学生张超给甲班上物理常识课，因课讲得太深，许多学生坐不住。毛泽东见此情形后，及时对学员说：“物理一科，极有趣味，方才所讲，不过发端，将来电灯之所以能

明，轮船、火车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以引起学员的兴趣。

这年年底，一师放寒假，夜校第一期也随之结束。12月24日，方维夏和毛泽东召集夜校工作总结会，宴请所有义务参加夜学教育工作的一师学生，以致答谢。同时，对那些认真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分三等发了奖品，以示鼓励。

1918年上学期，夜学继续开办。按照方维夏的意思，毛泽东兼任夜校“管理”职务，统筹举办工人夜学事宜，3月2日，他再次草拟了《第一师范附设夜学招学广告》，印制五百份，广为张贴。为进一步扩大社会影响，推动其他学校也来开办夜学，毛泽东还向湖南《通俗教育报》投稿，详细介绍了一师夜校开办的情况和经验，文章于3月19日在该报发表，题目是《告夜学生》。这篇文章内容具体，观点鲜明，通俗易懂，在长沙教育界产生了一定反响。

数月以后，毛泽东这一届学生毕业离校，他同方维夏共同举办工人夜学和这段色彩缤纷的生活也告结束。但是，工人夜学这株经进步师生共同培植起来的新苗，却依然在第一师范的这块沃土里茁壮成长。

举办工人夜学，是方维夏和毛泽东之间的一次成功合作。从客观上讲，方维夏这位当时的湖南省现补议员，要想在繁忙的本职工作之余，通过举办工人夜学这一举措，推行自己“民本教育”的构想，就无可选择地要依靠毛泽东这样的既有远大抱负又有实干精神的热血青年协助；而从另一角度讲，如果不是方维夏这样的好老师对毛泽东组织才干的赏识，对他主办工人夜学这一新生事物的全力支持，并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扶助，提供极大便利的话，毛泽东就不可能在学生时代找到一个最初从事社会活动的舞台，从而给他的辉煌人生留下早年这闪光的一页。毫无疑问，这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有意义的收获之一，并对他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举办工人夜学，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与城市工人开始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接触，并与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师附近的许多工人都很熟悉夜学中的“毛先生”，将他视为好老师，好朋友。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取得了与工人联系和接触的初步经验，为他以后从事工人运动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见《夜学日志》，1917年11月16日。

100 “人物互选”选奇才

1917年6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

“人物互选”，是一师根据“校章”而举办的一项全校性活动，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学业和操行，促使学生向上，培养、选拔人才。

这次活动由学监主任方维夏具体组织实施，选举内容包括德、智、体三方面，选举办法是每人至多可以投三票，每票只能选一人，被选对象不限于本班，但票中列举的项目必须名实相符。

为了引导这一活动健康地开展，真正选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给全校学生树立起学习的楷模，方维夏在选举前曾亲临各班，向师生宣讲开展“人物互选”的意义和目的，表扬毛泽东、周世钊等优秀学生的事迹，希望各班在老师的正确引导下评选出像他们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

方维夏这样做，绝不是偏爱毛泽东，而是出自于对这个学生的深刻了解。的确，在一师范师生眼里，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渊博的学识，顽强的意志，探求宇宙、社会、人生真理的执着精神，以及非凡的胆识和特殊的领导与组织才能，使之在师生中享有较高的威信，被誉为“特殊学生”、“奇才”、“伟器”。毛泽东的同学彭道良曾对友人由衷夸赞道：“我与二十八画生同班同学，颇知其为人品学兼优，且具独立特行之性格。他常语人：‘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著奇文、创奇迹，作个奇男子。’……合而观之，此君可谓奇特之士，因此同学中戏称为毛奇，且语意双关。”同学陈赞周评价“润之气质沉雄，确为我校一奇士！”……对于这样一位品学皆优、有口皆碑的好学生，方维夏怎么不希望通过由他亲自主持的“人物互选”这一具有“民意测验”性质的活动，使其让更多的学生所了解、来学习呢？

毛泽东终未辜负老师的愿望，“人物互选”的结果表明，他不愧为一师最优秀、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在这次全校十一个班，四百余人参加的大型活动中，毛泽东得四十九票名列当选为新闻人物的三十四人之首。其他当选者只有德、智、体三项中的一项或二项达标，唯独毛泽东三项都很拔尖。在德、智、体三方面所包括的细目中，也是他票数最多，“胆识”一项为他所独有，“才具”和“语言”两项除他外各只有一人得票，“敦品”一项为全校之冠。

总评时，方维夏综合全体师生的意见，对毛泽东作出了几条精到的评语。具体内容是：敦品为“敦廉耻，重礼节，慎言笑”，文学为“长于国文词章”；言语为“长于演讲，应辩论对”；才具为“应变有方，办事精细”；胆识为“冒险进取，警备非常”。从上述评语中，方维夏对毛泽东的气重与褒奖可略见一斑。

1918年的夏天，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从而结束了他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习岁月。

一年多以后的1920年，身为省议员的方维夏，被新任湖南省长谭延闿聘任为省教育司长，也告别了第一师范。

此间，毛泽东为探求真知曾两度进京和赴沪，同方维夏有过一个时期的小别。1920年来，他被一师校长易培基聘为一师附属小学主事，又得以时常聆教于老师的门下了。这期间，作为全省教育主管官员的方维夏，在工作上给予毛泽东许多指导与支持，而毛泽东由于受李大钊、陈独秀这些马克思主义播种者的熏陶，已确立马克思主义为人生信仰，并开始迅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到他的老师方维夏，从而形成了他们之间日后那种既为师生、又是战友的特殊关系。

1920年7月，毛泽东受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湖南“驱张运动”的影响，深感要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必须在社会上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和新文化。因此，他筹划创办了一个以推销马列主义书籍、报刊为主的书社。在一次去省教育司看望方维夏时，毛泽东对老师谈了创办书社的想法，方维夏听后极为赞赏，表示愿意领衔联络长沙教育、新闻和工商各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参与集资，保证书社如期开办。他们还一起商定了创办书社的具体事宜，将书社定名为“文化书社”。

为了向社会宣传文化书社，毛泽东撰写了一篇《文化书社缘起》的文章，经方维夏推荐，先后在湖南数家报纸上发表。毛泽东在文中用生动的语言写道：

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啊？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居住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文化书社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尽出力所能及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编辑社、印刷社等急待筹设）。我们认定，没有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会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8月中旬，文化书社租用长沙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为社址，随即正式开业。10月22日，召开了第一次议事会，方维夏和参与投资的湖南教育界、文化界及政界知名人士姜济寰、朱剑凡、易培基等三十余人，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推举毛泽东为书社特别交涉员，新民学会会员易礼容担任经理。

在方维夏等社会名流的扶持和毛泽东等人的苦心经营下，文化书社的发展十分迅速。1920到1921年春，书社与省内外发生书报营业往来的单位达六七十处。省外来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报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学术讲演会，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广东的新青年社，武汉的利群书社等。其中特别与恽代英等办的利群书社的联系甚为密切，通过这条纵横交错的销售渠道，大量进步书刊源源不断流向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广大城市。书社

开张才半年时，进步书籍如《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社会与教育》、《克鲁泡特金的思想》、《托尔斯泰传》及《白话书信》等，销售量就达两百本以上，进步刊物如《新青年》、《新生活》、《新潮》、《新教育》和《劳动界》等，销量为二千至五千份不等。后来，书社业务日趋发达，凡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机关刊物《向导》、《中国青年》、《先驱》等，以及新出版的马列主义丛书，更是大量推销到湖南及全国各地，在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重要的组织作用。

建党后，文化书社及其平江、浏阳、衡阳、宁乡、武冈、宝庆、淑浦等七个分社，又承担了提供秘密集会和联络的场所、周转革命活动经费、培养革命干部的作用。“马日事变”后，文化书社被何键等新军阀捣毁，然而书社的精神和事业，为后来的革命文化机关发扬光大了。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按照陈独秀和李大钊二先生的意见，学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经验，积极筹备在湖南创建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同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彭璜等人商议：借助方维夏在上层社会的影响，联络部分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成立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组织俄罗斯研究会，得到了方维夏的热烈响应和全力支持。1920年8月22日，方维夏出面借用长沙县知事公署的会议室，召开了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会议，新民学会会员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和湖南长沙县知事姜济寰、省教育司司长方维夏、一师范校长易培基以及包道平、贺民范等湖南政界、学界名人聚集一堂，共商创设该会的大计。经过一番充分的讨论和酝酿，形成了俄罗斯研究会简章，确立“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思想为宗旨”，以发行俄罗斯丛刊，派员赴俄从事实地考察，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为内容，推举毛泽东、何叔衡、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负责具体筹备工作。

经过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俄罗斯研究会终于宣告成立！9月16日，在文化书社举行了成立大会，方维夏、姜济寰等人出席了会议，会议推选姜济寰任总干事，毛泽东任书记干事，彭璜任会计干事并驻会办理日常事务。同时决定，会员除个人研究外，周末下午可自愿去文化书社进行集体讨论，并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汇编俄罗斯丛刊。为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该会还决定派代表赴京与苏联代表接洽，并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上海的苏联人来湘教授。

俄罗斯研究会，进行了大量的对俄国十月革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了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任作民等十六名进步青年赴俄学习，这些人学成归国后，大多数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骨干。

在创办文化书社和组织俄罗斯研究会的进步活动中，方维夏在他的学生毛泽东的影响下，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也开始了根本转变。1924年，已届天命之年，身为中国国民党老党员、“孙文学说”忠实信徒的方维夏，由毛泽东任书记的中共湘区委员会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而实现了他人生的根本转折。

方维夏入党后，党组织鉴于他在湖南的名望和与国民党元老原湖南省省长兼督军谭延闿过从甚密的情况，派他进入湘军担任政训部主任，开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工作，1926年秋，方维夏投身北伐战争，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二

军第五师党代表，参加了进军江西、攻打南昌的战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二十一军第一师党代表。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遣他秘密赴苏联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他从苏联回国，在去上海向党中央报到以后，不久即奉命奔赴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了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的重要职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毛泽东主席特地致函邀请这位师长到瑞金担任总务厅厅长。1932年，他被选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并兼任教育部部长。次年，调入湘赣革命根据地，担任湘赣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裁判部部长。1934年8月，湘赣的红六军团在任弼时、王震、肖克率领下突围西征，方维夏奉命留守湘赣坚持革命斗争。

1935年春，方维夏率领湘赣红军独立第四团到湖南开辟游击区，不料在资兴县遭到敌人的伏击，部队被打散，他和十数名战士突出重围，转移到桂东、汝城交界的东边山，与湘东地方游击武装一起坚持革命斗争。不久，蔡会文率领从中央根据地突围的部分红军战士转移到湘南，与方维夏的部队会师八面山，建立了八面山游击根据地，组建了湘粤赣红军游击支队。同时，成立了中共湘粤赣特委，方维夏担任宣传部长。同年十月，游击支队被敌人重兵围困，蔡会文在战斗中不幸牺牲，方维夏因叛徒出卖被捕。在狱中，敌人一则慑于他的威望，又服膺他的才能，妄图用高官厚禄收买他，要他宣布脱离共产党，遭到他的痛斥。最后，敌人向他下了毒手，他的鲜血洒在了故乡的土地上……

方维夏英勇就义的噩耗，半年以后才传到陕北，才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闻讯后，悲恸非常。这位被陕北抗日军民称颂为“大救星”的人民领袖，不禁悲泪长流，深深为失去方维夏这位良师、益友和同志感到痛心疾首。他对已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担任教育部部长的另一位老师徐特立说道：“方先生是我的好老师、好同志啊！他敦品力学，德高望重，放着国民党的高官不做，四十多岁投身革命，了不起呀！”

是的，方维夏无愧于他的学生——伟人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

“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回首方维夏数十载的教育与革命生涯，他无论为人之师还是为人之友，皆堪称后生楷模——作为一名“好老师”，在第一师范这段峥嵘岁月里，他把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视为“旷世奇才”，多方爱护提携，精心培养锤炼，为之兢兢业业，殚精竭虑，从而倍受学生的爱戴与敬重；作为毛泽东的“好同志”，他一生追求进步，向往真理，一俟追随学生毛泽东走上革命道路，便矢志不移，百折不回，直至血洒沃土，更是毛泽东引以自豪的战友！

第十九章杨昌济

——终身之师

君子之学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

四体，形乎动静。端而言，蠕而动，一可

以为法则。……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

——《劝学篇》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埃德加·斯诺。当斯诺获准向毛泽东采访其生平事迹时，曾这样问到过他：谁是你最尊敬的师长？

毛泽东不加思索地答道：“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的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确实，自杨昌济1913年任教于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开始，他便与毛泽东建立起亲密的师生情谊。以后，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们之间的这种情谊与日俱增。杨昌济不仅以他的哲学世界观、伦理学思想熏陶了毛泽东这个农家出身的青年学子，尤以他高尚的人格、廉洁的节操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赢得了毛泽东的由衷敬佩和爱戴。

杨昌济，字华生，1871年（清同治十年）4月21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清泰都隐储山下的板仓冲。因世居板仓，所以杨昌济后来被人称之为“板仓先生”。

杨昌济家住的板仓屋由土砖砌成，三面环山，青松翠竹，交相辉映，屋坪前是两口明净的水塘，再前面是一片宽阔平展的稻田，银练般的板仓河，在田畈中逶迤流过，风光十分秀丽。板仓家中，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杨昌济的高、曾祖父都是“大学生”，祖父杨万英是“邑庠生”，但没有做过什么官，一直在家乡附近以授徒为业。杨昌济父亲杨书祥，字书樵；其母向氏是平江县石洞人，向家乃读书世家，与杨家世代联姻，对杨家子弟影响甚深。他们有四个子女：长子昌运，字荣生；第二个是女儿，嫁金井郑姓；杨昌济是老三，老四杨昌恺，因叔父杨小吾无子嗣，便过继给他做儿子。

杨昌济七岁进馆“发蒙”，蒙师是自己的父亲杨书祥。他不幸“八岁失恃，十四岁失怙”，母亲、父亲相继去世，给他早年的生活留下了不少阴影。1888年，杨昌济十七岁时，与舅父前妻所生的第二个女儿向振熙结婚。次年参加长沙县考试，一举考上“邑庠生”。1890年应试举人不第，便出门授徒，积累了一些教学方面的经验。1893年再次“乡试”又不第，心情苦闷，日渐消沉。

1895年至1898年这几年中，杨昌济有时在长沙居住，大部分时间则在乡间授徒。这期间，他虽然情绪抑郁，但仍未放弃对科举的一线希望，一边在板仓乡下的巷子山一带当塾师，一边继续进行自学，阅读了大量古今书籍，打下了扎实的文化功底，以期他日科场再显身手。

1898年，杨昌济进入岳麓书院读书，积极参加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加入了他们组织的南学会，成为“通讯会友”，借此机会向谭嗣同等请教、交流。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看破了科举功名的虚伪和无用，从此绝意仕进。这期间，他的家庭生活也发生了变化。1898年生儿子杨开智，1901年生了女儿杨开慧。他的哥哥杨昌运虽在戊戌年也考上了“秀才”，但鸦片烟瘾不断，长卧家中。杨昌济岁岁课徒，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并帮助哥哥解决生活困难。他的经济负担是越来越重了。

正当杨昌济隐居乡间，感到彷徨无主、前途无适的时候，1900年8月，又传来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的消息。对于唐才常这位对湖南变法运动起过推动作用的人物，杨昌济是十分熟悉的，也是非常尊崇的。唐才常的壮烈牺牲，“自立军”烈士们的鲜血，进一步擦亮了杨昌济的眼睛。这时，杨昌济的密友杨毓麟思想更为激进。已经暗中鼓吹和串联进行革命，并于1902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时代思潮的感召下，在杨毓麟和其他亲友的鼓励支持下，杨昌济也萌发留学日本、寻求拯救中华古国出路的意念。于是，在1903年农历二月初，杨昌济告别了生活了近三十二个春秋的家乡，离开了亲爱的妻子和儿女，从长沙乘船漂洋过海，奔赴日本。临行前，他改名“怀中”，表示自己虽身在异邦，却心怀中华大地。

和杨昌济一起赴日的湖南留学生有三十多人，其中包括陈天华、刘揆一、李倬等。这群人中，以杨昌济年龄最大，学识也最渊博，大家对他十分尊敬，称他为“怀翁”。杨昌济到达日本后，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开始读的是速成师范科，不久便转入普通科。他学习十分刻苦，生活非常简朴，但是特别喜欢旅行。他相信古人“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的说法，每当假日，便去游览日本的名山大川，丰富阅历，陶冶情趣。这一点，对后来的毛泽东有极深刻的影响。

杨昌济在弘文学院的学习成绩优良，深得院长的赏识。1906年，他在弘文学院结业后，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教育学，修业期限为四年。不久，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在杨毓麟、章士钊的极力推荐下，调杨昌济去英国继续深造。1909年春，杨昌济进入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哲学系，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当时，章士钊亦在该校学习。

1912年夏天，杨昌济结束了在勒伯丁大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获得文学士学位。随后，他又往德国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考察。在这期间，他还去瑞士游览了一番。在德国，杨昌济重点考察教育制度，但是对政治、法律等各项制度也无不留意。考察完毕后，便即启程返回阔别十年的祖国。在长沙定居后，即把妻子向振熙和儿子开智、女儿开慧

从乡下迁到城里。

杨昌济回国时，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已被袁世凯所篡夺，湖南的政权也被立宪派政客谭延所窃据。谭延图多方网罗人材，他见杨昌济学识渊博，又先后留学“东洋”、“西洋”。在教育界具有一定声望，便想请他出任湖南省的教育司长。可是，经过近十年留学生涯的杨昌济，在国外耳闻目睹了资本主义国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培养的状况，深感中国教育之落后，人才之缺乏。因之，他无心参政，决心以教育为己任，走教育兴国的路子。于是，他推辞说自己久居国外，对国内情况缺乏了解，同时又缺少行政才能，谢绝了谭延■的聘请。而选择了一个冷冷清清的位子——当了一名学校教员。先后应省立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和湖南商业专科学校之邀，在长沙任教五年之久。

就是在此期间，杨昌济与后来成为历史巨人的毛泽东相识了，并成为他“印象最深的教员”“同他的生活有了密切的关系”。

103 资质俊秀

杨昌济归国之初，应聘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这时，结束了定王台半年自学生活的毛泽东，也刚好考入该校。不久，四师与一师合并，杨昌济便到第一师范任修身教员，毛泽东随之也转入合并的一师范继续学习。

在第一师范教书期间，杨昌济的学生著录以千百计，但却尤其欣赏毛泽东、蔡和森二人。在1915年4月的日记中，他对毛泽东的出身、经历专门作过一段详尽的记载：

“毛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格纯朴，烟赌甚稀。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一位颇有名望的老师，专门就一个普通学生的家世和履历写下一篇日记，这在当时的教育制度下已属少有；“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的评价，出自于一向严谨的杨昌济之口，则更为鲜见。从中人们不难看出：杨昌济对出身农家的学子毛泽东，是何等的看重！是的，杨昌济在这个时候写下这样一篇日记绝非偶然的，他的确十分器重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教学活动中，杨昌济以他特有的慧眼，对毛泽东进行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发现这个性格潜沉冷静、行为洒脱不羁的湘中青年，却原来是个出类拔萃的学生。毛泽东那渊博的学识，顽强的意志，探求“宇宙、人生、社会”大本大源的执著精神，非凡的胆识，特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等等，都令他刮目相看。身为一个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老师，杨昌济尤其赞赏毛泽东那一套奇特的为学之道。故而认定：毛泽东是个特殊的学生，堪称海内人材，能充栋梁之任，如多加点化，定会前途无量。故“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鼓励毛泽东以曾国藩、梁启超这两位湖南的杰出人物为榜样，努力学习，将来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

杨昌济如此喜欢自己的学生，那学生毛泽东又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老师呢？

对于杨昌济这样一位学问高深、道德高尚的老师，毛泽东是极为尊敬的和推崇的。他在后来给已赴北京任职的原一师历史教员黎锦熙的信中，曾表达了自己的这种心情：“弟观杨先生之涵宏盛大，以为不可及。”杨先生“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在当时一师的教员当中，论口才，杨昌济并不很好，但他既博学多才，又注重实际，所以授课仍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加之他与一师的一些资深教员，如徐特立、方维夏、黎锦熙、王季范、易培基等人过从甚密，这样自然而然地就吸引了一批“尖子”学生聚集在他身边。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听讲非常用心，并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杨昌济家中请教学识和文章。

那时，杨昌济的寓所门上，挂着一块一尺来长、三寸多宽的铜牌，上面用隶书镌刻着“板仓杨”三个大字。在五年多的时间里，这块铜牌随着他从河东到河西，又从河西到河东，先后换了四五个地方。不管这块铜牌挂在哪儿，都有一批批青年学生寻迹而来，登门求教。在这些求教的学生中，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陈章甫、罗学瓚、张昆第等人，都是“板仓杨”寓的常客。

尤其是毛泽东，他把到“板仓杨”寓聆教看作比课堂听讲还要重要的一

种学习机会。数年来，不管酷暑严寒，还是刮风下雨，从未间断过去杨昌济先生家登门求知问道。在这里，他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纵谈天下大事，只要所学，必多裨益。

杨昌济深感这些好学上进的学生十分可爱，很乐意和他们交往。他从毛泽东、蔡和森这批胸怀大志、朝气蓬勃的优秀青年身上，看到了人才脱颖而出的希望，感到无限慰藉，便竭尽心力，加以培养。他除了在课堂讲授“修身”、“教育学”两门课程外，还动手自编教学参考书《论语类钞》、《儿童侦探》、《教育学讲义》及《附录》等，还翻译了一部《西洋伦理学史》，他将这些书籍和书稿送给前来求教的学生，供他们学习、阅读和传抄。如毛泽东就曾手抄《西洋伦理学史》七大本，十余万字。

为了使学生不局限于课堂知识，把学生从“小课堂”引入“大社会”，杨昌济在测正街李氏芋园还组织了一个哲学研究小组，其成员有黎锦熙、方维夏、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从1914年冬到1915年9月，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这些人都要到杨先生家中来讨论有关读书、哲学问题。哲学研究小组主要是介绍读物、讨论读书心得。大家每次碰到一起，就把自己一个星期来读书的心得拿来自由地进行讨论，有时也随手拿起旁边一个人的日记看看，1915年暑假，毛泽东、陈昌、熊光楚等人都没回家度假，就住在李氏芋园，由杨昌济和王立庵二先生辅导哲学和数学。通过杨先生悉心而又系统地指导，“毛泽东很快接触到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从杨那里受到融合中西方思想为一体的教育”。

这中间，杨昌济和他的学生们曾有过一次小别。那是1915年夏天，毛泽东等一师学生，在学校掀起了一场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因此触怒张干，张下令将毛泽东等十七名带头“闹事”的学生挂牌开除。杨昌济等教员积极声援学生，要求张干收回成命。不料最后张干仍给毛泽东一个“记大过”处分。杨昌济为抗议校方这种专横作法，辞去了一师的教职，整整一年未在一师教课。但是，尽管这样，他和毛泽东等一师学生的亲密关系并没有因此中断。这年七月五日，杨昌济举家迁往河西岳麓山下，为了方便毛泽东等人前往他家学习和讨论，他还家里专门开辟了一间客房，每当这些学生来后，亲密的谈话一扯就是几个小时，吃饭时坐下来一大桌，去留都十分随便，不分彼此，亲如一家。

关于毛泽东等一师学生到板仓杨寓聆教的情况以及杨昌济与学生的关系，毛泽东的同学、新民学会基本会员之一的张昆弟，在他1917年8月至9月的日记中有如实记载：

“八月二十二日。晚餐后至板仓杨寓，先生谓读书之要，在反复细读，抄其大要；不在求速求多，反毫无心得也。又谓向吾之理想生活进行，文章誉望，听之后人。又曰，不计较于现在之社会。又曰，势力不灭。又曰，渐蓄其力而乍用之。”

“九月八日。去年杨师谓余曰：克己之功夫多，存养之功夫太少；须从存养多下功夫，则可免克己之苦矣。”

“九月十三日。晚饭后至板仓杨寓，杨师为余辈讲‘达化斋读书录’。后又谈及美人之做事务实。”……

杨昌济的儿子杨开智，也有一段有关毛泽东不辞辛劳到他家拜访请教父亲的回忆：

“一九一六年暑假，怀中先生在板仓家中度假，暑假期间的一天，毛泽东从长沙城出发，步行了一百二十华里，来到我们家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来板仓。毛泽东在板仓期间，曹以很大的兴趣浏览了我父亲的藏书，特别是所订阅的新书刊报，和我父亲讨论了一些学术问题……。”

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言传身教，作用巨大，尤其是教师自身的思想、品格和行为，往往给学生以深刻的影响。

杨昌济出生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正如他自己所言：“君子所泽，源远流长”。受这样的家庭环境熏陶，他自幼饱读圣贤之书，对于中国古代文化有很深的修养，尤其对于宋明理学有深刻的研究，同时又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湖南近代有识之士的学说。戊戌之后，他留学日本六年，就读于英国三年，并游历了德国、瑞士，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风气和社会制度。这样，他在精通中学的基础上，十年于外又较系统地了解和掌握了西方的哲学、伦理学和教育学，真正做到了学贯古今中西。杨昌济的这种特殊的出身经历及其渊博学识，使之成为第一师范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毛泽东等一批进步学生自然而然地团结在他的周围。以培养人才为己任的杨昌济先生，通过教学竭力将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传授给学生，求知若渴的学生们则在诸多方面向老师学习，甚至是刻意模仿。在这种师生相亲相得、人生观和价值观相互一致的情形下，正处于世界观逐步形成阶段的毛泽东及其学友们，受杨昌济的影响之大是可想而知的。观察毛泽东的一生，无论是在思想观点中，还是在他的人格磨练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杨昌济的痕迹。

对于毛泽东而言，他从杨昌济这里最大的获益，莫过于思想、志向和抱负的初步确立。如前所述，杨昌济对宋明理学有很深研究，接受了理学中个人修养和立身处世的某些有益东西；他又考察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并加以批判、抉择、融汇，自成一种比较进步的伦理思想和讲求实践的人生观。故有人将他的学问称为“新儒学”。中国旧时的读书人，大多受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学”的影响，曾国藩就是以宋明理学的研究者和继承者自任。杨昌济受时代的局限，自然也不例外。他是“中体西用”论者，恪守中学、尤其是朱陈之学力主的新儒学，辅之以西学。因此，他的思想体系仍然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他的人格则是以传统儒学的忠、孝、信、礼、诚、廉和宋明的主敬、静等为特色的儒者人格；在哲学思想上，他过于夸大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在伦理学观点中他将伦理道德当成世界的本源，这都带有很重成分的唯心主义。但是，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他追求新思想，躬行实践，总是谆谆教导学生，要有崇高的理想和改变社会、国家的远大抱负，这些对于毛泽东等一师青年学生，曾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杨昌济常常对学生讲，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是人生的高境界，要臻此完美地步，就必须“立志”，必须经受住意志的磨练。他在解释孔子“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时，对学生这样讲道：“人有强固之意志，始能实现高尚之理想，养成善良之习惯，造就纯正之品性”。“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临难毋苟免，见危授命，乃意志之强，同于良心之强之状态也。古来殉道者，宁死而其志不可夺；反对之者，但能残虐其身体，不能羁束其灵魂。其志事虽暂挫于一时，而前仆后继，世界卒大受其影响。”

因此，他要求学生树立奋发向上的人生观。他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

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争做一个公正、有道德、有益于社会的人。他认为，为人一定要有理想，要研究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人便很庸俗。他强调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自己的利益，但绝不能牺牲自己信仰的主义，他说：“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

杨昌济的这些见解，给毛泽东以很大影响。他在听课笔记里写下了自己的感想：“理想者，事实之母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动，皆期合此理想）”；“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手，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事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这表明他受老师的影响开始懂得“高尚理想”对于人生的重要意义，并已经作好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不惜奋勇献身的精神准备。他在1917年8月给老师黎锦熙的书信中，进一步抒发了他确立探索“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这些大本大源作为自己奋斗目标的宏图大志：“志者，吾有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谓也。”“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羨其成功，盲从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这算不上真正立志。“真能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学、伦理学，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再择其合于此鹄之事，尽力为之，以为达到之方，始为之有志也！如此之志，始为真志。”此志岂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贵我以及个体自身的修养和自觉，是杨昌济思想体系的基点。他在《达化斋日记》中写道：“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既然“天地万物，以吾为主”，那么这个“吾”的素质就至关重要了。因此，杨昌济极为看重个人的人格修养和修身，并将仁、义、礼、智、信、恕、诚、忠、敬、静等作为自己的道德行为准则。

他认为，待人以诚，律己从严，是修身之本。他在日记中将这种人生态度概括为：“余生平待人有五字：一曰恕，犯而不校，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二曰介，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观；三曰敬，无众寡，无小大，无简慢；四曰浑（亦可曰下），沉默寡言，不议论人长短，不轻发意见；五曰诚，言而有信，无宿诺，久要不忘平生之意。此五字可配仁义礼智信五字”。他还说：“待人处事，一当出以至诚，然而得圣贤之正，而行之邦家无冤”。

他主张做事要有毅力，并深谋远虑，认为这是自身涵养的必备功夫。他常教育学生：“吾无过人者，惟于坚韧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韧之力何如耳。”为了激发学生树立坚韧不拔之志，他从宋代唯物论者、天文学家张载的《西铭》、明末学者吕坤的《呻吟语》等书中找出材料施教，还以达尔文著《物种起源》、司

毛泽东致黎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杨昌济：《达化斋日记》。

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之重要性。在做事方面，他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神注之，始能成功而不至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益。”“凡办事有一定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在讲解这些主张时，举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己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在生活作风上，他主张严谨刻苦。在言行方面，他坚持静坐、默思，不说谎话，不涉狎邪等；在生活磨练方面，他做事勤恳，崇尚劳动，衣食菲薄，珍惜时间，废止朝食，冷水沐浴，长途步行，以及反对无谓应酬等等。这些在学生们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争相效仿。据毛泽东在一师的同学周世钊回忆：当时有的同学喜欢在寝室里谈论个人和家庭生活琐事，有的同学喜欢谈论男女之间的事，还有的同学在言谈中羡慕升官发财的人。针对这种现象，毛泽东和同学订下“君子协定”，相约做到“三不谈”，即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否则就不能做朋友。有一次毛泽东到一个朋友家里做客，原来约定是要讨论社会问题的，不料这个朋友却侈谈生活琐事，并当着毛泽东的面把佣人叫来，为买一点肉的小事仔细吩咐了半天。毛泽东对这件事很生气，认为这样的人不配做他的朋友，以后便不同这个人往来了。在他看来，国家民族的危急是如此严重，青年肩上的责任是如此重大，求学求知的需要又是如此迫切，哪有闲情逸志谈论那些低级趣味的东西呢？他说：“我的朋友和我只乐意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罗学瓚在一首诗中描述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的这种高尚情趣。“……开怀天下事，不谈家与身。登高翘首望，万物杂然存。光芒垂万丈，何畏鬼妖精。奋我匣中剑，斩此妖孽根。立志在匡时，欲为国之英。”及至后来，毛泽东更加重视生活作风同进步事业的关系，在成立新民学会时他特地建议就生活作风提出会员必须遵守的五条纪律，即“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以此保证会员的政治素质，做到“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

“格物致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古代读书人奉行的一条出仕入世之道，杨昌济自然地跳不出这个儒家政治文化的框架。所不同的是，他不把修身本身当目的，也不为步入仕途而修身，目的在于实践于社会。因此，他极力推崇王船山、顾炎武、谭嗣同和曾国藩，主张知而行之，注重实践，“贵我”在于“通今”。他反复强调：“学者之所以自处，一在贵我，一在通令。无论何种之社会，莫不有公众承认之法则。”何为通今？他解释说：“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自觉与活动乃不可相离者也。无活动则无自觉，故实行尚焉。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博学、深思皆可指导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力行为目的，而博学、深思为方法。博学而不行，何贵于学？深思而不行，何贵于思？能力行，则博学、深思皆为力行之用；不能力行，则博学、深思亦徒劳而已矣。”从这种观点出发，杨昌济十分重视实践，反对学生闭门读书，

《毛泽东 1936 年同斯的谈话》，第 29 页。

《告学生》，《国民》第一卷第 1 号。

学用脱

节。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实践于社会的“力行”，表现在躬行实践的杨昌济身上，便是积极投身于改造社会的潮流中去。正因为如此他才发出“江山孰主持”的济世感叹，不惜远涉重洋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倡导“改革思想，提倡真理”，“不当迎合恶社会，当创造新社会”——即“创造—德莫克拉西的新社会——没有一切阶级、一切竞争的自由、平等、和平、幸福的新社会”，并为此而奔走呼号。当他的政治抱负在腐朽社会制度下难以施展时，他最后选择的人生之路则是以修身为本，以教育为天职，通过培育长天之材，达到治国的目的。杨昌济的这种榜样，对毛泽东科学世界观的形成无疑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伟人的毛泽东就像他的老师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知行统一，言行一致，躬行实践的范例。

在读书治学的方法上，杨昌济着重于博与精两个方面，可以用“贯通古今，融合中西”八个字来加以概括。毛泽东读书之博勤，以及专心研究问题的精神，在读书笔记中旁征博引，食必求化的方法，这都是向杨先生师法的。杨昌济虽然出洋留学十载，但不同于那些盲目崇拜西洋、东洋的留学生，他十分重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强调学习外国要结合中国的民情、国情。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虽然倡导学习西方的各种思想和制度，深入利用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又要求学生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遗产。在他看来，向西方学习的益处，不是以一种新的文化来整个地取代中国的文化，而是借以推动中国古老的文化恢复活力。他曾在1914年10月发表在《公言》杂志第一卷第一期上，题为《劝学篇》的文章中阐述过这一思想和主张：“夫一国有一国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一国之文明，不能全体移植于他国。国家为一有机体，犹人身之为一有机体也，非如机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装置之也。拆卸之则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体之状态；善治国者，必审国家之特异情形。吾人求学海外，欲归国而致之于用，不可不就吾国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当因，何者当革，何者宜取，何者宜舍，了然于心，确有把握，而后可以适合本国之情形，而善应宇宙之大势。”学习外国，必须结合国情，要有批判的精神，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中具有这种辩证思想的人，是非常少见的。杨昌济能超越时空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中西学关系问题的真知的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杨先生所“心赏”的毛泽东、蔡和森等，当时不仅接受了老师的这些思想观点，而且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日后，在毛泽东成为新中国最高领导人，执掌国家内政外交权柄的过程中，这些思想无不在诸多治国方略中得到体现，许多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从而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治学方法上，杨昌济还非常重视自学。他当时同时兼任三四所学校的课程，教学任务十分繁忙，但仍抓紧时间刻苦自学，并能坚持不懈，他天天写日记或读书笔记，几十年如一日，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出了表率。以老师为榜样，毛泽东订立了严格的自修计划，大量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用自习时间阅读的……

以自己的全部人格，以坚强的道德信念和良好的道德习惯直接影响学

生，收到潜移默化的教育功效，是杨昌济成功的、也是非凡之处。如果说，在教育人、培养人的过程中，教师的人格对学生有着直接的影响，教育的力量往往只有从人的个性这活主生的源泉中才能喷涌而出的话，那么，杨昌济确是一位言行相顾，表里如一，以师示范，言传身教的良师。

105 从“身心并完”，到“三育并举”

在一师读书期间，毛泽东从杨昌济这里所获裨益，不只是品行和学识上的，还有身体上的——老师不仅教他修身养性，还教他强身健体。

杨昌济在教学当中，一贯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身心并完”。他认为，一个好学生不仅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丰富的文化知识，还要有强健的体魄，这样才能在将来担当起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就是，只有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才能任重致远。因而，他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加强体格和意志锤炼的教育，要求学生“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刻苦顽强地坚持体育锻炼，不断增强体质。

杨昌济不但是体育运动的热心倡导者，而且是一位体育活动的实践者。他长期以来坚持静坐、冷水浴、废止朝食、长途步行等体育锻炼方法，并收到健身养生的功效。他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学生，积极指导实行，以此推进学校体育活动的开展。

毛泽东在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到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他十二岁那年，害了一场病，人变得十分瘦弱。后来辍学在家，从事两年多的体力劳动，他上山砍柴，挑粪下贩，异常辛苦，不料身体反倒日见强壮起来。这种亲身体验使他明白一个道理：人的身体全在于锻炼。以后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和知识的日渐丰富，熟读史书的他，看到历代名贤都很看重身体的锻炼和意志的磨砺。孔子重视体育，“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墙堵焉”；孟子奉行皮肤哲学：“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李刚提倡“主文而兼武”；颜习斋推崇“文武缺一岂道乎”；顾炎武力行“以动养生”，年迈而漫游天下。而颜回、贾谊、王勃、卢照邻诸人，虽有才华，却都短了命，皆因身体不健之故。身之不存，德与智也就毁了……出于对前贤的效法，他对身体锻炼也日益重视。进入一师后，由于良师的熏陶，已开始确立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毛泽东，受强烈使命感的驱动，对体育的作用看得更清，在认识上又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感到如果一个人身体不好，则学问道德的进修都有困难；一旦身体不存，德智则随之而隳。不把身体锻炼结实，就不配谈救国救民。所以，他认为体育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平均发达，不仅要强筋骨，还要强意志；不仅在于养生，还在于卫国。为了能够实现生平的抱负和志向，将来承担起挽救中华民族危亡，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重任，一定要像杨先生所要求的那样，努力学习、刻苦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具有远大理想、高深学问和健壮体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

从此，毛泽东自觉地成为一名体育活动的爱好者和全校最顽强的锻炼者。正如他后来所说：“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寒假里，我们徒步穿过田野，上山下山，绕行城墙，渡过江河。碰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衫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脱掉衬衫，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大声叫嚷，说这是一种叫做‘风浴’的新体育项目，在已经下雪的日子里，我们露天睡觉，甚至于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锻炼身体’的名义下进行的……”

毛泽东参加的锻炼项目很多，根据他的回忆，主要有远足，爬山，冷水浴及雨浴、日光浴、风浴，露宿，游泳，六段操运动，等等。

远足，即长途步行，是杨昌济所喜爱的健身方法，它也是毛泽东最感兴趣的锻炼项目之一。毛泽东认为，这些活动既可以了解沿途的风土人情和百姓生活状况，又可以培养身体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情。因此，他经常与同学一道长途跋涉到郊外农村旅游。1916年和1917年的两个暑假，他曾借修学旅行的机会，徒步考察了数县农村。而在后一次从农村考察归来后不久，毛泽东又偕同学张昆弟、彭则厚等人步行五十多里，去游览湘潭昭山。张昆弟对这次远足，在自己的日记中作了生动的描述：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六日。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同至■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意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话，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话，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小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毛君云，西人物质文明极盛，遂为衣食住三者所拘，徒供肉之发达已耳。若人生仅此衣食住三者而已足，是人生太无价值。又云。吾辈必想一最容易之方法，以解决经济问题，而后求遂吾人理想之世界主义。又云，人之心力与体力合行一事，事未有难成者。……夜深始睡。”

登山和露宿，是毛泽东经常从事的体育活动，与一师隔江遥望的岳麓山，古树参天，挺拔秀丽，林木蔚茂，层峦叠翠，山上留下了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无数的足迹。每当深秋季节，枫叶经霜之后，岳麓山“漫山红遍，层林尽染”，这便是毛泽东和同学们爬山的最好时节。他们在登岳麓山之前，一般不吃早饭，只带些“结蚕豆”。毛泽东说，这种蚕豆吃起来硬，不仅可以饱肚，还可以锻炼肠胃的消化功能。爬上山顶后，他们便找块地方坐下，交谈起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张昆弟在1917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同蔡毛两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山下，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慨。”

除岳麓山外，第一师范附近几乎所有的山，毛泽东都去攀登过。有一个毛泽东一师的同班同学，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秋季的星期天，毛泽东同志在自习室看了一阵书，觉得有些疲倦，起身走到我的座位边，邀我同去爬山。我随他走出校门，连走带跑，一气爬上离学校两里外的金盘岭。我们站在山顶上，眺望长沙近郊的初秋景色，又坐在树下石头上谈了一会，才慢慢地下山回校。在路上毛泽东同志很有感触地告诉我：我们爬得高，就看得远。有一天我要爬上阿尔泰山，喜马拉雅山……”

毛泽东还通过野外露宿来锻炼身体和胆量。他经常邀集一些同学到学校

后山的君山亭，湘江中的桔子洲头和岳麓山的云麓宫、白鹤泉、爱晚亭等处露宿。当夜幕降临，游人尽散之时，同学们围坐在一起谈人生、谈国家和民族的前途，相互交流学习心得，直至夜深人静时，大家才各自散开，相隔一定距离露宿到天明。这种露宿活动，他们每年一直坚持到霜降的日子。

冷水浴是杨昌济天天坚持的锻炼项目，得到一师许多学生的效仿，毛泽东就是最坚决的仿行者。毛泽东进行冷水浴是从1915年暑期开始的，当时毛泽东在“李氏芋园”自学和补课，看到杨先生每天都要冷水浴二次，便向老师学习。杨昌济告诉毛泽东锻炼的要领：冷水浴一定要从夏天开始，经过不断地反复练习，使皮肤逐渐经受冷水的刺激，那么就是到了天气很冷的时候，也能够坚持下去。从此以后，他按照杨昌济教给的方法，长期坚持不懈的锻炼。每天天蒙蒙亮，同学们还在酣睡的时候，毛泽东便一个人悄悄来到学校东北隅浴室旁的一眼水井边，穿一条裤衩，吊上一桶又一桶冰凉浸骨的井水往身上浇，然后用浴巾摩擦全身。就这样淋了擦，擦了又淋，一直到全身皮肤发红发热为止。时令由夏到秋，由秋到冬，他进行冷水浴的锻炼从未间断过，即使在寒风凛冽、滴水成冰的隆冬日子里，他仍天天坚持，从来没有挂过一次“免战牌”。同学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冷水浴既能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强壮筋骨；还可以锻炼意志，培养勇猛无畏的气魄和战胜困难的精神。有人问他为什么能坚持不辍，他答道：“只要有决心和毅力，就能坚持到最后。”

毛泽东进行冷水浴的习惯，一直保持了许多年。建国以后，他的年岁大了，不能做冷水浴，但每天洗澡仍然坚持不用热水，只用微温热水。他对这种淋浴方法很满意，曾向要好的朋友介绍说：“冷水浴对锻炼身体的确有很好的效果。我虽然因年纪大，不能正式搞冷水浴，但每天洗澡不用热水，只在冷水中加一点热水，使水达到微温的程度，也不坐在浴盆中去洗，只用水淋到身上，再用毛巾用力擦洗。我觉得这样洗澡比一般洗澡的办法好得多，一般洗澡的办法只有清洁的作用，我这样洗澡的办法，除有清洁作用外，还有锻炼身体的作用。”他还满腔豪气地说：“一个经常注意锻炼身体的人，更不会被风雪的寒威所吓倒。我过去练习过冷水浴，现在年纪虽然大了，冬天也还可以不用热水洗澡，小小的寒冻也还经得住。”

风浴、雨浴、日光浴，这是毛泽东通过冷水浴的体验，自己独创的体育锻炼方法，这些在常人看来是不可理解的行动，他却进行得十分认真。夏天烈日当空，他打着赤膊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游泳后，也要躺在沙滩上让太阳暴晒。他把这叫“日光浴”。冬天，大雪纷飞，寒风刺骨，他跑到空旷的地方脱去棉衣，迎风搏雪，说是“风浴”、“雪浴”。狂风暴雨时，他常一个人在操场上脱掉衬衣、长裤，让瓢泼大雨淋个痛快，还逆风大声呼喊，说是“天雨浴”。有一次，在一个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的夜晚，他独自一人，抗风斗雨登上岳麓山峰，然后又从山上跑下来，全身湿淋淋地来到好友蔡和森的家中。蔡母问他是怎么回事，他笑着说，是为了体验《诗经》里“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这句话的意境，并借以考验一下自己的身体和胆量。

“六段操”运动，是毛泽东融各种运动之长，在实践中创造的一套健身体操，它包括手、足、头部、躯干、拳击与跳跃等动作，共六段二十七节。

这种运动能够活动全身各种器官，既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又不需要任何器械，简单易行，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毛泽东很喜欢这种运动，每天早晨做完冷水浴后，他就要做一遍“六段操”，临睡前再做一次。天天如此，终年不绝。

游泳，是毛泽东最喜爱、也最擅长的体育活动项目。

毛泽东幼时就常在家乡南岸塘扑腾翻滚，练就一身好水性。到一师范后，学校前面的湘江，水面宽阔，更是他畅泳的好场所。他经常邀集爱好游泳的蔡和森、罗学瓚、陈绍林等同学，到南湖港或桔子洲头去游泳。毛泽东的泳技好，胆量大，耐心强，不仅能自如地横渡湘江，还能从猴子石泳到十多华里远的牌楼口；不仅在夏日游，还冒着北风呼啸的严寒，毅然去江中游泳。

关于毛泽东和同学们游泳的事，罗学瓚和张昆弟在日记中多有记载。罗学瓚在1917年9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往水陆洲游泳，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冷。余等全行不顾，下水亦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力气，不得不谓运动中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同年9月23日张昆弟日记记载：“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夜谈颇久。”

毛泽东不仅自己酷爱游泳，他还发动同窗好友都参加游泳活动。1918年3月，上海《教育》杂志主编、著名教育家李石岑来长沙讲学。当时担任学友会总务兼教育研究部部长的毛泽东，闻知李在留学日本时就以善于游泳著称，就趁他来一师参观之际，特地请他到湘江中向同学们传授游泳技术。那时还穿着棉衣，李石岑带头示范，毛泽东一行也跟着下水，游了四十分钟。这次活动，对增进同学们的游泳兴趣，提高游泳技术，都有很大帮助，一师群众性的游泳活动蓬勃开展起来。据一师校志记载，在毛泽东主持学友会期间，仅正式参加游泳部的学生就多达八十余人。

对这种莘莘学子藐视大自然、一同征服大江大河的壮观情景，毛泽东在他的诗作中曾有过生动写照：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他还充满激情地写道：“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对于游泳活动的兴趣，毛泽东毕生丝毫未减。建国后，毛泽东多次在江河湖海畅游。1958年1月上旬，六十五岁的他到南宁邕江中冬泳30分钟，游程一千多米。他曾数次横渡长江，“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1966年7月16日，七十三岁高龄的他又一次横渡长江，历时七十五分钟，游程三十华里，创造了全世界政治首脑业余体育活动的“吉尼斯”纪录。毛泽东这超人的意志力和精湛的游泳技术，令当时的苏领导人赫鲁晓夫瞠目结舌。赫氏处处抨击、贬低毛泽东，但他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自己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毛泽东不仅自己畅游江河，还号召全国人民说：“游泳是同大自然斗争的运动，你们应当到大江大海中去锻炼。”“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还诙谐幽默地说：“长江，别人都说很大，其实，大，并不可怕。美帝国主义不是很大吗？”

见《体育报》，1978年12月20日，第一版。

见1966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我们顶了他一下，也没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东西，其实并不可怕。”

若干年后，毛泽东对自己师法杨昌济，强身砺志所获得的身心益处，仍然念念不忘。他对一位国际友人说，各种体育锻炼：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经过数年的体育锻炼，毛泽东感到自己受益不浅——他正朝着“身心并完”的方向发展。但是，正在探求宇宙之大本大源的毛泽东，精神上并不觉得轻松和心安理得，他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现状：整个教育制度存在着德智体三育脱节、“偏于智而略于体”的弊病和“精神身体不能并完”的谬误，学校教育把体育当作“杂科之末”，极不重视体育锻炼。从一师的情况看，校方虽然注意体育工作，但存在“锦标主义”，单纯追求运动成绩，没有做到面向全体学生、以增强学生体质为目的，以致许多学生的体质极度虚弱，有的人甚至被繁重的课程压跨了。1917年，仅毛泽东这个班便有七名同学不幸染疾身亡，这令他非常伤心。在学友会主持的追悼会上，毛泽东特意写了一副平白如话的挽联：“为何死了七个同学，只因不习十分间操”，以此尖锐批评学校当局对于体育徒重形式、不讲实效的弊端，同时也在于唤醒全校师生吸取死读书、读书死、读死书的惨痛教训，提高对体育锻炼的自觉性。

这以后，毛泽东一直思索着怎样才能变革现行教育制度的问题，以使学校教育真正做到“三育并举”，进而达到不仅个人“身心并完”、整个民族亦应，身心并完”的理想境界。

于是，他产生了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著述的念头，以阐明自己■

过多年实践总结出的教育思想。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老师杨昌济，受到杨先生的赞成。杨昌济还和他一起专门讨论了文章的体裁、结构和选材等技巧方面的问题，指导他拓宽思路、放开手脚，结合所学过的修身、教育学、心理学、生理学等方面的知识，以及古今中外名人名言和历史故事，写好这篇文章。在老师的鼓励和支持下，毛泽东花了几天时间，写就了一篇长达七千余字、题为《体育之研究》的文章，经杨昌济加工润色后，推荐给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陈独秀，于1917年4月1日发表在由陈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三卷二号上。

毛泽东这篇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的署名文章，共分八节，前面还有一个导语。这是一篇理论联系实际，很有新观点、新创见的文章。

导语表达了他对国家不重视体育的现象极为忧虑的心情，说明撰写此文的意图，旨在唤起人们自觉地重视体育，以达到强身体、振国力的目的。他开宗明义地写道：

“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1975年9月5日毛泽东横渡长江时的谈话。

《西行漫记》第123~124页。

见《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1日。本节以下引文均同出于此。文中着重点，原文如此，下同。

文章接着谈了八个方面。第一，释体育；第二，体育在吾人之位置；第三，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第四，体育之效；第五，不好运动之原因；第六，运动之方法贵少；第七，运动应注意之项；第八，运动一得之商榷。这八部分内容可归结为三个大的方面：其一，体育的内涵、地位和作用；其二，当前体育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其三，体育运动的方法及应注意的事项。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十分出色的文章，它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的理论成果，它的历史价值不独是学术上，还在于思想观念上的。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改造国民性是自康梁以来文人学者奔走呼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如何改造国民性问题亦是“五四”运动前后思想家探索的焦点之一。鲁迅以深刻的自我解剖和对人类劣根性的剖析，让人性中一切丑恶的、鄙陋的、愚昧的东西，生动形象地摆在人们的面前，让人们去沉思，在沉思中惊醒。他这走的是一条思想改造的道路。胡适等人则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走全盘西化的路子。毛泽东呢？作为一个远离新文化运动中心的湖南青年学生，他却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即从呼吁国人对体育的重视上着手，以改变国民的体质和精神面貌。应该承认，与鲁迅、胡适等人相比，毛泽东那时不过是一无名小卒。但他探索问题的角度，却是独特而又切实的，富有自己的特色。《体育之研究》固然是一篇研究体育运动的专著，但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篇体育论文是远远不够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早年毛泽东思想的写照，它与《伦理学原理》上的批注共同构成了毛泽东的思想框架。从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尚动、尚变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和尚实事、不尚空谈，一切唯实求的思想风格。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毛泽东日后的生活道路——它促使毛泽东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广大人民群众解放，从每一件实事做起，由小到大，由近至远，长期坚持，终生奋斗，直达最终目的。

另外，从这篇文章中反映出来的“三育并举”的教育思想，是一个有志学生对当时现行教育深刻体察的结果，也是他自身成材的经验之谈，它成为毛泽东以后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雏型。半个世纪以后，已成为新中国领导人的毛泽东，发出了那个当代教育史上著名的《“五·七”指示》，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他早期的教育思想：“我们的教育方针，应当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然而，值得提请人们注意的是，当年作为青年学生的毛泽东，他上述这一切思想框架的构造和产生，绝非偶然的。在他的身后，有一位比较高明的设计师，此人就是杨昌济先生。无论是他的行为规范，还是他的思想规范，都深深留下这位老师的痕迹。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这是一个春光明媚、草木生辉的日子。和煦的春风，吹动着清澈的湘水，掀起一层层碧波；江岸上芊绵的绿草，在阳光的照耀下，舒展着娇嫩的叶片。岳麓山上，青枫翠柏，郁郁葱葱；杜鹃盛开，花红似火。岳麓山■湾市蔡和森的家——洩痴寄庐，聚集着十多位青年学生，他们正在这里举行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

新民学会的成立，经历了一个较长的酝酿过程，关于它发起的原因和经过，毛泽东在他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有过颇为周详的叙述：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为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从毛泽东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新民学会的成立与杨昌济关系紧密——它发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经常“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深受老师“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影响……

在几年的师范求学过程中，毛泽东置身省城长沙，亲眼看到了“洋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看到了军阀、官僚和财主们的横行霸道，更看到了穷苦人在死亡线上挣扎和呻吟……面对这一切，青年毛泽东的心，一刻也无法宁静，他不能不常常思考和求索改变社会现实、解除人民痛苦的途径及方法。

就在这个时候，国内民主革命运动正悄悄兴起。1915年9月，也就是毛泽东在一师掀起“学潮”之后不久，提倡新文化、宣传新思想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了，它冲破军阀的文化封锁，传到了三湘大地，也传到了湖南亚高学府第一师范，唤醒着许多正在沉睡的人们。《新青年》问世，受到杨昌济的热情欢迎。几乎从她创刊之日起，他就是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和坚决的支持者。他除了自己认真阅读外，还积极向朋友和学会推荐。他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读者和宣传者，还自己出钱买了一批，分赠给他的一些得意门生，毛泽东就是他赠送《新青年》的学生之一。为了将一师的进步学生聚集在《新青年》周围，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杨昌济不仅热心向学生推介它，还鼓励学生向它积极投稿，如毛泽东署名以“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

一文，便是在他的鼓舞、支持和推荐下，才得以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的。与此同时，杨昌济自己也积极给《新青年》撰文，先后在该刊发表了《治生篇》、《结婚论》等论著和译文，以自己的新思想和新见解影响学生。毛泽东从老师杨昌济那里阅读了《新青年》以后，头脑受到了新思潮的猛烈冲击，观念发生了激剧的变化，他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就必须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日趋激进，认为“现在国情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理论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罗网，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所以，他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又赞同“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这些都成为毛泽东后来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所说的考虑“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问题的发端，也是后来成立新民学会的最初思想动因。

这期间，杨昌济不仅影响毛泽东去接受《新青年》的思想主张，还引导他去接近另一个团体——船山学社，或称王夫之研究学会。这是由长沙一批杰出的文人学士建立的，几乎和《新青年》同时出现。满清征服中原后，有许多文人学士拒绝为异族统治者效力，王夫之便是其中最激进的一个船山学社社员，从研究王夫之入手，试图从这位十七世纪初湖南大学者的著作中寻找鼓舞力量，以求在保持中国固有传统的前提下使国家达到复兴。这些人批判朱熹和宋明理学家著作中的唯心主义邪说，认为宋明理学使文人脱离实际，闭门修养，以幻想代替实践，导致民族丧失独立。他们还强调尚武精神，这种主张虽然不是与经书直接对立，但同传统观点格格不入。在杨昌济的建议和支持下，毛泽东曾出席船山学社的会议，参与学会的大量活动。这些活动培养了他的集体意识，为他从事有组织的活动作了经验上的积累和准备，使他产生了集结同志、组织社团的愿望。

到这时为止，毛泽东的思想脉络已清晰明了：要建功立业、匡世救民，就必须改造国家和社会。但要彻底改造中国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三年五载便能完成，更不是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除了本身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之外，一定要联合许多志同道合的人，结成一个坚强有力的团体。这样，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定不移地长期奋斗，方能有所成效。

毛泽东爱交朋友，他在进入一师以后，就在同学当中结交了一些好朋友，其中包括蔡和森、张昆弟、陈昌、罗学瓚、萧子升、萧子璋兄弟等人。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家境比较贫寒，有的自己从事过劳动，城市和乡村小资产阶级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情景，他们都是耳闻目睹的，因而经常聚集在杨昌济等先生周围研究治学做人的道理，讨论个人和国家的前途等问题。但是，自从有了明确的志向以后，毛泽东深感自己身边的朋友还是太少了，活动范围也嫌狭窄了。可是，怎样才能找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呢？到哪里去找呢？这是他一直萦怀的事。光靠在一师找，自然不行；光在一个长沙城找，也还不行。必定要由近及远，在一师打，在长沙找，在湖南打，在全国找。同志

萧子升：《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

找得越多越好，朋友越多，团体就结得越大，从而力量也就越雄厚。毛泽东左思右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做法——征友。

度过 1915 年的暑假后，毛泽东向长沙各学校发出了一则《征友启事》。启事是他自己刻写油印的。只有几百字，内容大意是：愿意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结为朋友，愿意和那些不怕艰苦，不怕困难，能够为国为民献身的志士通信联络。启事最后借用《诗经》之句：“愿效嚶鸣之求，步将伯之呼”，以表示迫切求友的心情。启事的署名为“二十八画生”，是他姓名的书写笔划数。启事特别注明：“请张贴在大家看得见的地方”。

这个“征友启事”不仅寄往长沙各个学校，而且在长沙的几个城门口都张贴了，还在报纸上也登了出来。但是，当时一般人很难理解毛泽东的这一举动。一些头脑守旧的校长，甚至觉得“二十八画生”一定是个怪人，征友是不怀好意，于是将启事没收，不让张贴。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马校长，竟然以为这个启事是为了找女学生谈恋爱。他按照启事上的通信处到一师附小找到毛泽东委托的联系人陈章甫，又去找一师校长武绍程，打听发启事的究竟是个什么人。从他们这里，马校长才是知“二十八画生”真名叫毛泽东，是个品学兼优、深受师生称道的好学生，征友是为了共同寻求真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这样，才消除了马校长的疑虑，使之放下心来。

启事发出之后，毛泽东以急切的心情等待着回音。过了些日子，他终于收到了五六个人表示愿意相互交往的来信，其中有后来成为著名人物的罗章龙和李立三。罗章龙在他的《椿园载记》中，对他响应毛泽东的《征友启事》、两人相识相交的过程，有过一段回忆：

有一天，罗章龙到司马里省立第一中学访友，于该校会客室门外墙端，偶见署名“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一则。罗出于好奇心，伫足浏览，见启事内容为求志同道合的朋友，其文情真挚，辞复典丽可诵，书法挺秀，看后颇为感动。返校后，罗立作一书应之，署名纵宇一郎。大约过了两三天后便收到了回信，其大意是：接大示，空谷足音，跫然色喜，愿趋前晤教云云。于是，双方约定于下星期日到定王台湖南省立图书馆见面。是日，适逢久雨初晴，丽日行空，空气清新宜人，罗章龙偕同学陈圣皋欣然前往定王台，见到了“仪表端庄，气宇轩昂”的毛泽东。他们一见如故，从上午九时一直交谈到图书馆午休为止。此后，每遇周末，毛泽东和罗章龙经常约定到天心阁、城南书院、长郡中学、韩玄墓、板仓杨寓等处晤谈，或到部外云麓宫、自卑亭、水陆洲、猴子石、东南渡等处游览。对湖南的历史名胜古迹，如楚国屈原的故居玉笥山，汉朝贾太傅祠，岳麓山上的崇德寺（唐朝诗人杜甫流浪时曾在此寺住过），长沙的飞虎营（南宋文学家辛弃疾将军在长沙练兵的地方），以及王夫之的家乡等地，他们都同去访问、凭悼过。坦率的交谈和深入的接触，使他们成了好朋友。后来，罗章龙也成为新民学会的基本会员……

通过几年的努力，在毛泽东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主要有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萧子璋、罗章龙等十几个人。他们多数是一师和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也有的是长沙各中小学的青年教师。这是一群朝气蓬勃、富有理想的人，是一群积极进取，“真心求学，实意做事”的人。他们大多来自乡村，深知民间疾苦，和劳苦大众有着较深的感情，他们没有公子少爷的奢靡浮夸作风，也少有某些读书人的那种“书生意气”；他们勇于反抗旧世界，热心追求新思想，努力树立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满怀着为改造国家、改造社会而奋发图强的豪情壮志。正

如毛泽东后来对斯诺所说的，“我逐渐地在自己周围团结了一批学生，……他们人数不多，但都是思想上很认真的人，不屑于议论琐事。他们所做和所说的每一件事，都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认为时局是如此危急，求知的需要是如此迫切，没有时间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的朋友们和我只乐于谈论大事——人的性质，人类社会的性质，中国的性质，世界，宇宙！”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经常保持聚会。岳麓山下蔡和森的家里和萧子升任教的楚怡小学教师宿舍，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是他们讨论的中心议题。经过严肃认真的反复讨论，大家达成一种共识：个人的品行要改造，学问要进取，国内的新思想、新文化已经发展起来了，再过静的生活和孤独的生活是不对的，应该追求一种动的生活和团体的生活。最后，毛泽东根据大家酝酿形成的“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这一结果，提议组织一种严密的团体，成立一个学会。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蔡和森当即提出了会名，他根据《礼记·大学》篇中“在新民”和《书经·汤浩》篇中“作新民”的意思以及谭嗣同、梁启超倡导过的“新民之道”，认为“新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用这个名称最能代表时代精神和大家的意愿。大家听了他的解释以后，都觉得很很有意思，都同意将团体名称定为“新民学会”。这样，水到渠成，新民学会就应运而生了！于是，便出现了本节开头描述的那一幕——举行新民学会成立大会。

据《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的记载和当事者的回忆，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十四人，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罗章龙、张昆弟、李维汉、萧子璋、陈绍林、邹鼎丞、叶瑞玲、邹蕴真、陈书农、周名弟等。还有八人因故未到会，但也是基本会员，他们是陈昌、罗学瓚、周世钊、熊瑾玎、熊光楚、傅昌钰、曾以鲁等。所以，新民学会的最初会员是二十二人。

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由毛泽东主持的。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毛泽东和邹鼎丞共同起草的学会章程。会章采“大学之道在新民”之意，正式确定学会的名称为“新民学会”，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规定，会员必须遵守五条纪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鉴于学会的部分会员即将毕业，各有所归，为便于了解外出会员情况，以利于团体的活动，会章还规定了会员的义务：“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理，以资互益”。此外，章程还对学会的组织机构、会务活动、会址、会费及新会员入会手续等一一作了明确的规定。

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发展会员问题。毛泽东认为：人要多，力量才会大，所以会员应该多发展；但会员的标准应严格要求，不能降低，一定要品格好、志向好、学问好，确有向上要求的青年，我们才欢迎他入会。对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

会议最后举行了选举，会员们首行推选毛泽东为评议会的总干事，他谦辞了；最后由萧子升任总干事，毛泽东和陈书农为干事。不久，由于萧子升赴法勤工俭学，所以新民学会的会务，实际上一一直是由毛泽东负责主持的。从此，新民学会这个组织严密、富有希望和生命力的团体，便在毛泽东等的

组织和领导下，以战斗的姿态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新民学会是一些愿为救国救民而求索的青年知识分子集合而成的进步团体，它一开始就以不凡的组织活动能力，显露出勃勃生机。它成功地组织了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便是生动的一例。新民学会成立以后，遇到第一个具体问题，就是会员的出路问题。大家都从学校毕业后，向何处去呢？毛泽东主张，新民学会的会员应该立志“向外发展”，“各方面的阵地都要打开”，各方面都要派人去打先锋。他在给同学陶毅的信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方面。”当时，全国正在掀起一个赴法勤工俭学的浪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主张与设想，新民学会便决定也投入到这一潮流中去，组织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后来，经过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北京数月的奔忙筹备，第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一百多名湖南青年，于1919年3月去了法国。

1920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来信，提出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指导方针。毛泽东接信后非常高兴，他立即回信说：“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为了统一国内会员对学会方针的认识，毛泽东于1921年在长沙主持召开了新年大会，根据他的提议，会员们反复进行了认真讨论，一致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指导方针。学会宗旨的重新确立，标志着它已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开始朝着建设一个“高尚纯粹、勇猛精进”的革命团体的方向发展。

新民学会的会员，以后发展到七八十人，分布在国内外许多地方。国内如长沙、北京、上海、汉口、南京；国外如法国、日本、南洋等地。他们或求学，或做事，大家精神振奋，努力上进。它的基本会员，大都在“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革命实践中，逐渐锻炼成为勇猛精进的无畏战士，“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如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瓚、向警予等革命先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成立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学生时代最重要的社会活动，是他在一师求学时的一大“杰作”，也是他开始革命实践的第一步。这一重大举措，对于毛泽东的一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通过新民学会，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集合在自己的周围，这些人都是一师的精英，又是湘中的人杰。他们和毛泽东一样，具有许多非凡的特点。他们所具有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好学深思、追求真理的坚强毅力，冲破罗网、勇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蔑视旧制度、旧道德和一切权贵的革命气魄，豪迈无私的个人品德，以及深湛的新旧学识和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都是同毛泽东一样师承杨昌济等良师的。他们早年是毛泽东砥砺品行、切磋学术的同窗学友，又是后来从事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他们毕生追随毛泽东，并为他创建的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赤诚，直至热血和生命……因之，如果我们撇开成立新民学会的政治意义不讲，单就毛泽东的个人成长而言，它不啻于是他通向成功的基石与阶梯。

然而，当今天人们探讨和评估新民学会在毛泽东人生历程的意义与作用时，笔者想特别提醒的是，在这件足以让青年毛泽东引以为自豪的创举中，

我们千万不应当忽略他的老师杨昌济。

新民学会的成立，固然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社会根源，但与杨昌济的巨大影响是分不开的。从新民学会成立的时间看，它是“五四”时期成立最早的团体。“五四”前后，全国各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但大多是在运动以后成立的。而新民学会却是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就成立了，并早在1915年就开始酝酿了。这一点绝不是偶然的，它与杨昌济有密切的关系。新民学会从酝酿到成立，即从1915年到1918年春，正是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期间，作为老师，他不仅热情地向毛泽东这群青年学生介绍和传播西方各种流派的政治学说、哲学思想和伦理观念，而且传授了大量中国古典学术思想和历史知识。同时，他和他们一道严肃地讨论当前的时事政治，热情地向他们推荐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鼓励他们积极参加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和学风，练就强健的体魄。新民学会成立时的二十二个“基本会员”，除了罗章龙是第一联合中学的学生外，其余二十一人，都是一师的学生，都曾或长或短地“与闻”过杨昌济的“绪论”。罗章龙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与毛泽东建立密切联系以后，也经常去“板仓杨”寓聆教。这样，当“一种奋斗和向上的人生观”在这群学子的头脑中树立起来以后，结成进步团体的条件已经成熟，“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另外，从新民学会的章程看，它确定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之宗旨，和“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纪律，正是和杨昌济关于“修身”和伦理道德一贯主张相吻合的。这是新民学会成为组织严密、会风扎实、战斗力很强的革命团体的可靠保证。再则，新民学会许多与其它社会团体比较起来的优点，如“不标榜”、“不张扬”、“不求急效”、“不依赖旧势力”等，也是杨昌济经常过问，悉心指导和面授机宜的结果。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杨昌济当之无愧地是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917年，杨昌济在英国勒伯丁大学的密友、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请杨昌济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当时对军阀张敬尧在湖南的倒行逆施早已不满，又向往北大的民主自由风气，当接到蔡元培的邀请后，便欣然应聘，并于是年6月初举家迁往北京。

临别之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同学到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嘱咐学生：“润之，林彬，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几个月后，毛泽东获得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文凭，从而结束了长达五年半的师范学生生活。

从一师毕业后，毛泽东和同学中的大多数人不想急于谋职，都希望趁年轻继续升学深造，可是又苦于缺钱，连自学的栖身之所和生活费用都成了问题。因此，大家处于彷徨无主的状态中度过这个暑假期。这期间，毛泽东记起杨昌济先生离长赴京时的叮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谈了他和同学们眼下的窘境，请老师帮助拿主意。

正当他们翘首以待的时候，杨昌济从北京来信，告诉他们法国政府又继续来中国招募工人，正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这一下子解开了他们心里的疙瘩，得到了大家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随即，毛泽东、蔡和森召集新民学会会员开会，专题讨论赴法勤工俭学问题，确定由萧子升、蔡和森负责进行联系。不久，蔡和森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通过杨昌济的介绍，很快就找到了蔡元培和李石岑，并拜会了李大钊、章士钊等人，然后写信给毛泽东，传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希望他“到北京来，一面主持勤工俭学事宜，一面入北京大学学习”。八月中旬，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二十多人，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河南鄆城县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几十里，他们就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次日，毛泽东和罗章龙、陈绍林搭过路便车到了三国时的魏都许昌，因凭吊魏都旧墟，又耽搁了几日。这样沿途辗转，毛泽东一行约在九月上旬才到达北京城。

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等人第一次出远门。在纸醉金迷，被毛泽东后来称之为“腐臭之地”的北京，“身无半文”的毛泽东，得到了杨昌济先生慈父般的关怀和照顾，这一点使毛泽东感激不尽、终身难忘。

初到北京，毛泽东和同学们吃住都很困难，全凭杨昌济先生大力帮忙，在北京大学附近找到了三间小房子安身，这便是“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毛泽东则被杨先生留住在家里，由于房子较窄，只好和杂役挤在一个房里睡觉。吃饭也在杨先生家里，家里吃什么他便吃什么。有时，师母向振熙还特意为他做几样可口的湖南家乡菜，让他饱饱口福，给他改善生活。在杨家，毛泽东体验着老师全家人亲人一样的挚爱，他就像远方的游子回到阔别的家里一样温馨。

当时，北京米珠薪桂。杨先生一家加上毛泽东和杂役，一共六口人过生活，全靠杨先生微薄的薪水维持，日子过得十分困难。毛泽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便要求杨先生帮助找事做，以解决燃眉之急。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尚未开展，便先把湖南来的青年安排进入北京附近的几个留法预备班学习，又推荐萧子升给法华教育会的李石岑做秘书，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月薪八元，解决了

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奔走呼号和进入北大旁听学习的基本生存条件。

后来，为了上班和与湖南同学商讨事情便利，也是为了减轻老师的经济负担，毛泽东离开了杨昌济家，搬到三眼井吉安所夹道七号居住。

吉安，清朝时叫作梓官，是停放皇帝棺材的处所，皇帝“驾崩”以后，建造陵墓要花很多时间，只得选一个地方临时停放灵柩，等墓造好了再把它运进去。这个地方很大，有宫殿，有住房，清朝推翻后成了一片废墟，但宫殿还在。这附近有一条小巷，叫吉安所东夹道，地方偏僻，房租也便宜，他们以大学生的名义租了三间房子，同住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陈绍林、陈■甫、欧阳玉三和萧三等八人，三间房子一间用作烧饭，一间堆放物品和供学习用，一间房是搭铺睡觉的地方，炕上从左至右依次睡的是陈绍林、萧子升、毛泽东、罗章龙……每个人只能占一块方砖这样宽的地方。湖南人的被子大，摊不开，不能各盖各的被子，有的被子垫在底下，有的被子铺在上面，就如同盖一床大被子。由于人多炕窄，挤得骨头发酸，晚上有事起来时，还要招呼旁边的人，后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道：“八个人聚居三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大被同眠”这句话有个典故，唐朝有个姓张的人，家里人口很多，张公倡议全家人住在一个屋里，盖一床大被子，使子女们知道什么是互相体贴和谦让，共同战胜困难，毛泽东借用这个典故，一是以他特有的形象思维说明当时的艰苦环境，同时还取众人团结如一家之意。

生活上的困难，除了睡觉之外，还有吃饭问题。开始，毛泽东他们在馆子里吃饭，因为饭钱太贵，口味上也不习惯，后经大家商议决定自己起伙。北京买大米困难，只得吃面，但南方人不会做面食，又闹出种种笑话。有一天，罗章龙买了个脸盆，萧子升就用它做了一盆“浆糊”，大家外出工作和学习一天，肚子很饿，但谁也吃不下……由于生活太苦，有几个人病倒了。

杨昌济得知这些情况后，一方面为生病的学生请医送药；一方面隔三差五让毛泽东到家里吃饭，加强他的营养。这样保证了他的正常工作和学习。

为了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筹措旅费，使他们早日结束这异常艰苦的生活，尽快成行，杨昌济还协助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将掌握在湖南旅京人士熊希龄、范源濂手中的一笔前清户部应退还湖南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了出来。同时，杨昌济还通过他的老友章士钊出面，组织义捐，筹款二万元，全部资助给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杨昌济对赴法勤工俭学之事的熱情支持和赞助，使毛泽东等湖南学子十分感激，也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

这期间，杨昌济和毛泽东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用毛泽东的话说，杨昌济“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在师生频繁往来的日子里，杨昌济发现学生与女儿开慧的感情与日俱增，在他的赞许下，他们正式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经常漫步北海，游览故宫，欣赏古都风光，体验着爱情的甜蜜。

作为父亲般的仁慈长者，杨昌济精心地照顾毛泽东的生活，关怀着他的个人婚娶大事；而作为老师，杨昌济更注重毛泽东知识的长进、学问的更新。

在进入北大工作不久，根据杨昌济的建议，毛泽东利用自己身为北大职员的条件，进入北京大学旁听学习。他除了在工作之余常去听哲学、文学、伦理学等系科教授讲课外，还参加了北大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等

学术团体。其中的哲学研究会，是杨昌济和马叙伦、梁漱溟、陈公博、陶履恭等二十位知名学者联名发起成立的，旨在通过定期的讲演和报告会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活跃北大学术气氛。毛泽东通过参加这些团体的学术活动，吸取了新的知识，结交了名流学者。同时，为了使毛泽东接触知识界的名流，杨昌济还让学生利用工作便利多向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聆教，并推荐他去拜会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以及知名人士胡适、蔡元培等，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在交谈和接触过程中，毛泽东的崭新思路及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受到了这些第一流学者的关注。

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是新旧文化及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在这里，毛泽东及时阅读到了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思想“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同时他也读了不少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

对于毛泽东思想上的骤变，杨昌济是喜忧参半的。说心里话，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是主张人是应该有哲学头脑和思想信仰的；作为性格热烈坚强的湖南人，他更欣赏学生在对信仰追求中表现出的勇气和执著；但作为一个纯粹的教授和学者，他又本能地希望他的学生成为知识的启蒙者，而不希望他走什么政治之路。不过，他是一个开明而豁达的长者，不愿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但他还是想以一个老师、一个人生之路“过来人”的身份，好好同学生谈一谈，摸清他的思想脉搏，而后帮助扶持他沿着选定的路坚定地走下去。

于是，后来的有关史料便明载：在毛泽东第一次北京之行中，杨昌济和他就信仰的确立和事业的选择有过一次深谈——

一天晚上，杨昌济一边缓慢地饮茶，一边询问毛泽东：“润之，你见过陈独秀，还长谈过？”“嗯。”毛泽东恭谨地回答老师。

“有哪些印象和收获呢？”杨昌济仍然保持那种不变的平稳语调问道。

“我感觉到他不仅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科学和民主的斗士，更深的印象是他不妥协地拥护和支持一切不受束缚的、充满活力的新生事物。我们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出语便不同俗流。

“你也说过，你同李大钊完全一致。”

“是的，我说过，李大钊满怀热情地献身于事业，他追求使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的事业。”

“可是，陈独秀与李大钊是有激烈争论的，他俩并不完全一致。”

“四年前他们就有一次论战，争论人民的自由与启蒙同国家的生存相比，哪个更重要；李大钊主张，即使在最专制的国家中受痛苦也比当亡国奴好。”

“因为亡国奴更无民主自由可言。”杨开慧赞同道。

“你在李大钊那里研究马克思主义，你想得最多的是什么？是做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做个中国人？”杨昌济问。

《西行漫记》，第127～128页。

《西行漫记》，第127～128页。

“我首先是中国人。”毛泽东认真思考着说：“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

“李大钊最近加入了《新青年》编辑部，说明他和陈独秀开始合作了。”杨开慧又轻声插了一句。毛泽东向她凝望着，目光里饱含惊喜之色。他不料这位温柔娴静的少女对国家政治竟然这样关心熟悉，使人产生出强烈的志同道合的欢愉感。

“列宁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强调民族解放的意义。李大钊过去认为陈独秀对民族价值观念重视不够，现在列宁的阐述使他们能够有基础结合起来了。总的说来，陈李虽有争论，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上是一致的。”

“这么说来，你想效法陈李二人信仰马克思列宁的学说？”

“关于这一层，我还没有想通。不过，我是一个中国人，就应当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主义。自然，也包括马列主义。”

“嗯，对！”杨昌济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他生平虽然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作为一种学问，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还是进行了一定研究。他用老师教导学生所特有的语重心长的声调指点毛泽东道：“首先是中国人，你这句话讲得对。不论自然主义、民主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还得为我所用才行。我看多研究几个主义好，各种思想兼收并蓄，经过自己的经验，从中引出正确的观点……”

“是，先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个主义只能拿来供改造我中华古国所用，但绝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要找到符合国情之主义，还要待吾辈殚精竭虑去研究、探求啊！”

“润之，你能够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不过，润之！思想确定之后，紧接着就是选择人生道路和事业突破口的问题了。有人讲，人不外是人所设计的蓝图。人实现自己有多少，他就有多少存在。不知你想过没有，你为自己设计的人生蓝图是什么？你打算怎样地去实现自己的存在？”

“这……？”毛泽东望着老师，一时语塞。是的，人的社会本质，是他自己造就的，是他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自我选择的结果。毛泽东诘问自己：我设计的人生蓝图是怎样的呢？

望着沉思的毛泽东，杨昌济继续循循诱导：“润之，天长人短，时不待我。不管你选择哪条道路，只要是你自己认准了的，就要只争朝夕地去走，笔直地走下去，直至到达目的地。西方世界的精神巨人罗素是怎么说来着？‘人生应当像条河。开头河身狭小，夹在两岸之间。河水奔腾咆哮，流过巨石，飞下悬崖。后来河面逐渐展宽，两岸离得越来越远，河水也流得较为平缓。最后流进大海，与海水浑然一体，看不出任何界线，从而结束其单独存在的那一段历程……’他说得太形象了！生动地点破了人生旅途的生死底蕴。的确，人生就是一条长河人生的童年时期，就像江河的源头，那涓涓细流的小溪；他享受着那生活的平和、时美和温存，他唱着欢乐的歌，无忧无虑地汇入滔滔大河。人生的青年期，如同处在大河的上游段，河岸开始陡峭，河水开始湍急，这是人生竞争和搏击的第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优胜者，将会成长为社会的栋梁之才。青年时期的搏击，实际上是成才的搏击。人生的成年期，就像是大河漫长的中游段，伟岸之间，河流浩洪急速；水面波涛汹涌，水下潜流澎湃。涛涛大河，奔腾而下，气势磅礴，不可阻挡。这是人生的真正搏击时期，他需要莫大的勇气、智慧、知识和毅力，他需要人们使出自己的十八般武艺，全身心地投入生活和事业的竞争，力争获得最佳的成就，作

出自己最佳的贡献。人生的老年期，就像进入大河的下游段，河水开始宽阔平缓，象征人们心胸应该宽广坦荡，为逐步把自我融入社会的大海作好准备。一旦他年老体衰难以支撑时，便要坦然放弃自我，平静地、毫无痛感地让自我汇入浩瀚的海洋，让自我在人类社会的汪洋大海中获得永生。……润之，你目前正是处于人生的中游段，努力吧，希望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世界也是属于你们青年人的！……”

就在杨昌济和毛泽东谈话以后不久，新民学会中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会员将从北京去上海，乘海轮启程去法国。毛泽东决定，放弃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再回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向杨昌济先生一家辞行，偕同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了生活了半年的北京城，取道上海，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湘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湘江评论》，同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五·四”运动的军阀张敬尧展开公开斗争……

这年年底，杨昌济终因积劳成疾，住进了医院。12月初，病情较重，便由西山医院转北京德国医院治疗。恰在这时，毛泽东率代表团为驱逐军阀张敬尧第二次来到北京。得悉老师病重的消息后，毛泽东不顾旅途劳顿，立即到医院看望。以后，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多次前往探视。

和自己心爱的学生久别重逢，杨昌济感到莫大的安慰，病体就好像恢复了许多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师生常常在医院轻声细语地交谈，谈“五四”运动，谈湖南的局势，谈国家、湘省和毛泽东个人今后的发展前途……当杨昌济了解到学生自年初分别回湘已有所作为的情况后，控制不住内心的极度高兴。

他怎么能不高兴呢？多年来，他像园丁一样在教育的园地里辛勤劳作，所求的是为国家民族栽培一批有用之材。如今，眼看自己的一大批学生，特别是参加新民学会的许多学生，就像早春的蓓蕾，含苞待放。这当中尤其是毛泽东、蔡和森二人，他们不负师望，多年来勤奋读书，独立思考，勇于实践，在个性中已经形成极富特征的良好品质，诸如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己任，强调勇气、力量和尚武精神是救国之道等等，像这样发展下去，真可望成为“建国之用”的栋梁之材。“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自己的宏愿将可成为现实，这实在是一位教师的最大快事！

但是，杨昌济心中明白：他已病入膏肓，将不久于人世。他感到有一桩心事尚未了，这就是要把毛泽东和蔡和森推荐给有关教育当局，以便在自己故去以后，有人对他们加以提携。于是，他强撑病体，给他的好朋友，北洋军政府教育部长章士钊写信，恳切举荐毛、蔡二人。信中说：“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欲言救国必先重二子。”“毛蔡二君，当代英才，望善视之！”办完这最后一件事后，杨昌济感到浑身极度轻松、爽快。他在临终前与友人谈话时还说：“吾意正畅”。然而，就在他说罢这句话时，便溘然长逝了！这一天是1920年1月17日！

病魔终于夺去了这位勤奋学者的宝贵生命。就在杨昌济逝世以后，蔡元

《西行漫记》，第129页。

章士钊：《杨怀中别传》。

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二十人，在《北京大学日刊》联名发表《启事》，“优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以募集赙金。杨昌济一生埋头教育事业，无意富贵利达，家境是十分清寒的。他在西山养病时，由于不能到学校讲课，按惯例没有工资，蔡元培特别加以照顾，按月给他发生活费用。一些同乡好友如章士钊、杨度、李锐、方表等人，则集资供给医药费用。为解决杨昌济身后家属的生活困难，北京大学评议会作出决定：“杨昌济教授及刘师培教授身后恤金，应根据田北湖、朱蓬仙教授先例，各赠送两月俸金。”

1月25日，北京和湖南教育界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北京的追悼会在法源寺举行，许多著名学者都参加了追悼会，不少人送了挽联。蔡元培的挽联中这样写道：“学不厌，教不倦，本校失此良师”，字虽不多，却高度概括了杨昌济的一代师风。由蔡元培、毛泽东、李肖聃等数十人署名的“讣告”中说：“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吾国学术不发达，积学之士寥落如晨星。先生固将嗜学终身者，因不假年，生平所志，百未逮一。”李肖聃的悼文中说：“杨怀中之死，令人伤心！好学之笃，立志之坚，诲人之勤，求之友辈，遂无此人。居北京西山卧佛寺数月，尤刻苦于学；又感慨时事，愤友朋中意志萎靡不自振拔，则日发书，以警责人已，而还家欲休息一月，仍往大学授课。其家所用男女雇工，每日必亲自教之。生平未尝有疾言遽色，与人言惟恐伤之。……君于三十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说，十余年来，又益研英日学者之说，意量之渊远，大有得于时代精神。其意气似纯出于和平，而其心光湛然，力抗流俗，而造物有自得于己……。君，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

痛失良师和慈父，毛泽东尤感悲恸。猝然降临的巨大打击，使杨师母一家痛不欲生。身为半子的毛泽东，只好强忍哀伤竭尽全力帮助料理老师的后事。二月中旬，杨昌济的灵柩在其夫人向振熙、儿子杨开智、女儿杨开慧和学生毛泽东、陈绍林等人的护送下，从北京启运，返归长沙板仓故里。

李肖聃：《杨怀中先生逝世再志》，载1920年1月20日长沙《大公报》。

就在杨昌济逝世后的这年冬天，毛泽东和老师的女儿杨开慧自由结合了。

新婚之夜，送走了前来贺喜的亲友，新婚夫妇久久没有入睡。他们双双端坐在妙高峰青山祠那栋权当新房的一师教师宿舍里，凝望着挂在墙壁上的那帧恩师和父亲杨昌济的遗像，似有千言万语要对他说。泽东和开慧心里明白：他们能有今天，应该永远感激这位良师和慈父，是他用他俩共同追求的知识 and 理想，给两人牵的红线、搭的鹊桥……

毛泽东和开慧最初的相识是在 1913 年的春天。那时，杨昌济从欧洲留学回来后，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任教，杨开慧便随父一起迁往长沙，住在“李氏芋园”。同年，毛泽东也考入四师，在杨昌济门下读书。在几年的学习期间，毛泽东成了“板仓杨寓”的常客，每逢节假日必到李氏芋园的杨先生家请教学问，讨论问题。也就是在老师家里，毛泽东对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的师妹杨开慧开始有了一定的了解。

杨开慧，生于 1901 年 11 月 6 日。她的降生，给“板仓杨”家带来了无限的欢悦。她的父亲杨昌济先生给女儿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的一生能够在阳光的照耀下，有如灿烂的云霞，美丽火红。

开慧刚满两岁时，父亲离别了她和母亲、哥哥，远涉重洋，出国留学。此番别离，竟是十年！她的儿时是在家乡那明山静水的田园风光中度过的，也是在对父亲的思念中熬过来的。这种生活经历，养成了她勤劳俭朴和善良的性格。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同情下层生活的同胞，厌恶那些穿华服，只顾自己快活的人。我热天和下层生活的人一样，穿大布衣。”

开慧长到七岁，父亲从国外来信，要她上学读书。她家斜对门的杨公庙，办了长沙县第四十初级小学。山冲里从来不让女孩子读书，学校破例为开慧等七个女孩子单独开了一个班。她在杨公庙小学只读了三个学期，便转学离板仓五里多路的隐储学校去了。这个学校比杨公庙小学大，图书也多，强烈地刺激了小开慧的求知欲。

辛亥革命发生不久，开慧从隐储学校转到衡粹女校，接着又转到麻林桥附近的县立第一女子高小，一直读到毕业。

开慧上学期间，父亲每两年从国外回来一次，给她讲述一些国外见闻和简单的道理，教她博览群书，把读书当作吸取新知识、新思想的一项重要方法。在父亲的鼓励下，开慧刻苦自学，阅读了不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打下了良好的文学基础，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她从小爱读《木兰辞》，向往那种少女的戎马倥偬的征战生后，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一展身手。

清淡雅致的物质生活环境，良好的家庭教养，父母亲的熏陶，使少女年华的开慧，不仅有花木兰那样不让须眉的爱国壮志，在感情世界里，也很少有那些大家闺秀所特有的缠绵悱恻。她生就一身傲骨，独具超凡脱俗的个性，对生活、对爱情都有不同凡响的见解。她在一篇日记里写道：“我大约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对于结婚开始有了我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用仪式的结婚，并且我认为有心去求爱，是容易而且必然的要失掉真挚神圣的不可思议的最高级最美丽无上的爱的！我也知道这不是普通人能够做得到的事，而且普通

人是懂不到这一层来的。然而我好象生性如此，不能改变，用一句恰好的话可以表现我的态度出来：‘不完全则宁无’。”（好一个“不完全则宁无”！这或许就是他以后选定为人品识兼优、性格特立独行，被人称之为“毛奇”的毛泽东为终身伴侣的“基因”吧？！）……

友谊是从了解起步的。刚开始，当父亲和他的学生们交谈时，开慧常侍立在一旁，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听。后来，她逐渐加入他们的讨论。杨昌济对这个聪明的女儿很是看重，对她的介入也极为赞许，并不时向毛泽东等学生推荐女儿的学问。时间一长，杨开慧自然成了这批学生中的一员，他们一起讨论时事，抨击时政，并互相传阅笔记，交流心得体会，彼此之间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批学生中，毛泽东年龄较大，思想也较为激进、深刻，因此他给杨开慧的印象也最深。杨开慧除了向他学习一些思想方法外，也不断接受他的一些生活方式。如她坚持洗冷水浴，作深呼吸，常吃硬食等体育锻炼的方法。她还在作文中写道：“要救国就要锻炼强健的身体”。这句话正是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所阐述的中心思想。

于是，客厅里的感情交流便逐渐升华，日趋成熟。严肃的杨先生终于发现那种借眉目交流的感情。他没有责难任何一方。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激进、睿智、不修边幅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不过，他未提婚嫁之事。毛泽东也不曾提。毛泽东还不具备婚娶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他们心里都有数。何况，杨先生深知他的学生所具有的强烈自尊心，在吃饭问题尚未解决好的时候，毛泽东是决不会谈婚嫁之事的。

但是，杨先生是喜欢看到毛泽东与女儿杨开慧的日渐接近的。有时他与学生讨论问题，女儿悄悄走来，默默坐在一角藤椅里倾听。对此，杨先生并不反对。而毛泽东只要见开慧在场，就会表现出格外的精神振奋、思想敏锐，讨论也显出异常的热烈和深刻。

有时，杨昌济还为自己的爱女和高足创造条件，让他们在一起自由研讨学问文章，抒发各自的见解，互相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1917年4月，毛泽东的长文《体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发表以后，杨昌济是湖南的第一个读者。他读完这篇七千余字的文章后，深感文章中的许多观点非同寻常，便有意地把刊载有此文的《新青年》送给女儿看。杨开慧不知底里，一翻开杂志便看到了毛泽东的大作，她一口气读完之后，又怀着异常欣喜的心情把它“推荐”给了父亲，还谈了一些读后的感想。于是乎，在杨昌济的“导演”下，两个具有激进思想的年轻人，曾就体育的主旨和教育的方针等问题，有过一次深刻的讨论——

“润之，小女向我推荐了你的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杨昌济稍稍顿了顿，瞟了女儿一眼。杨开慧脸色微红，垂下眼帘摆弄着衣襟。

杨昌济看到了女儿的窘态，又把目光转向毛泽东，慢条斯理地说：“我读了这篇文章，你写得不错：‘国力■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夫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原因之事也。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臻远？’……嗯，讲得好！”

毛泽东听了老师的夸奖，心里十分高兴，但只是谦逊地说道：“那是受先生的影响和鼓励才写出来的，实在还很幼稚，只不过是学生有感于国力■弱，武风不振发出的一声叫喊而已。我堂堂华夏之邦、文明古国之子民，何

遭‘东亚病夫’之辱，故学生常思强健国民体质、重振民族雄风之良策。‘体不坚实，则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坚实在于锻炼，锻炼在于自觉。……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促使国家富强之活力蕴藏于每个社会成员身上，惟有激励人之主动性，方能迸发出来。孔子云：‘君子求己’，可见自力更生之必要性。学生在散文中向国人介绍了一套自己设计的锻炼之法，作为增强体质，陶冶性情之手段，旨在矫健国民之体魄，坚强其意志，以御外侮耳！”

“不过，润之——你说‘夫体育之主旨，武勇也。’这里的意思，开慧，你是怎么看？”杨昌济似疑问，又像有意要考考学生和女儿的见解。

随着老师向开慧的发问，毛泽东终于得到公开凝望杨开慧的机会——是用一种期待、不安的心情凝望，似乎杨开慧的回答与他一生的理想和追求有什么重大关系。

杨开慧沉默了片刻才轻声细语道：“人家用枪炮打来了，你不用枪炮对付又怎么办？体不坚实，见兵而畏之……我看这个道理不错。”

“嗯，‘夫体育主旨，武勇也’……”杨昌济仔细品味一番后赞许道：“润之，从《心之力》发展到这一论断，这是你个人努力研究的成果啊！”

老师提到《心之力》，又勾起了毛泽东对过去的回忆。刚到一师时，杨昌济讲授《伦理学》课，在老师的推荐下，毛泽东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一本《伦理学原理》，在这本书的启发下，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阅读后觉得很对他的心路，高度赞赏了毛泽东这篇文章，给了他一个满分。现在回过头去看一看，那时知识底子太薄了，看问题也颇为偏激片面。这些年来通过杨先生的精心指导和培养，自己在各方面才真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切真是多亏了老师！

想到这里，毛泽东以感激的心情凝望着杨昌济，然后移开目光，情不自禁地深深看了师妹一眼。那一刻，他感觉与杨开慧的感情完全相通了，两颗心仿佛被共同的血管所连结，跳动着同一个节奏的脉搏……

杨开慧在自己的日记中敞开了爱的心扉，倾吐了她和毛泽东之间这种感情的升华。她笔端醺情，欣喜地写道：“……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因为我不要人家的被动爱，我虽然爱他，但决不表示，我认定爱的权柄是操在自然的手里。我决不妄大希求。我也知道都像我这样，爱不都埋没尽了吗？然而我的性格，非如此不行，我早已决定独身一世的。一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不是一位朋友——知道他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他为我非常烦闷，我相信我的独身生活是会成功的。”

“自从我完全了解了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杨开慧还记述说，他们经历了两年的恋爱生活，其中也有一点小小的波折，那是因为她常常把对毛泽东的爱藏在心底。惟恐毛泽东看见她爱他的心。然而波折过去却令杨开慧倍感欣喜。她说：“他的心盖，我的心盖都被揭开了，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我们觉得更亲密了”。

1918年夏，杨昌济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全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9号。9月，毛泽东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也来到北京，杨昌济

推荐他到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工作之余常到杨家做客。身处异地他乡，得遇同乡知己，两人倍感亲切。后来，毛泽东要赴上海，临行之时他们相约别后愿借鸿雁传书、寄情。次年四月，毛泽东转道上海回湖南，杨开慧写给毛泽东的信，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回信也是一个字：霏。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京，有时候就住在杨家，他与杨开慧的恋爱关系公开了。那段日子里，杨开慧受毛泽东的影响，也常到北京大学旁听，认真阅读《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和英文版的《布尔什维克》等进步书刊，对各种社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走上追求进步事业的道路。

父亲杨昌济在北京去世以后，杨开慧随家人扶柩南下，回归故里。不久，她从板仓来到长沙，在好友李淑一父亲的帮助下，进了湘福女中。这时的杨开慧已具有相当的革命觉悟。她继续求学后，带头剪短发，进男校，热情宣传反帝爱国主张，发动和组织同学参加斗争。毛泽东胜利结束“驱张运动”后回湘，她就去湖南学生联合会协助毛泽东做宣传工作。这年秋天，为了支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杨开慧不顾家庭困难，和母亲一起慨然献出父亲逝世时北大同事们征集的一笔赙金。

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终于把她和毛泽东连在了一起。就在今天——1920年的一个冬日，杨开慧夹着一个书包，来到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不坐花轿，不备嫁妆，没有媒灼之言，“不作俗人之举”，自由地同毛泽东结了婚……

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婚姻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真挚的爱情基础之上的。就像毛泽东曾经说过的：“我同开慧结婚，是建筑在双方个性思想彻底了解，完全相合的基础上的。所以经过恋爱结婚，都没有什么波折发生。”

有人说，爱情是人生的加油站，既是人生的真正起点，又是人生的必然归属，生命尤可贵，爱情价更高，可见爱情之神圣了。然而，以毛泽东的个人特质，当爱情与事业难以两全时，他可能把重心倾向事业与理想一边，让爱情受到冷落。不过，他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妻子杨开慧，她理解他、支持他，在关键时刻宽慰他，爱情又成了他事业的助燃器。

杨开慧和毛泽东结成伴侣以后，把自己的感情紧紧融进对丈夫革命事业的支持之中。从1920年冬，直到1927年8月，整整七年，她一直紧随在毛泽东身边。不管是在长沙的清水塘畔，还是在武昌的黄鹤楼前，或是在上海、在广州；也不管毛泽东是顺境，还是在逆境，甚至是在险境，她总是精心细致地照顾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不分昼夜地帮助毛泽东整理文稿，不遗余力地协助毛泽东发展党团组织，并时刻注意保护毛泽东的人身安全。

1921年秋，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成立后不久，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掩护毛泽东的活动，她从板仓接来母亲，一起住在中共湘区委员会会址所在地——清水塘，自己则担任湘区党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1年8月，毛泽东曾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多方筹集办学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共产党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何叔衡、毛泽民、毛泽覃、罗学瓚、夏明翰等人，当年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1922年，毛泽东又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该馆的负责人，主持馆内一切事务。当时

图书馆还设有秘密的阅览室，藏有《向导》、《先驱》、《赤光》等进步书刊，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1922年4月，女青年张琼为了参加革命，毅然脱离家庭，偕女友来到长沙，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杨开慧将她们安排在清水塘自己的家里暂时住下。五十五年后，张琼在回忆清水塘主人这一时期的战斗生活时写道：

“开慧姐不愧是毛主席的亲爱的夫人和亲密战友。她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使毛主席有更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那时，毛主席常常通宵达旦地写东西，寒冬腊月也是这样，一到晚上八、九点钟，开慧姐就把取暖用具给毛泽东准备好；深夜一、二点钟，常起床取送临睡前热在锅里的‘点心’，有时毛主席没顾上吃，她就等在旁边，待吃完后才去睡。那时候，毛主席经常夜里睡两三个小时，清早，又出去工作，她就去整理毛主席夜里写的东西。在草稿本上凡有‘定稿’二字的，她就誊写到另一本簿子上去。那时，他们已有了孩子岸英。开慧姐在抄写文件时，常常把岸英的摇篮放在身旁，一边抄，一边用脚摇摇篮。”

从这段回忆中，读者可以看到杨开慧对从事革命活动的丈夫毛泽东，是怎样的奉献着她那片作为妻子和同志的至诚！

1923年4月，湖南军阀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毛泽东奉党中央之命离湘赴沪，后又到广州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以陈独秀为委员长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任秘书，承担了协助陈独秀领导党中央的重任。婚后的第一次别离平添了毛泽东的许多离愁别绪，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贺新郎》的词：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不到两岁的长子毛岸英和刚刚降生的毛岸青，来到上海，看望国共合作后已在国民党中央上海执行部工作的毛泽东。毛泽东闻讯后，前往码头亲自迎接，结束了梦牵魂绕的两地生活，得以“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底，毛泽东因与当时党中央领导人陈独秀意见相左，加之身体有恙，决定离沪回湘。次年春节期间，他偕妻儿回到自己的故乡韶山，一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杨开慧协助毛泽东在韶山创办了农民夜校，并亲自给乡亲们授课，同时支持毛泽东深入到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实地考察农民运动，帮助丈夫做了大量的调查和资料的整理工作，写下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高度赞扬了农民运动，指出了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基本群众，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从而解答了当时中国革命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而又亟待解决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此后不久，新军阀赵恒惕再次悬赏捉拿毛泽东，在乡亲们掩护脱险后，全家先后到达广州，住在东山庙前西街三十八号。杨开慧继续担任联络工作，与周恩来、邓中夏、恽代英、林伯渠、李富春等人保持了密切的联系。

大革命后期，毛泽东和陈独秀之间的分歧日益加剧，在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6 日武昌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受到错误路线的贬斥，他又一次“赋闲”。正确的主张得不到党内同志的理解与支持，毛泽东内心的苦楚是难以言喻的。“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作为知己的杨开慧陪同丈夫默默无语地登上了黄鹤楼。居高远眺，万里长江，烟波浩渺，毛泽东顿觉心胸开阔，他吟唱出气势磅礴的诗篇，表达了两人此时此刻的心境：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处？剩有游人处。

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和毛泽东一起由武昌回到长沙，住在北门外沈家大屋旁的北角门楼。“八·七”会议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县清泰都下的板仓杨家，万没想到，这次分手竟成夫妻二人的永诀。在板仓坚持地下活动的日子是艰苦的，再加上关山阻隔，音讯不通，杨开慧的心情日益惆怅不安。1928 年 10 月，她写下了《偶感》词一首，表达了自己对丈夫那牵肠挂肚的思念之情：

天阴起朔月，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1930 年 8 月，湖南省清乡司令何键悬赏大洋一千元，通缉“毛泽东的妻子杨氏”。十月中旬，杨开慧被捕入狱，同时被捕的还有保姆陈玉英和毛泽东八岁的儿子毛岸英。在狱中，杨开慧经受了各种形式的威逼利诱，甚至说只要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但都遭到了她的严词拒绝，她对前去探监的亲友说：“我死不足惜，但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11 月 4 日，杨开慧在长沙城济阳门外的识字岭被敌人枪杀，时年 29 岁。她以自己的青春和热血表达了她对革命事业的忠贞和对毛泽东的热爱，以实际行动实践了自己爱情的诺言。

杨开慧被害后，遗体被亲友连夜运回长沙板仓收殓，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上。毛泽东从报纸上获悉噩耗后，悲恸万分。他一连几夜不曾合眼，拿起又放下的是《楚辞》，记起却忘不了的是美好的回忆。杨开慧那温柔娴静的面容，纯洁善良的微笑，深邃而又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他的面前。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简直无法叫人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优秀品格的人。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冑、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养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似生来就是为一奉献，而不曾有过一点点索取。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也想不起她生前向自己提过什么要求。就是妊娠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的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

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想到这些，大颗的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烁。他眨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地上。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爱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上井冈山以后，因山水阻隔，又难通音讯，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真相，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是在两年后的今天才牺牲。她的献身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于是，毛泽东含着热泪，挥笔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同时，专门寄款为杨开慧修墓立碑，上刻：“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19年冬立”。

全国解放后，他在接见杨开慧的堂妹时赞叹说：“你霞姐是有小孩在身边英勇牺牲的，很难得！”“你霞姐是积极主张武装斗争的。”在接

见他们当年的保姆陈玉英时，毛泽东详细询问了杨开慧被捕经过和狱中情况后，深情地说：“开慧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六个人，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1957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复故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的信时，又写了《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相赠。词曰：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水顿作倾盆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词中“骄杨”作何解释时，毛泽东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得不骄？！”“骄杨”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从此以后，“骄杨”便成为舍身取义、长垂不朽的杨开慧的代名词。

109 无尽的思念

十年树林，百年树人。从 1913 年在四师范与杨昌济相识至

1920 年先生谢世，毛泽东沐浴老师长达 8 年的教诲之恩，良师的谆谆教导如春风化雨，催他成材。直至 1949 年新中国的诞生，经过二十八年风风雨雨的磨炼，他终于如老师所愿，长成了一株柱天大木——成为中华民族这泱泱大国的主席和数万万中国人无限拥戴推崇的伟大领袖！

前人栽树后人歇荫，吃水全凭掘井人。成功越是巨大，好念旧情的毛泽东越是忘不了“强避桃源”栽种长天之材的杨昌济老师。怀念之情夹杂着些许忧愁和感伤，常常啃噬着他那颗永不安逸的心——杨先生走了，开慧也走了，他们未能等到这一天就都永远地走了！不会也不能同他毛泽东一起分享这成功的喜悦、胜利的滋味……每逢思虑至此，杨先生那清瘦的面容，伏案辛劳的情景，便一一浮现在毛泽东的眼前。他想，老师毕生事教，为教书育人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心血，可他积劳成疾，不到五十岁就与世长辞了！他就像春蚕一样，取天地生物之精华，经几番生死之蜕变，最后从腹中吐出那晶莹剔透的银丝，来造福于人，而自己

却劳累、困顿而死……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品格，多么可贵的奉献精神！

毛泽东由杨昌济先生联想到他的其他许多老师：邹春培、毛麓钟、谭咏春、贺岚光、符定一、袁仲谦、王立庵，还有徐特立、黎锦熙、王季范等等，再通过这些老师联想到全中国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他觉得这些人也和杨昌济先生一样，具有高尚的品格和可贵的奉献精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解放前后一直是在从事冷冷清清的教育工作，一直是在为教书育人“吃粉笔粉”，这些人今天的生活怎么样了？是否都健康地生活着？看来有必要制定一个政策，要保护这些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文化人，切实保障他们的生活、工作条件，照顾好他们的家属子女，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服务……毛泽东的思绪从国事上又重回到家事上来，他想，杨昌济先生不愧为一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的家属既是毛泽东的至亲，也是人民中的一分子，于私于公他都责无旁贷，当尽心尽意、尽忠尽孝地去关心照顾他们。

从此以后，毛泽东把对老师杨昌济和妻子杨开慧的怀念与挚爱之情，转嫁到他们的亲人身上。

在长辈中，岳母加师母的杨老太太向振熙，是毛泽东最关心和牵挂的一个。1949 年 8 月，长沙解放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曾将老太太尚健在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当即回电道：“来函悉，老夫人健在，甚慰，敬致祝贺。”9 月，当他获悉王稼祥夫人要回湖南省亲时，便托朱仲丽给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也替杨开慧尽了人子之心。礼物之外，还写了一封便信：

杨老太太：

你们好吧？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大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一日

1950 年，杨老太太八十大寿。毛泽东特地让儿子岸英前往湖南祝寿，并带去两棵人参，送给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毛泽东的，毛泽东认为老岳母比她更需要进补。外孙毛岸英的到来，使向振熙老人百感交激，欣

喜万分。她透过岸英英俊的面庞仿佛看到女儿开慧和女婿润之的身影，不禁热泪盈眶。二十多年，漫长的二十多年啊！老人在痛失爱女之后，与女婿和外孙也未见过面，她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在焦虑忧愁中度日如年。记得就在杨开慧英勇就义后，经蔡元培等熟人出面说情作保，毛岸英和陈玉英不久被释放，但板仓杨宅受到了特务的严密监督，鉴于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所处的危险境况，党组织决定将他们转移到上海。在周密的安排下，向振熙和儿媳、开慧的嫂嫂李崇德扮成走亲戚的样子领着毛岸英三兄弟，坐火车到武汉，又改乘轮船到达上海。她们将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后，不久便返回湖南。此后二十多年，再也没有和三个孩子联系上，与毛泽东也音讯不通。没曾想到，再相见时，当年的小岸英已长成一个伟岸的男子汉，他爸爸已成为这个国家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想到这些，再看看毛泽东让岸英带回的礼品，老人十分激动，她对孩子说：“岸英，别看你爸爸是个大人物，他也有赤子之心。”她还说：“过去我常给做些好吃的，现在不能做给他吃了……”言语之中，浸透着他对女婿毛泽东的慈母之爱，舐犊之情！

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

1960年，向振熙太太九十高寿，毛泽东听说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要回老家祝寿，便给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开英同志：

杨老太太（岸英的外婆）今年九十寿辰，无以为敬，寄上两百元，烦为转致。或买礼物送去，或直接将二百元寄去，由你决定。劳神为谢！顺致问候！

毛泽东

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五日

为了保证向振熙老太太安度幸福晚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她的生活，并供给足够的生活费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以后，毛泽东就用自己的稿费按月给老人寄生活费，哪怕工作再忙，也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有时检查发现秘书忘记寄了，他便叮嘱补寄。就这样一直赡养到老人去世。

1962年，惊悉老岳母逝世，毛泽东心情十分哀痛，很快给杨开智发去电报以致悼念。电报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望你节哀顺变。”字里行间，情真意切，感人肺腑。

毛泽东对岳母杨老太太的一片孝心，寄托了他对夫人杨开慧的满腔炽情，也体现了他对老师杨昌济的无比崇敬和不尽的思念！

杨昌济先生慧眼识人，作为人师，他有毛泽东这样的学生；作为人父，他有毛泽东这样的女婿，他当含笑九泉！

第二十章 王季范

——表兄 挚友 老师

友谊之光像磷光，当四周漆黑之际最

为显露。

友谊永远是美德的辅佐……

——代题记

1950年的国庆节前夕。首都北京。

一辆轿车驶进新华门，直抵中南海丰泽园门前停稳。身边工作人员向躺在床上看书的毛泽东报告：“主席，你请来的客人已经到了！”毛泽东闻讯，连忙放下手中的线装书，三步并作两步走出书房，迎到门口。他边走边情不自禁地用湖南湘乡话喊道：“九哥，九哥，你来哒！”

这时，从轿车里走下一位约模六十来岁的老人来，他中等身材，精神饱满，身着藏青色中山装，戴一幅博士镜，颇具文人雅士风范。他听到毛泽东的喊声，急忙驻足望去——身材高大、红光满面的毛泽东正伸着两只大手，笑盈盈地向他走来。顿时，老人神情激动，热泪盈眶，哽咽着叫道：“润之，二十三弟！……”然后，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久久地没有分开。摄影师按动快门，记下了这动人的场面……

当日，一向节俭的毛泽东，吩咐生活秘书让食堂预备了丰盛的晚餐，招待这位他称作“九哥”的客人。宴席前，毛泽东特地把岸英、李敏等孩子叫到客厅与客人认识，他极富感情地对孩子们说：“你们来认识认识，这是从老家来的稀客，是你们的表伯父，也是我的老师！”他还握着客人的手，向夫人江青和工作人员介绍说：“这是我九哥，在我青少年时期，给我好多帮助。没有他，就没有我毛泽东。”在场人听了，无不感到惊讶！

这位被毛泽东被之为“九哥”，并尊敬有加的人是谁呢！他就是王季范先生。

王季范，字邦模，生于1884年11月，湖南湘乡人，是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的次子，与毛泽东是亲姨表兄弟。他既是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学监，又是交谊甚深的挚友。王先生在同辈兄弟中排行第九，后辈都尊称他“九阿公”，毛泽东一直叫他“九哥”。

“没有九哥就没有毛泽东！”这并非是毛泽东对王季范的溢美之辞。追寻这位历史巨人的人生轨迹，人们不难发现：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王季范有着非同寻常的交往关系。在那蓄才聚能的求学岁月里，他不仅曾在生活上得到王季范这位表兄的关怀照顾，在学业上得到这位良师的悉心指导，而且在思想观念的形成上也受到王季范的深刻影响。因之，人们有理由确信，毛泽东的话，是他与王季范之间那特殊的兄弟之情、朋友之情和师生之情的真实反映！

毛泽东的二姨妈文六妹，下嫁湘乡土绅王文生，生有二子，长子王星臣，次子王季范。那时，毛泽东的外婆家是湘乡农村数得上的殷实人家，家里开办有私塾，由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任教。王文生和文六妹为了让孩子将来有个出头之日，就先后让星臣和季范住在外家，并到唐家阁私塾从师文玉钦，接受启蒙教育。如前所述，毛泽东从两岁多便寄养在外婆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和王氏兄弟同是外公、外婆的掌上明珠，老人将他们与自己的孙子们排行并列，王季范排行第九，毛泽东排行二十三，毛泽民为二十四，毛泽覃为二十六，他们常常食同桌、寝同床，宛若亲生兄弟。

王季范从小聪明伶俐，在八舅文玉钦的严格要求和督导下，古典文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尤其对古代诗词有极深的爱好，当时，毛泽东年纪很小，表哥们上学以后，他就常常独自一人跑到野外去抓蚱蜢，到门前的小溪里玩水。外婆怕他出事，就让文玉钦的三子、比毛泽东大三岁的文南松和王季范把这个淘气的小表弟带到私塾玩耍。渐渐地，毛泽东对读书识字发生了兴趣，成了私塾里的一名“旁听生”。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毛泽东竟能把个《三字经》、《百家姓》倒背如流。毛泽东读书的天赋，博得八舅的赞赏，便有意精心培养他。文玉钦精通史籍，知道历代的神童都是在出世后就开始接受教育的，便也着手对三四岁的小外甥毛泽东进行知识的启蒙教育。他除了自己抽空教毛泽东读书写字外，还让王季范教读些适合幼儿趣味的古诗。像曹植的七步诗，骆宾王的《咏鹅》，李白的《静夜思》和李绅的《悯农》等脍炙人口的诗歌名篇，都是王季范最初教会毛泽东背诵的。后来，王季范见毛泽东接受能力特别强，就把自己在课堂里学到的有些东西也教给他。数十年以后，毛泽东的表兄文南松还对人提起过，姑表兄王季范教毛泽东和他读《千字文》和《六言杂字》等难度较高的童蒙诗书，还教过鲁迅先生称之为“夸着读书人光荣”的《神童诗》。据他说，他的父亲很欣赏这部诗作，诗的作者汪洙为宋代神童，九岁善诗，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在这首诗中汪洙全部用的是五言绝句，篇幅短小而诗味浓郁，音韵和谐而对仗工整，宣扬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正统思想，故而被父亲列为私塾学童习作诗歌的教材之一。受父亲的影响，表兄王季范也很喜欢这首诗，平时认真加以研习，并在闲暇时间把它教给毛泽东等表弟。文南松回忆，那时他和表弟毛泽东都很小，不懂诗中含义，只朦朦胧胧地记得：表哥王季范说过这是说读书好处、读书做官的好书，就跟着他囫圇吞枣地背，由于该诗朗朗上口，易于记忆，竟学会了不少。他说，诗中不少句子，如“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和“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到老都铭记于心，很难忘掉。

王季范不仅教毛泽东学习文化，还常常带着表弟到龙头山上去采山菜，摘野果，帮助舅父喂猪、放牛、拾烘，从事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在外公、外婆和舅父、舅妈眼里，他俩在众多的小辈人中，是最招人喜爱的孩子。

除学习和劳动之外，像所有的少年儿童一样，他们最舒心的还是玩。那时候，每逢天晴月朗的夜晚，王季范、毛泽东和唐家阁的表兄弟们，便聚集在门前的打谷场上尽情地玩耍。其中最有趣的是“攻城门”的游戏，十几个小伙伴手牵手围成一个圆圈，由王季范提头：“城门城门几多高——”众人应道：“万丈高！”王季范：“么事马——”众人：“白马！”王季范又提问：“么事刀——”众人答：“关刀！”王季范：“么事柄——”众人，“栗

树柄！”王季范：“打开城门将军进！”就和文南松用手臂架起一道“城门”，毛泽东等小兄弟就一个个从“城门”里进入圆圈，又开始新一轮游戏。

夏秋季节，他们还相邀一起到门前田畈里去抓青蛙，捉蜻蜓、蚱蜢。玩到忘形处，抓起田泥做泥人，毛泽东等年龄小的都是些淘气包，常常用脚踹坏了大哥哥们精心做好的泥人、泥兽，惹恼了就甩泥团去砸他们，这样便又往往引发出了一场“泥仗”。一次，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见儿子久不回家，便提了些自产的时鲜水果到岳母家去看儿子，刚下龙头山，过八斗拗田畈，就见一群伢子在打泥仗。说来也巧，毛泽东正捏着一团泥追打王季范，却不料不偏不倚正砸在父亲的脑门上。毛贻昌十分气恼，怪儿子只顾撒野，不学些识文断字的正经事。盛怒之下，左手提了篮子，右手夹着小泽东来到唐家阁，当着岳父岳母的面把儿子痛打了一顿，心疼得外婆直掉老泪。后来，还是王季范出面向姨父求精，说表弟虽然年幼，尚未入馆就读，但每日一起到八舅的私塾里去耍，也学得不少诗文。说着，当面要表弟毛泽东背一遍《百家姓》，给姨父听一听。毛贻昌听完，转怒为喜，他觉得儿子小小年纪就懂得了书中之事，看来确实比在韶山冲有了许多长进。一向对孩子刻板的他，竟把儿子高兴地举过头顶。当他听说，这些书都是姨侄王季范教给毛泽东读的时，着实把王季范夸奖了一番。

1898年，毛泽东的外祖父文芝仪病逝，七舅和八舅分家析产单独过日子，文家这个三世同堂、数十口人丁的大家庭，一下子就散了。当时，王季范渐渐长大，这年夏天他考取了东山书院，于是便要离开唐家阁外婆家，告别表弟毛泽东，回湘乡读书去了。临行的头一天，王季范把自己已读过的书清理好，把它送给了表弟毛泽东。他叮嘱表弟：要听外婆和七舅、八舅的话，好好读书习字，长大做个人上之人。离别的时候终于到了，小泽东挽着外婆的手，送了表哥一程又一程，直至坳口的那棵大松下……

三年以后的1902年春，毛泽东也告加别了生活六年的唐家阁，回到了生身之地韶山冲，像表哥王季范那样开始上学读书了。但是，在唐家阁度过的那些美好岁月，却令他念念不忘。

王季范和毛泽东离开唐家阁以后，特别是毛泽东回韶山进私塾读书以后，他二人见面的时候少了许多。但他们都十分留恋在外婆家的那段美好的童年生活。于是，逢年过节互相走亲戚，便成了他们重叙友情的机会了。

如前所述，王季范十分聪颖，读书刻苦用功，是唐家阁外婆家孙字辈及外孙中唯一的“秀才”，毛泽东对他十分敬佩。那时，毛泽东虽然正式进学堂较迟，但他天资聪慧，会读书，课堂所学往往难以满足他的求知欲。所以，每次与表哥见面，便成了他向王季范请教知识的最佳时机。王季范很喜欢自己的这位好学肯问的表弟，总是把自己在城里读书所见所闻的新鲜事讲给毛泽东听，把一些新书借给毛泽东读。通过王季范，毛泽东开始知道：韶山冲好小好穷、好偏僻，它离城里有好远、好远，城里好热闹，城里人不种田有饭吃，住的房子却很小，富人坐轿子的现在少了，换上了两个轱辘的车子由人拉着满街跑……从那时开始，毛泽东幼小的心田里萌发了这样一个愿望：自己什么时候也能去城里去看看，玩玩呢？

时光过得很快，一转眼到了1910年盛夏时节。

这时，王季范已经考入湖南省长沙优等师范读书了。毛泽东呢？却又一次陷入失学的困境之中。

毛泽东从九岁启蒙上学算起，先后进了七个私塾，拜了七个先生，总共读了六年书。前两年，父亲给他娶了一房妻室罗氏，加上家中缺乏劳动力，他曾辍学两年在家务农。后经堂兄毛宇居和李漱清先生的劝说，父亲才勉强让他重新进了学堂门。可是，眼下因一个偶然的事件他得罪了族长，父亲不准他再上学读书，他将要永远和书本告别了。

事情是这样的：宣统初年，长江洪水泛滥，向洞庭湖倒灌，八百里洞庭湖区汪洋一遍，百万农民无家可归，淹死和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在长沙，数十万走投无路的饥民，掀起了震惊全国的“抢米风潮”。紧接长沙饥民暴动之后，韶山冲里也出现了“吃大户”、闹祠堂的反抗行动。就在这时，毛氏族族长毛鸿宾在震公祠里囤积了一百多石稻谷，打算趁长沙和湘潭米价飞涨的机会，把粮食运到银田寺下河，然后从水路运到湘潭和长沙赚大钱。这件事情，被毛家的族人知道了，就由一个叫毛承文的佃农领头，找族长毛鸿宾交涉，要求开仓平粜。没想到毛鸿宾却动用族规家法，命令亲信打手把毛承文捆绑起来，召集阖族老少，当众责罚于他，直打得他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这个消息传到东茅塘私塾，毛泽东就赶到毛氏宗祠，听清情由后就替毛承文打抱不平，指责族长毛鸿宾为富不仁。毛鸿宾恼羞成怒，就向毛泽东的父亲毛貽昌告了毛泽东一状。毛貽昌本来就不满意佃农们“吃大户”的做法，听了族长的话以后，觉得儿子目无尊长，有违族规家法，没有体统，丢尽了家人的脸面。一气之下，强迫毛泽东辞退了学校，要他马上离开韶山冲，去湘潭城裕盛米店当学徒。

听说父亲要送他到湘潭去做事，毛泽东心中不由有几分活动。他长到十六七岁，还没有离开过家乡这块天地。早就听表哥王季范说，湘潭是个相当繁华的水陆码头，有一条几里长的大街，紧紧地依着湘江。江里有不少洋船，就像两层房子那么高，船是铁做的，可在水里却沉不下去。他真想即刻去看看百舸争流的湘江，看看湘潭这个繁华的城市……

想到眼前的境况，想到表哥王季范描述过的湘潭城，毛泽东不由想起王季范。他思忖：眼下正值暑期，在省城念书的表哥王季范也一定回到家乡。

按以往的习惯，他回来后一定要到唐家阁看望舅父舅母，并在这里避暑，我何不去唐家阁会会他，并把父亲要送他去湘潭当学徒的事告诉表哥和舅舅，请他们帮助拿个主意呢？

于是，第二天清早，毛泽东换了一身做客的衣服：白布短褂，青布长裤、头戴宝庆出产的细篾丝斗笠，脚登自家编织的苎麻凉鞋，提了鸭蛋、山茶和从南岸塘里捞起的鲜活鲤鱼，迎着早上初升的太阳，走出韶山上屋场，踏上了去唐家阁的路程。

十多里的山路，不用一个时辰便到了唐家阁。自从外婆去年逝世以后，毛泽东到唐家阁走动比从前稀疏多了，七舅、八舅和两位舅母对于外孙的到来，自然是格外高兴。王季范和八舅文玉钦的次子、在湘乡东山书院读书的文运昌，正好也放暑假回到了唐家阁，他们同毛泽东还是今年正月初拜年时会过面，此时别后重逢，更是万分欣喜。

常言道：三个屠夫讲猪，三个秀才讲书。两位表兄和毛泽东寒暄过后，王季范即关心起他读书的事，问他时下学堂开什么课，读何种书，功课可做得来？见表哥问到学习上的事，毛泽东就将谈话引到正题上来，把自己为佃户打抱不平而得罪族长，父亲硬逼他退学，要他到湘潭去当米店学徒等情况，一一对表哥细说了，最后恳请两位表哥帮助拿主意。

听了毛泽东的话，一向文静的王季范不由生出几分激动，他不假思索地说：“姨父要你退学经商？那怎么行呢！你的天资比我们都高，荒废了岂不可惜！得罪了个族长，有什么了不得的！韶山冲不能上学，就不能到别的地方上学？”

毛泽东叹息了一声，说：“书，我是想读的。不过我再也不愿在韶山冲的学堂读了，更不想在韶山冲这块地方呆了！到外面去读吧，有又哪里好落脚呢？”

王季范思考了一下，说：“以你的年龄和文化程度，的确不宜再在韶山读了。依我之见，你可以去报考湘潭、湘乡和长沙的新式学堂，只是去长沙远了些，花销也大，就怕姨父舍不得。湘潭、潭乡远近差不多，但湘乡的东山高等小学堂办得不错，早先是有名的东山书院，刚刚改成洋学堂的。我看就到东山学堂去读吧！”

文运昌接着说：“我们学堂是办得好哩！单是从东洋买回的物理化学仪器，就花费了几千两银子！润之，到湘乡去读书吧，我俩还有个照应呢！”

王季范和文运昌的一席话，极对毛泽东的心路，他本来就不愿弃学经商，只是慑于父亲的压力而不能自主。听了两位表哥的介绍，他终于下决心走出韶山，去投考“洋学堂”。但是，他深知父亲生性固执、专横，他一旦决定了的事，就不容人更改。要让外出求学的想法变成现实，还得做通父亲的工作。当毛泽东向王季范说出自己的打算和顾虑以后，王季范主张先取得两位舅舅的支持，只要他们出面做工作，姨父保准会说服的。

主意已定，王季范就让文运昌去把七舅文玉瑞和八舅文玉钦请到一起，待毛泽东介绍完情况后，他对两位舅舅说：“七舅、八舅！你们看着润之长大的，他绝顶聪明，才华出众，‘四书’、‘五经’很有根底，如果再进新学堂深造，只怕是前途无可限量哩！如今姨父要他弃学从商，岂不是耽误了润之一生一世的事！刚才我们同润之合计了一下，他想到东山学堂继续上学，这事还要请二位娘舅劳劳步、到韶山去跟姨父说合说合。”

王季范的话，入情入理。文玉瑞和文玉欣听罢后，都不赞成妹夫的做法，

表示支持外甥毛泽东继续读书，还当场表示抽空到韶山冲去一趟，说服毛贻昌同意毛泽东到东山学堂学习。

几天以后，王季范和七舅、八舅来到韶山南岸，还请来了韶山的几位先生——毛麓钟，毛宇居、李漱清等，共同做毛贻昌的工作，大家众口一辞，说毛泽东天分好、会读书，只要不断深造，定会大有出息。毛贻昌怕却了众人的好意，只得收回送子经商的成命，应允了儿子到湘乡读书的要求。但是，一向守财的毛贻昌提出读书费用难以筹措的问题，他说：“各位亲朋劝我让石三读书，都是好心好意，我领大家的情！既然大家作了一半的主，我还有什么不赞成的？只是到城里去上学，要花很多的钱，我这穷家薄业的，怕是供不起哩！”

王季范听出姨父这是在趁机讨价还价，意在向亲戚朋友请求资助，就连忙向毛贻昌说：“姨父，那不要紧！到东山学堂去读书，不要太多钱，只要交一千五百文铜钱，连伙食都有了。至于说到其他的用度，侄儿我包下来了！”

毛贻昌知道王季范家境殷实，只要他开了口，供个把人的学费是不成问题的。于是，他笑着朝王季范点了点头，不再吱声了。

据有关资料记载：后来，王季范果不食言，他节省家里给自己的每一个铜板，接济表弟毛泽东。湘乡市《文史资料》这样写道：“在东山小学，毛泽东的父亲守财、刻薄，舍不得给儿子支付昂贵的学费，是王季范慷慨解囊，一次就从家里拿出大洋一百元。……”

就这样，毛泽东在王季范等人的鼎力相助下，终于走出了韶山这个闭塞的山窝窝，投身于斑斓广阔的大世界，在一个全新的教育园地里，尽情采撷新知识、新思想的智慧之果，为自己日后搏击生活的激流，探求个人、民族和国家的振兴之路，储蓄了丰富的精神营养，从而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副无与伦比的身手，承担起了“改造中国与世界”历史重任……

113 保护人

从 1910 年起，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了六七个月的书，这期间，王季范已经在湖南长沙优等师范毕业，受聘于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为了更有利于毛泽东的学习，他给表弟去信，促其到长沙去上学。次年春天，东山小学的教员贺岚光先生奉调到湘乡驻省中学任教，毛泽东便和贺先生结伴而行到了长沙，在王季范和贺岚光的帮助下，他顺利地进入了湘乡驻省中学就读。

毛泽东初到省城长沙，人地两生，一文不名，如果不是表弟王季范充当他的保护人，将是寸步难行的，正常的求学生活也将无法维持。

入学之初，毛泽东面临的第一大难题是交纳学费。湘乡驻省中学是湘乡会馆开办的学校，虽然学习费用较低，而且对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实行公费制，但由于毛泽东初来乍到，报名费和书本学杂费，仍然数量可观。这一大笔钱，对于来自偏僻山区农家的毛泽东来讲，无异是一组天文数字，为了保证表弟按时入学上课，王季范向教务课出具了欠据，保证四十元学费从自己的薪水中逐月扣除。

学费问题解决了，还有住宿的困难。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人都是在省城长沙供职的湘乡籍人士的子弟，他们在城内都有住处，因而校方没有为学生安排寄宿的宿舍。这样一来，像毛泽东这类远道而来的学生，只有自找住处了。当时，王季范的住房很窄，但还是腾出一间房给毛泽东住，而他和妻子、小孩则挤在一起。仅有的一张条桌，也是与毛泽东共用，每天晚上，他总是等表弟完成课后，才开始批阅作业，直到夜深人静。从 1912 年春到 1913 年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止，毛泽东在王季范的家里居住了一年多时间。在这里，王季范和妻子精心照料毛泽东的饮食起居，使身处异乡的毛泽东如同生活在家一样方便自如。更为难得的是，与表兄朝夕相处，使毛泽东学到了许多读书治学的经验，懂得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知识有了大的长进。

1913 年春，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稍后，四师范与一师范合并，他又转入一师范读书。1915 年，王季范受聘到一师任教，并担任学监。他们既是表兄弟，又是师生，交情自然更深了。

这个时期，王季范对于毛泽东不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在经济上全力支持，在学业上谆谆教诲，对他的进步活动也大力支持。当时，毛泽东等有志青年，开始接触《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深受新思潮的影响，积极组织 and 领导革命活动。因此，也常惹出一些“祸”来，多是王季范出面予以保护，他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那是 1915 年的上学期，为了抵制学校当局增收学生学杂费，毛泽东等人在一师发起了驱赶校长张干的运动。校长张干大怒，要挂牌开除以毛泽东为首的 17 名“闹事”学生。后来，是王季范和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等先生出面，召集了一个全校教职员会议，为学生鸣不平，对校方施加压力，才使张干不得不收回开除毛泽东等学生的成命。

以后，毛泽东在长沙从事工农革命运动，几次被反动军阀追捕，都得到了王季范的救援掩护，帮他度过了难关。

1925 年 8 月，带病回故乡韶山开展农民运动的毛泽东，遭到反动军阀赵恒惕围捕，韶山的共产党员事先得到情报，掩护他秘密转移到长沙。当晚，毛泽东潜往王季范家里，通报了自己遭赵恒惕通缉追捕的险情，要表哥帮他

准备几套换洗的衣服和一些盘缠，以作前往广州

之用。还委托王季范设法通知韶山的夫人杨开慧。要她携孩子岸英、岸青随后前往广州。考虑到自己与毛泽东的亲戚关系尽人皆知，为确保表弟的安全，王季范即将他护送到乐古道巷颜子庙的湖南私立平民女子职业学校，安排在政治上比较可靠的湘乡籍教师谭泮泉处住宿。第二天清晨，毛泽东装扮成商人模样，由韶山地下党负责人庞叔侃和工人骨干周振岳护送，由株洲经衡阳，南下到达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

1969年7月，谭泮泉在北京中关村王季范的家中，曾专门撰文回忆当年受王季范之托，掩护毛泽东的往事。他写道：

“1925年一天的傍晚时分，毛主席身披一件黄色大衣，手拿提包，来到贫民学校，见了我，他说：‘我今晚要找你借歇。’我说：‘行！’就把他带到教员宿舍。他问我：‘你睡哪一个床铺？’我指着厢房那边”主席将行李放在我的床上，低声道：‘赵恒惕要捉人，你莫说毛泽东来此。’我送他就寝后，心情很不平静，深恐他不安全。于是出来嘱咐传达室老工人和见到主席的学生，一定要保密，嘱咐完了，才回房和他同寝。翌晨，主席向我告别，我依依不舍，送他到乐古道巷口，远远地望着他走了。

就在毛主席走后的次日，我在局关词墙上看到赵恒惕出的‘赏格’载：‘倘能生擒毛泽东，赏洋千元。’我回到学校，将‘赏格’念给葛母（蔡和森的母亲葛健豪—引者注）听时，何胡子（叔衡）正来校，向警予亦在旁。葛母说：‘毛先生走了就好了！为革命，他真是饱经风霜。’在座的人均为毛主席脱险而感到安慰。”

谭泮泉，湘乡人，系王季范的学生，也是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的同学，与毛泽东过从甚密，解放后，任湖南省文史馆专员。

《湘潭文史资料》第一辑第12—13页。

1927年“马日事变”前，毛泽东前来与王季范告别，说他这次要出一趟远门。王季范没有料到，此次分手，彼此离别竟长达二十余年，直至1950年才在北京再见面。

毛泽东这次走后，一直音讯杳茫。在这一漫长的岁月里，王季范对毛泽东梦绕神牵，深为表弟的安危担忧。

直至十年内战结束，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时局形成，王季范通过报章的宣传和中共方面的友人所传递的信息，才陆续知道了毛泽东的一些情况。原来，毛泽东自“马日事变”离开长沙以后，即前往武汉参加了中共中央的紧急会议。在会上，他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会后，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接着率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发动土地革命，创立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931年在江西东南部的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被选为主席。此后，“朱毛”红军多次战胜国民党军队的“围剿”。1934年10月，他率部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次年十月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2月，促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创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有了表弟的音讯，王季范欣喜异常，立即将这些情况告诉给了唐家阁外家的表兄弟们，以解故乡亲人们十余年对毛泽东的思念之苦。

多年以来，王季范恪守“清静无为”的处世观，一直从事清苦的教育工作，不大过问政治。自从了解了毛泽东这些年来的斗争经历以后，他从表弟毁家兴国、为劳苦大众争解放的革命大无畏精神中，看到了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看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继而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与曙光。从此，王季范如同换了一个人一样，他将毛泽东个人的感情，转化为对毛泽东领导的正义事业的同情和支持，他不仅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钱来赞助进步学生和教师进行革命活动，还利用讲坛向学生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唤起广大青年的革命热情。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王季范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日益不满，对共产党、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充满了无限向往，心一直系着延安那片热土。这期间，他通过多种渠道捎信到延安，给毛泽东带去了许多真诚的问候与祝福，也带去了一份份挚友情、兄弟爱。

后来，为了直接投身抗战，王季范几经周折，把唯一的爱子王德恒送到了延安——毛泽东的身边。

那是1937年的深秋，王季范来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见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事、原一师范教员徐特立，要求办事处帮助儿子王德恒去延安，徐特立当即表示大力支持。数天以后，在徐特立的精心安排下，王德恒终于成行。他和几位进步青年一道先坐火车抵达西安，再改乘汽车到延安。

王德恒到达延安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找表叔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住在凤凰山沟的北山坡。山腰间，院落整齐清洁，院子中间有几棵碗口粗的枣树，依山是一排石窑洞，左右两边还有几间平房。毛泽东居住的窑洞是一个套间，外边是会客室，里间用一块边区生产的土布从中隔开，作为办公室和卧室。窑洞里陈设异常简陋，只在会客室的窗台下放了一张又长又宽的桌子，上面堆满了公文和书籍，后半间架了一张行军床，铺盖和战士们没有什么两样。王德恒一直生活在城市，虽说平时生活上也很节俭，但他怎么也想象不到一个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竟是这么朴素！心中不由对表叔平添了许多敬意。他遵

照父亲王季范的嘱咐，亲热地喊了一声“表叔”，向毛泽东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然后撕开棉袄的衣摆，从中取出父亲捎给表叔的信呈了上去。毛泽东让王德恒坐下喝水，自己连忙拆开书信读了起来。读完信后，他拉过一把小凳子和王德恒面对面地坐着，聊起天来。毛泽东问王德恒：路上走了几天？回过湘乡老家没有？唐家阁、韶山的情况晓不晓得？父母大人的身体好不好？日子过不过得去？王德恒一一作答后，毛泽东又说：“你父亲向我推荐了你，这是信任我哩！可是你们晓不晓得，到延安来，一要吃小米窝窝头，二要住窑洞，三要挑柴背米，四不发饷银，比起长沙来苦得多呢！干革命不容易，你伢子有没有思想准备哟？”王德恒毫不犹豫地回答：“苦，我不怕！来时爸爸跟我说过，表叔为革命吃了好多的苦，他要我来延安跟表叔学习，为天下人的甜去吃苦！”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他对王德恒说，“你父亲的这些想法很好！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许多人的艰苦奋斗，才能取胜。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前……”

经毛泽东同意，王德恒留在延安，参加了革命工作。不久，他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王德恒牢记表叔毛泽东在自己初到延安时上的第一课，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著作，认真钻研军事技术，在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上有了很大提高。后来，中央组建“南下支队”，开赴湘粤沦陷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王德恒得知消息后，向表叔毛泽东提出参加南下支队的请求，毛泽东当即赞同他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接受对敌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44年初冬的一天，南下支队一万余人由王震将军率领在延安飞机坪接受毛泽东、朱德的检阅。王德恒告别了表叔，随大部队离开了延安，回到了湖南老家。在长沙，王德恒过家门而不入，即奔赴桃源地区开辟工作。不幸的是，后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余岁……

王德恒南下，因为事关军事机密，毛泽东没有告诉表哥王季范。后来，王德恒在湖南牺牲，王季范也不知晓。在这几年里，王季范给毛泽东和儿子王德恒写过几十封信，拜托表弟从严教育王德恒，使之在延安这片沃土里茁壮成长。他还反复告诫儿子：要听表叔毛泽东的话，听共产党的话，学习表叔的革命思想和优良品质，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用实际行动为家人争光，为表叔争光！十分可惜的是，这些书信，在国民党大举进攻延安时失落了，倘若保存至今天，当是研究王季范与毛泽东感情交往的宝贵资料！

王季范得到儿子牺牲的噩耗，是在1950年的秋天。就在本文开头写到的那次会见之后，毛泽东亲自把这一撕心裂肺的消息报告给了表兄。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两眼垂泪，哽咽着对王季范说：“九哥，你把德恒交给我，我没有保护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哇……”当时，王季范已是六十多岁的人，老年丧子，其悲痛自不待言！但是，此时此刻他反倒显得极为平静。说心里话，自从把儿子送到延安跟着毛泽东干革命那一天起，他就有了奉献与牺牲的精神准备。现在，儿子既然已经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除了为之感到骄傲和自豪外，还能有什么呢！想到这里，王季范竟安慰起表弟毛泽东来：“润之老弟，快莫这样讲！为了革命，你几十年东奔西忙，抛家不顾；为了革命，表弟媳开慧命丧黄泉，泽民二十四弟、泽覃二十六弟血染疆场，如今你又把岸英大侄儿送到了朝鲜战场……若论牺牲谁比你大！若论痛苦谁有你深！德恒以你做榜样，为天下人的幸福作牺牲，他当含笑九泉，家人亦为他光荣！”毛泽东闻言，稍觉心安，他恳切地对王季范说：“九哥，你说的极是哩！德恒是个好伢子，也是你做父亲的教育之功！人民是忘不了的，我毛

泽东也是忘不了的！你要节哀顺变，照顾好他的一双儿女，有何难处，可直接找我！我们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这次会见之后，党和政府给了王季范很高的礼遇，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了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国庆节观礼……

115 次致电赠国策

解放初，王季范出任湖南行政学院副院长和省文史馆专员之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面对巨大的政治荣誉，王季范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他觉得惟有在有生之年多为国家做些有益的事情，才能对得起党和政府对自己的信赖，才能对得起表弟毛泽东。

建国伊始，王季范利用他和毛泽东之间的特殊关系，经常向毛泽东致电致函，就国家政治抒发自己的不凡韬略，提出了许多诚挚而又中肯的意见，深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重视。他曾三次致电毛泽东，进忠言，献国策，提出“用贤才，立法制，崇道德”三个治国重点，供毛泽东参考。在同毛泽东的书信往来中，他除了谨致问候和报告家乡情况外，还常常结合自己数十年来钻研经史所得到的感悟与启示，与毛泽东一起探讨安邦治国的谋略，希望表弟能够以史为镜，从中找到国家盛衰、存亡的“周期率”，并能打破这个“周期率”，摸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路子。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早在建国初期，王季范就提醒毛泽东注重防止党内腐败现象的出现。他在1951年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剴切陈词：大凡一党一派在萌芽之时，自知勤勉、节俭、奋进、向上。……惟其一接近实际政治，掌握政权，最易停滞和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

王季范的这些真知灼见，深得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赞赏。为了让这位贤达之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提名，毛泽东同意，王季范于1952年聘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参事，并定居北京。从此，王季范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积极参政议政，从事调查研究，努力沟通民主人士与政府的关系，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牵线搭桥。这期间，最值得一书就是前面多次说到的他为湖南一批老教育家如原一师校长张干、国文教员袁仲谦等落实政策，解除疾苦而仗义执言、奔走呼号的事。

此外，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王季范，一直为发展家乡教育而多方奔走。无论是重修省立第一师范，建立湘潭大学，还是扩建东山学校，他或献计献策，或筹资出力，无不尽心尽意，不遗余力。这些，在湖南学界是有口皆碑的，从而深受社会各界的敬重。

晚年王季范，对毛泽东的感情更加深沉执着。这个时期，在他心目中的毛泽东，再不只是他昔日的学生、表弟和挚友，而是万民敬仰的领袖与统帅，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使包括王季范在内的千千万万的旧知识分子，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毛泽东的英明，从而由衷产生出一种对领袖人物的热爱与崇拜之情，又化作一种自觉的行动——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干革命，子子孙孙沿着毛泽东指引的路走下去……

正是由这一崇高感情的使然，王季范常常向孙儿、孙女讲述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故事，褒扬毛泽东建立的丰功伟业，要他们以表爷爷为楷模，象他那样修学和立身，做一个对于社会和人民有用的人。

那时，王季范是毛泽东家的常客，遇上亲朋故旧来访或重要活动，毛泽东总不忘邀“九哥”相聚。每逢这样的场合，王季范往往依照毛泽东的事先关照，携带孙儿孙女一同前往，让他们晋见表爷，接近毛泽东，接受伟人的教育和影响。

毛泽东很疼爱从小就失去父亲的海容和她弟弟，尤其是对清秀、朴实的王海容，更是视为己出，格外喜欢。王海容出生于四十年代初，和毛泽东的小女儿李纳年龄相当，由于她经常随祖父进出中南海，久而久之便和李纳成为好朋友。她俩在家庭背景和生活经历上虽然有很大的悬殊，但性格爱好上却有许多共同点，衣着打扮，个头长相都差不多，总是穿着朴素的服装，方口布鞋，留齐耳短发，戴普通的塑料框近视眼镜，一副典型的学生娃形象，因为这层关系，加上又是至亲，王海容被允随意进出中南海，有时还被留住一段时间，成为毛泽东家里的“编外家庭成员”。她好学上进，生活俭朴，性格文静，又懂礼貌、有教养，令毛泽东刮目相看，便有意对她进行培养和造就。

那是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寿辰那天，毛泽东在中南海举行家宴，除了他自己的家里人之外，还邀请了四位湖南同乡老人作陪，他们是王季范、章士钊、程潜和叶恭绰。按请柬要求，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因此，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章士钊带了女儿章含之赴宴。饭前，毛泽东与四位同乡谈笑风生，论古说今，并问及先生们儿孙辈的情况。毛泽东首先询问章含之，有多大岁数，在哪里做事？当得知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后，毛泽东打趣地说：“年纪不大，硬是个老师哩！”接着又问章：“你来教我读英文，行不行？”章含之恭恭敬敬地回答说：“我的英语水平低，不敢教主席。”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怕什么嘛？我的水平很低。”随后，毛泽东又转而问王海容：“海容，你中学快毕业了吧？”王海容点头回答：“嗯，年底就要毕业了！”毛泽东又笑着问她：“毕业后你有什么打算呀？”王海容老实地答道：“主席，我还没有想好呢！”毛泽东认真地建议说：“你可以去报考大学嘛！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人才哩！”王海容想了想说：“眼下正是困难时期，一个大学生国家要花很多钱呢，这钱还是节省给国家建设用的好。再说，我的学业平平常常，也不定考得上，我看就去当工人、农民吧！”见王海容把个人志愿与国家现状结合起来考虑，毛泽东十分高兴。他对坐在身边的王季范夸赞说：“九哥，你养了个好儿子，又养了个好孙女！你看海容，咯大年纪，就有了忧国忧民意识，这很了不得哩！”王季范谦逊地说道：“主席，你快莫夸她，海容还要搭帮你多教育呢！”毛泽东摇了摇头，说：“九哥，你就莫客气哟，我毛泽东和你王邦模本是一家人，一家人就不说两

家话，培养教育好海容姐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嘛！”接着，他对王海容说道：“海容呵，我这大门一直是朝你敞开的，什么时候你想来就来，来了也可以住下来不走，就算是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你看好不好哇？只是不晓得你爷爷舍不得，放不放心啊？”王季范闻言，激动地表示：“主席，二十多年前我把德恒送到延安，你带着她走上了一条为中国人民求解放的光明之路；今天海容跟着你，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把他们交给你，我舍得，我放心！……”

毛泽东是个极重情谊、守信义的人，自这次谈话之后，他果然开始着手王海容的教育和培养。不过，他培养人不是简单的“栽培”、“提拔”，而是以一个革命家所特有的政治眼光，把培养对象放到社会上去“摔打”，“经风雨见世面”，在艰苦的环境下锻炼成长。他认为王海容首先得过“思想关”、“群众观”和“困难关”，所以就让她到北京化工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劳动中改造世界观，磨炼意志，增强体魄，以便将来能担当重任，王海容不负毛泽东的厚望，在化工厂工作两年，各方面进步较快，很受干部、职工的欢迎。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收获，不仅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65年初，王海容圆满完成了毛泽东要她“做两年工，劳动大学毕业”的任务，受组织保送进入北京师范学院深造。在北师这所学术空气很浓的学校，王海容系统地学习了各科文化知识，文化素质和专业技术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68年，她从北京师范学院毕业，随即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了八个月的俄语以后，被调入外交部工作。从此，这位心地单纯，对毛泽东及其路线无比忠诚的姑娘，被无端卷入了一场政治旋涡。

王海容在外交部工作时间不长，即被提为礼宾司司长，后进一步提升为外交部副部长。于是，这位戴眼镜的姑娘，每逢外事活动便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在党报的新闻图片上。在中国老百姓眼中，她因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而格外引人注目，其地位远在其他副部长之上，成为仅次于外交部部长乔冠华的重要角色。更为重要的是，她在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有着特殊地位——她不仅在毛泽东接见外宾时担任翻译，而且是这位党中央主席家中的常客。在毛泽东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家里的客人是不多的，其他中央领导人有时半年都难得见上他一面，只是在召开政治局会议或接见外宾时，才能和政治局委员们或陪同人员一起见一见。毛泽东非常信任王海容，要她和外交部另一位“小字辈”唐闻生列席政治局会议，然后直接听取她俩关于政治局内部各种情况的汇报及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反映。报送政治局委员传阅的有些文件要列上她们两人的名字。毛泽东知道政治局内部是分为两个阵线的，对两个方面报告的情况他都不轻易相信，而需要他认为是真实的情况。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王海容便充当了毛泽东与政治局其他人之间的一座特殊的桥梁。毛泽东不仅从她这里获得他想了解的情况，而且他的指示有时也要通过她向政治局、中央、国务院其他领导部门传达。因此，王海容在那时被称作毛泽东的“直线电话”。“四人帮”跨台以后，王海容即从政坛上消失了。她“待业”了一个时期后，被安排在她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国务院参事室，担任副主任的职务。

毛泽东当初看上王海容这棵苗子，曾对她进行精心培养，指望她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但是，不曾想却在政治上和个人生活上给她招致了许多麻烦。对此，这位高瞻远瞩的历史巨人大概是始料不及的。

不过，有一点值得告慰毛泽东的是：王海容绝不是那种政治品质不好的人，她把权位看得很淡，只想多为党和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今天的她，依然是一副近视眼镜，蓄着和过去一样的“运动头”，穿一身朴素的衣裳。据与她共事的同志说，她虽然身体民弱，却柔中有刚，做事干练，谈吐率直，工作很有章法。她待人也很谦逊、热情，没有一点官架子。她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说：“人民养育我几十年，党和毛主席教导我几十年，我一定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把全部的生命献给伟大的党，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人民！……”

由此看来，她的祖父王季范并没有白费心血，让她从小跟着毛泽东生活、学习，接受教育和影响。如果要公道地评价地话，长期耳濡目染，王海容从毛泽东这位伟人身上学到了最为宝贵的东西，就是他那为人民、为革命大公无私、虚怀若谷的宽阔胸襟！从这个角度来看，大概不违背王季范老先生“托孤”的初衷吧……

117 “九哥千古”

1972年7月，王季范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其时，年近八旬，身患多种严重疾病的毛泽东，得知这一噩耗后，悲痛不已！

是的，毛泽东怎能不悲痛万分呢？！故人虽离去，记忆却长存。想当年，父亲要他辍学经商，是九哥到韶山上屋场慷慨陈词，极力相劝，父亲才得以送他去湘乡东山学堂读书；想当年，他到省城求学举目无亲，身无分文，是九哥给了他经济上的资助，感情上的慰藉，学业上的指点；想当年，他屡违校规，险遭开除，是九哥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保他过关；想当年，他在长沙建党建团和发动工农革命，几次被反动派通缉追捕，是九哥将个人和全家的生死置之度外，千方百计给他以掩护、救援……。往事，犹如一幕幕电影，在他脑海里闪现。思量至此，毛泽东不禁潸然泪下，泣不成声。为了表示对表兄的哀悼，毛泽东让身边的工作人员特地订做了一个花圈，在花圈的飘带上赫然写着这样几个字：

九哥千古

毛泽东敬挽

小小花圈，寓意深长。这是学生献给老师的一簇花；这是表弟捧给兄长的一掬情；这是人民领袖送给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一份礼！

鉴于王季范同毛泽东的特殊关系，以及这位革命老人毕生的贡献，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7月13日下午四时，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追悼会的规格很高，除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徐向前等大批党政军要员送了花圈外，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郭沫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了追悼会。

追悼会由郭沫若副委员长主持，毛泽东一师范的同学、王季范的学生周世钊先生，代表有关部门致了悼词。悼词首先介绍了王季范的

生平、简历，然后对他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悼词说：“王季范先生解放前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他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多方

赞助进步学生和进步教师进行革命活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对他们的迫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努力活动。解放后，王季范先生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注意改造世界观。关心国家大事，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日益繁荣富强而欢欣鼓舞。”“王季范先生持身严谨，富有正义感。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我们悼念王季范先生，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

第二十一章 徐特立

——一代师表启后昆

屋脊的阔度，决定尖顶的高度。

——引自一位美国名人的话

118 教育界的“长沙王”

1913 年秋，就在毛泽东考入湖南省第四师范不久，学校来了一位新教员。他，就是徐特立。

徐特立的到来，在四师学生中引起了轰动。不少同学早就风闻，这位徐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长沙师范学校的校长，又曾担任过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社会上颇有名气。他只有六年半学历，靠自学而精通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各科知识，十八岁开始在蒙馆授徒，执教十年间亲手创办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和长沙师范，门生遍及长沙城，在湖南教育界享有“长沙王”的美誉。

徐特立原名徐懋恂，按徐氏辈顺又名徐立华，1877 年 2 月 1 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五美山荷叶段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徐树照，除种田外，还经常外出打零工、挑脚，另有一身烧窑做瓦的好手艺，所经营的“徐家窑棚”在四乡闻名。他四岁丧母，姐姐出嫁，十四岁的哥哥徐立太随父下田劳动或出去做工，他便和一个两岁的妹妹静寂凄凉地呆在家里。不久以后，妹妹也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徐特立的幼年，是在孤独凄苦中熬过的。

徐特立九岁那年，父兄因饱受不识字的痛苦，便多方筹集学费，送他入学。这样，他才开始进离家不远的一所蒙馆，读“四书五经”一类的书。最初半年，蒙师只教学生读书写字，死记硬背，从不讲解书的内容和字义，他学了之后既不能理解，也不会运用，收效不大。这使他产生了抵触情绪，不久便转到一个张姓蒙师的私塾学习，这位先生教书非常认真，教一句解释一句，要求学生甚严，而且动辄打人。调皮的学生往往逃学，而他却喜欢这个先生。这位先生很注重教学生做人的道理，除教经书之外，还教读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和杨椒山的遗嘱。朱氏《治家格言》讲的都是日常琐事，徐特立读后，觉得它与“四书五经”比较起来，文字浅显易懂，道理切实透彻，对自己颇有启发。杨椒山是明朝的一位官吏，因弹劾权臣严嵩惨遭杀害，临刑前给儿子留下了一份极富情感的遗嘱，还附有这样一首绝命诗：“浩气还大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少年徐特立对杨氏这种不畏强暴，嫉恶如仇，坚持正义，死无反顾的品格和气节，深表敬佩。阅读遗嘱后，为之流泪不已。后来他回忆说：“使我对书籍发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而不是《论语》。”

徐特立十五岁时，转至浏阳河畔一座大古庙里读私塾，老师是一位有道高僧。这个和尚老师不仅教他读八股文，而且还教他静坐、读佛经和禅宗语录。他从此开始接触到一些唯心派哲学。

1893 年，徐特立的家境愈趋窘迫。他在读完六年蒙馆之后，终于辍学在家，一边劳动，一边自学。这时，他为自己的前途而苦恼，一心想找份职业，弄碗饭吃。

辍学两年后，18 岁的徐特立开始在五美乡小塘湾教蒙馆。五美地处长沙和浏阳之间，徐特立经常前往长沙城，逐渐接受了康、梁的维新思想，拥护他们的变法主张。他重新拟定了自修计划，决心钻研近代科学，寻求御侮救亡的道路。这期间，他边教书，边读书，努力博览中国经、史、子、集，刻苦攻读国外传入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比较系统地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国文等学科的基本知识，为日后从事教育工作打下了扎实基础。

1905年，徐特立28岁。当年清政府举行考试。他出于前途考虑，同时也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文化水平，乃报名参加考试。初次应试，虽未考取秀才，但因预考被录，名望大力提高，年俸由十四串钱而上升为六十串，一跃四倍，这是他引以自慰的。然毕竟应考落第，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职业问题。正当他为前途而焦虑的时候，社会改革和时代进步给他带来了一线光明。

1905年，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长沙望麓园新办起一所宁乡师范学校，徐特立考入该校学制为四个月的速成班，虽然，论文化程度他已在一般教员之上，但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倒很新鲜，使他受益匪浅。特别是校长周震麟，系同盟会员，刚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学校里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主张，使他深受影响，迅速走上“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而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

四个月紧张的学习生活很快便结束了，徐特立和同学们即将跨入社会。毕业典礼上，周震麟校长热情洋溢地说：“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专门培养你们当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和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于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徐特立深为周校长这种鼓励所感动，立誓毕业致力于教育事业。

宁乡师范毕业后，徐特立与同学姜济寰和何雨农一起，在离长沙三十里的■梨，创办了一所梨江高小。姜、何家庭富有，自己出资；徐特立没有钱，自愿出力，不拿工资，只管饭，在学校任课。

1906年春，徐特立应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的聘请，初次进长沙城至该校任教。由于靠平时刻苦自学打下的良好基础，他在周南女校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既授国文、历史，又兼教地理、数学等课程。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我半教半学，读了许多古文，还读了新的地理、历史和数学。1906年，我离开蒙馆成了学校的教师，同时教地理、历史、数学三科，教小学兼教中学。……后来一直教到中学以上的高等师范学校。”

从1906年到1910年，徐特立在长沙四年的中学教学中，感到基础教育——小学教育问题不少，直接影响到中等教育，便决计离开中学，研究小学教育。1910年春，他前往上海，入江苏省教育会所办的“单级小学训练班”，边学习、边考察上海的小学教育。接着，他又东渡日本参观考察小学教育约两个月。归国后仍至周南女校任教，兼任小学部校长。为了将所学到的新鲜知识和自己的工作实际结合起来，推广先进经验，改进教学，提高小学教学质量，他创办了《周南教育》周刊。他亲自动手写文章，自己校对，自己发行，自己筹款，使这份湖南最早的教育刊物办出了特色，而受到教育界的热烈欢迎。在他的倡导下，1910年，湖南破天荒地举行了第一次全省学生成绩展览会，他每天课余前往参加，将各校成绩详加审阅评比，从中总结成绩，发现缺点，明确改进教学的方向。在此基础上，他又利用课余时间整理自己的参观笔记，写出了一本《成绩批评小册》，以每本三分钱的低价卖给各校教师作为改进教学的参考。这本小册子，既有理论，又有实际，是他去上海、日本学习教学理论和经验，同他自己多年的教学实践以及全省各校的教学成果相结合的产物。《周南教育》和《成绩批评小册》，对湖南改进小学教育状况起了较大的先导作用。后来，他回忆这些事说道：“我认为实际第一，书本第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可以不要，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本则越多越好。”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省城教育界人士，在徐特立、何雨农等

人的策动下，积极参加了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长沙起义。长沙起义后，湖南成立临时议会，徐特立公开发表自己的政见，竞选当议员。鉴于他对教育的贡献和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结果被选为省临时议会副议长。在议会里，他和一部分议员主张各县县长由人民选举，但官僚代表反对这个主张，暗中和官绅勾结，把已经通过的议案搁置起来，不提交给政府，使之无法实施。徐特立等议员继续斗争，结果议会被强行解散，民主共和成为泡影。通过这件事，徐特立认识到从议长到议员不少人心怀鬼胎，总想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国计民生，而是个人的升官发财。他痛恨某些人挂着革命党的招牌，争权夺利，当上官就背叛人民的可耻行径。他感到辛亥革命已经失败，革命党已经变质，愤懑之余，毅然辞去议长之职。几乎与此同时，他还曾应邀到省教育司做过几个月的科长。其后，他主张发展平民教育，反对省教育司长陈某削减学生数额，裁汰个人不喜好的教员之弊政，因权不在手，反对无效，遂立即交出委任状，离开教育司。这件事终于促使他变成了一个“教育救国论者”，认为“政府总是坏的，革命党做了官就要叛变”，决心“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徐特立离开教育司后，担任善化高小校长。当时，他的同窗好友、长沙知县姜济寰打算大力发展教育，在全县建立一千所国民小学。为此，准备先建一所师范学校培养教师师资。姜请徐特立担负这个学校的筹建工作。他接受这个任务后，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困难很多，非常艰巨。善化高小设在化龙池，房屋十分破旧，他便让人腾出一些旧房子来，并就校内的走廊、过道等添辟一些房间，作为师范的教育和办公室。然后，他又与湘岸樵运局负责人商量，将该局存放在善化高小后面的硝磺拨给学校变价使用，得现金一千元，以解决师范开办经费问题。在他的努力下，一所命名为“长沙师范”的新学校，终在“盘根错节，历尽艰辛”的情况下创办成功，并于1912年春正式招收学员。半年后，又另选荷花他的泐潭寺为永久性校址。徐特立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当学制为六个月的二部讲习科学员毕业时，徐特立高兴地为他们写了这样一首《毕业歌》，既概述了他办学的艰辛，也表达了他大兴教育的目的和意愿。歌词曰：

“非夸长沙十万口，子弟不教非我有。

十八乡镇半开化，少数通人难持久。

莫谓乡村阻力多，盘根错节须能手。

莫谓乡村馆谷薄，树人收获金如斗。

大家努力树桃李，使我古潭追邹鲁。”长沙师范诞生后，面临着种种困难。1913年，袁世凯的爪牙汤芑铭督湘。他把学校视为“制造革命党的机关”，蓄意克扣和停发教育经费，致使不少学校关闭或停课，长沙师范也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徐特立不忍坐视数百学员失学和长沙县创办一千所小学的规划破产，决定将已初具规模的全部校舍租给省立第一中学使用，而本校全部师生则搬到破旧的城隍庙，照样继续上课，以每月数百元的租金收入弥补学校经费之不足。

由于经费困难，长沙师范教职员的工资待遇一直是比较低的。作为校长，徐特立规定自己同主任、庶务、缮写等拿同等工资，月薪二十元。以这微薄的收入开支伙食、购买书籍、维持家庭生活、接济困难学生，显然是不够用的。他只得到外校兼课，增加部分收入，以解决经济拮据。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长沙师范虽然简陋，却为长沙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材。徐特立日后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时说：“长沙县（包括今天的长

沙市和长沙县——引者注）的教育，民国八年以前，差不多都是我一手办的，不独创办了男女两师范，而且创办了实习批评会，教员训练班，一周的、一月的、三月的，各种各样的都有。长沙一共有八百个小学校，所有教员都是短期间由我一手培训出来的，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

徐特立在长沙师范当了两年多的校长，由于出资帮助家乡兴办五美高小和解囊接济贫困学生，亏空六百余元而无力偿还，这样被北洋军阀汤芑铭麾下的湖南教育当局所不容，不得不辞去校长职务，然后受聘到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任教，讲授修身、各科教学法，并兼任教育学习主任……

能拜徐特立这样有名的教育家为师，同学们都引以为荣。毛泽东也是如此。以后的事实证明，徐特立不愧为是一位能给学生以良好影响的好老师，他以自己的优良品格和高尚师风赢得了毛泽东的尊敬和爱戴，从而成为毛泽东在一师中关系最为密切的老师之一。

119 特立独行的先生

徐特立原名叫徐懋恂，现名是后来才改的。

他改名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893年，他的养祖母病重，经求神拜佛均不见效，就许愿到南岳衡山进香。为使祖母转危为安，他与同乡十余人，共租一条小船顺浏阳河而下湘江，再逆水南行，前往南岳。在四天的水上行程中，同乡们嫌船行得太慢，天天呵斥船夫，而他却为船夫无故受责愤愤不平。他当时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我若是一船夫，就决不渡人，只运猪：我读书如取得科甲，就只做教书先生，而不当欺压百姓的官老爷。南岳归来后，他就更名为徐特立，取意“独行特立，高洁自守，不随流俗，不入污泥”。这一年，他十六岁。毛泽东则刚刚出生。

有人说过：名字是每个人特有的符号，这不是昭示着主人的命运，便是寄寓着主人的秉性。的确，名如其人，徐特立的为人及其独具特质的个性，与他的名字相应照，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一师范，徐特立是位与众不同的老师。

——徐特立生活上与众不同。当时，长沙中等以上的学校极少，这些学校的老师十分稀罕，在社会上有着相当的地位，许多人还保持着前清绅士的派头，冬裘夏绸，衣冠楚楚，穿的不是中式长袍马褂，就是西装革履；那些留过洋回来的，则是一派洋打扮，装出一副洋相。他们每天到学校上课，也都要雇请三人抬的轿子，以示阔气。徐特立却与众不同，他虽当选过省议会副议长，又曾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是全省有名的教育家，生活却极简朴，穿著也极普通，一年到头，布衣布鞋，活像个乡下人，故有“徐二叫化”之谑称。一次，他去周南女校找老友朱剑凡校长相聚，新来的门房不认识他，看了他的装束后问：“你说徐特立先生来会见朱校长，徐先生在哪里？”徐特立笑眯眯地指了指自己：“鄙人正是。”那个校工虽然客气地让他进去了，但还是感到诧异：此人这副寒酸相，怎能和大名鼎鼎的徐特立对得上号呢？徐特立在一师任教时，住地开始在长沙北门的荷花池，后来在浏阳门的李氏园，到南门外书院坪的学校上课，每天要走近十里的路，但从来没有以轿代步。下雨天，他穿着木屐钉鞋，撑着朱红纸伞，腋下挟着讲义，按时到校上课，从不缺席。

徐特立的这种难得的反绅士精神，不仅为毛泽东等学生们深深敬佩，而且也影响了其他教员，改变了当时一师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奢靡之风。一师有个图画教师黄澍涛（号梓北），子女多，家庭生活困难，还雇三个轿夫，使经济很吃紧。但为顾及“面子”，仍然咬紧牙硬挺着。自从徐特立到学校任教后，黄看到徐这样有名气的先生也是那么省俭，便下定决心向他学习。一天，黄澍涛对徐特立说：“徐先生，你不坐轿子，学生仍然很尊敬你，今后我也要学你。”从此，黄到校上课就再也不坐轿子了。

徐特立对个人和家庭生活开支，总是千方百计地节省。他的家眷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当学生问及他为什么不迁家进城时，他说：“城里生活费高，不如住在乡下省钱。我的薪资少，还要维持一个小学的费用，不想法子节省就更困难了。再说，家里不进城，孩子可以在农村学校念书，让他们多懂得些艰苦，养成勤劳朴素的习惯，比在城市的学校好得多！”这时，学生们才明白：徐先生为了让农民子弟有机会上学，用自己的部分薪金，让出自家的房子，在家乡创设了五美高小，而他和家人却过着异常勤俭的生活。

是的，为了筹资兴学，他是够艰苦的了。那时，他每次回家看望家人，八十里路全靠步行，连往返的午餐费也舍不得花，带些家炒的薯片之类的东西，聊作路上充饥之用。徐特立曾经专门谈到过这段艰苦生活，他说：“我自己没有财产，也没有办法赚过钱，有什么能力创办学校呢？我的办法就是：每日多上课两小时，一月多得六十元，分给两个高小用。家留在乡下，节省日用，谢绝一切应酬，绝对不请朋友吃酒肉和茶点。……”

徐特立这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对毛泽东具有很深的影响。此后，他一生加以效法，并发扬光大。在一师读书时，毛泽东就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学生；后来身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更是一直保持着这种优良品质。

“历览前贤家与国，成由勤俭败由奢。”对历史的借鉴，使毛泽东深深懂得：吴越之争中越国能反败为胜，功在勾践卧薪尝胆；梦求千秋霸业的秦王朝何以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罪在统治者的骄奢淫逸。正是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他衣食住行，一切从简。吃的是粗粮，穿的是补丁衣，睡的是木板床。他统率千军万马，打了大胜仗，最高要求是吃一碗红烧肉，算做补补脑子；他夜以继日地操劳国家大事，充饥的只是一小碗麦片粥或者几块霉豆腐；他1949年作为一个新诞生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进京时，全部家当中竟找不出一件没有打补丁的衣服，1953年至1962年十年不做一件新衣，直到1976年他逝世时，身上还穿着补丁探补丁的内衣……一个有权有钱的人难得一生节俭，而毛泽东一生能一以贯之地坚持清廉作风，从而给他的人民、尤其是给领导干部树立了一个高大形象，同时也给自己增添了巨大的政治威望……

——徐特立在教学上与众不同。他讲课时，声音宏亮，富于表情，常以手势助说话，很有感染力。且善于联系社会生活和学生思想实际，不讲干巴巴的教条，也不喜欢谈抽象空洞的大道理。学生们都觉得他讲课好懂，容易接受，并切合实际。他常以古往今来的模范人物及他自身的生活体验启迪学生。如一次修身课讲到“节俭生活”，他指出俭朴的生活不但可以省钱，更重要的是使人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锻炼坚强的意志，陶冶崇高的品质。他告诉学生：“我生平过惯了俭薄的生活，觉得只有俭薄，才能使人精神愉快。”

“我还有一桩得意的事情，就是从来没有被扒手扒过东西。我的房里没有皮箱、大柜，也没有值钱的家具、物品。我有钱就随手放置在网篮里的破书籍中，扒手不会想到这些故纸堆中会放着他们所要偷窃的钱，因此我的钱从不曾失过。我在街上走路时，扒手们看见我穿得这样破旧，很快就走开了，因为他们当心我扒他们的东西！”他这种授课方法，生动具体，深入浅出，内容既丰富又扎实，深受学生欢迎。

他还善于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特长。当时一师学生读书蔚然成风，爱好文学，写诗歌和散文者甚多，偶有写游戏文章贴于自修室的窗子玻璃里面，供从室外走廊上过路人的阅读。最初有《晚钟报》、《神鞭报》，后来又出现了比较守旧的《■坛报》，彼此之间展开笔战。因为贴在窗上，故称“窗户报”。有人认为“窗户报”有碍瞻观，主张禁止和取缔。作为兼管学生品行的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不但不加禁止，而且因势利导，还让教务处挑选优秀作品贴在“揭示栏”让师生传阅，助长其争鸣气象，活跃学术空气。当年毛泽东的不少诗文，就是在“揭示栏”内由同学们观摩，然后传抄，从而保持至今的。

——徐特立接人待物与众不同。他虽然为人严谨，执教认真，但对学生亲善随和，人称“徐二外婆”。他自己是贫苦人家出身，因之“平日最喜欢

贫苦学生”。在长沙师范时，他行使校长职权，尽可能地照顾劳动人民的子弟入学。他曾破格录取了一个退伍兵和一个铁匠。退伍兵叫廖桢，曾在一个人店铺当雇工，从未踏过学堂门，仅认识二三百字。经过考试，因成绩太差，未被录取。廖一再请求收留他，恳切地对徐特立说：“我也自知程度不行，但我有志读书。”徐特立见他求学心切，就破格予以录取。他笑着对廖说：“我就取你这‘有志读书’四个字。”铁匠叫黎升洲，也因成绩不合格，经徐特立介绍到湖南军械厂做一个临时工，再行录取的。廖、黎入学后，刻苦学习，进步很快，日后都成为某一方面之才。

徐特立来到一师任教以后，更是以爱护学生著称全校。一次值日查夜，他发现一个学生在床上呻吟，当得知该生患了脚气后，便亲自打了一盆水给他洗脚，然后又给上好药，这才离开寝室。后来事情传开了，有的教师说徐特立不爱惜自己的身份，竟然给学生洗脚。话传到徐特立的耳朵里，他淡然地说：“好事有人夸大，就像坏事有人夸大一样。我只稍微做了一点，就马上有人说我经常替学生洗脚，是把我的一点好处夸大了。”徐特立特别关心那些出身贫寒，但学习成绩却很好的学生，常常节衣缩食，省钱接济他们。他发现本科一班有个学生非常刻苦好学，大有培养前途。可是该生家庭困难，没有钱买书。于是，他就把自己在书店里买书的贴子，给这个学生拿到书店里选自己喜爱的书籍，书款统一由他清偿。入夏，这个学生没有蚊帐，蒙头睡觉，徐特立又给他买了一床蚊帐。这个学生后来果不负老师的厚望，成为一名著名作家。他忘不了徐先生对自己的关怀照顾，当徐特立七十寿辰时，专门从上海寄诗一首到延安向老师祝寿，诗中写道：“……学生遍天下，春风无不被；寒极暖亦近，雪深草弥翠。”洋溢着对老师的

衷心敬爱和深情厚意。这个学生，便是日后大名鼎鼎的田汉。

与此形成鲜明反差，徐特立对那些当官的、上司却没有唯唯诺诺，更不愿去曲意迎合，有时还“对着干”。当时一师的校长张干，年青有力，富有事业心，聘请了一批品德高尚、学有专长的先生来校任教，象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黎锦熙、方维夏、袁仲谦、王立庵、易培基、罗元鲲等等。但是，他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在学校礼堂里，高高悬挂着袁世凯的“训令”，禁锢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因而引起进步师生的不满情绪。徐特立早年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的熏陶，极力主张民主政治，是一个向封建专制开战的猛士。他在担任长沙师范校长时，就十分注重发扬民主，从不搞个人专断的那一套。到一师任教后，自然对张干的作法看不惯，常常发出“民主教育”的呼吁，如要求组织校务会议，成立学生自治会；开校务会议时学生会必派代表参加；校内一切重要事务均应先行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和决议，然后方能公布执行，等等。这样，他同张干之间就产生了一些矛盾。这种矛盾，后又因徐特立为毛泽东等在一师掀起学潮的学生鸣不平，而导致白热化，最后以徐特立罢教一年、张干离开一师后才告终。

徐特立艰苦朴素、奋发有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以及坚持正义、爱护学生等优良作风，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思想印记。他后来多次对人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他还赞扬徐特立：“他是我上第一师范时的先生，他还是我革命的老师哩！”

徐特立不仅品德和学识堪称一流，还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套良好的学习方法。而后者，对于求知若渴的毛泽东，产生了更为积极的影响。

当时一师学生课外自学已成风气，但在读书中存在着贪多图快、不求甚解的毛病，因而读得多，忘得快，效果欠佳。针对这种情况，徐特立结合自己长期积累的“读书以少为主，以彻底消化为主”的经验，提出了“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主张。

他向学生谈了自己的读书见解，“我读书的办法是‘定量’、‘有恒’为主。不切实际的贪多，既不能理解，又不能记忆。要理解必须记住基本的东西，必须‘经常’、‘定量’才成”。他还以自己的学习经历，向学生现身说法：他学习《说文》，苦于篆文不易熟记，每天只学三四字，晚上睡不着或平时走路，常常用右手指在左手掌中写来写去，《说文》部首五百四十字，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读完；学数学，常把一本表解装在口袋里，走路时，先翻看一条定理或一个题目，边走路、边思索、边记忆，走了一段路程之后，掌握了，再翻看另一条定理或另一个题目；学心理学、伦理学，对其中的术语，也是选抄成小本子，放在口袋里读熟。因此，他认为，不怕书看得少，就怕囫囵吞枣，只有严守一个“少”字诀，下苦功夫，长期坚持，才能学得深，懂得透。

但是，要真正做到“彻底消化”，还要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就是说，读书之前要做好准备，全神贯注，边读边思考，通过思考估定书本的价值。在阅读时，要用笔勾画出书中要点，摘录出书中精粹之处或写下自己的随感和心得体会。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得扎实，记得牢固，领会得深刻，真正做到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达到学以致用目的。

徐特立的读书方法，在—批好学上进的学生中得到积极推行，从而使—师的读书风气很快起了变化。特别是正潜心探索为学之道的毛泽东，非常赞赏老师“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读书方法，认为这确是值得学习的治学成功经验。从此，他记住这一至理名言，注意把读书、思考和批注结合起来，终生实践，受益无穷。

现存的历史资料中，关于毛泽东躬行“不动笔墨不看书”的例证很多，难以一一尽述。

经过徐特立几年的熏陶，及至—师学习后期，毛泽东已把“不动笔墨不看书”当作读书的习惯定势，坚持不辍。他听课写有“讲堂录”，课后读书有读书笔记和批注，阅报写读报摘记或札记。同时，还有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以及摘录精要的摘录本。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写日记。这样，经过数年的辛勤积累，毛泽东所写的各类笔记本有几网篮之多。他很珍爱这些笔记，毕业时携带回老家韶山收藏。1929年，国民党军队到韶山抄他的家，将这些本子和书籍全部给人焚毁了。毛泽东的塾师毛宇居，从火堆中抢出两本书籍和一个笔记本，这本笔记本就是现存的《讲堂录》。

从—师时期起，毛泽东养成的手中无笔不读的良好习惯，后来几十年坚持不废。从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保存的他阅读过的大量书籍中，随处都可以看到他圈圈、点点、朱墨纷呈的斑斑笔迹。例如，在延安的艰苦岁月，毛泽东仍然阅读和批注了大量的马列著作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军事和不少自然科学书籍。批阅较多的马列著作有《共产党宣言》、《资本

论》、《列宁选集》、《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斯大林选集》等等。这些著作毛泽东都反复研读，许多章节段落都作了批注和勾画。有的书他读过多次，每读一遍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在上面加上圈点，作一次批语，有些后面的批语又是对前面批语的修正和补充。他批阅较多的哲学著作也有几十种，其中苏联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批注最详，所写的文字评语最多。这部论著的两个版本，毛泽东从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仅半年时间就用毛笔、红黑蓝铅笔在书眉和空白处写下了一万三千多字的批语。此外，还勾画了直线、曲线、直线加曲线、双直线、三直线及圈点、双圈、三圈等表示特定意思，只有毛泽东本人才看得懂的各种符号。这部书的《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一章批注文字最多，最长的一段批文近千字。所有的批注都是用隽秀的行草体书写的，字迹清新俊逸，书写如行云流水，令人叹为观止。批语不少地方是联系中外历史以及当时中国抗日战争的实际，进行分析对比得出的结论和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总结；提出了一些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重要价值的政治见解和哲学观点，其中有许多哲学命题，可以说是说对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这些被毛泽东批注过的书籍及批注的文字，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的一份极其珍贵的遗产，它对于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思想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从这种意义讲，我们更应该感谢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先生，是他当年教给了他的学生一套独特的读书方法……

“不动笔墨不看书”，徐特立传授的这条读书秘诀，曾使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受益匪浅。但愿今朝的莘莘学子，也能从中有所借鉴。

121 并肩反帝倒袁

正当毛泽东在徐特立、杨昌济等良师的引导下，像蜜蜂一样在知识的花丛里尽情地采撷花蜜的时候，国内政治局势日益恶化了。

1915年5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向北洋军政府递交了“袁的美敦书”，提出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寻找靠山，竟然承认日本提出的全部条件，使中华民族蒙受了千古奇辱。随即，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倒袁运动。

一师是当时政府认定的“动乱窝子”，自然也是湖南教育界开展反帝倒袁活动的中心。因之，毛泽东和他的老师徐特立、杨昌济等率先

响应，立即放下书本，走出课堂，积极投身于这场斗争之中。

5月9日，《湖南公报》发出袁世凯正式承认“二十一条”的号外：“北京电，交涉已和平解决矣！”“四十八小时届满，无耻地屈服了！”消息传来一师，师生群情激愤。毛泽东更是义愤填膺，他在学校进步教员杨昌济、徐特立和方维夏等人连日赶急编印的揭露袁世凯卖国罪行的补充教材《民耻篇》上奋笔疾书：“5月7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表达了他要勇敢地站出来，和进步有为的一代青年学子一道，肩负起为国报仇雪耻的历史重任的决心。

正当毛泽东为“五·七”国耻而痛心疾首的时候，与他交往甚深的一师同学易永畦不幸逝世。在学校举行追悼会的头天晚上，毛泽东心潮翻滚，夜不能寐。想起国势危急和良友早逝，他悲愤交加，慨然挥毫作了一幅挽联和一首五言古体诗，表达了对挚友英年早逝的悲痛悼念之情和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挽联的内容是：“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腥秽待煎，独我来何济世；生死安足论，百年会有殁，奇花初茁，特因君去尚非时。”五古诗题为《列嶂青且茜》，诗曰：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踟躕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茜，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
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与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诗中“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涤荡谁氏子？安得辞浮贱！”等句，意思是说祖国已处于日寇和沙俄帝国主义的包围之中，国难当头，我们决不可为自己的身世低下微贱，就不去承担这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而应该扬眉拔剑，挺身而出，为国家民族效命。毛泽东以诗言志，抒发了自己忧国忧民，决心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斗争到底的豪情壮志，受到了师生们的高度赞扬。大家纷纷传抄他写的挽联和诗词，使之一直流传到今天。

与此同时，与邪恶势力毫不妥协的徐特立也奋不顾身，勇赴国难。徐特立是一位具有反帝反封建精神的知识分子。他早年深受康梁学说影响，思想颇为激进。在周南女校任教时，受长沙流传的《猛回头》、《浙江潮》、《中国魂》、《新湖南潮》等革命刊物的启蒙教育，民主意识日渐浓厚，认定只有推翻专制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和朋友朱剑凡等，经常商讨时事政治，把学校作为传播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和宣传革命的阵地。1906年湖南兴起的大规模“保路运动”，徐特立是发起人之一。在他的组织和策划下，长沙各公私立学校全体实行了罢教罢课。这是湖南最早的学生运动，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和清政府。它鼓舞了教育界人士反帝反封建的勇气，为后来响应辛亥革命，参与“长沙起义”，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五·七”国耻后，徐特立与学生毛泽东和其他进步师生相互呼应，展开了一系列的反帝倒袁活动。5月7日，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的当天，徐特立通过新闻媒介得知消息后，立即同杨昌济、方维夏等先生商议，决定编写一本书，彻底揭露袁世凯卖国求荣、企图复辟帝制的丑恶嘴脸。通过他们几天通宵达旦的努力，一本题为《民耻篇》的小册子与广大师生见面了，师生们进行反袁斗争有了武器。稍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活动加剧，指使他的亲信在全国各地成立所谓“筹安会”，大演“劝进”丑剧。湖南也出现了这股复辟逆流，禁止各报刊登反对帝制的文章，压制各种反袁言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为了对这股逆流进行反击，徐特立和毛泽东、蔡和森等进步学生，共同主编了一本反袁小册子，汇集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袁言论，定名为《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的主张》，到处散发。同学们非常佩服地说：“我们只知道暗里骂，就没有想到如何更进一步去做。”这件事影响很大，被军阀汤寿潜发觉，于是派出大批军警到一师搜查，但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早有准备，没有查出一点“乱党”痕迹来。此外，他们还同教师队伍中的复辟势力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当时，一师有一位叫廖笏堂的教师，在船山学社讲学时也曾认为“帝制不合国情民意”，表示反对。但回到学校后，却在课堂里向学生鼓吹袁世凯“有才能，有魄力”；宣称“帝制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徐特立和杨昌济、王季范、袁仲谦等富有正义感的教师，深恶廖笏堂的卑鄙行为。便用毛泽东、蔡和森等一部分学生的名义，写信给他，痛斥廖“一人之身，两种面目”，使廖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再也不敢妄吹帝制了。

这期间，最叫人荡气回肠的是，徐特立拔刀断指、誓死反对袁贼复辟帝制的壮举。一天，在长沙修业学校兼课的徐特立，应邀向该校师生作时事报告。会上，他慷慨陈辞，历数袁世凯对外奉行屈膝投降政策、出卖国家主权；对内借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之机，在湖南枪杀所谓“党案”牵连者数千人，为其复辟帝制清扫道路的滔天罪行……越讲越激昂，越讲越悲愤，声色俱厉，热泪如注。突然，他纵身从讲台上跳下来，跑进厨房，取来一把菜刀，当即砍断右手小拇指，以示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愤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

顿时，血流如注。徐特立即以指蘸血，写了“请开国会，断指送行”的血书，交给即将赴京请愿的湖南立宪派人士罗峙云（又名罗杰）等人，然后就晕倒了。事后，湖南省内外的一些报纸纷纷报道这一新闻，有人还作了一副对联予以赞扬：“罗峙云仗义执言，效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霁云之风。”南霁云系唐朝将领，安禄山反叛时，他镇守睢阳。当时，城中粮尽，他请求贺兰进明出兵援助，贺兰进明不肯相助，还强留他赴宴饮酒作乐。宴度上，南霁云哭着说：“睢阳将士不食月余日矣，义不忍独食。”说完，拔剑断一指，令满座人等惊异不已。出城时，他用箭射中佛寺的浮图，说：吾归破贼，必灭贺兰！”于是，又回到被叛兵围困的睢阳城。最后，危城陷落，他被俘，英勇献身。人们以徐特立比南霁云，借以称颂他的爱国之举。从此，徐特立的美名蜚声湖南，传遍全国。

1916年6月，袁世凯在护法运动的压力下，众叛亲离，只当了八十三天皇帝，就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随后，北洋军阀汤芑铭也兵败离湘。包括一师师生在内的湖南人民反帝倒袁斗争宣告胜利结束。后来，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老师徐特立在这段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的情形时，说：我们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122 离别又聚首

反袁斗争胜利后，毛泽东与徐特立为了各自的事业分别了。不期这一别竟是六年，直至大革命时期才在长沙相聚。

1919年，年届四十二岁、执教二十余年的徐特立，在反动军阀的迫害下，感到报国无门，前途无望，决心走自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开辟的路——赴法勤工俭学，做一个“拄拐棍的留学生”，去学习西方的新思想、新技术。

是年夏天，他卖掉一部分书籍器物，筹集了一笔经费后，秘密离长赴沪，着手熟悉法国的生活习惯，办理出国手续。因侥幸地碰上了一个相识的华工水手，他们一行十余人，享受特殊待遇，只花了平日船票费一百元的一半，于9月28日登上一艘法国邮船，正式开始了旅欧航程。途经香港、海防到西贡，由于船上运载的货物起火，在西贡耽误了十多天。接着继续航行，经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横渡印度洋，经科伦坡、吉布堤、红海至苏伊士运河；再穿越地中海，经原英属马尔他岛，绕过意大利南端，历尽千辛万苦，航行五十余天后，终于十一月下旬到达法国南部马赛，然后坐火车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到法国后，他先进入木兰省公学法文补习班，插班学习法文。由于年龄大，记忆力差，记单词比较困难，他谦虚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学习。经过七个月的刻苦攻读，基本上掌握了一些常用法语，凭借“图”、“式”的帮助，能勉强地阅读数学书籍之后，便进入法国南部圣徕猛钢铁厂，一边做工和替中国工人煮饭，一边学习。这样半工半读学了一年多，方进入巴黎大学学习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

当时中国留法学生形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官费生和有钱的自费生，即贵族派；一派是勤工俭学的平民派。两派学生在国内的政治经济地位和来法国后的生活待遇迥然不同。华法教育会在李石岑、吴稚晖等的把持下，一味压制勤工俭学生，致使他们陷入失业、失学和饥饿的境地。后来双方为争夺里昂大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里昂大学是以解决勤工俭学生的求学为名，在国内进行募捐所得，加上法国政府“退回”庚子赔款经费，专为中国留法学生而创办的。当时，里昂大学校长兼华法教育会负责人吴稚晖，私自在国内招收一批军阀官僚子弟，并侵吞国内为勤工俭学生捐献的经费，使得许多真正的勤工俭学生饥寒交迫，流浪异国，无处存身。1921年9月，里昂大学建成，勤工俭学生在蔡和森、赵世炎、李立三、陈毅等领导下，进占里昂大学，为争取上学权利进行斗争。这时，吴稚晖玩弄流氓手段，竟然勾结中国驻法公使和法国政府，派数百名军警包围里昂大学，以“强占校舍，扰乱治安”的罪名，强行将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陈毅等104名勤工俭学生装入囚车，押上火车，转马赛上轮船，送回国内。

徐特立赴法以后的一个时期，虽然同情勤工俭学学生的窘境，为他们的痛苦而焦虑和奔走，寻求各种援助，但由于他仍然苦恋于“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未直接参加留学生中的政治斗争。至里昂大学事件爆发时，他目睹勤工俭学生受苦受压的惨状，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平，他与黄齐生先生从巴黎到里昂，支持勤工俭学生的斗争，坚决反对吴稚晖之流压迫贫苦学生的暴行。他亲自出面与吴稚晖交涉，为营救被害学生而挺身斗争。但由于中法反动派的互相勾结，个人交涉终未达到目的。然而通过这场斗争，徐特立认识到，出国留学，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为官僚军阀富人专有，以培养其奴仆和爪牙，而贫苦学生只有投身革命斗争才有出路。

1922年，湖南省政府曾致电驻法国公使，委托徐特立考察法国教育，年

俸一千元。但徐特立毅然拒绝军阀政府的笼络，专门致函湖南《大公报》负责人，请代向省府交涉，要求取消原案，恢复他的勤工俭学资格。1923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三年后，欠债筹款到比利时参观半年，接着又到德国参观四个月，于1924年夏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

这时的中国，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徐特立从昔日的同事那里打听到：他的学生毛泽东在他赴法勤工俭学的次年，在湖南发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一师的许多学生、特别是新民学会的会员大都成了“共产主义”的党、团骨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诞生，毛泽东和他的老朋友何叔衡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了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1922年5月，毛泽东又受命在湖南成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并充任负责人；1923年5月，毛泽东奉调上海，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在“三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在共产党的“总司令”陈独秀任委员长的中央委员会里担任秘书，实际承担着领导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重任；眼下，毛泽东正加紧宣传共产党关于同中国国民党实行合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期完成国共合作，共同北伐，打倒军阀，实现共和的大业。

虽然，徐特立通过自己这些年对中、西方政治和社会的研究与认识，深感毛泽东走的是一条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道路。可他自己还是抱定要用知识改变国家落后面貌的誓愿，不想参与政治斗争，也就难以断然追随学生毛泽东所信仰的主义，而是想继续致力于教育事业。

就在徐特立归国后的这年夏天，一部分因限于名额没有考取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女青年，纷纷向他诉说失学的痛苦。徐特立深表同情，沉思片刻后，笑着说：“再办一个吧！”然后，他就在长沙师范附属小学的空房子里摆上一张桌子，放置笔、墨、砚池和报名簿，开始了报名登记。当时长沙师范的校长杨茂林是徐特立的学生，应老师的要求借了几间空房子，稍加修理，辟为教室和办公场所。又向长沙师范和其他学校借了一些破旧的桌椅和黑板，修修补补后又继续使用。就这样，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一所新的长沙女子师范学校，与长沙师范学校如同兄妹一般，终于在荷花池畔矗立起来了。学校的简陋可以想见，除一个饮食员和几个能吃苦的教员以外，其余就是徐特立自己了。他任校长，兼教员和勤杂工，除负担学校行政工作外，还兼任一部分教学工作，以及摇铃和扫地等事务。他的艰苦奋斗精神，感动学生们勤奋学习，主动参加勤俭建校。一天，木工送来一些新制的便桶，徐校长正在亲自动手油漆，一群学生从旁边经过，他呼唤她们说：“来，大家动手！”一小时后，这些桶子在学生踊跃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很快就油漆好了。

学校开学半年后，又将原来只一层的教室升高为两层的楼房，还从各方募来一些残破的书籍，加以拼凑修补，勉强办起了一个供学生课外阅读的图书室。还想方设法收买了一些破旧的仪器，供师生教学之用。旧历除夕，他为了替学校借钱还债，深夜还在外面奔波。回到学校，走进厨房，看到晚餐后没剩什么菜，就用开水泡点米饭吃。老师们知道了，抱着不安和钦佩的心情说：“这是徐校长的特别年饭。”此后，徐特立又到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担任校长。在这里，他白手起家，依靠社会各方力量集资办学，建起了一女师第一个化学实验室。这样，继梨江高小、长沙师范、五美高小、长沙女子师范之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又在徐特立手里完备和发展起来了。他因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修修补补，艰苦建校而闻名全湖南，被人们友好地称为“徐

二炉锅”

在这段时期内，徐特立通过教学活动，结交了不少共产党做朋友，如陈章甫（陈昌）、罗学瓚、熊瑾玎，周以栗、廖锡绶，黄芝岗，毛际科等。在他创办的长沙女子师范里，一些共产党员在那里担任教职员，成了学校的支柱。学生中，朱端绶、郑杰等也是共产党员。这时，徐特立对于中国共产党虽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看到毛泽东、蔡和森等这些他最喜欢的学生都是共产党的负责人，也就自然而然地亲近于共产党员。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和了解，看到了这些人不图名不图利，忠实积极，埋头苦干，为学校工作和学生服务，就更感到钦佩。这也是他日后转向共产主义的一个客观条件。

1925年“五卅”运动后，赵恒惕在长沙开展“反共产”，指使各学校开除进步学生。结果，长郡中学开除了曾三等，并逮捕下狱；兑泽中学开除了段湘等八人出校。因曾三、段湘等为省学生联合负责人，遂遭到长沙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反抗，他们于11月9日向教育司请愿，三千余学生包围了教育司，要求撤换反动校长，允许集会结社自由和恢复被开除学生的学籍，立即撤退驻校军警。教育司召集各校校长开会讨论处置学生示威行动，赵恒惕亲自出席，表示欲以武力驱散学生。各校长皆噤若寒蝉，少数人随声附和，只有一女师校长徐特立明确表示不赞成用武力镇压无辜学生。遂被赵恒惕“斥其不合”，对他加以排挤打击。残酷的现实，使他教育救国的幻想破灭了。

旧中国是一个豺狼当道、群魔乱舞的世界，没有徐特立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出头之日。他后来在谈到这段社会经历时说：“在长沙教育界我应该是‘长沙王’，但是反动势力来到了以后，我在长沙教育会都没有被选资格。我和旧势力势不两立。”又说：“我们年轻时遇到的是国家存亡问题。我参加过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都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结果。从1911年起又立志教育救国。我十八岁时就教蒙馆，只有四个学生。以后教中学，还办过几所小学和师范学校。那时我想赶走敌人是后一辈人的事情了，我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国富民强了，我只有尽心教育青年一代，将来依靠他们救中国，为穷人做好事。我为这种理想奋斗了好几十年。1924年我从法国留学回来后，还是继续办教育。不过这时我思想上很苦闷，感到教育救国的路行不通。”

正当徐特立对前途悲观失望，思想处于彷徨消沉的时刻，毛泽东与他久别重逢了。

1925年的春天，毛泽东因病从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上海回到湖南，一边养病，一边从事农民运动。这次回归故里，毛泽东特地到长沙拜会了阔别多年的老师徐特立，师生进行了促膝长谈。

在叙谈了相互别后的情况后，徐特立向学生坦露了自己的苦闷心情。毛泽东听后对老师说：“社会制度不好，恶势力当道，是没有人管教育的。您辛辛苦苦培养出来的人才，说不定会被人用去干坏事，为虎作伥。可见在现时教育救国的路是行不通的。只有动员广大民众起来革命，彻底砸碎旧的社会，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创造一个劳苦大众的天下，教育才有希望，才有出路。”他还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告诉老师：“共产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造就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而眼下正全力做这样的事业。待到革命成功之日，便是发展全民教育之时。”接着，毛泽东向徐特立谈了自己对中国农民运动的看法和主张，也吐露了此次返乡拟定全力推动湘省农运的计划，最后

湖南地方以铁水补锅为业者，叫炉锅匠。徐特立排行第二，故有此称呼。

恳请老师出山参加和支持湖南农民运动……。

同徐特立会见以后，毛泽东即回到自己的故乡韶山，以韶山、湘潭为中心，点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熊熊烈火。

这次会见及与毛泽东的谈话，对徐特立产生了很大影响，是他思想观点转变的起点，也是他整个人生转折的开始。

123 先生追随学生

1926年，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在拜访了老师徐特立以后，深入到湘潭、湘乡、长沙、衡山、醴陵等县，进行实地考察，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反击了国民党右派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的奇谈怪论，高度赞扬农民运动，给觉醒了的农民兄弟以有力的支持，使湖南农运更加蓬勃发展。三湘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迁。

1927年春，徐特立回到离别不足半年的家乡，展现在他眼前的乡村面貌是全新的——恶霸地主的威风被打下去了，流氓、烟民、赌徒也不见了。过去政府禁止鸦片烟毫无办法，现在农民晚上开个会，男女老少一齐行动起来，马上就禁绝了。农会成立以后，法院无案可审，大小诉讼，农会开个会就公平解决了。混乱黑暗的社会经农民运动一冲洗，顿时呈现出一片光明，人们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的大儿子徐笃本，过去在中学读书时就想恋爱找对象，曾受到他的严厉批评：“你还没有立业，怎么能成家？你要先为社会出力的思想，掌握为社会服务的本领，不能过早地想个人和家庭的事。”如今，笃本已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并且加入了共产党，整天为革命而奔忙。当别人要为他介绍对象时，他回答说：“现在革命工作这样忙，哪有闲心考虑个人问题啊！”徐特立自己创办的五美高小，也完全变了样，师生都踊跃参加农运，女学生全都把长独辫子剪成齐耳短发，与男学生一样参加斗争土豪劣绅。学校的教材也增添了革命内容，他自己写的《留法老学生之自述》也选进了语文课本……

家乡这沧海桑田般的世变，深深地触动了徐特立。透过这些变化，他看到了火山爆发般的农民运动的力量，更感到共产党人的社会作用，也体察到学生毛泽东潜心从事农民运动的远见卓识。后来他回忆说：“我回乡住一个星期，使我从十八岁到五十岁以来的思想整个革了命！我过去所崇拜的康梁和中山，比之有组织的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作用涉乎小矣！这时我做了农民的小学生，我也就从学校跳到农民学校工作”。于是，他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并担任教育科长，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同时加入了国民党左派队伍，担任国民党长沙部的工农部长，协同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何叔衡、柳直荀、郭亮等，全力推进工农革命。

1927年5月，继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反动军阀何键在湖南策动了“马日事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镇压工农运动，革命群众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徐特立的儿子徐笃本，也在敌人追捕、涉水渡江逃亡时染病牺牲。共产党转入地下活动，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四处逃散。革命队伍中有人落伍了，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隐迹了。徐特立深感靠国民党解救中国已成泡影，国恨家仇，促使他在逃亡中四处寻找共产党，并决心献身于她的事业。不久，他在自己的学生、女共产党员黎尚瑾家中，遇到了过去一师的学生、隐瞒政治身份来避难的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他向李维汉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并且表示：“我已经51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正获得了新生。”于是，经过李维汉的介绍，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彭公达批准，徐特立正式加入了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胆小鬼纷纷脱党，投机分子相继投敌的情况下，作为老教育家的徐特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敌人是一个示威，

对叛徒是一个打击，对同志则是一个鼓舞。不少同志赞扬他说：“真是疾风知劲草，岁寒知松柏啊！”老共产党员曾三评价徐特立说：“要您信奉一个主义，很不轻易，但您一经信奉就一直干到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徐特立入党后，党派他赴武汉工作。他到武汉后，受到昔日在一师任教时的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热情欢迎，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参加了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不久，又与谢觉哉等一起编辑出版《大江报》。同年7月，按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的续一部署，徐特立同林伯渠、郭亮、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等秘密经九江奔赴南昌，准备在张发奎的部队中发动起义。毛泽东要徐特立暂时不要公开身份，仍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以便争取和团结更多的人士参加起义。此间，徐特立和林伯渠、郭亮一起，去做青年时代的同学和好友，现任江西省主席姜济寰的工作，争取姜参加了起义。8月1日，南昌起义正式爆发。起义军胜利占领南昌后，徐特立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革命委员会所属党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起义部队整编后，由“两湖”和武汉等地逃亡出来的党团员和农民协会骨干，编为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为周逸群，徐特立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艰苦的前卫战斗中，气候十分炎热，徐特立打摆子、发高烧，病情严重，被转移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住院治疗。住院期间，他一方面以顽强的毅力同病魔作斗争，另一方面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对医院医务人员进行思想发动和争取工作。医院院长傅连璋医师，在交谈中得知徐特立的社会经历和参加革命的经过后，对他表示由衷敬佩。在他的影响下，傅连璋后来也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在福音医院治疗十多天后，徐特立刚退烧和脱离危险，便和身负重伤住院的陈赓一起，坚决要求回部队，随军出发，向潮汕进军。在驻守潮州时，部队被敌人打散，他从一位同志的口中得知前委“流沙会议”的精神，便果断地决定从甲子港一带乘小船经广州、香港脱险，潜至上海。

1928年，党中央派徐特立赴苏联进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这时，正是国内革命形势大变化的年月，尽管在当时号称“世界革命的首都”莫斯科生活比较舒适，学习也十分紧张，可他时时刻刻惦记着祖国，关注着国内动态，特别是苏区的发展和红军的斗争。当他得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了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里站稳了脚跟的消息后，高兴得夜不能寐，恨不得生上双翅飞回国内，和毛泽东一道开展革命武装斗争。

124 根据地辅佐毛泽东

1930年，徐特立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风尘仆仆地回到了国内。

到上海向中央报到述职后，徐特立即奉命赴苏区。当年底，他化装成商人，假道香港、潮汕、大浦，穿过国民党军警的重重封锁线，安全到达赣南根据地。就在他来到苏区的12月30日这天，苏区广大军民正在欢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围剿”，活捉敌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伟大胜利。而统一部署指挥这次震惊全国的战役的，就是他当年的学生，如今已成为党和军队领导人的毛泽东，以及在南昌起义炮火中结识的战友，现已成为红军“总司令”的朱德。

在宁都小布赤坎，有一幢两层楼的民房，这里设有红一军的总部。在这里，徐特立见到了毛泽东、朱德、见到了同是老教育家的董必武……新朋故旧喜相逢，说不出的亲切和激动。从此，他就与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左权等住在这幢简朴的民房里，共同开创开天辟地的伟业。

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官兵，总政委毛泽东就请徐特立去担负教育俘虏的工作。徐特立按照毛泽东的意见，深入被俘官兵之中，进行个别谈话，了解到他们绝大多数出身贫苦，便帮助他们认清个人和家庭受苦的根源，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红军为穷人翻身而打仗的革命道理，使这些俘虏兵受到深刻教育，纷纷要求参加红军，使红军队伍不断扩大。

1931年7月，继第二次“围剿”失败之后，蒋介石又纠集三十万军队发动了第三次反革命围剿。他们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气势汹汹地闯入我中央根据地。毛泽东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歼”的方针，并采用“敌进我也进”的打法，把敌人引进赣南根据地，然后待机破敌。在盛夏三伏的酷热季节里，红军和白军平行地走着，只隔一天的路程。徐特立当时不了解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一边行军一边问：“泽东同志，敌人和我们平行着走，我们为什么不打？”毛泽东风趣地说：“他们要打时不打，我们要打时才打。”接着，他向老师举了很多战例，讲解了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方针。通过战争实践和毛泽东的帮助，徐特立对红军的战略战术也逐渐有了了解和研究。后来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时，尚能生动地宣讲关于游击战争的课题。

在红军将士中，大多是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文化底子很薄。毛泽东知道，没有文化的军队，就是愚蠢的军队，很重视红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老教育家徐特立来到根据地后，他就具体委托徐特立负责抓教育工作。还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时，红军总部在驻地举办了部队骨干训练班，通常又称“随营学校”。这种随营学校是我军建军以来，指战员系统地学习政治、军事和文化的开始。学员来自各军各部的干部，红军总部的战士——通讯员、警卫员、勤务员也一概编班参加学习。教学条件简陋异常，不仅无教室黑板，而且没有纸笔墨砚，教员上课以木炭代“粉笔”，以白墙壁代“黑板”，学员就用木棍作笔，沙盘作纸，用心听讲，勤学苦练。学习条件虽然极其简陋，但教员却闻名中外——政治教员毛泽东，军事教员朱德，语文教员徐特立，历史教员董必武，地理教员左权。真可谓是举世闻名、独一无二的学校！后来，这种随营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种军事院校，为我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干部，为军队的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党的前委决定让一些老同志不再随军行动，而留在地方开展工作。一天，毛泽东找徐特立谈话，提出党和红军要关心群众生活，要关心群众教育。为了革命需要，要发展苏区的教育事业，开展扫除文盲的运动。毛泽东请他起草一个苏区的教育方案。为了完成好这一任务，徐特立深入到兴国和雩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起草了一个扫盲教育的方案，提出了一套具体的扫盲办法。毛泽东很欣赏这个方案，并作了修改和补充，然后交付实施。

1931年11月7日，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徐特立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和瞿秋白一起负责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瞿秋白任部长，徐特立任副部长。因瞿秋白在上海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活动，苏区的教育工作，实际由徐特立负责。

为了普及人民教育，徐特立认为首先要培养出一批人民教师。于是他选定瑞金城城北一栋背靠池塘的两层旧民房作校舍，创办了师资训练班。不久以后这个师资班发展为列宁师范学校。列宁师范学校前后共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各区乡创办列宁小学；当时瑞金全县有一百四十多个乡，每乡都有一所列宁小学。在徐特立的直接领导下，苏区还办起了各种专科学校，除红军大学、列宁师范学校外，还先后创办了苏维埃大学、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高尔基戏剧学校、通讯学校、商业学校、卫生学校、农业学校、为党培养了一大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干部和专门人材。

正当徐特立全力以赴从事苏区教育事业的时候，战争的乌云却开始在苏区的上空密布。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极力排挤毛泽东，剥夺了他对红军的领导指挥权，致使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惨遭失败，苏区几乎丧失殆尽。1934年10月中旬，红军主力部队开始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时的徐特立已经五十七岁，是长征队伍中年纪最长的一个。党中央把他和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等一起编在红军野战医院中央工作团，董必武任主任，他任副主任。毛泽东也被编在中央纵队，拖着病体被战士用担架抬着踏上了漫长的征程。

125 资水河畔的“密谋”

两年前的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实际权力。眼见自己同许多战友多年来苦心建立起的根据地，在博古、李德左倾主义错误路线的指挥棒下，一天天地沦丧掉了，这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痛苦的——可以想见，以正确屈从错误，该有多么痛苦啊！可是，毛泽东并不灰心丧气，他深知成大业者除了要有经天纬地之才外，还要有坚韧不拔之志。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只有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搏击才能培养出力量。伟人之所以伟大，关键在于当他与别人共处逆境时，别人失去理智，他则下决心实现自己的目标。可眼下到底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恢复昔日的权力，把已陷入死亡之谷的红军带领到胜利地带呢？这是毛泽东，也是徐特立长征途中共同思考的问题。

1934年12月4日，在红军登上越城岭山后的小憩中，徐特立和毛泽东坐在资水河边。他们的谈话像澄澈的资水，徐徐有致地缓缓向前流淌——

“润之，从撤离中央苏区那天起，我就考虑这个问题了。博古同志热情干练，却没有实际经验；恩来同志组织观念强，温良恭俭让，却事无巨细，过分繁忙。这样，一切军政大计全委托于不了解中国特点的李德，这种状况潜在的危机使人担忧……出于革命的整体利益，你是责无旁贷的。”徐特立开门见山，推心置腹地对学生毛泽东讲了自己的忧虑。

毛泽东默然，他拾起手边的一块石头，投到河里，翻了个小小的水花。

徐特立无法测知毛泽东在想什么，进一步说：“《商君书》有言，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不仅仅是个权力问题，而是事关革命利益的大问题……”

“事之难易，不在大小，务在知时。”毛泽东深知时机的重要，“时机不备，徒劳无益。”

“我倒觉得时机到了……”徐特立还不清楚，毛泽东早在为时机的到来做准备，便进一步叮嘱道：“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受其殃……”

“是的，也许正是时候。司马迁不是说嘛，‘天下无害灾，虽有圣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合同，虽有贤才，无所以立其功。’……审时度势，困难很大……”毛泽东像是自语。他面对的是握有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央权力的力量，以他离开领导岗位两年之久的影响能否与之抗衡，的确没有把握。必须谨慎从事，万一再跌个跟头，爬起来就更难了。“强扭的瓜不甜，必须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法之利……”

“我想，致弊之因，你已经找到了。”

“只能说正在找，而且还要大家能够接受。”毛泽东沉思良久：“徐老，你还记得，唐太宗在贞观初年就向侍臣们提出‘帝王创业，草创与守成熟难’的问题吗？”

“当然记得，房玄龄和魏征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房说创业难，魏说守成难，只是原话记不起来了。”

“其实，他们两个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都有片面性。唐太宗说得很清楚：‘玄龄昔从我定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也。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当恩与公等慎之。’他的看法是很全面的，而且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的……但我们目前既是草创也是守成，所以两者皆难！”

两人一时无语。

徐特立仔细揣测毛泽东的用意，他知道毛泽东自青年时代就精读深研《贞观政要》，身任苏维埃共和国主席后，更有了实践感受，对《贞观政要》有着特深的见解。从刚才这番借古喻今的话所透出的信息看，毛泽东分明是感叹“草创”或说“打天下”的艰难。尤其是在目前党内意志不能统一的政治局面下，就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以徐特立对昔日学生个性的透彻了解，毛泽东生就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的性格，越是困难越要有所作为。

徐特立蓦地忆起一件往事。那是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毛泽东放弃军职以休养为名从前线回到后方。结果真的病了。

他记得那时的毛泽东比眼前还瘦，眼窝深陷，而且吐血不止，住进了汀洲福音医院附设的老古井休养所。

老古井休养所在汀洲城外北山脚下的一座别致精巧的淡红色小楼里，它原是一个大土豪的别墅，1929年红军入闽，土豪逃亡，从此成了福音医院专供高级干部休养的地方。

毛泽东痰有血丝，先以为是胃出血，后来经过X光透视，发现肺部有一块阴影，但已经钙化。对痰作了细菌培养，没有发现结核杆菌。但是根据症状，不能完全排除肺结核的诊断。治疗的方案是：多休息，增加营养，辅以药物治疗。

可是，傅连璋去看徐特立时，却悄声对他说：

“毛主席的身病好治，心病难医。”他发现毛泽东的痛楚从体内流溢而出，眼睛因为面部苍白憔悴而显得乌黑，透出悲哀与忧烦，但他在徐特立面前表述不出来，只要求徐老给他鼓励与安慰。

这位苏维埃政府教育部副部长思考了很久。他了解毛泽东的青年时代，但他很难说了解毛泽东的现在。那时，毛泽东是他的学生，而现在毛泽东却是他的顶头上司。毛泽东对老师总是尊敬有加，但徐特立在看毛泽东时，却有一种仰之弥高的神秘之感，觉得有些话不好当面说出。他思忖再三，决定手录一首1905年所写的七绝赠他：

言 志

丈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

非同泽柳新秭弱，偶受春风即折腰。

可是，徐特立并不真正理解当时毛泽东的心情。

毛泽东阅后笑笑，有些话也不好当面说。随录旧作七古诗一首，回奉徐特立：

送纵宇—郎东行

云开衡岳阴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长钟此。

君听呈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坛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化名。他是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征友”求得的好友。1921年加入共产党，1931年被开除出党，后一直在大学执教。青年时代的罗章龙，和毛泽东志趣相同，友谊日深，他后来加入了由毛泽东、蔡和森等发起的新民学会。1918年，罗章龙根据新民学会的决定，准备东渡日本。在长沙起程时，新民学会会员在北门外的平浪宫为他送行，毛泽东并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写了上述这首诗赠他。5月，日本政府迫害东京的中国爱国留学生。已经抵达上海的罗章龙参加了上海各界人士发起的抗议活动，取消了日本之行……

毛泽东在政治上“失意”的时候，以这首当年激励过同道的诗书赠老师，其远大志向、恢宏气势和深厚寓意是不言而喻的。

徐特立还知道，毛泽东早就对王明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搞教条主义的一套不满。那还是宁都会议以前，一次毛泽东手指住地的松柏问徐特立：“徐老，你去过欧洲，也到过苏联，据说那里的松柏都跟这里的下一样？”

“嗯”。徐特立随口答道。可话一出口，他就感到太简短。毛泽东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他看了一眼毛泽东，见他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顿时，徐特立“破译”出毛泽东话中的弦外之音——他是另有所指。于是，便接着刚才的话头说：“不要说外国的松柏树是这样，就是中国的橘子也是这样的。《考工记》里说：‘橘逾淮而北为枳’。为什么？”

只因换了水土，名称变了，味也变了。”

“这个道理很对。”毛泽东表示赞成，“淮河以北的泥土自然会把江南之‘橘’变成‘枳’。长也在斯，短也在斯，得也在斯，失也在斯。”

“人物同理。树且如此，人又何堪？中国毕竟不是西方国家。统一中国、治理中国光靠外来的教条不行，要有中国的方法。”徐特立把毛泽东想要说的话引发出来。

“可见你和那些吃洋面包长大的布尔什维克不一样，虽然也吃过几天，可是脚还站在华夏大地上。有些人，脚在这里，脑壳在那里。身首异处，能长久乎？”毛泽东不由哈哈大笑。

这时，在毛泽东的想象中或许出现他所深研熟知的中国历代王朝兴衰的画面，那些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各自带着显赫功业的灵光，走过他面前。他忽然又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口气对老师说：

“治理中国，要中西结合，洋为中用——要马克思加秦始皇！

……”

摆脱对往事的追忆，徐特立的思绪又回到现实当中。

徐特立思忖，以毛泽东不屈的性格和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深恶痛绝，以及他那与生俱来的使命感，他是会奋起抗争，振臂一呼的。徐特立觉得再无须拐弯抹角，而应该直奔主题。

“西征以来，我思虑很久。”徐特立说得很沉很重，仿佛字字千钧：“我综观全军上下，全党上下，唯润之治人将兵无所不宜，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应变。军旅大事，革命大事，任重道远，此历史重担，唯奇才能挑。我想，非润之莫属……”

这种“青梅煮酒论英雄”式的嘉许虽然不至于使毛泽东像刘玄德那样闻

雷落著，却也颇感惶悚。在权力之争的风口浪尖上是很危险的。

“啊，人皆可以为尧舜。”毛泽东急忙谦逊地说，“有为者亦若是，如果义不容辞，不管局面多么严重，我们都要面对现实，承担起我们各自的责任。血的教训是需要总结的，您的话极对，不能再像现在这样维持下去，这是全党全军的利益所系！……”毛泽东的话透出几分力度，几分坚毅，也透出深思熟虑后的决断。

徐特立深深吐了一口气，结束了这次令后来的史学家们探究不休的谈话……

同徐特立在资水河边深谈以后，为了挽革命狂澜于即倒，毛泽东抓紧了解决错误政治路线的战前准备工作，他决定尽快和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商议，拿出切实解决问题的办法来。

其实，早在11月下旬，红军渡过潇水、临近湘江时，毛泽东就开始了被某些西方人士后来称之为“担架上的阴谋”的疏通工作。

王稼祥是毛泽东争取的第一个目标。他和毛泽东一个负伤、一个生病，都坐担架，所以经常住在一起。他是个精明而又诚挚的知识分子。他在与毛泽东的较多接触之中，默默地观察着他。他虽然也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却不像其他“吃洋面包长大”的留学生那样，只是从别人的传言中，从主观臆测中想象毛泽东。他比博古他们先到苏区，与毛泽东相处很久。他从毛泽东带有悠闲色彩的繁忙中，看到他应付裕如地创造一个完整的“国家”，除战争准备与战场指挥外，他还同时关注施政、财经、外交、民事甚至开荒、植树……并亲自调查，起草文电布告命令和撰写文章。可是，那些自诩为纯粹的马列主义者，像王明、博古他们只能背诵马列原文，只顾执行国际路线，而对中国的国情和当时的战争实际几乎一无所知，却又严然是些高高在上具有裁判权的法官，到处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二者一比较，王稼祥深感毛泽东有文能治国武能安邦的经天纬地之才，由此产生了一种心定神宁的依附感，同时也对那些“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是真是假产生了怀疑。

一天晚上，倚坐在担架上的王稼祥终于鼓起勇气和毛泽东谈起了眼前的危局：

“主席，这次反‘围剿’的失败，我们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认识。”王稼祥不无痛心地说“不然，红军的命运难测……损失太惨重了……”

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思索很久了，他很清楚这是国际路线所带来的影响所致，也是临时中央及后方的那些政治局委员们竭力推行国际路线的结果。解决政治路线才是根本。可是，目前解决政治路线几乎是不可能的——时机尚未成熟，在这危机四伏的远征途中，挑起这样的纷争将会使红军的处境更为危险。他必须讲求策略。

“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毛泽东望着隐在黑影中的王稼祥，说得很缓慢很自然。“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动员广大工农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扩大红军运动成为群众的热潮，使红军数量达到十万以上；在‘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号召下，我们保证了红军在财政物资精神上的需要；我们的经济建设以及和群众关系的改善，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热情和积极性。这一切都造成了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有利条件……”尽管毛泽东所列举的这些成绩大都是苏维埃政府的有效努力而取得的，可他还是充分地肯定了当时的临时中央。

“那么，未能粉碎五次‘围剿’的原因在哪里呢？”王稼祥仍然不能把军事上的失利与政治上的错误分开。他苍白瘦削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困惑。

“我们应当把注意力集中在纠正军事路线上，战略战术的错误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致于其他的，放在以后再解决。”

王稼祥终于明白了毛泽东的斗争策略。

于是，“不谈国际路线和政治路线，只谈变换军事领导”便形成既定方案。毛泽东按这一方案进一步展开了寻求支持者和同盟军的活动。

毛泽东主动同中央领导人谈心对话的第二个人，是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张闻天原来站在王明路线的一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开始使他清醒起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主动要求同他和王稼祥住在一起，这样，他们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毛泽东向张闻天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通过张闻天的女友刘英做工作，通过多次的谈话，张闻天逐渐转变了思想认识，开始相信毛泽东是正确的。这就成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出来纠正博古的错误，坚决支持毛泽东重新回到军委工作的思想基础。

这样，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取得了一致意见，都认为应尽早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以解决军事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还经常去找周恩来。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时期，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之一，又是军委主席，但毛泽东对他的看法，一向与其他人不同。他常常对他的妻子贺子珍说：周恩来实际上是个执行者，真正的决策人，一个是李德，一个是博古。事实上，毛泽东在长征之初，给中央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先同周恩来谈过的。他建议中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把红军队伍拉到贵州，也是先得到周恩来赞同，并通过周恩来去实现的。后来，毛泽东同贺子珍谈起遵义会议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在这期间，毛泽东也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其他军委、中委的同事谈心。这样广泛的相互对话，增进了了解，争取了多数，统一了认识。由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中，得到多数同志的了解和支持，终于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1935年1月，党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三人军事小组的指挥下，渡过大渡河，翻越雪山，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终于在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红军完成史诗般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又找到新的立足之地。

以遵义会议为里程碑，中国革命出现了转机，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生命也从此大放异彩。因而，当今中外毛泽东的崇拜者们，在讴歌遵义会议的历史功绩时，自然也对它的前奏——“担架上的阴谋”津津乐道，却很少有人记起毛泽东与徐特立在资水河畔的深谈。笔者旧事重提，只是想告诉人们这样一事实：这次谈话，才是真正促使毛泽东下决心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的发端……

长征胜利结束以后，徐特立和全体红军将士一样，有着一一种绝处逢生的欣喜和庆幸。他深为毛泽东那无与伦比的领导指挥才能感到由衷的叹服。联想到韩愈所讲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他感到应该好好地向自己过去的学生毛泽东学习，更加自学地接受他的领导。当人们提起他是毛泽东的先生时，他总是真心诚意地说：“从前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教过书，当过毛主席的先生，那是真的；那只是一日之师，而毛主席是我的终身之师——是他带我这个老朽走上了革命道路。泽东同志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是很多的，特别是他精通马列主义理论，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此外在政治、军事、经济、历史、文学各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他的知识是多方面的，非常渊博。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不自以为是。”言语之中，充满着对毛泽东的爱护和尊重之情。

毛泽东对徐特立也是十分依赖和敬重的。到达陕北以后，因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牺牲，毛泽东亲自提议徐特立担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后来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又任命他担任边区教育厅厅长之职，给这位老教育家创造一个为边区教育事业大展宏图的机会。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六十岁的生日。1月30日，在延安各界为徐特立举行六十寿辰庆祝大会的前一天，正忙于制定抗日救国大计的毛泽东，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心情，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给徐特立，为他祝寿。毛泽东在信中说：

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为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此致

革命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于延安

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地概括了徐特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的重大贡献，热情地赞扬了他作为一代师表所具备的崇高品

格。“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多么高的评价！充分地表达了一位学生对老师的崇敬之情。

毛泽东在延安为老师祝寿，十年后还有一次。

那是1947年初，蒋介石正命令胡宗南指挥二十三万人马进攻延安，妄图摧毁共产党的“中枢神经”。当时，徐特立已转移到陕北高原东北部的绥德城，他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于1946年冬撤离延安的。徐特立寿辰的前几天，工作人员请示正在全力指挥西北和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徐老的七十大寿还庆不庆祝？毛泽东毫不犹豫他说：“庆，为什么不庆？还要大大庆祝一番！我们一方面要为徐老祝寿，另一方面还要显示延安军民沉着应战，以鼓舞边区军民的斗志。”这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党中央派出一辆大卡车专程前往绥德，接徐特立返延安做寿。寿诞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等中央负责同志亲临徐特立居住的窑洞祝贺，俗称“暖寿”。九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边区政府举行了热烈的庆祝大会，各解放区负责人也纷纷来电祝贺。朱总司令在会上祝词，他说：“徐老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革命时代的七十年生活中，使他锻炼成为一位模范的革命教育家和科学家。早在江西苏区时，他就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作风。”朱总司令号召大家：“以不断学习徐老的优良作风来庆祝他的七十大寿。”会上，还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定签发，由党中央写给徐特立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

中央的信中说：“你的道路，代表了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最优秀传统。你是热爱光明的，你为了求光明，百折不挠，在五十岁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你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事业抱有无限忠诚，在敌人面前，你坚持着不妥协不动摇的大无畏精神，你的充沛的热情，使懦夫为之低头，反动派为之失色。你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你的知识是和工农相结合、生产相结合的，你把群众当做先生，群众把你当做朋友。你对自己是学而不厌，你对别人是诲人不倦，这个品质使你成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你痛恨官僚主义和铺张浪费，你的朴素勤奋七十年如一日，这个品质使你成为全党自我牺牲和艰苦奋斗作风的模范。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骄傲，把你的这一切优良品质发扬光大是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革命任务。”这封信高度评价了徐特立的革命业绩，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和发扬他的革命品德。

会上，中央主要领导均为徐特立题了词。刘少奇副主席的题词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周恩来副主席的题词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朱总司令的题词是“当今一圣人”；彭德怀副总司令的题词是“徐老是人民的教育家”；毛泽东的题词是：“坚强的老战士”。

难得这么高的评价，难得有这么样的殊荣。翻开中共党的高层领导人的生活记录，有谁的生日能像这样受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重视呢？有谁能得到党中央和她的主席如此高的赞语呢？在徐特立的七十寿辰庆祝大会上，当中外来宾摩肩接踵地参观着来自中直机关和全国各解放区的五彩缤纷的寿幛、贺礼、题词、祝词时，人们不禁在心目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徐老如此！

127 危难受命返湖湘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的翌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动员实行全面抗战，呼吁：“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之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7月13日，延安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号召：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应沉着地完成必需的准备，随时准备出发，到抗日的前线去。听了毛泽东的动员报告，年过花甲的徐特立热血沸腾，当即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请求：让他到抗战最需要的地方去。根据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派徐特立回湖南，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名义，出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代表。

就这样，徐特立临危受命了。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徐特立在临行前特地来到枣园看望毛泽东，并请他对这次返湘工作做指示。毛泽东一边捧出延安的红枣招待老师，一边和他聊了起来。

“徐老，你离开湖南好多年了吧？”

“算起来，整整十个年头了……”徐特立扳起指头以回味的口吻说：“1927年春，我从学校‘跳’到农民协会，‘马日事变’后从长沙到武汉，从此就再也没有回过家了……”

“贺知章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你可是五十离家花甲归，乡音无改志未衰啊！”毛泽东信手拈来，开了一句玩笑，“此次返湘，可不会是‘儿童相见不相识’，在社会上你徐老的名气大得很咧，你是教育界的‘长沙王’嘛！”

接着，毛泽东就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工作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徐特立利用他在湖南教育界的名望，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和发展湖南党的组织，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主张。他们一直交谈了几个小时，到深夜徐特立方才离去。临别时，毛泽东亲自把他送到窑洞外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徐老，珍重！珍重啊！”徐特立回道：“润之，你也要保重啊！”

11月26日，徐特立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王凌波一道离开延安，途经武汉，向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负责人周恩来请示工作后，于12月9日抵达长沙，并立即在寿星街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湖南老教育家徐特立，须发尽白，而精神颇实，身着灰布短衣，乘武汉特别快车来长沙。……”当长沙各界人士，从《长沙晚报》和《民国日报》等报纸上，得知十年杳无音讯的徐特立突然回到长沙，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并络绎不绝地前来八路军临时办事处探访和会见，求教国际国内形势，聆听革命真理。他们看到徐特立的确“精神颇实”，但并不“须发尽白”，从精神到形态，均不像一个上了花甲的老人。对于来访者，他都热情接待，向他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到达长沙后的第三天，他就在银宫电影院宣讲党的洛川会议精神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听众达三四千人，把整个影院挤得水泄不通。当天，徐特立还会见了报界记者，谈了抗日诸问题。那时，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的文章还未公开发表，但他在离开延安前已从毛泽东那里倾听了他的见解，对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已有相当的理解。所以，在这次与新闻媒介的接触过程中，他谈了很多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在驳斥“速胜论”和“亡国论”时说：

“有人以为日本没有煤，没有铁，我们抗战六个月，日本帝国主义就必然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机是事实，可是把它估计得这样低，不但离开事实，而且是于长期抗战有害。”他尖锐地指出：“那些唯武器论者，对抗战前途悲观也是不当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现代化的武器，我们可以从敌人那里夺取，我们可以从战争中补充。”他满怀信心地说：扛游击战是共产党八路军的拿手戏，我们将通过游击战发展壮大，越励越强。

以后，徐特立外出讲演十分频繁，当时的联合大学、第一师范学校、青年会礼堂、教育会礼堂、荷花池中央戏剧学院、火宫殿等处，均是他经常应邀讲演和作报告的地方。他那百折不回的意志，迎难而上的毅力，严肃认真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长沙各界群众留下深深的印象。当时的《观察日报》曾在报道徐特立在火宫殿讲演的情况时说：“徐先生本来是深入民间的，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所众越来越多，徐先生讲了又讲，讲到午餐的时候，大家公请徐先生一顿。……”

徐特立到长沙后，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和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以高文华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工委。他是省工委委员，并担任统战部长。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湖南省长沙市先后又成立了各界抗敌会、文抗会、妇抗会、工抗会、学抗会、商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在徐特立的授意和支持下，共产党员和革命知识分子黎澎、潘开茨、田汉、廖沫沙等同志还相继创办了《观察日报》、《抗战日报》、《长沙日报》、《前进》、《火线》、《长沙青年》等进步报刊，积极开展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1938年春，当徐特立获悉原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参谋长乔信明等三十多位同志，从国民党江西监狱转移到长沙陆军监狱时，就大义凛然地前往监狱探望他们。他以激动而又亲切的心情向身陷囹圄的战友们介绍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形势，讲解党的抗日方针和政策，并以“太阳快出来了，天就要亮了！”作为讲话的结束语，鼓舞他们坚定信念，坚持斗争，争取胜利。随后，他马上开出乔信明等三十余同志的名单，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国民党顽固派不但不予释放，还企图将他们秘密转移予以杀害。徐特立闻讯，立即找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交涉，终于迫使国民党将乔信明等从桃源监狱中释放出来。尔后，徐特立又指示办事处安排这些同志治病和学习，后来又护送他们前往延安，有些同志则奔赴八路军、新四军，上了抗日前线。

这期间，徐特立还主持办好了一件对毛泽东个人和革命事业都有着密切关系的事情，这就是寻找到了毛泽东的弟弟、烈士毛泽覃失散多年的儿子毛楚雄。毛泽覃牺牲后，其妻周文楠投奔苏区，抚养小楚雄的周陈轩外婆迫于反动派的迫害，带着外孙流落到长沙城，靠沿街乞讨为生。徐特立从韶山的地下党组织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即派人四处查找，终于找到了楚雄祖孙俩。遂于1937年11月间，派专人将毛楚雄和外婆周陈轩、舅舅周颂年护送回韶山，进行妥善安置。

1938年9月，徐特立作为湖南党组织负责人之一，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扩大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徐特立见到了分别近一年的毛泽东，聆听了他的讲话，学习了 he 刚发表不久的《论持久战》等重要文章，领会了中央精神，增添了新的力量。会后，毛泽东邀见了徐特立，听取了他关于湖南统战工作和组织建设情况的汇报，给湖南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当他听到老师带回家乡韶山的情况和侄儿楚雄等亲人的音讯时，激动不已，连连向

老师表示感谢。

1939年初，徐特立再次回到湖南和长沙，以新的姿态投入了抗战工作。可是，当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愈演愈烈，手段也越来越凶。后来，湖南国民党反动军阀、省主席薛岳，竟然凶相毕露，命令衡阳警备司令部通知徐特立“限期离湘”。1940年8月，徐特立不得不离开长沙，经重庆返回延安。从而结束了他的特殊使命。

从1941年到1942年，解放区处于最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困难，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毛泽东亲手制定了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等十项基本政策，领导和发动解放区军民渡过难关。

十项政策中，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是两个中心环节，徐特立身体力行地投身于这两大运动之中。在整风会上，徐特立联系他在中央苏区和长征路上亲历的实际，对王明一类自谓神圣，自命不凡的“纯粹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了批判，指出他们“把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变成了新旧约、可兰经及南无阿弥陀佛”，他们“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可是有一句最主要的没有读，即《费尔巴哈论》上说的‘一切东西在辩证法面前没有神圣’。他们虽然满嘴马克思主义的口头禅，其实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认为判断一个同志是否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他嘴巴上能否背诵马列主义的词句，而是看他行动上是否能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解决革命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他说：“离开革命事业专凭一己的意见议论人们的政治水平，必然要把马列主义空洞化、庸俗化、书本化。”对于徐特立这个发言，毛泽东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很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并请他整理成文，公开发表在1942年4月1日的《解放日报》上。

当时，为了战胜国民党蒋介石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还亲自带头在住地不远的黄土坡上开荒种地、栽瓜种菜。在他的带动下，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蓬勃兴起，王震将军率领三五九旅将昔日荒芜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徐特立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便不顾已近七十岁的高龄，同中宣部机关的同志一道投入了大生产运动。当他手捧自己劳动的果实时，这个毕生教书育人未事耕种的老人，既高兴又感慨万端：共产党伟大！毛泽东英明！把世道变了——主席、部长和中央委员都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这样的党和她领导下的军队，能不无往而不胜吗？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胜利诞生了。徐特立在这年三月参加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后，随毛泽东迁往北京西郊香山，接着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进入中南海，继续担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1950年起，他还担任过一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会的名誉主席。

建国之初，毛泽东尽管政务十分繁忙，仍忘不了他与徐特立之间的师生情谊。一次，毛泽东特地派人来到徐特立的住地，邀请他到中南海家中吃饭。席上，还专备了几样家乡风味的菜肴招待老师——一碗湘笋、一盘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毛泽东抱歉他说：“徐老，请你来，没有好菜吃。”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特立谦和地对毛泽东说：“你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说：“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是父’，您更应该上坐。”硬是让徐特立坐了上席。

叙谈之间，毛泽东请徐特立谈谈他对治国方针大计的看法。徐老思考片刻后说：国家初建，要防止某些同志以为革命大功告成而滋长骄傲自满情绪，还要力戒贪图舒适，追求享乐，腐败堕落思想和作风。他还把不久前在吴玉章七十大寿时写的一首诗中的几句念给毛泽东听：“前途之艰巨，基本在建设，幸勿过乐观，成功在兢业。”毛泽东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击节叫好。

话别时，毛泽东见徐特立穿着还像过去那样简朴，又联想到徐老当年为革命牺牲的两个儿子，就将自己身上穿的一件呢子大衣脱下来送给徐特立，以表人子之心。徐老接衣在手，激动不已。他的心潮起伏翻腾：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可又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敬老尊贤，像今天这样无微不至地关怀自己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还是胡宗南大举出兵进攻陕北之际，毛泽东为了徐特立的安全，让他先行撤离延安，他自己则以数万人马与二十万敌军周旋。当徐特立离延时，毛泽东亲自去送行话别。当时，毛泽东检查徐特立的行李准备情况，发现没有热水瓶，立即命工作人员从他仅有的两只热水瓶中拿来一只，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想到这些，不禁老泪纵横，唏嘘有声。那天，毛泽东拉着老师的手，依依不舍，送出丰泽园，又送出门前雨道，送了好长一段路。徐特立十分珍惜这份师生情谊。回家后，他把毛泽东赠送的大衣交给老伴收藏起来，只在庄重的场合才穿。

与毛泽东的会见，徐特立深深被学生那种励精图治，建设新中国的宏伟气概所打动，他感到全身被激发起一股年轻人一样的朝气，虽是暮年却壮心不已。他回首过去，展望未来，重新制订了一个二十年学习计划和工作计划，希望在有生之年为国家民族、也为自己的学生，做一些有用的事情。

此后，徐特立投入主要精力领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他不顾年老力衰，每天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开会，作报告、写文章。批阅和草拟文件，孜孜不倦。有时为了写一篇文章，往往要翻阅文件资料几种至数十种，严肃谨慎，一丝不苟。仅建国头四年，他就相继发表了《在教师节谈民主主义教育》、《科学化民族化大众化的文化教育》、《普通学校的思想教育》、《小学教师自学经验谈》、《小学校的体罚问题》、《青年的学习问题》等一系列重要文章，对于建国初文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教育的本质、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对象、教育的方法，以及培养国民公德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在小学教师队伍中引起很大震动，很多教师想离开教育界，投身到工厂、矿山中去参加经济建设。他们认为当小学教师没有出息，没有前途。有的甚至把小学教师的工作说成是“吃粉笔灰”、“给小娃娃抹鼻涕的事情”、“不能发挥一个革命青年的作用”，不安心搞教学工作。徐特立从中央教育部知道这些情况后，建议教育部牵头组织全国小学教师在《小学教师》杂志上展开了“小学教师有没有前途”的讨论。从1953年9月至1954年3月，不到半年《小学教师》杂志就收到全国各地小学教师近四万件来稿。在讨论结束时，他应《小学教师》编辑部的要求，写了《小学教师的地位和前途问题》一文，为这一讨论作了总结。他在文章中指出：现在我们的国家是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翁，“既然每个公民都有了政治地位，如果说小学教师没有政治地位，这是不合逻辑的。现在面临着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小学教师要求参加这个建设是十分正确的。要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靠全国人民的分工合作和积极参加。”“教育建设是整个国家建设必要的任务之一”，“而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使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教育，这种伟大的任务就落在小学教师身上。”

徐特立的这些立论深远，有理有据的文章，很快被天天读书看报的毛泽东注意到了。他对徐老为人民教育呕心沥血、辛苦耕耘的高风亮节敬佩不已。在一次中央工作会上，毛泽东见到徐特立，笑着对他赞许道：“徐老不老，老当益壮啊！”

随着时光的推移，徐特立感到年事日高，记忆力逐年衰退。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他给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写信，请示免去他担任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职务，让年轻有为的同志来接替。他在信中说，“若不这样，我是很不安心的。”毛泽东阅读了这封信以后，心中很不平静。他想起大革命失败之后，正当反动派疯狂屠杀仁人志士之时，徐特立毅然在这个时候投身了革命，参加了共产党。今天，革命已经成功了，他本来可以心安理得地做高官、享清福，可他却又要辞去领导职务。这一“进”一“退”，体现着徐老多么高洁的人品、宽阔的胸襟啊！“进”是为了革命，“退”亦是为了革命。他真不愧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他毛泽东的好老师！

于是，毛泽东立即让杨尚昆、陆定一代表他去看望徐老。当问到徐特立为何感到不安时，他说，“不让贤怎么能安心呢？就是要让贤嘛！”“青年

是国家的未来，只有青年人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杨尚昆等回去后，把徐特立的这些意见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沉思良久，没有表态。徐特立还是没有退下来，党和人民仍需要他继续发挥“余热”。就在这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

徐特立一生主持正义，刚直不阿。在党内的长期斗争中，严肃认真，独立思考，以党和人民的利益定是非，从不投机取巧，更不随声附和，明哲保身。

建国以后，政治风向一变再变。作为一个老政治家，徐特立深知顺风行事的重要性，但他偏不见风使舵。当有人在教育战线片面强调实践、强调生产劳动，忽视书本知识，忽视课堂教学时，徐特立指出“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工作经验。”当社会上一味追求“成名成家”的时候，徐特立多次鼓励“青年要有志气，要做科学家，要发现许多新方法新道理，那就不能只在书本子里去发现，只有从改造事物的劳动中去发现。”他多次举例谈到毛泽东，说“毛主席不仅没有进过陆军大学，连陆军小学也没有进过，他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学习战争，成为古今中外最优秀的军事家之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写出了不朽的军事著作。”

他这种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在“大跃进”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58年，社会上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一些人为了放“卫星”，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是年秋天，徐特立南行途中路过河南，在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陪同下，到一个公社参观。茫茫棉田杂草丛生，颗颗棉桃多未吐絮，一个介绍情况的人，声称亩产皮棉能达几百斤。徐特立立即表示：“我不相信！等我回来还要到这里，看看到底能摘多少斤。”介绍情况的人还说稻子亩产能上万斤。他听了，更加不高兴地对周围的同志说：“这不可能！不透空气，稻子怎么能生长呢？这是普通常识嘛。”

徐特立从河南回京后心情沉重。后来通知他去徐水参观，他坚辞不去。他的儿媳徐乾劝他：“在外面讲话，可要注意啊，不然会说您反对大跃进。”他沉思片刻，说：“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困难了。但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他还说，“讲大话容易，到头还是老百姓遭殃。”

1961年，党强调发扬民主，总结三年大跃进失误的经验教训。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徐特立用毛笔在一张旧公文纸上，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浮夸风其目的是骗人，结果把社会信用失掉，使自己孤立而垮台，并人格也丧尽。一切自谓聪明缺乏求实作风者必遗害社会且灾及子孙。”1962年冬，徐特立回到湖南家乡，在应有关方面之请给《长沙日报》题同时又写道：“创业难，守业亦难，须知物力为艰，事事莫争虚体面，老老实实，勤俭建国，发愤图强。”真是下笔千钧，发人深省。

徐特立的这些话，本是一股清凉的和风，如果能吹到他昔日的学生毛泽东那里的话，或许能起到清神醒脑的作用，使他那发热的大脑冷静一些。可惜，言路不通，“下情”难以“上达”。

自此以后，徐特立再不讲话了。他保持着缄默……

131 深深忧思离人间

1966年5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五·一六》通知。以此为标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就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始了。同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向他的湖南同乡、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开了“炮”！1968年10月，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议，国内政治形势呈现出异常严峻的局面！

此时的徐特立，已经年逾九旬。他虽然肢体衰老，行动不便，可头脑却十分清醒。就在前不久，也就是1967年的1月底，他还用蝇头小楷亲笔“恭录”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赠与曾经在此任教多年的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与“湖南第一师范全体革命师生员工同志共勉”。

在那些日子里，他天天要儿媳兼秘书徐乾给他读文件，读“红卫兵”的“战报”，以关注政治形势的发展。终于，他听到了不愿意听到的消息。“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燃遍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已经“靠边站”，许许多多当年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老同志都被打倒，甚至连他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德高望重的朱老总也被造反派点名批判，并冠以“黑司令”之名而倍受污辱……毛泽东知道这些情况吗？他应该是知道的——以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地位而论，毛泽东不点头谁又能打得倒呢？可是毛泽东为什么要把这些毕生追随自己干革命的战友和学生打倒呢？……这一连串的疑问深深地困扰着徐特立，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不，毛泽东决不是那种人，他可是特别尊重同志的啊！

徐特立不由回想起当年延安军民中广为传颂的毛泽东“轿车送给‘五老’乘”的佳话来：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同志没有小车，到哪里都是骑马走路。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们的尊敬和信赖，给他们送来了两辆小轿车。

延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孩子们追车雀跃，老人们望车含笑。警卫战士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泽东主席外出开会办公再也不用骑马代步了！这时管车的同志想分给毛泽东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小车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虽然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还是按照他的意见，一辆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同志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骑他的老青马。有一次，毛泽东在去枣园开会的归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出事以后，朱老总和徐特立等“五老”定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开到他跟前。可是，毛泽东又把他们给“撵”回去了。

不久，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的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员悄悄地把小车叫来了，还解释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坐这一趟吧。”毛泽东风趣他说：“胳膊有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走！”说完，迈开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又过了两年，毛泽东才有了自己的“专车”，那是海外华侨捐赠的一辆救护车。毛泽东平时很少用，只是在接送客人时偶尔乘之。这曾在延安和“国统区”及国际友人之中一度传为笑谈、美谈……

这件小事，作为毛泽东尊重老同志的佐证，几十年来一直清晰地保留在

徐特立的记忆之中。是啊，毛泽东最能尊重人、理解人，他的作风是很民主的，绝不是那种不能容人的人！

提起“民主”，徐特立记忆的闸门又打开了。早在抗战胜利的前夜，毛泽东不就说过：“要用民主打破历代兴亡的周期率”吗？他的话音至今犹在耳畔。

那是1945年7月1日至5日，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偕傅斯年、章伯钧、左舜生、褚辅成等人访问延安，毛泽东先后几次和他们促膝交谈了中国社会、政治形势与发展的种种问题。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来，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用大力也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治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话是对的，只有把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块地方的事，公之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用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黄炎培先生从毛泽东的谈话中，看到了中华古国希望的曙光，看到了中共用民主跳出历代兴衰周期率的构恩与践履。这正是中共的魅力，真正的政治优势，也是吸引与团结起全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的法宝。

用民主打破周期率，真是至今不易的至理名言！国家正值建设时期，多么需要用民主换得全党上下的集思广益、众志成城啊！可是，毛泽东难道忘了当年的许诺了吗？他还记得当年长征途中师生二人在资水河边的深谈，还记得唐太宗“帝王创业，草创与守成熟难”的宏论吗？要在以往，徐特立真要去亲自问一问“润之”。可是，如今他已至耄耋之年，毛泽东的威信又那么高，他肯听吗？……

1968年11月29日，在那造反之声甚嚣尘上、大动荡搅乱全国的多事之秋，徐特立——这位老革命家和教育家，带着许许多多的忧虑，带着对他未竟事业的无限牵挂，在北京溘然辞世，享年91岁。

“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徐特立是毛泽东的老师，也是中国人民的师表。他教导一个已成为伟人的毛泽东立志、立德，更立下了百世英名、千秋大业；他还使万万千千万万个普通的中国人，知道了读书、识字、明理、摘掉了“文盲”的帽子。他的功德千秋万代长垂不朽。他是不死的。

第二十二章 易培基

——不是“良相”的良师
要赢得光荣名誉，须经过曲径崎岖，爬
上那座通到不朽声名的峭壁岩上去……
——题记

《中国革命史人物词典》第 482 页这样写道：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字寅村，号鹿山，早年毕业于武昌方言学堂。1920 年与谭延■在湖南筹组教育委员会，任委员长。次年兼任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及省长公署秘书长。1923 年至广州，任大元帅府顾问。1924 年任广东大学教授，同年任黄郭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 年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1928 年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同年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1934 年辞故宫博物院院长职。同年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珠宝，匿天津租界。1937 年 9 月逝于上

海。

这段文字作为易培基的小传，不知编撰者出于有意还是无意，至少省略掉了易培基的这么一段生活经历，即曾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老师，他教过毛泽东整整两年国文课；作为第一师范的校长，他做过毛泽东三年多的“顶头上司”。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这位与毛泽东过从甚密的良师和政治活动家，无论是在传播文化知识还是在指引人生道路上，对“巨人”日后的成长和定型，都起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对此，历史是不该遗忘的。

133 “神秘人物”与“廿八画生”

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易培基是一位令师生刮目而视的“神秘人物”。

在一师，易培基的资历最深，是不折不扣的“元者”。自早年在武昌方言学校毕业以后，他即受聘于第一师范的前身——湖南师范馆，1903年11月，师范馆与城南书院合并为湖南全省师范学堂。1904年，全省师范学堂改名为中路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1912年又改为湖南公立第一师范学校，两年后与湖南省第四师范合并为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期间，学校几经变迁，他迎来送走了十三任馆长、监督、校长。截止毛泽东考入该校时，他在一师这块育才的园地里已辛勤耕耘了整整十年。其时，他只不过三十来岁，从年龄上讲又是十足的“少壮派”。仅此一点，就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外纱。

更令师生感到神秘的是，易培基作为一个普通的国文教员，却深受湖南省现任省长和督军谭延■的垂青。

谭延■（1876—1930），字组庵，湖南茶陵人。光绪进士。1905年9月至次年10月，曾在一师的前身——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担任了一年多的监督（即校长）。1909年（宣统元年）被推为湖南咨议局议长。1911年与汤化龙等发起成立宪友会。辛亥革命时，杀害湖南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篡夺都督职位。此后，曾几度督湘，担任湖南省督军兼省长。1922年加入中国国民党，任湖南支部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后依附蒋介石，曾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等职。

1905年，科举宣告废除，三府之士争学师范的日益增加，谭延■就在这个时候被清朝巡抚端方委以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之职。谭虽走马上任，但并不具备兴办新学的经验，便虚心向学识渊博、颇有号召力的易培基请教，赢得了易的信任和支持。谭延■依靠易培基及其周围的一批教员的大力支持，参用日本学制，进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使学校的面貌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许多新变化。就像一师校史描述的那样：“谭随其前规，更新学制，颇有改作，是一师创办初期有影响、有作为的一位校长。”一年多的办学经历，使谭延■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望，积累了政治资本，两年多以后即被湖南各界推力咨议局议长，从而为他日后登上仕途之巅峰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与易培基一年多时间的接触了解，他深感对方不仅才华出众，且颇有政治头脑，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由从内心深感敬佩，并引以为知己。数年之后，谭延■的地位不断升迁，直到成为统治湖南的“封疆大吏”。然而，他同易培基的交情却一如当初，每逢闲暇之时，他的轿车常出现在一师门前的书院路，接老朋友去督军府相聚，或畅叙友情，或讨教军政方略……尽管如此，易培基似乎也能淡然处之，不为官场声色犬马之所动，照常教他的书，讲他的课。他的这一举动，在一师师生中树立了一派洁身自好、不事权贵的名儒风范，博得了大家的一致称道。……

易培基这位传奇人物与“廿八画生”毛泽东的相识，是从阅读他的诗文开始的。

1913年春，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省立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于第一师范。他们这批春季始业的学生和原一师秋季始业的学生同编入一个年级。毛泽东先被编在预科三班，后转入本科一部第八班。在预科

班和本科一部一二年级时，由袁仲谦先生担任国文课的任课老师。因之，这个时期他和易培基本不太熟悉。但是，易培基和袁仲谦同在一个“国文教员室”两人私交甚好，相互之间常常交谈起各自班级学生的一些情况。袁先生告诉易培基：他班上有个学生叫毛泽东，字润之，文章和书信常以“廿八画王”自诩。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每回国文考试必夺文章魁首。袁先生赞叹，他执教以来还从未遇上过文章做得这么好的学生，认为毛泽东“已练成一色文字，自是异材，伟器，再加深造，吾不知其所至”。易培基熟识的一位学生，毛泽东的同班同学陈赞周也向他由衷称赞道：“……观其所为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透过些发自师生内心的赞美之辞，易培基深感这个“廿八画生”的异乎寻常！

易培基是一位颇有才华的先生，他也很喜欢具有真才实学的学生。打那以后，他便开始关注毛泽东，尤其是十分留意毛泽东的那些被老师张贴在“揭示栏”的诗文。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毛泽东的文章果然词章华美，语句流畅，且立意都很高远。特别是他的论说文，大部写得洋洋洒洒，长篇大论，犹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笔锋犀利，气势磅礴。亲自目睹这些诗文，易培基才体味到袁仲谦这位前清举人出身，从不轻易夸奖学生的老学究，为什么对毛泽东情有独钟！

易培基与毛泽东的直接交往，始于1916年，这年春天，毛泽东升入本科一部三年极，他所在的八班的国文教员，由袁仲谦改为易培基担任。在此后两年半的教学生活中，毛泽东以一个孜孜不倦的求知者的形象，矗立在他的老师——易培基的心目中。

最令易培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对学习文史哲的那份兴趣，简直到了痴迷忘我的境界。毛泽东给易培基总的印象是：这个学生酷爱读书，但不喜欢读死书，死读书。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程他认为是“杂货摊”，凡是喜欢的就一丝不苟地去钻研，不喜欢的就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学它。

毛泽东在学习上也颇有独到之处，无论对学校规定的必修课目或课外的新旧读物，他都以批判的眼光去阅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凡经他读过的书，如对原著有否定和存疑之处，上面往往布满“×”“？”等符号，并留下“此不然”、“诚不然”，“此处又使予怀疑”，“此说终觉不完满”，“吾意不应以此立说”等批语；凡原著思想进步，立意新颖，论述精辟的地方，他总是朱笔圈点，眉批则往往有“切论”，“此语甚精”，“此语与吾意大合”等语。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分析能力与鉴赏水平，在众多的学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易培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为人品学兼优，还具备成大器者应有的特立独行之性格。毛泽东绝非那种唯唯诺诺，老实听话的学生，学校的规矩往往在他身上失灵，但他天生一派沉雄的气质，具有一种谦逊质朴的特性，待人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走路从不蹦蹦跳跳，说话慢条斯理，十分和气，平时正襟危坐，沉默寡言，遇事不紧张，不忙乱，从容不迫。每逢集会时，无论是做主席或当听从，他都不轻易发言，尤其没有冗长而庞杂的演说。在大家纷纷议论或有激烈争议的时候，他常常先静静地倾听，尔后才开口作出自己的分析和结论。他与同学相处从不开无味玩笑，更未和别人发生口角，平常和同学、朋友相聚时，大都是交流读书心得和评论古今人物，或谈论民生疾苦和国家大事。在同学中不少人称他为“毛奇”，寓双关之语意——是说他乃“奇特之士”，二是因德意志建国时普鲁士著名将领也叫毛奇（Moikt），

此人在普法战争中功绩卓著。大家将毛泽东比作“毛奇”，希望并相信他也会像毛奇那样，成为国家民族的栋梁之材。

自从对毛泽东有了深层的了解以后，易培基便十分喜爱这个学生了。此后，他们师生相亲相敬、相得益彰，一起度过了数年的教学生活……

1918年夏，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毕业。八月中旬，他告别易培基、方维夏等先生，为继续深造和筹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偕萧子升、李维汉、罗学瓚等二十四名准备赴法的青年，从长沙启程抵京。次年3月12日，他离开了学习和工作了半年多的古都北京，南下上海，在送走赴法求学的朋友之后，于四月初又回到长沙。

此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夜，在北京，在长沙，在全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即将降临一场政治大风暴。毛泽东好像一只海燕，张开矫健的翅膀，飞回湖南这片他生活和斗争的海洋，去搏击狂风恶浪。

不久，“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这一运动震动全国，湖南学界闻此消息后，群情激昂，积极响应。当时，毛泽东经师友引荐，已在修业小学任历史课教员，靠八块钱的月薪维持生计。然而，位卑未敢忘忧国，当他从北京学联代表邓中夏那里得到“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便立即投身到这一爱国运动中。他带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

校进行联络，准备成立学生联合会，实行罢课，以声援北京学生。同时，在5月9日这天，还亲笔写了一张措词激烈、鼓动人心的传单，与一师新民学会会员商量后，以一师名义发出，号召各界民众“毋忘国耻，誓死反抗”。

长沙各界群众的爱国运动，受到湖南督军张敬尧的百般阻挠。张敬尧系皖系军阀，1918年3月直皖联军击败湘桂联军，赶走驻湖南的湘桂联军总司令谭浩明后，他率兵入湘，爬上了湖南督军兼省长的宝座。张督湘后，杀人放火，奸淫掠掳，勒索搜刮，摧残文化，作恶多端，罪行累累。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生动地道出了湖南人民对张氏兄弟无比痛恨的心情。

“五四”运动爆发后，张敬尧深感惊恐，认为照此发展下去，将对他的统治不利，于是对长沙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亲自派员加强新闻检查，严禁报纸刊登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令各校校长严厉管制学生，压制学生上街“寻事”。

张敬尧的高压政策，丝毫不能动摇进步青年投身爱国运动的决心。5月27日，毛泽东邀集各校代表齐聚方维夏、易培基和徐特立主持的省教育会，举行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通过了“以爱护国家，服务社会，研究学术，促进文明为宗旨”的会章，选举产生了以新民学会会员彭璜、蒋竹如等为核心的学联领导班子，讨论通过了长沙和全省学校学生总罢课的决议。学联成立以后，立即着手发动各校罢课。第一师范是长沙各校响应学联号召，组织罢课斗争最得力，最坚决的学校。学友会骨干和新民学会会员在同学中广泛进行活动，用串联的方式，发动学生起来罢课。易培基、袁仲谦等一批进步教师勇敢地站在斗争前列，他们利用讲台向学生宣讲反帝救国的意义，宣扬男女平等、劳工神圣的思想，大声疾呼“不自由，毋宁死”。激愤异常的易培基，甚至收藏了炸弹，准备去炸死骑在湘人头上作威作福的张敬尧。老师们高涨的爱国热情，使同学们深受教育和鼓舞，当大家听到学联实行罢课的号召后，无不一致响应。6月3日，以第一师范、长沙师范和湘雅学校为首的长沙二十多所中等学校学生罢了课，接着湖南全省学生也罢了课。

实行总罢课后，张敬尧压制和迫害学生行动进一步升级，6月8日，省府以“过激党”捣乱的罪名，恫吓学生，声言“社会党人利用时机，到处煽

惑，淆乱人心，业经当局查觉，正严令侦察总局一体拿办”，并扣留学联对外各种通电。10日，又发文各校，迫令学生复课。11日，张敬尧发表一篇所谓“告学生训令”，杀气腾腾他说：“倘有听信浮言，固执己见，荒废学业，游行市街，现值匪气未尽，本兼省长为维持治安，预防祸患起见，定当遵照命令严加制止，勿谓言之不预也。”张敬尧的警务处也向各校发出“最后忠告”：“学生如有言词过激，逾越常轨，制止不听，任性直行者，即按照戒严规则，一律逮捕，以保公安”。

与此针锋相对，各界人士全力支持学联领导的罢课斗争。省教育会在方维夏、易培基、徐特立等领导和骨干的安排下，于6月7日拟发了一个快电，就湖南学生总罢课告全国各省教育会。电文说：“国是日非，人心愈愤，祸及无日，恐不独危及教育前途。查学生此举动实基于爱国热忱，倘政府不谅其苦衷，学校将全体动摇。”并建议由江苏教育会发起，召集全国教育联合会，推出代表赴京请愿，以“推求罢课真因，俯顺舆情，根本解决。”同时发布了《呈省长文》，告诫张敬尧：“祈通飭军警，对各校外出讲演之学生，随时加以保护，以防意外。”湖南教育会，工团联合会及其他社会团体，还捐款支援学联的爱国行动。7月9日，湖南各界联合会成立后，易培基、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学界名人，更是直接参与到斗争中来，发起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的基层组织“救国十人团”二百余个，深入城乡发动群众，使青年学生的爱国运动扩展为各阶层群众参加的爱国运动。

随着“五四”运动在湖南的深入发展，驱逐张敬尧便提到议事日程上了。1918年8月，学联的机关刊物，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张敬尧查封后，毛泽东和方维夏、易培基等激进的知识分子便开始谋划怎样开展同张敬尧的斗争。据知情人后来回忆：9月中旬，毛泽东在商专召集学联干部开会，就驱张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指出：北洋军阀正出现内江，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的主力军。会上，他还就近期工作作了如下安排：一、尽可能策动教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行动；二、推举原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及商专学生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进行驱张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三、恢复前段被张敬尧强行取缔的学联，做好由参与“五四”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1月16日，湖南学联发出“重组宣言”，以重组的方式恢复公开活动。宣言指责“政府麻木，措施乖方，”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何有之乡，惟一己之骄奢是纵。”这实际上成为湖南人民的第一份驱张宣言。

学联重组后的主要活动，是借检查日货，开展反日爱国运动，同张敬尧开展斗争。12月2日，学联在长沙教育坪举行了一次焚毁日货的示威大会。这次行动除学生外，工人、店员也参加了，共约一万余人。正当要举火焚烧日货时，张敬尧的四弟，政府军参谋长张敬汤，带领军警千余人冲进会场，用皮鞭和刺刀驱赴集会群众，并破口大骂男女学生为“男女土匪”，“湖南人都是土匪”，甚至还令军警把台上的学生代表拖下地来，强行要他们下跪，打他们的耳光……

反动军阀对爱国学生的肆意侮辱，激怒了湖南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全体

人民，人们再也忍无可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从此拉开了帷幕。

12月3日下午，学运负责人毛泽东、蒋竹如和周世钊等，约集各校学生代表二十余人，在白沙井枫树亭易培基家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和联络省内外可以联络的力量，全面开展驱逐张敬尧的运动。易培基、方维夏、徐特立、朱剑凡等湖南教育界名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这些知识精英向学生们分析了形势，列举了驱张的有利条件：青年学生的愤怒，全省民众的愤怒，全国舆论的抨击，直皖两系军阀狗咬狗的斗争，都使张敬尧完全陷入孤立，这次侮辱爱国学生，压制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义举，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有利时机，动员各界群众投入斗争，全面开展罢课、罢教、罢工、罢市，坚决把张敬尧赶出湖南。同时，针对当时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和驱张抱有怀疑观望态度的情况，易培基、方维夏、朱剑凡和徐特立等人主动表示，愿意由他们领导的、长沙各学校较有威望的校长和教师为主体的进步团体健学会，领衔做好这些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工作。会议最后形成四项决议：组织驱张请愿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撤销张敬尧省长职务，并给以惩处；各校于12月6日统一罢课；学生自动回家，无限期罢课，张敬尧不离湖南，学生不返校；各校学生代表向学校当局交涉退还伙食费，作为学生回家旅费。

12月6日，长沙各大学、中学、中级专业学校以及部分小学，相继举行了罢课。湖南学生联合会代表中等以上学校的一万三千名学生，发布了激昂慷慨的罢课宣言，历数了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坚决表示“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时日曷丧，誓与偕亡！”

学生总罢课以后，由于健学会的中坚作用，以及方维夏、易培基、朱剑凡、徐特立、毛泽东、何叔衡等教育工作者积极发动的结果，长沙七十三所公私立学校，一千二百余名教职员宣布总罢教！这对于张敬尧，自然是一次较之学生罢课更为有力的打击。

全省总罢教和总罢课后，张敬尧侦骑四出，威胁收买教育界人士，各种谣言纷纷流传，形势骤然紧张。针对这一情况，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把驱运运动扩展到省外，湖南各界联合会又及时召开了有长沙部分教育界知名人士和各校学生代表参加的“紧急联席会”，商定成立赴省外请愿团事宜。这次会议是秘密进行的。会址选在正待维修的楚怡小学的一栋空房内，毛泽东等会议组织者规定以“人格”为口令，与会者只有准确回答口令才准进入会场。这时，遵照12月3日在枫树亭易培基家召开的会议精神，长沙七十多所学校均已选出各自的请愿代表，易培基和蒋竹如、钟秀被一师推举为请愿代表，毛泽东为修业小学教师代表。会议根据各校提交的这些请愿代表名单，编组成六个请愿团和一个留守团，请愿团分赴北京、上海、广州、衡阳、常德、郴县各地，一方面扩大驱张宣传，一方面利用张与吴佩孚，谭延闿之间的宿怨，策动吴、谭在军事上对张敬尧的逼进；留守团继续在长沙组织学生和团结各界人士进行驱张活动，并负责与赴外地的请愿团保持联络。赴北京的请愿团最大，共有代表一百人，易培基和毛泽东都编在这个团，并被指定为代表团领队。

各代表团于12月上旬分头出发，毛泽东和易培基师生二人亲率赴京代表团踏上了征程。由于代表团人多、目标大，为避免张敬尧的耳目发觉，易培

参见李思安《回忆驱张运动》一文。

基要求代表团成员分头行动，到他的同窗好友胡子静任校长的汉口明德大学汇集。在武汉进行了近十天的宣传发动工作后，才集体乘火车北上，18日抵达北京。21日，驱张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旅京湘人去张各界委员会及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易培基和毛泽东分别选为“旅京湖南公民驱张请愿团。”易培基和毛泽东分别选为“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和“旅京公民驱张请愿团”的负责人。北京成为驱张运动的“大本营”。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着手组织了一个“平民通信社”，由毛泽东亲自担任社长。通信社每日要向全国各主要报刊发出大量稿件，通报请愿团在京的活动情况，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宣传驱张的意义。当时，通信社设在北长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马神庙里，大殿中一张长长的香案上，放着油印机和一些文具、书籍、稿件，权当工作室；里面有几间房子搭着一排排统铺，大部分男女学生便住在这里。北京的隆冬，寒风呼啸，大雪纷飞，福佑寺东墙外的故宫护城河，已经结了一层厚冰。然而，这些全然影响不了毛泽东和易培基的高昂斗志。白天，他们四处奔波，组织和领导驱张运动；晚上，又要顶风冒雪来到福佑寺起草、编辑稿件。他们都怀着一个共同的目的：不把张敬尧从湖南撵走，决不罢休。

为了争取更多人的支持，毛泽东，易培基和代表们多方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富商绅士，向他们宣传驱张的意义。12月28日，他们出席了在前门外的湖南会馆召开的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人士有一千多人，大家一致要求与会议员签字担保驱张。这些议员见群情激愤，无辞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病逝。作为杨先生的学生和未来的女婿，毛泽东前往地安门豆腐池胡同“板仓杨寓”帮助料理丧事，驱张代表团的工作便落在了易培基一人的肩上。1月18日，易培基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文，以代表团的名义发往天津、上海、北京等地，全面揭露张敬尧祸湘的罪行。电文云：“吾湘不幸，迭受兵凶，连亘数年，疮痍满目。去岁张敬尧入湘以后，纵饿狼之兵，奸焚劫杀；骋猛虎之政。卖公地，卖湖田，卖矿山，卖纱厂，公家之财产已罄；加米捐，加盐税，加纸捐，加田税，人民之膏脂全干。洎乎今日，富者贫，贫者死，困苦流离之状，令人不忍卒闻。彼张贼兄弟累赏各数千万，尚不自厌，连此仅存米盐公款，竟思攫入私囊以甘心。”

1月28日，驱张代表团组织了一次震动京华的示威游行和请愿行动。这天上午，毛泽东、易培基率全体赴京驱张代表，和北京的部分学生及各界人士一道，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分头出发，到新华门总理府请愿。请愿的队伍顶着凛冽的寒风在总理府门前等待数小时，不见总理靳云鹏的人影，便离开新华门，经北长街景山出后门，至棉花胡同总理私宅。靳云鹏不得已，才出来会见请愿代表。毛泽东等湖南代表，当着靳氏的面，慷慨陈述张敬尧祸湘的数十条罪状，并递交了《上靳氏书》。靳云鹏许诺，一周内答复代表们的请求。2月4日，毛泽东等六位代表以“一周期满”、“访靳氏以践前约”为由，再次来到总理府，要求答复驱张。由于政府没有作出满意答复，驱张

1920年2月24日《湘潮》春节特别刊号。

《昨日湖南之人之大请愿》，载1920年1月29日北京《晨报》。

代表团再次举行了示威游行。

在京期间，毛泽东和易培基还率代表团与“旅京湘省维持会”，“湖南旅京各界联合委员会”两个保张团体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两个团体，是受张敬尧爪牙的重金收买，由一些反动的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起来的，他们打着湘人的牌子，出卖湘人的利益，为张敬尧歌功颂德，与驱张代表团势不两立。为揭露“保张团”的劣迹，毛泽东撰写了《湖南驱张代表团声讨保张团》一文，再次对张敬尧进行了控诉，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保张团”是卖身投靠反动军阀的“卖乡党”，“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惜卖乡媚敌。”文章还重申了湖南人要以驱张除奸为己任，坚决和“保张团”、“卖乡党”斗争到底的原则立场。在毛泽东和驱张代表团的凌厉攻势面前，“保张团”很快土崩瓦解了。

与此同时，分赴上海、广州、衡阳等地的代表团，也积极开展反张活动。一时间，驱张运动的烈火在湖南乃至全国越烧越旺。

反动军阀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中，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的斗争也更加尖锐了，吴佩孚部北撤，谭延闿，赵恒惕率湘军尾随其后，步步逼进长沙。张敬尧已处在孤立无援，内外夹攻的境地，他在湖南的统治快到尽头了。

在这种形势下，驱张代表团的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1920年4月，易培基率代表团成员登上了南归的列车。毛泽东在与老师分别后去了上海，一来同陈独秀、彭璜会晤，商议驱张以后湖南向何处去，二来欢送萧三等新民学会会员前往法国勤工俭学。

一个多月以后，张敬尧在舆论和军事的双重压力下，不得不急急如丧家之犬，仓皇逃离长沙，滚出湖南。历时十个月的驱张运动，在湖南人民胜利的欢呼声中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是，毛泽东对自己青年时代这最为辉煌的一页，却久久难以忘怀。1925年秋，他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非常生动地描绘了他和师友们一起度过的这段充满战斗激情的生活：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粪土当年万户侯。

135 出任一师二十二任校长

1920年的夏天，是湖南人民喜庆的时节——动军阀张敬尧被赶跑，谭延■率湘军进入长沙，向全国发出■电，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一时，三湘四水群情振奋，各界人士扬眉吐气，全省呈现了一派新的气象。

当时，易培基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谭延■曾经三进三出湖南。此番再度返回故里出任省长兼督军时，他面对父老乡亲，不禁“泪随声下”，表示自己“负罪甚深”。为了消除留在湘人心中那“亡湘罪人”的恶名，标榜民主，取信于人，稳定局势，他不得不以新派人物的面目出现，装出一副唯才是举的样子，起用一批享誉湖南的社会名流进入督府辅政。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易培基这位“五四”运动的进步民主派人士、“驱张”代表团代表，一师范的资深教员，受谭延■之聘，担任了湖南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然而，这时的第一师范正危机四伏，困难重重，濒临倒闭的局面。1918年夏，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以后，湖南的教育受到严重摧残，第一师范受害更甚。学校校舍大部被北兵所占，教育经费被动反动军阀督府克扣，教员薪金经常停发，部分教师不得不另谋出路，许多学生也纷纷流失，颇有作为的孔昭绶校长愤然离任隐归故里。此后短短的一年时间，一师校长三易其人，均因无力回天而引咎辞职。

面对这种情势，一师的进步师生忧心如焚。在易培基出任省长公署秘书长兼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师师生三番五次上书谭延■，请求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一方面，易培基在第一师范工作了十多年，对学校有较深的感情，自己乐意兼任一师校长；另一方面，谭延■早年曾担任过中路师范学堂的监督，深知一师是一所重要的学校，办好了它，将可点缀自己的政绩，因而也就批准易培基兼任一师校长。就这样，易培基由一位普通的国文教员，一跃而成为全湘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长官和湖南“亚高学府”的校长。

1920年9月，易培基正式接任第一师范第二十二任校长。新学期开学时，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暨欢迎仪式。会上，易培基作了施政演说，宣布了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和改革措施，决心在任职期间依靠全体师生的积极支持，顺应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锐意革除旧的教育模式，把一师办成一所新型的学校。省长兼督军谭延■也亲自出席了欢迎仪式，并向全校师生发表了讲话，他由城南书院，湖南师范馆，讲到全省师范学堂、中路师范学堂，自然引出自己当年汪一师范“监督”的往事；又从不一师学堂被焚毁，后重新建造并扩展的曲折历程，论证了一件事业的成功，全靠一茬茬人的不懈努力方能实现。最后，他对易培基校长所宣布的改革主张和措施，大加赞扬，表示全力支持，并希望易培基不孚众望，不辱使命，紧握接力棒，把一师办好，为造福桑梓献力。

从1920年下半年至1923年下半年，易培基在他为期三年多的校长任期内，利用谭延■的扶持和自己在省长公署及省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职务，开展了对第一师范的全面整顿和改革。几年之中，他在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改革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倡民主自由，革新招生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建树，都成为一师建校以来的里程碑，《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在《易培基的教育改革》的专门章节里，记述了他为复苏一师所做的贡献，高度评价他“是继谭延■，

孔昭绶之后，在一师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第三位校长。”

见《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第 148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

易培基担任一师校长后，采取的第一步举措是整顿学校机构，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为全面推行教学改革创造良好的内部环境。

“五四”之前，一师虽然有一批思想进步，专业精湛的优秀教职员，但也有不少教职员的思想比较陈旧，业务素质不高。易培基认为，进行教育改革，教职员是一个重要条件。因此，他撤换了原有的部分教职员，从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先后聘请了具有新思想的教员十多人，又在省内选聘了一批从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毕业的学生担任各科教员，还聘了几名外籍教员教英文，这批教员，业务上绝大部分是第一流的，并具有同“五四”精神一致的新思想，堪称德才兼备。如我党最早的党员李达、李维汉、陈章甫，后来成为著名专家学者，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周谷城、田汉、辛树帜、舒新城、汪馥泉、赵景琛、夏丏尊、熊瑾玎、罗驭雄、陈奎生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受聘到一师任教的。

易培基在加强第一师范本部教职员队伍的同时，还对附属小学的领导 and 师资力量进行了充实。

在这次机构调整中，易培基解聘了原一师附属小学“主事”，重聘他的学生毛泽东担任这一职务，全面主持附小的工作。这一职务安排，对毛泽东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既为毛泽东提供了基本生存条件，也使他找到了一块进行早期革命活动的沃土。在附小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通过自己的工作职务和依靠校长易培基的大力支持，开展了积极而又有意义的教学改革活动，并以教学工作为掩护，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骨干，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迅速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在长沙修业小学任历史教员，并以此职业为掩护秘密发起“湖南自治”运动。一天，易培基给毛泽东带去口信，转达要他来一师附小担任“主事”的意向。毛泽东得知老师的口信后，十分高兴，立即辞却了修业小学的职务，前来母校应聘。这样，由于老师的器重，从学校刚刚毕业两年的毛泽东，于1920年秋天又回到母校，正式就任一师附小“主事”，也就是实际上的校长了。

在老师易培基的直接领导下，毛泽东在附小工作了一年半时间。虽然，他用相当一部分时间忙于从事各种革命活动，但仍对附小的工作做了许多改革尝试，并有很大的起色。

毛泽东上任伊始，即按照易培基校长关于“建立新的教职员队伍”的统一安排，开展对附小教职员的调整工作。毛泽东衡量教职员合不合格，主要以才、德为标准，并且，注意征求学生的意见，学生普遍反映不好的教职员，就将其辞退，同时招聘了一批新教员。经过易培基批准，毛泽东聘请了何叔衡、谢觉哉这样一批德才兼备的教员到附小任教。他还特地信写到浏阳、邀老同学、新民学会会员陈章甫回母校一道工作。这些经“五四”运动洗礼的进步知识分子，不仅成为毛泽东在附小中的同道，其中不少人还是他进行革命活动的同志。教员何叔衡、陈章甫、谢觉哉，以及由他们引上革命道路的附小学生任弼时、毛泽民、毛泽覃、易礼义、陈安仁等，后来都成为著名革命活动家，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毛泽东调整完教职员班子后，正值附小招收秋季新生，他又立即着手进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当时，附小学制仍然实行七年制，学校规模为七个班，三百人左右。附小坚持秋季招生，招生范围和师范部的一样，只限于中路各

县。毛泽东征得易培基的允许，取消了这些限制，广收各路学生，过去录取新生时，由“主事”把各方面介绍学生的信件取出，并表示某些学生应予录取的意见。毛泽东坚决废除这种陋习，组织有关教师根据学生考试卷汇集分数，然后召开校务会议统一由高分到低分录取新生。发榜之后，还有许多远道来的学生请求报考，只要是取之有理，一般都予录取。他还放宽了入学的年龄，方便失学的工农子弟上学读书。对于学生入学时所交的学费、杂费、膳费，以往须一次交清，毛泽东则允许分期交付，个别家庭生活确实困难的学生，学费则予以减免。

那时，许多在附小毕业尚未升入中学和校外失学的青少年，常常要求到附小插班复习功课，以备升学。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于1921年的春季，在附小创办了一个“成年失学补习班”，解决了这些失学青少年复学难的问题。如浙江有个名叫许志行的青年，他的父亲让他辍学去学做生意。他不愿意，便流浪到了长沙。他听说一师办了个“成年失学补习班”，就来到附小，要求报名读书。毛泽东问明情况后，将他收留在补习班就读，后来，许志行在大革命时期跟随毛泽东到广州从事宣传工作。1930年，他曾专门写了一本书，纪念老师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帮助。毛泽东逝世后，许志行再次撰写纪念文章，回忆当年在毛泽东亲自创办的“成年失学补习班”的这段学习生活。

毛泽东非常爱护学生，尤其对于穷苦学生，他更是加倍关心。许志行收留在附小就读后，缴不起学费，毛泽东就从薪水中拿出钱来帮他缴。许志行没有被子蚊帐，毛泽东就让他同弟弟毛泽民睡在一起。毛泽东对学生的生活也是关怀备至的。作为一校之长，他经常亲自检查学生寝室，严冬时一夜检查二、三次，帮学生盖被子。有段时间，学生反映学校伙食不好。毛泽东广泛征求学生意见，最后将教职工食堂和学生食堂分开办，并派学生代表协助和监督办好伙食，使学生吃得饱，吃得好，又节省。毛泽东反对动辄开除学生的做法。他深知，在旧学制下被开除的多是思想进步的学生和贫苦人家的子弟，因而再三申明：要开除学生，必须取得广大学生的同意才行。他所表现出的这一鲜明态度，不仅是对学生的爱护，而且是对旧教育制度的批判。

毛泽东十分重视各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改革，注意给学生灌输进步思想和新的科学知识。经请示易培基同意，附小的教材进行了更新。高小三年级的国语不用当时官方的课本，而选印时文作为教材，如李大钊的《今》，毛泽东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揭露谭延闿、赵恒惕搞“湘省自治”、“湘人治湘”骗局的文章等，都作为国语教材印发给学生们阅读。毛泽东大力提倡从实际出发教育学生，实行分类指导。对初小学生，注意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础技能的训练；对高小学生则注重加强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高年級的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分科设立作业室一个，每日上午规定一百分钟为自由作业时间，各科教员分别进行指导。国语科还根据学生学业成绩分组，分类辅导。

毛泽东常常利用朝会，给学生讲国家大事及读书做人的道理，宣传新思想、新道德，反对封建制度。当时，一般学生家庭都较富裕，且年龄较大，由于受家庭和社会影响。在学校只顾闭门读书，不管周围的事物，也不爱劳动。毛泽东在朝会上教导他们说，人生在世是与社会有密切关系的，因此，大家不能光知道埋头读书，还要多注意社会实际问题，多看报纸，关心时事。此外还要参加劳动，对劳动人民要尊重，要看得起工人农民，不要当小少爷。

毛泽东主张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在他的努力以及易培基校长的

支持下，附小成了一所重视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学校。学校开设了劳动课，规定以班为单位，每周搞半天劳动，学生自己动手开辟了菜园，种植了各种蔬菜，还喂养了二十多头牲猪。这对于学生来说，既减轻了家里的经济负担，又逐步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为了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毛泽东还增加了手工课的内容，除设竹工、木工课外，还报请易培基校长批拨专款办起了印刷室，学校请专人雕刻印版，由手工课老师指导学生印制作文本、算术本、练习纸及信笺、信封等。这项活动不仅学生乐于参加，甚至还吸引了许多老师。每当课余时间，印刷室里总是异常热闹繁忙，师生们从劳动中尝到了一种创造的乐趣。

毛泽东不但努力办好一师附小，而且十分关心工农劳苦大众的文化教育。他在担任附小“主事”不久，即向校长易培基提议：将学校原来由“校友会”主办的“工人夜学”改为附小与“校友会”联合主办，校址由国民学校迁往附小。易培基了解毛泽东在一师任“校友会”总务时曾主办过“工人夜学”，并办得很好，便很快采纳了学生的建议，并决定从即时起将“工人夜学”纳入整个一师教育工作之列，每学期拨给专门的“义务教育费”五百元，由毛泽东统筹支配，用于主办夜学。附小参与主办夜学后，吸收了一师周围几个工厂的青年工人，一师自己的工友和学校附近失学的居民子弟，学员一下子增加了几十人。为了办好“工人夜学”，毛泽东安排了两名教师负责管理夜学的教学工作，并邀请师范部的学生任教。毛泽东虽然本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仍亲自主持夜学的教学业务，常利用课前课后与学员谈心，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的宣传教育，学员们都亲热地称他“毛先生”。夜学的成功主办，为帮助工友学习文化，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作出一定的贡献，在长沙教育界引起热烈反响，毛泽东因此受到省教育会长兼一师校长易培基的高度赞誉。

137 支持二十二班改革

毛泽东自担任一师附小“主事”职务以后，对于附小的教育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校长易培基，对自己这位学生新颖的思想、卓越的才能非常欣赏。于是，又于1921年下学期，聘请毛泽东兼任师范部二十二班的国文教员。

“五四”时期，第一师范学校的民主空气很浓，学生对老师的要求很高。当时在一师任教的老师，多半是一些到国外留学或在国内著名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有的还是社会上的知名学者。毛泽东在一师毕业不久，便被聘为国文教师，这不能不说是易培基校长的破格之举。

如前所述，“五四”前后的易培基，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不满当时军阀混战、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的政治现状，一直在教育救国的道路上艰苦跋涉，自担任湖南省教育会委员长和一师校长后，他决心顺应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潮流，把一师办成一所新型学校，为三湘大地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但是，作为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他深知旧的教育体制根深蒂固，要改变它并非一帆风顺，必须依靠一批具有新思想、新观念和开拓精神的教员，探索出一套新的教学模式，取得成功经验后在全校推广，以此带动一师的教育改革。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易培基才不拘一格聘用附小“主事”毛泽东兼任二十二班国文教员。

毛泽东没有辜负老师的期望，他担任二十二班国文教员和班主任后，坚决贯彻易培基校长的改革意图，大刀阔斧地开展各项教学改革活动，使一师的民主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对以后的办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是当时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国文课的改革，又是教学革新的重中之重。二十二班的改革，便是从国文课的改革入手的。新文化运动以前，学校多采用文言文，并且随教师之所好，有的喜教汉魏文，有的擅长唐宋八家，有的附和桐城派，还有的专教四六骈体文，也爱好“康梁”文体的。毛泽东执教国文课以后，彻底废止了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在教材方面，当时很少采用统一的教科书，而是由教员自己编选课文，撰写讲义。鉴此，为了引导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尽量利用国文教学的讲台，对学生进行新思想、新道德的教育。他选编的国文教材，思想倾向非常鲜明，有的文章来自当时流行甚广的《新青年》，有的是鲁迅的作品，也选用《国民日报》副刊《觉悟》中的时文。如李大钊的《今》，徐特立《留法老学生之自述》，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尤其突出的是，他还把《共产党宣言》选作教材，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的创举。正当青年学生徘徊在十字路口时，老师适时地给予正确的指导，其影响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在教学方面，毛泽东废除了注入式，改为启发式、讨论式。他先就所教文章的大意加以阐述和引申，然后采用问答方式，由学生各抒己见，自由讨论，开展争鸣。后来，经易培基批准开始试行“道尔顿制”，老师指定学生的精读书和浏览书，规定学习进度，学生把主要精力放在精读课文上，然后写下学习笔记和心得体会，送请老师评阅。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程度，及时进行辅导。这种教学方法，虽然存在着削弱课堂教学，降低教师作用的缺陷，但对于当时打破旧的教育体系，改进教学方式，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也曾起过积极作用。

早在一师读书时期的毛泽东，对学校的课程安排就颇有看法，认为它内容庞杂，且大部分学而无用，像个“杂货铺”。他担任一师教员以后，曾多

次和易培基交谈过自己对一师课程设置中结构不合理、不科学之处的种种看法，并共同探讨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的办法，从而达成一种共识。他们一致认为：从一师的课程而言，不但社会科学戴上了封建陈腐的枷锁，就是自然科学也极其陈旧和保守，远远跟不上新文化运动后形势发展的要求，已到了非变革不可的程度。他们商定的意见是，利用一师优越的师资条件，开设一些新课程，以取代部分思想内容和知识结构落后的课程。这项改革仍在二十二班先行起步，毛泽东大胆砍掉了经学、修身等课，增设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生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文学史、生理卫生等新学科，分别由具有民主思想的教师李达、田汉、曾星笠、魏先朴、赵惠谟、黄士衡、杨柏森、辛树帜等人任教。这些经受“五四”运动洗礼的青年教师，在教学中大胆冲破封建思想的樊篱，给沉闷的课堂带来了一片生气。如博物教员辛树帜打破讲生理卫生“有伤风化”的旧观念，不但讲人的生理构造，讲进化论，而且公然向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某些“正人君子”的服里无异于异端邪说，但对要求进步，追求真理的青年学生来讲，却起着良好的启蒙作用。

为了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毛泽东在二十二班创办了“图书角”。在毛泽东的倡议下，同学们不仅把自己的藏书捐献出来，还把每月的书报费凑在一起，购买“五四”运动以后的新书刊，如俄国文学作品《甲必丹之女》、《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夜未央》、以及《新潮》、《语丝》、《莽原》、《创造季刊》、《创造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学艺》、《孤军》、《少年中国》等有名的期刊杂志，办起了一个藏书比较丰富的“图书角”。这些图书由班学生代表集中统一管理，师生都可以借阅，且借书不限日期，也不限数量。“图书角”的创办，对促进同学们的自学和老师的教学工作，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二十二班还一扫旧学校闭门读书的陋习，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教学方法。加强同其它学校和学术单位的横向联系。毛泽东除带领全班学生到湖南长沙师范、省一中学等兄弟学校参观学习外，还经常聘请省内外著名学者来校讲学。其中，载入一师校史的一次是请恽代英来校讲课。当时，恽代英就武汉地区建党事宜由鄂赴湘找毛泽东磋商，毛泽东就利用这一机会请他到一师给学生讲演，恽代英讲演的内容是帝国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也讲到了国家和政党的存在以及将来的消亡问题，同学们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么新奇的理论，兴趣极高。他讲完休息时，偕毛泽东来到二十二班寝室，大家仍向他提出各种问题，他都一一作了解答。这次讲演，给学生以深刻的思想启蒙教育，在全校引起极大轰动，各班学生纷纷向校方提出要求，申请效法二十二班。这样，易培基以省教育会和一师的名义，先后聘请了美国的杜威，英国的罗素，国内的章太炎、章士钊等国内外名流来校讲学，从而使全校的学术空气空前活跃起来。

二十二班的改革，最成功之处是把民主与自由机制引入了课堂。

毛泽东认为，一师的校规过繁过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挥和能力的培养，亟待改进。因而，在班务活动中他不愿拿校规校纪过多地束缚学生的自由，而是让学生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他积极向校长易培基提议，废除学监管理制度，由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参与校务管理。易培基不失为一位很有民主意识的校长，他深感实行“学主自治”是锻炼学生自律、自觉、自动能力的极好尝试，欣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于是，一师于1921年秋正式废除了学监管理制度，组织了学生自治会，选举了会长和

干事。学校对学生自治会给予高度信任，自治会选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对教学的改革、教员的聘请、经费的使用、纪律的执行，都有权参与讨论，提出意见。例如，有个姓黄的图画教员，只会临摹古画，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和创作精神，同学们表示不满。自治会向校长易培基反映了同学们的意见，引起校方的重视。不久，学校就辞退了这位不称职的教员，改聘杭州“冯氏兄弟”来校任课。在这两位画家的精心指导下，一向冷僻的图画课也开始走俏了，学生中一度兴起了实物写生、野外写生以及模型制作的热潮。实行“学生自治”以后，不仅使学校的民主风气兴盛起来，学生自律精神也进一步得到发扬，自我约束更加严格了。当时，有个姓苏的学生，假借校长易培基的名义给长沙县县长姜济寰打电话，替他在长沙打官司的老乡说情。学生自治会知道此事后，即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自治会负责人夏曦、郭亮等在会上严厉斥责了这种卑劣行为，并由自治会向学校建议，开除了这个姓苏的同学。

民主机制的引进，对学生来说，是一次大的解放。在宽松的环境下，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个人与个人之间，团体和团体之间，就政治观点或学术问题各抒己见，相互辩论，整个学校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学风。这当中，仍以二十二班最为活跃。由于有“新民学会”这个开路先锋，全班组织的团体有“文学研究会”、“小学教育研究会”、“儿童文学研究会”、“英语研究会”、“博物研究会”、“美术研究会”、“唯心学会”等等，几乎每门课程都有它的研究会，真是名目繁多。各个组织以座谈、讨论、演讲、展览、创作和出刊的形式开展活动。各个团体经常出小字报，也有以个人名义出的小字报，贴在教室和宿舍的走廊上，琳琅满目，五花八门。各个团体除在自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外，国文教员毛泽东还鼓励大家向长沙各报投稿，当时的长沙《大公报》、《国民日报》副刊《觉悟》、《湖南通俗报》，都采用过学生的文稿。这些旗帜鲜明的文章，对于发扬“五四”精神，宣传反帝反封建，传播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了一些学术组织外，学生中还出现了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社团。其中，由毛泽东亲自指导、二十二班学生肖述凡等负责组织领导的“崇新学社”，是当时学生中最大的一个团体，参加的学生占全校学生三分之一以上，三百余人，其组成人员都是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这个以二十二班学生为骨干的学社，是团结广大同学的一个重要组织，它指导社员用马克思主义去观察问题和研究学问，并通过社员带动一般学生学习革命理论，参加革命活动。“崇新学社”的活动主要通过学习、讲演、讨论等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并且积极参加校内外的社会政治活动。学社社员很多人订有《新青年》、《响导》等进步刊物，经常学习和讨论有关政治时局和社会问题的文章，也经常请校内外进步人士讲演。如李维汉、李六如等人，就曾应“崇新学社”的邀请作过几场讲演，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鼓励青年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崇新学社”成员在学生运动中也往往走在全校同学的最前列。有一次，为了学校的经费问题，学生代表到新军阀赵恒惕把持的议会交涉，遭到无理拒绝，几位“崇新学社”社员当即扯破了挂在议会大厅里的省议会会旗，与反动议会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正是在这些社会活动和政治斗争中，“崇新学社”的骨干经受了锻炼，得到了提高，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跟随老师毛泽东走上了革命道路。如学社领导人肖述凡、郭亮、夏曦等，当时便参加了毛泽东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传播马克思主义起到很大作用。

除了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外，二十二班的课外文娱活动也

曾盛极一时，尤其是在招收女生以后，则更为活跃。提到招收女生，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在当时，湖南全省中等学校尚无男女同校的先例，易培基担任校长以后，决心以实际行动向旧礼教宣战。他把自己的女儿易漱萍首先送到一师学习，为实现招收女生、男女同校带了头。当新招来的女同学入校与男生在一起学习时，顿时被居民传为奇谈，许多人特地到一师教室外面观看。后来时间久了，便也习以为常，男女同校的风气逐渐在整个湖南传播开来，最终形成了制度……

据当事人后来回忆，二十二班男女同学在文娱活动中，通过排演“文明戏”，宣传新文化和进步思想，曾在一师传为美谈。他们曾演出过话剧《孔雀东南飞》，剧中人物的悲惨遭遇，封建礼教的吃人罪恶，令观众悲泪长流，激忿不已。此外。演出过《夜未央》，还演出郭沫若的《卓文君》、《湘累》，也演出过田汉的《咖啡店之夜》，同样使观众深受感动，每次演出都是座无虚席。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以学生的身份来扮演话剧，这是对旧社会旧礼教的公开挑战，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

二十二班的改革，带动了第一师范的改革；一师的改革，又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湖南全省——一师毕业生分布于全省城乡，促进了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改革不同程度的进行。“五四”以后的一师，之所以能够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大势所趋，受时代潮流的冲击；另一方面，当时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校长易培基保持开明的态度，能够接受以毛泽东为突出代表的进步师生所提出的各项改革建议，支持他们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无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二十二班的成功改革，是毛泽东早期的一次重要教育实践，与他整个早期革命活动是紧密相连的，是他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 1913 年来到第一师范起，他在这里学习和工作了七八年，做过学生，担任过行政职务，做过教员，给自己也给母校留下了许多珍贵的东西。今天，人们透过毛泽东当时在二十二班的教学活动，便可清楚地看出他在青年时期就十分重视对旧教育的改革，努力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改造国家、唤起工农觉悟、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武器。特别是当他接受了马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明确地坚持工农是社会的中坚，要让工农及其子弟享受教育权的主张，坚持教育为阶级斗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坚持“三育并重”，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主张。这些，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第一师范不仅是青年毛泽东进行教育实践的地方，还是他最初开始革命活动的场所。毛泽东在一师工作期间，除了执教以外，还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建党活动。他在领导新民学会的同时，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研究会，积极宣传马列主义，建立党团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为日后开展大规模的革命工作打下了基础。

需要在这里特别一提的是，毛泽东依托一师这个“湖南革命青年的大本营”和基地所从事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几乎全都得到了他的教师易培基的鼎力相助，并不同程度地争取了这位知名民主人士的参与。正像毛泽东自己在五十年代曾对他的同窗好友周世钊所讲的那样：“……我那时能在一师范搞教育，还有能在军阀恶势力下宣传马列，组建党团，多亏易培基先生这个后台老板硬哟！”

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曾经先后两度赴京学习和开展社会活动。这期间他在北京大学陈独秀、李大钊二位教授的引导下，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信仰发生着根本转变。从古都北京返湘受易培基之聘到一师工作以后，他一直思考着怎样在湖南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开展新文化运动等问题。根据湖南思想界文化界的现状，他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毛泽东的这一构想，首先在易培基这里征求意见。立即得到这位教育会委员长兼一师校长的赞同。易培基的看法相当明确：湖南虽是近代中国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但没有受过系统的新文化熏陶，也没能形成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仍根深蒂固。特别是张敬尧统治期间，公然提倡扶乱占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还亲临城隍庙拈香，把湖南搞得乌烟瘴气。如不补上新文化运动这一课，就无法研究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各种进步的新思想文化便无法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生根结果。他表示将以全力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并就书社的组织人员、资金、场地等一揽子方案，提出了建设性意见。易培基还自愿充当书社发起人，同时由他出面相邀，长沙教育、新闻、工商等各界有声望的人士，如周南女校校长朱剑凡、省教育司长方维夏、长沙县长姜济寰和商会会长左学谦等，欣然参加书社的发起和创办工作，并慷慨解囊，为书社捐资。在他们的赞助下，毛泽东和易礼容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共集资五百余元，租用潮宗街56号湘雅医学校的三间房子为书社社址，购进新书一百六十四种，杂志四十五种，日报三种，书社于1920年9月9日正式开业。开业这天，易培基特地请省长兼督军谭延闿为书社题写了“文化书社”的社名，并偕姜济寰、方维夏、左学谦、朱剑凡等社会名流，参加了开业庆典。10月22日，书社召开了首次议事会，易培基再次莅临会议，代表省教育会宣布：书社为公共组织，投资作为公产，既不收回，亦无利息。经他同意，已在一师附小担任“主事”职务的毛泽东，又出任书社“特别交涉员”，指导经理易礼容开展图书经营业务。此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书社由小到大，越办越好，至次年春季资金已扩充到一千多元，与省内外七十多家书刊出版机构及图书馆建立了业务联系，还在平江、济阳、邵阳、衡阳、宁乡、武冈、溆浦设立了分社，在长沙城内的一师、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也设立了图书销售部。

文化书社前后创办了七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建党的思想准备时期，有书社这样一个“公共组织”，

公开发行人进步书刊，使广大革命青年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合法”化了；书社还为建党和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部分经费；1921年至1923年，书社曾作为共青团的活动场所，后来成为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据《新民学会资料》记载：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前往桂林同孙中山会商改组国民党事宜，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他们的见面就是在文化书社里秘密进行的。正因为这样，书社一直为反动派所不容，“马日事变”后，被新军阀许克祥捣毁。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等人一起，于1920年8、9月间相继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易培基积极参加了两个研究会的发起和组织，并再一次亲自出面联络长沙政界、文化教育界要人姜济寰、贺民范、包道平等作为发起人，以此吸引广大青年的参与。他还支持和鼓励一师进步师生入会，两个研究会的会员中以第一师范的教师和学生为多，如熊瑾玎、何叔衡、陈章甫、郭亮、周世钊、夏曦、肖述凡等。妙高峰下惜阴街拐角处的一师校友会会址和一师附小，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地方，在这里可以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十月革命。这期间，他还应毛泽东的请求，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声望，将各地进步报刊的重要文章推荐给长沙各大报纸转载，便于更多的人学习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文章，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

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俄罗斯研究会，对于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共产党早期骨干，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许多进步青年通过深入地学习和研究，都向往着世界上第一个实践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很想到那里去学习。毛泽东利用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地介绍一批热血青年到上海，然后通过有关方面的努力，突破重重关卡，转赴苏俄。像第一师范附小学生任弼时、萧劲光等人，就是湖南首批赴俄学习的成员，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我党早期的重要骨干，和领路人毛泽东一道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党的后备军——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上海最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毛泽东同上海的共产党发起小组负责人陈独秀和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人李大钊、邓中夏等，都建立了组织联系。10月间，他相继接到上海和北京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即着手在湖南建立团的组织。

毛泽东在湖南建团，最先是从小一师开始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经过多次研究，认为一师有着良好的革命基础，校长易培基思想开明，作风民主，支持进步的社会政治活动，许多方面可以得到他的保护。另外，一师“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已有过较长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革命斗争，是青年团员的理想人选。他们考虑，“新民学会”的青年会员，只要本人自愿都可以加入青年团，并成为其中的骨干，有了团的组织，“新民学会”的历史任务也就可告结束了。“新民学会”的会员们都极力赞成这个意见，于是一师学生郭亮、夏曦、肖述凡、彭平之、张文亮等，就成为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批团员。

青年团建立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社会现状和一师的实际情况，发起组织了“星期同乐会”，团结，教育更多的青年向团组织靠拢。在这一过程中，易培基以一个政治活动家特有的素养和宽阔胸襟，同毛泽东一起导演了

一场“安马合流”的活剧。

当时，一师存在着两大思想营垒，一方面是以“新民学会”、“崇新学社”为主体的进步青年，信仰的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一批宣扬“要民主不要政府”的师生，推崇所谓“安那其主义”，亦即无政府主义。两者之间阵线分明，针锋相对。无政府主义者在第一师范相当活跃，他们先后成立了“明社”、“爱社”、“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诗社”等组织，定期开展活动，极力鼓吹极端自由，主张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领袖，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张平均财富，一切平等。他们这种思想很投合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脾气。因此，无政府主义社团在一师乃至长沙颇有影响。更有甚者，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常常利用各种集会和自办的刊物，同“新民学会”和“崇新学社”会员展开争论，有的还用张贴小字报的方式攻击对方。这样，不仅使同班同校的学友失和，还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阻碍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校的传播。鉴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审时度势，及时指导肖述凡、夏曦、郭亮等青年团骨干，发起组织了“星期同乐会”，同无政府主义思潮作斗争，争取无政府主义者的转变。

一师的上述动态，自然引起了校长易培基极大关注。此时的易培基，虽然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并已身居省府要职，但他在政治思想上仍是奉行无政府主义的。他反对强权政治，不赞同俄式的暴力革命，而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他的这些观点，同一师师生中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是基本接近的。尽管如此，他不失为一位具有民主思想和宽广胸怀的师长，他不愿使自己的政治观点掺和到学生相互的争鸣之中，更不以世界观的同异厚此薄彼。虽然，他透过毛泽东组织“星期同乐会”的举措，即看出学生鲜明的政治立场——旨在改造和争取不同政见者，但他仍然赞成毛泽东兼容并蓄的政治策略，希望通过“星期同乐会”的活动，使思想上有分歧的师生达成新的团结，实现品行和学业上互学共进。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易培基十分支持“星期同乐会”的工作，他特批将废除自修室后空出的教室腾出一间，作为“星期同乐会”的专门活动场所；还经常亲自参加“星期同乐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以此带动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师生参加。那时每逢星期天，师生们就到长沙近郊的名胜地水陆洲、开佛寺、天心阁、碧江湖、望湘亭、朱家花园等处聚会，或举办理论研讨会，畅所欲言谈主义，论时势；或组织歌咏比赛，尽情尽兴朗诵古诗古诗词，演出新歌新曲；或在青草地上席地而坐、在林荫道上并肩漫步，在烟波荡漾的湘江中泛舟……轻松活泼的气氛，自由自在的接触，亲密无间的交往，加深了同学们之间的相互了解，消除了隔阂，增进了友谊。在青年团员的帮助和影响下，“星期同乐会”的基本会员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提高，那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的青年，也深受启发，思想观念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最后大都转为信仰马列主义了。当时，毛泽东把这个争取转变过程称作“安马合流”，即安那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合作，也就是党的教育说服了无政府主义者。

青年团成立之后，毛泽东即在长沙着手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过程中，易培基这个党外的民主人士，仍给予毛泽东以大量直接与间接的帮助，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不容易的，其意义已远远超出师生之间感情交往的本身。1921年元旦，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在“文化书社”召开了新年大会，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具体办法，得

出以暴力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改造社会的结论，作出了建立党团组织的决定。这样，“新民学会”经过三年的发展，至此已发生了质的飞跃，事实上已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湖南小组。新年大会后，“新民学会”的基本会员毛泽东、何叔衡、陈章甫、彭璜、熊瑾玎及稍后从法国留学归来的罗学瓚、向警予等人，即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最早的成员。湖南建党，引起了陈独秀等人的高度重视。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即发来召开党的成立大会的通知，请毛泽东赴沪参加会议。随即，毛泽东一边为他和附小教员何叔衡向易培基校长打了《请假报告》，一边进行着行前的各项准备，等待着假期批准后立即成行。当时，第一师范尚未放暑假，学生正面临紧张的复习考试阶段，按规定是不允许教师告假的。但是，易培基是一位政治灵敏度很高的政府官员，毛泽东信仰马列的政治倾向他早已明了，毛泽东在一师组织激进社团的事人所共知，再联系到当局关于上海、北京等地正秘密建立俄式党的情况通报，他仿佛感到毛泽东此番突然请假远行，绝非寻常之举。于是，他未究详情，便在请假报告上签了字。这样，在六月二十九日这个黑云蔽天的夜晚，毛泽东偕何叔衡悄悄离开了湖南，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的盛会。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毛泽东于八月中旬回到湖南。就在这次归后拜望易培基先生的时候，他被告知从下学期起被聘为一师国文教员。于是，毛泽东仍然以在一师任教为社会职业，继续从事建党工作。这期间，由于易培基的开明和宽容，毛泽东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利用一师这个有革命基础的阵地，发展和建立党的组织。首先，毛泽东从一师的青年团员中，积极而慎重地吸收夏曦、肖述凡、郭亮等先后入党，成立了第一师范党的小组；接着又在省一中、商业专门学校、甲种工业学校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小组。10月10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毛泽东被选为书记。随后，毛泽东把主要力量放在开展工农运动上，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党员。这年秋冬，他征得易培基校长同意，利用课余时间，深入长沙各大厂矿，调查了解工人情况，选拔培养工人骨干，他还专门请假考察了湘南、湘北数县农村，物色党员培养对象。从1921年冬至次年春，毛泽东在长沙的造币厂、黑铅炼厂、第一纱厂、电灯公司，粤汉铁路和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以及安源路矿工人中发展了党员，还在衡阳、平江、岳州、常德等县建立了地方党小组。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担任书记。至此，毛泽东辞却了第一师范的教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的显赫功绩，是在他的母校第一师范起步的。他在一师任教时期亲手发展的知识分子和工农成份的党员中，既造就了许多优秀的党的领导者，也锻炼出许多出色的社会活动家和军事家——何叔衡、谢觉哉、李维汉、郭亮、方维夏、向警予、陈章甫、张昆弟、罗学瓚、夏曦、夏明翰、蒋先云、张秋人、李六如、杨开慧、毛泽民、柳直荀、毛泽覃、张汉藩、毛福轩……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宛若一颗颗璀璨的明珠。这些英雄们，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牺牲了的，都为后人树立了永久的楷模，留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当人们缅怀这些革命前辈和先烈时，绝不会忘记当年革命的大本营——第一师范，也不会忘却曾被毛泽东称之为“后台老板”的一师校长易培基先生！

139 同路不同归

二十年代初的那些如火如荼的岁月，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老师易培基来

说，无疑是他们人生历程上的重大转折。

这个时期，人到中年，仕途得意的易培基，并没有心安理得地去当官做老爷。相反，愈是在官场呆的时间长了，他愈看清军阀政权的反动、社会的黑暗和腐败，革除旧制度的愿望一直在内心萌动。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决定，他始终未能踏上他的学生毛泽东选择的那条道路。

尽管如此，富有民主思想和正义感的易培基，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湘区委员会组织和发动的爱国学生运动。在他任一师范校长时的几次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他和他领导下的一师师生，总是站在斗争的前列。

1923年初，因收回旅顺、大连和抵制“二十一条”，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以毛泽东为总干事的湖南工团联合会，以夏曦为总干事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以易培基、徐特立、周方为首的湖南教育会等公法团体，举行了六万人的反日游行示威。第一师范的全体师生及附小高年级的学生参加了这次行动，他们在易培基校长及一批有名望的教员的带领下，高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认二十一条”、“收回旅大”等标语，行进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4月5日，工团联、学联和教育会发起组织了“湖南外交后援会”，一师学生郭亮、夏曦、夏明翰等被选为后援会主席和副主席。

当时，毛泽东受反动军阀通缉已离开湖南，郭亮等人在易培基校长的帮助和指导下，利用一师的宏文图书发行社创办了外交后援会的机关刊物《救国周刊》，唤起民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5月14日，“后援会”向全省宣布了《对日经济绝交公约》，在湖南掀起了规模空前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随即，长沙和各县城关日货无人买，日轮无人坐，日本人开办的商店里华人店员纷纷离店，“日人受此打击，无立足之处”，便凶相毕露，于6月1日制造了日本水兵杀害中国木工王绍元和长沙国民小学学生黄汉卿、打伤数十人的“六一”惨案。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全市、全省人民的极大愤慨。当天，外交后援会召集了有各界群众两万余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举行全湘统一罢工、罢市、罢课，然后抬尸到省府请愿。次日，全市又举行了各团体各学校六万多人的抬尸大游行，以敦促赵恒惕政府“疾速与日本领事馆交涉，惩办凶手，撤退日军、撤换日领，抚恤死者，赔偿损失……。”请愿和游行结束后，第一师范师生在易培基校长的支持下，率先响应外交后援会的号召，实行全校总罢课，师生们还在学生会的领导下，组织了好几个讲演团，到工人、小贩、苦力集中的大椿桥讲演，到行人川流不息的南门口控诉，宣传“莫买日本货，莫当亡国奴”的主张，激发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

易培基和第一师范师生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深深触怒了赵恒惕军阀省政府，他成了赵恒惕的眼中钉。早在1920年上半年，赵恒惕便率兵进入长沙，到年底逼走谭延闿，当上了湘军总司令，随后，又逼走临时省长林支宇，当上了省长。赵恒惕主湘后，看到长沙发生的每次学潮，一师学生均必参加，并总是居于领先地位，故而认为一师“学风浮薄，士习嚣张，青年学子，多不以学课为重，而专为出位之图，每借题滋生事端”。而学生起事，校长有责，赵恒惕对易培基颇为不满。但是，这位校长在社会上很有名气，在一师很有威望，又是省长公署的秘书长，加上赵恒惕刚刚上台，根基不稳，只好暂且维持现状。“六一”惨案发生后，易培基以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支持全市教员罢教，并亲率一师师生参加请愿和游行示威，把矛头直指亲日的军阀政府。因此，赵恒惕再也难以容忍易培基了，必欲去之而后快。到

1923 年的下学期，省政府要撤换一师校长的风声已传遍了全长沙……

再说毛泽东，自 1922 年辞却第一师范教职以后，在主持中共湘区委员会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致力于工人运动。继 9 月发动和领导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之后，他先后组织了粤汉铁路工人、长沙泥木工人、长沙铅印工人等大规模的罢工运动，掀起了湖南工运的高潮。到 10 月间，全省已正式成立了二十多个大大小小的工会，拥有会员五万余人。于是，毛泽东便积极筹划成立湖南全省工人的统一组织。11 月初，“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诞生，毛泽东当选为总干事。从此，湖南工人运动有了公开的组织与指挥机关。

工运的蓬勃发展，使赵恒惕政府深感不安，想方设法要进行破坏。他们制造谣言，说搞工运的人都是“过激派”；诬蔑工人提倡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省政府；同时放出将对罢工工人采取严厉制裁手段的口风，威胁工人群众。此外，还不断在工人中制造各种挑衅事件。为消除部分群众的思想顾虑，揭露军阀政府的阴谋，保护工会组织，毛泽东依照易培基的主意，巧妙利用赵恒惕为愚弄人民，巩固既得地位而公布的“省宪法”，以工人代表身份面对面地同赵恒惕进行了一次说理斗争。辩论会上，毛泽东以确凿的证据和雄辩的口才，彻底戳穿了省府玩弄假民主的骗局，使赵恒惕理屈词穷，败下阵去，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把摘去的工会牌子马上送还；理发行业的收入由原来的三七分成改为四六分成；被捕的工友可以保释”等条件。事后，赵恒惕无可奈何地对手下人说：“湖南若再来个毛泽东，我便不能立足了！”

反动派总是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老奸巨猾的赵恒惕虽在当时不敢对工人运动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但对毛泽东个人则处心积虑要加以谋害。在 1923 年发生的这场大规模反帝抗日爱国运动中，赵恒惕终以“煽动市民骚扰滋事”的罪名，于 4 月间的一天夜里，出动军警搜捕毛泽东。幸被省长公署秘书长易培基事先得知，及时派人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 22 号中共湘区委员会机关报了信，毛泽东才得以脱离危险。赵恒惕没抓到毛，便狗急跳墙，下令悬赏缉拿“过激党”毛泽东。为躲避反动军阀的拘捕，毛泽东不得不离开湖南前往上海，后又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的筹备工作。“三大”以后，他随中央机关暂留广州，9 月迁赴上海。不久，为贯彻“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精神，他又从上海秘密潜回长沙。

这次回到长沙后，毛泽东立即拜访了易培基先生，根据党的“三大”精神，对老师开展了统战工作。在易培基的书房里，师生二人促膝谈心。毛泽东从军阀政府的反动和腐败，谈到国内新生政治力量的崛起；又从共产党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谈到国共合作，挥师北伐，打倒军阀，建立新国家的光明前景。易培基听后很受震动，情不自禁地向学生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吐露了这些年为官的艰难际遇和苦闷心境。这次谈话，使易培基产生了离开军阀政府，投身国民革命的想法。

11 月底，毛泽东完成返湘的使命后，遂与老师告别，从长沙再到广州，应孙中山先生之邀，参与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924 年 1 月 22 日至 30 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毛泽东出席了这次大会，并由大会主席指定，任《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审查委员会委员。30 日上午，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由孙中山亲手书列为候选人之列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就在这前后，易培基接到赵恒惕撤销他一师校长

职务的通知，随即赵便委任其亲信李济民担任一师校长。李济民上任那天，一师师生全体罢教罢课，以示反对。赵恒惕派军警荷枪实弹包围学校，以武力强行压制师生接受李济民出任校长。至此，易培基教育强国的梦已破灭，他忿然辞去了省府的一切职务，于旧历腊月举家南迁革命中心广州，通过谭延■、毛泽东的举荐，在孙中山大元帅府担任高级顾问。

从这一阶段的情况看，易培基和毛泽东走的本是一条道路，但没料到此后因政治信仰的不同，他们朝着各自的目标越走越远。

1924年3月，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的派遣，赴沪指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行动”。年底，毛泽东结束上海执行部的工作，回湖南老家“养病”，全力开展农民运动。不料，又被军阀赵恒惕所不容，1925年8月，赵恒惕再次下令缉拿他。在韶山党组织和人民群众掩护下，他完全离开湖南，“间道入粤”。到广州后，即代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务，直至次年5月。1926年冬，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影响和推动下，农民运动犹如暴风骤雨，席卷全中国。第二年春节期间，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又回到湖南，深入湘潭、长沙等五县农村考察农运，写下了历史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是年夏天，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紧接着长沙也发生了国民党右派袭击工农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政治风云突变，革命走向低潮。顷刻之间，国共两党这双大革命时期的兄弟，反目为仇，兵戎相向。中共“八七”会议以后，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而后率部历尽艰辛，转战千里，终于把工农革命军的红旗插上了井冈山，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从此，这里星星之火以燎原之势蔓延全中国，直至烧掉了腐朽的“蒋家王朝”。毛泽东以数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实现了当年在一师创立“新民学会”的宗旨——“改造中国与世界”，他的梦想成真了！

与此相反，在大革命中参加国民党的易培基，却踏上了一条曲折崎岖，没有光明和出路的死胡同。

在担任大元帅府顾问后，易培基以他勤勉的工作和卓越的才能，赢得了大元帅孙中山的信任和赏识，不久，又兼任时称“革命摇篮”的广东大学教授。南北议和后，他作为国民党议员出任黄郛摄政内阁教育总长。1925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家政权陷入军阀之手，易培基不愿同流合污，再次脱离军政府，先后任故宫博物院理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等职。1927年，谭延■依附蒋介石，登上了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宝座。次年，易培基先被谭委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兼古物馆馆长重任，后据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部长要职。只可惜，好景不长。1934年，他被诬告曾盗换故宫珍宝，被迫辞职，为躲避惩罚隐匿于天津租界。

其实，这是一起大冤案，它是由易培基另一位最喜欢的学生萧子升一手造成的。萧子升，亦名萧瑜，湖南湘乡人。少年时代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以第一名成绩在甲班毕业。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5年毕业于一部三班后，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他从东山小学到第一师范，都与毛泽东同过学，且交谊甚深，在一师他俩同是最受易培基先生器重的学生之一。学生时代的萧子升，思想进步，颇有才气，会做文章，尤其能写一手好字，好习曾国藩的理学，待人以敬，交游甚广，是“新民学会”发起人之一，学会成立时，推选为总干事。赴法勤工俭学后，思想日渐转向右倾。他赞成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的机会主义，从法国给毛泽东写信，“主张温和的革

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他的这些政治立场恰与易培基的信仰基本吻合，因而颇得易的好感。萧子升回国后，为谋求个人的前途，即投靠到国民党要员李石岑、易培基门下，易培基多方奔走，为其谋划，终将其安插在身边供职。萧先是在他任院长的故宫博物院当监守，掌握故宫无数珍宝的看管大权；后出任农矿部处长、司长，直至博得农矿部次长之高位。但是，千万没想到，这个倍受易培基垂青的萧子升，竟在他恩师的背后捅刀子。就在他任故宫博物院监管时，盗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并嫁祸于易培基。事情败露后，萧子升于1934年携款潜逃，长期旅居国外，直到年老病死异国他乡。易培基蒙此不白之冤，不仅在政治上彻底绝望，就连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终日心情抑郁，久积成疾，于1927年病逝于上海，时年五十七岁。一位早年积极投身“五四”运动，中年舍弃高官参加国民革命，富有民主精神的教育家，最终落得这样的结局，这大概是连他本人在内的人们始料未及的。

易培基和毛泽东这对早年交往颇深的师生，在革命的路上他们曾是同路人，而结果却迥然不同——一个沦为国民党官僚政客，一个成长为共产党的领袖。这种反差实在是太大了，太大了！由于这一层原因，新中国诞生后，没有人再提起这位伟人的老师。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易培基走了另一条政治道路，而忘记这位老师的恩德。有关资料表明，毛泽东曾私下多次对当年一师的师友谈起过学生时代的这位恩师，并以他特有的口吻说：“易先生是个好人啊，他帮过我毛泽东好多的忙，只可惜路走错了……！”言语之中，流露出对故人的一片怀念与惋惜之情。

党没有忘记这位民主人士在自己幼年时所给予的特殊帮助和所作的特殊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版的《湖南第一师范校史》，对易培基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据传，老革命家李维汉在为《一师校史》一书作序前审阅书稿时，曾就记述易培基事迹的专门章节发表看法说：“这样写好。只有这样写，才客观、公正！”

是的，历史需要客观、公正。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易培基与他的学生毛泽东背道而驰，献身于一个始是进步和革命的、终则彻底堕落和反动了的政治团体——国民党，这条路不能说没走错。但是，有一点值得庆幸的是：易培基不是一个救世救民的“良相”，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良师。他不只是对学生时期的毛泽东爱护有加，恪尽人师之责；就是在毛泽东从一师毕业走上社会以后，他仍然十分珍视他们之间那份师生之情。尽管因生活经历和政治见解的不同，他始终未能成为毛泽东的同志与战友，但这并没有影响彼此之间的牢固交谊，他更没有因此妨碍过学生追求进步的步伐，而是竭尽全力地对毛泽东的事业予以热情支持与扶助。在那个政治阵线纷坛复杂的年代，仅此一点便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当昔日那些曾经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战争罪犯也被写进文学作品里大肆渲染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多用些笔墨，来讴歌易培基这位有瑕疵的伟人之师呢？！

第二十三章 李大钊

——思想导师

科学的使命是对真理的探索。

具有伟大的理想，出以坚决的信心，施

以努力的奋斗，才有惊人的成就。

——代题记

140 第一次北京之行

1918年夏，毛泽东以优异的成绩，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

当他手捧烫金的文凭时，这位农民的儿子眼眶湿润了——五年半的苦读，五年半的穷恩，五年半的心血和汗水，终于化作这文化知识的结晶！他将带着它走向社会，走向人生的角逐场。在未来生活的大舞台上，他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历史的匆匆过客，还是社会的主人翁？是显赫一时的权贵，还是流芳百世的英雄？

正在这时，他接到了同学蔡和森寄自北京的信。蔡和森的信中说，联系赴法参加勤工俭学一事，“殊不好为计，故示望兄来指教。”并说“驻京唯有润兄最宜”，“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问题。”极力敦促毛泽东前往北京。蔡和森还在信中转达了杨昌济先生的想法，希望他能一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兼搞社会活动。

原来，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往北京。这月下旬，杨先生写信给毛泽东，劝他在一师毕业后到北大继续学习，并告诉他一个消息：法国政府为弥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来中招募工人。曾在法国留学的蔡元培、李石岑、吴玉章等人，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倡导青年利用这个机会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求学，并组织“华法教育学会”来举办此事。就这样，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便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不小的浪潮。

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从杨昌济先生的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便决定立即在长沙大力推动这一运动的发展。他们首先向新民学会会员和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学生进行宣传和发动，数日之内报名者达三十余人，其中新民学会会员就占十多人。

6月下旬，新民学会就此召开了一次会议，大家认为，学会应向外发展，而留法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会议决定派蔡和森前往北京了解有关情况，并和各方面进行联络。蔡和森进京后，感到勤工俭学事宜困难不少，非得有一个得力的人来筹措不可，所以就写信请毛泽东北上。

为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同时也由于渴望接触新思想和新人物，毛泽东接信后，即于8月中旬，偕新民学会会员离开长沙，启程北上，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

秋风送爽，枫叶初红。8月15日，毛泽东同罗学瓚、张昆弟、萧子升、李维汉等二十四名准备赴法的学员，由长沙登船，走水路到汉口后，转乘火车直往北京。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湖南，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此时，当了五年半穷学生的他，已是身无分文——路费是同学借的，饭钱是同学们合伙掏的；唯有的，是胸怀天下，追求真理的一腔热情和愿望。

当时的古城北京，是直系军阀严密统治的地方，它是官僚传统的沃土，是达官贵人的世界，富丽堂皇下，呈现出封建的腐朽与没落。而另一面，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在这里展开《新青年》正以它那摧毁一切旧事物、旧观念、旧道德，高扬一切新事物、新观念、新道德的气势，从这里向全国放

射着启蒙运动的光芒；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家们，正以其勇猛之心和不怕断头的精神，向一切愚昧落后的东西进行猛烈的抨击；民主和科学这两面中国人最陌生的旗帜，已开始在千年古都上空高高飘扬，东方最古老最辽阔的国度，正经受着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新旧思想、新旧文化在北京的这块土地上，激烈地较量着、厮杀着。

为了落实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到处奔走。他们请李石岑介绍情况，制定计划，筹措经费，还先后在北京大学、保定育德中学、蠡县布里村、长辛店四处开办留法预备班。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虽然“所受意外的攻击和困难实在不少”，“但大家都望着前头的乐园，本着冲动与环境的压迫，勇往前进，而没有一个人灰心”。罗学瓚在家信中这样写道：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佩服”。在毛泽东的具体组织和妥善安排下，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以后，终于在次年3月启程前往法国。

毛泽东要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事情奔忙，但生活却日益窘迫，即使是每月极有限的几元生活费，也无法筹措到，他急于寻找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10月间，通过杨昌济先生的介绍和联系，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在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给他安排了一个助理员的差事。

这一安排，使毛泽东满心欢喜。他知道，北京大学是名流荟萃的最高学府，更是新思想、新文化孕育传播的园地，思想十分活跃，名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这些对他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更使人注目是，在北大图书馆，李大钊已开始把中国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系起来，正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给那些求知青年指明一条闪光的大道。

想到自己第一次北京之行，便能与李大钊这位令人十分仰慕的知名学者见面，并将要在他身边工作和学习，毛泽东激动不已，夜不能寐。

毛泽东与李大钊神交已久。

他最初知道李大钊的名字，是在1916年的9月。那时，李大钊刚从日本留学回国，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

当时，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是《新青年》在湖南最早的读者和支持者，他鼓励一师学生阅读这本杂志，还自己掏钱买了一些分送给他最喜欢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从中受到教益和得到启发。

毛泽东记得，他第一次从杨先生这里看到的那期杂志上，登载有李大钊撰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青春》。文章指出，“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文章号召青年“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造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毛泽东对上述宏论极为赞赏，精神为之振奋。他说：“是的，要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于是，毛泽东成了《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之一。并且，通过他的老师杨昌济，对李大钊的生平情况、不凡经历和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出世不久，父母先后病逝。既无兄弟，又无姊妹，靠祖父抚养。祖父李如珍，早先开杂货铺，赚了点钱，添置了九十多亩土地，家庭生活还算富裕。祖父对孤孙十分疼爱，使大钊自幼得到读书的机会。因为祖父母年纪大，家中无人操持家务，1900年春天，11岁的李大钊，便与邻居十八岁的赵纫兰结了婚。纫兰是个勤劳朴实的姑娘，善理家事，对李大钊有很大帮助。

在李大钊结婚的这年春天，义和团的主力由山东向河北转移。8月14日，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李大钊亲眼见到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亲眼见到中国人民反抗清政府、反抗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这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05年，李大钊16岁。当时，科举考试已经停止。他曾考虑在家务农。由于妻子赵纫兰的支持和鼓励，他得以继续读书。秋天，他离开乐亭县大黑坨村，进入卢龙县水平府中学。这是一所中西合流的学校，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新学，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物的著作，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开始了关注。1907年暑假，李大钊没有等到中学毕业，便投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生活朴素，为人正直，博闻强记，能读善文，深受学校老师的器重和同学们的敬佩。在这个学校里，他从一些进步教师那里接触到孙中山的学说，从而产生了探寻救国救民真理的强烈愿望。有一次，很多学生聚在宿舍里谈毕业后个人的志向，有的想“高官厚禄，光宗耀祖”；有的想“周游天下，玩赏名山大川”；有的主张“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而已”。有位同学让李大钊把他的志向讲给大家听听，李大钊抬起头，很严肃地讲道：“我的志愿，就是要投入时代的洪流，改造我们的中华国土，不愧为炎黄子孙。就我个人来说，我活着只希望做一个对老百姓有用的人。我死后一不要棺槨，二不需埋在地下，只希望把我的尸体扔到大海里，喂肥鱼虾，供民食用，也使人民得到一点好处，这就是我终身的最大快乐！”为了努力实现自己的志愿，他和同学们一起组织了北洋法政学会，创办《言治》刊物，赞颂辛亥革命的胜利，抨击袁世凯窃国称帝的罪行，已成为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了。

1913年冬天，李大钊在朋友们的资助下，远渡重洋，进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学习。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他组织了“神州学会”，进行反袁的秘密活动。1910年底，李大钊在章士钊子日本主编的《甲寅》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国情》一文，对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发出严厉警告：按照中国国情，必须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如果硬要把君主制强加于中国，“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

1916年，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里，李大钊担任了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负责编辑这个会出版的《民彝》杂志。

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李大钊从日本学成回国，先在北京担任《晨钟报》的总编辑，宣传民主主义思想。嗣后，由章士钊推介，被蔡元培聘请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不久加聘为教授并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对于这项新的工作，李大钊是十分满意的。他最喜欢同青年人接洽，因为他认为青年人是中国的希望。他将原图书馆加以扩大，使它拥有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阅览室，来看书的人比以往多了好几倍。当时，北大校风很腐败，为破旧习、树新风，他发动进步学生成立“进德会”，以不嫖、不赌、不娶妾、不吸烟、不喝酒等为基本戒条，受到广大师生的好评，学生中的骨干邓中夏、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相继成为他过往甚密的朋友。

在这期间，李大钊从中西方各种思想、流派的分析、比照中，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最合中国国情，能够拯救古老的华夏之邦，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之后，利用《新青年》这块园地，连续发表反映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的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分析问题，从而很快地成为当时我国思想界的领袖……

对李大钊的了解，加深了毛泽东对他的尊崇；对他的尊崇，又转化为对《新青年》的喜爱。从此，毛泽东每逢接到新的一期杂志，即对李大钊的文章反复阅读，并摘抄一些精辟段落和具有哲理、远见的句子，深刻领会、认真揣摩。他感到，《新青年》就是专门为广大有志青年而办的，它是青年的代言人，说出了青年人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它的许多见解，竟然和他的思想完全吻合。他完全同意《新青年》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等主张。毛泽东不仅爱读《新青年》，还积极给它投稿。1917年春，毛泽东在登过岳麓山之后，激情勃发，写下了《体育之研究》一文，寄给了《新青年》编辑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介绍了他自己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出的一套体育锻炼方法，提出了把“武勇”作为体育之“主旨”的见解，文中不少惊人之语，如“力拔山兮气盖世，猛烈而已！不斩楼兰誓不还，不畏而已！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忍耐而已！”《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慧眼识珠，很快将此文发表在4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三卷二号上。

对于景仰已久的《新青年》编辑——李大钊，毛泽东早就希望能到北京一趟，登门拜访和结识，聆听教诲，并亲睹他那令人倾倒的风采。现在，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142 红楼相识

就这样，在北大图书馆所在地——红楼东南角的一间办公室里，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两位历史巨人的四只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极富意味的是，正是由于毛泽东和李大钊这两位巨人在这里相识、握手、工作，使得当年的北大旧址“红楼”，在数十年后被国家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辟有纪念性的陈列馆。解放后，郭沫若先生曾在《咏红楼》一诗中写道：

星火燎大原，滥觞成瀛海。

红楼弦歌处，毛李笔砚在。

力量看方生，勋勤垂后代。

寿与人民齐，春风永不改。

图书馆的助理员，是一个暂时安插性的职务，每月工资八块钱。毛泽东的工作室紧靠着李大钊的办公室。房子的中间是长方形的会议桌和许多凳子，他自己就坐在窗下的一张三展桌前办公。他的具体工作，是登记来馆看报纸的人们的姓名。这虽然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被人瞧不起的职位，但是通过每天管理和阅读报纸，他从中吸取了许多新鲜的有益的知识；同时，也给他提供了结识名流学者的便利条件。从那些来阅读书报的人当中，他知道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他对这些著名学者怀有浓厚的兴趣，试图与他们就政治和文化问题开展交谈，但他们都是大忙人，无暇去听一个图书助理员说南方话。即使在大学的其他场所，毛泽东也只有在缄口不言时才能去听。在一次旁听教授讲课时，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得知他只是一位没有注册的学生时，竟拒绝回答他的提问。从这些冷遇中他感觉到：即使是高等学府，也是专制的世袭领地。它就像一座耸立云端的金字塔，名流学者高高在上，“下等人”是无法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这也触发了他决心打破旧的传统习惯、变革社会的强烈意念。

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遇上了知音，这就是李大钊。虽然，李大钊也是很有名气的教授，但毛泽东蓬勃的工作热情、认真踏实的办事态度，首先就博得了他的好感。尤其是毛泽东那远大的抱负、横溢的才华、敏捷的思维和锋芒毕露的锐气，更深得他的赏识。平时工作之余，或在他前来阅览室检查工作、翻阅书刊杂志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畅谈。李大钊以极大的关注，倾听毛泽东讲述他对社会、人生和学术问题的见解，回答对方提出的一个个疑难问题，有时谈话长达四五个小时，而每次交谈总是十分投机，都有新的论题和新的收获。

一次，毛泽东向他的先生叙谈了他的身世，剖白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他说，他是一个在湖南闭塞山村长大的农家子弟，虽然家境小康，但自幼参加田间劳动，亲眼目睹了贫穷、饥寒、失学、欺侮和种种不公正。经过同父亲的斗争，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读完六年私塾。读孔夫子的书没有兴趣，但师命难违，竟也能背诵如流。他最喜欢读的是中国历史小说，许多故事都熟记在心。描写造反英雄杀富济贫的《水浒传》，使他神往；对长沙“抢米事件”中无辜者的镇压，使他悲愤；只要力所能及，他总是像他母亲一样，援助受苦的穷人。为力争继续求学，抗拒父亲安排的经商之路，才得以走出家门，先到邻县湘乡一所新式高小，读了半年“洋学”，开始接受了康、梁

变法维新的影响。后来他来到长沙继续求学，当武昌起义，湖南响应时，他立即剪辮从军，过了半年士兵生活。退出兵营后，由于文章写得好，以第一名考取省立中学，但生性洒脱不羁，不愿受刻板的课堂规矩束缚，半年后退学，在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阅读了古今中外大量的社科书籍，进一步接受了进化论思想。

父亲对他这种不进学堂的读书方式，表示坚决反对。二十岁时，他又考取了湖南省第四师范学校，后合并成为第一师范。他在这个学校读了五年半时间的书。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中国军阀混战的混乱年代，湖南先后三次为北洋军阀统治，成为南北拉锯的战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但一师是一所办得好的新式学校，有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这样一批思想进步、道德高尚的好老师，学生多出身贫寒，读书用功。一批不满现状力求上进的同学，与学贯中西的老师们来往密切，师生之间，切磋问题，交换心得，如鱼得水。

在第一师范，他是一个“特殊学生”，学习以自修和选修社会科学为主，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在学习的前期，他很重视国学、即中国古典经籍的研究，这主要是指“孔夫子的书”，包括孔孟儒家和宋明理学的学说，也有墨学、道学和佛家的学说。这时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的主体。由于时代（国家存亡之秋）和地域（湖南“湘学”传统）的关系，在国学方面，他深受王船山、颜习斋、曾国藩、谭嗣同直到老师杨昌济的影响，其最根本处在于重视理想和道德力量，讲究“立志”“修身”的理学精神，同时又注重经验、注重实际、注重行动、注重“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经世致用的实践精神。

《新青年》问世以后，他和他的同学成为这个刊物的热心读者，进一步接受了“德赛二先生”的熏陶。于是，陈独秀代替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为他的楷模。他还向该刊投搞，积极参加《新青年》的战斗行列。

在第一师范的后期，他特别喜欢哲学。他认为，哲学是一切事物的“大本大源”，既是“宇宙真理”，又是“思想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定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理学。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从而十分强调个人主观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道德完美境界。基于夸大个人主观意志的作用，他的恩师杨昌济弘扬“心之力”的作用，他便以《心之力》为题，写了一篇作文。唯心主义的老师，对此文奖掖备至，打了一百分。从这个时候起，他头脑中开始形成“改造世界”“舍我其谁”的济世观。

在学校里，没有机会接触到纯粹讲唯物主义的书本，他只能从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所涉及到的、古今中外的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以及从《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以树立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他手抄杨昌济翻译但尚未出版的《西洋哲学史》七大本；并以批判的眼光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十万字的《伦理学原理》，批注达一万二千余字。这些书引导他的世界观由儒家的唯心主义转向心物二元论；而且在“物质不灭”这类批语中，已含有唯物主义的因素；至于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则更为明显。由于早已从中外古今学说的参照中得到启迪，加之自己参加体育锻炼等实践经验的体会，对于辩证法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在读书批语和文章中已有自觉表现。

毛泽东说，他试图探究“大本大源”的思想特征，正是来自于平时所掌握的辩证法，即认为运动、抗争为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通过对于体育的深入研究，从“人皆乐动”，而得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不仅持肯定态度，而且持喜爱态度；自然界水力、风力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生所喜也。”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外界抵抗，实现自我，成了他身心存在不可缺少的一大需要。他在自己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之语，并非单纯之身体锻炼中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思想。

在第一师五年半的以自学为主的学习生活中，他做到勤奋读书，独立思考，不做书本的奴隶，而是真正眼到、手到、心到。他读过的书多是打满各种记号和密布批语，所写的读书笔记共积有一大网篮，真正从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融会贯通中，跨出了一大步。

毛泽东说，除开读书外，他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他天天仔细读报，特别关注时事，常向同学们解释时局的发展，头头是道，被大家誉为“时事通”。反对袁巨凯称帝时，他做了卓有成效的宣传活动。他的忧国忧民之心，被朋友们称为“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们的自学能力，活跃各种课外活动。他创办工人夜校，精心为失学工人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时，他带领同学护校，竟缴了一支溃军的枪械，同学们以双关语谑称他为“毛奇”。

他喜欢漫游，要读无字书，“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学之”。为多了解社会实情，一个暑假，以“打秋风”送字方式，不费一文钱，与好友萧子升周游洞庭湖五个县。此外，他还带动同窗和朋友，实行冷浴、冬泳和露宿等抵抗自然外力的活动，有意识作“野蛮其体魄”的锻炼。他不愿做那种坐而论道的文弱书生，而是想做一个知行结合。凡事身体力行的实践家。

有感于国家的危亡和追求个人的进步，他和同窗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一批热血青年，深受杨昌济老师的影响，具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都有一种共同的愿望，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达到这种目的？他们感到急待解决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从1915年至1917年冬，他们“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大概在百次以上。”最后的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新民学会于1918年他毕业前夕的4月正式成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听了毛泽东的自述，李大钊不禁对眼前这个年轻人刮目相看了：毛泽东的学识才具、革命气质和思想方向，所树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尤其是知行结合的实践精神，已经具备了干大事业的良好素质——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进步的团体，共同追求真理，共同从事战斗，已经体现出“领袖”的风姿。

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的抱负、理想和才干，深得李大钊的赞扬，认为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的领袖”。和毛泽东在一起，李大钊更为深切地看到“新青年的创造”，仿佛展望到二十世纪人类“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143 初识“马列”

1918年的岁末，俄国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终于突破中国反动派的森严壁垒，传遍古老的中华大地，传到古都北京，使这座本来已不平静的城市开始沸腾起来。

当时，以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思想最为活跃，校长蔡元培先生“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一些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抱残守缺的封建遗老遗少，都聚集在这里进行宣传活动，北大显然成了新旧文化和各种思潮汇集和角逐的场所。但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由于受十月革命的影响，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们借助北大这个得天独厚的教育阵地，领导着新文化运动朝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在运动中增加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内容，这样就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的飞跃，它已突破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从而也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的摇篮。

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西侧的中央公园举办演讲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陶孟和等社会名流出席了这次大会。当李大钊身穿棉布长袍、裹着灰色毛线长围巾，气宇轩昂地登上讲台时，台下数千听众发出阵阵掌声。会上，他作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说。不久，又发表《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李大钊这几篇具有崭新观点的战斗檄文，不仅标志着他本人已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

从此，在李大钊的带动下，北京大学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蓬勃开展。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收集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包括许多英文、法文、德文本的马克思主义原著。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都到这里来寻求真理，他们或者孜孜钻研、刻苦阅读，或者共同研究、交流探讨，或者径直向李大钊质疑、请教。

由于在图书馆的工作关系，更由于李大钊对他的倚重，毛泽东获得了直接向李大钊请教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这期间，他不仅专程到中央公园聆听过李大钊那激动人心的讲演，还及时阅读了李大钊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文章，透过那惊世骇俗的时代强音，他仿佛看到了中国希望的曙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他“对政治越来越感兴趣，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开始“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为了让毛泽东进一步吸收先进思想，学习新的知识，经受全面锻炼，以增长社会活动的能力与才干，李大钊引导毛泽东参加了大量的学术活动和广泛的社会活动。经李大钊准许，毛泽东抽出一定工作时间，经常在北大旁听他感兴趣的文化课，如哲学、伦理学、文学、新闻学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多种学术组织。1918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年1月28日，参加了蔡元培、李大钊、杨昌济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月19日，又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造大会；3月10日，在理科第16班教室聆听了李大钊对哲学和新闻学两个研究会会员所作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还因李大钊的介绍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邓中夏发起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的活动……在参加这些学会的过程中，毛泽东认识了许

多名人学士，像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张国焘、康白情、段锡朋等。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泽东还在这时结识了北大的许多进步学生，像邓中夏等人，并成为他们的亲密朋友。参加这些学术团体和结识这么多的朋友，使毛泽东开扩了眼界，吸收了大量新鲜、有益的知识。与此同时，经李大钊引荐，毛泽东还拜访过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的各种问题。如：他以新民学会在京会友的名义请蔡元培、胡适、陶孟和作讲演或解答问题；他单独造访了胡适，征询了胡对是否出洋一事意见，并试图争取他对湖南学生运动的支持；还多次拜会蔡元培、李石岑，接洽、商讨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还前往陈独秀的寓所，聆听了这位北大文学院院长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他还经常到原一师的老师杨昌济、黎锦熙家中，同他们畅谈世界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中的中国地位问题，还有办报的事情……通过拜访这些名流学者，他广泛地了解各种思想及学说，满足了自己强烈的求知欲望，使知识迅速地增长起来。

对于毛泽东来说，北京是非常值得留恋的地方。但是生长在贫穷落后的乡村、在封建军阀横暴统治下奋力求出路的青年毛泽东，忘不了他生活了二十多个春秋的生身之地——湖南。通过这次北京之行，在“兼收并蓄”的北京大学、在李大钊先生身边，他求得了新知识、结识了新朋友，吸收了新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开始接触了同他的精神方向最为吻合的马克思主义。置身于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腹地，使他顿觉视野大为开阔，精神格外振奋，强烈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意识到自己正在走上中国现代历史的舞台，即将站到时代潮流的最前列。因之，他取消了出洋领略外面世界的打算，谢绝了老师杨昌济“一边在北大读书、一边兼搞社会活动”的劝告，而选择了一条职业革命家的崎岖道路。他决意回到湖南，去实现自己的许多构想。

1919年3月12日，为给湖南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热血青年送行，毛泽东告别了朝夕相处了半年多的老师李大钊，告别了古都北京，先前往上海，后即回长沙。

在北京，毛泽东虽然只呆了六七个月的时间，但他有两个大的收获，对他后来的发展，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或者说是一个决定性的开端，奠定了他事业成功的基础。一是结识了他认为是第一楷模的李大钊先生，并通过李大钊接触了许多思想激进的人物，交结了许多思想进步的青年朋友，参加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有了长足的进步；二是吸收了许多新的思想，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粗线条知识，脑中装满了许多社会实际问题。其间最让他震动的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他看到新的曙光，感到古老的中国会有新的出路。正如他后来对自己这个时期思想历程所叙述的：“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走俄国人的路——这就结论。”

毛泽东回湖南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随即迅速席卷全国。

“五四”运动的消息，像一枚巨型炸弹震动了湖南。当时统治湖南的军阀、段祺瑞的走狗张敬尧，深知形势的严重，所以对长沙进行了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下令每日检查报纸，严禁新闻机构报道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严禁一切爱国活动。

怀抱着宏伟理想的青年毛泽东，从反动派的高压政策中，即刻以高度敏锐的政治眼光，洞察到这场运动的巨大影响。他早已热切渴望投入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实际斗争，如今这一天终于来临了。他以满腔的热忱投入了革命的激流，开始了沸腾的政治生活……

如何传播新的革命思潮，这是毛泽东北京之行返湘后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五四”运动的爆发，正好为他实现自己的设想提供了契机。他积极向湖南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指挥部——湖南学生联合会建议：创办一种指导性的刊物，宣传“五四”运动。这样，毛泽东在长沙连绵不断的夏雨里，通过两个多月的奔波和筹划，终于使他主编的《湘江评论》杂志，于7月14日正式创刊。

《湘江评论》为周刊。在形式上和陈独秀、李大钊举办的《每周评论》相仿，四开一张，分四版，辟有“东方大事述评”、“西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和“新文艺”等栏目。它最大的特点是“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泼辣，气势磅礴，极富有战斗性，这是同期其他刊物所远远不能比拟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写的政论性文章以及对国际、国内大事明确锐利而透彻的评述和杂感。《湘江评论》自创刊之日起，共出版四期，另有“临时增刊”第一号。第五期没有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全部查封没收了。

由毛泽东主编的这份《湘江评论》杂志，充满了反帝反封建的反叛精神。他在刊物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亲笔撰写了大小四十来篇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发表在第二至第四期上的《民众的大联合》长文。在这些文章中，他以杰出革命家的无畏气魄、政治家的卓越才能、思想家的雄辩和诗人的火热激情，用近乎散文诗一样的词章，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鞭笞魑魅魍魉。现摘抄几段，供读者诸君欣赏品味。

在《创刊宣言》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统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以“日光之普天照耀，探海灯之向外扫射”的精神去追求真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在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时，他写道——

“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成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与其

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即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若干的大革命”。

他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施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

他针对有人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的论调，运用阶级观点分析指出——

“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用了强权打倒了强权，结果仍然得到了强权。”“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前，世界最高的强权在德国。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世界最高的强权在法国、英国和美国。德国的强权，为政治的强权。这回大战的结果，是用协约国政治和国际的强权，打倒德、奥政治和国际的强权。”

他嘲笑法国首相克里孟梭是个“无知的老头子”，“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指“巴黎和约”），以为签字在上面，就可当做阿尔卑斯山一样稳固，可怜得很啊！”“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

他以预言家的科学头脑断言：“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阶级战争的结果，就是东欧诸国主义的成功：即是社会党人的成功。”

他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直抒胸臆——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我们竖看历史，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较大的运动，必有较大的联合。最大的运动必有最大的联合。……胜负所分，则看他们取联合的坚脆，和为这种联合基础主义的新旧和真妄为断，然都要取联合的手段，则相同。”

他豪迈地宣称，中国的民众大联合必告成功，中国革命必将胜利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抗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拼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

《湘江评论》充分表达了“五四”运动的主题，锋芒直指反动派，统治湖南的军阀张敬尧惊恐万状，他下令查封了这个进步刊物。可是，毛泽东是个不信邪的人，他继续利用其他报刊，发表了许多批判社会、鼓吹新思想的

见《湘江评论》第四号。

见《湘江评论》第二号。

见《湘江评论》第二号。

文章。

综观毛泽在“五四”运动中所写的文章，唯物主义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许多观点明显地受着李大钊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崇尚科学与民主，反对迷信盲从，反对孔子为中心的守旧思想。他认为做事情，研究问题，都要“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要“研究事实和真理”；要敢于“狂妄”，要敢于打破各种强权和独断，不能“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隶”。这些文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了某种初步的认识。在他撰写的《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提出吃饭问题是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后来在《学生之工作》一文中，还明确指出：“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这可以说明，毛泽东已开始注意到经济生活和经济制度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贵族、资本家以及其他强权者，“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贫民的公开利益者”，无非就是“知识”、“金钱”和“武力”这样一些法宝。他们同广大劳动人民之间，是“贫富”、“智愚”、“强弱”根本不同的阶级。“几个人享福，千万人要哭，实业愈发达，要哭的人愈多”。许多文章很注意用经济原则去分析西方国家的政治情况，认为罢工与社会革命都是经济原因引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殖民地国家，“连空气阳光都专利起来”。这也说明，他已认识到经济关系对人们的政治地位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已经初步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说明社会与国家间的对立。显然，这里有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成分。他在总结巴黎和会文章的结尾，还预言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设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十月革命的一边，坚决痛斥诬蔑布尔什维克为“过激党”的论调：“你们指为‘过激党’的人，只不过是舍命救国的志士，为国家争权利，从强权索自由的志士”，“其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照字义讲，就是‘多数党’；照主义讲，就是要组织纯粹工民的共和国，以工民办理国家的事务。”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李大钊这位思想导师的指引下，开始走向唯物主义，并以此观察社会历史，也就必然重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及其历史作用。他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认为不过是一些留学生、哥老会和新军在活动，“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这是一个伟大的觉醒。这样：读《伦理学原理》时冥思苦想的唯心主义，“圣贤豪杰”同“愚人”、“小人”，教化与拯救的关系，就让位于“民众的大联合”这一改造国家社会的根本力量了。当年世人所公认的《民众的大联合》这篇重要文章，标志毛泽东已开始用不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且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吹响了最初的第一声号角。

《湘江评论》由于它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以及与群众斗争的休戚相关，一经问世，便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广大热血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热情地拍手欢迎它。长沙和湖南各地以至武汉、广州、北京、四川等地的许多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都十分喜爱阅读《湘江评论》，并成为它的忠实朋友。许多进步青年在它的启发和鼓舞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老将军肖劲光在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他和任弼时是怎样受《湘江评论》的影响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情况。他说：“弼时同志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主席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主席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

开始了革命觉悟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革命烈士郭亮也是于 1919 年秋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发现了《湘江评论》，偷看了以后，才从家乡来到长沙找到毛泽东，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湘江评论》在新闻界也引起了轰动，长沙各报刊，都在第二天登出了它创刊的消息，有的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的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也有的称赞它是“吾湘前所未有之佳报”。创刊号寄到北京，李大钊看过后，认为它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刻的一种刊物。他十分重视，赶紧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

国读者推荐。他在《每周评论》第三十六期专门予以介绍：“‘湘江评论’的长处在于议论一方面。……”他称赞：“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他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他还于 12 月 20 日在《新生活》第十九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同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李大钊的支持与呼应，使毛泽东甚感欣慰，更增添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他们虽然一个在南，一个在北，远隔千山万水，但两人的心是相通的，要求变革社会的思想也是一致的。

“五四”运动在湖南的直接继续，是驱逐在湖南施行残暴统治的北洋军阀张敬尧出湘的运动。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积极策动和领导了这个运动，他们手无寸铁，却不畏强暴，敢于“秀才造反”。为了推进“驱张”运动，毛泽东作为青年教师的代表和一百人组成的驱张请愿团团长，率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他自1919年12月中旬到达北京，到次年的4月离京赴沪，在北京城逗留了四五个月的时光。

这次再到北京，毛泽东感到与春天离开这里时的情形大不一样了。那时的北京，正处在“五四”运动的前夜，正处在一个新与旧、进步与反动斗争激化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北洋军阀的血腥统治，使得中国社会更加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民族的危机和国内社会的矛盾益加深；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进步的因素：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壮大，新文化运

动的兴起，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革命的新兴力量正在谋求着救国救民的新路。中国正在酝酿着一场政治大搏斗。而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则处在斗争的旋涡之中。就像一名快要生产的孕妇，于阵痛中扭动着她那笨重的躯体，痛苦地呻吟着……一转眼，大半年匆匆地过去了。时代在发生巨变，政治形势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时，经过“五四”运动战斗洗礼的古都，面貌已是焕然一新。

如今，这里的政治空气极为活跃，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这年7月，苏俄政府发表了第一次对华

宣言，声明废除沙俄时代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它突破了中国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公布出来了。各界人士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三十一个社会团体发出了热情洋溢的谢电；《天问》周刊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国人民应“和俄国农民、工人阶级、红军相提携，为自由而奋战，先竭力打破国内军阀的强权，再竭力打破各国的强权”。报纸

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以及一些介绍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从而形成了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热潮。

国家的政治局势发展变化如此之快，那么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又是怎样的呢？上次来京，他通过李大剑和《新青年》，对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但同时仍“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这时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处于“正在寻找出路”的阶段。可出路又到底在哪里呢？就在今年春夏之交，他创办《湘江评论》时，还坚信无政府主义的目标是“和乐亲善”、“共臻盛世”的美好理想，还不同意马克思提出的“激烈的”暴力革命，而赞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较为温和的、不想急于见效”的非暴力办法。然而，无论是“忠告运动”也好，“呼声革命”也好，却是处处碰壁。原以为“我们起而一呼，奸人就要站起身来发抖，就要舍命地飞跑”，但是，在张敬尧这样的“奸人”面前，忠告和呼声又顶什么用呢？他没“抖”也没“跑”，而是凭着军警和刺刀，硬是查封了只出了五期的《湘江评论》，宣布解散了成立不久的湖南学生联合会。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

苦苦地思考着、鉴别着、探索着……过去一年的斗争实践，使毛泽东不能不重新检查自己的信仰。他决心要对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种种学说作一番重新研究，认真比较，以求寻得改革中国社会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并总结和清算自己的思想，确立自己的信仰。

想到这里，毛泽东不由得又联想到他十分崇敬的李大钊先生，正是第一次来京期间和他一起工作，在他身边耳濡目染，毛泽东才开始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念。眼下，自己的思想正需要人驱云拨雾，还得要依靠这位良师的指点。

于是，毛泽东在故宫西边的北长街九十九号，租用了一个叫“福佑寺”的喇叭庙，将它作为驱张宣传机构“平民通讯社”的社址。刚刚安顿下来后，他便迫不及待地赶往北京大学，去看望他的思想导师李大钊。

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这位来自湖南的“学生领袖”。在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自春天离别以后，他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情的进展，《湘江评论》的创办情况，以及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情况。李大钊认真地听毛泽东的情况介绍后，就宣传刊物的创办和驱张运动谈了自己的意见。接着，李大钊又向毛泽东介绍了他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并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英国柯卡普著、辟司增订的《社会主义史》等。正是受上述三本书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才促成毛泽东下决心确定政治方向——决心走俄国人的路，接受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二十多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曾谈到这次李大钊向他推荐“三本书”的情况：“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还回忆道：“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自这次谈话后，毛泽东又连续几次到李大钊那里，同他进行更为深入广泛的接触和交谈。在交谈中，李大钊常常论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具体道路，苏俄国内的现实情况，世界共产主义的发展，伯恩斯坦的第二国际的垮台，列宁组织的第三国际，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前途等重大政治思想课题。毛泽东听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日益浓厚的兴趣。为了加深对俄国的了解，毛泽东好几次还专门找李大钊商谈组织赴俄勤工俭学的问题。显然，这就是受李大钊的影响，表明他对十月革命故乡的十分向往。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友人陶毅的信中说：“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

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后来，他果真在长沙发起成立了“留俄勤工俭学团”，认为“俄国学术精神不可不研究”。这时的毛泽东，已感到赴俄学习要比赴法学习迫切得多了。他和李大钊都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到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学习，以改造和拯救腐败无能的中国。

新民学会派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主要任务本来是从事驱张活动。可是“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更为广阔的、色彩缤纷的世界。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启发，他发现还有更多更大的问题需要关心。如：“驱逐了一个军阀张敬尧出湖南，还有大量军阀统治整个国家：政府的腐败无能；凡尔赛会后全球形势的急剧变化；布尔什维克革命引起的反响；“五四”主题的回落等等，都是亟待探讨和关心的事。他觉得深入这些事，来寻找救国的真理，才符合他的性格，符合他的口味。

1920年4月，毛泽东在北京工作、学习了不到半年，即将离京赴沪。临行前，李大钊对毛泽东说，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和前途有独到的见解。5月5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后，遵照李大钊的嘱咐，多次会晤陈独秀，同他讨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问题，研究如何在湖南开展革命。通过陈独秀的进一步影响，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路上，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第二次北京之行，特别是和李大钊的进步一接触，是毛泽东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根本转变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它确定了毛泽东日后的发展方向，对他来说是成败攸关的一步。当然，这仅仅是个决定性的起点，绝不是思想发展的终结。他将按照自己在学生时代养成的绝不盲从的习惯，在通向真理的路上不断探索着，努力向前攀登着……

1927年初，蒋介石和张作霖，为了向帝国主义献宠，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制造了一连串的反共暴行。张作霖在北京准备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进行屠杀，白色恐怖笼罩了北京城。

作为党中央负责人和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李大钊，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为保存革命力量，他把许多同志转移到其他地方，而自己却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拒绝亲友们要他离开北京的劝告，坚持领导北方党的地下斗争。为了以防万一，他妥善处理了党的机密文件。3月间，他和北方区委其他一些同志，由原来的翠花胡同8号，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所属的一个废弃的兵营。4月6日上午十时半，由于叛徒李渤海的出卖，大军阀张作霖，无视国际公法，派出一营军队，强行闯入苏联使馆，逮捕了李大钊。党组织立即着手进行营救活动，敌人却抢在面前对他下了毒手。

4月28日下午，天空笼罩着乌云，西风裹挟着黄沙，把北京刮得天昏地暗。二时许，李大钊等二十位无畏勇士被押赴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刑场。李大钊昂首挺胸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像平素走上讲台一样从容、镇定。行刑前他那慷慨激昂的演讲，如春雷震撼着大地：“不能因为你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育了很多的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胜利！”

那天，随李大钊共赴刑场的还有二十位无畏勇士，其中还有位女中英杰，她叫张挹兰。张挹兰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籍贯同是湖南，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教育系，由于受李大钊先生的教育和影响，她参加了民主革命。在刑场，张挹兰目送着自己崇敬的李大钊先生和一个个同志与战友倒在敌人的刑具下，丝毫没有动摇。当刽子手叫到她的名字时，她面带微笑，神色自如地走向绞架。这时，执行警官拦住了她，说：“你年纪轻轻，又是女流之辈，搞什么革命？现在二十多人只剩下你一个了，只要你说一声今后不干了，就放你出去。”“要我不革命？妄想！正因为我是女子，所以我更为自己的死感到骄傲！跟着李大钊先生去殉我们的事业，是我最崇高的荣誉。”她踏着老师的足迹，阔步登上了绞架，实践了先生生前的教导：“为女子争得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

毛泽东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悲恸，极珍视友情的他为痛失导师和战友洒下了一腔热泪。据说，在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非常会议上，中央对毛泽东的另一位思想导师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进行清算时，他还曾提议向牺牲了的李大钊等中央领导同志表示默哀，

岁月流逝，毛泽东对李大钊的怀念之情却丝毫未减。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的土窑洞里，曾多次饱含感情向埃德加·斯诺谈起了李大钊。当回忆起第一次到北京的情景时，他说：“……我到京后不得不立即找工作，我在师范学校的伦理学教师杨昌济，这时已成了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一份工作，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后来被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给了我一份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八元钱。”他又说：“……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

理员时，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发展……”。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和党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无限感慨地对工作人员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京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第二十四章 蔡元培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智慧和学问之碑是怎样远比权
力或武力之碑更加长垂不朽。因为荷马诗
歌已流传两千五百多年而未失去一个音
节或字母；而在此期间却有无数宫殿、庙宇、
城堡和市镇已被腐蚀完毕或毁灭殆尽，
难道事实不是如此吗？
——录自《学术的进展》

1918年夏天的北京之行，对于毛泽东来说，收获是巨大的。

在千年故都北京城，毛泽东不仅认识了李大钊这位思想导师，初识了马列主义，思想上发生了飞跃；而且还结识了像蔡元培这样一位学界泰斗。

毛泽东第一次拜会蔡元培，是在9月初的一天。那次，他和新民学会会员、学友萧子■一道，持着蔡元培的好友杨昌济先生的名帖，找到北京大学校长室。在这里，毛泽东见到了他十分仰慕的大学问家，而蔡元培也头一回认识了毛泽东这个北大“未注册的旁听学生”。从此，他们之间的师生交往便从这里起步……

毛泽东最初知道蔡元培的名字，是在第一师范读书的时候。说来很巧，也是由于他素来崇敬的杨昌济先生的介绍，他才得以同蔡元培神交的。

的确，要研究蔡元培与毛泽东的关系，应先从蔡元培同杨昌济的关系说起。

早年的杨昌济，得中秀才后，在乡间教书。1902年，蔡元培在上海主持中国教育会，杨即开始和蔡联系。次年，杨昌济东渡日本，入东京弘文学院及高等师范学校；后往英国，入苏格兰勒伯丁大学；学成后，又去德国考察教育。

杨昌济在苏格兰时，其族孙杨笃生、同乡章士钊均在该处。此时，蔡元培亦在德国攻读。杨笃生是蔡试制炸弹共图革命时的战友，章士钊是蔡主持的爱国学社的社员；同时，蔡元培与杨昌济既是研究伦理学和哲学的同道，又同在西欧留学，交流较便。这些因素，促使他们两人交往颇多，友情日进。

辛亥革命后，杨昌济归国，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任教。在一师的学生中，他特别赏识毛泽东，称之为“海内人材，前程远大”。毛泽东更是格外敬佩杨先生的人品学识，常到“板仓杨寓”聆取教诲。在交谈学问时，杨昌济常向学生提起他的好友蔡元培，言语之中，流露出对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的敬重。这自然也影响到毛泽东，习惯于寻师求学的他，大概从这时就打定主意，将来有机会，一定要亲自拜访蔡元培这位名师。

杨昌济在湖南一师讲授伦理学、哲学等课程，极力推介蔡元培的译著，并把蔡翻译的德国康德派哲学家鲍尔生原著的《伦理学原理》定为教科书。当时，多数同学对这门学科不感兴趣，唯有毛泽东等少数人用心听讲，勤作笔记。毛泽东早年读过的书，多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主要是孔孟儒学，《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还有主张平等、博爱的佛学，《盛世危言》是他第一次接触中国近代思潮；当他在早期改良派思想家郑观应、冯桂芬的著作中乐而忘返的同时，又沉浸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中；在崇拜康梁时，也开始研究孙中山的政治理论。在此之前，毛泽东还没有接触过西方哲学，一旦当他得到《伦理学原理》这本教科书时，便爱不释手，反复研读。

毛泽东精读了这本蔡译《伦理学原理》，并用毛笔小楷写了一万二千多字的批语和提示，而且几乎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红黑墨笔加上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

由于当时历史的局限，批语还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但由于受书中“心物二元论”的深刻启迪，它又处处充满着毛泽东追求真理和立志改造国家社会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具有重要思想价值的观点。

受译著的影响，毛泽东开始重视“个人价值”，强调个性解放。他称道：

“崇尚个性，泡尔生之好主张也。”认为“个人”在宇宙中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吾人苟放大眼光，而曰人类一大我也，而曰生类一大我也，而曰宇宙一大我也，亦何必讳言自利哉？”亦何自利之非佳哉？”正因为“我即宇宙也，各除去我，即无宇宙。各我集合，即成宇宙”，而“各我”又以“我”而存，既然“我”有这么重要的地位，所以“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在这里，我们虽然可以看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和陆九渊“吾心即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的主观唯心主义及近代注重“个体”的思潮对他的影响，但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闪烁着个性解放的光辉。他说：“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有神乎？”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注重个体的地位和价值出发，发出了“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的疾呼。这种主张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束缚的思想，无疑富有时代的特征。

由译著所昭示，毛泽东主张涤旧染新，彻底改造国家社会。过去，“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自从掌握了哲学思想后，“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为德意志也，无忧也。”那么，如何去进行这种变革呢？“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因此，主张“时时涤旧，染而新之”。当原书说到社会上存在着阻碍革新，以过去压现在的情况时，批语写道：“中华民国正处此地位”。并进一步指出：“此类是古非今之思想，不独我国，西洋亦有之。”他认为要改造国家社会，必须有革命真理来指导。“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力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

受译著的启迪，毛泽东初步掌握了辩证法，并开始运用辩证思维的武器。在论及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批语指出：“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吾人虽为自然所规定，而亦即为自然之一部分，故自然有规定吾人之力，吾人亦有规定自然之力；吾人之力虽微，而不能谓其无影响于自然。”在论及人的认识源泉时，他写道：“美学未成立之前，早已有美；伦理学未成立之前，早已人人有道德。”“知圣人者生而知之，不虑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不可信也。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在论及社会变革中乱与治的关系时，他说：“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亦自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览史，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材辈出，令人喜读。”辩证思维对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在分析问题和观察人生、社会中曾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极端的观点都在辩证地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克服了。这种辩证的思维方式与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相结合，其实已昭示了毛泽东以后的思想历程的必然性。当然，批注中所反映的辩证法还具有十分浓厚的相对主义色彩，没有摆脱庄周“齐万物，一生死”的中国古代辩证思想中片面夸大事物的同一性，而相对忽视事物差异性的局限性。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个青年学生有如此独立的思辨能力，并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实属不易。至今读来，仍令人钦佩。

通过读《伦理学原理》这本书，毛泽东深受启发，获益颇多。在他看来，鲍尔生对哲学问题具有这样精辟的见解，实在不容易。可是，蔡元培能准确把握原著的思想内容，用流畅的笔法将它翻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来，更是殊为难得。几十年后，他对自己早年阅读这部蔡译《伦理学原理》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先后多次向友人提起这件在他读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言语当中流露出对蔡元培这位哲学启蒙老师的怀念之情。

解放以后，当昔日一师的同学杨韶华托周世钊将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给主人时，毛泽东说：“我当时喜欢这本书，有什么意见和感想就随时写在书上，现在看来，这些话有好些不正确了。”他还说：“这本书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确，它不是纯粹的唯物论，而是心物二元论。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一旦接触一点唯物论的东西，就觉得很新颖，很有道理，越读越觉得有趣味。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新的启发和帮助。”

毛泽东是个喜欢怀旧而又极讲感情的人，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位早期哲学的拓荒者和他早年无比倾慕的名师，他怎么能念念不忘呢？

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的几个故事》。载《新苗》1958年第10期。

了解毛泽东早期生活的人们大都知道，毛泽东曾是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倡导者和组织者。那么当时全国范围内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又是谁倡导和组织的呢？

翻开中国近代教育史就知道，蔡元培便是这一活动的总筹划人。

原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曾在中国招募了十五六万劳工，帮助它做战争勤务。大战结束后，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紧缺的局面，法国政府继续来中国招工。那时，蔡元培正在法国，看到这种情形就想：中国工人可以到法国做工，中国的学生为什么不可以到法国一面做工、一面学习呢？如果中国的学生到法国去做工，赚了钱、学了法文，那么他们就可以进法国的学校去读书了。于是，他会同吴玉章、李石岑等人创办了一个赴法勤工俭学会，提出“勤以作工，俭以求学”的口号，鼓励中国青年到法国去边做工、边读书。为了主办赴法勤工俭学这件事，他们还在法国组织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后来，蔡元培等回国，又在北京设立了总会，许多地方设立了分会，大力宣传勤工俭学的好处。到了1918年夏，赴法勤工俭学便在全国形成热潮。

毛泽东和他的伙伴们，从已到北大任教的杨昌济那里得知上述消息后，便决定立即在长沙大力推动这一运动的开展。新民学会先决定派蔡和森为联系此事到北京打前站，随后毛泽东也于8月中旬赴京，打算接受杨昌济先生的建议——边就读北京大学，一边落实赴法勤工俭学事宜。

毛泽东到京后，由于北京“开销太大”，找同学借的钱很快花光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更谈不上学习和搞社会活动了。于是，他决定先

找到一个维持生活的职业。9月底，杨昌济把他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李大钊找到校长蔡元培，提出了杨先生为学生毛泽东谋事的

请求，蔡当即同意，并写了张条子“派毛泽东为图书馆助理员，月薪八元”，通知校会计课照发工资。这样，本来担负筹划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重任的毛泽东，自己倒先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毛泽东找到了职业，但他对学习文化课却毫不放松。他充分地利用自己任职北大图书馆的机会，经常旁听北大各种课程，并参加了新

闻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广泛开展学术研

究交流活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这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种创举。蔡元培在成立会演说词中，提出两个目的：一是“先介绍欧美新闻学”；二是“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919年2月19日，又举行改组大会，蔡元培再次亲临演说，并被选为会长。

该研究会每周举行两次活动，由导师讲授新闻学课程，文科教授徐宝璜为主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著名报人、《京报》总编辑邵飘

萍为兼任导师，讲授《新闻学原理》。毛泽东多年以来和报纸结下了不解之缘，杨昌济先生原来就曾打算让他到北京一个报馆工作，后来

由于毛泽东要到北大边工作、边学习才作罢。因此，毛泽东自然以极大

邵飘萍，号振清，浙江金华人。当时是一位有正义感的新闻记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年4月24日，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以“宣传赤化”的罪名杀害。

的热情和兴趣参加了这个研究会。对此，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曾作了记载：“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1919年10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又记载道：“新闻研究会第一次研究期满式，业于本月16日下午8时，在本科事务室举行。……由蔡元培先生发给证书，并致训词。”获得听讲半年证书者共有三十二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名字。蔡元培高度赞扬第一期新闻研究会的圆满成功，说：“本校之有新闻学研究，于中国亦实为第一次，故今兹结束，是可谓中国新闻学研究之第一次结束”。

在新闻研究会里，毛泽东同会长蔡元培的关系很密切，他在有关新闻工作的业务知识等方面，毫无疑问得到了蔡元培的许多教诲与帮助。毛泽东参加新闻学研究会的这段经历，对他稍后主编《湘江评论》、创办平民通讯社等活动，都有着密切关系：甚至对日后作为新中国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亲自动手抓报纸、抓新闻工作、抓宣传舆论，都有一定影响。此外，他学习过程中还认识了不少进步的老师与同学，像邵飘萍，谭平山等人，建立了较深的友谊。因此，他对参加新闻研究会和与进步师生的友谊，一直念念不忘。他后来对斯诺说：“我加入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以便能上大学的课程。在新闻学会里，我结识了一些学生，……还有邵飘萍，邵对我帮助尤多，他是新闻学会的一个讲师，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的理想和高尚品格的人，他在1926年被张作霖杀害。”

毛泽东参加的另一重要学术团体是北大哲学研究会，它是由陈大齐、杨昌济、胡适等发起的，蔡元培实际是该研究会领导人，其宗旨是“研究东西诸家哲学，淪启新知”。毛泽东在会中阅读了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著作，包括十八世纪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正是由于他对许多人不感兴趣的哲学进行潜心钻研，对哲学基本问题开始独立的探讨，从而打下了雄厚的哲学思想基础，逐渐养成了严密的分析头脑和精湛的思辨能力，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培养了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必备素质。

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在蔡元培支持下，邓中夏、许德珩等发起组织了这个讲演团。1919年3月23日，该团在蔡元培的校长办公室举行成立大会，有团员三十九人。该团团员经常到闹市及郊区向工人、农民讲演，宣传爱国主义思想及文化科学知识。

毛泽东还因李大钊的介绍而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该会发起于1918年6月，成立于次年7月。会员除北大的李大钊、周炳琳、许德珩等人外，尚有王光祈、周太玄、曾琦、宗白华等人。蔡元培对该会的工作，特别是它所倡办的工读互助团深表赞赏，认为“它的宗旨和组织法，都非常质实。”他建议改名为“工学互助团”。在该团《募款启事》上，他具名领衔发起。

作为一名勤工俭学的旁听生，毛泽东还常去拜访他的校长蔡元培和其他一些名流学者。据萧三回忆，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和他一起去访问过蔡元培、胡适、陶孟和等人。毛泽东还和在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一同邀请蔡元培、胡适等座谈，“形式为会友提出问题，请求答复，所谈多学术及人生观问题。”

毛泽东除自己勤工俭学外，还有一项重要使命是要筹备湖南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因此，他在北京的半年中，为这件事做了大量工作。当时，湖南青年陆续到达北京有四五十人，比各省的都多，而且还有增加的势头。但是，

华法教育会并没有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准备好应有的出国条件，于是大家不免情绪波动，甚至对蔡元培等“华法教育会”领导人口出怨言。毛泽东劝告大学说，赴法勤工俭学是件好事，但并不是没有困难；我们既然来了，就不必着急，先安顿下来，再共同商量，总会想出办法来的。他一边安慰同学们，一边代表湖南学生与蔡元培为会长的华法教育会接洽有关的事。后经会商蔡元培同意，开办了赴法勤工俭学预备班。由于北京不容易租到房子，生活费用又高，华法教育会决定预备班在三处分设。一处保定，附设于育德中学；一处北京，附设于北京大学。这两处是高级班。还有一处是初级班，设在河北省蠡县。预备班的功课主要是学法文，其次是制图、数学等科目，有的还要到工厂实习，为出国后“工读并行”的生活作准备。

这期间，毛泽东留在北京，统筹全局。他一方面应蔡元培之邀为“华法教育会”起草一份赴法勤工俭学的计划，同时进行赴法学生所需准备的各项工作，如出国护照的旅费的筹措、行装的制备。因此，他日夜奔走，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一个大忙人。这样，经过毛泽东的具体组织和妥善安排，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在1919年2月，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

值得人们记住的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创办成功，“华法教育会”和蔡元培等人功不可没，毛泽东更应记头功！自1919年至1920年间，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共一千六百多人，其中湖南一省去了四百多人。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先后去法国的有蔡和森、罗学瓚、张昆弟、向警予、李维汉、蔡畅等近二十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国外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加入了共产党和共青团，其中不少人回国后成为我党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在当时，最引起震动的是，已经四十三岁、从事教育工作二十多年的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也到法国去半工半读；五十多岁的蔡母葛健豪，也跟随着自己的子女蔡和森、蔡畅一起，远渡重洋，前往法国去当“老学生”。当时，很多进步人士对毛泽东等人领导的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十分赞赏，说这些优秀青年“勇于奋斗”，是“将来回国努力创造的人”，湖南的报纸也称赞这次运动是“吾湘的生机”。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北大的半工半读生活，告别老师蔡元培等，偕同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14日抵达上海。在上海，他久久地仁立在黄浦江码头，望着装载有赴法勤俭学青年的法国邮船渐渐消逝在远方的江面上，心渐澎湃，难以平静。作为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者，他自己却没有迈出最后一步——出洋领略西方世界。他日后告诉斯诺：“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毛泽东决意要留在国内，立足于自己土生生长的这片土地，探求民族振兴之路。

历史过去七十多年后，当世人认识到晚年毛泽东的错误，同时认真地去思索造成这种错误的根源时，禁不住设问：倘若毛泽东当年赴法，情形会不会一样？可是，谁能理解青年毛泽东眷恋祖国的那份执著，谁能体味他内心深处蕴含着多么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没有这片赤诚、没有这身豪气，或许没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也很可能更没有毛泽东的一世英名、千秋功业！

149 为亡友征集赙赠

“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随后，又领导驱逐统治湖南无恶不作的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为了驱张宣传，并利用北洋军

阅各系内部矛盾，从政治和军事上瓦解张敬尧，毛泽东率领一个驱张代表团，于 1919 年 12 月 18 日到达北京，开展控拆、请愿，组织平民通讯社，发布揭露张敬尧罪行的新闻等活动。

毛泽东第二次进京期间，个人生活中也发生了一件重大事情，这就是确定和公开了同他的老师、北大伦理学教授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之间的爱情关系。

可是，万万没料到在此后不久，毛泽东未来的岳父、和他关系最深的老师杨昌济，竟因久病不治，在北京德国医院溘然长逝了。巨大的悲痛袭击着杨开慧一家。

蔡元培也为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所震惊。他立即与毛泽东等为好友杨昌济病故发布启事，征集赙金、资助遗孤。摘录《启事》原文如下：“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以本年一月十七日前五时病歿于北京德国

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时生计仍恃修俸，歿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这份二十九人具名的启事，是对杨昌济所有亲友而发的。蔡元培还同马寅初、胡适、陶孟和四人联名另发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收集到一定数额后，由杨昌济家属带回故乡。

给杨昌济治丧期间，蔡元培和毛泽东倾尽全力帮助杨家料理后事。

150 创设自修大学

1920年10月，蔡元培和毛泽东在分别半年多之后，又在长沙见面了。

当年夏天，统治湖南三年之久的军阀张敬尧，在湖南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全国舆论的猛烈抨击下，终于仓皇逃离长沙、逃离湖南。长期饱受军阀蹂躏之苦的湖南人民无不欢欣鼓舞。以毛泽东为代表一大批关注湖南命运的有识之士，决心趁此有利时机，掀起一场湖南自治运动，废去督军，建设民治。慑于各方压力，湖南新省长谭延■只好硬着头皮作出“顺应民情”之态，于7月20日发出■电，宣布“湖南自治”，“还政于民”。这样，在“自治主义”的旗子下，湖南的政治气候呈现出短暂的宽松活跃景象，特别是在“文化普及于平民”的呼声中，教育言论界更是勃发出一片生机，一个“新湖南”似乎出现在世人面前。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南省教育会为振兴湖南教育事业，开展学术交流，决定在长沙大中学校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炳麟、吴敬恒、张东苏等著名学者，以及外国来华讲学学者罗素、杜威等人赴湘讲演。

为了搞好这次学术讲演活动，湖南省教育会抽调专人从事接待、翻译和记录工作，长沙《大公报》特请毛泽东等人另作记录，供该报自行迅速刊布。这样，他和蔡元培又重逢了。

蔡元培莅长后，除按省教育会预定讲演七次外，还应周南女校、岳云中学等处之邀，增讲五场。其中由毛泽东记录的有两篇。一篇是蔡元培预定的讲演，题为《对于学生的希望》；另一篇是蔡元培在周南女校的讲演，题为《美术的价值》。这两篇由毛泽东亲录的演说词，刊登在当年长沙《大公报》上，至今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

蔡元培莅长讲学期间，毛泽东每天陪伴在侧，进行了密切的接触和交谈。其间，毛泽东鉴于蔡元培和已故老师杨昌济的深厚交谊，特向他报告了自己将在是年冬天与杨开慧结婚的喜讯，蔡元培听后十分高兴，并致祝愿。其时已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毛泽东，还向蔡元培谈了自己立志兴办教育，为振国兴邦培养人材的愿望，毕业从事教育的蔡元培听后更是深表赞赏。随即询问他：想兴办哪类学校？需要什么帮助？崇尚自修、深恶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的毛泽东，向蔡元培谈了自己的设想——他久思组织一所采古代讲学、现代学校之长的学校，结合同志，自由研究，共同讨论，同时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适当结合，使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以培养具有先进思想而体质健壮的青年。蔡元培听了毛泽东的设想后兴奋异常，鼓励他“务必尽快筹措”。当他们讨论到学校叫什么名称时，毛泽东告诉老师：年初他在京时，曾同胡适先生说起过此事，胡先生提议叫“自修大学”。蔡元培听后表示同意说：那就叫自修大学吧。

事后，蔡元培带上由毛泽东亲手写的办学报告，亲自出面到湖南省政府和教育厅游说，有关当局鉴于他在政界和教育界的声望，很快就批准了毛泽东的办学申请。毛泽东即着手筹办建校之事。

1921年8月，在省教育会委员长易培基和船山学社社长兼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积极支持下，毛泽东、何叔衡等利用省教育会批拨的每月400元经费和船山学社社址，创办了一所全新的学校——“湖南自修大学”。毛泽东任教务长，次年4月又继贺民范任校长。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阐述了自修大学的性质和办学宗旨，公开发表在1921年8月16日的湖南《大公报》上。“大纲”

开宗明义：“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因而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教师负责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文等责任。学生不收学费，寄宿者只收膳费。”在毛泽东执笔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更明确指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为了使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作准备，自修大学除让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其他一些课程外，尤其重视德育，要求学生明确学习的目的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为此。《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明确写道：“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为实现这个培养目标，自修大学在招收学生时极为慎重，学生入校前，先要以通讯方式答复问题，答案经学长评阅后，“再行当面接洽决定”。由于招生条件严格，所招收的学员都是些品学皆优的青年，毛泽民、夏民翰、陈佑魁等都是自修大学的学员。

自修大学的创立，不但在湖南，而且在全国各地都引起了较大反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报刊多予以介绍和赞扬。蔡元培在收到毛泽东寄来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后，“欢喜得了不得！”认为这所大学“注意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他不仅为自修大学题了词，还热情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湖南自修大学的介绍与说明》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新教育》杂志第五卷第一期上，广为传播。在这篇长文里，详细他说明了他自己对于发展中国教育的主张，赞扬湖南“自修大学的组织”，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所设大学之模范者；内部的组织法，当然可以随地变通；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教育界名流李石岑紧跟蔡元培之后，也写了《祝湖南自修大学之成功》的文章，称湖南自修大学是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创立了“新教育制度之纪元”，是“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导”。与此相反，湖南的一些守旧人物则称它为怪事，认为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组织，并企个图唆使湖南省政府停止供给船山学社的活动经费。但是，由于有蔡元培、李石岑这此教育界名宿的支持，他们也奈何不得。后来，为了适应一般青年工人的要求，毛泽东、何叔衡于1922年9月又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对外公开招生。1923年4月10日，又创办了《新时代》月刊，为加强对中国革命问题的研究和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开辟了一块阵地。

“湖南自修大学”，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共产党最初创办的一所“党校”。它招收的学员，大都是进步的知识青年和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他们经过学习，打下了文化和思想基础，成了共产党强有力的后备军。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先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党入团，许多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会活动家。

“湖南自修大学”的创立和《新时代》的出版，引起了湖南省省长、军阀赵恒惕的不安，他处心积虑地要扼杀这件刚刚诞生不久的新生事物。1923

年 1 月，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为由，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及附设实习学校，取缔了只出版了四期的《新时代》。

151 营救开慧

蔡元培和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交谊很深，特别是在 1918 年他主持北大校务聘任杨为北大伦理学教授以后，两人的来往更为密切。

当时，杨开慧偕母亲和哥哥随父北上，住在地安门豆腐池胡同 9 号。蔡元培常来这里和杨昌济一同磋商教学方法，讨论哲学课题及品评政局，是杨家最熟悉、也是最受欢迎的客人。杨昌济极赞同西方的文明生活，在家庭关系中很讲究平等互爱、尊重人格，特别反对封建家长制，对子女没有拿烦琐的“家规”来束缚他们，而是让他们顺其自然，健康发展。特别是对小女开慧更是格外疼爱，给她比一般人家的女孩子较多一些的自主。因之，即使是象蔡元培这种身份的人造访，杨昌济也没让女儿回避。每逢这样的時候，杨开慧总是悄悄地坐在一边静听，成了一名热心的“旁听生”。听到兴奋处，稚嫩的脸上泛起红晕，抿嘴微笑；听到严肃处，忽闪着明亮的大眼睛，如思似辨；听到激愤处，柳叶眉梢高挑，怒不可遏。间或，送上一杯清茶、递上一支香烟，顺势得体地提一两个问题，求得解答。所以，蔡元培十分喜欢老友的这位娴静端庄，聪明好学的千金，把她当亲女儿一样看待。不幸的是，杨昌济于 1920 年病逝，杨开慧一家老少顿失依靠。为资助救济遗孤，蔡元培发起征集捐赠，然后妥善安排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从此，北京和湖南远隔千山万水，他再也难得与亡友的妻子儿女见上一面了。

1930 年 10 月 24 日，杨开慧被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部逮捕，关入陆军监狱。蔡元培闻讯后，焦急万分，迅即进行营救。据萧永义记述：“开慧同志被捕后，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立即开展了紧张的营救活动。她 60 多岁的老母和她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还先后到了南京、上海等地，他们在上海找到杨怀中先生的好友蔡元培先生，蔡先生立即联合几位社会知名人士联名打电报给何键，要求保释杨开慧同志。反动透顶的何键得电后，竟采取阴险狠毒的手法，决定立即枪杀开慧同志，然后复电，推说电报来迟了……”

蔡元培的营救活动未能成功，杨开慧于 11 月 14 日在长沙城浏阳门外的识字岭英勇就义，时年二十九岁。蔡元培在报纸上闻悉噩耗后，十分悲恸。他为自己这个堂堂的国民政府的部长竟然救不了一个弱女子，而感到痛心疾首。

152 关山万里心相通

1935年9月25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策略。会后，党即着手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1936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给身在“国统区”的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宣传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恳请蔡元培推进这一“救亡之至计”的早日实现。毛泽东写道：

子民先生左右：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

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

存亡绝续之日。……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

生将何以处此耶？共产党倡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

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1925年至1927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8月25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国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寇深祸急，率尔进言。风雨同舟，愿闻明教。

敬颂

道安。不具。

毛泽东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事实上，蔡元培自1927年“4. 12”事变之日起，即积极营救革命志士，反对国民党屠杀。事变之后，坚决主张抗日，“直接间接对于国内团结共御外侮，用力甚多”。抗战爆发前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他曾欣然认为是“国家民族的大幸”。

蔡元培对毛泽东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状况非常关心。1939年8月6日，他仔细阅读《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并撰写札记：“阅《西行漫记》，美国爱特伽·斯诺著，吴景崧等十二人译。是书凡十二章：第一，探寻红色的中国；第二，到红色首都去的路上；第三，在保安；第四，一个共产党员

的略历；第五，长征；第六，西北的红星；第七，到前线去的路上；第八，在红军中（上）；第九，在红军中（下）；第十，战争与和平；第十一，回到保安去；第十二，回到白色区域。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的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十二章，叙西安事变”。

“阅《续西行漫记》，斯诺夫人宁谟·韦尔斯著，胡仲持等八人译。是书分五章：第一，到苏区去；第二，苏区之夏；第三，妇女与革命；第四，中国苏维埃的过程；第五，中日战争。又有附录。是书于红军人物叙述最详，诸要人均有自传分叙于各章，而最后附录记八十六人略历，分政治领袖、军事领袖、开除党籍者三类，已有自传者亦列其中，但较略耳。第二章之十一节，中国字变了，指拉丁化中文的利用。第四章之第四节，关于托派的二、三事。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

中国共产党对蔡元培也非常推重。1940年2月5日，毛泽东等发起的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亲临讲话，蔡元培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同月20日，也就是在蔡弥留前的十四天，由毛泽东发起的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宣告成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重要报告，蔡元培待又被推为名誉主席团成员。

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逝世，毛泽东由延安发出一电，向蔡的家属致唁：“子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毛泽东叩。阳。”

1962年春，蔡元培之子蔡无忌在北京参加一次中央举行的招待会，陈毅领他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同他见面后，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你的父亲真是好人。”

“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真是好人”，这就是毛泽东对蔡元培的评价，这一评价充分表达了毛泽东对蔡元培的无限尊重与无尽的怀念。

第二十五章 陈独秀

——引路人战友政敌

真理的蜡烛常常烧伤那些举烛人的
手。一个人要发现卓有成效的真理，需要
千百个人在失败的探索和悲惨的错误中毁
掉自己的生命。

——名人格言

153 偶像的崇拜

1942年，盛夏的一个夜晚。在延安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昏黄的灯光里弥漫着呛人的烟雾，办公桌上的空罐头瓶子里堆积了许多烟蒂，地上飘洒着点点烟灰，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纸烟，并不时来回地踱着步。炽热沉闷的空气，加上主人那不宁静的情绪，使室内的气氛真令人感到窒息、压抑。

刚才，毛泽东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报告：曾是我党创始人陈独秀，因病医治无效，于5月27日在四川江津逝世！这一消息，在毛泽东胸中卷起滔天巨澜，让他久久难以平静。回想起与陈独秀的初识、深交、共事和分歧，不尽的怀念与怅惘之情，填补了岁月的鸿沟，使他与那位既是他的恩师、战友，又是政敌的人，愈来愈近……

早在第一师范读书时期，陈独秀便是毛泽东崇拜的偶像。那时，毛泽东从他的教师杨昌济那里经常阅读到由陈独秀主办的进步刊物《新青年》，他十分赞同《新青年》提出的“提倡新文化，反对旧礼教；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劳工神圣，反对剥削生活；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等一系列主张，遂成为这份杂志的热心读者和忠实朋友。他尤其喜欢看陈独秀和李大钊发表在杂志上的那些思想激进、旗帜鲜明而又笔调清新的文章，总是反复阅读领会，并将一些精辟段落和具有哲理、远见的句子摘抄下来。

毛泽东不仅爱读《新青年》，还曾给它投稿。1917年春，他登过岳麓山之后，激情之下，写了《体育之研究》一文，署名“二十八画生”，寄给《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慧眼识珠，很快便将这篇文章在《新青年》上发表了。

在一师求学的后期，毛泽东除每天上学、读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由于受《新青年》的熏陶，他深深感到，中国需要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风俗、习惯各个方面，进行根本改造。这样，他就由早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救国救民思想，发展到了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根本改造国家和社会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他逐渐意识到，要彻底改造中国决非一件容易的事，也决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成，更非少数几个人的力量所能办到的。除了自己从各方面作好充分准备之外，还必须联合更多的同志，共同为之奋斗。因此，他深感成立一个坚强而又严密的团体的需要，于是“新民学会”便应运而生了。诚如毛泽东所言：“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更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发起新民学会。”“这个社团，多多少少都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组织起来的。这一著名的文学复兴刊物是由陈独秀主编的。我在师范学校读书时，就开始读这一刊物，十分敬仰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取代了我已经摒弃了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我新的榜样。”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毛泽东便在第一师范毕业，尔后即于1918年秋天第一次到北京。在京期间，由于杨昌济的介绍，作为北京大学旁听生和北大图书馆临时工作人员的毛泽东，认识了当时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陈独秀。通过短暂的接触，陈独秀那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深刻地影响着年轻的毛泽东。后来，他曾对人回忆说：“第一次见到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国立北京大学，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

《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第29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

此后，毛泽东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帮助下，参加了陈独秀所属的北大文学院的各种学术活动。1918 年冬，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1919 年 1 月 28 日，参加了李大钊、蔡元培等组织的北大哲学研究会成立大会；2 月 19 日，又出席了新闻学研究会改造大会；1918 年 11 月 15 日，他还专程前往北大在中央公园举办的演讲会上听陈独秀、李大钊演说……通过这些学术活动，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建立了名副其实的师生关系。陈独秀对毛泽东这位才思敏捷、颇有见地的“编外学生”很是器重，常常对他悉心指导；毛泽东更是敬仰陈独秀这位思想深邃、博学雄辩的老师，以能从师这样的名师名下为荣幸，因而更是用心学习和请教。尽管他只在北大学了短短的半年多时间，但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知识上都有很大收益。

1919 年春天，北京街道的垂柳已被春风染绿的时候，毛泽东为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出国，离开了北京，乘火车南下上海。行前，李大钊嘱咐他：“你不妨再找一下陈独秀先生，他现在上海，他对马克思主义、对俄国革命颇有研究，对中国的现状与前途有独到的见解。”根据李大钊的意见，他在上海又拜会了陈独秀，聆听了他关于社会改造的教诲。

通过多次同陈独秀的接触，毛泽东对老师那极富特色的个人品质有了较深了解。他发现：陈独秀既有政治家的激情，又有思想家的睿智；既有文人的偏颇，又有智者的豁达；既有青年人接人待物的板拙，又有成熟者洞明世事的练达。他严谨到刻板的程度；他勤奋，事无巨细，一概付出全部的热情；他忠诚，对自己信仰的马列主义视若神圣；他坚定，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去追求既定的目标。他的本身，充满着数也数不清的矛盾，简直就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但是，正是这些矛盾组成了性格的和谐，构成了他多侧面、多层次、多色彩的人格，从而显示出无与伦比的个性魅力……所有这些，都令初出茅庐的毛泽东崇拜不已。

1919年12月，为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出湖南，毛泽东率领一个由湖南各界人士组成的百人代表团，再次来到北京。

进京以后，他稍事安顿，便匆匆前往北京大学，急于同陈独秀、李大钊、杨昌济、蔡元培等几位老师见面。然而，在李大钊先生那里听到的消息是：陈独秀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因在运动中与进步学生一道上街张贴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关押数月，蒙孙中山等保释。

出狱后，为避开反动军阀的继续迫害，已离开北京这块“腐臭之地”，南下上海；此外，杨昌济先生也积劳成疾，身患绝症，住进医院……第二次北京之行，未能与陈独秀谋面，令毛泽东深为遗憾。

通过毛泽东一行在北京数月的活动，广泛取得了社会舆论和湖南籍在京知名人士对“驱张”运动的大力支持，代表团已完成赴京的使命，遂于1920年2月底回湘。这时，陈独秀正与陈望道、李达、李汉俊等人，在上海着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闻讯后，会晤陈独

秀的心情更加急切，便决定暂缓回湘，先取道上海。3月初，毛泽东告别李大钊先生，离京赴申。

在上海，毛泽东终于见到了分别一年的陈独秀。陈独秀对于这位进步的湖南青年的到来，也深感高兴，他让他留下来一同参加即将开展的一系列社会活动。根据陈独秀的建议，毛泽东尔后在上海逗留了将近三个月。

这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经常见面，有了异常密切的交往关系，两人交谈问题的深度与广度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商讨过组成“工读互助团”事宜，预测过湖南“驱张”运动的前景，研究过如何在湘沪乃至全国开展革命。但谈得最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何在中国青年中宣传马克思主义，鼓动人们信奉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对马列主义的执著信仰，深深地打动着毛泽东的心，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促使他在世界观上发生着根本的转变。

在这段时期内，让毛泽东最感兴奋的是，他“改造社会”的理想已打破仅停留在口头上的状况，在陈独秀的引导和支持下，开始付诸实际行动——他和陈独秀共同着手办了两件有意义的事情——成立“工读互助团”和筹建“改造湖南联盟”。

3月5日，陈独秀、王光祈、毛泽东、彭璜等联名在上海《申报》上刊登了《上海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以此为标志，上海“工读互助团”正式宣告成立。陈独秀等人在“启示”上阐明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办法。”5月间，根据驱张运动的进展情况，毛泽东找陈独秀多次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陈独秀提出详尽的意思，纠正了毛泽东反映在“改造湖南联盟”计划中的无政府主义观点。6月，《申报》发表了毛泽东、彭璜草拟的《湖南改造促进会发起宣言》和《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这两篇文章，从军政、财政、教育、自治、交通和民权等六方面，勾画了未来湖南的蓝图，提出湖南未来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革命政府、军队、警察和严密的政府机构，要有法律制度，各种群众团体，人民要有一定的权利义务等。所有这些，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不能认可的。毛泽东提出了这样的改造湖南纲领，表明了他接触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的过程中，在马列主义与其他各种主义、学说的对比抉择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动摇进一步加剧，并开始抛弃它。对于

与陈独秀共同商讨组织“改造湖南联盟”一事，毛泽东自己也曾作过回顾，他说：“1919年，我第二次去上海。在那里，我再次见到了陈独秀。……在上海，我与陈独秀讨论了要组织一个

‘再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我返回长沙后，着手组织这一联盟。”

在上海期间，毛泽东与陈独秀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陈独秀对毛泽

东十分信任，他将自己的建党计划也告知了毛泽东。早在1919年初，陈独秀、李大钊就通过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人与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1920年，共产国际的权威代表维金斯基抵达北京，陪同前来的俄共党员杨明斋充当翻译。他们与李大钊进行了商谈。还与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会部分成员会了面。之后，第三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来到上海，专门与陈独秀进行了会谈，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事宜。同年5月，陈独秀和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召集会议，着手建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准备工作。陈独秀将建党计划这一十分机密的情况告诉毛泽东，可见这时的毛泽东与陈独秀是真诚相见、无话不说的。正是这一次接触，在稍后一些时候才基本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对年轻的毛泽东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后来同斯诺所说的：“我第二次去上海，曾与陈独秀探讨了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亲聆他谈他自己的信仰，这在我一生也许是最关键的时期深深地影响了我。”所以，“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在上海生活了三个多月后，毛泽东于7月初从上海回到长沙。遵照陈独秀关于在湖南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建党作宣传舆论准备的嘱托，毛泽东经过一系列周密筹备，联络易礼容、彭璜等人发起成立了长沙文化书社，其宗旨是：“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实际上，毛泽东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在湖南传播新文化和马列主义，建立一个牢固的阵地。陈独秀对毛泽东创办书社给予热情支持，他和李大钊、李石岑等文化界名人一起主动承担该社在北京、上海等地的“信用介绍”，使文化书社在业务往来中得以免去押金，以便扩充进书量，加快周转。这样就解决了该社开办之初资金周转困难的燃眉之急。毛泽东则指导文化书社对与陈独秀等人有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等，给予隆重介绍，广泛传播。

文化书社前后创办了七年时间，为传播马克思主义。联络和团结社会各界发挥了积极作用。1921年12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陪同下，去桂林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时，毛泽东与他见面交谈就是在文化书社里秘密进行的。在建党的思想准备时期，有书社这样一个公开发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机关，方便多了。书社还为建党的早期活动提供了部分活动经费和秘密交通联络。1921年至1923年，书社曾作为青年团的活动场所。

应为1920年春。“1919年，我第二次去上海”属记忆有误。

《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115页。

155 共同建党

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独秀立即给长沙的毛泽东写信，函约毛泽东在湖南建党，并寄来一些进步书报给毛泽东。10月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建立，陈独秀随即给毛泽东寄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并介绍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组织发展情况。

毛泽东接到陈独秀的信和团章后，马上秘密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并亲自到第一师范、第一中学物色人选，以保证组织的纯洁性。据毛泽东回忆，正式发起时在文件上签名的有他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六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多次向远在巴黎的蔡和森等人，介绍陈独秀在上海的建党情况，以加强留法学生对陈独秀的了解。如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复信中，他说：“党一层，陈仲甫先生（即陈独秀——引者注）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值得附带记述的是，蔡和森正是通过毛泽东对陈独秀的不断了解，才逐渐与陈建立起信任与友谊，一俟他从法国留学归国后即找到陈独秀，由陈独秀亲自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期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还有刘少奇和林伯渠等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毛泽东采纳蔡和森“组织此事须秘密”，活动必须“潜在从事”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或个人名义，领导和从事组织、宣传活动。

在宣传方面，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除了运用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以外，还开始注意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在组织工作方面，除慎重发展成员外，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把主要精力放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毛泽东同何叔衡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经过多次研究以后，认为新民学会的许多会员都已有过比较长期的思想准备，参加了许多实际革命斗争，有决心为马克思主义的理想奋斗，因而只要自愿，许多年轻的会员特别是新会员，都可以加入青年团，成为其中的骨干。1921年1月13日，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1921年6月初，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可洛夫来华，对中国革命进行具体的帮助。他们在上海同陈独秀、李达等进行了商谈后，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于是，陈独秀、李达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就担负了发起、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6月下旬，毛泽东接到陈独秀领导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关于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29日，他和何叔衡一道离开长沙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们动身时的情形，据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同在第一师附小任教的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黑云蔽天欲作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的‘突然’，他们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知道，这就是他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7月上旬，毛泽东和何叔衡经武汉到达上海。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三集。

谢觉哉：《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同志》，《谢觉哉杂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330～331页。

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子学校正式开幕。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十二人，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可洛夫也到了会。会场的布置很简单，只有一个大菜台，周围可坐十余人，各代表席上只放了几张油印的文件。毛泽东和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各地的工作。马林即席讲话，代表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希望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们为革命努力工作。接着，代表们在望志路108号的厢房楼上进行大会的议事日程。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大会的最后一天，改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大会经过充分的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纲，确定了完全以俄国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导思想的建党原则并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这次会议的组织 and 筹划者陈独秀，因故虽未出席大会，但鉴于他的名望和在建党工作中的贡献，仍被代表们选为党的总书记，毛泽东亦被选为大会的秘书长。

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回到湖南，住在船山学社，开始进行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的工作。萧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一个秋凉的日子，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旁边的一个小丛林里，有几个人在散步。他们时而默默地站在树丛和石碑的中间，时而在丛林里的小路上走动，彼此热烈地谈论。在高高身材、神情凝重的毛泽东的旁边，是宽肩膀、矮矮身体、一口黑胡子的何叔衡。此外，还有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大家在这里讨论建立共产党湖南支部的问题。这一天是民国十年的十月十日（曾被戏称为“三十节”），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正式成立了。毛泽东被选为书记。

党支部成立后，首先在长沙发展党员，并根据各地工作的基础，建立党的地方基层组织。毛泽东采取积极慎重的建党方针，一方面在原新民学会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中，个别地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分子入党；同时广泛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学校中，他首先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学校发展了党员，并在有的学校建立了支部。工人中，首先在长沙的粤汉铁路、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铅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发展了个别党员。从1921年冬至1922年春，衡阳、平江、安源、岳州、常德等地都发展了党员，有的地方还建立了党的

小组。在此基础上，1922年5月，中共湘区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区委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这是城郊一个清冷、荒僻、无人注意的地方。在1923年4月以前，毛泽东一直住在这里，为发展和壮大党的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罢工斗争，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开始焕然一新了。从此，作为党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也就更加自觉地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工作一直很信赖，并极力提携毛泽东。1921年11月，陈独秀在起草中央通告中，要求长沙与上海、北京、广州、武汉五区，在近年内发展组织三十人，以便成立地方执行委员会。毛泽东接通告后，积极活动，创造条件，到衡阳、安源等地从事活动，秘密发展党员，准备成立中共湘区委员会。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湖南的党组织很快发展到四十人，并在衡阳、常德、岳阳等地建立了党的小组。这样，到1922年党的“二大”召开时，全国一百二十名党员，湖南就占了三分之一，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对此，陈独秀多次表扬湖南的工作做得好。在党的“三大”报告中，陈独秀高度赞扬了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工作，比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的工作做得要好，特别是工人运动，“湖南几乎所有拥有3万人以上的工会，都在我们控制之下”。“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由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的工作完成得出色，加上陈独秀的推举，毛泽东于1923年5月奉调到上海，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这样他与陈独秀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在党的“三大”上，毛泽东与陈独秀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任委员长，毛泽东任秘书。根据“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及秘书召集之”。显然，陈独秀和毛泽东此时已经一起承担着党中央领导工作的重任。

大会后，毛泽东随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9月迁赴上海。不久，他又受陈独秀所托临时离开上海去长沙，贯彻党的“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11月底，离开湖南再到广州，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第二年二月中旬，毛泽东从广州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在闸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机关内，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工作，协助委员长陈独秀处理日常事务，起草、签发文件，掌管全党的组织工作。这样，年方三十的毛泽东开始直接参与了中央的领导工作。

据当时也在中央工作的许行之回忆，毛泽东“在上海主要是写文件”。他住在楼下厢房，“靠天井窗边有三个抽屉的一个写字台。中间是卧室，床上有竹竿撑起，纯白色的蚊帐，这蚊帐是湖南带来的，中间还有一只方桌，主席就在这方桌上写文章。”

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期间，由他起草或陈独秀联合签署的文件至今找到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关于“五一”、“五四”、“五五”、“五七”之纪念与宣传》、《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号——声讨吴佩孚、萧耀南破坏革命，逮捕许白昊等》，《中共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加强党务工作，对孙中山参加北方和会的态度》等通告；还有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发的有《为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意见给各地的通知》、《中共中央关于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通知》、《各地委分配及推销中央机关报办法》等文件。从这个时期毛泽东与陈独秀所发表的通告和文件的情况看，他们之间配合是很默契的，在对待党内的许多重大问题上观点还是比较接近的，彼此尚无思想分歧。

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的分歧，始于1925年底。

身为党中央秘书的毛泽东，自幼在农村长大，对穷苦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学生时代他曾“游学”湖南的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步行四百五十多公里，对农村作过调查；1921年春夏，他又深入岳阳、华容、南县、安乡、湘阴等县农村进行过调查；1923年4月，毛泽东派遣水口山工人刘东轩和谢怀德回家乡衡山岳北农村从事农民运动。经过几个月的访贫问苦、组织发动，于9月中旬成立湖南衡山岳北农工会。岳北农工会领导农民进行平崇、阻禁、惩办土豪劣绅的斗争，取得了震撼四乡的胜利，会员曾经达到四万余人，成为湘南农民运动的先声。但是，直到1925年初，毛泽东还“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这年2月至8月，毛泽东利用回湘养病的机会，发动和领导了故乡韶山的农民运动，他同贫苦农民促膝谈心，对农民进行阶级教育，创办农民夜校，建立秘密农会，并采用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与此同时，毛泽东又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状况作了进一步调查研究，并亲手创建了韶山党支部。这个支部在组织领导韶山的农民运动中，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这次韶山之行，使毛泽东认识到“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一场迅猛的农民运动风暴即将来临，“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从此，农村就像是一块巨大的磁石，深深吸引着他。这年秋，毛泽东到广州后，就给中共湖南区委写信，建议湖南多选派干部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培养农民骨干。湖南区委遵照他的指示，第一批选派了十二人，第二批选派了四十四人，分别前往广州农讲所第四期和第五期学习。毛泽东亲自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时，湖南又选派了三十六人前去学习。这些学员学成回湘后，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还亲自给韶山党支部写信，指示要把“雪耻会”变成公开的农民协会组织，并寄去一份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韶山党支部根据这一指示，立即决定以韶山“雪耻会”为基础，正式成立“湘潭西二区农民协会”。

在深入进行农民运动斗争实践的同时，毛泽东还对中国农民问题作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精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一个基本问题——农民同盟军问题，指明了农民运动在中国革命中前途。

而这时的陈独秀，在对待农民问题上，与毛泽东就不一致了。陈独秀过分夸大了农民落后性的一面，甚至听到国民党右派的一面之辞，就跟着斥责农民运动“过火”，并拒绝在党报上刊登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毛泽东曾回忆道：“我写的文章越来越多，在共产党内专门负责农民的工作。根据我研究和组织湖南农民工作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叫《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叫《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我在第一本小册子里表达的观点，即主张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激进土地政策和强大农民组织，他拒绝在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它。后来，这本小册子在广州的《中国农民》和《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二篇在湖南出了小册子。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我们之间的斗争到1927年才达到顶点。”

陈独秀与毛泽东在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上的分歧，也直接反映在 1926 年 12 月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上。这次会议上根据陈独秀的政治报告作出决议，错误地认为当前主要的危险是农民运动勃起并日益左倾，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运动而日益向右，左右距离日远，会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国民革命运动。根据这一错误形势分析，会议规定当时党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同时扶持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这实际上是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在会上，陈独秀还斥责湖南工农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妨碍统一战线”等等。

在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陈独秀采取了教条主义的态度，一味屈从于国民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人数少，不易形成强大的力量，从而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毛泽东通过对中国社会及各阶级状况的分析，认识到：中国“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的领导力量。”所以，近代中国革命必须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才能取得胜利。还有在对待中国革命的前途、对国民党的估计、武装斗争等问题上，毛陈之间也存在着严重分歧。

对于中央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毛泽东“非常不满意”。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攻击、怀疑和指责，1927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5 日，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的身份，在省农协负责人戴述人等的陪同下，身着蓝布长衫，脚穿草鞋，手拿雨伞，考察了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毛泽东的这次考察活动，历时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广泛接触了各方人士，获得了极其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正是根据这些材料，毛泽东断定，农民运动好得很！2 月 12 日，毛泽东由长沙到武汉。16 日，他给中共中央写了“视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其主要内容，是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农民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痞子运动”、“情农运动”的议论。紧接着，毛泽东便在武昌都府堤 41 号住所的卧室内，就着小煤油灯奋笔疾书，赶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报告”写成后，陈独秀竟又一次拒绝在党报上发表。是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刊于 3 月 5 日首先刊载了此文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刊才开始登载。4 月，瞿秋白以《湖南农民革命》为题，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单行本，由长江书店印发。他为该书写了一个序言。序言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争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该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毛泽东对湖南农民运动的实地考察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发表，以强有力的事实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种种错误议论，极大地鼓舞了高涨的全国农民运动。但是，这件事也触怒了陈独秀，他不能容忍自己昔日的旁听学生冒犯他的尊严，他更自信自己对中国革命的现状和前途的了解与把握是正确无误的，他开始从政治上排挤毛泽东了。毛泽东回忆说：“1927 年春天，尽管共产党对农民运动持冷淡态度，尽管国民党对此有些惊恐，在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农民运动的战斗势态已经发展到惊人的地步。国民党高级官员和将领开始要求镇压，他们把农民协会说成是‘痞子协会’，说它的行动和要求过火了。陈独秀把我调出湖南，认为我应对那里发

生的一些事件负责，粗暴地反对我的观点。”及至党的“五大”上，陈独秀公开动用组织手段压制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受到党内错误批评，被迫违心辞去中共中央的领导职位。对当时的情况，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1927年5月，党的五大在武汉召开，党当时仍受陈独秀支配。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开始在上海和南京向共产党进攻，而陈独秀却仍主张对武汉国民党妥协退让，他压制一切反对意见，实行右倾机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政策。当时我非常不满这种政策，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政策。今天我认为，假如农民运动能更彻底地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苏维埃也许早就更强大地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了。”

“但是陈独秀激烈地反对。当时，他既不了解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也大大低估了这种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前夜召开的五大，没能通过一个合适的土地纲领。我要求迅速加强土地斗争的意见，甚至都没有予以讨论，因为被陈秀把持的中央委员会拒绝对它们加以考虑。这次会议除了把地主定义为‘有五百亩土地以上的农民’以外，就没有再讨论土地问题——根据这一定义来开展阶级斗争，是很不合适和不切实际的，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土地经济的特殊性。然而，会后还是成立了一个全国农民协会，我当了第一任会长。”

《红星照耀中国》第 122 页。

《红星照耀中国》第 121 页。

中共“五大”以后，尽管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政策，力图同国民党求得妥协，可是国共合作的形势却每况愈下，国民党右派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磨刀霍霍，正伺机绞杀大革命。

此时的毛泽东，由于与陈独秀政见不合，在中共中央几乎丧失了发言权。出于对革命的最高利益的考虑，他选择了“服从”，只保留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主张，但是，他的内心却充满着深深的不平与愤懑。是的，陈独秀曾是他极力推崇的导师；在“五四”新文化的浪潮中，陈独秀是“总司令”，自己还是个无名小卒；在完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过程中，陈独秀走在了最前列，是自己的引路人。他承认，陈独秀所读的马列著作，自己甚至还有许多未曾涉猎到，可是中国国情这么复杂，光凭多读几本经典著作恐怕还是不够的，用为经典著作中毕竟没有解决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良方啊！然而，陈独秀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他太自信了，自信得有些刚愎自用，他看问题常常十分偏颇，一种想法一旦形成，便不容更改，更听不进相反的意见。他缺乏党内民主作风，有时就像一位封建式的家长。“陈独秀那时在中国党内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在重大的决策上甚至不与中央委员会磋商。”“他不让其他党的领导人看到共产国际的指令，甚至不与我们讨论这些命令。”这是毛泽东后来对陈独秀的工作作风所发表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陈独秀致命的问题是思想上的毛病，“陈独秀真正害怕工人，特别是武装起来的农民。当最终面临着武装反抗的现实时，他完全丧失了理智。他不再能明辨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小资产阶级本性使他陷入恐惧和失败。”

基于上述这些看法，毛泽东对陈独秀那虔诚的个人崇拜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失望。他决计从陈独秀这位思想巨人的影子下跳出来，去走一条更适合中国人应该走的路，同时也确立自己应该确立的位置。从此，他们分道扬镳了！

1927年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湖南、湖北的国民党右派相继叛变革命，5月21日在长沙制造了袭击工农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马日事变”。政治风云突变，革命走向低潮。毛泽东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这样说：“许多共产党的领导人奉党的命令离国出洋，到俄国或上海或更安全的地方。我被命令去四川，但我说服陈独秀派我去湖南任省委书记，可十天后他就命令我立即返回，他指责我组织暴乱反对控制武汉的唐生智。现在党内处于混乱状态，差不多人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不久，武汉国共合作的瓦解导致了他的倒台。”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从组织上解决了陈独秀的问题，改组了中央常委会的领导核心。毛泽东被通知出席这次会议。当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时，他提出了“上山”的策略：“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他还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这一想法，是他早就深思熟虑并有过一定准备的。在这以前，亦即他说服陈独秀派他“去湖南任省委书记”的期间，毛泽东曾经回湘积极恢复党的组织

《红星耀中国》第123—124页

《红星耀中国》第123页

《红星耀中国》第122页

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会扩大会议记录。

联系，并恢复和扩建了“工农自卫军”，秘密从事武装训练，伺机准备上山。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受到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视。7月20日，中共中央下达了《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的总策略》。该文件指出：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夺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

中央常委扩大会后，毛泽东留在中央准备“八七”会议，参与制定湘鄂赣粤秋收暴动大纲。8月7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即著名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参加了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了言，他认为陈独秀应替大革命失败负责，是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在进一步妥协明就意味着灾难的关头，使得党丧失了决定性的领导和自己的路线”。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陈独秀在革命统一战线中自动放弃领导权，反对农民革命，致使大革命失败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阐明了革命的统一战线必须由我党领导，由工农大众做主人，没收地主的土地以满足农民的要求，并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思想。这便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由来。

对于中央的批判和处理，陈独秀似乎并未心服口服。他认为自己只不过是斯大林路线的替罪羊。在他的内心，始终想不出自己错在哪里？他觉得，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原因所造成的。中国有名古语：自古兴亡不由人……在大革命后期那种纷坛复杂的政治局势下，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更何况，自己是完全按照被中国共产党奉为行动指南的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陈独秀知道，正是自己盲目执行国际路线，造成了自己与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众多中国同志和战友的政治分歧，最后导致了自我的垮台。

所以，他把气出在“国际路线”身上。在武汉召开的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他就曾为自己申辩说：他在1927年初曾抵制共产国际，但遭到拒绝。此后，尽管他“有更好的意见，但还是服从了共产国际的纪律和斯大林的指示。”在“八七”会议以后，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的陈独秀，公布了一封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反对中央仍采取“‘捍卫苏联’作为超过其他一切革命行动的第一位考虑的任务”。他为此又受到中央的批判。

这大概就是陈独秀的政治悲剧所在。他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拿马列著作当教条，照本宣科，生搬硬套，因而始终找不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且为之付出了失败的代价；他敬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唯“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可又要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同志一道从事革命事业。在这当中，当共产国际的指令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左时，他常常夹在其中。为了自己追求的事业，他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求得平衡，可是没料到最后平衡失去了，他也摔了个大跟头！权力的双刃刀在用之不当，既伤害了革命，也伤害了自己，他沉入郁闷难抒的痛楚之中。

尽管陈独秀在“八七”会议上受到了“小字辈”毛泽东的严厉批判，但他了解毛泽东是一个公事论理不论情的人，因而不但从未发表过反对毛泽东的言论，而且还称赞毛泽东的领导。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接着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使革命首先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得以胜利。陈独秀对此深表赞扬，认为毛泽东领导开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之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和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农民”的见证。“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政制，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有了俄国的经验，它不但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保障，同时，也是空前的最高度的民主主义政制，任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权所不能召集的彻底民主的国民会议，只有它能够召集。”

这是他经希望幻灭之苦以后，从失败的痛楚中得出的经验总结。然而，他总结得有些晚了……

159 悲剧性的人生

命运对于陈独秀似乎是极不公平的。他毕生致力于共产主义事业，不惜为之抛头洒血。他一生中，先后五六次坐过反动军阀和国民党的监牢，肉体上受尽摧残和折磨，精神上倍遭欺凌与侮辱。这还不是最痛苦的，最痛苦的是革命同志的曲解和反对，他被冠以“有倾机会主义头子”的恶名，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因此，他失去了党，失去了同志和战友，失去了家庭，失去了他昔日拥有的一切。他不得不像一片残叶，被风悄然无声地刮到某一角落，蜷曲起来，直致腐烂、化一杯泥土……

啊，悲壮的人，悲剧性的人生！

陈独秀的婚姻也充满着悲欢离合。

光绪二十三年，陈独秀考中秀才后，由父母包办娶了清军副将高登科的女儿高大众。陈独秀对这门亲事快快不乐。这不仅由于高大众长他两岁，更主要的是他对这种包办婚姻深恶痛绝。新婚后，起初两人还过得不错，数年之后高大众也为陈家添了两个孩子——长子延年、次子乔年。但两人间性格和个性的间隙已到了难以相容的地步；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而高大众却是个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式妇女，对陈独秀劝她识字不屑一顾。后来陈独秀参加了革命，她坚决反对他这么做，说他是大逆不道，夫妻常常闹得不可开交。

不久，陈家来了一位意想不到的客人——妻妹高君曼，她和高大众完全不同，就学于北京女子师范，特别喜爱文学，见地也很广博。此时陈独秀在文化界已有名气，高君曼对他十分崇敬，两人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说到女人，谈得很多，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告辞的时候，借走了几本书。以后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不时地和陈独秀见面、攀谈。两人过从甚密，自然也少不了风言风语，但高君曼似乎并不在意，而陈独秀也感到只有她才谈得上理解自己，所以也不因人言而回避。相处日久，两人的感情日趋融洽，后来陈独秀借出国留学的机会，把高君曼也带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两人终于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就此形影不离，于1910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自由结合。

但是，琴瑟和谐的生活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注重稳定宁谧的家庭生活，陈独秀却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她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与了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更是充满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是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的固执与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她想把姐姐生的孩子延年、乔年接到家里，陈独秀却坚决不同意。高君曼忍无可忍，从口舌之争，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幼就娇生惯养，哪能容忍，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一双儿女松年和筱秀，离陈独秀而去，直到1931年在南京香消玉殒，也没有再去见他。

婚姻生活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了很多的刺激，其时又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延年和乔年也相继壮烈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党内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他更名易姓，在上海贫民集中的地区隐居起来。他租住的地方叫岳州路永兴里十号楼，同楼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比陈独秀小三十岁，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她当时不知道陈独秀的真名实姓，也不过问陈独秀的行动。因敬重陈独秀的

学问，同他成了忘年交，并逐渐产生爱慕之情，随后与之同居。几年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的菲薄薪水，她却毫无怨尤。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报上登了消息并附有照片，她才恍然大悟。得知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国民党政府通缉已久的著名共产党领袖人物时，潘兰珍不由惊喜交加，更加觉得自己终身没有误托。于是，立即辞去工作，收拾行装赶赴南京，租了一间房子，一面揽活赚点钱，一面抽出时间到“南京模范监狱”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南京坐了五年大牢，潘兰珍给他送了五年牢饭。由于潘兰珍的精心关照和看护，陈独秀虽然在狱中患过多种疾病，但安然无恙。陈独秀于1937年重新获得自由以后，两人正式成为夫妻。自此，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和他一起飘泊流落。潘兰珍与陈独秀没有子女，但两人因是患难夫妻，格外恩爱。据见过潘兰珍的人说，“她圆脸短发，个子矮小，不爱言语，每次外出做客，总是默默地陪在陈独秀身边低头不语。回到家中，就整日悉心照料陈独秀的病体。”

陈独秀定居江津时，他的母亲（嗣母）和儿子松年也定居江津，老老少少合住一起。潘兰珍很会处事，一家人和睦相处，十分融洽。她操持家务，勤快有方，竭尽全力维持艰苦的生活，深得陈家老少的尊重。闲时，她还挽着陈独秀在江边闲谈，或陪他在野外散步。陈独秀脾气不大好，有时心情烦躁，潘兰珍便轻声劝说，从不与之争吵。由于敌人的迫害和窘迫的生活，陈独秀身体已变得很坏，有时胃痛得在床上打滚。陈独秀病重归土后，潘兰珍几日不思饮食，眼泪终日不断，十分痛楚。她遵照陈独秀“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的临终嘱托，带着陈家给她的少量的陈独秀的稿费，离开陈家，自谋生活。先是在重庆一家农场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定居，并收养一女，聊解孤凄。1949年11月，潘兰珍病逝于上海肿瘤医院，时年39岁。这位为政治上和生活中都失意的陈独秀奉献出全部爱的女人，谨守她所敬爱的人的遗嘱，终于以一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的身份，在自食其力的艰苦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最后一程。

1937年，抗战爆发，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寇长驱直入，上海、太原相继失陷，南京告急。1938年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随后南京失陷，又从武汉迁都重庆。以后，武汉、长沙都被日军占领，大批难民流离失所，蜂拥来到陪都重庆。在逃难的人群中，有一个身材清瘦，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长衫的老者，在一年轻妇女的搀扶下，步履蹒跚挤上了汉口到重庆的轮船。他，就是曾被共产党宣布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刚释放不久的原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陪伴他的女性，就潘兰珍。经过几个月的飘泊流落，陈独秀显得有些疲惫不堪，脸色苍白。

陈独秀为什么会出现在重庆呢？这还得从时局说起。

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要求下，国民党不得不释放许多知名的政治犯，陈独秀便是其中之一。1937年8月23日中午，陈独秀走出南京模范监狱大门，便应邀住在他的学生、国民党立法委员傅斯年家中。当时日寇已攻下上海，经常派飞机轰炸南京。有一天，傅家住宅附近被炸塌，傅斯年也不告而别。陈独秀无奈，只好寄居另一学生陈钟凡家。9月中旬，南京兵临城下，国民政府搬到武汉，陈独秀也随之到武汉，住在汉口老租界里。由于战局恶化，陈独秀又移迁长沙。以后，国民政府搬到重庆。1938年7月2月，陈独秀逃难到重庆，住进石板街十五号川原公司一个姓黄的资本家家里。由于陈独秀是有名的风云人物，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都纷纷求见，但陈独秀都以身体不适，不愿见陌生人为由，拒绝接见。

在陈独秀到达重庆之前，他的嗣母和一个儿子陈松年已先期到达重庆。当时，迁居江津的安徽人很多。特别是在国立九中任教的人中，陈独秀的同乡和熟人以及他的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当陈独秀到达重庆之后，他们更通过书信和托人转告等形式，邀请陈独秀到江津居住。陈独秀初觉得江津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有些犹豫。入夏后，号称中国三大火炉之一的重庆更是酷暑难忍，对患有高血压病的陈独秀来说很不适应；另外，日机空袭频繁，到处狂轰乱炸，白天黑夜都不得安宁；再加上重庆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但国民党仍然耿耿于怀，放心不下，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感到非常沮丧。在陈独秀早年的同学和朋友、国立九中校长邓季宣和安徽名医邓仲纯的竭诚劝说下，陈独秀于1938年8月3日搬到了江津居住。

陈独秀到江津后，虽然表面上行动自由，其实暗中仍受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当时的江津县长曾向陈独秀的学生透露说：“陈先生是受监视的，重庆方面常派人来监视他的行动，每隔一两个月就要来人问问。”

其实，陈独秀对自己的险恶处境，心里也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蒋介石是不会轻易放过他这个共产党的“开山鼻祖”的，他们表面上给他这么点“自由”，不过是想利用他做点文章，捞到一些政治实惠。因此，他言行格外谨慎，平日深居简出，只谈柴米油盐、天气冷暖，似乎无意关心时局，只图安度晚年。

但是，由于陈独秀过去的名声，江津的上层人物也有常来拜访他的。每当这时，他往往只是陪着静坐喝茶，沉默不语，绝口不谈及国事。据一些老人回忆，陈独秀的安徽口音很重，一般人都只听其言，不解其意。有时，陈独秀也在潘兰珍的陪同下，到江津公园内的“支那内学院”去散步、找人谈话聊天。“支那内学院”是由南京迁往江津的一个佛学研究机构，地处长江边上，风景很是优雅。只有在这里，陈独秀才能在精神上获得短暂的安逸与

宁静。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生活十分清苦。其时他虽早已离党，然仍不失中华儿女的骨气，尽管贫病交迫，但绝不受国民党的拉拢和俸禄。他的住房是一间偏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土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俱也十分简陋，仅有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以及遍地堆积的书报。陈独秀搬到石墙院不久，一次到城内延年医院治病，便发生了寓所被盗事件，几口箱子以及部分书籍和手稿被偷走。陈的箱子中值钱的东西很少，只有一些换洗衣物、手稿和一枚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玉印章。对于衣物的损失，陈独秀毫不在意，但手稿和印章却是他的心爱之物，失之痛心。奇怪的是，后来经县警察局追查，衣物居然得以物归原主，但手稿及印章却永远失去踪迹。对于陈独秀寓所失盗事件，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因陈独秀是名人，又是外来户，强盗以为他很有钱财，箱子里装的非金即银，所以被盗；另一种说法是，因陈曾是共产党的要人，国民党不放心，便制造了一个盗窃案，借以检查他的行动和书信。

当时，陈独秀曾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有少量津贴。有时他也为其他报纸写些文章，但敢登者甚少。靠这些微薄的稿酬是应付不了物价一日三涨的生活的。陈独秀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北大同学会资助。

1942年5月27日，虽时届初夏，但天色阴霾，还夹着丝丝小雨，使人觉得寒气未退。晚上九点四十分，当医生给已昏迷两天的陈独秀注射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后，陈独秀挣扎了起来，两眼露出绝望的目光，突然头一偏便倒下去了。就这样，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陈独秀，在离江津城二十多里地的偏僻山村，静静地离开了人世，终年六十三岁。

161 公正的评价——“中国的普列汉诺夫”

尽管毛泽东与陈独秀之间，在大革命后期发生了分歧，但毛泽东一直未忘陈对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1963年，毛泽东曾十多次谈起过陈独秀，还曾说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人”。陈独秀出狱后，毛泽东曾派叶剑英找其谈话，邀陈独秀到延安工作。陈独秀对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表示拥护，并通过罗汉找到我党联系，表示愿意在党领导下工作。但据说是康生从中作梗，陈独秀回到延安的意愿才未能实现。陈独秀在江津期间，毛泽东又让董必武同志多次去看望陈独秀，并劝他以国家、民族为重，抛弃偏见和固执，写一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但陈独秀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刘伯坚同志曾从互济金经费中拿了一百元钱给陈独秀，资助其生活。陈独秀对此感动得热泪盈眶，紧握着刘伯坚的手，坚决不收，并说：“互济会的钱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照顾烈士遗孤。”

陈独秀自恃清高，拒绝认错，使之晚年走上了一条绝望、凄凉的道路。但是，他并未因此丧失晚节，丝毫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所动，坚决不肯同他们同流合污。

陈独秀初出狱时，张国焘去找过他，想借陈独秀这块招牌再组织一个伪共产党，陈独秀断然加以拒绝；谭平山曾劝说陈独秀，要他为首组织第三党，陈独秀回答说：“无此意”；胡适想请陈独秀到美国去写自传，陈不干，并说：“不去美国，也烦见生人”；周佛海、张伯苓等人想拉陈独秀进国防议会当议员，陈独秀气愤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不反对他也就不错了！”国民党方面，为了拉拢陈独秀，以便为他们所用，让罗家伦、傅斯年等人利用与陈的师生关系，多次给他送去钱物，陈独秀态度冷淡，拒绝接收。他还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们的救济。”另外，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和大特务头子戴笠也曾到江津拜访过陈独秀。这件事的始末是这样的：当时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并将陈独秀的抗战言论编辑成册，以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比起由叶青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份量重得多。蒋介石与戴笠商量，戴说这不过是张国焘的黔驴技穷手法，把共产党开山祖师搬出来，以此自重，搪塞校长。蒋介石主张将计就计，并特别强调要慎重保密，以私人身份前往。戴笠和胡宗南接到指示后，原打算要张国焘一同去，但张坚决拒绝，理由是会引起陈独秀怀疑，被延安抓住把柄，以后在宣传上有所顾虑，实际上是怕陈独秀臭骂。戴、胡二人准备了水果、茅台酒等礼品，微服拜访陈独秀。陈独秀听说是这两人，感到非常意外，拒

不接见。后来，两人找到陈的亲友高悟罕通融，才得会见。一见面，陈独秀便问是不是蒋介石关照来的？并表示：“我是逃难入川，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闻政治，更不曾有何政治活动。”“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本人孤陋寡闻，不愿公开发表言论，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请转蒋先生好自为之。”戴、胡二人碰了个软钉子，只得悻悻离去……

陈独秀的这些不失气节的举动，自然会通过有关途径反馈到中共

中央高层领导人毛泽东那里，使这位成功者对作为失败者的陈独秀的

悲壮之举，不由发出许多的感佩。当后来得知陈独秀贫病交加谢世于江津的噩耗时，毛泽东这个极重旧情的人，深深地被陈独秀那悲剧性

的人生所悲恸。平时难得流泪的他，不由得也为之洒下一掬同情的泪水。从此以后，毛泽东常常念及陈独秀，不忘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以及对中国革命

的贡献。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肯定了陈独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前期和中

期是正确的。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影响了一大批我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认为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并评价陈独秀在许多方面“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著名人物。他是苏俄社会民主党人，1900年和列宁一起创办《火星报》，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鼓吹暴力革命，对苏俄人民特别是进步的知识分子投身共产主义运动起到了启蒙教育的作用。他同列宁个人友谊甚深，共同的理想和信仰，促使他们一同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并成为他的主要领导人。后来，他在如何对待革命领导权问题、如何组织革命同盟军，以及革命的手段和目的等方面，同列宁产生意见分歧，逐渐演变成政治的态度暧昧、主张折衷调和的“中间派”，实际上滑向孟什维克一边，终于与列宁分道扬镳。尽管如此，列宁仍对他评价很高，在苏共党史上给予他党的创始人的重要历史地位。

毛泽东称陈独秀是“中国的普列汉诺夫”，重在肯定他缔造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功绩，这既体现了他对历史人物的实事求是态度，又说明了他对于历史上曾有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路线错误的人所抱的宽大胸襟。是的。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深知政治斗争的严酷性的。他也曾数次卷入这种斗争之中。但正因如此，他才反对那种用极端的手段来对付对方。他认为，政治路线的分歧，是矛盾双方对中国革命认识的差异、主张的不同，不是敌对的斗争，在这种内部斗争中只能运用批评的武器，而不能采取清洗和消灭的办法。他还认为，在路线斗争的风暴中，有的可以乘机扶摇直上，有的则被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但大丈夫报国，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逆顺，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共产党人不应抱那种“胜者为王，王者无咎”的陈腐观念——只要当权，一切错误都可以诿之客观，如果失去了权力，那就罪责难逃了。按尊卑而定褒贬，看沉浮而事扬抑，历史岂不成了任意转动的魔方？！毛泽东虽然痛心陈独秀的右倾领导给革命所带来的惨重损失，但他从不怀疑陈独秀对马列的坚定信仰和参加革命的动机与目的，更佩服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深知，有时，一个领导者由上下左右的制约，他干了本来不愿意干的事情，如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桂冠会落在他的头上，成了时代的宠儿；有的则相反，被迫干了自己极不愿意干的事情，结果失败了，成了可怜的替罪羊。这中间蕴含着这样一个定律：不管成功失败，任何人都在历史的合力推动下进退沉浮。陈独秀确实犯了大错误，但犯错误不是耻辱，是探求者勇敢精神的体现，是为成功付出的代价，后行的成功者不要耻笑先驱者跌了跟头，要知道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对真理的探索，犹如进入远古洪荒的森林，云遮雾障，危难丛主，前路茫茫，有多少先烈倒毙在披荆斩棘的中途。逝者已长眠，生者将何为？也许先行者的路线偏离了目标，但精神却是伟大的。后来人的成功比起先驱者的探求，谁更值得赞颂？毛泽东自知，陈独秀在中国革命的长河中，是一座连结两岸的桥梁，是一架攀登险峰的人梯，是一个黑暗中火炬或蜡烛的擎举者……当年还是无

名小卒的他，倘若不是从陈独秀那里接触到马列主义，倘若未在陈的影响下开给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信仰的完全确立，那么，他毛泽东是否至今也“还在黑暗中摸索”呢？！.....

后 记

本书是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大祭的时候完稿的。今天能同读者见面，仍值得庆幸。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曾先后三度前往毛泽东主席的生身之地——湖南，进行实地调查采访。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大量资料随着岁月的流逝，早已湮灭。那些日子里，我的心沉甸甸的，随之也感到身上多了几分责任。似乎我的几番远行，不只是为了撰写一本小书，而是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为挖掘和抢救研究毛泽东从师求学生活的珍贵史料，做一件份内的事情。我在那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奔忙着。毛泽东部分老师的故里——长沙、湘潭、湘乡、宁乡、新化、安化、平江、浏阳、岳阳、韶山等市县，留下了我的匆匆步履，三湘大地洒有我辛劳的汗水。

我是幸运的。我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充分肯定。湘潭市政协、湘乡市政协、韶山市政协、湖南省韶山管理局、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长沙市博物馆、湘潭市图书馆、东山学校、韶山学校等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给予了大力支持与热忱帮助；一些在湖南乃至全国知名度颇高的毛泽东思想研究专家，如湖南省韶山管理局副局长高菊村，宣传处长陈高举，韶山市政协常委，“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研究室主任刘胜生，湖南长沙“毛泽东同志青年时期革命活动陈列馆”馆长林陆，东山学校校长陈寿康等同志，或赐教，或赠送书籍、资料和图片，或为采访创造诸多便利条件。同时，笔者所在地的省、市党委宣传部门和所属单位的领导，对本书的写作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扶持，在时间上提供了充分的保障，从而使这部数十万字的书稿能够如期完成。此外，红旗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高晨野编审、甘肃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谢昌余编审，为书稿的审阅和出版工作耗费了大量的心血……。还需特别提及的是，笔者在采写当中，有幸结识了毛泽东老师们的一些后嗣及亲属，书中不少口碑材料及文字资料，便是由他们提供的。在撰稿过程中，还有许多同仁的研究成果和著述可资笔者参考，出版物主要是《毛泽东传》（R·特里尔）、《红星照耀中国》（埃德加·斯诺）、《毛泽东家世》（李湘文）、《伟人之初——毛泽东》（曹志为）、《毛泽东求学的故事》（王以平）、《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苏扬）、《毛泽东和党外朋友们》（即康）、《毛泽东书信选集》，等等；还有《巍巍韶峰》、《湘潭文史资料》、《湖南第一师范校史》等地方性史籍。总之，正是赢得了社会方方面面的鼎力相助，汲取了学界同仁的精神养分，《毛泽东的老师们》才得以问世。值拙作即将付梓之际，请允许我谨向上述单位和同志，真诚地道一声谢谢！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之史料不足，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六年九月

